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上)

水陆洲 编辑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上) 目 录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1965—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4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4
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253
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346
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360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03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 通知” -----	403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	524
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69

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

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978
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1116
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2032
第七节 各省市区文革运动的开展-----	2398
第八节 部队院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3002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3096
第一节 一月革命风暴-----	3096
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3261
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800
第四节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946
第五节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977
第六节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092
第七节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4243
第八节 解决陶铸问题-----	4725
第九节 批刘保帅保肖-----	498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一章（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1965—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从 1959 年 6 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 年，他又经过 7 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

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

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 1569 年夏到 1570 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 24 万亩，有的说 40 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

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乏”，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

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

“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

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已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

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

术加工, 需要再创造, 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 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 不许可有歪曲, 腊造”,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 只能属于“歪曲, 腊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 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 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 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 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兼并、逃亡继续发展, 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1587年海瑞死, 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势如怒潮。1644年明亡, 离海瑞死还不到60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 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 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 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 就不能不承认, 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 包括“清官”、“好官”在内, 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 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 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 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 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 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 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 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 会有区别, 有斗争。但是, 从根本上说, 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 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 惩办一些“贪官”的事; 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 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

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

“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

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像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当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4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4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4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

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 1 5 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将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1957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

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

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 1961 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出” 1961 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文章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文章指出：“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反对派进行反批评的主要理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 1961 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奇怪的是，1960 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 1961 年才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

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 1962 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这种反批评只能哄骗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与单干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难道也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

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于《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并没有说得十分明确。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就是海瑞。

罢彭德怀的官总不是一九六〇年以后的事吧！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

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就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¹⁾。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³⁾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大的问题。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

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⁴⁾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⁵⁾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

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争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7)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

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它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8)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

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9)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综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予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

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¹¹⁾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¹²⁾他们究竟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 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 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 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毛泽东思想, 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1)《英国状况评托马斯·\u2134\u2135X 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版, 第 650 页。

(2)《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 版, 第 801 页。

89

(3)《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第 2 版, 第 522 页。

(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619 页。

(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第 1031 页。

(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522 页。

(7)《丢掉幻想, 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第 1491 页。

(8)《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版, 第 34 页。

(9)《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 20 卷, 人民出版社版, 第 459 页。

(10)《〈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 人民出版社版, 第 573 页。

(11)《路德维希·\u36153X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人民出版社版, 第 353 页。

(12)胡适: 《南宋初年的军费》。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编者按：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一些报刊发表了文章，许多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大家就《海瑞罢官》和海瑞的评价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出戏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这出戏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讨论也涉及对海瑞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海瑞这个人的看法，分歧是很大的。这种分歧，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各种意见整理发表于后，以供参考。真理愈辩愈明。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有些同志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狂热地宣扬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在国家和法律问题上宣扬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它不是通过揭露恶霸地主的罪恶，帮助人们认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本质，而是用所谓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烘托“清官”、“王法”的伟大。《海瑞罢官》告诉人们，封建社会中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用经过农民的革命斗争，只要有“海青天”一类的清官出现，就能得到解决，农民就能得救。《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吴晗同志的“道德继承论”。吴晗同志企图通过他所加工塑造的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尽力宣扬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一套封建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且加以充分发扬，硬要人们相信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是可以继承的。这种美化地主阶级国家、提倡封建道德、宣传不要革命的戏，实际上是散布一种“合二而一”论。《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反映。

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通过海瑞这个人物歌颂了刚正不阿、敢做敢为、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表现了人民的希望，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这出戏还表现了海瑞全心全意为贫苦农民服务，反对贪污浪费、减轻苛捐杂税、均衡贫民力役、力主建立廉洁清明的政治局面的精神。这些都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

《海瑞罢官》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罢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明代中叶，这个封建王朝已经到了没落阶段，上层建筑腐朽之极，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

着生产力的发展。但从《海瑞罢官》一剧看来, 封建制度似乎还是十分美好的, 只是由于几个贪官污吏违法乱纪, 才坏了事。只要把这些人去掉, 就可以“长治久安”。当时, 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把广大农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 农民反抗斗争已经不断出现。但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 人们所看到的农民, 不过是一些只会叹息、流泪、怨命、哀求的人。他们没有一点斗志, 没有一点力量, 没有一点阶级仇恨。农民似乎是绝对不想斗争, 也不可能靠自己的斗争来解放自己的。他们的命运只能靠向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叩头哀求来决定。相反的, 在地主阶级内部, 吴晗同志却大肆渲染他们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互为表里。历史上的海瑞曾和盘托出要徐阶退田的心意: “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 正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替他掩饰这一点呢? 《海瑞罢官》既对历史这种种歪曲, 怎么能说这出戏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呢?

另一种意见认为: 《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的。戏里用许多篇幅描写了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坏官对老百姓的压迫, 这不正是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吗? 而且, 海瑞所处的时代, 封建制度还没有濒临崩溃, 农民革命的烽火还没有燃烧成燎原之势, 特别是江南一带, 由于统治阶级驻有重兵, 防范极严, 农民的阶级觉悟还不高, 革命力量还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王法和青天, 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海瑞所作的退田、除霸等事, 史籍俱在, 确有其事。《海瑞罢官》如实地描写了这些历史事实, 怎么能说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呢? 何况《海瑞罢官》是戏剧, 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历史情况。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形象的?

有些人认为: 吴晗同志尽情地美化海瑞, 把他塑造成一个“力除贪污行新政, 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的代言人, 值得“万家生佛把香烧”的穷苦人民的救星, 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海瑞是封建皇室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 是封建地主的代表。他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 只想缓和这个矛盾, 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怎么能说他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穷苦人民的救星呢? 在与徐阶的斗争中, 海瑞本来是一个失败者, 他是被罢官撤职而离开江南的。然而, 吴晗同志却臆造了一个处斩徐瑛的情节, 把海瑞塑造成一个胜利者。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臆造这

样一个“胜利”，是为了粉饰海瑞的改良主义的失败，也是为了给海瑞的形象加上一个美丽的光环。不难看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形象，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是可以夸张的。海瑞确有“为民”的思想，也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事情。在海瑞的时代，为了人民而敢于同当时的权贵作斗争，是具有革命性的行为，海瑞是一个革命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把他的形象拔高一点，塑造成当时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并不过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海瑞把徐瑛处死这一情节确实是虚构的。但是艺术不等于生活，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作者在不违背人物思想本质的基础上，取舍素材，进行艺术加工，突出人物形象，加深对读者的感染，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对海瑞这个人物并没有一味歌颂，而是有分析的，戏中指明了海瑞的阶级局限性，指明了他的忠君思想，特别是最后受到革职处分，说明他的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海瑞罢官》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写作于一九六〇年，并于一九六一年出现在舞台上，这不是偶然的。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我们国家正遇到暂时的困难。有些人乘机吹起一股黑风，打起“为民请命”的旗号，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刮“单干风”和“翻案风”。而吴晗同志也在这时，在戏里对所谓“退田”、“平冤狱”，大肆宣扬。这出戏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配合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作用。有的意见认为：编写历史剧，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当然要和现实联系。《海瑞罢官》这个剧，要人们学习海瑞的“顶天立地”和“真男子”精神，都是有所指的，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借古讽今”，以发泄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海瑞罢官》的编写和演出，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确实做过“退田”、“平冤狱”的事情，并非捏造。这出戏写于一九六〇年，不能说与一九六一年刮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还有的意见说：吴晗的动机是好的，他满腔热情，想尽办法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出戏提倡了敢说敢为的精神，古为今用，开辟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新道路。

海瑞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

有的同志认为：海瑞这样的人，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绝不会“站在农民一边”，“为民作主”，而是始终站在统治阶级一边，为统治阶级作主的。海瑞所谓的“为民”，实质上是为朝廷。海瑞上疏嘉靖，是在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情况下，给皇帝敲警钟。目的就是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以便使封建统治秩序牢固到“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的境地。他虽因上疏被捕，但在狱中得知嘉靖死去，却又终夜大哭，这充分说明了他的顽固的统治阶级的立场。所谓“平冤狱”的问题，也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封建官吏处理案件，只能根据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这种法律当然只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绝不可能出现根据地主阶级的法律，而为农民利益进行斗争的事情。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瑞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他是同情人民的。“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他在应天巡抚任期内，坚决站在农民一边，主动迫使大地主退田。在地主豪强和农民打官司时，他也始终站在农民一边，平反了不少冤狱。他关心民间疾苦，不畏强暴，连皇帝都敢批评。因此应当说，海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海瑞的所作所为起了什么作用？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所作的一些“兴利除弊”措施，本质上是替封建统治服务，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起了一定作用。海瑞搞退田的根本目的，是“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也就是为了增加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反对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借以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海瑞修吴淞江，目的也在于为封建王朝增加剥削收益，在于“兴工救荒”，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至于所谓平反冤狱，所谓执法公平，从实质上也只是站在维护封建法定权利的基础上，力图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加以贯彻而已。海瑞的这些措施，也许给农民带来一些暂时利益，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措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即使有部分兑现，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例如所谓退田，就算有一部分退给农民，但由于明代土地兼并剧烈，农民收回的土地，也仍然会给地主兼并掉，这种措施根本不可能使“江南贫民”真正获得土地。

另外一些意见认为，海瑞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好事，不但效果是好的，而且动机也是好的。海瑞的思想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是要“为民父母”，要富国利民，这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还有些意见认为：海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他推行退田、治水、一条鞭法等措施，虽然主观动机是由于害怕阶级矛盾尖锐化会引起封建王朝被推翻的危险，因而要求统治者作些让步，借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实行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有利的。所以，海瑞还是值得赞扬的。

“清官”的实质是什么？

有些同志认为：象海瑞这种“清官”，只是封建统治的自我调节器。他们终究不能置身于封建地主和农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外。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在于，“清官”力图使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限制在当时法定的范围之内；而贪官则只顾满足自己无穷的贪欲，肆意突破法定的剥削限度。清官“养鸡生蛋”，贪官“杀鸡取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青天”，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麻痹、愚弄劳动人民的幻象。统治阶级经常施展这套伎俩，来瓦解人民革命的斗志。劳动人民中有许多人对“青天”抱有幻想，这是可能的。这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觉悟，并且受了统治阶级的欺蒙的结果。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清官是应该歌颂的。清官总比贪官好，海瑞总比严嵩好。他的退田、除霸、均徭、修江等措施，总比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有利。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公正廉洁、不畏强暴的官吏却很爱戴。人民希望多出几个青天，海瑞就是这样的青天。广大人民对海瑞有良好的印象。在民间文学中，海瑞从来也都是正面人物。如果连清官都不歌颂，历史上还有什么可以歌颂的人物呢？也有一些意见认为：清官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有不同的作用。在阶级斗争已很激化、一个王朝已走向没落时，他们主要起了麻痹革命思想、破坏革命斗争的作用；而在阶级斗争还不十分尖锐、一个王朝尚未面临末日时，他们则主要是有利于人民的。在海瑞所处的时代，虽然许多地方已爆发了农民起义，但是苏、松一带还是比较平静的，朱明王朝也还没有到覆灭的前夕。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海瑞还是应该肯定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樵子的文章：《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先谈海瑞。考其为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直言敢谏，刚直不阿。上疏嘉靖，痛斥其种种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二，关心民生疾苦。在应天巡抚任内，施行过“一条鞭法”、轻徭、退田、治水等措施，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制止豪强的兼并，发展生产，起过好的作用。三，作风廉洁朴素。在贿赂公行的明代中叶，他是一个较为难得的正派人。

正因为他有这些特点，所以才在民间获得赞颂。但是，统治者们对他的态度，却是逮捕下狱，罢官闲置，你上疏，他弹劾，务必去之而后心甘。谁爱谁憎，了了分明。

具体谈到退田，由于史料上未为我们开列明细账，我们很难判断究竟谁得利益较多。但是，贫苦农民是否一无所得，姚同志也提不出具体证据来。

不错，海瑞“退田”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反对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而是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是必须看到，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帝王士大夫，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能被迫地向农民作出某些让步，反对土地过分集中和横征暴敛等搞法。海瑞的动机也不例外。正由于他要为皇上收拾民心，巩固根基，就不能不在一定限度内，给农民一点好处。姚同志说：“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这话很正确。可惜自相矛盾，即既然承认海瑞想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又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焦点——土地问题上，不给贫苦农民一点好处，只让中小地主独占其利，那末试问：矛盾何从缓和？远见何能体现？

再谈治吴淞江，明明史实俱在，姚同志也企图一口否定，这表现了他的非科学态度。当然，海瑞治河是否进度有如此之快，是可研究的。但姚同志仅从当时的技术条件落后着眼，而看不到广大农民要求治水、发展生产的热望，显然不符合人的因素第一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然而，仅就海瑞这个历史人物而言，说是说非，问题还不大，但姚同志大有一笔抹杀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这便更应当研究了。

不错，国家及其执政者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官吏就是地主阶级向农民阶级专政的代表。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多变的，牵涉到具体的人、事，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解决得了问题的。试问：在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集团、个人之间，在压迫人民的策略、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是否还有促进与促退之分？开国“明主”与亡国昏君，忠臣与奸贼，“清官”与贪吏，是否还有是非之分、好坏之别呢？如果把李世民和秦二世，岳飞和秦桧，郑所南和吴伟业，史可法和洪承畴，都划上一个等号，称为“一丘之貉”，那能算得了是阶级分析呢？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〇一页）。研究历史人物也是如此。不把他们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不以条件、时间为转移，而抽象地谈论什么好和坏、是和非，那末，不是颂古非今，就是否定一切。谈罢海瑞其人，附带谈谈《海瑞罢官》这出戏。

一九六一年我有机会在北京看过演出，觉得很好。现在读了姚同志的文章，仔细一想，得到了不少启发。

吴同志的剧本的确有较大的缺点。第一，虽然戏中也写了海瑞的出发点是“忠君爱国”等封建思想，但从其行动来看，未免太“现代化”了。一个封建官吏，决无那么高的“处处为百姓”的思想水平，吴同志确有美化古人之嫌。第二，把农民群众写得太消极，除了哭啼叫喊以外，一无作为。他们与海瑞对比，似乎就是英雄与群氓的关系了。吴同志为了美化海瑞，贬低了广大群众对他的推动作用，是不好的。

但姚同志说剧中写了“退田”、“平冤狱”，就是借古讽今，也未免太过火。本剧的主题是除霸。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恶霸的所作所为，不外乎霸占民田、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等等，抽掉了这些具体事件，霸也无从霸起。吴同志之写平冤狱、退田，明明是为了揭露徐阶父子和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为了表现“除霸”这个主题的。姚同志硬把古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强牵在一起，指责吴同志是借此发泄对党的不满，指责他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实在难于令人同意。

据我的看法，就历史人物海瑞来说，他当然不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但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不失为一个比较关心民生疾苦的好人。作为历史剧的《海瑞罢官》，存有较重大的缺点，但并没有如姚同志所指责的严重政治错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必须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

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嘴，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孩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

分析也不有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让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

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海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冲淡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他虽然斗倒过几个权门巨富，但正像鲁迅所说，这等于替皇帝掐死几只填肥了的鸭子，掐出来的家私大部分还是落入头号地主皇帝的腰包，换上几只空肚鸭子，对人民也只有被吃得更凶。——这些，似乎已不难肯定。因为海瑞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今天不能把他抬得太高。要不然，就是把我们的创作水平降低到旧日海瑞戏的水平了。

如果姚文元同志的批评基于这一点，归结到这一点，平心静气，实事求是，我想他对《海瑞罢官》的缺点以至错误，一定会提出比较公允的意见。可惜他的文章从这一点起步，就像脱了缰的野马，远远地奔到界外去了。而那界外的某一点，恐怕还是批评家为自己立在那里的目标，以便得出他那“一株毒草”的结论。姚文元同志主要认为海瑞被塑造得一无缺点，成了农民的救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剧本和戏看，这个海瑞明明是有缺点的。海瑞满口皇上，不就是他最致命的缺点吗？即如姚文元同志所说，海瑞被摘了印还聊以解嘲地口里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令人为他的精神胜利法哑然失笑，不也正是他的缺点吗？姚文元同志还说海瑞被写得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斗争，这不也正是海瑞的缺点吗？怎么能说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怎么能说作者要拿他来做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呢？

至于戏上的农民把海瑞当作救星，不等于作者也把海瑞当作农民的救星。农民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这正表现了四百年前的农民在偶然满足了一点狭隘的经济要求和基本的人权要求之后的感激和喜悦，恰恰使今天的观众想到这些农民的好光景何等可怜，而且完全保不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农民有多少幸福。水平高一点的观众就能从而想到，这正是海瑞的改良主义在当时起着冲淡阶级矛盾的害处。

姚文元同志在肯定了这出戏是这样那样塑造海瑞的以后，就得出了他的第一个结论：“一个假海瑞”。

人物的真与假，在历史剧和现代剧里的要求是共通的，即要求艺术的真实。写现代剧不要求照抄生活，写历史剧也不要照抄历史；写活人写古人都不要求替活人、古人照相。《海瑞罢官》不是连台本戏，因而只能要求以一点表现出了全体，或者只能要求这一点与海瑞的其他方面并无根本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个海瑞是剧作者在大量历史素材面前，经过取舍扬弃，加以突出渲染创造出来的。为了成真，却确是弄假。

在加工创造上，原作决非完善。批评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根据党的文艺政策，对吴晗同志的第一号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把批评文章写到有助于这个作品的提高和第二号作品的生长。但是，姚文元同志不在此，他从一个假海瑞的结论出发，说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就要看看作者拿这个假海瑞来宣扬什么了。好像只要是一个真海瑞，就不产生宣扬什么的问题，而假海瑞呢，就一定是在宣扬要不得的东西了。于是他又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宣扬阶级调和论”！紧接着追问作者要人们向海瑞学习什么，而且马上替作者作主，说是学习退田，学习平冤狱，要么准是学习以傲骨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了。而照他看来，退田者，吴晗同志主张把今天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退给地主或农民也；平冤狱者，吴晗同志想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也；吴晗同志的横眉呢，是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于是乎最后结论来了：“一株毒草”。好痛快！这篇批评文章不正是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的吗？

文艺作品要人学习什么，未必决定于它的故事情节有些什么。《海瑞罢官》有退田和平冤狱两个情节，但是写海瑞而着眼于这两个情节是最不足为奇的。被徐阶并吞的土地，不管是原属于贫雇农还是原属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总是该退的

吧？戏里的冤狱，总是该平的吧？海瑞是怎样跟土地兼并者和冤狱制造者进行斗争的呢？吴晗同志着力写了他用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刚直不阿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斗争。我看作者要人学习的就是这种斗争精神，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封建社会里极其难得的东西，有一些正是要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得以普遍发扬的，刚直不阿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

讲到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姚文元同志也说，官僚主义确实要反。是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长期斗争的内容难道应该排斥有关反官僚主义的文艺作品吗？这出戏不是触及了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吗？何况，学得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是也可以用来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活命主义的。

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傲骨就是魏延后脑杓上的反骨。这实在太奇特了。看来，他从凡是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一定意在影射现实这个前提出发，联系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又套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这个客观规律，就轻而易举地把虽酝酿于一九五九年，却写成演出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扔进这只染缸里去了。

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确有影射现实的东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连牛鬼蛇神明目张胆的进攻都不怕，蝎蝎螫螫的含沙射影又何惧之有？而且影射也有区别。事实上，我们见过怀着阴暗心情的人，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对现实作恶意的影射，这种毒草，非拔不可；我们也见过一些作者，好心好意，但是胡里胡涂，也拿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不恰当的比喻，这种作品，大抵只要加以批评，对作者进行帮助就行。此外，出于善意，比喻虽然不百分之百地恰当，却可以起一定的惩前毖后、借古励今的作用，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出现过？有。今后可不可以做呢？也可以这样做，虽然这样的作品比之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是隔一层、差一点，无妨搁一搁，慢慢地来。

历史的最大用处之一，就在于给后人当借鉴，接受祖先的经验或教训。中国的历史不是劳动人民写的，现有的史书本身很难直接起这个作用；旧日的历史剧和演义戏十之九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所以大多数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演，极少数可以整理的，整理起来也往往事倍功半，实不如新编。这就有待历史与戏剧两者皆

在行的作者来考虑动手。这个工作，将来需要加以鼓励，现在也从未被人忘却。倘有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横加阻遏，吓得人不敢碰一碰，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剧的创作中，作家如何表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鉴别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试金石。旧的历史剧，往往歪曲人民群众的形象，劳动人民在舞台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今天，在人民的时代，新的历史剧作家应该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表现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剧作家的使命。然而，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在《海瑞罢官》里，作者是把洪阿兰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来描写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人。她的丈夫被徐家气死，公公被贪官打死，女儿被徐瑛抢走。但在血海深仇面前，她不是极度愤恨，不是极力反抗，而只有哀求、痛哭、悲伤。她的反抗与仇恨不是随着苦难的加深而增长，而只知道“满腔悲愤唤苍天”，怨恨“人间难把是非辨”。

洪阿兰在不幸中遇见了海瑞，好像遇见救星，跪在他脚下哀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妇伸冤啊！”以至为他欢呼“公侯万代”，高唱赞歌。似乎除了海瑞之外，无论自己或别人都无法使她脱离苦难。

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生活极端痛苦。但是她们并不甘愿忍受这种痛苦，有不少妇女还起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就在海瑞的时代，就有苗族妇女米鲁为首的农民军勇敢奋战，可是作者不愿意去描写人民的斗争，感兴趣的只是象洪阿兰这样软弱无力的形象。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偏见。

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还歪曲丑化了农民的群像。在戏中的乡民也是胆小怕事的。当徐瑛调戏赵小兰时，他们只知道呼告：“天老爷要睁开眼，治治这坏蛋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拔刀相助”。当赵玉山被徐家恶棍打得昏死过去时，众乡民也只是无可奈何的叹息道：“这是什么世界！王法何在？天理何

在？”当贪官王朋友打死了赵玉山时，众乡民也无愤恨的表示，默默地抬着赵玉山的尸体回去。他们竟然说：“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似乎多说了一句不平的话，就作不成佃户，当不成奴隶，或者还会遭到赵玉山同样可怕的下场了。农民在作者笔下都成了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毫无斗志的可怜虫。他们虽然生活困苦，但不是十分愤恨贪官地主，只是埋怨自己穷人“命不该”。他们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地位，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清官”。他们赞美海瑞是“公正为官”，“美政多端”，“明断公案”，能为“百姓伸冤诉苦”。当“海清天”说了几句好话以后，农民就喜于形色，连连叩头称谢：“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欢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他们一再叩头表示“感恩戴德”。在吴晗同志的笔下，农民群众就这样被描写成一群屈辱的奴隶，而不是一个反抗的阶级。吴晗同志所以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因为他对“谁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问题有错误的看法。他在剧本的“序”中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在吴晗看来，谁敢说谁敢做，谁就是历史的主人。皇帝敢杀老百姓，敢统治人民，皇帝是历史的主人。海瑞敢“骂皇帝”，敢与徐阶作斗争，海瑞就是历史的主人。

正因为吴晗同志有这样的错误的历史观，所以他对于历史剧也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看法，说什么：“现在有一些历史剧都不适当地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一大群人民群众上了台，就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写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恐怕就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庸俗化了。”

了解了吴晗同志对历史和对历史剧的看法以后，就不难理解在《海瑞罢官》里的农民群众，为什么都那样苍白无力，懦弱无能。庸俗地歪曲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正是吴晗及其《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一个多月来，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只看到一小部分），对我极有启发，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

研究、认识海瑞。也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对过去长时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各方面都各抒己见，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端正立场，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我研究海瑞，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两年中的事。把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排一个队：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

二、《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集》页一四六——一六八。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海瑞》一九六〇年《新建设》第十、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页二二八——二三七。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七稿，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的《北京文艺》，二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八月间加上一篇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〇年以前写的。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文章最后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

有现实意义的。”①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前言中说：“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剧本）正面主角是海瑞。对立面是退休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剧本）描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现在检查起来，《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在《海瑞的故事》中，说他“像海瑞这样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等等，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章的开头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中间说他“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是忠君爱国的。”“他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礼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称先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然肯定了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怎么又有可能同时站在农民一边呢？一个人同时可以站在对立着斗争着的两个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吗？由此看来，历史上海瑞的立场并没有错，是我的立场错了。这是严重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在海瑞作应天巡抚的九个月中，（我在论文和剧本中都错写成七个月）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因为他一生作官的四个时期，任淳安知县时期已经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这类戏了。在北京作京官时期，已经有新戏《海瑞上疏》了，最后在南京作官时期，时间虽然有两三年，却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描写的大事。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人写过戏，可以写。在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作为主题，前四稿是以退田为主题的，经过讨论，认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措施，没有意义，第五稿以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九场戏中有六场是写除霸的，却没有想到在当时海瑞即使除了个把恶霸，根本不会触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什么利益，性质会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罢官》是以除霸为主题的，但是许多批评的文章却把笔锋指向退田这件我认为是陪衬的事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海瑞强迫乡官退田说是改良主义的措施，《论海瑞》中说过：“不改变生产关系，简单地要求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部分田地，少剥削些，农民的苦楚减轻一些，无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做到

了，也还是封建的剥削的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关系依然不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矛盾。……海瑞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地农民、特别是松江的农民，乡官们骂他们是“刁诈之徒”，是“刁民”，多年来一直在告乡官夺产的状，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告状的时间如此之长，告状的人如此之多，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告乡官夺产的状呢？这要从苏松地区的农村经济情况来分析，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

从明朝一个朝代的情况来说，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农民和地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从时间前后来讲，明朝初期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数量很大的地主分子由于武装反抗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大量地被消灭了；元朝官僚、宫廷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因政权的被推翻而变成官田；由于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人口剧减，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地旷人稀，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明朝政府把无主的、抛荒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就这样，在明初几十年中，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着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从地区来说，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旧地主阶级不像北方那样，大量地被战争所消灭，相反，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参加了明王朝政权，不止保存了原来拥有的土地，还有所增加，有所发展；还由于明初建都南京，成群新贵族、公侯将帅都成为新兴的大地主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现象逐步增加了，和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明初几十年中，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而北方地区却比较安定的经济原因。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东南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也不断跟着发展，阶级矛盾也就随之日益尖锐化了。

但是，这是一般的基本的情况。就苏松地区而说，还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

第一，苏松地区的田赋特别重，明代全国实物税收约三千万石左右，苏州一府七县占二百八十一万石，松江一府三县占一百二十一万石。苏州垦田数只有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百分之一点一，交纳税粮呢，却占全国税收百分之九点五。^③松江垦田数只有四万七千一百五十六顷，比苏州少一半。^④苏

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负担还重，松江三个县的负担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第二，是这两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国官田数为全国垦田数七分之一。^⑤苏州垦田总数内官田为六万五千零三顷，民田为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顷。^⑥大致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强。松江府垦田数内官田为三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三十三亩，民田却只有七千三百顷二十三亩。^⑦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总数七分之六弱，民田只占七分之一多一点。官田和民田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是因为从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展，贵族、官僚用种种方法兼并土地，（从贾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发生变化，旧的贵族、官僚被推翻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没收为官田，经过多次变化，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这带地方以后，又把原来（东吴张士诚）的豪族地主田地没收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税，这样，这带地方的官田租税就特别重了。”^⑧官田只是个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的田地。官田比民田赋税重多少呢？“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吴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税，一亩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盖几于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远，而一丘之内，只尺之间，或为官，或为民，轻重悬绝，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者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久之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贫者不能供，则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无所出则摊之里甲，里甲坐困，去住相牵，同入于困。……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调均徭者，大率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务逐末而不务力田，避重役也。……所谓重役者大约有三，曰解户，……曰斗库，……曰粮长，……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当之则一家破，百家当之则百家破，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其役，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绩，此之故也。”^⑨说这话的人是明武宗时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几十年，他说的苏松地区经济情况是和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没有很大差别的。官田田赋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这样，把重赋都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自耕农的日子便越发不好过了。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苏松地区人口就日益减少，

据明史地理志苏州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四十九万一千五十四（公元一三九三）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零三十
弘治四年 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零九（公元一四九一）口二百零四万八千九十七

万历元年 户六十万七百五十（公元一五七三）口二百零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

松江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口一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

弘治四年 户二十万五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七千三百十三

万历元年 户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四十八万四千四百十四

很清楚可以看出从公元一三九三年到一五七三年，一百八十年中，苏州府的户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却减少三十四万三千人左右。松江府户也少了，口则剧减到七十三万五千多人，减去一大半。这是什么缘故呢？显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垦田总数七分之六弱，农民负担不起，大量逃亡的缘故。这两个府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了。据当时人纪载，有的人成为大官僚地主家里的仆役，有的成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条船作买卖，当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有的跑外乡外地去谋生，流浪。这种情况也就是王鏊的所谓逐末。

农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负担租税和徭役，在那时候，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

一面是农业人口的大量逃亡，象松江府这样，经过一百八十年，从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口，减少到只剩四十八万四千多人，全国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另一面呢，明朝政府为了保护官僚地主的利益，还规定了一套特别优待的办法。办法规定京官一品可以免粮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一直到从九品还可以免粮六石，免役丁六丁。外官免半。致仕官亦即乡官依照品级免粮、丁十分之七。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役丁二丁。生员已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七丁，新进生员不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五丁。计算方法是“田十亩准一丁，田二十五亩准粮一石以算。”^⑩这样，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拥有土地多，免的粮、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农既非官僚，又非生员的，

一遇重役，便非破产不可。明末温宝忠说过：明朝里役负担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亩田地的农民，假如家里不出一个秀才，一轮到里役，便得破家荡产。^①^②顾炎武也说：“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又沉痛地说：“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由此可见，封建王朝对乡官直到生员的优免，优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无所失，而是分摊到里甲去的，分摊到农民身上去的，粮、差的优免部分“尽归于小民”，以此，一个地区的乡官、生员愈多，小民的负担也就愈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海瑞在给谭次川侍郎信上说：“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长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便说明了这种特殊情况。接着说：“国计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宽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赐矣。”田赋定额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赋以外的额外需索，则希望能够少要一点，宽一分也好一分。其次，没有功名，也弄不到监生、生员的中小地主、富农，为了逃避重赋、重役，保全家业，自动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门下也就日益众多，叫作投献，就这样，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也就日益贫困，走投无路了。

投献也要加以分析，一种是自动投献的，一种是狗腿子强迫投献的，这两种都不经过买卖手续，是无代价的。还有第三种，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那一家中小地主、富农的土地，用高压手段以低价勒买的，也叫作投献。

投献是违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为损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又规定“军民人等将竞争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朦胧投献……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换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③这里指的都是无代价的投献。只有第三种以低价勒买的，才能“或许之赎”，前两种是说不到赎的。

明代的皇庄，公元一五一六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共计九万余顷，后来增加到二十九万九百十九顷，不过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畿内地区，没有一个皇庄是在苏松地区的。^{①④}同时，明代各朝所封亲王也没有一个是封在苏松地区的。^{①⑤}这个地区根本没有皇庄。这个地区唯一的土地掠夺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在朝的苏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乡的官员——乡官。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

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阶级斗争已经展开了，农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采取告状，告乡官夺产，大量的人告状，经常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应该明确指出，农民到官府告状是不容易的，他们没有文化，告状的状纸要花钱请人写；到府、县城告状要耗费时间，耽误劳动生产，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时候，农民是不会轻易告状的。

这种告乡官夺产的农民，封建地主阶级叫作刁民，刁诈之徒，打官司告状叫刁讼，刁风。

海瑞在一五六九年六月任应天巡抚时，便面对着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他在督抚条约上说：“本院到处即放告。江南刁风盛行，非系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不准。”“江南刁风日盛。”“江南民风刁伪。”^{①⑥}他也打老百姓的板子，关老百姓在监牢，也把他所认为刁民者枷号在衙门门口。在这一点上，他是和乡官一鼻孔出气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判案却有自己的标准，在任淳安知县时，颁布的判断疑狱办法：“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①⑦}应该而且必须对这段公开的文告进行具体分析，在判断疑狱上，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判断争言貌上，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是从反动的封建礼法，封建等级制度出发的，是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也还有另一方面，判断疑狱，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

顽。特别是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在他看来，在疑狱和争产业问题上，屈了贫民，可能引起不安、骚动，对王朝统治不利，屈了富民，屈了乡宦，他们经得起屈，屈一点也不要紧，这个屈也还是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

他面对着苏松地区，特别是松江“告乡宦夺产者几万人”的斗争形势，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原则处理的。

松江的情况，他说：“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他向府县官、诸生员、乡官之贤者问故，原因是“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①⑧}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背景是什么呢？徐阶是华亭人，他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入阁的，四十一年当首相，隆庆二年（公元一五六八）致仕，当了十七年宰相。^{①⑨}从公元一五五二年到一五六九年，恰好十八年，这个二十年正好是徐阶当权的时代。⁽⁽⁵⁾⁽⁶⁾⁾

海瑞企图缓和这个激烈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占农民田地的办法，根据明王朝的法律：“盜卖田宅：凡盜卖换易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②⑩}他要退的是什么田呢？他说：“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谓实有断卖文契也。苏松四府乡官，贤者固多其人，厉民致富者诚不为少。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实卖文契耶！臣于他府县告系白夺之状，间行一二，惟华亭县告乡官状，所准颇多。”^{②①}由此可见，他下令强迫乡官退的田是白夺的田，也就是不付分文代价，用强占手段白白夺来的田，是没有实卖文契的田，这样做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措施，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可见退得是不多的。退了没有？海瑞自己说：“乡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报数册到臣见在。天理人心，不容泯灭。”^{②②}他在给徐阶的信中也说：“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②③}再拿海瑞的对头，轰走海瑞的徐阶的话来印证：“自隆庆庚辛（四年、五年，公元一五七〇、一五七一年）间，吏兹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为政，而端导之以嚣讼，教之以争夺，

民靡焉@①丧其廉耻之心，毁弃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为仇，故家旧族，所在破败。彼其意以为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则贫者当富矣，而岂知人情得财既易，用财遂轻，加以奸恶之徒，竞相诱引，淫奢饮博，视如泥沙，讼墨未干，空空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则不可复振，盖里巷之间无富民者数年矣。”②④隆庆四年三月以前吏兹土者就是海瑞，这封信是写给当朝首相张居正，是骂海瑞的。由于他的大官僚地主的立场，当然有歪曲，但也说出一件事实，那就是海瑞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夺、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田，是“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富者是乡官，贫者是农民。以此，明史海瑞传也说：“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也说他做得过火了一些：“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这个屈也就是海瑞所主张的，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屈。

海瑞退田的效果如何？海瑞自己说：“臣任九个月矣。……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②⑤贫者自贫，富者自富，是他自己的总结，说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正因为他依据王朝法律强迫乡官退田，他是被苏松乡官在朝的代言人给事中戴凤翔弹劾下台的，他一离任，新任巡抚当然一反他的所为，所退的什百之一的田，不言而喻，又退还到乡官的手里去了。剧本《反攻》一场，徐阶说：“换了新官，还不又是我们的天下。”是指出这一点的。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在《海瑞罢官》前四稿以退田为主题的末场，众乡官在迎接新任巡抚戴凤翔时说：“戴都老爷今日上任，他上本参倒海瑞，是我等重生父母，再世爹娘。如今又来巡抚东南，这一来呵，三吴又是我们的天下了！刁顽愚民从此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良田好地又要物归原主了！感恩戴德，我等在此迎候。”（根据一九六〇年五月写的第三稿油印本）这一段是和《反攻》一场徐阶的话相呼应的。点明了海瑞罢官后所退的田又退还到乡官手上去了。五稿以后改以除霸为主题，末场大大改写，把这一段话删去了，退田又退回到乡官手上上去的事实便不那样醒目明确了。

当然，退田中有一部分是退给投献户的，但不完全是。至少有一部分是退给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农民。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的有几万人，一人代表一户，松江府在一五七三年的人口数，才四十八万多一点，按一五七八年的全国人口和户数的平均数计算，每户为五点七人，这样松江才有八万四千多户，在八万

多户中，告乡官夺产的就有几万户，假如全是投献户，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这个比例看来是太大了些。

姚文元同志批评说：“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徐阶确是退了一部分田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退给谁呢？姚文元同志说：“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纪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查《国榷》的原文是这样的：隆庆五年七月庚午，蔡国熙为按察副使，整饬苏松兵备。……至是高拱擢之以迹阶，松人群起讼之，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入田四万亩于官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海瑞是隆庆四年三月以后离开应天巡抚任的。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子事。

正因为海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了制止农民逃亡，赋税减少，和徭役征发，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执行封建法律的退田办法，并且还执行了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方针，他就遭受到大官僚地主集团的攻击，以致罢官。毛主席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②⑥海瑞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他就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改良主义的措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行不通，办不了。他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者。

海瑞走了，农民是不是就不告状了呢？上面《国榷》说“松人群起讼之。”和海瑞同时的华亭乡官何良俊骂他：“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辑，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一二年不止，东南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又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百姓，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②⑦稍后的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也说：“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风起，江南鼎沸，延及吴浙，不问年月久近，服属尊卑，以贱凌良，以奴告主，弟侄据兄叔之业，祖遗蒙古夺之名。自庚午（公元

一五七〇年)至今将四十年，少者壮，壮者老，习为故常，专此诬讦。缙绅之贤者，反谨避以博忠厚之名。尝闻吴中杨震崖(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风力者，动云不畏强御。然则强御乃我辈也。不亦哀哉！”②⑧沈德符的话也有过分的地方，上面已经说过，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已经有大量的人告状了，沈德符却把这件事全算在海瑞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由此看来，第一，海瑞退田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官僚地主阶级是发生了震动的；第二，地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不大可能指的是中小地主；第三，一五七〇年以后，过了四十年，浙西一带的农民还在告地主的状，“以贱凌良，以奴告主。”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封建地主阶级极为痛恨。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一五六九、一五七〇年，苏松地区是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农民是和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海瑞所采取的执行封建法律的改良主义的退田措施，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目的是在缓和阶级矛盾，目的是在使农民不逃，田地不荒，便于徭役征发，当然，这样做，对得了退田的部分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决不能说成海瑞是站在农民立场上。

根据以上分析，在海瑞以前，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在海瑞离任以后的四十年中，封建统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亦即被他们白夺土地的农民，是在始终斗争着的，并没有屈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农民应该是正面人物，英勇顽强，斗志昂扬，但是剧本写农民苍白无力，只会唉声叹气，只会喊“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玉山被当堂打死，不吭一声。“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海瑞下令退田后，众乡民说：“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最后幕后合唱“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不是由于农民自己的斗争，而是由于一个清官解决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混淆了，抹煞了阶级斗争的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立场性质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尽管也强调了这一方面，“江南地鱼米乡多交粮饷，……恶乡官贪残吏摧残乡党，害得那苦百姓逃亡他乡，民已穷财已尽国脉琢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要申三尺皇家法”，“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谈孔孟说诗书取法先王，……学乡愿讲圆融愧对吾皇。”，“多为百万生民办一点好事，也就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但是，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松江地区的乡官渐富，民产渐消的情况，在他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府县官、生员，甚至乡官的贤者都对他说了的，海瑞在官僚中、甚至部分乡官中，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他并不孤立。但是剧本却不提这些，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在家庭中只得到他母亲一个人的支持，这不但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而且还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对读者、观众起了有害的作用。

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吴淞江是修成了的，这在不少讨论文章中已经谈到了。白茆河虽也修了，但没有修成。

为了便于讨论，有必要把修吴淞江的经过说明一下。

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说明，他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巡历上海县，亲自相视，量得淤塞当浚地长该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阔三十丈，今议开十五丈，计该用工银七万六千一百二两二钱九分。因为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他就结合修河和救饥，“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经费来源是他自己筹措一部分，乡官吏际捐出赈济谷二万石，并要求量留苏松常三府漕粮二十万石。②⑨以后他又报告：“各县民告饥甚急，臣思昔人兴工救荒，旋于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实自初八日以后，人工方集。二月二十后渐收工，

二十九日告成。……止用过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③⑩他在给人的信上也说：“百凡区画，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余垂成中止，奈之何？”③⑪此外，明史河渠志和嘉定县志都有修成的纪载。连骂他的何良俊也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③⑫可见这工程不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修成（我在文章和剧本中说成不到一个月，是错的。），还是当年就见效的。

于此，提出的问题是修水利是不是好事，为了什么目的。

历史上封建王朝较为稳定的时代，是比较注意修水利的，因为水利不修，常闹水灾，就会影响王朝的田赋收入。海瑞修吴淞江应该说是好事，决定是他作出的，经费是他筹集的，人力是他组织的。但是，还有其主要目的，那就是借兴工来救灾，灾民没有饭吃，闹起事来，可不得了。以工代赈，一举两得，这便是他的目的。当然，修水利参加劳动的是遭了灾的劳动人民，功劳主要是劳动人民的，但海瑞也应该算上一份。

关于除霸，内容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根据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说没有是说洪阿兰一家三代被害的故事是虚构的。说有是根据明史徐阶传：“同列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③⑬高拱传：“阶子弟颇横行乡里。”③⑭李贽海瑞传：“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徐阶），按问其家无少贷。而（徐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③⑮谈迁枣林杂俎：“华亭徐文贞阶家居，子仆积横，讼牒山积。”是根据这些资料虚构出来的。

惩处贪官污吏的情况也是这样。梁云龙说：“赎者则望风解印绶去。”③⑯黄秉石说：“贪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⑰谈迁说：“瑞一意拊单赤，抑贵势，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⑱明史海瑞传也说：“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剧本中判处王明友、李平度、萧岩的死刑和革职，也都是虚构的。

关于对清官的看法，我过去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

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象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③⑨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既然封建时代的清官是为他的本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末，无产阶级能够向他们学习什么呢？就以《海瑞罢官》为例，我说“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这个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和无产阶级的刚直不阿，有没有社会内容、本质上的区别呢？不讲区别，不讲本质不同，是不是要无产阶级去学习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呢？这样一检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问题就多了，我过去几年，写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文章的结尾都说这人的某些品德值得今天学习，没有区别，没有分析，都是错误的。

由此就联系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清醒的，例如我曾说过：“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道德标准也就不同。……总之，社会性质变了，道德标准也必然随着改变，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观点。”④⑩在谈骨气时也说过：“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当然，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英雄气概，有它自己的骨气。”④①在《论民族英雄》一文中，更具体指出古代的民族英雄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有着阶级本质的差别；有着立场、思想的根本差别；

有着最终的目的和任务的根本差别。④②这都是正确的。但有时候又糊涂了，在讨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时，三篇文章却强调封建道德也可以批判地继承，犯了绝大的错误。

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和许启贤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第一，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只能批判，不能继承；第二，道德是上层建筑，是从不同社会、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反过来又为下层基础服务，保卫本阶级的利益；第三，无产阶级道德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它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成长、壮大、提高、发展，一句话，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而形成的。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道德绝无共通之处。

由此，也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我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是正确的。但又说：“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这就有问题了，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须这样做的。其次，当时当地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是封建官僚的标准，还是人民大众的标准？这里就有一个阶级分析的根本问题。

由此看来，我的思想深处，同时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有一点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以此，有时候写对了，更多时候写错了。两种对立的东西经常在头脑中作斗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没有挂帅，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所以犯错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现在认识到，一方面，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没有注意，没有警惕，反而自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放松了自我改造，问题就出在这里！毛病也就出在这里！

我也曾说过：“有人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④③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没有写文章。没有写，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没有错误的东西，不过没有暴露出来罢了。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也跃进了，不但写，而且大写特写，越写越多，暴露出来的错误也就越多。经过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这样，至少，犯过的错误，经过批评以后不会重犯了。要是不写，不暴露，这些错误的东西会在思想中发霉，会使你中毒，最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道德的批判继承和《海瑞罢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评，对我来说，确是好事，这使我重新认识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立场、观点；促使我重新学习，改造自己，好处是说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再去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教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拿这个标准，即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来检验《海瑞罢官》，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尽管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写成的，但是《北京文艺》的发表，北京京剧团的演出，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的事，出单行本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在这样情况下，《海瑞罢官》的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什么效果呢？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去追究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年月写的，他们是在一九六一年读到、看到的，这是一个铁生生的事实。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江西上饶县中学朱彦同学已经指出，在一九六二年，有个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④④这是多么严重的恶劣的效果！还有，这个剧本“反映”什么呢？向海瑞“学习”些什么呢？不言而喻，这种“反映”“学习”给党和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个剧本在社会实践、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作

为一个国家干部，却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经过五年的长时期，对这样具有严重性质的问题，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在北京京剧团演出几场以后，就停演了，为什么？没去想。甚至在两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肯动脑子，引起反省，只推说是一九六〇年写的，便自以为事了。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态度是对当前政治的严重不负责任，是对党、人民事业的严重不负责任，决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这个错误。

由此再进一步认真严肃地进行检查，“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④⑤我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没有照老样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问题以后，还不知道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呢！其次，我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突出海瑞这个人物，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一切歌颂他的话，不加具体分析，都在我的一些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里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历史家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官僚地主阶级。当时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当然没有农民的著作流传下来。即使有个把民间艺人创作的关于歌颂海瑞的作品，那也还不是受了封建历史家的影响。就这样，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和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

既然错了，那也不要紧，改了就是了。但我没有改，在一九六〇年写完以后，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加序出单行本，这就是错上加错了，性质也就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呢？毛主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

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④⑥重读这一段，好像就是针对我的批评。不是吗？我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吗？一切皆好吗？我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尽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为已经在政治上摆脱超阶级观点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对待历史人物问题上，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但没有摆脱贫产阶级观点，甚至还被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所俘虏。

这个严重性质错误的揭发，对我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

我对于这个错误，“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④⑦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诚心诚意地写了这篇自我批评。

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止是一个个别历史事实问题，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种思想方法、两种观点，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思想、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问题。

认识了，不等于问题就此解决了，还要通过实践，通过斗争，才能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我就以这篇自我批评作为起点，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后，参加这个兴无灭资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最后，我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后还要继续检查，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错误，转变立场。感谢并期待着同志们批评。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人民日报》刊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编者按语中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展开一次辩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根本问题。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

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论文中，吴晗同志塑造了一个最高大的艺术形象，使用了大量最美丽、最崇敬的言词，歌颂了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好官”。历史上歌颂“清官”、“好官”的政治家、历史家和戏剧家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所用的颂词，不过是“清廉正直”、“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爱民如子”之类。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把对“清官”、“好官”的歌颂，提高到像吴晗同志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政治的、阶级的高度：

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

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

他“同情贫农、中农，对大地主有反感”；“人民喜欢他，大地主反对他”；

“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他“站在人民方面，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

他“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 正当被冤屈的农民“满腔悲愤唤苍天”, 唱着: “人间难把是非辨。天哪天!”的时候, 海青天出来了。海青天一来, “抑恶扶良”, “济困扶危”, 为农民申了冤, 雪了恨, 除了霸, 退了田。于是, “众乡民”叩头: “大老爷为民作主, 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同唱: “今日里见到青天, 勤耕稼重整田园, 有土地何愁衣饭, 好光景就在眼前。”①这就是吴晗同志塑造的作为农民“救星”的海青天的英雄形象!

人们不禁要问: 这样一个“英雄”、“救星”, 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是从农民、市民那里来的吗? 是依靠农民、市民的斗争来反抗封建官僚势力的吗? 不是! 在吴晗同志笔下, 农民群众不过是供海瑞怜悯、施恩, 又给海瑞叩头、烧香的道具而已。

吴晗同志告诉我们: 作为农民的“救星”, 海瑞的力量是从皇帝那里来的, 他是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代表而有力量的, 是凭借幕落时仍然举在手里的大印行事的。

海瑞在剧本里一出场就向农民宣传“王法”, 又反复地宣布自己的任务就是“整顿纪纲”、“整顿纲维”、“要申三尺皇家法”、“宪纲三尺重如山”。他是作为“皇朝大法”的执行者而成为农民的“救星”的。

海瑞具有的一切“好的品德”,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剧本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是因为海瑞的母亲从小给他“课诗书教忠孝非礼勿窥”, 又经常地勉励他“读圣贤书, 行圣贤事”的缘故; 剧本中的海瑞也一再表白: “二十年寒窗下苦学文章, 谈孔孟读诗书取法先王。”这就是海瑞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这样来歌颂海瑞、歌颂“清官”, 难道不是通过歌颂封建阶级的英雄人物, 狂热地歌颂了封建国家和法律, 封建纲纪、礼教和道德, 一句话, 歌颂了封建制度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 这样来描写海瑞, 是想说明海瑞“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可是, 问题在于, 吴晗同志正是歌颂这一点, 而不是批判、暴露这一点, 人们从剧本中看到, 正是这一点成了“清官”海瑞作为农民“救星”的力量之所在, 而不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吴晗同志通过这种歌颂,

硬要人们相信，最忠实、最严格地执行封建法律制度、遵守封建纲常道德的人，就是最代表人民利益的人。

这样，我们便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一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像海瑞这类“清官”，究竟是一种什么人物？他们究竟做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又应当怎样来评价？他们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历来对“清官”的歌颂和宣传，究竟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今天来歌颂和宣传“清官”，并且把他们打扮成农民的“救星”，究竟是什么意思？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什么是“清官”？从来没有抽象的清与贪、好与坏；它们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于判别清贪、好坏，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封建阶级的“清官”，他们“清”，就“清”在政治上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忠于封建的法律制度，在思想上遵守封建的纲常道德，在经济上于合法剥削之外不贪或少贪非分之财。如此而已。作为封建阶级专政工具的官吏，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是属于剥削者、压迫者的阵营，而同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相对立的。这是一条不容混淆的基本的阶级界限。

当然，仅仅这一条界限还不能全部说明“清官”的本质特点。同是封建官吏，“清官”同“贪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同是封建阶级的成员，“清官”同他们所反对的“豪强恶霸”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封建的统治权利也是如此。封建阶级凭借法律的统治，总是同这个阶级的不法行为相伴随，它们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构成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两种形式。

封建的法律，是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封建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这种法律赋予封建阶级的权利，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程度的制约。而剥削者贪婪无厌的本性，又总是不满足于法定范围内的利益，总是要超越一切法律限制，去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利。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总要依赖本阶级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又从来没有哪一个剥削阶级会认真地遵守自己制定的统治规则。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贪婪地追求非法权利，干出种种不法行为，野蛮残酷地掠夺一切。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和普遍现象，是封建制度残酷本质的赤裸裸的表现。

法定权利体现了封建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个压迫和剥削之神是用普遍法律形式的圣洁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贫富贵贱之上，显示了不可侵犯的凛凛尊严。而不法行为则体现了封建阶级中的集团和个人的特殊的、眼前的利益，它像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但是，不法行为的恶性泛滥，又会造成生产的严重破坏，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使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也面临化为乌有的危险。为了防范和消除这种灾难，封建统治阶级中就不能不有一些“清官”出来，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在这种斗争中，“清官”有时也表现出维护本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某种勇敢和魄力。

一旦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革命的农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完全冲破封建法律的樊笼，从根本上威胁封建阶级的统治，要消灭封建阶级的一切法定的和非法的权利。这对于忠实地维护封建制度的“清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

封建法律经常遭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不同性质的破坏。在反对来自阶级外部的破坏和来自阶级内部的破坏的斗争中，“清官”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封建法律的维护者，他们的阶级本质，就暴露得更加清楚，更加鲜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清官”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部分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对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有所裁抑。对这些，完全可以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但是，怎么能够混淆基本的阶级界限，把作为封建法律维护者的“清官”，打扮成站在农民立场的农民“救星”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对“清官”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爱民”等等的阶级实质，就很容易看清楚了。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一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一个反映。

早在明太祖的时候，他就看到土地的大量投献对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曾经下令禁止皇亲功臣受献“田土山场窑冶”②。但是，兼并土地是封建社会中的必然现象。封建阶级，特别是权贵豪强，经常突破法规界限，通过投献、占夺等等手段，疯狂地掠夺田产。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皇帝和某

些官僚不得不出来搞一通反投献和退田、限田。在明朝，皇帝诏令退田的事，屡见不鲜③。就是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也曾一再清查了王府和功臣的田产④。在海瑞要徐阶退田的前几年，徐阶也要别人退过田⑤。海瑞罢官后不久，被吴晗同志说成是“恨极了海瑞”的张居正，也主持发布一个命令：凡是王府功臣侵占受献的土地，“速改民田入籍，一体纳粮当差”⑥。

有两个官僚对这种斗争的实质讲得很清楚。嘉靖初年的大学士杨一清说：近来投献之风太盛了，“民既失常业，非纳之死地，则驱而为盗”④。嘉靖中叶的给事中王鸣臣说：兼并的土地太多了，“宗室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贻累粮里”⑦。原来，投献和土地兼并盛行的结果，不但会引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且连明王朝的赋税也收不到了。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且，尽管一再颁发命令，采取措施，究竟有多少兑现了，也是很可疑的。即使实现了一些，稍稍约束了一下权贵豪强过分的不法行为，也无非是为了维护明王朝征收赋税的法定权利，为了明王朝的“青春永驻”，为了整个地主阶级剥削利益的“万世长存”。在这里，农民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充其量也不过是象海瑞所说的“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⑧而已。

对于这个目的，海瑞自己讲得很清楚。“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区区欲存翁（徐阶）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⑧这是一个封建忠臣和诤友的真实的自白。海瑞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抹杀海瑞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和对朋友的一番好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站在农民立场，向封建官僚和黑暗势力进行的一场斗争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从嘉靖皇帝到徐阶、张居正，岂不都要跟在海瑞后面成群结队地“站到人民方面”来了吗？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平冤狱”，也不过说他“执法持平”。他执的什么法？皇朝大法。执行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封建法律，又哪能在地主和

农民之间“持平”？所谓“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更是从何说起？顶多不过是在某些案件中，对贪官恶霸的过分的不法行为作了一点约束罢了。马克思说：“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七八页）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去揭露封建法律虚伪的形式和镇压人民的职能，却要我们大家相信：根据封建法律也可以有“公正”的判决，可以使农民得救呢？

海瑞不是总以“爱民”、“为民”自许吗？当时很多人不是都交口称赞他“爱民”、“为民”吗？这些难道都是假的？

封建官吏关于“爱民”的自白，有的是虚假的，有的也不乏主观的真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从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实践去分析这种“爱民”的实质。地主阶级要长久统治下去，不能无视农民，因为农民既是掠夺的对象，又是威胁自己统治的力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谓“爱民”，无非想求得地主阶级邦国的安宁，这不过是同维护封建的法定剥削权利相适应的一种道德观念。人们可以并不觉察到隐藏在自己观念背后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因为这种观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复杂的途径而已经形成。他们只是现成地接受这种观念，以为自己的行动仅仅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可是“爱民”的观念和其他许多观念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为只能对地主阶级有利的观念形态的体系。海瑞就说过“以下奉上，理所当然”，贵贱有别，务须“存体”⑧。在他那里，“爱民”“为民”的观念和“上下”“贵贱”的观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当一些“矿徒穷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打破封建秩序的时候，海瑞就认为他们“罪不容诛”，下令“随即杀之”⑧。在这里，他的“爱民”的面纱就完全撕破，而显露出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相。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

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可是吴晗同志却宣称：这样的“爱”是古已有之的，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就有了，在“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海瑞那里就真正实行了。吴晗同志起劲地充当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爱”的说教者，他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能从地主老爷那儿得到什么样的“爱”呢？他们当了几千年的牛马，“不爱民”的老爷随时可以给他们一顿鞭打，而“爱民”的老爷也不过是掷给几束干草而已！

（注：《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发表过星宇同志的《论“清官”》，这篇文章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一九五一年，当着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学者，拍电影，写文章，狂热地歌颂武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事物我们究竟应当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他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如果说，电影《武训传》歌颂一个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人物，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资产阶级反动宣传，那末，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的“清官”海瑞，这样狂热地歌颂，并且把他说成是农民的“救星”，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于“清官”，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吝笔墨，极力加以歌颂、鼓吹的。一部廿四史，把多少“清官”记入列传！在戏剧和小说里，又有多少“清官”被刻划为英雄！封建统治者热心提倡宣传“清官”，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宣传“清官”，不但不会触动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一根毫毛，相反地，倒是极大地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来巩固封建的统治。

在这种宣传中，封建制度的一切罪恶，人民的一切苦难，被委之于几个贪官、恶霸个人的罪恶。而且，他们的贪、恶，被描写成并不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反倒是他们违背、破坏了那据说是无比美妙、公平、纯洁的封建法律、纲纪、道德的原故。封建制度反倒由于“清官”、“好官”对贪官、恶霸的斗争而得到净化。

在这种宣传中，社会的矛盾，被归结为“清官”与“贪官”的矛盾。“贪官”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清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贪官”是人民的灾星，“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人民群众只消盼望“清官”出世，申张皇朝大法，力行封建道德，太平盛世就会出现，“好光景就在眼前”。还要什么革命！还要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

这样，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

封建阶级的政治家、历史家、艺术家，千百年来在“清官”这个问题上向人民群众散布了种种谎言，造成了重重迷雾。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武器去揭穿这些迷雾，还它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呢？还是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卖力地去歌颂封建时代的“清官”，歌颂以“清官”为化身的封建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继续帮助他们制造迷雾，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把它装潢起来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舞台上的“清官”不同于历史上的“清官”，它是人民的幻想和愿望的化身，人民在“清官”的艺术形象中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歌颂这样的“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并且用这些理由为《海瑞罢官》辩护。这些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7)(8))

过去某些“清官”戏里的“清官”形象，是艺术的虚构，他们在舞台上做了一些历史上的“清官”所不可能做的大快人心的事情，的确反映了人民中某些人

的幻想和愿望。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想和愿望呢？在封建时代，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幻想和愿望。一种是革命的、健康的、积极的、前进的幻想和愿望；另一种是落后的、软弱的、消极的、保守的幻想和愿望。后一种幻想，是弱者的命运。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着幻想，对虚伪的封建法律道德存在着幻想，并且把这种幻想在舞台上加以实现。这样，戏剧舞台上“清官”的形象越高大，封建法律、纲纪、道德就越是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劳动人民也就越是苍白无力，阶级斗争也就越是黯然失色。就以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臆造的一个处斩相爷公子的情节来说吧，这种艺术处理，从政治效果看，无非是希望借舞台上一个恶霸的脑袋，在现实生活中赢得对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和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片掌声。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批判旧时代的消极的幻想，用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来消除这种幻想。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某个时期中，一部分人民由于处在软弱的尚未觉悟的状态而产生了这种幻想，因而也产生了某些表达这种幻想的“清官”戏，那末，在今天，中国人民政治、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都根本改变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早已摆脱了弱者的命运，那种奴隶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在这个时候，写出《海瑞罢官》这样一出“清官”戏，又是反映什么人的愿望，倾注了什么人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又是要反抗什么、向谁作斗争呢？

（二）《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海瑞罢官》在舞台上出现并且受到一批人的热烈赞扬，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个别的事情；它是一种社会的现象，是当时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喧嚣一时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物。

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一种思想、理论、倾向的出现，只要它引起社会的注目和反响，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那么，要理解它，就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发现它的根源，必须把它摆在现实的社会斗争中，看它起什么作用，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对谁有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教导的、观察和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

《海瑞罢官》的写成和演出，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那几年间，艺术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死人”统治的怪现象。戏剧方面最为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完全占领了舞台。在学术研究中，响起了一片颂扬帝王将相、颂扬清官好官、颂扬一切封建阶级英雄人物、颂扬整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声浪。

一九五八年以来，同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的革命高潮相配合，在学术界，对厚古薄今的倾向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革命的批判的风气大发扬。一批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人，着手重新改写历史，力图把过去被统治阶级歪曲和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这个学术革命很是激怒了一些人。因为它触动到他们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深处，冲撞了他们感情上最熟悉、最珍贵的东西，摇撼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于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来了一个大反复、大反动。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潮流泛滥起来，利用我们检查和纠正学术革命中某些缺点的机会，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学术革命本身。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出现。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⑩，总之是糟得很。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⑩，非要出来讲话不可。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①①，“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①②，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⑩。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⑨，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⑩，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①③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①④，“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⑤。他特别连篇累牍地

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①⑤，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本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①⑥，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为什么这样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这样一种对封建阶级英雄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宣传，在那个时候，忽然盛行起来？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反复，只能是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形势变动的反映。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个反复，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发动了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进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积极鼓吹什么“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掀起了“单干风”、“翻案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舞台上和学术界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相呼应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复辟活动，总是要借助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而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结晶出来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它的影响、它的潜移默化的能力，是很大的。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它们能够而且必然结合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联盟。用封建的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抗，就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辟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准备思想条件。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要了解《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不仅要考察它对历史采取怎样的态度，宣传一种怎样的历史观点，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它所反映出来的对现实的态度，它表达和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点。

吴晗同志曾经说过：“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

图等等”①⑦。他似乎是用这段话来批评旧历史剧，实际上又何尝不是用来说
明自己的新编历史剧。

哪一个历史剧没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哪一个历史剧不是在现实生
活中有所为而发？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而发。不论剧本选择的是多么古
老的题材，它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写的，是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看的，是想
要通过它向人们宣传一种思想，抒发一种感情，唤起一种反响，从而在现实生活
中发挥一种作用。古往今来的历史剧，都是如此，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
不例外。今天，我们对历史剧的要求同过去的不同：过去的作者往往为了现实的
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不顾历史的真实，而今天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
则必须努力把适应现实的革命需要，同对历史的严格的唯物主义态度很好地结合
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年中出现的新编历史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对现
实的态度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对现实生活是热爱的，拥护的，他们是从歌颂现实
的感情出发，从鼓舞今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出发去写历史剧，
尽管他们的作品也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在这个或那个观点上背离了
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同志，他们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本来感情很淡薄，而
沉醉在古代的东西中间，或者是在暂时经济困难而前经不住考验，在现实中看不
清前途，因而就转向古代的东西，欣赏封建主义艺术，到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
生活趣味。还有极少数人则不同，他们心中对社会主义积累了深刻的不满，在阶
级斗争的一定环境和温度下，迸发出来了。他们写历史剧，是为了借古非今，用
古人的口吐自己的心声，发泄不满，攻击现实。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
瑶环》①⑧和《李慧娘》①⑨。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
的精神欢呼②⑩。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
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②①。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
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②②。物
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物

以类聚。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这里，重温一下一九五七年前后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在文艺方面提出所谓要“写真实”，“揭露阴暗面”，“干预生活”。他们直接从反动的立场来观察和描写现实，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他们直接歌颂现实生活中的反社会主义的“英雄”。到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同，资产阶级进攻所采取的方式也变化了。这一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以写历史题材的方式出现，而把他们对现实的阴暗心理，灌注到对古代的描写中去。他们用古人的躯壳，去容纳他们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的灵魂。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攻面前，他们觉得天昏地暗了，社会主义大势不好了。所以，《海瑞罢官》中唱出了“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谢瑶环》中唱出了“载舟之水也翻舟”。《李慧娘》中唱出了“时艰急草万言书”。船要翻了，时势艰难了，不久长了，这是他们对形势的感觉和估计。他们觉得是号召人们起来抗争的时候了。《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罢黜的清官，他“要为生民作主张”，“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不为强暴所屈”，“不怕杀身之祸”。《谢瑶环》塑造了一个遇害的女杰，她“为民请命”，“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李慧娘》塑造了一个复仇的厉鬼，她“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死后报仇冤”，“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请看，这三个剧本，不但在精神上，甚至在语言上都是多么一致！“为民请命”，同当道的“强暴势力”作殊死斗争，成了它们共同的中心口号。他们又都特别声明，塑造这些“英雄”，是为了要“我们今天学习”②③，是要对今人发生深刻的“教育意义”①⑧，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①⑨，是要予读者或观众以“现实斗争的指导”②①，总之，是渴望唤起一种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抗现实的斗争。《李慧娘》中特别借“急草万言书”的太学生之口说：不要去骂那死人了，“还是对付这活着的”，“还要写到目前才是”。这不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吗？

什么是“为民请命”呢？“为民请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是革命者的口号，在今天，更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呼声。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人民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还要谁去替他们请命呢？那些打出“为民请命”

的旗帜的英雄，究竟是为谁请命，又是向谁请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不是站在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之中，而是站到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外面和对面，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向党请命，同党斗争，似乎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党，反而是他们，这样，他们究竟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总要在农民问题上大作文章，“为农民请命”是他们惯用的口号。这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地、富、反、坏讲话吗？不能。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资产阶级剥削利益讲话吗？也不能。他们只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忧的是灾黎苦”，同情和关怀的是农民的利益。他们诅咒社会主义改造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如果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被改造了，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巩固和发展了，那么，资产阶级就彻底被孤立了。这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能善罢甘休呢？于是，他们挺身而出，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他们“不畏强暴”，要同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抗争。

对于这样的冒充农民“救星”的反社会主义“英雄”，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还在一九五三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就有这样的“英雄”出来，叫嚷什么“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为“农民”鸣不平。一九五七年前后，在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和发动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之中也不乏这样的“英雄”，大嚷什么“农民生活苦”，并且刮起了一阵“合作化不

行”，“不如单干好”的小台风。一九五九年，又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叫喊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中，再一次跑出来这样的“英雄”，把农村情况说得一团漆黑，大肆宣传“单干优越”论，掀起了一股“单干风”。

这不是历史的滑稽剧吗？过去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吸吮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踩在九地之下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翻了身，走上了消灭剥削和逐步消灭穷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居然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捍卫者，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了。

这样，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看，从当时剧本写作和演出的实际背景看，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果看，《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的是什么作用，不是很清楚吗？

原来，在戏剧舞台上抬出一个历史人物，把他塑造为农民的“救星”，不过是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企图把自己装扮为农民的“救星”。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舞台上的海瑞是按照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面貌塑造出来的。在舞台上为罢了官的海瑞唱赞歌，不过是为了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遭受的失败表示惋惜和不平。至于历史上农民反对兼并、要求田地的题材，不过是被借用来表达今天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反对人民公社，要求恢复单干，恢复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愿望。在同一个时候，不但《海瑞罢官》大写“退田”，《谢瑶环》也大写“退田”，甚至《李慧娘》中也引用了“公田枉自害苍生”的诗句。这难道是偶然的现象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在《论海瑞》中不是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的确，在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大量宣传文字中，有过几句游离于他的全部宣传的主旨之外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词句。但是，这些词句并不能够改变他的全部宣传的意图和倾向。以吴晗同志第一篇宣传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来说，这篇文章根本不讲海瑞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上，不讲这件事情的阶级实质，不讲海瑞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是这个封建阶级的优秀人物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行为，而是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以一骂为快，甚至说什么就是“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②④。请问，这种感情同什

么人共鸣？吴晗同志还离开阶级分析，大力宣传一种抽象的“傲骨”精神和所谓“反乡愿”的态度，宣传“老来傲骨犹然在”，请问，这在现在又是同什么人的精神状态相符合，它的矛头指向哪里？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五九页）

在这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辩论中，透过“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揭露这个新编历史剧所代表的思潮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

作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宣部主持写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纪要节载于后。

* * *

周予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一些问题还值得研究。我觉得这次讨论里究竟有多少问题，可以排排队，介绍一下。目前有些文章有许多重复的见解。建议今后讨论论点可以先排排队，把已发表的及时总结一下，再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一、戏剧和历史有关系，但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目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吗？

学生中存在着贪官比清官好的问题。现在中学生也提出这个问题，中学教历史的教师苦在不知如何教法。中国封建社会便有三千年历史，阶级成份的变动也很大。因此，对封建社会的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历史，那将要把世界上优秀的一部分文化淹没了。现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倒不大注意了，敌人美帝国主义拼命在研究明史，日本也很注意中国史的研究，甚至在组织会社研究唐玄奘。将来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好取材外国资料了。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我看了。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周谷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清官有没有，有的话与贪官是不是一丘之貉，是否比贪官更坏，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清官比贪官更坏，一般不易接受，但是一定要说清官比贪官好，好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谁讲得清，因此这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还可拿出来辩论。

第二，现在发表的文章还不是这篇驳那篇，还不够针锋相对，没有劲，不过瘾。

第三，借此讨论之机会可以使历史问题的讨论范围扩大一些。例如，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可以研究一下，投献问题就是可以讨论的。投献不仅明代有，魏晋南北朝也可能有，不仅中国有，西欧也有“投奔”。中国的部曲、门生，故吏、食客等都可研究。中世纪的封建财产关系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投献问题在世界

各国似有共同性，有世界性，这些问题都可继续讨论。此外，现在海瑞问题在打歼灭战，当然歼灭战很好，能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要只打歼灭战，游击战也可以打一些。在海瑞讨论的同时也可搞些其他的题目，冷门也可让大家看看，冷门对某些读者来说不一定是冷门。海瑞的文章已经发表得很多了。我觉得讨论版面不必有一定的格局。那篇主动提出问题，就把那篇发头条。现在还需要不同意见针对性强些，我们看的人才过瘾。

对于吴晗的文章，我没有好评。我对他的“自我批评”有批评，文中第二段是为自己辩护，至于清官评价问题，文中没有解决，只是说了清官、贪官一丘之貉，那么有什么好坏呢；第三段提出了不少问题是要人家给他解决。吴晗当初曾坚持历史剧要符合历史真实，但写《海瑞罢官》的剧本又不强调了，是自相矛盾了。

蒋星煜（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

吴晗名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对姚文元反批评。吴文好象处处对他自己一分为二，实际上割裂了动机和效果、政治和学术、世界观和历史观。文章第二段是骨子，但成立的可能性恐怕不存在。

过去我也曾美化海瑞，考虑过清官问题。看来，清官不光是指经济上的清，而有清正（有正义）、清廉（不贪污）、清明（不糊涂）等涵义，清官的对称包括酷吏、贪官、糊涂官。

对这次《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对海瑞应怎样一分为二？有的说对反面人物不能一分为二。有的说肯定海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否定海瑞为人民做了好事。这样说当然很对，是否就是一分为二的提法？有的说海瑞是两手，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修吴淞江是胡萝卜，衙门口枷七、八人是大棒。有的说现象和本质一分为二，海瑞现象上为人民服务，本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对具体历史人物是否适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否普遍真理？

谭其骧（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

《海瑞罢官》犯了很大错误，经过五十多天的讨论，成绩很大，对学术界很有好处，提高了大家的认识，使许多头脑糊涂的人受到教育，也包括我在内。现在要找赞成吴晗是对的人，怕很少了。何况吴晗已经站出来检讨，不管他检讨得

够不够，深不深，有人再要拥护《海瑞罢官》，不大可能。其他问题，可以大放一下。

清官问题，很值得讨论。清官，和贪官比较，是剥削少点好，还是多点好？压迫轻点好，还是重一点好？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即历史上除农民起义领袖外，在封建统治阶级范围内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人物？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大家都肯定。此外和民族矛盾没有关系的封建人物，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再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一个问题，如何评价海瑞又是一个问题；但现在有些人因为否定《海瑞罢官》，连海瑞这个人也根本否定了，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应该分一分。

最后，对吴晗的自我批评谈些看法。这篇文章看得很匆忙，没有很好看清楚。他说《论海瑞》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我弄不懂海瑞和反右倾有什么关系。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大量篇幅是第二部分，它还是扭在退田、反霸上，没有对根本问题好好检查，检查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就以退田来讲，吴文还存在很多逻辑问题。吴晗这篇自我批评文章轻重倒置，不该把第二段写得那么长，成为主体，而对根本问题——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却避而不谈。

刘大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虽说也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很不深刻。他是以辩解代替检查，以现象掩盖本质，而又前后矛盾，很难自圆其说。作者不仅仍旧宣扬了那些旧观点，还有不少地方，是用辩解来进行反批评。

其次，对于文艺作品，首先要注意的是政治倾向问题。而作者在自我批评中，对于这个重要问题，只谈现象，不接触到本质，因而把动机和效果对立起来，把政治和学术割裂开来。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排了一张写作的时间表，无非是要读者相信，《海瑞罢官》与政治无关，没有什么目的性。但奇怪的是：他自己说他的《论海瑞》，是有政治动机的，是为反右倾机会主义而作（其实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服务的），何以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海瑞罢官》，反而目的性“不清楚”，反而“糊涂”起来了呢？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中说：写历史剧（也是指《海瑞罢官》），“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为了继承前人的斗争经验教训，使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到古为今用。”但在自我批评中，他又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古为今用’‘厚

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怎能叫人相信？他的《海瑞罢官》当然是有感而发，正如《人民日报》刊的方求同志文章所说，这反映了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吴晗同志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说，他的错误，“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他不仅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且还积极地参加了阶级斗争，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已。至于他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他是站稳了的，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还有问题。这样把政治和学术完全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关于“清官”问题，大家都很注意。姚文元同志所提出来的“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阶级界限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这就是对于历史人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我认为这只能是一种误解。首先承认“清官”、“贪官”在阶级本质上是同一的，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同一的，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就没有可以区别、可以评价的地方。对待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必须进行具体分析，首要的问题，是划清阶级界限。决不能把一个地主阶级的巡抚大官，说成是农民阶级的救星。近来大家常常谈到岳飞，其实他的问题，也并不简单。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河北一带的抗金义军，风起云涌。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抗金的形势下，岳飞同抗金义军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援，自己积极参加了抗金斗争，他在这一方面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但如果我们将这件事只归功于岳飞一人，那就完全错误了。同时，他又存在着忠君的封建道德的一面，这又是应当批判的。至于他在阶级斗争中，镇压杨么起义军，他在这里就完全成为农民阶级的敌人了。要把岳飞写成剧本，处理不当，同样是要犯错误的。

关于“清官”问题，方求同志的文章谈得比较全面。我同意他这种看法。“清官”问题比较复杂，关心的人也很多，希望在今后讨论中，多发表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李俊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

清官和贪官有区别，历史人物的好坏还是要区别的。贪官实际上是糟粕，不在话下，而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也大，这种影响并不好，所以越是精华越要批判。清官比贪官坏，也有道理，从革命者立场来看，贪官、恶霸好对付，

所谓“清官”难对付。海瑞同开明绅士又不同，开明绅士在一定条件下有革命性一面。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在初期应肯定，海瑞在当时也是封建顽固派，不应肯定那么多。

吴晗说有些人自封反对派，自封海瑞，不论他自己态度如何，可见总是这些人需要“海瑞”。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适应了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需要，起了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吴晗称“有时候是清醒”，“有时候又糊涂”，是“合二而一”。他拿资料讲话，但“宁屈乡宦”可能不可能？吴晗的检讨实际是用死人的“资料”来和活人争辩，为自己辩解，这同真正的自我批评相差太远了。

束世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自我批评文章的按语和发表姚文元文章时的第一个《编者按》有所不同，这次的完全针对吴晗，意思要把《海瑞罢官》这个剧本讨论透，别的问题慢慢来。

吴晗的自我批评我越看越不对头。他先是排了张时间表。为什么排，就是准备赖账：《海瑞罢官》的剧本是一九六〇年写的，不是影射现实。这是欲盖弥彰。他的《海瑞骂皇帝》骂的是谁？为什么要骂？这篇文章恰恰就是在右倾机会主义闹得凶的时候写的。我本来很原谅他，但他在自我批评中说自己政治立场是稳的，只是学术思想的问题，我就不相信他政治上靠得住。他说《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搞出来的，这倒可以说得通，我们也有这种情况，一面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面在教书时却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吴晗也不比我们高明，他会自然而然地替资产阶级服务，他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的根本立场没有动，学术思想的错误根源正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稳，不能把两者分开。不能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是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

杨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吴晗同志把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隐蔽了创作的真正意图。他说自己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在他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海瑞罢官》中，哪里有真正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呢？吴晗又说写这个戏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搞古史的人“为古而古”的或者有之，但吴晗早就主张“古为今

用”，写历史戏要着眼于“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写这个戏不能没有目的。

吴晗又把政治和学术的联系完全割裂开来，隐蔽了创作这戏的政治立场。吴晗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只是学术上的立场错了，难道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会有两个绝然不同的立场吗？

吴晗为了坚持过去的错误，还进行了反批评。文章的第二部分完全是对姚文元的反批评。吴晗大谈其当时苏松地区的社会特殊化，认为那里“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农民对地主的矛盾”，也就是说，农民只是和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乡官有矛盾，不是和整个地主阶级有矛盾，这就严重歪曲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吴晗还说“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如果“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岂不是接受告状的“青天大老爷”成了处理和解决阶级矛盾的“公正人”了？把这样的告状看作阶级斗争，只能是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歪曲。实际上，告乡官夺产的主要是一般中小地主，不可能多数是农民的。就算告状是一种阶级斗争，在当时，无地的贫苦农民是大多数，有地被夺而去告状的农民只能是少数，这少数人去告状，就可以代表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吗？当时当地广大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确很尖锐，主要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已经发展到群众直接打击地主的斗争，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为什么吴晗视而不见呢？

吴晗仍然坚持原有的错误观点，声称对“清官”的看法基本未变。说“清官”叫作“青天”，是“人民作了鉴定”。众所周知，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阶级，就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斗争，而吴晗却认为“清官”能够使得这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都“一致”。吴晗又说海瑞的“退田”，既符合封建王法，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王法真是既能维护地主利益，又能使农民有好处，那末，王法就成为“全民”的了，封建皇朝就成为“全民国家”了。总之，从这篇文章来看，吴晗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未有改变，名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反批评，而且是在继续宣扬他的谬论。

魏建猷（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有的同志提到必须抓住主要问题展开争论，分辨是非，不要扭在枝节问题上。这一点很重要，费太多力气去争辩一些枝节问题，是意义不大的。为了避免发生这类情况，对于某些枝节问题而自己又无甚把握的，不必轻下结论。例如：说退田中没有农民，吴淞江没有修，既没有说服力，也容易引起纠缠。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有许多是为自己辩护。文章的第一段，目的是在证明他写《海瑞罢官》及《论海瑞》等文章，都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阶级斗争形势无关，他是响应党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号召。这种机械地按时间排比，不论思想实质，当然解决不了问题。文章的第二段，占全篇分量二分之一，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他就许多具体问题反驳了对他的批评意见，但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如一面说退田没有效果，一面又竭力夸张退田的影响；有些是似是而非的，如说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农民对地主的矛盾。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企图说明：（一）《海瑞罢官》是写了阶级斗争，因为写了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二）海瑞搞退田，是按照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官的原则处理的，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宁可让乡官“屈一点”；（三）剧本曾强调了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只是把他突出过分了，才使读者观者会产生另一种理解。因此所谓忘记了阶级斗争，所谓阶级立场问题，就很难索解了。

张家驹（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吴晗的自我批评写得很别别扭扭，许多地方自相矛盾。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他在为自己辩白。文章好像承认一些错误，但在具体分析中，却把这些错误都否定了。

这篇文章有四大要点：

一、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政治动机辩白，如排了个时间表，有关海瑞文章大都在一九六〇年前后写的，那时还没有翻案风，单干风；《论海瑞》是为了配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动机很好，只是客观效果不好；又说自己的政治立场很稳，学术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截然分开。

二、否认《海瑞罢官》宣扬阶级调和论，剧本写了农民告状，这也是阶级斗争，退田是陪衬，除霸才是主题。

三、强调清官的作用，自己对清官的看法是对的，这在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都着重说明了这点。再一次重复了他以前的论点：清官所做的好事，和人民利益一致。也就是说，他对清官和海瑞的估价没有错。

四、认为《海瑞罢官》对海瑞也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报圣恩、尊孔孟都已有批判，只是读者没有领会。

吴晗就是从这四方面进行反批评的，其中很多论点都有问题。如说“刁民”都是农民，但在《万历野获篇》中，“刁顽”主要是指“秀才”之流。

徐德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晗的观点立场基本没有变，这是对他自我批评文章的看法。

这里只说两点体会。

第一，这场批判，对吴晗，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吴晗说自己二十多年来政治立场是稳的，只是学术立场有问题，把政治和学术分家。但他是明史专家，在学术上是独立思考的，一独立思考，旧东西就原封不动地出来了。我自己也有经验，有时自以为有研究的东西，独立思考发挥得最多，因此错误也最大。独立思考很重要，但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为依据。政治与学术有密切联系，如果世界观不改造，不仅学术上会犯错误，也很难担保政治上不出问题。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最好是确定几条原则。这次学习、讨论中如果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也是世界观可由此得到一些改造。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陈向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

吴晗的文章的题目称“自我批评”，但与内容对不起来。正如大家指出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我补充几点意见。他在《海瑞罢官》的序里和《论海瑞》的文章里都讲明是要古为今用的，可见写作是有目的的，他宣告得很清楚。吴晗现在却说是“为古而古”了。这个弯子是转不过来的。

吴晗要我们学习海瑞敢于斗争的品质。但请问对立面是什么？谁是今天的嘉靖？谁是徐阶？谁是乡愿？读者有权要问。吴晗心中是有数的。吴晗自称写海瑞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方求同志说得好，这说法是和整篇文章游离的。其实他所要提倡的恰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是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么？

吴晗又说，剧本改定以后的主题思想是“除霸”，“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在《海瑞罢官》中从头至尾写的是退田，讲退了田，有好日子过。杀徐瑛只是一个情节。情节是代替不了主题的。剧中退田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即使就历史上的“退田”问题说来，海瑞要退的是违反王法的田，而大地主的田主要在王法保护下兼并、占有的，投献的田不过是违反王法占有的一部分。“退田”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结果是“贫者自贫”，“富者自富”。这个历史事实，吴晗不是不知道的。那末为什么要写这个宣传退了田才有好日子过的戏？可见为写戏而写戏，为古而古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这出戏的本质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是在借古讽今，是要把封建道德，封建思想、人物、制度都要继承下来。

吴晗自称没有借古讽今，其实他是借古讽今的老手。他过去写过不少借古讽今的文章，在民主革命时起过一些作用。现在写的这类文章，立场没有变化，不过对象和方法不同罢了。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吴晗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他的谦逊之辞，我看一点也没有忘记。

吴晗在他“自我批评”的文章里，不谈写这出戏的真实目的和现实作用问题，只谈历史上的退田问题，历史上的海瑞的评价问题，想在这方面展开辩论。他说，我政治上的立场是站稳了的，我不过把海瑞评价过高而已。问题真是这样么？

吴晗说，对海瑞，过去看不清楚，现在才知道他是个改良主义者。大家知道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潮。如果封建时代也有改良主义的话，那末海瑞是轮不到的。海瑞恰恰是最顽固，最保守，封建原则性最强，保卫王法最坚决的一个忠臣。说他是个改良主义者，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

看了吴晗写的剧本，这次又看了他的“自我批评”文章，我觉得里头有些重要问题还有大可讨论之处。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陆雨的文章：《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有的同志说，海瑞的“退田”是为了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平冤狱”是模糊了农民的斗争意志，是强化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这两件事都是

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我愿意谈点不同的意见。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据历史记载，海瑞搞“退田”确有其事。官史也说他“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我们从“严厉”、“悉”、“或许”等字眼上可以看出，海瑞对这一斗争态度非常坚决，斗争的面也很广，采取的办法也比较灵活。海瑞文稿和其它记载都说，“退田”是为了“民产渐消”，制止“民产”流失到“官”的手里去。那末，海瑞的“退田”到底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呢？

海瑞说的“民”是指没有做过“官”的人，即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商人。在海瑞的目光里，这些“民”虽然有一些田产，然而他们与那批有权有势的“官”和“绅”比起来就是“弱者”，官绅向他们要“投献”，他们就“莫敢不与”。所以海瑞要为他们打抱不平。我们得想一想，海瑞本人是明朝的“官”，却站在“民”的一边向“官”作斗争，这究竟是微不足道的事呢，还是难能可贵的事呢？试问，历史上能有几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官吏敢于这样做呢？

有的同志说，“退田”是骗人的把戏，徐阶本人不是也搞过“退田”吗？我认为徐阶搞的和海瑞搞的有许多重要的区别。徐阶是在景王朱埜死了以后才上奏一本，退了景王朱埜的田，这是轻而易举的；海瑞却是和徐阶经过了一场很久的坚决的无情的斗争，才使徐阶低头让步的。徐阶搞了“退田”，自己却占了更多的田，这说明徐阶的“退田”是企图捞一把政治资本，是“沽名钓誉”；海瑞却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这说明他是真正地为了“民”的利益。再者，徐阶搞退景王朱埜的田，还联系着当时宫廷、皇族夺权的倾轧；海瑞却没有夹杂其他目的，只是为了民产的流失。如果我们能结合他的其他政绩来考察，他的“退田”斗争确实是很叫人感动的。因此，徐阶和海瑞同样搞了退田，两者的价值却不能混为一谈。

虽然海瑞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但是这是不是就算巩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呢？我的意见是否定的。

在明代后期土地大量兼并、阶级矛盾日趋严重的关头，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也非常不稳，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随时可能分化到农民一边去。海瑞搞“退田”也确是使他们最受其惠，但这

一斗争可以引起别的受压迫、受剥削阶层人们的同情。特别是“退田”斗争的展开，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进一步看清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占夺田产的罪恶本质。因此，海瑞这一坚决的措施，是可以引起广大农民对他好感的。

再者，由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没有权势，缺乏经济上的保障，所以他们在那时不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应该被当时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农民阶级看作是又有团结、又有限制的一定程度的联盟，可以结成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敌人——官僚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统一战线，推翻封建独裁的朱姓王朝。在海瑞以后不久的李自成农民革命，不就是吸收过中小地主中的某些开明人物参加起义的吗？在这个意义上讲，海瑞搞“退田”尽管是为了遏止“刁险”的“民风”和徐家的“百年安静”，但收到的客观作用却远远超越了他的主观意图。因此，要想从海瑞“退田”的阶级路线来否定他的功绩，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也不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

既然海瑞的“退田”并不是与当时人民绝缘的行动，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取得人民拥护的，那么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里通过烘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段，集中地写了这一斗争的场面，决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的。

《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

说到海瑞“平冤狱”的问题，我认为，海瑞绞死徐瑛一场固然是剧作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但决不能无视海瑞其他许多“为民昭雪”而和权宦过不去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事实姑且不论，我们就谈谈这是不是美化地主阶级的法律这一原则问题吧。

封建王朝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欺压农民的工具。而海瑞却把“民”的事看得非常认真，专门敢冒着风险向“强项”作这样的或那样的斗争。当时江南地方的“官”、“绅”确实对他非常讨厌。那末，《海瑞罢官》描写他“为民请命”、“断案如神”，也并不是十分不对的。如果单单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那恐怕过于简单化了一点。

我认为，仁政主义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最积极的部分。作为“清官”的海瑞，就具有这种思想。他在少年时就有“效君图上，以德政为本”的抱负。他这种思想就成了他一生斗争中最基本的力量，也就是他所以能成为“清官”的思想基础。农民或者其他一些受冤的人向他告状得到“昭雪”，这里起着根本作用的不

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这个具体的人，即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海瑞在受理冤案的时候，当然必先考虑的是这个案件会不会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也就是海瑞的阶级偏见和局限性。但结果是海瑞得罪了许多乡宦，而当时的“小民”却呼之为“青天”。这就说明海瑞行事客观后果和他主观意图、阶级本能发生了格格不入的矛盾。我认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和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确是海瑞的阶级要求，但他处理到许许多多惊心触目的案件的时候，他的仁政主义思想和责任感就会占上风。这正好象我国历史上不少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一样，他们虽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虽则有“致君于尧舜”的忠君思想，但当他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创作素材就会联系到自身的痛苦经历，他们就会写出千古传诵的篇章。当然，在他们所留下的事迹和诗篇里仍有斑斑可寻的阶级痕迹，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当然，向“清官”跪下来告状，这不是当时农民的真正出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参加武装斗争的农民革命，彻底粉碎封建制度。但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至于《海瑞罢官》里夸大、虚构了这种“平冤狱”的描写，就是调和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还好，事实证明海瑞时代的农民没有中海瑞的“鬼计”。在海瑞死后五十多年，陕西的农民大革命就埋葬了这个封建集权的朱姓王朝。不然，海瑞真地要成为历史上千古罪人了！我觉得可以反问一下，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反而值得表扬的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是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我这样的反问并不是存心开玩笑，而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说明对一个有民间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冷静、全面。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有的同志说，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海瑞只能是为地主阶级鞠躬尽瘁，任何封建时代的“清官”也都只能在这个阶级范围里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我又要反问一下，就算海瑞那样的“清官”跳不出他们的阶级

圈子，那末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也是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呢？我认为，统治者内部“清”与“邪”的斗争，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统治者的“内部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海瑞那个时代，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大地主手里，江南一带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统治者的对立日益加深，就促使统治者内部在对待土地、农民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就出现了“清”（开明派）与“邪”（顽固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和统治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海瑞在这样的严重关头，起来说了一些公正的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如修吴淞江），虽然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覆灭，但客观上也是符合农民利益的。我们知道，在封建统治下农民虽然不满意封建剥削制度，但他们对现实却仍寄于无限的幻想。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封建剥削，但希望有“好皇帝”。那末，海瑞那样的“清官”，深受历来人们的传颂是可以理解的了。况且“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最后悲惨遭遇是会对农民起一些教育作用的。这正告诉农民，“清官”起来为他们做一些好事，却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赏。这也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认识封建统治的罪恶本质。可见出现“清官”和“贪官”的斗争，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用显微镜般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能用一句话说尽其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历来的“海瑞戏”之所以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素。说它有一定的人民性，也并非过誉。只看到海瑞效忠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一面，不透过“清”与“邪”的斗争而显露出来种种复杂的其它积极因素，因而得出地主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结论，就轻轻地一笔对海瑞和“海瑞戏”作了根本的否定，这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

由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引起的一场大辩论，正在深入地展开。像《海瑞罢官》这样一种历史剧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和《海瑞罢官》相呼应，或者说在它“带动之下”，“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的孟超同志，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田汉同志也同时树起了《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旗帜。

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当时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在戏曲舞台上的表现。

历史剧（包括传说题材的戏）作为一种艺术武器，从它的思想内容来看，都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历史剧既然是以历史作为它的题材，就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观察、处理历史题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进行创作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剧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创作呢，还是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去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创作？

第二，从古至今，所有的历史剧，都存在着对现实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剧来说，当然也必须看它反映什么样的思想，代表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必须看它究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不管你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也好，或者是根据历史真实进行艺术虚构也好，也不管你多么隐晦曲折，今天的历史剧都不可能避开这样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好的历史剧，应当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观察和描写历史，同时又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些历史剧，虽然并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表现历史，但它却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有的还想借历史来歌颂今天，当然，由于对历史的看法不科学，它们对今天的歌颂也往往不恰当。至于《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这些剧本的作者，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歪曲历史真实，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同时又借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攻击现实，诽谤现实，发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封建皇帝能代表人民利益吗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究竟是怎样粉墨登场扮演自己的角色的呢？这里，我们首先也要看看，作者是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反映历史的。

《谢瑶环》，是从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过来的，而《女巡按》又是根据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改编的。《万福莲》是反对武则天的，《女巡按》把历史背景改到了唐中宗时期，变成反韦后专政的戏。田汉同志的新改本给武则

天翻了案。他自己说，根本上的改动，是“把骂武则天的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做一定批评”（《谢瑶环》：《小序》）。这样，也就完全改变了谢瑶环和武则天的关系——谢瑶环从反对武则天被改成执行武则天反对豪门贵族政策的亲信。

根据剧本的情节，武则天统治后期，她的一些子侄近臣，违反了她一贯的政策，也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兼并土地，压榨人民，动摇了国家的根本，面临着“载舟之水也翻舟”的危险，这“使她非常愤怒”。用谢瑶环的话说，就是“自先朝推行均田制，近年来良法美意多废弛。豪门贵戚兼并土地，只逼得百姓颠沛流离。”而在江南破坏这“良法美意”的，又是武则天的“子侄”武三思的儿子武宏，近臣来俊臣的兄弟。这实际上是说，新豪门贵族破坏了武则天的政策，损害了武则天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戏剧冲突的焦点。所以当江南农民受不了豪门贵戚的压榨，“啸聚太湖”，举行起义的时候，在武则天的宫廷里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梁王武三思认为，这是“唐室诸王余孽”造反，主张发兵征剿；尚仪院司籍女官谢瑶环则认为，起义军不过是被豪强兼并，逼得无路可走的“庄稼汉”，只要制止兼并，“招抚”“安置”，“使耕者得田饥得食”，那时节就会有“江南江北皆春意，笙歌一片颂明时”的太平盛世。

武则天听从了谢瑶环的“忠谏”，肯定了她的“为民请命”，“所奏各节深合朕意”，并且派她巡按江南，还赐上方宝剑一口，亲下谕旨：“如有强占民田，鱼肉百姓者，虽豪门勋戚亦不宽贷”。最后虽然由于武则天听了谣言，举棋不定，被武三思、来俊臣乘机把谢瑶环谋杀了，但武则天却因而醒悟过来，打击了豪门贵族，杀了武宏和来俊臣，罢了武三思的官，并训斥他说：

嘟！你明知朕生平痛恨豪门贵族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你却纵令你子胡作非为，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使三吴百姓积怨朕躬，使兼并侵夺天下成风，动摇国家根本，如何容得！

请看，这位皇帝对百姓是何等的“体贴”！真可谓嫉豪门贵族如仇。田汉同志“肯定”武则天的，就是她这种“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而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谢瑶环的“誓要与三吴百姓惩贪婪”，所以能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也正是由于“谢瑶环身上体现着武则天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

这样塑造武则天的形象，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呢？根据剧本的描写，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武三思、来俊臣等豪门贵族，他们是“鱼肉百姓”的“贪婪”；另外一类人，他们却“超脱”于封建阶级的立场，为农民制定了可以带来“耕者得田饥得食”的“良法美意”，“一贯反对豪门贵族”，一贯反对“兼并土地，鱼肉百姓”，替被剥削的农民着想，维护被剥削农民的利益。这类人里，有“为民请命”者的封建官吏谢瑶环，而谢瑶环所以能“宁玉碎不求瓦全”，又是反映了武则天的“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那怕是农民已经起来“造反”，在他们看来，其“罪”也不在百姓，而是由于豪门贵族破坏了“法制”。只要“制止豪强严法制”，就可以恢复“笙歌一片颂明时”的盛世。在这里，封建社会的地主头子——皇帝，也被装扮成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是代表人民和豪门贵族进行斗争的“伟大人物”！作为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法制”，也变成了维护农民利益的“良法美意”了！

请看，封建帝王成了农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样一来，一部历史还有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还需要革命做什么？田汉同志极力歌颂谢瑶环按照武则天的意旨同豪门贵族作斗争，不是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农民用不着起来斗争，只要等待皇帝把武三思、来俊臣之流的坏人铲除掉，农民就会得到“江南江北皆春意”的安乐生活；因为皇帝已经在那里维护他们的利益，替他们向豪门贵族进行斗争了，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呵！

从历史事实来看，武则天是不是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呢？不错，武则天的确曾经打击过李唐旧贵族，但她打击这些旧贵族，既不是为了铲除贵族经济，更不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而是为了巩固她的武周新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在打击旧贵族的同时，又扶植了大批武周新贵族。她赐予诸武亲王、郡王、公主的封邑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初唐以千户为限的旧制，她的爱女太平公主前后加封至三千户。他们自立小“朝廷”，贪残无厌，使“封户受困，甚于国赋”，还以剥削所得的大量封租营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在她统治时期，新的豪门贵族利用特权夺占人民田地的，也并不罕见。武攸绪“买田使人耕种”，她的男宠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强市人田”，强夺住宅、奴婢等，不可胜数，她的爱女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大大发展了新贵族的经济。武则天消灭了一批异己的豪门贵族，这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制度的改变。封

建社会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总是有一批旧的豪强倒下去，同时又起来一批新的豪强。武则天时代也是如此。田汉同志把武则天宣扬为站在人民的利益方面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连她的子侄近臣走上了豪门贵族的老路，她也毫不姑息，这完全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捏造。

田汉同志所创造的武则天这个艺术形象，不但不符合武则天的情况，而且根本违背历史真实。一个封建皇帝怎么能够代表人民来反对“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呢？她的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她是站在那一个阶级立场上的？难道封建阶级的皇帝不是地主头子，不是最大的豪门贵族，反而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吗？难道武则天的“法制”不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产物，不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的工具，反而是代表农民镇压豪门贵族的工具吗？这里有什么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可言？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可言？

我们赞成重新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因为我们不赞成封建统治阶级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反对这个女皇帝；但是，如果把她描绘成居然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并借此达到散布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反动目的，那就不仅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在政治上站到同劳动人民敌对的立场上去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们不能忘记，解放以后文艺界第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在进行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所有制。电影《武训传》却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把武训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奴才（后来他自己也变成了地主），美化成所谓“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的”“典型”，把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个人苦行，颂扬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些作者们是在鼓吹反动的历史观，鼓吹“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

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电影《武训传》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观，虽然受到了深刻的批判，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只要社会上一出现适当温度的气候和土壤，它们仍然要卷土重来，而且有时候还可能变本加厉。如果说《武训传》是把一个向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膝的奴才，美化成“代表”贫苦农民的“伟大人物”；那么，《海瑞罢官》却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骨干、封建法制忠实维护者的海瑞，写成“站在农民立场”的代言人，颂扬成“万家生佛把香烧”的农民的“救星”。田汉同志的《谢瑶环》更进一步，在这里，不但“为民请命”的谢瑶环是人民的代言人，连皇帝武则天也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这是颠倒阶级关系，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美化帝王将相的极端反动的历史观点。

“为民请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一方面颠倒了阶级关系，把封建皇帝武则天描写成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另方面，又大力歌颂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大力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思想。那末，“为民请命”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田汉同志对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这种歌颂美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观和历史观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在中国历史上，“为民请命”的思想和人物确乎是有的。“为民请命”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的代表著作《孟子》一书，就反复宣传“民为贵，君为轻”，“保民而王”。我们知道，儒家的思想根本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它所主张的“保民”是从巩固封建政权的需要出发的“保民”，是符合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民”。孟子一方面鼓吹“保民”，一方面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巩固封建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孟子以后的“为民请命”者，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无世无之。大体说来，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巩固封建剥削制度的“万世之基”，他们请求皇帝轻徭薄赋，适当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剥削，以安定社

会，缓和阶级矛盾；第二种情况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请求皇帝相对地减轻一些对被压迫阶级的刑事处分，主张在一定的时期释放一些“囚犯”，平反一些“冤狱”，从而收到在政治上麻痹群众斗志的作用。第三种情况，是针对农民起义军的。他们请求皇帝减少“杀戮”，改用诱降、瓦解农民起义军的办法，也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一种“招抚”政策。例如南宋绍兴元年（一一三一）二月，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上书给皇帝说：“至于江西‘土寇’，皆因朝廷号令无定，横敛不一，名色既多，贫民不能生，以至为‘寇’。……良民无辜，情实可悯。陛下自降宽诏，择其首领与补官，收隶军籍，而散遣其徒，使民还业，则江西之‘乱’可指日平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如果说一、二两种“为民请命”，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在不同程度上还带有一点改良主义的色彩，那末，第三种“为民请命”，即专门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为民请命”，就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更为反动的措施。

以上所有的“为民请命”者的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虽然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冒充代表人民利益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为民请命”的口号被提出来，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前提：皇帝昏庸无道，政治黑暗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所以在历史上，“为民请命”这个口号，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口号，从来就只是一种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口号。它所采取的方式，也从来不是革命的方式，而是叩头哀告，乞求统治阶级大发慈悲，给人民施舍“恩德”。它不是吊民伐罪，不是帮助人民打碎奴隶的枷锁，而是帮助人民“做稳奴隶”。这种办法，正如列宁所说，是“当做一种反对革命阶级但也多少改善这个阶级的处境，并以此防止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给予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却不应当加以歌颂赞美，至于对待那种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为民请命”，就只能揭露它的反动作用，决不允许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毒辣手段也加以顶礼膜拜。

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情况既然如此，那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是属于那一类呢？毫无疑问，是属于上述“为民请命”的第三类，即它是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反动的“招抚”政策，也就是剧中人徐有功说的，是对农民起

义军实行“釜底抽薪”。剧本里所描写的廷辩，就是辩论究竟是“招抚”好，还是“镇压”好。这种“为民请命”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作为共产党员的田汉同志，非但不去揭露批判这种“为民请命”的反动性，相反却玩弄了许多手法对它大加赞美和歌颂，让人们去同情“为民请命”的谢瑶环。究竟是“招抚”好，还是“镇压”好呢？谁都清楚，封建阶级的这两种策略只不过是“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的区别，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农民起义，所以这“软”、“硬”两手，都是反革命的策略，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的。不仅我们这样看，就连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也是这样看的。他们说：“今宜先剿后抚为定策，如果投戈弃甲，抱旗乞降，则剿之中亦自寓抚之意，而实以剿坚抚。如或狡诈复逞，聚掠不散，则抚之时亦自有剿之用，而不因抚废剿。”（《绥寇纪略》卷一）这里说的是“剿中有抚”和“抚中有剿”，不可“因抚废剿”。总之，是“剿”“抚”并用，“剿”“抚”一致。他们的这些话，不是把统治阶级对待起义农民的“剿”和“抚”两种策略的实质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么？从这些话里，不是至今我们还可以闻到封建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强烈的血腥味么！这样的两种策略，对于起义农民来说，还有什么“好”“坏”可分呢？然而田汉同志却认为是大有“好”“坏”可分的，他认为“招抚”比“镇压”好，“软”的一手比“硬”的一手好。他在剧本里大力赞扬了这“软”的一手，把主张实行“软”的一手的谢瑶环美化成“只要除万民苦，哪顾得一身安”，“誓要与三吴百姓惩贪婪”的“为民请命”者。实际上是大肆宣扬这“软”的“招抚”的一手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不管是封建官吏，还是皇帝，只要主“抚”，就是“除万民苦”的“救星”。在这里，田汉同志不是公然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鼓吹统治阶级对付起义人民的“软”的一手的骗局，鼓吹旨在瓦解农民起义的反动的“为民请命”吗？一个共产党员的剧作家，居然歌颂起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反革命的策略来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从哪里来的“覆舟”之感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的反动性，绝不只是表现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阶级颠倒方面，也绝不只是表现在歌颂和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反动思想上面，甚至可以说，这些还不是《谢瑶环》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说，所有的历史剧

创作，都不是为了“僵尸的复活”，而是为了要在今天起现实作用。人们是这样看待历史剧，历史剧本身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或者是借古非今，或者是为了给今人以有益的历史经验，二者必居其一。孟超同志、吴晗同志不也都主张历史剧要“古为今用”、“为活人服务”吗？田汉同志更是反复地加以强调，他认为：“许多历史剧是为现代人写的……，它的矛头都是针对着当时的现实”，“任何文艺都是象征的东西，不可能不和当前现实相联系”，“历史剧照样可以反映当前现实斗争，也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发挥强大的现实意义”，甚至连给谢瑶环安排一个悲剧的结局，田汉同志也是为了“按目前这样处理，教育意义较为深刻”的缘故。可见田汉同志写这个剧本，是有他现实的目的性的。

那末，他这样写武则天，这样写谢瑶环，究竟是和什么“当前现实相联系”，“矛头”是针对什么，打算发挥怎样“强大的现实意义”呢？这个剧本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分析的。

根据剧本的描写，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维护人民利益的武则天，在她的统治后期，由于沉醉在“铁柱铜盘颂大周”的“太平盛世”里，被“万千朱雀舞宫楼”、“彩凤祥麟朝冕旒”的景象搞得有点飘飘然了，她正在走上“官僚主义者”的道路，犯了一系列应当受到“批评”的错误：

（一）她偏听偏信，使她的子侄近臣对她阳奉阴违，走上了她所一贯反对的豪门贵族的老路，“兼并土地，鱼肉百姓”，“逼得百姓颠沛流离，逃亡何止十之一”，害得百姓们“家破人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涂炭不堪”，“民不聊生”，引起了“一片怨苦之声”，“民怨沸腾”。

（二）她好大喜功，铸造“颂德天枢”，征用民间铜铁，致使她的子侄近臣把老百姓的犁锄、锅瓮都征了来，如谢瑶环所说：“叫民家将犁锄献出，如何耕种，将锅瓮收去，怎样举火？”

（三）她“喜爱巡游”，致使武三思这样的人“揽权收宠”，“以御用为名”，到处“侵占民产”，修建行宫，“浪费国库数千万两”。

（四）她“宠信奸佞”，不肯“开张视听，采纳忠言”，致使来俊臣之流可以随意“残害忠良”。如来俊臣所说：“小官自理刑以来，犯官无有口供死在刑杖之下的却也不少，圣上也不甚过问”；“小官也曾这样杀过许多元勋上将，圣

上不曾见责，何况一个小小的巡按。”这样就“害得忠良无下场”，搞得“志士寒心”，“无心用世”。

一句话，因为武则天在她统治的后期，不再“了解”民间“疾苦”不再“采纳忠言”；她“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大有“载舟之水”要“翻舟”的危险。“覆舟”之感渗透着整个剧本的情节。因此，我们说武则天的“覆舟”之感，是田汉同志通过剧本所大力宣扬的一个重要思想。

那末，究竟从哪里来的武则天的“覆舟”之感呢？正像武则天根本就没有所谓“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一样，武周统治后期的武则天，也根本没有产生过什么“覆舟”之感。相反的，她很陶醉于她的豪奢专断的腐烂生活，也很满意于她自己的“德政”，她曾自我吹嘘地说：“天下安乐，朕所养也”。田汉同志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历史事实，却为什么偏偏要反复地渲染她这种“莫须有”的“覆舟”之感呢？

很明显，田汉同志这是“借戏言志”，有所感而发的。他是把自己今天的“感受”，披上了古人的外衣，实际上却是针对今天的现实。田汉同志表面上加给武则天的种种罪过，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的诬蔑。因此，田汉同志借武则天的形象所抒发的，实际上是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覆舟”之感，是他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估计。这样，人们就不禁要问，正当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下，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不断推向前进的时候，为什么在你的脑子里却忽然产生了“覆舟”之感呢？显然在田汉同志的心目中，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因而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政权了！他笔下的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又脱离了群众的武则天的政权，正是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影射和攻击。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权，看成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虽然上面还不错，但是下面的干部则坏得不可收拾，草菅人民，“夺”地“抢”物，搞得一塌糊涂。总之，人民活不下去了，无产阶级政权要完蛋了！“载舟之水要翻舟”，当时的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这样叫喊的。田汉同志恰好和他们唱了一个调子。那些鼓吹《谢瑶环》的评论家大谈这出戏“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你继续去思考戏里的思想”，热

烈赞扬它的“现实教育意义”，和“时代感”，不正是暗示人们要从这方面去“联想”吗？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刻，一切牛鬼蛇神总是要暴露他们的真面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在革命的洪流里混入了革命队伍，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鼠目寸光，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惕焉震惧”的阴暗心理，使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因而，只要在革命的道路上一出现风吹草动，只要党和人民遭到了一点困难，只要阶级敌人一嚣张，他们就认为社会主义之“舟”要翻了，共产党要垮台了，于是，按照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主观估计，有些人就赶紧跳下水去，参与“覆舟”的行动。另外有些人认为只有他是代表人民的，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他要代表人民说话，也来插上一手，举起“为民请命”的旗子，要求按照他们的主张，按照他们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改弦更张。这些人本来或者是站在人民头上，或者是一贯脱离人民的，今天却都借着人民的名义出来说话了，他们的目的是要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田汉同志自己就是一个活例证。一九五七年他不就曾经打起过“为民请命”的旗帜吗？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国内外阶级敌人疯狂进攻社会主义的时刻，他怎能不再产生“覆舟”之感，又怎肯自甘“寂寞”而不赶快加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合唱队中去呢？为什么《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发还田地”，要求“平反冤狱”，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

既然武则天的“覆舟”之感，实际上是田汉同志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估计；那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自然也就是田汉同志对当时的阶级斗争所采取的一种行动。

前面说过，历史上的“为民请命”从来就不是一种革命的思想，从来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在今天，“为民请命”就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因为，第一，“为民请命”，首先是认为今天已经“民不堪命”。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不下去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第二，他把党和政府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在他看来，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党和政府是压迫人民的，而他倒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需要他出来“为民请命”。谁都知道，在今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今天的人民群众决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们“请命”。今天感到“不堪命”的，感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不下去的，与党和政府站在对立地位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分子和那些具有反社会主义思想情绪的人吗？因此，“为民请命”这种思想，在今天只能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以及所有对社会主义抱有仇恨情绪的人的一种反动呼声。事实上，田汉同志的“为民请命”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深入，资产阶级右派正在酝酿着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暗流的时候，就曾一马当先，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以《必须切实关心和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为题，发表了两篇恣意地歪曲和诬蔑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文章，恶毒地在戏剧界煽风点火，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鸣锣开道。田汉同志的这种活动，当时曾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反而形成了“忠而见疑”的阴暗心理，耿耿于怀。到了一九六一年，当我国人民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了反华高潮，国内的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的时候，田汉同志长期压积在心头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便按捺不住地一齐迸发出来了。“为民请命，何罪之有？”他借武则天之口说出的这句话，正是田汉自己的话，是他对受到的批评的抗议和反攻。

田汉同志坚持要给谢瑶环安排一个因为“为民请命”而遭杀害的悲剧结局，认为这样的结局“教育意义较为深刻”。那末，这个“教育意义”究竟是对谁说的呢？它的“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是表现在哪里呢？说穿了，他是对党说的，田汉同志是企图用谢瑶环的死来警告党，并且企图向人们暗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干部已经完全腐败，即使上面的政策不错，也没有办法贯彻下去了，因而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就不得不“以死殉之”。

田汉同志不仅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来表示他对党的警告，还通过袁行健这个人物进一步发出了对今天社会的控诉。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而“牺牲”，袁行健则为了谢瑶环的死而出走。一个死了，一个走掉，这里面包含着田汉同志对今天社会现实的多么深刻的愤懑呵！

田汉同志笔下的这位谢瑶环的“合作”者，也是被作为怀抱“安边报国，不负生平”壮志的“英雄”来描写的。在和谢瑶环结婚的晚上，他曾信誓旦旦：“与贤弟全不是等闲婚嫁，同生死共患难，报效邦家。”此后，他还曾为了实现谢瑶环的“安抚”太湖义军的“理想”而奔走，可是，当武则天杀了来俊臣、贬了武三思，接受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而且准备实行她的政治主张时，这位和谢瑶环“全不是等闲婚嫁”的“志同道合”者，却只记得谢瑶环的被害——“纵有丰碑高百丈，此恨绵绵天地长”，“瑶环一死，此心已碎”，给武则天留下了一个“警告”，就拂袖而走，“五湖烟水且盘桓”去了。他给武则天留下的“警告”是：“请她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戏也就在这里落幕，可以说这是全剧的画龙点睛之处。很明显，这就是田汉同志的所谓“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之所在。田汉同志的这两个理想中的“英雄”，用不同的形式体现了作者的“把矛头针对现实”的创作意图，他们融合一致，互为一体，作为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忠实代言人向现实“请命”，要求按照他们的思想来改造党、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听从他们的主张，那末，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天下”就“从此多事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田汉同志，你通过袁行健的嘴发出的咒骂：“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什么是“忠良”？在今天，当然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党对于他们是一贯爱护、尊重、信任的。什么是“奸佞”？当然只能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而党对他们又是一贯坚持斗争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宠信”。可见，田汉同志所指的“忠良”和“奸佞”，和我们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在他看来，为党的事业而赤胆忠心坚持斗争的人是“奸佞”，党对他们的信任则是“宠信奸佞”；而被党和广大人民批判斗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他们这些站在党的对立面的“为民请命”者，则是“忠良”，党对他们的斗争，则是“残害忠良”。他声言，如果再要对他们斗争下去，那末，天下就要从此多事了！这显然是对党的威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控拆。请问田汉同志，即使对你心目中的那些所谓“忠良”——右派分子、

右倾机会主义者等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仍然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吗？什么时候“残害”过他们？你发出这种莫须有的“控诉”，分明是别有用心的诽谤。

如果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对因为要求“退田”而被“罢官”的今天的海瑞们表同情，唱颂歌，那末，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就公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这就难怪有些评论者要大加称赞他的“胆识”了。原来他所写的“奸佞”和“忠良”都是实有所指的。拆穿了说，“忠良”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因此，在这个戏里，谢瑶环就是田汉的化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也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结局，也就是田汉和那些“为民请命”者的“悲愤”的发泄！

× × × ×

当田汉同志的《谢瑶环》脱颖而出的时候，正是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加序出版的时候，而孟超同志的《李慧娘》也在这时发表。这样，在一九六一年七、八月间的剧坛上，便同时出现了三棵大毒草。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偶然吗？当然不是。归根结蒂，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正是在这几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看到了我们遭遇到暂时的困难，就认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的船要翻了，于是，一切牛鬼蛇神都钻了出来。在农村是封建文化大泛滥，地富反坏乘机进行活动，续家谱、修祠堂，十分猖狂。这种现象，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就在学术界、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相结合，向社会主义展开了新的进攻。在史学、哲学方面，大捧帝王将相，鼓吹封建道德，甚至还表演了拜孔的丑剧；在戏曲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鬼戏大批出笼。有些人就兴高采烈，“破门而出”，亲手改编所谓“新历史剧”，妄图借古代的幽灵来宣传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它们通过所谓“骂皇帝”，反“权奸”，反“乡官”和歌颂“清官”，歌颂“清官”的“为民请命”——实际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者，来对党、对社会主义作斗争。而它的形式又是与复古主义结合起来的。“颂古”、“复古”是这个思潮的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则是这个思潮的内容。如果说《海瑞罢官》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海瑞的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抗议”，对被“罢

官”者的支持；那末，《谢瑶环》就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死的谢瑶环的强烈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的“控诉”。因此，“为民请命”这个口号，就成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集中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敌对阶级必然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他们不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没有资本来进行这一场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装扮，终究遮盖不了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过程中，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的，有时是很激烈尖锐的，而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是十分复杂的。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彻底清除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由于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够，学习得不好（包括我们在内），缺乏辨别香花毒草的本领，这就给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艺以可乘之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又说：“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我们必须遵照这种精神积极参加斗争，必须把这一场大辩论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方史《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的文章：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姚文元同志认为：“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不可能相反。”这岂不是说，只要是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不论他们是“清官”还是“贪官”，统统都是一号货色吗！？

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种逻辑，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呢？因为古人的地位，姚文元同志早给确定好了，都是半斤八两，一模一样。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清官”是地主阶级用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掩盖统治阶级本质的工具”，“是削弱农民的反抗”，“当作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照此看来，“清官”比起贪官来要更坏了。因为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会更快地引起农民的反抗，燃起农民起义的烈火，而“清官”的改良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延长了统治阶级的寿命。可是，这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既然贪官污吏要比“清官”好，那么，且让历史上尽是贪婪暴虐的贪官污吏，而农民只好不停息地举行起义好了。但是在封建社会，农民的起义和斗争又不可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取得彻底胜利，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请问：照此办理，封建社会的生产如何发展？封建社会的这一段历史又如何向前推进？

抹杀“清官”的阶级本质，甚至把“清官”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救星”，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但是，姚文元同志对“清官”、“贪官”一概而论，全盘否定，甚至把清官说得比贪官更坏，恐怕也是不正确的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样的，对于封建社会里的“清官”，不也应该这样看吗？海瑞在当时抑制兼并，打击豪强，退田（姑且就按姚文元同志的“考证”，田是退给了中小地主和富农），平冤狱，修治吴淞江，难道对当时江南地区的人民和生产毫无好处吗？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中说：“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姚文元同志对于海瑞的这些局部的改良，对于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为什么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完全否定”呢？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我看，这个批评不符事实。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没有这样讲过。相反，他在《论海瑞》一文中却清清楚楚地写道：海瑞的不屈不挠，言行一致，刚直不阿……等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这一点，姚文元同志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古人的一些优秀品质，譬如“刚直不阿”，“不畏强暴”，“言行一致”，“敢于承认错误”等等，都有“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不能“抽象化”。其具体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刚直不阿，言行一致……”等等，都是隶属于万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统应该摒弃，万万学不得（那怕是首先要进行批判，赋予它们新的含义）。难道古人就这么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吗？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要求我们“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对于这些，姚文元同志又该作何解释呢？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姚文元同志在自己论据不足时，就穿凿附会，钻牛角尖，凭主观想象进行推理，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以达到驳倒对方的目的。现举一例说明。史书上记载，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酌而哭者，百里不绝”。吴晗同志据此认为当时广大人民是尊敬和热爱海瑞的。姚文元同志为了驳倒这一点，证明海瑞并没有得到“真正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竟然作出如下的推理：“只要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好一个“想一想……就知道……”！屈原是深受我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他投汨罗江自杀后，

广大人民在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竞渡）、缚粽子来表示悼念。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想一想”：在解放前（具体一点，古代）广大人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那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划龙船，那会有贏粮，而且还是上好的糯米扔到江里喂鱼呢？那么，岂不是“就知道”“那时候怀念、热爱屈原的人”，“决不是”“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么？岂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屈原并不受我国真正的“广大人民”的热爱吗！？

显然，只要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姚文元同志这种立论是没有道理，站不住脚的！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姚文元同志在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等等。这种理解，不禁使人大吃一惊。姚文元同志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小朋友，看了《三剑客》就拿起棒去格斗，难道看了《海瑞罢官》就要去扯着公社社长的衣襟闹“退田”，抱住法院院长的大腿要“平冤狱”？！

姚文元同志认为分析一个作品，应该把它同当时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可是，姚文元同志据此硬把《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扯在一起，断定《海瑞罢官》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这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只要认真地把《海瑞罢官》读一读，想一想，就知道“退田”、“平冤狱”并不是该剧要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不过是借以渲染海瑞的部分情节而已。显然不能认为剧作者是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而去搞“单干”，闹“翻案”。退一步而论，《海瑞罢官》中尚有海瑞组织人民修吴淞江等情节，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认为这是要人们在困难时期去兴修水利、防治天灾、克服困难呢？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汉人的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提要：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 * *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字很长，内容很杂，概括言之，它的基本精神是自我辩护，包含有反批评的成分，同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些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作深入的批判，但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不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实则以很大的力量作自我辩解、洗白和澄清，名不副实，文不对题，难怪乎有些同志很气愤了。

最近，各报发表了不少对《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中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是同意的；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这里谈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写歌颂海瑞的文章、剧本，其真实的、具体的动机何在？他内心是如何想的？有些同志很急于要知道这一点。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承认自己立场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有些同志的要求。他们指责吴晗同志假装糊涂，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认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如何自觉地配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究竟根据什么呢？无论它，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是这个或那个，是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是的，我们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我们对于动机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既要同唯心论者划清界限，又要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

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宣扬了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表现了吴晗同志错误的道德观、历史观等等，对退田、除霸、平冤狱和海瑞的“傲骨”的描写，在当时起了某种程度的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这就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事实上，吴晗同志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往下再追问他的主观意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者有这个或那个动机，《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号召人们“退田”、“平冤狱”，搞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样说，看起来倒也干净利落，方便省事，动机和效果绝对地统一起来了，但这样搞“统一”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作法。把问题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在文学上有所谓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或超过他的主观意图。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六八六页）。这不是说狄更斯等如何比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多少倍，对那些政治和社会真理都认识到了，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在再现现实生活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获得了较大的客观意义，可以说是非作家意料之所及的。同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决没有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揭露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主观意图，因为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今天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读者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里有一条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很显然，我们不能说有这个效果，曹雪芹就一定有这个动机。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有很复杂的因素的，它是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等等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

那么这样说，对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否就不可知了呢？不，一方面固然要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那是既说服不了吴晗同志，也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的。总之，对这样关系重大而特别需要慎重的问题，批评者是不宜太武断的。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学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分析学术问题的阶级实质的理论根据。这个道理吴晗同志是有些懂的，他没有认为《海瑞罢官》只是学术问题，而承认它在政治上客观效果是恶劣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的反动的表现？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人可以有截然对立的政治上的和学术思想的两种阶级立场，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但从全文看，吴晗同志所表达的意思多少可以触及，即是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思想深处还蕴藏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应该说，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最终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一个人学术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也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所致，而且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水平，与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泛滥于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某种思潮都有关系。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又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具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同时由于不熟悉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在学术问题上犯错误的人是存在的。有人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在学术上便会作出与他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表现。”这个说法一般说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断言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足以使这种说法成立的真实凭据究竟有多少呢？光是吴晗同志前几年学术问题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就能够使人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吗？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反动，需要从他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轻率地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已经造成某种僵持局面，即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对自己过去几年中所作所为的反动性很自觉，其政治立场是完全反动的，另一方面吴晗同志也不能被说服，坚持认为自己是不自觉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意姚文元同志的这一分析：“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的，

是因为它并不排除一个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的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不自觉地当了阶级敌人的义务兵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一个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阶级敌人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可能性；既不排除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也不排除在这个或那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它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通过对吴晗同志过去几年中宣传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如何反映的，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因而从中汲取深刻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至于吴晗同志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似乎不必急于替他作结论。

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我们认为，对于吴晗同志发表文章，承认某些错误，提出看法，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吴晗同志如果继续坚持他过去的意见，只要讲出理由，就应该深入研究，如果他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应该认真予以考虑。应该说，吴晗同志发表文章对讨论的深入开展是有好处的。

现在有些同志动辄就说他的“自我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进攻、新挑战，又拿不出很充足的证据来，这是无助于讨论的。我们认为，这个讨论还只是刚刚揭开序幕，离作结论还太早，谁是谁非大致上有个眉目了，但是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如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还远没有完全弄清楚，也没有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看法。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里提出的不少看法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有人说，他又宣扬了中、小地主和农民利益一致论，宣扬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当前利益一致论，宣扬了海瑞的“退田”给部分农民带来了好处，一言以蔽之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问题果真能作这样的概括吗？不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他说：“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这里，我们无意于作什么比拟，只是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重视对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解释，真正作到以理服人，不能压服。

另外，对吴晗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也要实事求是，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引用吴晗同志的原文，必须力求准确。有的同志在这方面注意得还不是很够的，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顾作者的原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乍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经不起对证和推敲，这样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引证史料，尤其要有科学态度。已经有人指出某些同志引证同一资料里合乎自己论点的部分，抹杀掉不合自己论点的部分，这种手法也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的。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的这一场大辩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思想界的反映，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这一场斗争主要是以学术辩论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它要求我们既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我们的表率。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都是我欢迎的。”他对论敌的意见，总是认真考虑，然后以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给予回击。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仅反击喧嚣一时的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而且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解决多年来没有正确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发展、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提高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造成一个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高涨形势相称的学术文化大繁荣、大兴盛、大提高的新局面。为此，当前对于吴晗同志的批评中的某种简单化倾向，不能不加以克服和防止。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6. 02. 12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漆、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 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漆、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里，曾为那些“骨鲠在喉”，“想骂皇帝而不可得”的人，出了一个主意：“在戏上骂”。并且还提供了一个“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历史人物——海瑞。说也真巧，上海有一个专门借古人死人做文章的蒋星煜同志，也编造了一篇历史故事《南包公——海瑞》^①，大棒“直言斥责昏君”的海刚峰。这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不久，一出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果然应声而出。蒋星煜同志不但为这个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还亲自参与设计，积极扶持他自己捏造出来的《南包公——海瑞》登上舞台。《海瑞上疏》不负倡导者们的期望，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

这出戏公演之后，受到某些人的大肆赞扬。有的说这个戏“具有足够的思想深度”^②；有的称赞海瑞的形象“是典型的，也是具有时代精神”^③的；还有的认为海瑞敢于“冒死向暴君作坚决的斗争”，这样的主题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海瑞敢于当面痛骂皇帝的风格，“更具有现实教育作用”^④，“值得大大表扬”，“可为后世楷模”^⑤。他们围着这台“有声有色的好戏”^⑥吵吵嚷嚷，意思无非是说它骂得好，骂得痛快，骂得正是时候，要大家起而仿效。

这样“有声有色”的“好戏”，倒是值得仔细研究一番的。

《海瑞上疏》据说是根据海瑞给明朝嘉靖皇帝朱厚^⑦上《治安疏》的故事铺衍而成的，但是在这个剧本里出现的海瑞形象，和那个向皇帝上《治安疏》的海瑞，完全是面目迥异的两个人物。

《海瑞上疏》里的海瑞是一个敢于痛骂皇帝的“英雄”。他不但在背后骂，在家里骂，在朋友面前骂，而且敢于在上司面前骂，在写给皇帝的疏本里面骂，甚至在金殿之上，当着众人之面，指着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确实有一股疯狂的“骂”劲。他甚至于抱着这样的坚定信念：“只要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终有一日海晏河清”！剧本把海瑞周围的文武大臣，写成是三缄

其口、明哲保身的“甘草”和“乡愿”，相形之下，海瑞更成了一个鹤立鸡群的不凡的“英雄”。

至于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呢？关于这一点，吴晗同志说过，蒋星煜同志在他的《南包公——海瑞》里也明白地说过：因为老百姓“生活日益困难”，“家家户户弄得干干净净”了，海瑞“想到人民的痛苦，终于下了决心”，“让昏君惊醒惊醒”。在蒋星煜同志的提示下，剧本的编导者抓住“家家户户，干干净净”大做文章，在海瑞与徐阶的对话里，描绘了一幅“民不聊生”的图画：

海瑞 你……可曾看见？

徐阶 看见什么？

海瑞 天灾人祸，遍地哀鸿！

徐阶 哦！

海瑞 你……可曾听见？

徐阶 听见什么？

海瑞 怨声载道，人人咒骂当今！

徐阶 禁声！禁声！

海瑞 若再等待，民无噍类矣！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戏里的海瑞便等不得了，他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骂。据他自称，骂皇帝正是为了拯救“海内受苦受难的百姓”，否则“又如何对得起四海苍生！”如此看来，剧本里的海瑞又成了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的“了不起的伟大”^⑥人物了。

然而，这样的海瑞形象，和那个向皇帝老子上《治安疏》的海瑞，又有什么相干呢？历史上的海瑞自己说，他之所以要向皇帝上疏，目的是为了“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⑦。也就是说，他上奏疏是从封建皇朝万岁万万岁这一最终目的出发的，根本不是象剧本所写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治安疏》里，海瑞除了肉麻地吹捧皇帝行过“德政”、“可为尧、舜”，颂扬皇帝是天下最“英武”、“仁恕”、“大度”的君王以外，他只是规劝了皇帝几句，委婉地指出“玄修无用”，希望皇帝“日视正朝”，并且反映了一些情况，说明天下不稳、“盗贼滋炽”（请看，他在这里倒是狠狠地骂了敢于反抗的农民）。所有这一切，包括《治安疏》中那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在内，不过是要唤起嘉

靖帝的注意，要他“励精图治”，巩固封建统治，使“陛下之家”“磐石之也”⑦。这哪里是什么“骂”皇帝呢？他是爱皇帝唯恐不及哩！

历史上的海瑞写《治安疏》，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向皇帝出谋划策，到了吴晗、蒋星煜同志的笔下却成了“骂皇帝”、“斥责昏君”，到了《海瑞上疏》，就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而且把这场“非常之痛快”的骂，说成是什么为了“受苦受难的百姓”而向皇帝作面对面的斗争。请看，剧本捏造了海瑞的“骂”词，他骂嘉靖“害百姓加捐添税”，“害百姓生计濒危”，“害百姓欲哭无泪”，“害百姓滥施淫威”，“害百姓流离颠沛”，“害百姓无家可归”。作者的笔锋轻轻一转，就把海瑞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划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来了，使他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摇身一变而为洞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阶级论者。

剧本的最后一幕，避而不写海瑞听说皇帝死去哭得把吃下去的饭都吐出来的事实，让海瑞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高举小雨伞一把，左右遮蔽簇拥在他周围的众百姓。大幕落下重又拉开，舞台上发生霍然巨变：在万道霞光的映照下，小雨伞变成盖天覆地、硕大无比的一把万民伞，海瑞擎住，老百姓个个躲在海瑞伞下，齐声歌唱：“青天海公，拯民水火中。白叟黄童，共仰贤吏风。……博得个千秋称颂，千秋称颂！”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在霞光与颂歌的烘托下，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成了“解除苍生数十年倒悬之苦”的“英雄”。

《海瑞上疏》的编导者愈是精心地进行艺术设计，就愈加突出了这个戏的反动的政治观点。

《海瑞上疏》的作者捏造出这样的一个“可为后世楷模”的“人民英雄”，究竟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呢？究竟对谁有利呢？究竟把矛头指向哪里呢？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把这个戏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进行考察。

《海瑞上疏》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创作的。第一次上演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它向我们伟大的节日献了什么礼呢？请读一段“精采”的台词：“想今晚有多少大臣，正在那里，撰写青词贺表，歌功颂德，以博君王的欢心。那里晓得我海瑞，却在这里狠狠的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疏本呵！”这里流露了一种没落阶级的阴暗心理。正当全国人民在欢欣鼓舞地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时候，它却偏偏反对“歌功颂德”，它究竟是在为什么人起草“这一道不中听的疏

本”呢？在这出戏的创作过程中，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国内形势，正如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那些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惊慌失措，他们眼看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末日来临，发出了“家家皆净”的哀鸣，迫不及待地向无产阶级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站在这个进攻的前头，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形势底下，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出现了。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出现了。《海瑞上疏》出现了。吴晗同志鼓动人们“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蒋星煜同志危言耸听地说：对于“病入膏肓”的人，“再吃甘草这种药无济于事，大黄、芒硝也许能救转来，我这一道奏本就是大黄、芒硝啊！”①《海瑞上疏》的编导者，在他们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并且宣称：“圣上吃了数十年的甘草，以致病入膏肓，如今必须服用大黄、巴豆，使圣上大泻一场，将肺腑洗上一洗，方能起死回生也！”你看，他们之间的语言何等相似，他们之间的感情又何等相通。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共同地鼓动人们勇敢地站出来“骂”，岂不是正好适应了一切反动势力的需要吗？((2)(3))

因此，《海瑞上疏》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请看看海瑞与另一个官僚何以尚的几句台词：“嘉靖爷是不是暴君？”“自然是暴君！”“该不该骂？”“骂也骂得！”“骂得可好？”“骂得好！”“骂得痛快不痛快？”“你今天骂得痛快，明天杀头，也是痛快的呀！”一问一答，“好戏”做足，看来也真“痛快”！作者写到这里，一任感情流泻，真是得意忘形，什么也顾不得了。剧本结束时，还有几句特别“意味深长”的对白：

老者 来来来，我们躲在海青天雨伞下吧！

海瑞 呵呵！可惜我这把伞太小了！

施象清 有这样一把，也就难得的了哇！

海瑞 哈哈哈！

你看，这个打着“为民作主”的旗号的海瑞，笑得多么得意，多么露骨！然而，他们笑得毕竟太早了。历史是无情的。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们终于彻底暴露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落得了“罢官”的下场。当然，他们是不甘心的，于是又抛出一个《海瑞罢官》。《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一起，联成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逆流，因为它出现得比较早，它在吴晗的“全国一盘棋”中很自然地占着突出的地位。它为《海瑞罢官》打先锋，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因此，必须加以批判，把毒草变成肥料。

注：

①蒋星煜：《南包公——海瑞》，《解放日报》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

②小捷：《（海瑞上本）（即（海瑞上疏））中的海瑞形象》，《解放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③卫明：《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文汇报》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④徐以礼：《评京剧（海瑞上疏）》，《上海戏剧》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⑤健夫：《周信芳初演京剧（海瑞上疏）》，《戏剧报》一九五九年第九期。

⑥《海瑞上疏》前记。

⑦《治安疏》，《海瑞集》第二一七——二二一页。*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肇庆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提要：“清官”是当时人民拥护的，替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当权派。说“清官”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把政治理论与不变的数学公式等同起来。生搬硬套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 * *

自从《海瑞罢官》问题展开争辩以后，人们好象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封建时代，“清官”、“好官”都只能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清官”也好，贪官也好，本质上是一丘之貉。

这一番话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千真万确的。那末，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争论不休呢？理由很简单，政治上的理论跟数学上的公式不同，在某些场合不是绝对不变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时，应该斟酌具体情况，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机械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不同点就在这里。明了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以后，再来谈谈“清官”“好官”的概念吧。

所谓“好坏”跟“快慢”一样，都是相对的概念。过去是快的，现在可能是慢的。同样，过去是好的，现在也可能是坏的。在封建王朝时代，人民不接触官员也罢了，假使非接触不可时，那末只有两类人物：一种是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还有一种是“奉公守法”的所谓“清官”。广大人民喜欢的，不用说是后一种。因此说“清官”、“好官”受到过去人民的拥护，这完全是科学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当然，这种“清官”、“好官”在目前看来，也成问题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不过，这并不等于当时人民的想法呀！假使广大人民不爱戴“清官”的话，那末他们倒会喜欢强凶霸道的贪官污吏吗？因此“好坏”问题，主要应该拿当时人民的选择标准来作决定，不能单凭我们目前的政治眼光来作判断。

有人会说，“清官”既然为地主阶级服务，怎么会站在人民那一边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我们只要想一想，中国地大人多，历史又很悠久，出个把象包公、海瑞之类的傻瓜，专门跟上司顶撞，替老百姓办事，那有什么稀奇呢？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谈谈罢，有些在反动政权里工作的官员，因为看不惯上司的胡作非为，激于义愤，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说，向“清官”跪下来告状不是办法，只有参加武装斗争，发动农民革命，粉碎封建制度，才有真正的出路。这几句话，初听起来倒很漂亮，却是值得研究的。首先，农民的出路问题，跟官员的“好坏”概念，根本是两回事。其次，陆雨同志说得很对，“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人民日报》今年一月十九日）。何况农民平时是不上衙门的，要见官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急于要解决，现在轻描淡写地叫他们发动农民革命，不论是否成功，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况且那时候的农民军队，根本不可能接受过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教育，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最后即使革命成功，旧的王朝推翻，结果新的政权仍旧是一个封建王朝，地主阶级依然统治着广大人民。新的政权是否好一些呢？绝对不会。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是吃人的。我这一番话并不是说，过去的农民不应该去斗争，只不过一部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宣统末年，尽管大小起义事件有数百起，甚至数千起，但是搞来搞去，不过是这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这是铁一般的事，任你怎样争辩，也是无法推翻的。

有人又说，“清官”、“好官”能够迷惑群众，削弱人民斗志，调和阶级矛盾，起了巩固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作用，因此，应该严厉批判。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完全同意陆雨同志的说法：“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流反而值得表扬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何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假使全国各地都是一批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类，那也不成体统了。对于广大人民来说，这竟是利多害少呢，还是害多利少呢？即使人民天天斗争，月月起义，年年换朝代，也是好不了多少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所谓乱五代，那时候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的情况不是好一些，反而是坏一些了。让我再来强调一下，我这一番话并不是叫过去的农民不要去革命，事实是我国绝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诞生以前的。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农民群众又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搞来搞去，始终跳不出封建王朝这个圈子。结果占便宜的还是地主阶级，吃亏的还是农民群众。现在叫广大人民不去向“清官”告状，却要来一个彻底革命，去争取自由，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在千百年以前，难道做不到吗？

至于说“清官”、“好官”起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谁都知道“清官”、“好官”打击的对象，正是豪门权贵之类的大地主。他们实在是封建王朝的当权派。他们既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怎么可以说封建王朝的地位，反而来得巩固些呢？海瑞虽然把大地主的田地退还给中小地主，但是当权派的大地主受到沉重打击以后，整个地主阶级的

地位，难道反而来得巩固吗？还有“清官”、“好官”对于广大人民，有时候也可能做出一些有利的事情来。冤狱案件中的受害人，难道都是一些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吗？修桥铺路开河，难道对于广大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吗？因此，说“清官”、“好官”的所作所为，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只能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跟实际情况核对以后，就站不住脚了。

根据以上种种分析，我认为“清官”、“好官”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千万不能闭着眼睛，空谈理论呀！应该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就是主观唯心论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者的讨论综述：《“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人民日报》编者按：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 * *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什么是“清官”？有些同志认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就是政治上忠于封建制度，思想上恪守封建纲常道德，经济上不贪或者少贪非分之财。有人说：“清官”的“清”，是指“清廉、清正、清明”。

有的同志对“清官”作广义的理解，把历史上凡是执行某些被认为是“进步的”、“改良的”政策的，实行变法和采取改革措施的，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以至抗击侵略的官吏，都称做“清官”、“好官”。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一些人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一、在封建社会里，所有官吏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他们对人民的剥削虽有程度的不同，但无官不贪，他们不可能一尘不染。二、“清官”和“贪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是统治阶级用来划分其内部

人物的标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观念。我们不能拿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三、封建统治阶级惯于使用欺骗和镇压两手来统治人民。为了适应本阶级的实际需要，他们往往把某些善于使用欺骗手法的官吏，有意识地美化、宣扬成所谓“循吏”、“良吏”和“清官”，当作政治标本。因此，“清官”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假象。

另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清官”，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清官”在我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一再出现，并被各个不同阶级所重视，这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有人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倡导者、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而产生的。

有的文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封建国家在应付基本阶级矛盾的同时，还要应付王室同豪强之间的尖锐矛盾，需要一些“循吏”、“酷吏”、“清官”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补充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而恢张伦常礼教，宣扬德化仁政，以维护封建制度，此即所谓“清官”。有些同志认为：封建剥削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法外权利（或习惯权利）。前者体现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后者体现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豪强权贵常为了后者而肆意突破前者，以致激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当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威胁封建统治时，封建统治必须进行自我调节——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以求延续自己的寿命。“清官”就是封建统治进行这种自我调节的工具。他们的所作所为，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

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清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的理由是：一、“清官”既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又同情人民。他们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些措施既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又同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甚至也不违背农民阶级的长远利益。二、“清官”的反权贵斗争是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事情，是历史上光明

面同黑暗面的斗争。“清官”是封建黑暗统治中的一线光明，“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

许多同志不同意上述论点。他们认为：封建官吏，无论“清”、“贪”、“好”、“坏”，就其阶级本质来看，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坚决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绝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清官”所谓的“爱民”纯粹是欺骗，其用意在于更多地剥削人民并瓦解革命。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绝不可能一致。不能以清、贪的对立来代替阶级的对立，抹煞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

也有的同志指出：“清官”的“爱民”，在主观上不乏真诚，这是由于他们对掩盖在自己的观点、情感后面的阶级利益可能毫无觉察的缘故。不能否认促使“清官”行动起来的这种观念冲动力，问题在于不应该停止在这种观念冲动力前面，而应该进一步探究这种观念冲动力怎么可能发生，隐藏在这些冲动力量后面的是什么。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么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讨论中普遍论及“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有人认为：虽然“清官”只能局部地、暂时地促进生产发展，但是他们实行德治、仁政，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有利于生产。虽然“清官”对农民斗争起有麻痹作用，但是他们压抑豪强，毕竟打击了地主阶级最反动的部分，有利于农民斗争。因此总的说来，“清官”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与上述意见不同，有些同志认为：“清官”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增加封建王朝的收入，防止农民起义，巩固反动的生产关系，只是对地主阶级有利，根本谈不上对农民有什么好处，也谈不上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历史前进。

有的人说，“清官”的历史作用只是：美化封建政权，宣扬封建道德，散布对于“朝廷王法”的迷信，诱使人民做稳奴隶，不致拿起刀来闹革命。“清官”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利工具，封建秩序的忠实维护者，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卫道人，欺骗农民的王牌。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几种不同的“清官”类型：在封建王朝上升时期，“清官”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在封建统治已趋腐烂、而农民战争尚未大规模展开时，“清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是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清官”的反豪强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起了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但是“清官”从来是以失败告终的，“清官”的失败使人民对统治者的幻想破灭，有助于革命的发生。当封建统治秩序土崩瓦解、农民革命已如疾风暴雨时，“清官”则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有些同志提出，“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有的人认为：“清官”同豪强恶霸、贪官污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贪官是封建时代的糟粕，“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如果清、贪不分，则古人将一无是处，历史将成为漆黑一团。有些同志说：封建官吏没有清、贪、好、坏之分，本质上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都是剥削、压迫农民的执行人。“清官”和贪官，只是封建政治的两种不同表象，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各有自己的行动特点罢了。一般说来，贪官追求封建地主阶级个人和集团的眼前利益，杀鸡取卵“清官”则着眼于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养鸡生蛋。他们的区别绝非阶级的区别，只是压迫、剥削的重或更重、狠或更狠的区别，绝非剥削或不剥削、压迫或不压迫的区别。只有首先认识“清官”、贪官的相同本质，再看他们的区别，才有意义，才不致把“清官”同贪官的矛盾代替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提出“清官”与贪官谁好谁坏，这个命题就是不科学的。从根本立场上看，“清官”和贪官都是同人民对立的。“清官”的一切作为不可能超出封建统治所许可的范围。当揭露“清官”的反动本质和欺骗作用时，绝不能根据形式逻辑的推论，得出贪官污吏比“清官”好，暴行可以促进人民斗争的结论。因为这一说法不是从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并且实质上把一切暴力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统治阶级，把历史上最黑暗的势力看作封建社会自己瓦解的内在动力。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有人认为：评价“清官”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封建统治下，广大人民向往比较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因而拥护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

民冤枉的“清官”。“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人民给予鉴定，叫做“青天”。

“清官”在历史上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歌颂“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否定“清官”在人民中是通不过的。有些人说：封建社会根本没有被人民“拥护”的“清官”。人民从来不赞扬那些所谓的“清官”。“清官”这一称号不是农民鉴定的，而是地主阶级文人史家冒充农民给加上去的。这些称号不代表当时农民的意见，甚至不代表当时的一般舆论。人民对这些所谓“清官”的鉴定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们今天对于这些所谓“清官”，应该全盘否定。

另外一些同志指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对“清官”作出正确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幻想。这是一种落后、软弱、消极、保守的幻想。如果我们今天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对“清官”进行歌颂，那是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揭穿封建统治阶级装潢在“清官”身上的重重迷雾，消除那些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软弱、消极和保守的幻想，还他们以本来面目，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锋 吴传启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 提要：吴晗同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以及“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些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规范以及其他道德观念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因素。道德规范和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不能把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 * *

一、驳吴晗同志的唯心主义道德来源论

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是他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的理论前提。

吴晗同志说：“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无产阶级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么，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阶级继承，或者自己来凭空创造了。问题是在古代，无产阶级并不存在，自己凭空创造呢，也不大可能。”（《再说道德》）

照吴晗同志说来，历史上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是没有道德的，所以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的问题。在另一个地方，他明白地说：“所谓阶级的道德也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说道德》）这就是说，历史上只有统治阶级的道德，在道德领域里，没有一分为二，没有阶级斗争。

照吴晗同志说来，无产阶级也是没有道德的，要使自己有道德，就必须“吸取”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如果摒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那就是要“凭空创造”，而“凭空创造”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观念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来源；无产阶级既没有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供批判继承，又不能从自己的阶级地位中吸取道德观念。

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曾经说道：

“如果近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从这上面，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就是说从生产和交换所依以进行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①

这也就是说，各个阶级的道德都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是从他们的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照吴晗同志说来，恩格斯的观点就是应该被打倒的

“凭空创造”论。请看，他所要反对的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吗？

二、吴晗同志要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

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什么呢？他要无产阶级接受的，主要的就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而这一些，正是地主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

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一再强调：“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又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历代的封建王朝，总是尽力宣传“忠”、“孝”、“节”，表彰忠臣、孝子、节妇，把他（她）们当作人的楷模，要大家当作榜样来学习。这一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和最高原则，也就是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地主阶级道德的其他规范，都是从这个核心派生出来的。

礼、义、廉、耻是维护三纲、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主要道德范畴。《管子·牧民篇》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所谓的“国”就是封建王朝，就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什么是“礼”呢？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讲得很清楚。《左传》上说：“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宋荣、尹文说：“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管子·心术上》）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郑玄说：“礼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别，明男女长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孝经注》）司马光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然后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资治通鉴》）什么是“义”呢？宋荣、尹文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管子·心术上》）孟子说：“义者，人之正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敬长，义也”，“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这就是说，“义”就是各个等级的人，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各自尽伦尽职，规规矩矩地行事，它是和忠君、敬上、孝悌密切联系的，所谓“以下事上，古之义也”，“义不可缺”，“理所当然”（《海瑞集》）。在封建社会里，仆人绝对地、无条件地忠于主人，叫做“义仆”，甚至把驯犬叫做“义犬”。什么是

“廉”呢？朱熹说：“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孟子注》）尽管朱熹说得
很抽象，但是同整个的封建道德体系联系起来看，就是严守封建法律、忠于王朝、
忠于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所谓“不苟取”实质上也是为封建国家服务的东西。
什么是“耻”呢？地主阶级认为不按着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纲常行事和思想，就
是可耻的。孟子就说过：“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可见，羞恶、羞耻，
是以封建的礼义等等为基础的。

封建道德的忠孝节义和礼义廉耻，完完全全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东西，其中
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元素”。可是，吴晗同志竟要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
关于“忠”，吴晗同志说：无产阶级要继承封建道德的“忠”，说什么“过去要
忠于君主，今天呢，难道不应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说道德》）又说：“‘忠君’，是过去的道德观念，除了个别遗老外，今天
没有人讲忠君了，是不是连带这个‘忠’字也应该否定呢？我看不应该。”（《学
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试问：有谁主张不要“这个‘忠’字”呢？人们在口头上，在文章里不是经
常使用这个“忠”字吗？如果是为了保留这个“忠”字，那里用得着吴晗同志出
来大声疾呼呢？

试问：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道是从地
主阶级道德的“忠”继承来的吗？不。地主阶级的“忠”要消灭反封建的运动，
保卫地主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忠”则要打倒地主阶级及其道德观念。两者是完
全相反的，这里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绝不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来的，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非
要破除封建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不可。

吴晗同志说什么要保留“这个‘忠’字”，“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云
云，不过是骗人的手法。表面看来，似乎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都舍掉了，然
而这是假象。如果真的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完全舍掉，继承又从何谈起呢？
在这里，他是利用“公众成见”来宣扬封建道德。由于封建道德的长期影响，对
于封建道德破除得还远远不够彻底，在这种情况下，抽象地宣扬继承封建地主阶
级的“忠”，就会使一些觉悟不高的人，不知不觉地想到去继承而不是破除旧道

德的“忠”的内容。不仅如此，吴晗同志还作了具体交代，他说：今天的爱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忠”有历史继承关系，并且不是“两码子事”（见《三说道德》）。明明白白，这不是要无产阶级继承地主阶级“忠”的内容吗？哪里只是要保留一个“忠”字呢？

吴晗同志的手法不过是，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从前门赶出去，从后门悄悄地引进来。前者是假象，后者是本质。

关于“孝”，吴晗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封建的“孝”，说什么“对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丧失劳动能力了，子女难道不应该照顾父母？”（《说道德》）无产阶级关于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以及照顾父母、赡养父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派生出来的。这里并没有从封建道德的“孝”继承什么东西。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不使人们的观念模糊，我们根本不用“孝”这个词来表达子女和父母的关系。这一点，在革命同志之间早已成为习惯了。

儿子对父亲绝对服从，所谓“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这是封建道德孝的根本原则。难道无产阶级要继承这条原则吗？共产主义者所要绝对服从的，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党的组织。共产党人是在阶级关系的前提下处理父子关系的，绝没有什么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按着这个道德教条，无产阶级战士为革命而流血牺牲，就是不孝，彻底摒弃“扬名声，显父母”，也是不孝。难道这个道德教条，有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吗？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按着这个道德教条，革命者父母在而“远游”，以四海为家，就是不孝。对于这个道德教条，不也是应该完全摒弃吗？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子为父隐”是合乎道德的，否则就是不孝。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自己的父母犯了罪，必须揭发，就是犯了一般性的错误，也要采取批评的方法，尽可能地给以帮助。这跟“子为父隐”的封建孝道，不是截然相反吗？

封建道德认为，绝后是最大的不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传宗接代是封建的最大孝道，并且只有男孩子才成，女孩子是不算数的。无产阶级对这种道德教条，当然只能唾弃。

关于“节”，吴晗同志说，“不应理解为妇女守节的节”，而应该理解为有骨气，“我们的祖先是有骨气的，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见吴晗同志最近发表的《是革命，还是继承》），这“有骨气”，难道不应该继承吗？

可是，吴晗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祖先”是谁呢？是哪个阶级呢？他在反对批判帝王将相的时候说：“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有什么好处呢？”（《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可见，吴晗同志所说的“祖先”就是帝王将相等地主阶级的人物，他要继承的“骨气”就是地主阶级的“骨气”。所谓“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就是说“我们”的骨气是地主阶级的骨气的扩大，而没有质上的任何区别。说穿了，这就是要更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他所谓的“骨气”，就是他塑造的“海瑞”的敢骂，“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就是反社会主义的所谓“骨气”。

关于礼义廉耻，吴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也必须继承。他说：“礼义廉耻中的礼，今天还是要的，人与人之间不能一点礼貌也没有，光着身子进电影院是不对的。有些青年人，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据说这样才叫做‘朴素’，这恐怕是缺乏礼的教育所致吧？”“义，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这不是很应该吗？”“廉，要不要廉洁？要不要爱护国家财物？……公私要分清楚，不可占用公家的东西，应该有这样的品德。耻，不好的事不要去做。旧时代的这些道德，我看都应该批判地继承应用于今天。”（《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请听，吴晗同志用封建道德的“礼”对我们进行说教了：如果不接受封建道德的“礼”，那就只能是野蛮的人，那是会“光着身子进电影院”的。吴晗同志禁不住破口大骂了。试问，有谁提倡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并把这叫做“朴素”呢？大概在吴晗眼里，劳动人民都臭烘烘的。他骂了我们一顿之后，把地主阶级的“礼”捧了出来，非要无产阶级接受不可。

请问：革命的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难道是从封建道德的“义”继承来的吗？封建的“义”，有什么彼此爱护，互相批评吗？“士为知己者死”，倒是封建的“义”的一个内容，可是我们对它不是必须绝对摒弃吗？共产主义者只能为革命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绝不能为什么“知己”、为任何个人和小集团而死。

“爱护国家财产”，“公私分明，不占用公家的东西”，这是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从革命的利益引伸出来的，这种品德的普及是党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结果。它决不是从地主阶级的道德教条中继承来的。照吴晗同志的逻辑，无产阶级如果不继承地主阶级的“廉”，就会盗窃国家财物、假公济私。难道这不是对无产阶级的诽谤吗？

“不好的事不要去做”，难道是从封建的道德教条那里继承来的吗？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耻辱与光荣也是这样。地主阶级认为坏的、可耻的事，我们则认为是好的、光荣的。无产阶级怎么能继承地主阶级“耻”这个道德教条呢？照吴晗同志的逻辑，无产阶级如果不接受这个道德教条，就要尽做坏事了！？

在这里，吴晗同志采用的手法，是把地主阶级的道德，贴上社会主义道德名词的标签。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把封建的礼义廉耻打扮成似乎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东西，以便于推销它们。什么“批判地继承”啊，什么“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啊，什么“公私分明”、“爱护国家财产”啊，等等，都只不过是一些迷惑人的名词术语而已。

关于资产阶级道德，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什么呢？他要无产阶级接受的，主要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一些恰恰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

对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吴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继承。他说：“不止是封建道德，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精打细算，多主赚钱，难道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第一重要原则？”

请看，这不是明明要把为了赚钱的资产阶级经营原则也当作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原则、当作无产阶级道德吗？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群众服务，而决不是为了赚钱。当然，社会主义企业在上述前提下也讲“利润”，也要力求厉行节约，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决不是把“多方赚钱”当作原则方针。商业工作者李素文同志说：“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身在柜台，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商业工作者的世界观和道德观。这种高尚品德难道是从“多方赚钱”的资产阶级道德观那里继承来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它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它是和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斗争的结果。几年来，我们党领导企业职工在企业内部广泛地开展了两种经营思想的斗争，这是为了克服企业中残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的斗争，也是用共产主义世界观道德观教育人、改造人的斗争。吴晗同志却把资产阶级“多方赚钱”的所谓“道德”硬塞给无产阶级，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很显然，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继承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就是要继承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要继承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并且实质上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针，提倡钞票挂帅、利润挂帅。

吴晗同志还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作为政治范畴和道德范畴，要无产阶级继承下来。他说：“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对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掌握了政权，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人民是没有民主的，自由也是一样。这样，民主和自由也就变了质了。自从有了无产阶级之后，有了马列主义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民主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不是批判地继承下来呢？”接着他也说，我们的民主、自由是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掩盖真相的词句），但是他却断言无产阶级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②

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不仅在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他的思想家创造的

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也是资产阶级的，绝没有一点全民的、超阶级的内容。在这个时候，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因为，这时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吴晗同志只谈资产阶级“兴起初期”民主、自由“反抗封建制度束缚”的一面避而不谈它们的资产阶级内容，它们欺骗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正是为了要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完全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民主，无论作为政治制度来说，还是作为思想体系来说，对于劳动人民，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③。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作为观念体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把民主给予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则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把民主给予劳动人民以及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则实行专政。从道德观念方面来说，资产阶级认为用全民民主的口号欺骗人民是道德的，它们各个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民主的口号下，互相争权夺利，是道德的；无产阶级认为，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产，一定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很显然，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道德的，他们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是道德的。我们认为，这是极其污浊、极不道德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只给予人民，绝不给予反动派。无产阶级认为，消灭资本、消灭剥削，不给它半点自由，是道德的，认为在人民内部，自由也是对纪律而言的，按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这个原则行动，才是道德的。而反动派则骂我们没有自由，不要道德。请看，无产阶级的自由跟资产阶级的自由不是完全相反的吗？

用剥削阶级的道德，改造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论的秘密。

三、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

吴晗同志在论证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时说：“列宁不是说过吗？‘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再说道德》）这是对列宁的极大歪曲。

列宁总是把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创造出来的文化一分为二。他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④，一种是反动的文化，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而吴晗同志却在“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和资产阶级文化、地主阶级文化之间划上一个等号。难道这不是对列宁的歪曲吗？

在《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五三——二五四页，列宁论述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他指出：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吴晗同志所引的列宁的那段话，就在二五四页上。从二五七页开始，列宁才开始论述道德问题。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对道德问题的全部论述，不但没有说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而且说我们必须摒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并且指出，“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吴晗同志却假借列宁的名义说，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试问：吴晗同志的这种引证法又是哪一种道德道德呢？

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学、文艺、哲学、经济学等等，我们当然要批判地继承，即如毛主席所说的，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却同上述思想遗产不同。经典作家都没说过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吴晗同志用“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来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这是徒劳的。广义地说，法权规范、法律也属于文化范畴，难道我们也要继承地主资产阶级，她要继承国民党反地动派的《六法全书》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其中就包括着打碎和完全摒弃资产阶级法律。

在上层建筑中，道德观念、规范和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是有其不同的。哲学、经济学是对社会存在的抽象反映，文学艺术是用艺术形象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道德观念、规范和法权规范、法律一样，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法律、法权规范，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成文法和习惯法），并且由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道德则通过社会舆论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道德观念、规范和法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许多道德教条都直接写在法律条文上。例如，《唐律》、《明律》规定，不忠、不孝、不节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汉律》、《唐律》、《明律》规定：“亲亲得相着匿”、“亲属相为容隐”，这就是说，“子为父隐”之类的道德教条也就是法律。

尽管道德和法律是有区别的，但是，它毕竟和法律一样，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剥削阶级的道德和法律，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意志而形成的、直接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规则；它的职能都是直接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因此，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

吴晗同志除了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以外，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道德观念要无产阶级继承。在这里，我们择其主要的讨论一下。

吴晗同志要我们继承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孟子说：“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吴晗同志引了这段话，要无产阶级继承，并且说，“在近、现代革命史中，也出现过符合这个标准的无数烈士和英雄人物”。

请问：孟子所说的“道”，难道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之“道”吗？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以地主阶级之“道”为前提的，就是说，不论是富贵的引诱，贫贱的折磨，强力的压迫，决不改变实行地主阶级之“道”的精神，这就是所谓大丈夫的品德。这里表现的是地主阶级的顽固的党性。例如，现在一个地主阶级分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死要独行其道（即坚持地主阶级的立场）”，这不是十分反动的吗？这种所谓道德，怎么能有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呢？

照吴晗同志的说法，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是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孟夫子思想教育的结果。这不是十分荒唐吗？我们有时候，也借用“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说明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这里绝不是说无产阶级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而只是从孟子那里借用了语言资料。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绝非来源于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形成的。

吴晗同志在论证必须继承封建道德的时候，还说：“诚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雄心壮志这些美德，难道不可以移用在今天？”

试问：有什么抽象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吗？地主阶级道德所讲的“诚实”是忠实地于地主阶级，对地主阶级诚实；无产阶级道德所讲的诚实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党、对人民老老实实，如果在敌人的法庭上也“诚实”，那是出卖党的秘密的叛徒。地主阶级道德所讲的“勇敢”是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社会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被地主阶级颂扬为“忠勇可嘉”、道德高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今天，地主阶级分子还讲他们那个阶级的“勇敢”，这就是顽固不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道德所讲的勇敢是在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所畏惧，在革命战争中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地主阶级的“雄心壮志”是万贯家财、荣华富贵或个人野心家的争权夺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中国和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等等完全是具体的、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与地主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绝然对立，怎么能把地主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移用在今天”？

至于“勤劳”、“刻苦耐劳”，这根本不是地主阶级的道德。“勤劳”、“刻苦耐劳”总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地主阶级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认为劳动是可耻的，是卑贱人做的事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勤劳”、“刻苦耐劳”的品德。吴晗同志把劳动人民才可能有的“勤劳”、“刻苦耐劳”的美德挂在地主阶级的头上，这不是露骨地宣传地主靠自己“勤劳节俭”起家吗？

吴晗同志还宣传地主阶级的“刚直不阿”，把它说成超阶级的，硬要无产阶级接受。这也是完全骗人的。超阶级的“刚直不阿”是没有的。所谓“刚直不

阿”，在地主那里，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坚持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的原则，而不逢迎破坏这种原则的上司；如果说要无产阶级道德时，有限制的借用“刚直不阿”这个词汇，那么它指的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两者是极端相反的。无产阶级从革命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领导，这是应有的美德；而地主资产阶级却把这种美德骂为“阿”，骂为“逢迎拍马”。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不是就这样恶毒地攻击过我们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宣扬抽象的即故意掩盖其阶级内容的“刚直不阿”，只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

在世界上还没有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及其影响以前，是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道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遗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⑤

吴晗同志利用人们还在使用的在历史上形成的语词、语言，掩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阶级性，把它说成“全民性”的东西，要人们把它接受下来。这完全是骗人的戏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到婚姻制度时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又说，无产阶级的婚姻也是一夫一妻制。这两种一夫一妻制是不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恩格斯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他说，在无产阶级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都除去了。“无产者的婚姻，决不是在一夫一妻制这个词的历史意义上，而是就这个词的语源意义上说来，是一夫一妻制的。”⑥我们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必须把词的本来的意义即“历史意义”和“语源意义”区别开。这也就是说，语词、语言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码事。同一句语言，同一个语词，它的意义，它的社会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还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⑦。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

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四、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是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贩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当吹捧“孔子”十分猖獗的时候，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同志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硬要无产阶级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其政治意义不是代表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反对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很显然，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既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文化革命的“反动”，又是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无产阶级的斗争。

从中国近代革命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封建道德的复辟活动，每一次复古尊孔运动，都是反动阶级政治复辟运动的先导，都是对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反动。而当这种反动逆流受到揭露、批判之后，坏事就变成好事，促进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革命的前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宣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宣扬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无产阶级道德的发扬，同破除旧道德是分不开的。旧道德不破，新道德不立，旧道德不止，新道德不行，旧道德不塞，新道德不流。一句话，不坚决摒弃地主资产阶级的吃人道德，就不可能发扬无产阶级的高尚道德。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发扬和巩固，又将加速旧道德的最后死亡。

目前在我国，共产主义道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之下，抗拒了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道德的思想毒素，树立了以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扫除旧道德的基本的社会力量。

新道德总是在同旧道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道德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同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道德的进一步发扬，必然伴随着同地

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必将在这场斗争中，把自己的道德提高到更高的境界。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近几年，我国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冲击着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旧史学。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向旧的、传统的历史观点展开了斗争。这样，就使得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历史学家们如坐针毡，他们感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摇摇欲坠了，非起来抗争不可。于是，史学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辩论，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又为史学革命开创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

这一场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史学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当前史学领域里的这场大论战，就是坚持还是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论战。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②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由于他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颇具有迷惑人的作用。为了分清是非，辨明真理，就翦伯赞同志历史观点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认真进行一番讨论，对于目前正在迸行的史学革命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及其规律。他们把历史一会儿说成是偶然现象的堆积，一会儿说成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一会儿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善良本性的发现，一会儿又说成是暴君的罪恶活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所以把历史歪曲成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东西，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历史的真相，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阶级斗争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迫使那些具有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改变反对的方式。

翦伯赞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

一九五二年，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所谓“历史主义”。但是，把“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大肆宣传，那是近几年来的事情。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到处宣传他的“历史主义”，要用所谓“历史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③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④

说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把中国历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这是污蔑。翦伯赞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说，阶级斗争观点要不得，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历史，把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会把历史说成是“罪恶堆积”。在翦伯赞同志看来，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评论历史人物，就是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就会把封建阶级的历史人物否定掉。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⑤这是翦伯赞同志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又一个攻击。

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主张用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奴隶同奴隶主、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这种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历史现象。翦伯赞同志说，不行，如果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这个，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讲历史应该复杂一点，复杂到分不清阶

级界限。他所以要大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要用这种矛盾来冲淡或者代替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同志给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同志扣了许多帽子，什么“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简单化”、“片面性”、“否定一切”，等等。但是，最大的帽子还是“教条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翦伯赞同志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大肆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他说：“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只讲普遍真理、一般原则，不结合自己历史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应该反对”⑥。

翦伯赞同志讲了不少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口头上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把阶级斗争观点除外。这是一种挖心战术。他所反对的恰恰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观点。

翦伯赞同志把所谓“历史主义”奉为研究历史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则。其实，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破烂武器。翦伯赞同志不过是给它涂了一点金黄颜色，就拿来到处挥舞。

我们且不说现在世界上大谈“历史主义”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历史上说，最早用“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克罗齐。他认为“唯一的实在性，就是流动性”，就是“精神”，并且宣称这就是“历史主义”。资产阶级的许多哲学派别，如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也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坡培尔即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过份简单化的观点”，只“承认贫富之间的分歧始终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把一切政治冲突都错误地解释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否认“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否认“统治阶级内部分裂”。⑦臭名远扬的实用主义者杜威，他表面上也承认“历史是一个变化过程”，但他坚决反对历史变化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观点污蔑为“教条式的历史哲学”。

⑧

人们有理由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理论如出一辙，他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是站在一起的。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毛泽东同志一贯热情地歌颂历史上的农民，歌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⑨因此，怎样对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根本态度、根本立场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⑩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并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并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翦伯赞同志对历史上的农民，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观点，完全暴露了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请问：为什么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呢？难道封建压迫、剥削不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吗？为什么反对地主，不是反对地主阶级呢？难道地主阶级不就是由地主构成的吗？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制度就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制度。怎么能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呢？列宁说，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其目标“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①①。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①②

翦伯赞同志之所以要在封建压迫、剥削和封建制度之间，在地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划一条界限，就是为了证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这种观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污蔑。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③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把它叫做革命呢？难道把它叫做改良不是更合适吗？

所谓“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如果这句话，指的是有时农民起义借用王朝的名义来号召，就认为起义农民不反对封建的皇权主义，这是只看形式，不看实质。马克思曾经指出：“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①④难道对农民起义借用王朝来号召的现象不应当象这样地进行阶级分析吗？如果这句话，指的是起义农民没有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思想，这是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否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①⑤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①⑥。请问：在封建社会里受剥削的农民，为什么不会产生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主义”呢？难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等，不是和封建的皇权主义根本对立的吗？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性质，是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决定的，而不是以当时农民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依据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当时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翦伯赞同志还说：“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①⑦。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例如，黄巢起义建立过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过大顺政权，在这些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里，“捕得官吏悉斩之”，“富家皆跣而趋”，“巨室膏田”没了主人；“究棍”领回了“祖产”，“贫儿”、“奴仆下才”“广侵田宅，滥渎财货”，“并兼”了地主的“田园甲第”。这种使农民扬眉吐气，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权，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封建政权这样做过？

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战争发展的高峰。它在建立农民政权方面，也最典型。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中说：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请问翦伯赞同志：如果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你是否认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一样是封建性的政权呢？

封建社会的农民，以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历史发展，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前奏。正因为他们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性，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的，没有革命性，那么，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怎么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呢？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一方面用他的“历史主义”歪曲和污蔑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又用他的“历史主义”大肆美化和歌颂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制度。

一九五八年，史学战线上掀起了一场大破帝王将相主宰历史，大写劳动人民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翦伯赞同志在这个革命运动面前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成。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①⑧。这就是说，筑长城、开运河，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但是秦始皇、隋炀帝是发动者和组织者，必须承认和肯定他们的功劳。

毛泽东同志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①⑨在我国历史上，长城也好，黄河也好，运河也好，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

些皇帝的功劳？翦伯赞同志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也要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

特别是像隋炀帝，连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敢替他说好话，认为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①黔黎，俱充蛇豕之饵”。②⑩而翦伯赞同志竟把这样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当作挖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加以歌颂，这就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

能不能够说由于隋炀帝是开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因而就应该把功劳写在他的账上，加以肯定、加以歌颂呢？当然不能。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剥削阶级所兴修的水利、所创办的事业，都一律看待。但是，那些直接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服务的工程，其政治目的必须坚决揭露。而翦伯赞同志完全掩盖了隋炀帝修运河的阶级本质，把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说成是给人民办好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②①

这是什么“历史主义”呢？这就是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主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对这种剥削和压迫，有什么理由不准反、不准骂？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般认为是从唐宋开始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一八七一年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走向没落的。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在唐宋以前，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巴黎公社以前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反对。谁如果反对，就是反“历史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唐宋前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秦末农民起义、汉末黄巾起义等等，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度。同样，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国、英国、德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触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也许有人认为，翦伯赞同志美化帝王将相，似乎是有条件的，他只是歌颂历史上那些所谓对人民有功劳的帝王，只是歌颂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实际上，凡是地主、资产阶级，翦伯赞同志都是毫无例外地肯定。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②②这就是说，对于帝王将相，即使要批判几句也不行，也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只许向帝王将相高唱赞歌，顶礼膜拜，而不准说半个“否”字。你看，他对帝王将相是多么爱护备至！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任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封建帝王不仅能够替“个别的人民”伸冤，而且能够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

封建帝王替人民伸冤，根据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观点，是当然的事。但是，且慢，请问帝王替人民究竟伸的什么冤？伸那个阶级的冤？历史上有这样 的事吗？那怕有一件也算。什么是封建的法律制度呢？封建的法律制度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政治制度。要求帝王用地主阶级的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到底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呢？这是把帝王及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法律都当作超阶级的偶像来崇拜。

翦伯赞同志大叫要用“历史主义”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他不仅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去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将相，而且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把国家和法当作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来歌颂。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为了美化帝王将相，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了贬低农民革命，否认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翦伯赞同志还一直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减轻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

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②④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来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⑤。很显然，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翦伯赞同志宣扬的“让步政策”理论，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不比不知道”。对古今中外的地主阶级我们也要做个比较。

我们先看看现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规模不能算不大吧，对统治阶级的震动不能算不重吧，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究竟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对此，我们许多革命老同志和革命群众还都记忆犹新。统治阶级加给革命人民的是屠刀、是牢狱，多少人死在统治阶级的屠刀之下，真是血流成河！多少人身陷囹圄，真是暗无天日！工农群众在革命中争得的一些权利，被统治阶级夺回去了，并且加重了负担。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⑥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阶级的“让步”和“让步政策”，只有变本加厉地进攻和反攻倒算，只有白色恐怖！

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德国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规模很大、影响很深远的革命运动。这次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

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②⑦同样，在这里也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绝没有什么“让步政策”。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至于认为“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实行的，这就更加荒唐了。这岂不是说

农民阶级在革命中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失败以后反而得到了吗？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极端仇视，坚决镇压。当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只能反攻倒算，血腥镇压，绝不会有“让步”，更不会有“让步政策”。

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实行的政策，是翦伯赞同志宣扬“让步政策”理论的第一个例子。他说：“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②⑧

翦伯赞同志所特别称道的“除秦苛法”，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不是。

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这是“除秦苛法”吗？不。“约法三章”，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反对农民革命的法律，是刘邦背叛农民革命的标志。农民革命，“杀”地主阶级、“伤”地主阶级、

“盗”地主阶级（财产），这犯的是那家的“法”？难道不是地主阶级的“法”！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它，反而歌颂它，这不是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反对农民革命吗？

“除秦苛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是当时地主阶级用来诱骗人民，使之规规矩矩就地主阶级的法律之范的。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地主为农民准备的鞭子，它是专政的工具，绝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汉初法律的阶级实质，却一再宣传那所谓的“除秦苛法”，这不是在帮助地主阶级继续欺骗人民吗？

翦伯赞同志说，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到文景时代出现了“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廩实，蓄积有余”的现象②⑨。这种描绘完全是从地主阶级御用历史学家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中抄来的。封建社会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地主阶级越富，农民阶级越穷。地主阶级的富是建立在农民阶级的白骨上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地主阶级国家的钱积得“贯朽而不可校”，粮食存得“腐败不可食”，农民仍然要卖儿鬻女，在死亡线上挣扎。对这一点，连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也不否认。晁错给汉文帝上奏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②，百@②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③⑩翦伯赞同志对这些事实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举一反三，以此例彼。翦伯赞同志所说的各个朝代统治者对农民实行的“让步政策”，都是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对封建社会的歌颂。

翦伯赞同志声称，他的“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论的解释③①。不是，绝对不是。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翦伯赞同志却认为，阶级调和、阶级妥协推动了历史发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才能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翦伯赞同志却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怎么能说“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解释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③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不能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对人民作什么“让步”，实行“让步政策”。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对敌人抱有丝毫的幻想。

结束语

解放初期，在史学领域里，虽然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作了一些批判，但是，由于革命的史学工作队伍还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批判的锋芒还不那么锐利。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大肆宣扬“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们宣扬“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是为个人主义，为个人的名利而研究历史。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史学革命运动。这个革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反以地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

这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史学革命，方向对，干劲足，成绩大。革命批判精神得到了大发扬，旧的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

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③③}，革命史学的发展也决不是平静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决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地位，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虽然经过斗争使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破产了，但是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会登台演出。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史学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以为有机可乘，他们就公开出台表演了。

翦伯赞同志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史学革命，冷嘲热讽，挖苦打击。他到处讲演，发表文章，把刚开始不久的史学革命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攻击史学革命。一时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

翦伯赞同志对“以论带史”，即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大为不满。他说，“以论带史”的口号有片面性，“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③④}他提出：“材料是知识的泉源”，“对

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③⑤这实际上就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

针对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观点，翦伯赞同志提出“政治是替经济服务的”，“经济是历史的骨干”，是“写历史的原则”③⑥。他指责有些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并说“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③⑦

翦伯赞同志特别反对史学工作者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他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奚落“为了站稳立场”的史学工作者，说“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③⑧。

翦伯赞同志给史学革命竟然作了这样的总结：“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③⑨

总起来说，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

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为了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必须批判。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几年来，吴晗同志一直在狂热地进行着海瑞和“海瑞精神”的宣传。同志们对这样的宣传，一直是有意见、有议论的。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象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一时间，海瑞问题变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晗同志在同志们的批评下，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同志如果真的能以自我批评做为自己进步的起点，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当人们仔细看了吴晗同志近两万字的自我批评文章以后，

却不得不说，吴晗同志的检讨，态度是不老实的。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吴晗同志的检讨是个假检讨，不仅是个假检讨，而且是在假检讨的掩护下，向批评他的同志们进行反批评。我们从来认为，反批评是可以的、允许的，但是为什么要打着自我批评的旗帜？这是一种什么论战手法呢？

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一下吴晗同志海瑞宣传的过程，对他的海瑞宣传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吴晗同志排出来的“时间表”，恰好说明了他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他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劈头而来地为我们排出了一张他“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从这张“时间表”开始，吴晗同志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辩护。

吴晗同志以为，“时间表”的烟幕能够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振振有词地说，我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党中央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是一九五九年八月间的事；《海瑞罢官》是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也是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和“翻案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以前。好像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①

但是，吴晗同志竟然没有理会到，时间从来对于掩盖真理的人是不利的。不是有人说吗？不是别的，正是这张“时间表”，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一样，明明白白地暴露了事情的真象。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把“谜”一般的“学术问题”的现实内容点破了。

为什么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突然对“骂皇帝”的题目，这样热烈地感到兴趣起来？文章写得那么尖酸、热辣，通篇皆是骂、骂、骂。可是谁都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向是吴晗同志安身立命的基础、精神寄托的所在。他最反对骂皇帝，就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后，吴晗同志不是就写过许多为封建皇帝争地位、续家谱的文章吗？他认为，“在过去的历史时代里，在某项政治措施、工程建设或大规模的战争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谁？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领导、指挥了这些工作。……对这样的人应该肯定、表扬、歌颂。”②在那时，只要有谁少

写了一笔封建帝王，马上便会遭到吴晗同志的严厉指责。他曾经感慨系之地说过，在我们的一些历史书籍中，“除秦始皇而外，对像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等这样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③他认为，历史上的很多皇帝，特别是那些所谓“全盛时代”的“领导人”，简直都是些保国安民、龙腾虎跃、“伟大”得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祖宗”，“不这样看，就会把我们祖宗的脸完全给抹黑了。”④谁要是敢于随便对某个封建王朝的所谓“领导人”发一点不恭敬的议论，吴晗同志就要给以迎头痛击！他曾经不胜激愤地问道：“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有什么好处呢？”⑤可是，奇怪的是，如此一个坚决保卫皇帝尊严的历史学家，却突然写出了一篇尖酸、热辣的，号召人们以一种抽象的“勇敢”精神骂倒一切皇帝的文章。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什么样的思想动向呢？吴晗同志一定要辩白，我所谓的骂皇帝指的是骂“坏皇帝”，“好皇帝”是不可以骂的。

“好皇帝”和“坏皇帝”是吴晗同志的概念，这种概念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就用吴晗同志自己的概念来说，他写的“骂皇帝”文章，也并不是什么骂“坏皇帝”。

吴晗同志的文章，明明白白写着的是“骂皇帝”，而不是骂“坏皇帝”。文章第一句，就写道：“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这皇帝如果指的是“坏皇帝”，则逻辑不通。下面的什么皇帝的“避讳”啦、“缺笔”啦，当然指的也不都是“坏皇帝”。再往下，什么“徐世_{j i}①只能叫徐_{j i}①”啦，那指的不仅不是“坏皇帝”，而简直是吴晗同志奉之若神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了。以后的什么“贺后骂殿”啦，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啦，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啦，什么“宋太祖”啦，什么“小叔皇帝”啦，当然，指的更不是“坏皇帝”。至于吴晗同志后面写的海瑞骂皇帝，那只不过是他“骂皇帝”文章的一个小题目，大题目仍然是骂皇帝。更彻底地说，这里的大题目、小题目都是为了鼓吹一种更大的题目。这更大的题目则是发扬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骂骂也是好的“勇敢”精神。即是说，吴晗同志所说的“骂皇帝”，指的既不是“坏皇帝”，也不会是“好皇帝”。“醉翁之意不在酒”。吴晗同志不过是

借着“骂皇帝”的名目，向当代的人们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来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已。

尽管吴晗同志是那样地喜欢讲“历史真实”，但是实用的需要，使他完全顾不得“历史真实”了。海瑞骂皇帝的故事里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人家海瑞本来是劝皇帝、爱皇帝，吴晗同志为了鼓吹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便顾不得事实，改“劝”为“骂”、改“爱”为“骂”了。甚至连海瑞《治安疏》里本来没有的话，例如什么“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也生造出来了。这是为什么？⑥是吴晗同志不懂古文，翻译错了吗？不是，吴晗同志对于古文是熟悉得很的。那末，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给海瑞加上他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呢？不是别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突出他所鼓吹的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吴晗同志反对在历史剧的舞台上给古人戴上眼镜，但是他自己却为无限忠于皇帝的古人，勾绘上了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虚假脸谱。

有虚构，就有隐瞒。海瑞被皇帝关在监狱中，一天，狱吏请他吃饭，吃完了饭告诉他皇帝死了。海瑞一听这个消息，“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⑦这个故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海瑞的真正“品格”，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海瑞“精神”。它比任何一种烦琐的考据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的真海瑞究竟是在骂皇帝，还是在爱皇帝。可是尽管事情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典型，而且是那样的准确无误，却只因为它不符合吴晗同志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所以就绝口不提了。这就是吴晗同志的“历史真实”！

是一种什么原因，使吴晗同志这样毅然决然地不顾他一贯歌颂皇帝的立场，不顾他一向标榜的“历史真实”的口号，尽心竭力地向人们鼓吹他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呢？因为一种更高的需要，超过了吴晗同志一切其他的需要。

什么是吴晗同志更高的需要呢？这就是吴晗同志在“时间表”里一点而破的，那个被党中央庐山会议胜利地粉碎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需要。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资产阶级的力量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力量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斗争，贯穿在整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经济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披荆斩棘，作开路的先锋。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则要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道路摇旗呐喊，争生存的权利。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迈进，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革命运动极不满意，极不舒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寻找机会，向革命发动进攻。一九五九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困难，国际上的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华的高潮，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也蠢然活动起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吴晗同志，正是适合这种社会思潮需要的代表。不是吗？在一九五九年，什么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极不舒服、极不满意，而极想一骂为快呢？什么人不仅自己极想一骂为快，而且更想鼓励别人也“勇敢”地出来骂一骂呢？这样一件小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就在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那个夏天，四川新繁县农村的一个生产队里，发生过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水田里的禾苗茁壮地生长着，忽然来了一阵风雨，一些禾苗倒伏了。一个心中颇有一些牢骚和不满的家伙咕噜着说：“人背时，天也背时！”一个富农抓住话音：“龟儿子，象个张飞，敢说！”那个人得到了鼓励：“嘴长在我脑壳上，啥子不敢说？”这个富农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读过《明史》，不知道海瑞，乡下报纸少，大概也没看过吴晗同志“骂皇帝”的文章，但是他提倡的那个“张飞精神”同吴晗同志鼓吹的“海瑞精神”，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一贯把帝王将相的历史看做是祖国历史“光明面”的吴晗同志，突然一反常态，积极地、连历史事实都不顾地去为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振臂高呼呢？

(二) 今天，反动派已经被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你那爱之如珍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早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那末，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究竟是要人们去骂谁呢？

(三) 难道你所要引导人们去骂的那种抽象的“皇帝”，同今天当家做主的人民没有联系吗？同我们亲爱的党没有联系吗？难道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正在吴晗同志大力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时候，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始而看风色，想骂而不敢骂，终而憋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什么这个搞坏了，那个搞糟了。他们满以为时机大好，一骂就能骂出他们的天下来。多么猖狂，多么嚣张！岂知逆历史潮流的人，总是事与愿违。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声音同吴晗同志的声音是那样地相似？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在党中央庐山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两者怎么联系得上呢？

我们知道，党中央庐山会议是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既然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在“反”以前，必然是已经有了右倾机会主义。事实上，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时候，正是社会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开始出笼的时候，否则吴晗同志怎么能有资格在思想斗争的战线上做他们的代表呢？列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代表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知识分子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远的不去说它了。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前两年，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不是在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以前，就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吗？

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同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海瑞骂皇帝》之后，吴晗同志又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

《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海瑞骂皇帝》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它的终结和转变。

吴晗同志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在自我批评中，对这样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自己提问：“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然后答曰：

第一，是为了“反右倾”。理由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他在《论海瑞》中，写了“不许可假冒海瑞，歪曲海瑞”一类“反右倾”的话。

第二，是“为古而古”。这一条是拿来为《海瑞罢官》辩护的。他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吴晗同志颇以为，这两条理由可以堵塞天下的言路。

恰恰相反，这样不成其为理由的辩护词，却会引出了好些文章，从而把关于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讨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吴晗同志两条反批评的理由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吴晗同志自己说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发表的《论海瑞》，是为了“反右倾”的目的而写的。这目的性不是很清楚，很明确吗？为什么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冬底动笔”，而且也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却突然连目的性是什么都“不清楚”，都“糊涂”起来了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主题的作品，怎么一个的目的性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确；而另一个的目的性，却又是那样的“不清楚”，那样的“糊涂”了呢？一个“古为今用”得那样“好”，密切联系了“政治”，密切联系了“现实”。一个却变成了“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问吴晗同志：这究竟是一种离奇的童话，还是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

原来这都是假话。什么“反右倾”，什么“为古而古”，统统不过是吴晗同志逃避错误、逃避批评，回避自己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一种遁词。

是的，吴晗同志的《论海瑞》的确有一个“反右倾”的尾声。但是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反右倾”的尾声同吴晗同志整个文章，是不协调、不一致的。

看来，这一段话不过是一段外加的、脱离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表面文章，它绝对不是发于吴晗同志内心深处的声音。

是不是武断？不是。因为吴晗同志整个海瑞的宣传都是为着一种现实需要服务的。倾注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抒发了一种反党感情的、号召人们向一种抽象的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作品，怎么能是反右倾的、革命化的作品？脱离了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一个外加的小小结尾，掩盖不了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的整个立场。

外加的那种表面文章，在《海瑞罢官》里再也找不到了。吴晗同志再也不好继续拿这块美丽的面纱遮掩自己了。他只好说，他的《海瑞罢官》，是“为古而古”是“为写戏而写戏”。前后的矛盾，逻辑的混乱，都顾不得了。当初，吴晗同志写历史剧的时候，实用的需要超过了历史的真实，现在，写自我批评的时候，实用的需要又超过了现实的真实。

毛泽东同志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超阶级的历史，为历史而历史；超阶级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过的。吴晗同志过去的主张从来也不是这样。他从来都是主张“古为今用”，主张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

“研究古，正是为今服务”。⑧

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今人”。⑨

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⑩

“历史实际是为当前实际服务的，不能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过去的事情”。

①①

这些话都是吴晗同志以前经常说的。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例子很多。比如，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发表的《赵括和马谡》，谈的是“古”，“为”的是“今”，反的是“教条主义”。“自以为是，因而失败，害己、害人、

误国的教训。时间虽然隔得很久了，今天来重温这些教训，看来还是有益的。”①②六月，发表的《反对“花法”》，也是“古为今用”的。“所谓‘花法’就是华而不实”，“在当前也还有其现实意义”。①③

海瑞的宣传，当然也是“古为今用”的。这一点，他过去也是不隐讳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写海瑞是为了让“后人纪念和学习”①④，是为了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①⑤也就是说，是为今天的现实而发思古之幽情。“为古而古”，超政治、超现实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吴晗同志的主张，吴晗同志也从来不是这样做的。

历史小品和历史论文的“古为今用”，到底有局限性，而且引不起广大群众的注意，于是吴晗同志排除万难，“破门而出”地搞起戏剧来了，并且选择了群众喜闻乐见的京剧形式。由历史小品而历史论文，由历史论文而历史剧，吴晗同志的用心可谓良苦矣！今天怎么能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一句话，轻飘飘地把过去唯恐别人不知道的现实目的性一笔勾销呢？

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易其稿的《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公开发表了。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引言上明确地说，他写海瑞，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学习”的。

二月，北京京剧团上演了这出戏，全心全意拥戴吴晗同志的“老兄老弟”们欢喜若狂。他们为了一点暂时的成功而得意忘形。

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阴暗的心理，共鸣的心弦，都在这里流露出来了。

自称为“老兄”的繁星同志，用他们之中最高的称誉——“我们的先师孔夫子”的榜样，称颂了他“老弟”“破门而出”的精神。这出戏是多么激动他的心啊！“一面看，一面脑子转个不停”“出了戏场，我的脑子也转个不休不止”。至于“想些什么，那就不用细说了”。①⑥好个不用“细说”！但是，要是别人看不懂这出戏怎么办呢？岂不白费了功夫？为此，“老兄”象煞有介事地装起“糊涂”来了，他向“老弟”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人们懂得，提几个问题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作法。

吴晗同志对繁星同志的提问，报之以会心的微笑。他巧妙地回答了提问者巧妙的发问：

“无论是历史书也罢，历史剧也罢，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古为今用”，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①⑦

对提问者的假装“糊涂”，吴晗同志并非无意地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装什么“糊涂”！“我看，你一点也不糊涂，我所说的，我看，也都是你所想到的，不过，你在故弄玄虚，要我替你说出来而已。”接着，吴晗同志向对方将了一军：“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

此后的三个月，吴晗同志又在《论历史剧》一文中，再一次地阐明了历史剧“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等等理论。①⑧这些理论，可以看做是吴晗同志《海瑞罢官》戏剧创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又三个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又一次地谈了戏剧在“反映人们的痛苦、希望和要求，鼓励人们敢于斗争，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方面，对“今天也仍有它的现实意义。”①⑨

吴晗同志怎么能这样健忘呢？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什么让今人“学习”啦，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啦，“不是为了死人，而且为了活人”啦，“以古讽今”、“古为今用”啦，“指桑骂槐”、“不容怀疑”啦，“反映人民痛苦”、“鼓励人们敢于斗争”啦，怎么今天一挨批评，就变成了“完全”是“为古而古”，“完全”是“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古为今用”“一点也没有想起过”了呢？以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不是赞成孔夫子、孟夫子吗？我们对孔丘、孟轲的话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按你们说的，孔子的“强哉矫”，孟子的“大丈夫”，是这样吗？你们不是要人们学习“刚直不阿”、反对“乡愿”吗？什么叫“刚直不阿”？按之《说文》，“刚直不阿”者，不屈挠，不钩弯也。“刚直不阿”怎么可以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呢？什么叫“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②⑩孟子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乡愿也。”②①反对“乡愿”，怎么能“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呢？

一向反对“是今非古”②②，一向主张“写作”的“目的性要明确”，“要有所为而作”②③的吴晗同志，怎么会“为古而古”！煞费苦心，想过来、想过去，浇进了作者全部心血的《海瑞罢官》哪里会是“为写戏而写戏”！在他的剧本刚上演的时候，就有同志看出了他的剧本是有所为而发的。吴晗同志自己也说，当时曾经有人向他指出剧本的倾向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更多的人读了吴晗同志的剧本，人们说，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戏中有人，呼之欲出”。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大谈其《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退田啦，除霸啦，“平冤狱”啦。其实“退田”也罢，“除霸”也罢，“平冤狱”也罢，都只不过是吴晗同志剧本的情节。吴晗同志哪里是在为三代冤仇的贫农洪阿兰一家鸣冤叫屈，他对“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②④的贫苦农民哪里会有这样的感情！实际上他是借着被污辱、被歪曲了的农民，来为他心目中被“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鸣冤叫屈。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也不是消极的“罢官”，主题思想应该是高于情节之上的东西。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说得好，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思想是：“海青天，回来吧！”②⑤

回来干什么，回来再干！这是积极的同“现实”斗争的姿态，而不是消极地对“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发一点哀思。

如果有人对这样的分析仍然抱有怀疑，那末，可以看看吴晗同志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海瑞罢官》的前言里，吴晗同志对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有一个“画龙点睛”的说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说明，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吴晗同志召唤的“海青天”，当然不是明朝的海瑞。因为《海瑞罢官》写的根本就不是明朝人海瑞。尽管吴晗同志过去曾经一再斩钉截铁地说过：“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②⑥但是他还是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所冲动，虚构了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海瑞罢官》，其主要情节“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次要情节“也都是虚构的”。

那么，呼之欲出的戏中“人”是什么人？

“回来吧！”的“海青天”又是谁？

吴晗同志是最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只要把吴晗同志的戏剧放到吴晗同志所喜欢讲的每个历史剧都有它创作的“时代背景”②⑦上来考虑一下，问题也就可以清楚了。

在吴晗同志写剧本的时候，是一些什么人被人民“罢”了“官”呢？

正是那一小撮以“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为形式，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实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不等于阶级斗争不再起伏了。在六十年代的头三年里，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妄想利用连续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再一次地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牛鬼蛇神又一次地出笼了。

《海瑞罢官》是第一批出场的牛鬼蛇神。

联系当时社会上那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来看，《海瑞罢官》这出戏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不久以前被人民“罢”了“官”的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弹起“魂兮归来”的曲子，企图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弹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音乐伴奏声中东山再起。这才是《海瑞罢官》的真正主题。

“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同志们想一想：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什么人的性格，什么人的面貌描述的？而这样的描述，究竟是为谁服务？为谁鼓气？为谁张目？

“破门而出”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繁星同志不是呐喊着再来一个“海瑞”吗？不止一个的“海瑞”，在吴晗同志的开场锣鼓声中，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②⑧而梳装打扮，粉墨登场了。

《李慧娘》和《谢瑶环》，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作品陆续出来了。正象马克思说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二一页）不同的是他们有的披着“姿质美丽”的画皮，有的披着“刚直不阿”的外衣。他们都企图完成吴晗同志所没有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 为什么你一反过去坚决反对在历史剧中虚构人物、情节的理论，整个虚构了一个并非历史剧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你那样处心积虑地为一种并非海瑞所有的抽象反抗精神大肆宣扬，目的何在？

(二) 《海瑞罢官》发表和上演以后，你号召人们从中“学习”，并且一再地说历史剧决不是“僵尸的复活”，“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而是“以古讽今”“指桑骂槐”，这些究竟都是什么意思？

(三) 为什么你以前不断地讲《海瑞罢官》是“古为今用”，今天却突然变成了“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吴晗同志的“以古讽今”，“以古喻今”，所运用的无非是一种讽喻的手法，这种东西大家熟悉得很了。从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直到今天的吴晗、繁星、孟超，用的人太多了。难道吴晗同志以为就你们才懂得此中的奥妙？无限忠于革命的人民群众对于政治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他们永远要比自以为知识很多的文人学士们聪明得多！只手岂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一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同志就所谓明朝的“清官”“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于谦的事迹，写了又一篇歪曲历史真实、鼓吹“刚直”精神的文章，②⑨文章里引了一句当时流行的歌谣：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 q i ǎn @②？

吴晗同志解释道：这鱼 q i ǎn @②说的就是于谦。从这件事情看，吴晗同志对于讽喻的手法不是很懂得，很明白吗？怎么问题到了自己的头上，就这般“糊涂”起来了呢？

吴晗同志最害怕的是把他的《海瑞罢官》，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他在自我批评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剧本发表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以前，我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预见到以后会出现“单干风”、“翻案风”呢？他这样地洗白自己与“单干风”、“翻案风”的关系，目的是摆脱掉他在思想上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联系。其实，“单干风”指的不过是一种恢复个体经济的主张，吴晗同志在“退田”里所说的就是这一种主张。至于“翻案风”，大体上也是属于吴晗同志所写的“平冤狱”之类的东西，虽然我们和吴晗同志对于什么叫“冤”，看法是有根本不同的。这两股风，不是突然出现的，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们就存在着，不过有时比较盛行一点罢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当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八页）可见早在吴晗同志动笔写《海瑞罢官》剧本的时候，即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社会上已经有了“单干风”、“翻案风”。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辩解，而否定历史的事实是不可以的。

吴晗同志在写《海瑞罢官》的同时，还写了周忱《罢官》。什么周忱“被地主阶级攻击，罢官离开江南”，什么他一“罢官”，“农民完不起粮”，到处“逃亡”“饿死人”。什么人民怀念“好官”。③⑩同《海瑞罢官》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为什么就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人民“罢”了“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竟然对“罢官”的题目这样有兴趣，这样情致绵绵？其中的关系，岂是几句辩护词洗白得了？

当然，为吴晗同志辩护的也不乏其人。羽白同志就是其中最积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羽白同志说，姚文元同志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棵“借古讽今”的毒草，是对吴晗同志的一种“露骨的攻击”。并且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谦虚谨慎”态度的、“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穿凿附会”的、“捕风捉影”的、“不够老实”的作风。他质问道：这样一来，谁还敢再写历史剧！“历史剧岂不要从此绝迹于舞台了吗？”③①有人说，今后历史也没人敢写了。

((5)(6))

羽白同志的指斥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说过，“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是吴晗同志戏剧创作的理论，《海瑞罢官》正是这种理论的应用，人家自己说过的话，作过的事，你辩之何益！

“讽”的什么“今”呢？“讽”的当然是共产党之“今”，社会主义之“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讽”，是那样恶毒地“讽”。人家在那样恶毒地“讽今”，你还在那里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爱护备至地为之辩解，你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呢？真是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吗？也不然，反

起维护革命利益的同志来，什么不“谦虚谨慎”啦，“粗暴”啦，“官僚主义”啦，“形而上学”啦，“不够老实”啦，气势汹汹，帽子一大堆，这又是一种什么风度呢？

至于从此不敢写历史、不敢写历史剧了，这不过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写什么样的历史和历史剧呢？

“颂古非今”，“以古讽今”的毒草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过去有人写以后还会有人写，但是也得允许别人有批评的自由。

歌颂帝王将相，传播剥削阶级道德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写了几千年了，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了，有人实在不愿意写，也好。

歌颂劳动人民、发扬革命正气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是要带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带着毛泽东思想去写的，这样做，有些人又不愿意。

那末，历史和历史剧是否真的象羽白同志所说的那样从此“绝迹”于人寰了呢？这种耽心又大可不必。人民的历史人民自己会来写的。革命的人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为革命的利益，家庭可以丢弃，生命可以抛舍，赴刀山，下火海，万难不辞，写一写历史和历史剧，就会使他们害怕得扑倒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的面前吗！

贵族老爷们垄断文化，垄断历史的时代过去了，人民创造自己的文化，人民编写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来到了。一个贫雇农的女儿，都能够写出充满着阶级仇恨和强烈革命感情的家史，一个部队战士都能够写出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革命的人们怎么不敢写历史，怎么不敢写历史剧？

《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提高了我们许多人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了我们许多人的政治觉悟。我们有的人，有时对别人一句半句隐隐刺了自己的话很敏感，但是却偏偏对狂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不敏感，对改了装扮出场的牛鬼蛇神不敏感。什么原因呢？根本上还是因为缺乏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抗日战争中一个老同志看了《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拍案而起，大呼一声：“这是反党！”反右派斗争中许多老工人听到“党天下”、“不自由”的谬论，义愤填膺，同声质问：“这是为什么？”这种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是一个革命战士最宝贵的品质。我们革命的青年的一代，

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把革命老一代最宝贵的品质承继下来。

“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一句假话。《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吴晗同志对自己自我批评文章的一个概括。

我们只要剖析一下吴晗同志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就会明白吴晗同志这句话完全是一句假话。

在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隐隐流动的时刻，以《海瑞骂皇帝》作为思想武器，为那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兴波助澜的人，怎么会忘记了阶级斗争！在困难的三年中，在人民群众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以后，又以《海瑞罢官》作为思想武器，企图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并且极力号召人们向一种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人，怎么能忘记了阶级斗争！不会的！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它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反动。

为了替自己“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说法打掩护，吴晗同志口口声声地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一种同政治立场问题无关的学术问题。他说“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毛病”就出在“学术思想上”。

有关吴晗同志各种问题的讨论中有些是学术问题。就是这种学术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属于政治的。但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却不能简单地以学术问题待之。

通篇皆是骂、骂、骂的《海瑞骂皇帝》是学术问题吗？充满了夸张、虚构，以至于捏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小品文算什么学术问题？

“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京戏《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吗？没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连台词和人物都是按照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塑造的大毒草算什么学术问题？

早已从学术的大门里“破门而出”了，早已脱掉了学术的外衣赤膊上阵了，还谈什么学术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

吴晗同志为什么回避政治问题？③②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他在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还不知承认错误，但是再没有“照老样子”做。其实，吴晗同志在发表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以后又何尝罢手？在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这一类的文章和讲话又何止这一点。一九六二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吴晗同志同《北京日报》的记者纵论古今，大谈治史。吴晗同志谈的第一个题目便是“寻根究底”。寻什么“根”？究什么“底”？寻究的是“矛盾繁多”、“破绽百出”、“全是望风捕影”、“莫须有”的胡惟庸“里通”外国案。又是蜡烛，又是大刀，又是和尚，又是武士，讲得是那样津津有味。③③使人不解的是，向来以革命的历史学家自居的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二年积极地向人们宣扬这一场不义之争的案件呢？

一篇在书橱里冷落了多年的《胡惟庸党案考》，突然在一九六二年受到吴晗同志如此这般地宠爱，在这次谈话里，变成了一个首先拿出来的赫赫然的重要题目。这是什么用意呢？

“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时时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跟踪追击……。”③④原来吴晗同志是在向我们树立一种时时以他那种“寻根究底”的精神去倒翻其他案件的榜样。

别人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为“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张目，他说《海瑞罢官》写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这一次的一番谈话，总不是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了吧！那末，正在一些人大肆叫嚣“平冤狱”，“翻案风”的时候，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一向主张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的吴晗同志也在那里“纵论古今”大谈其“寻根究底”，倒翻古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胡惟庸案”谈话后的一个月，吴晗同志又发表了一篇悼念“生性质直”的斛律金的家族的文章。③⑤这里又讲了一个“全是望风捕影”的案件。文章的末了，吴晗同志对“封建帝王统治下良将忠臣”的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所谓“生性质直”的军人的命运，引起了吴晗同志这样的同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的共鸣啊！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各地开展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这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话。吴晗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我们希望吴晗同志能够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思想里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出来，不要回避政治问题，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要讳疾忌医。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刊载的关锋 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曾经这样讥笑过当时德国的一个庸人、唯心主义者：“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①

吴晗同志把他写《海瑞罢官》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他那套道德论的支配；大概他之所以陷入泥潭，也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不过，在吴晗同志这里，却不单是唯心主义，重要的是他耍了一个花招：回避政治问题，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学术领域里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这是办不到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寻求毒草的根源，必须到阶级斗争中去找。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是代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的。他不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而是被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迷住”了。

“你们拿大帽子压人！”——朋友们，不要发脾气，这里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辩论。请看看我们的分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真理愈辩愈明。真理是驳不倒的，驳倒的就不是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请反对的，不赞成的，不完全赞成的朋友们、同志们来反驳、批评。对完全反对的反驳，我们愿意争论，奉陪到底；对不完全赞成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愿意和同志们讨论。把我们的意见驳倒了，有根有据地证明我们的意见部分的错了，或者完全错了，我们愿意检讨。

(一) 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在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吴晗同志急急忙忙地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②。在这篇所谓“自我批评”的文章里，表面上，吴晗同志给自己扣上一些空洞的帽子，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等等；实际上却歪曲事实，指东说西，多方掩盖，极力避开问题的实质，避开《海瑞罢官》的要害，并给自己下了个结论：“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还含沙射影地攻击从政治上批评他的同志。

但是，事情出乎吴晗同志的“始料所及”。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反而帮助了人们看清他的问题的要害，看清他歌颂海瑞的目的所在，看出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吴晗同志文章的第一节，小标题叫作《我为什么研究海瑞？》，在这个标题下，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〇年，跟“单干风”无关；可是这样一来，他自己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同庐山会议联系了起来，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吴晗同志为了掩护手臂，却把屁股露出来了。

吴晗同志写道：“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他自己回答道：“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这篇文章，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十分赞成，“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弄清楚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吴晗同志把《论海瑞》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他这篇文章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这个说法，你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呢？承认也罢，不承认

也罢，都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既然，吴晗同志自己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分析和批评也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一些我们在后面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先说他的“排队”。

照理，既然是在《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的标题下排队，就应该说一说每篇文章的写作目的，那怕是简略地说一说。可是对头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却只写了“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一句话，请问吴晗同志，在那个时候，你不是一再说写历史文章必须“古为今用”吗？不是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吗？而现在，你不是说要“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吗？你这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庐山会议前夕，究竟是怎样“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哪个阶级之用？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哪些“好品德”？对此，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然而，对于第二篇文章，即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的《论海瑞》，吴晗同志却大做起文章来了。他大讲而特讲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呢？吴晗同志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一段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可是，关于这段话，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与他的全文是根本不协调的，完全是外加的。当时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称海瑞”；而《论海瑞》则极力歌颂海瑞，把反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海瑞写成“人民的救星”，并要人们学习海瑞的所谓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反对‘乡愿’”、“不屈服”的精神，这样的货色，竟会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岂不是海外奇谈！其实，《论海瑞》也是一株毒草，这一点，在本文第四节里再来分析。

撒谎，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总是破绽百出的。既然写《论海瑞》的时候是清醒的，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对于紧跟着《论海瑞》、“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这是吴晗同志自己说的，见《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也应该是清醒的，为政治服务的，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了。可是，不行，《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了，找不着辩护的借口。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忽然“糊涂”了，对它的现实意义“一点也没有想”了，忽然“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了！

好吧，就让我们讨论讨论他的所谓“糊涂”、所谓“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

让我们看看，吴晗同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在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他自己说了些什么？

(一) 一九六〇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说：今天的人们要学习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好品德”。

(二)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出单行本时写的序言中说：“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按：指以退田为主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你看，当时吴晗同志自己出来证明，他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对它的现实意义，不是“一点也没有想”，而是曾“多次翻复”地想过。

(三) 《海瑞罢官》一上演，吴晗同志在《北京晚报》上借讨论历史剧之名大肆宣扬这出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目的讲得一清二楚。他说：“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③

(四) 吴晗同志说：“作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戏剧艺术来看，历史剧和故事剧是必须有区别的。”——见吴晗《谈历史剧》。此文发表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据吴晗同志自己说：《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那么，他写这个历史剧，当然是有意识地力求使它成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

(五) 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的《文汇报》，又发表了《再谈历史剧》。他说：“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要使历史上……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请读者注意：吴晗同志是认为历史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见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引者注），特别是我们祖先艰苦朴素，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历史剧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又说：历史剧要“结合当前的实际要求”。这是在《海瑞罢官》上演后，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这些话正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经验之谈和自我表白。

(六) 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了《论历史剧》。他说：正确的历史剧“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七) 一九六一年《戏剧报》第九、十期合刊发表了吴晗同志的答记者问（五月十八日吴晗同志作答）。这篇答记者问，是以如下的导语开头的：“历史家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在这篇答记者问中，吴晗同志大讲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他说：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就是“使观众从中汲取某些经验、教训，好的吸收，不好的引以为戒，达到鼓舞士气、加强斗志，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令人学习、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质”。又说：“谁都会看戏，男女老幼，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都可以从历史剧受到教育。历史剧的作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教育。”这也是吴晗同志写作《海瑞罢官》的自我表白。

(八) 一九五九年底，就在吴晗同志将动手写《海瑞罢官》时，他也明白地说：历史剧必须“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并且承认自己过去“也常常……‘指桑骂槐’。”④

上述种种，都是吴晗同志亲口讲出来，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

不仅吴晗同志自己这么说，就是在《海瑞罢官》上演时，大肆吹捧《海瑞罢官》的吴晗同志的朋友，对这出戏的现实意义，也是很清楚，并且极力设法宣传。他们同吴晗同志称兄道弟，庆贺《海瑞罢官》的出笼，竞相宣传《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繁星说：《海瑞罢官》是“新鲜好戏”，因此“赶戏场、挑座位”，“一面看，一面脑子里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至于脑子里“转个不停”的是什么，不便于“细说”，只好“私下去讨论”⑤。史优（即孟超）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它所塑造的人物“生动感人的出现在舞台上”，“予读者或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⑥。方三也说：《海瑞罢官》“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滋养”⑦。邓允建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现在又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新途径”⑧。

想当年，吴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气得很，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大肆宣扬《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惟恐读者和观众不懂得它的借古讽今的

春秋笔法。而今天，吴晗同志却来了个急转弯。黑墨落在白纸上，斧头也砍不掉。可是吴晗同志竟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抹煞事实，装起糊涂来了，说什么“古为今用”的问题，“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海瑞罢官》没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

吴晗同志咒骂自己“糊涂”，狠狠地指责自己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读者同志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汉人同志不是反对说吴晗同志假装糊涂吗⑨，那么请他就我们所摆的上述事实进行分析和反驳，证明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确是糊涂，确是“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我们的讨论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徒托空言的抽象议论，虽然“其言甚辩”、“其声甚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吴晗同志，你不是说，《海瑞罢官》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论海瑞》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吗？你不是说，写历史、历史剧，写海瑞、《海瑞罢官》，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吗？这是多么正确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所谓“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反而说当时“糊涂”了，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

我们说：这是在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这是因为他心虚胆怯，心中有鬼，心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时汉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那么请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上述种种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毕竟不可以由吴晗同志任意涂抹。历史是无情的。谁如果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终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历史是由个人来写的。但是，个人写下的历史，却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而更改。吴晗同志当然也不能改变已经写下的他自己的历史。历史将向人民作证，谁个忠诚，谁个虚伪，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谁真正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完全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

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今天他之所以对为什么写《海瑞骂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蝉，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下面，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海瑞骂皇帝》⑩单取一个“骂”字。吴晗同志究竟是骂谁呢？

如果是真正研究海瑞上疏的那段历史，就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指出海瑞“骂”皇帝的阶级内容（那怕是分析得不好，甚至有错误呢！）。但是，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却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一字不提，既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揭露地主阶级本身的矛盾，甚至连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情况都没有具体说。通篇只写一个“骂”字，从头“骂”到底。翻来复去强调“骂得痛快”，什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等等。

吴晗同志为了“骂得痛快”，根本改铸了历史，也改铸了海瑞。

海瑞骂皇帝，这句话本身就是歪曲历史的。海瑞向皇帝上的《治安疏》，从本质上说是劝皇帝、爱皇帝、对皇帝的谏诤、批评是有的，并且有些话很尖锐，但实质上还是贯彻一个“忠”字，而不是骂，更不是什么“骂得痛快”。

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正象《治安疏》中所说的，是在于“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因此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疏中对嘉靖皇帝朱厚 cōng gǎi ①有不少批评；但是即使在批评的时候，海瑞的敬爱之心仍跃然纸上。他首先歌颂朱厚 cōng gǎi ①“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说他“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太平指日可期”，“高汉文帝远甚（即比汉文帝高多了）”。继而又替朱厚 cōng gǎi ①辩解，说“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意思是说，皇帝有错不算什

么，圣人也是有过错的，问题在于“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并指责大臣说：“诸臣欺君之罪大矣！”

从头至尾，贯彻在《治安疏》中的是“忠”字。海瑞由于“受国恩厚矣”，而“请执有犯无隐之义”，虽有所犯，但都是逆耳的忠言。这一点，连朱厚 cōng @①也是清楚的。朱厚 cōng @①在看了《治安疏》之后，感情很复杂：初览，“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为感动太息，称有比干之忠。”①②又秘密地对徐阶说：“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视朝。”①③朱厚 cōng @①知道海瑞的忠心，海瑞也深深知道朱家王朝对他的厚意。海瑞后来在追述这段故事时说：“当是之时，即蒙陛下念臣一点赤忱，虽冒出位妄言之罪，实存忠君报国之心，特命左右侍臣传谕刑部及锦衣卫官，毋加重刑，留臣后用。”①③在海瑞死时，万历皇帝朱翊钧赐谥“忠介”，表彰他对朱家王朝的忠贞。

海瑞对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在他听到朱厚 cōng @①死讯时，表现得更为突出。《明史》本传记载：“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即被处死），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皇帝死了），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上距海瑞不远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极力赞叹海瑞这种“忠臣心事”。他说：“噫！到此然后知公真忠，一片心肠，有贯彻千古者！人须于此处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

几百年来，海瑞之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是由于海瑞的“忠臣心事”，是由于海瑞对皇帝的“真忠”，而决不是如吴晗同志所说的由于对皇帝的“真骂”，由于他“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

以熟悉明史著称的吴晗同志，不但把海瑞对地主阶级的忠贞隐瞒了，而且连朱厚 cōng @①死时海瑞哭皇帝的故事也隐瞒了。

吴晗同志在《海瑞骂皇帝》一文中，来了这么一段：“《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然后，他全部引用何乔远的《名山藏》海瑞传的资料。其实不仅《明史》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经过删节，《名山藏》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也是经过删节的。就这一点说，二者没有区

别。不同的是，《名山藏》海瑞传没有海瑞哭皇帝一段。海瑞哭皇帝是海瑞上疏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吴晗同志写历史文章，向来是重于故事情节的，可是他这回却一反其多年习惯，对海瑞哭皇帝这样的“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一九五九年写的《海瑞骂皇帝》上，还是在一九六一年修改出版的《海瑞的故事》上，都只字不提。居心何在，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吴晗同志不过是要借已死的海瑞之口来“骂得痛快”，宣扬抽象的“敢骂”，进行煽动；如果写上海瑞哭皇帝这一节，就会使读者想到海瑞是忠于他自己的阶级的，忠于他自己阶级的领袖的；那样就不能收到吴晗同志所预期的效果了。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不用《明史·海瑞传》的一个原因。

吴晗同志既不用《明史》所录《治安疏》，也不用《治安疏》原文。吴晗同志注明，《海瑞骂皇帝》所述《治安疏》上的话，是根据《名山藏》上的《治安疏》翻译的。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二者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吴晗同志所翻译的文字同《名山藏》所载《治安疏》，牛头不对马嘴，根本对不上茬口。有的是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有的完全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作者任意添加的。例如：吴文：“你比汉文帝怎样？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只讲玄修，……滥给人官做……”这一段和《名山藏》原文大有出入。“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滥给人官做”，这都是原文没有的。

吴文“你要知道玄修无益”这一段，篡改、删削不少。最后一句，《名山藏》原文是：“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尧舜禹汤文武之域，使诸臣亦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吴晗同志则写作“洗数十年君道之误，做些好事才是”，在把《海瑞骂皇帝》编入《海瑞的故事》中时，竟然改作：“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

吴文：“一意玄修，……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主要是修醮，……”这一大段，歪曲得最不象话。《名山藏》原文是：“陛下之误，大端在修醮”，意思是说，“陛下的错误，主要在修醮”，并没有“你的错误太多了”这个意思。“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一句，纯属捏造。《名山藏》上下原文是：“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详审，挠乱政事，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是已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之不当，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误陛下终于不释，诸臣欺君之罪大矣！”海瑞这段话的大意

是讲，臣子们自己有私心，挠乱政事，不合于陛下的意思，遂说陛下自以为是，拒绝谏劝。抓住陛下一两件不恰当的事，臆造陛下所有的事都这样，陷误陛下，臣子们欺君之罪太大了！吴晗同志竟斩头去尾，挖取“是已拒谏”四个字，译成“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这真是“偷天换日”的妙计。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死抱住《名山藏》呢？《丘海二公集》是很容易见到的一本书，这本书上所载海瑞《治安疏》是全文，是第一手资料；《名山藏》所载《治安疏》是据全文摘录的，是第二手资料，但是这本书很不容易找到。向来强调第一手资料的吴晗同志，却偏偏不用第一手资料，而用摘录的第二手资料。他的用意是，以为人们没有见到《名山藏》，会认为那些骂人的话，虽然《丘海二公集》中没有（或者意思不同），《名山藏》上一定是有，一定是那样记载的。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的又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吴晗同志在当时为什么那样大肆宣传他自己绝对忠于史料、历史剧必须“处处有本，字字有据”的真意了。这是要制造一种神话，仿佛凡吴晗同志所写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必怀疑，不要查对，而要绝对地相信。这样，吴晗同志就可以很放手地歪曲历史、走私放毒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骂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历史、经过精心编制的一篇骂人文章。吴晗同志的“运思独苦”之处在于，既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人，又使人觉得似乎是那位已经死了好几百年的海瑞在骂皇帝。

剥开《海瑞骂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海瑞骂皇帝》是通过海瑞之口来骂现在的人。

图穷匕首见。真正骂人，“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应读作“非常之恶毒”）的是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究竟骂谁呢？他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

吴晗同志发表《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当庐山会议前夕。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在疯狂地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恶毒地辱骂我们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来；那时，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中国人民无限热爱的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会议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公开向党进攻，疯狂地辱骂我们党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编造的《海瑞骂皇帝》出笼了。很显然，这篇文章的社会作用，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鼓励牛鬼蛇神骂党“骂得痛快”；鼓励他们大骂而特骂，说“同情”和“支持”他们骂的“到处都是”。《海瑞骂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文章；今天，只要没有偏见，又认真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是不难看出它的反动的政治性的。

旧剧每出大将，要打“急急风”的锣鼓来助威；《海瑞骂皇帝》，就是给要出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将”打“急急风”的锣鼓助威的。——吴晗同志当时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论斗争说来不是重要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促使人们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出来为这个阶级或者为那个阶级说话，如“骨鲠在喉”，非吐出来不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紧跟着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上海出了一出“海瑞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对于这出戏，丁学雷同志分析得好。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正蓬勃发展中，我们大举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海瑞上疏》出现了，真的“在戏上骂”了。《海瑞上疏》的编导者，在吴晗同志《海瑞骂皇帝》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海瑞上疏》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①④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得很好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说，丁学雷同志对于《海瑞上疏》的分析和批评对不对呢？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唱之于前，《海瑞上疏》和之于后，一唱一和，两者如出一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不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是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不是，那就请讲出道理来吧。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吴晗同志也是这样。吴晗同志自己说过：“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的启发作

用”。他在庐山会议前夕，写海瑞就是着眼于海瑞敢于骂的方面对于“人们的启发作用”，即“启发”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骂我们的党和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又着眼于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这个方面来“启发”人了。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他苦心经营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吧。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海瑞罢官》①⑤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就是“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不丧气、不屈服的所谓高尚品德，给今天的所谓“海瑞”们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当然，一出坏戏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作者的用意是多方面的。《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它是当时牛鬼蛇神开始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的反映，它起着鼓吹“单干风”、“翻案风”的作用。从吴晗同志的主要用意来说，从剧本的主要思想来看，从吹捧这出戏的文章来看，《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则是“罢官”。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写道：“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在这里，他把《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已经点得明明白白了。

从戏剧本身来看，吴晗同志是紧紧围绕着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展开的。

《海瑞罢官》是紧接着《海瑞骂皇帝》之后写的。海瑞一出场，就通过郑愉的口说：海瑞“把皇上骂苦了，皇上大怒，要问他斩罪”，“海瑞关在天牢，受尽了刑罚。到皇上驾崩，才被救出狱”。吴晗同志再一次歌颂海瑞的敢于“骂”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

在“骂”的同时，剧本就替“罢官”写了伏笔。乡民丙歌唱海瑞在淳安时的德政，唱词的最后一句点了一下主题：“调官去赢得了百姓心酸。”剧情越向前发展，剧本的主题思想也就更清楚。第五场《母训》中，作者借海瑞母亲的嘴，完全亮明了主题思想：“媳妇啊，你丈夫为官清正，刚直知名，纵然罢官坐牢，

还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这正是他的好处哪。”又对海瑞说：“纵说你有蹉跌被人倾陷，回琼岛饱看那绿水青山。”第七场《求情》中，作者通过徐阶向海瑞替儿子求情，特意虚构了一场海瑞同徐阶的所谓面对面的斗争，以便进一步刻划出一个不怕丢官，丢了官仍不屈服的“英雄”形象：

“徐阶：（唱）得罪了众乡官同心较量，只怕你乌纱帽戴不久长。

海瑞：哼！哼！哈哈，哈哈！乌纱帽吗？海瑞死都不怕，何况区区一顶乌纱帽！喏！喏！（取下乌纱帽）……徐太师，纱帽在此，纱帽在此：海瑞不只做官，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朝旨一下，立刻归田。……（唱）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

“罢官”这个主题思想，“画龙点睛”是点在最后一场《罢官》上。《罢官》是全剧的最高峰。在这一场，吴晗同志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海瑞”身上。《罢官》这最后一场戏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为“海瑞”辩理，说“海瑞”罢官是被人“阴谋倾陷”，气昂昂地唱出“将我罢职理不公”！

第二，对被罢了官的“海瑞”，寄以无限的同情。通过“海瑞”唱出：“海瑞罢官姓名香”；并且在闭幕时，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这是一首出自作者肺腑的诗。千万条相思牵系着作者的心，多么缠绵悱恻的感情？！“万家生佛把香烧”，多么崇敬虔诚的“深情”！“天寒地冻风萧萧”，又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气候啊？！这样的“佳句”，作者不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剧”（剧者，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的阶级斗争也）中去，是写不出来的。

第三，剧本还大叫被罢官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即卷土重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笔。这里喊出了：“海青天回来吧！”

第四，为了突出海瑞罢官之后的不屈精神，作者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被罢了官的海瑞打扮成胜利的英雄，而不致走得“灰溜溜的”。

吴晗同志曾经十分得意地叙述最后一场写作的经过，他说：“故事的收场”，“原来几稿”，“写海瑞便服离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别，从老百姓口中歌唱对海瑞的怀念和惜别情绪；中间插入新任巡抚戴凤翔到任，徐阶和众官员迎接的场面。”海瑞同戴凤翔、徐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在人民愤怒声中戴凤翔、

徐阶仓皇鼠窜，海瑞一行人也就此离去。” ((5)(6)) 编造这个收场，被罢了官的海瑞已经是够威风的了。但是，吴晗同志说，这样收场，还是叫“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没劲头，弄得无法下台”。怎样才能走得不灰溜溜的呢？脑子一转，计上心来：要杀他几个再走；于是，吴晗同志便“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改写成现在的‘罢官’”。有人提意见说，如果“在判刑以后，皇帝又派什么人来特赦，人还是杀不了，会更曲折些。”这不是更有戏吗？不，戏是要服从政治的，所以吴晗同志决不采取。他说：不杀人而走，“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不杀几个人再走，出不了“怨气”，也不能表现“丢了官并不屈服”的所谓“海瑞”精神。

《海瑞罢官》演出时，吴晗同志的朋友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并且一再赞扬剧本的主题思想鲜明。方三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明确”，“我们看到了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的鲜明形象” ①⑥。

《海瑞罢官》的捧场者们还直接点明，最后一场《罢官》是剧本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们绘声绘色地说：“最后一场‘罢官’是戏的高潮，冲突达到饱和点，海瑞坚定地传令处决徐瑛和王朋友，泰然举起官印办移交，徐阶、戴凤翔愕然不知所措。这时幕布徐徐合拢，戏就戛然中止。这个场面形象鲜明，思想鲜明，整个舞台成为一幅动人的画象，而从这幅画象中表现了海瑞的最可贵的品德，总结了剧本的主题。” ①⑦另一位《海瑞罢官》的捧场者则说：“最后一场”，“海瑞举起了大印，他的个人官宦前途完结了，他坚持的正义却胜利了。这个严肃的又愁又喜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它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这种处理手法，作者可算运思独苦” ①⑧。

《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这是铁案如山，吴晗同志是赖不了的。吴晗同志为了突出“罢官”这个主题，还不惜捏造历史。

吴晗同志曾经宣称，“事实没有根据”是不能“叫历史剧”的①⑨。但是，他在《海瑞罢官》中，为了主题思想的需要，却把自己的“理论”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海瑞根本没有杀过徐阶的儿子。替吴晗同志辩护的人说，这是艺术“虚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艺术虚构。艺术虚构不能违反历史真实。即从《海瑞罢官》一剧来看，海瑞是不可能按法杀死徐阶的儿子的。封建法律以严

格区别尊卑等级、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为前提，它公开规定王公官僚贵族犯法须经“八议”^{*}，不与庶人同罪。只有属于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才不受“八议”保护。徐阶属于“八议”之列。按明律规定：“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明律还有“存留养亲”的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罪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②⑩对于徐瑛，是必须按照这两条处理的，因此完全可以免判死刑。在《海瑞罢官》中还说明：徐阶“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如此，当然应按明律“存留养亲”的规定，不判徐瑛死刑。

历史事实是，在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贵族同农民打官司时，封建法律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特权，决不可能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损害地主，更不会杀死一品宰相的儿子。海瑞杀死徐瑛，从史上讲，没有；从封建法律看，不可能。可是吴晗同志为了使海瑞不致走得“灰溜溜的”，杀几个人出出怨气，便下定决心，歪曲历史。

根据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后，确是“灰溜溜的”，“弄得无法下台”。当时吏部批复戴凤翔的疏说：“海瑞志大才疏，宜改两京他秩。”②①海瑞自己也说：“臣气体原弱，从来疾病相仍。古人称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目今疾气交作，血气益虚，……外强中惫，衰弱为甚”，“恩曲赐归田以延残喘”②②。说海瑞是什么“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纯粹为了“主题”需要而捏造出来的。

总之，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吴晗同志是不惜一切手段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思想，那样地不择手段，主题思想表现得那么鲜明，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海瑞罢官》完稿时，还特别声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又煞有介事地议论起《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来了。他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原来

是退田，“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他又唠唠叨叨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写海瑞“罢官”的理由。

请问吴晗同志：

(一)《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你在一九六〇年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海瑞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吗？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又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呢？

(二)既然说主题是除霸，为什么又不厌其烦地诉说写“罢官”的理由呢？这是故弄玄虚。吴晗同志越是掩盖，就越是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知道，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主题思想，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在通常情况下，作者总是力求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表达出来；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作者却一方面要设法使读者懂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掩盖自己的主题思想。《海瑞罢官》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吴晗同志一方面力图向观众宣传自己的主题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剧起作用；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大摆迷魂阵，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一个时期里迷惑一些人，识不破他反社会主义的老底，以便招摇上市。

吴晗同志是很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他在序中，故意恍惚其词，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但是，剧本明明叫《海瑞罢官》，而不是《海瑞除霸》。于是，他编造了一些“理由”，说什么海瑞一生事迹都已有了剧本了，非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罢官”这段事不可。

这是经不起一驳的。除霸只是剧本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主题思想。通过故事情节所宣扬的中心思想，才是主题思想。假如真的是宣扬海瑞什么“除霸”精神，那么，据吴晗同志的研究，海瑞在兴国时确曾除了二霸，判了原兵部尚书的侄子张豹、张魁的刑（按：退职兵部尚书的侄子不在“八议”之列），故事情节也很生动，问题是这次“除霸”，海瑞胜利了，没有“罢官”。写这段故事不行吗？以除霸为主题，这不是好题材吗？不是也就用不着挖空心思，歪曲历史，让海瑞不灰溜溜的吗？不行，因为那是不能实现作者的意图的，不能达到赞美、歌颂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中，对它的主题思想遮遮掩掩，并且制造非写海瑞“罢官”那段故事不可的“理由”，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心里有鬼，表明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经过庐山会议，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官之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服气的，在我们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期间，还有人图翻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庐山会议前夕写了《海瑞骂皇帝》，为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急急风”锣鼓的吴晗同志，又写了《海瑞罢官》。说穿了，《海瑞罢官》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赞美和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鼓吹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居官重整纪纲”，即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之，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样“为活人服务”的。

吴晗同志说，他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不错，是站稳了的；但是，他站稳了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论海瑞》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们分析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再看他的《论海瑞》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容易明白了。

《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据作者自己说，这篇文章写于九月十七日。这时，庐山会议刚结束。在庐山会议上，“自命海瑞”、攻击并辱骂我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被击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先满以为可以胜利；但是，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失败了。就在这时，写过《海瑞骂皇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威的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论海瑞》。吴晗同志现在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的几句话，说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尾巴上那几句话是外加的，与全文思想根本不协调。分析一下他的全文，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论海瑞》写了些什么呢？

除了把地主阶级的海瑞说成是劳动人民的救星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以外，着重地宣传了以下几点：

(一) 继续《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骂”的思想，宣传(比较隐蔽了)所谓敢骂的“海瑞精神”。这里虽然没有用“骂”字(因为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而说海瑞“写信给嘉靖皇帝，提出严厉批评”。但是仍然本着《海瑞骂皇帝》的精神，歪曲海瑞上疏，对《治安疏》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实质一字不提，把《治安疏》中所说的臣下误以为“陛下是已拒谏”，照样歪曲为海瑞骂皇帝“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二)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全面地给海瑞写传记的文章，但是仍然跟《海瑞骂皇帝》一样，对嘉靖死后，海瑞哭皇帝的“动人”故事一字不提，而用“嘉靖帝死后，海瑞被释出狱”一语带过。

(三) 这篇文章大反所谓“乡愿”。如说：“海瑞所反对的乡愿，凡事调停，自居中间，逃避斗争，不肯批评人，遇风转舵，作事圆滑，总留有后路，不肯负责任做好事，也怕坏事沾了边，好比中药里的甘草，什么病都可以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坏不了。”又说：“他(海瑞)一生最恨的人是……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这种人他叫做乡愿，客气一点叫甘草”。后来曲六乙同志捧《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就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嫌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反“乡愿”，让人们学习所谓海瑞的这种反“乡愿”精神呢？

是反对自由主义吗？不是。如果是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有《反对自由主义》的著名文章，为什么不宣传这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思想加以发挥，而要借死人海瑞来说话呢？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党性明确；不可能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乡愿”一词是可以迷惑人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反“乡愿”抽去其阶级内容，把它伪造成超阶级的东西，抛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前提，借死人来宣传“超阶级”的反乡愿，就既可以出“怨气”，又可以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结合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看，结合他的《论海瑞》全文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四) 开始宣传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为人们歌颂、赞扬(虽然不象《海瑞罢官》那么集中，那么明显)。例如，他说：“内外夹攻”，“硬把海瑞赶出了巡抚衙门”；“海瑞罢职了，贼没全擒到，反而丢了官，这是海瑞

所没有预料到的”；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他恨极了，但他“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海瑞“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是“他也还是被一部分人所歌颂的、赞扬的”，“有些青年人仰慕他，以为是当代伟人”。

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隐瞒了海瑞对自己的阶级、对皇帝的忠贞；它所突出的“海瑞”精神，就是超阶级地办“好事”，“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这篇文章里，字面上改成了“严厉批评皇帝”）；反对“乡愿”；罢了官不气馁，不屈服，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歌颂赞扬的大丈夫精神。吴晗同志突出海瑞的这些“好品质”并要我们学习，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并且说“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请问：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党打败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罢了他们的官之后，吴晗同志抛开大是大非的前提，要我们“学习和提倡”所谓“超阶级”的“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屈服的海瑞精神，并且要“充分的发扬”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要人们同情他们，为他们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可能辩解说：我说过“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啊！是的，这话说过；可是“在社会内容上”有什么“原则的不同”呢？吴晗同志没有说；他接着说的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叫做“海瑞”，然而他宣扬的海瑞精神，如前边所说，他是作了规定的。那么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海瑞”，实际上就只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海瑞”了。所谓今天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只能是：历史上的海瑞忠于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巩固现存秩序——封建秩序；吴晗同志的今天的“海瑞”，则是反对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社会主义，恢复旧秩序——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尾巴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完全是外加的，就更加明显了。的确，如吴晗同志自己所说，《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同《论海瑞》一样，《海瑞罢官》里有“骂”，有“罢”，有“反乡愿”（这一点在《海瑞罢官》中也是很突出的）。不过，《论海瑞》比较隐晦；《海瑞罢官》

则十分露骨，并且特别突出地宣扬“失败了再干”，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所谓“海瑞”精神，要人们学习。这是因为政治气候不同的缘故。

吴晗同志硬把《论海瑞》说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样一来，倒是从反面点明了《论海瑞》及《海瑞罢官》等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吴晗同志的一位友人周予同先生，也看出来了。周予同先生说：“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②③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许不大懂得周先生的意思。周先生是说：吴晗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了，他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右倾不右倾之类政治性的问题，只装糊涂，当作纯学术问题就得；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因此，周先生叹息说：吴晗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其实，周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吴晗同志说《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这固然是泄露了“天机”；但是周先生这么一指点，就更进一步泄露了“天机”，而且周先生还以吴晗同志的老朋友的身份证明：吴晗同志是“爽直”的好人，是刚直不阿的“清官”，这岂不是说，吴晗同志本人也就是“海瑞”式的人物了吗（自然是当代“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说，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②④

吴晗同志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我们同他的斗争，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又是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就一目了然。

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呢？

一九五七年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了政治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大办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在生产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时，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条战线上，向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进行挑战。在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进攻面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进行反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乘机在党内煽风点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们自称为海瑞，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咒骂群众的革命干劲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咒骂群众的革命能动精神是主观唯心主义，咒骂我们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狂妄地要我们党立即改正错误。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些骂人的话，是不能公开拿到报纸上来的。要把那些骂人的话发表出来，就需要化装一番。“化装师”，总是会应运而生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场了。吴晗同志的这篇骂人文章，实质上是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灵魂塞到“海瑞”这具僵尸中去，借死人之口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要说的话。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全会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还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诽谤和破坏，但是这只能激起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干劲，只能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加强团结，坚持总路线的光辉旗帜，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全会还特别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全会要求各

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八中全会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②⑤。

在八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领导人发表了文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坚决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开地指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反对总路线的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谬论。

全会之后，党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之下，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毫无疑问，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重大打击。顽固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希望他们能够复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青天大老爷。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退却了；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则歌颂他们是刚直不阿的真汉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把他们塑造成为“胜利的英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续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之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这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

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左’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作“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实质上，这既是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的。

就拿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说，不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而且在思想界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就有人起而应和，按照《海瑞骂皇帝》的精神、题材写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一上演就有那么一些人出来大捧其场。这难道不是在地主资产阶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思想界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吗？如果说不是，那么在当时思想界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又到哪里去找这种斗争、去找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呢？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上演，他的同道又是轰的一声出来为之捧场、为之宣传；在《海瑞罢官》的带动之下，接着又出现了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又是一些人出来写文章叫好、宣传，为它“作护法”。大家都认为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为什么起了带头作用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试问：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还灵不灵呢？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千万不要被晗同志的“巧言善辩”所迷惑，千万不要上当啊！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对于任何东西，必须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分析其阶级实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阶级立场支配人们的行动。吴晗同志由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支配，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他的毒草是非放不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骨鲠在喉”非“把它写出来”不可②⑥。

根据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肯定：

一、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什么“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思想“糊涂”等等，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以古讽今，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二、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三、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吴晗同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时，他就骂；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时，他就歌颂被“罢”而不屈服，并且同时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当我们批判时，他就装糊涂，力图避开政治，企图混过去，并且还来了个“回马枪”，对姚文元等同志进行攻击。由此可见，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 * *

吴晗同志，为吴晗辩护的同志，你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怎么样呢？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你们站出来把你们的反对理由摆一摆吧，你们把我们驳倒了，我们自认晦气；如果不说话，那可对你们不利，社会舆论就会以为你们默认了，没有道理可说了。

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不管是何等牛鬼蛇神，不管是披上大红袍的“青天大老爷”，是化装为美女的谢瑶环，还是面目狰狞的厉鬼李慧娘……决吓不倒革命的人民，也骗不了革命的人民。

历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已。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行看云雨过去，旭日当空，人民的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提要：《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关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 * *

我们研究了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同意思想同志对它的评价：这是一个挑战。^①

你们批评我的《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文章么？我的这出戏和有关文章，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后写的！是响应这个会议的“伟大的号召”写的！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

这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性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一件好事。

没有这个挑战，我们有些同志还在那里天真烂漫地抱怨：为什么要把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扯到政治上去呀，这样岂不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呀，如此等等，纠缠不清。有了这个挑战，这些同志就可以好好地想一想了，吴晗同志无论在他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在他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

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问题的，我们这些同志怎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关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劝读者认真地看看吴晗同志的所谓“自我批评”。读读这样的文章，是很能帮助我们把塞了的鼻子开通起来，增长对世事的见识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

这篇文章的奇特处在哪儿呢？

奇就奇在自称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却硬要把自己写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说成是响应党的“伟大的号召”的作品；奇就奇在分明是为那种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同党斗争、遭到失败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党反人民的“英雄”唱颂歌，却硬要把这说成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事物的逻辑走向吴晗同志愿望的反面。吴晗同志从政治上提出新的挑战，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问题的政治本质。最近发表的戚本禹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反动政治本质，作了透辟的分析，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吴晗同志在他的挑战中从政治上提出了几条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们把它一一剥开来看一看。

(一)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一条理由是，他在《论海瑞》这篇文章中，明明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在《论海瑞》这篇文章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是有过几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宣传、一种思想的实质，不能仅仅根据个别的词句。如果把《论海瑞》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词句，放到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中加以考察，把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放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加以考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这些词句，是游离于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主旨以外的附加的东西，是同他的全部宣传主

旨格格不入并且以后不再被提起的东西。现在吴晗同志煞有介事地把这些根本不
是他的本意的词句，强调地提了出来，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读者而已。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宣传，开始于《海瑞骂皇帝》，归结到《海瑞罢官》。
《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那是什么时候？正是庐山会议前
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常活跃，大放厥词，在各个角落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咒骂的时候。在
这个时候，吴晗同志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把忠于皇帝
的封建官吏海瑞，打扮成“站在人民方面”而反对皇帝的“反对派”，把海瑞为
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向皇帝直言进谏的举动，说成是为人民利益着想，
代人民群众说话，当面“骂”皇帝的革命行为。这种描写，同历史上的海瑞风马
牛不相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则只能是为了给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
党反人民的“反对派”树立一个“榜样”，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精神力量”，假
冒海瑞，去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击败了，他们假冒海瑞、假冒人
民代言人的政治面貌被揭露了，他们的头目被撤了职、“罢”了“官”了。但是，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改悔，而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果然，没有过多久，
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
和封建势力相呼应，配合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联合反华，向
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历时经年，修改七次，在一九六〇年
十一月写成，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发表与演出。这个剧本的主题是什么呢？吴
晗同志力辩，剧本的主题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企图用这种纠缠来转移人们的视
线。其实，退田也好，除霸也好，都是它的情节；所有这些情节，又都归结到一
点——就是在剧本的题目上点明了的“罢官”。一个“退田”、“除霸”、“要
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救星”被“罢”了“官”，一个“站在人民方面”、
“为民请命”、同当道“强暴”作无畏斗争的“英雄”被“罢”了“官”，这就
是吴晗同志竭力想要向读者和观众说明的主题思想。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描写吗？
对历史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作这样荒谬绝伦的美化是可以设想的吗？不，
这是借古人的衣冠来改扮活人的躯体，是借历史的题材来抒发对现实的愤懑，是

借舞台的阵地来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惋惜和平。不。

一“骂”一“罢”。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前公开给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敲边鼓，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公开给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士气。这就是吴晗同志几年来有关海瑞的全部宣传的现实政治含义。这就是这种宣传同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真实政治关系。

所以，《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通过“罢官”，吴晗同志力图把他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的高大艺术形象。他把“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人民疾苦的代言人”的政治头衔安放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烂泥、污秽涂抹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同情倾注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谴责、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政治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决绝、失望的情感宣泄在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限愤慨地说：“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②请看，这里表达的，已经完全不是什么对一时一事的不满，而是希望通过“英雄”被“罢官”的描写，对“这年头”、这世道，也就是从总体上、从根本上对党和党所领导的当前这个革命时代，提出谴责。这就是《海瑞罢官》力图向人们宣传，并且力图唤起某种人的共鸣的极其阴暗、极其反动的政治感情。

宣传“退田”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同“罢官”相比，“退田”是居于从属地位的。“退田”是被罢了官的“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罢官”的描写所表达的政治感情，则是一种更深、更广的政治概括。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根本不触及《海瑞罢官》的这个现实政治含义，极力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反而要把它打扮成“响应庐山会议号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作品，这算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批评”呢？

（二）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二条理由是，他的关于海瑞的宣传文字，“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〇年以前写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讲，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写成的《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年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沾不着边，“把剧本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那是别人的事。

吴晗同志是历史学家。他以一个史学教授的姿态跑来教导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要把它割成一个一个碎片，当作一件一件没有来由、没有历史、没有发生发展过程的孤立的事情，然后他再耍一通年代考证的花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真实的历史联系掩盖起来，这不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史学的骗人方法么？

可是，藏了头来又露尾。吴晗同志竭力想把《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翻案风”的联系隐藏起来，却没想到，反而把它同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联系暴露了出来。抓住了这个要害就使我们对《海瑞罢官》同“翻案风”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刻、更清楚的理解。

什么是“翻案风”？“翻案风”首先是一些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一切历史过程都是在对立的斗争中前进的。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就会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失败，就会有一部分不肯悔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不甘心失败，力图挽救他们的失败。吴晗同志要求人们学习他的海瑞“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赞扬他的海瑞“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精神，盼望他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在一些人那里，翻案的意图是伴随定案而俱来的，是在定案以后就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是一种隐伏的潜流，或者只有零星的发动。什么时候能够刮起一阵“翻案风”，那是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综合的。要理解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翻案风”，首先要把它看作是对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一种反动，看作是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就已经存在的潜流在新的条件下的涌出和发展。把《海瑞罢官》的写作、发表、演出和出版，摆在这样的历史联系中一看，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不就很清楚了吗？“写成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云云，又能为吴晗同志作怎样的辩解呢？

至于鼓吹“单干”“退田”，作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反人民“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由来已久的事情。集

体化，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它的对立物的单干，是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十几年来，有过几番起伏。冒充农民“救星”，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反对合作化（一九五八年以后是反对公社化），是历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惯用方法。这些并不是一九六一年以后的新发明，吴晗同志怎么能够装糊涂，说他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都概不知晓呢？

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文艺作品究竟怎样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新闻报道记录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它的出现只能在事件发生以后。文艺作品反映阶级动向和社会思潮，是以全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为背景的，它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同于对具体事件的新闻记录的。文艺是阶级的敏锐的感觉器官，它能察觉社会生活中潜流的激荡，能感应酝酿中的变动的来临。文艺是阶级的喉舌，它把阶级的心声呼喊出来，不仅是阶级变动的回响，而且往往是阶级变动的先声和伴唱。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风信鸡，它能指示风向，当风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革命的文艺是这样，反动的文艺也是这样。请看看我们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历史，几乎每一次资产阶级进攻的风浪，都是首先从文艺方面显出征兆，发出信号，并且有文艺来推波助澜。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文艺界右派的“电影的锣鼓”敲起在年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三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进攻，高潮在庐山会议上；《海瑞骂皇帝》发表在会议的前夕。最近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六一、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写成、演出和发表在一九六〇年末或一九六一年的年初和年中。这样一个时间表，不是清楚地说明了文艺敏锐地、能动地反映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吗？

所以，一方面在舞台上为被罢了官的“英雄”唱颂歌，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一阵“翻案风”；一方面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要“退田”，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刮起一阵“单干风”——这样两个方面的现象，大约同时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互相呼应，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彼此无关的事情。它们同是我国阶级斗争历史发展和当前变动的产物，同受一个阶级斗争起伏规律的支配，从社会思潮来说，前者是能动地反映后者，并且为后者服务的。

(三)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三条理由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这里，吴晗同志调转了笔锋，拣起了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可是，这块破烂的盾牌，又怎能帮助吴晗同志把问题的要害掩护起来呢？

而且，我们记得，在写作和演出《海瑞罢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的腔调跟现是很不相同的。

就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序和前言里，吴晗同志明明白白地交代，他是反复考虑了剧本主题的“现实意义”，并且认为他写的海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③。

当《海瑞罢官》开始上演，一些人称兄道弟地为他捧场的时候，吴晗同志踌躇满志，在答谢别人祝贺的公开信里，又清清楚楚地声明，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④。

在谈历史剧的一系列文章里，吴晗同志也一再宣传，“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过去的某些时代精神有助于今天的需要”⑤，要“把死史料运用为活史料，密切结合当前需要”，“古为今用”⑥。

在关于学习历史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里，吴晗同志更是反复地讲解：“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取得过去时代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⑦；“不是脱离政治的科学，而是政治性很强的科学”；“不是为死人服务，而是为活人服务，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⑧。

吴晗同志还特别公开宣告过自己写文章的主张：“目的性要清楚”，“要有有所为而作”，“无所‘为’的文章，尽管文理通顺，语气连贯，但是内容空洞，只能归入废话一栏，以不写为好”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请看，这些话说得何等斩钉截铁！那里是“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古为今用的原则”！那里有丝毫“目的性不清楚”！又那里有片刻“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曾几何时，吴晗同志变了一副面孔。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是时势不同了。

在当时，吴晗同志认为气候适宜，所以当他用“古”为反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时候，他是那样热心地宣传“古为今用”，生怕有些人不懂得它的现实用意；而到了今天，当这种现实政治的反社会主义实质被揭穿并且受到批判的时候，他觉得气候不对了，所以赶忙装出一副糊涂样子，说什么那时候他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生怕人们捉住它的现实用意，击中它的政治要害。可是，当日的吴晗同志在反驳今日的吴晗同志。我们究竟相信那一个吴晗同志才是呢？在百家争鸣中，我们欢迎严肃的自我批评，我们也欢迎严肃的自我辩护和反批评。可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谎言呢？

世界上从来没有为文艺的文艺、为学术的学术。文艺和学术总是从属于政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政治，所以，无产阶级的文艺和学术，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目的。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为极少数人服务而反对绝大多数人的，所以，为这种政治服务的文艺和学术，往往要向人们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尤其是这样。思想战线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当你听到有人高谈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等等的时候，你必须当心，这里面有鬼。吴晗同志“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的辩词，又一次印证了人们的这一条政治经验。

（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四条理由，他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 中，体现在人们的言论和行动中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来考验的。请问吴晗同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你写出和发表了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的宣传文字，这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现在，你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但不从政治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它说成是响应党的号召的作品，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还有，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在学术界，你打出一面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向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学术文化革命猖狂反扑，妄图扭转社会主义学术文化革命的车轮，使之走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学术文化复辟的道路，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

吴晗同志很以他的“二十多年”自诩。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评论吴晗同志二十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我们只想指出，二十多年来，革命在前进，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一步一步地深入。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革命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发生重新分化和改组，这是革命深入的必然结果。能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不断改造自己，跟上革命的步伐，这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其严肃的问题。革命历史不能给任何人在政治上打包票，这只能取决于人们在革命进程中不断自我改造的自觉、决心与实践。没有思想改造的自觉，那么，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就一定要反映出来，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在阶级斗争的这个关头或者那个关头同党、同社会主义、同革命的新发展发生深刻的冲突。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路程的这个站口或者那个站口同党分手，甚至走到同党对抗的方面，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昔日的左翼变成今日的右翼，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资产阶级特别希望寻找这样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曾经是左翼，有政治资本和群众影响，能够起老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挂着左翼的招牌，实际上成了右翼拥戴的新首领，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充当了急先锋。

斯大林同志说过：“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全集第三卷第三七〇页）

彻底放下架子，向革命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从政治立场、世界观到感情深处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这是一切不愿意被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去的人们应当选择的唯一道路。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克的文章：《海瑞的骂与哭》

提要：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吴晗同志曾写过一篇《海瑞骂皇帝》，他说：“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至于骂皇帝，那是没有听说过的。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

是海瑞。”查《明史·海瑞传》的记载，其中并没有说他骂过皇帝，却说他哭皇帝，“终夜不绝声”。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地篡改历史呢？这里包藏着极其恶毒的政治阴谋。说穿了，就是借海瑞“骂”皇帝之名，来骂党、骂社会主义。为了彻底揭穿吴晗同志这一卑劣伎俩，让我们把历史事实摆一摆。

吴晗同志说海瑞“骂”过皇帝，其根据是海瑞上嘉靖的《治安疏》，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一下《治安疏》的内容。从“治安”二字便可以知道他上疏的目的。海瑞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就是认为要维持封建统治的百年大计，必须从两方面努力，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君，一是执行政策的臣，君要正君道，臣要尽臣职。在《治安疏》里，他要求皇帝正君道时，先对嘉靖吹捧一番，说嘉靖“天质英断，睿识绝人”，上之可以赶上尧、舜、禹、汤、文、武，下之亦可以超越汉光武、唐太宗等。同时又指出嘉靖的许多缺点，说“陛下之误多矣”，如“赋役增常”，“礼佛日甚”，“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又引老百姓的话，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云云。吴晗同志认为这是“海瑞骂皇帝最厉害的几句话”，从中得出了“海瑞骂皇帝”的结论。

海瑞为什么要上“治安疏”？据他说，是“受国恩厚矣”，所以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他为了维护明朝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惜“冒死”进言。因此，有人说海瑞的“治安疏”是爱皇帝，并没有骂皇帝。当然，要说海瑞没有骂过几句，也不尽然，甚至有几句却乎骂得很厉害。但这种“骂正”是出于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所以嘉靖处罚海瑞时，下的命令说海瑞“置主毁君，不臣悖道”（《世宗嘉靖实录》卷五五五），把他关进监狱，拟处以死刑。然而，他背地里却夸奖海瑞，把他比作殷朝的大忠臣比干。

海瑞上《治安疏》完全出于“忠君报国之心”，目的是维护朱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明朝皇帝深切了解海瑞的心情，认为他的动机是好的，主观是真诚的。所以明朝皇帝并没有辜负海瑞的“忠心”、“赤忱”，重用他为应天巡抚。当时地主阶级文人，对于海瑞的忠诚也是一致地赞扬不已。在封建时代，每个朝代都有极言敢谏之臣，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巩固他们的阶级利益。对皇帝上《治安疏》，痛论当时天下大事，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海瑞

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而吴晗同志竟把海瑞对其主子的效忠表现，颠倒过来说成是“骂”皇帝，岂不荒谬。

至于海瑞是怎样哭皇帝的呢？海瑞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忠心耿耿向嘉靖上疏，嘉靖反而把他关进监狱。按常理说，海瑞对于嘉靖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至少是受了委屈的。当狱吏告诉他，嘉靖已死，他即将被释放并有希望被重用时，按一般封建官吏来说，他是应该感到高兴的。然而，海瑞却并没有高兴喜悦，反而伤心痛哭。这该如何解释呢？根据海瑞生平的言论和行动，海瑞对明朝统治阶级抱着无限忠诚，对嘉靖寄予极大希望。他的信念是对他的封建皇朝及皇帝尽忠，虽死而无怨。他坚决维护封建阶级利益，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出狱而高兴。嘉靖虽然处罚过他，但他认为嘉靖一死，可能影响统治者的政权，可能使稳定的政局动荡不安，如再出一个象明武宗正德（嘉靖的哥哥，死后无子，嘉靖以藩王入京继位）那样昏乱的皇帝，则更将动摇朱明王朝的国本。所以海瑞之哭，是为他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及封建王朝的兴衰而哭。这就更证明了海瑞是封建王朝中最忠实的奴才。我们评论海瑞，对他哭皇帝这一幕应该特别重视，仔细分析。海瑞所表现的特殊面貌，确是古代封建社会中所称道的所谓“忠臣孝子”的坚韧精神，这完全可以说说明海瑞是个什么人。

海瑞的面貌和本质表现得如此清楚。海瑞从他的阶级情感出发，从他的封建道德出发，他对嘉靖的忠诚爱戴，对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持，是始终如一的。所以他的“骂”与爱是一致的，“骂”与哭也是一致的。

吴晗同志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并不注意海瑞是不是骂，而只取敢骂不敢骂。他说只有海瑞骂过皇帝，并且骂得很痛快。意思说谁也不敢骂皇帝，而海瑞敢了，因此赞扬海瑞“真是铮铮一汉子”。吴晗同志这样提法，这样拍手称快，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历史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以明史“专家”著称的吴晗同志心里也是明白的。那末，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肆意篡改历史呢？这是偶然的错误吗？不！只要提一提吴晗同志写作、发表《海瑞骂皇帝》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其用意就暴露了。在吴晗同志大肆歌颂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国面临暂时困难的时机，配合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向党和人民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骂党、骂社会主义、骂三面红旗。吴晗同

志也大写文章，鼓吹“骂”，宣扬海瑞对皇帝“骂得非常之痛快”。吴晗同志的文章，实际上是为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出：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全心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戏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吴晗同志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助威、鼓气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个期间，吴晗同志宣扬所谓“海瑞”精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姚文元同志对他的政治批评，说他的《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〇年，跟“单干风”无关。然而弄巧反拙，本想掩护耳朵，却露出了屁股。吴晗同志把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跟一九五九年八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联系了起来；这一下子泄露了“天机”。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自称海瑞，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庐山会议之后，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歪曲海瑞上疏，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之后，又煞费苦心地花了一年的时间，歪曲历史写了《海瑞罢官》。吴晗同志自己说：历史和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而是为活人服务；怎么为活人服务？答曰：“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是的，在庐山会议之前，吴晗同志着眼于海瑞的，是骂皇帝；其意图就是给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擂鼓助威，好比旧戏出“大将”

以前乐队奏的“急急风”。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着眼于海瑞的，是“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不灰溜溜的；很显然，这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鼓干劲，要他们“失败了再干”，而且还盼望着“海瑞”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见《海瑞罢官》剧本）哩！

（关锋：《此地无银三百两！》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

用“为民请命”替右倾机会主义者涂脂抹粉

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〇年，我国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经济上出现了暂时的困难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大活跃起来，他们完全撇开客观的因素，幸灾乐祸地诅咒领导群众运动的党。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六月十六日，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海瑞骂皇帝》，借古讽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势相配合。他在这篇文章中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又说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吴晗同志说这些话是为了什么呢？难道能说不是借古骂今吗，难道能说不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反党活动拍手称快，为他们撑腰打气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领导群众运动的党，却打着“为民请命”、捍卫农民利益的幌子，以农民利益的“保护者”自居，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救星”。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剥下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披着的这层“为民请命”的画皮，使他们的反党面目暴露无遗。这时吴晗同志又情急了，就赶紧在《论海瑞》《海瑞罢官》中大作文章，虚构了一个海瑞的高大形象，美化所谓“为民请命”的“英雄”。他说海瑞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他的“作为是对农民，特别对贫农、中农是有利的”；他为了农民的利益，“勇敢地把全生命投入战斗”。吴晗同志对海瑞的这种精心刻划，无非是想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穿上海瑞的服装，借海瑞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涂脂抹粉，并鼓动人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喝采。

（马泽民、王锐生：《“海瑞”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给右倾机会主义者提供的标本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竭力炫耀《论海瑞》这篇文章，说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为什么吴晗同志要在关于《海瑞罢官》

的自我批评中抬出《论海瑞》这篇文章来炫耀？那是因为，他说他的《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既然我吴晗写《论海瑞》的动机不坏，写《海瑞罢官》的动机当然也是不坏的。

那末，且看《论海瑞》中着重渲染和宣扬的又是些什么东西：

海瑞是“不怕大官，敢顶大官的小官，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的小官”；他“卵翼穷民”，“站在农民一边”，“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海瑞“是大丈夫，是古往今来一个真男子”；他痛心“现在医国的只一味甘草，处世的只两字乡愿”；

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民穷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为第一之害”；

海瑞“意主于利民”，“为百姓痛哭”，“为百姓长太息”；

海瑞“痛斥当时的社会风气”，“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全生命投入战斗”；他“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他“是当代伟人”。

我们要问吴晗同志：今天全国人民早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的主人，你号召学习海瑞“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究竟要向谁去说话呢？你号召学习海瑞做“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究竟哪些人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的人”呢？你号召学习海瑞“把全生命投入战斗”，不怕坐牢丢官，究竟是要叫谁不怕坐牢丢官而去向谁战斗？很明显，吴晗同志写《论海瑞》的真正意图是在于借海瑞的躯壳，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很显然，《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及其“为了活人服务”的目的是一样的。同样是浸透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情绪，表露了他的阴暗心理；同样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气，为他们唱赞歌。

（吴文治：《不能用这样的自我批评回避政治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

鼓励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精神”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我党向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会后不久，吴晗同志发表了《论海瑞》，大谈海瑞的“为民做主”的思想，大力赞扬“敢顶大官的小官，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的小官”，大谈“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且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吴晗同志所提倡的海瑞精神，在当时的确起了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赞扬和鼓励的作用。

紧接着，在一九五九年他又“破门而出”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什么要“破门而出”呢？这是因为吴晗同志看到了“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所以要占有舞台阵地使古人的“好品德”“深入人心”（见吴晗《再谈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产生，绝不是吴晗同志自己所说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这期间，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被人民识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被罢了“官”的时候。在吴晗同志看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由于“为民请命”而罢了“官”的，所以同情他们，为他们鸣不平，而且还鼓励他们“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希望右倾机会主义者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

（卢文辉、王悦：《吴晗同志为谁请命》，见《辽宁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

反动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住的

吴晗同志把他有关文章的写作时间介绍了一下，认为《论海瑞》写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后，是响应党的号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又说所有的文章“都是一九六〇年以前写的”，表明他的《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无关。

就以吴晗同志介绍的写作时间来说，也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是，除了《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前以外，还有《海瑞的故事》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观察》；《清官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日报》。这三篇歌颂海瑞的文章都写于八届八中全会之前，显然不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而《论海瑞》是在上述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其政治观点、历史观点跟上述三篇文章完全一致，那么请问：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为什么突然变成反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国内的阶级敌人以为有机可乘，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极力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几年中，吴晗同志写文章、编剧本，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海瑞，而且又是狂热地鼓吹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狂热地鼓吹海瑞的“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这不是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张目吗？不是为失败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鼓气吗？事实就是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了的。

（黄祖良 林铁民 蔡景康：《反动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住的》，见《福建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招魂

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塑造的“英雄”形象

当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一败涂地的时候，吴晗同志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要他们罢了官，也“心胸开朗”，说什么“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海瑞罢官》的前几稿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发泄了。他对党和人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极为不满，认为他们是“好官”，为他们的“罢官”喊冤叫屈，打“抱不平”。《海瑞罢官》不但是为被人民所唾弃而“罢官”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而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等待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也就是要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到底。“海瑞”实实在在是一个顽固到底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英雄”形象。

所谓“退田”、“除霸”、“罢官”，在现实生活里，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其核心在于“罢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叫嚷的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就是要“退田”。他们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把我们的伟大事业和我们的干部队伍说成“黑漆一团”，因此叫嚣“除霸”，“除害先除当道狼”，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英雄”的“退田”和“除霸”的进攻失败了，被撤职了，但还妄想卷土重来，这就是“罢官”的真谛。事实很清楚，吴晗同志正是接过右倾机会主义手里的武器，再把它磨光擦亮，用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这就是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贯穿的一条黑线。吴晗同志现在打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幌子，不是欲盖弥彰吗？

历史对于一切不愿意投身革命潮流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人，总是无情的。吴晗同志从民主革命时期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的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所以当他的未曾彻底改造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越来越同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矛盾的时候，在一次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就站到了反对社会主义、进攻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一方面，同右倾机会主义“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同地富反坏分子“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澄字：《（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见《北京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

为“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鸣不平

吴晗同志为了掩饰他的动机，竭力把动机和效果分开。他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列了一个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时间表；对这种用意，我们是能懂得的，那是在用写作时间和主题等等，竭力辩白《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不看文章的写作时间还罢，一看文章的写作时间，真相就大白于天下，恰好暴露了吴晗同志写作的政治动机。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庐山会议前夕，这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污蔑三面红旗，辱骂群众运动。而正当这时，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极力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气和胆量。试问，选择这一个时间，写这样的文章，岂不是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紧紧相呼应吗？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反击，他们的反党面目暴露无遗，完全陷于孤立。这时候，吴晗同志就迫不及待地赶写了《论海瑞》，竭力宣传“为民请命”和抽象的“傲骨精神”，据他说这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但在我们看来，事情决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其用意明明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同党同人民对抗到底。一九五九年年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吴晗同志又于此时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动笔赶写《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主题，据吴晗同志说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剧本的主题是“罢官”，是对那些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反党反人民的

“英雄”，寄予了无限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出主意。要他们象海瑞那样，罢了官，也决不善罢甘休，也不能走得灰溜溜的。

这样一个写作时间表，这些文章和剧本的这种主题思想，说明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吴晗同志是在用海瑞的幽灵，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一切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表同情，抱冤屈，鸣不平，出谋划策，撑腰打气。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破门而出，支持“不怕丢官”的“英雄”

吴晗同志一九五九年发表《海瑞骂皇帝》，有的人还为它大加吹捧，大书特书。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遭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攻击党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一九五九年六月，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中央发动猖狂进攻，反对总路线，辱骂群众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歌颂海瑞谩骂皇帝的“大无畏”精神，说海瑞“骂”嘉靖“家家穷得干干净净，没有钱用”，是“骂得非常痛快”，这难道会是偶然巧合，不是有所为而发的吗？一九五九年年底，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彻底失败，有些人被罢了官免了职的时候，吴晗同志又不惜“破门而出”，赶写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描绘成一个“为民请命”“不怕丢官”的英雄。这一切不正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吗？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别的解释呢？

（王希曾、杨寿堪：《为什么要歌颂（海瑞骂皇帝）？》见《北京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

鼓吹右倾机会主义者卷土重来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着暂时的困难。这时候，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演出反华大合唱。在国内，一小撮牛鬼蛇神正在蠢蠢而动，掀起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出“为人民利益”的幌子，披

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攻击三面红旗。他们的进攻，遭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击。

不迟不早，吴晗同志在这时写出了《海瑞罢官》。并在《海瑞罢官》的序里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确，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把一个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忠仆，美化、歌颂为一个“站在农民一边”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因而被“罢”了官的英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文里，介绍写《海瑞罢官》的体会时说“写这个人，演这个人……不是为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为什么样的活人服务？说穿了就是替当时假冒代表农民利益、叫嚣要“单干”、“平反冤狱”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卷土重来。吴晗同志通过对海瑞的美化、歌颂，寄托了自己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情，发泄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刻不满。从《海瑞罢官》演出和出版后的社会效果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中，假借海瑞之名，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说：它是一株大毒草！

（杨光楣：《（海瑞罢官）究竟在宣扬什么？》见《云南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为“单干”、“翻案”煽风点火 大肆叫嚣“退田”、“平冤狱”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不仅不承认《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反而说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事实不容抵赖。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间，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国际上，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出来反对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接着，社会上又吹起了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主张把公社的土地分给个人，实行“包产到户”，要求给地富反坏平反“冤狱”。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拿起文艺的武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思想。吴晗同志不

仅没有这样做，相反倒“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来火上加油。我们的人民振臂高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海瑞罢官》所表现的却是：清官、王法、封建主义万岁！（洪阿兰：“青天大老爷为民雪恨，公侯万代”。）通过海瑞的口大唱：“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作者并把海瑞描写成了一个专门搞“退田”“平反冤狱”的“为民请命”的“不怕死”的“英雄”，百般颂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农民群众早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敌人，报了仇、伸了冤，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海瑞罢官》中的这样一些描写，究竟是在替谁说话、为谁服务、对谁有利，不是很清楚吗？

（李衍柱：《布历史的迷雾，唱时代的反调》，见《文艺报》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煽动牛鬼蛇神兴风作浪

从解放初期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年间，吴晗同志在历次思想斗争中都异常沉默，甚至连批判胡适思想这样同他有特殊关系的斗争，都没有发言。但是，从一九五九年起，吴晗同志却突然开始活跃起来，“大写特写”。他从《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一直到“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三年间就写了大小文章将近一百五十篇。是什么使吴晗同志这么“难受”，“非写不可”？他又写了些什么呢？他着重描写的是：“乡官强暴百姓穷，如狼似虎田野空”，“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接着，他从封建文化的武库里捡起了一件破烂法宝，祭将起来。这就是“为民作主”，鼓励人们“告状”。《海瑞罢官》，就是吴晗同志宣扬“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的宣言书。吴晗同志的文章，是助长当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掀起“翻案风”的一把火。事实正是这样。在《海瑞罢官》剧本发表后，上海有个特务的家属，就递了一份要求“平冤狱”的“状纸”，上面公然写道：“在现世除非海瑞重生，方能超雪，否则就此埋送。”这不就是吴晗同志的新“告状”论的现实政治意义么？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我们的这些分析，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观点说得更清楚些，究竟该怎样理解这种“新”理论。

（罗思鼎：《论“告状”》，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

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大写“退田”，宣传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把它作为一种农民的天堂、理想生活来宣扬，这是什么意思呢？且不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剥削阶级自动把田“退”给农民的事情，而农民就是有了土地，就真能过好日子吗？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破天荒地做了土地的主人。但是，如果广大农民仅仅停留在分得土地，而不进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走集体化、人民公社的道路，我国广大农民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而且保持小农私有经济还会有利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卷土重来。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鼓吹什么农民有了土地就有美好光景，那就决不是在为农民说话，恰恰是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为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妄想服务。而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出现单干风的情况下鼓吹这种主张，那就更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徐公持、周铜：《（海瑞罢官）散布了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见《工人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

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们国家里，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吴晗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破门而出”，不但通过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且通过杂文、学术论文、历史故事等等，突出地歌颂海瑞的所谓“好品德”和“斗争精神”；正是在这个时候突出地宣扬封建道德，要把封建道德“古为今用”，“移用在今天”、“应用于今天”；正是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反对“是今非古”（《灯下集》六五页）；正是在这个时候“骨鲠在喉”（《学习集》二七三页），非“把它写出来”不可，等等。所有这些是偶然的吗？不，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吴晗同志的“破门而出”，“坚持到底”，关键就在这里。

所有这些，是目的性“不清楚”的“糊涂”在作怪吗？是“为古而古”在作怪吗？当然不是。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创作这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张目，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

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同上）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吴传启：《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为了什么？》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

妄想拆社会主义的台，走资本主义道路

吴晗同志竭力使人相信：《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的话，也只是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这是十足的自欺欺人的话！那些站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他们虽也在学术领域内做文章，而干的却是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当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这是他从史学领域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而至于更加明目张胆地，扩大阵地，煽风点火，要拆社会主义的台。试问吴晗同志：在阶级斗争大反复的那几年内，你这样狂热，搞出这样一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难道是学术问题？能说不是政治问题？

吴晗同志说，他“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这完全是假话。从吴晗同志这些年的一贯活动看，他不但没有脱离政治，没有脱离现实，而且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嗅觉的、很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搞的是资产阶级政治，而不是无产阶级政治。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一年左右，国际上出现了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千方百计地美化美帝国主义，说什么美国垄断集团，也有“明智”派呀，宣扬“三和”投降路线；在国内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乘机蠢动，他们趁我们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在经济上受到了暂时的困难，企图复辟倒算。吴晗同志正是选择这个时机，有计划、有目的地大写而特写海瑞，大讲而特讲海瑞，说什么海瑞是大“清官”，应当肯定，应当歌颂啊，什么海瑞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啊，什么海瑞是人民心目中的“好官”啊，是值得研究与学习啊，这究竟适应什么人的需要，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绝对不能上吴晗同志阶级调和论的当，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把他“借古讽今”反社会主义的面貌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海瑞罢官》决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它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吴晗同志是希望我们工人阶级能跟着海瑞跑，替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失去了自由的地富反坏分子摇旗呐喊。

既然吴晗同志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为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向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发动进攻，那末，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工人同志应该予以坚决的、有力的回击。

（陈阿发：《只是学术上的错误吗？》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几个月来，学术界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令人特别兴奋的是，广大工农兵群众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斗争。最近，很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议论，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他们说，这场大论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不能不管，不能不问，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阶级斗争，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赢得这场大论战的彻底胜利。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使这场大论战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创举。在旧社会里，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术论坛完全是被一小撮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所垄断的，他们搞学术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农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参加学术工作的可能。人们一提起学术，一提起理论，总认为这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情。我国人民革命胜利了，工农大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做了主人，也要做文化的主人。剥削阶级垄断文化学术的丧钟敲响

了。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工农兵群众直接登上学术论坛的时代也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事实证明，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强大武器，不仅能够用它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且能够用它参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一切革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知识分子，却感到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快要完蛋了，于是制造种种借口反对工农兵参加学术批判。他们摆出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说什么，“不读完二十四史，就没有资格评价历史人物。”说什么，“工农兵不懂历史！”在他们看来，工农兵群众没有资格在学术问题上发言。

工农兵群众对这种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他们说，我们虽然没有读过地主阶级写的二十四史，但是，我们有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自己革命斗争的实践，我们有自己的“四史”——家史、村史、厂史、社史。有了这些，我们就能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一切骗人的谬论彻底驳倒。

完全正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最强大武器，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四史”是驳斥剥削阶级邪说的有力根据。

说“工农兵不懂历史”。我们倒要问问，究竟什么是历史？究竟是谁不懂历史？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①地主阶级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历史，歪曲阶级斗争的真相，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完全抹杀劳动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一味歌颂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完全被颠倒了。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即使能把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也不能算懂得历史。

什么人才真正懂得历史呢？不是那些把二十四史奉为金科玉律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史学家们，而是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革命干部。

工人，贫农下中农，他们记得自己的悲惨的家史，他们熟悉自己的村史、厂史。在这些历史里，有剥削，有反剥削，有压迫，有反压迫，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曾经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才最懂得阶级斗争的历史。

工农兵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所以他们嗅觉灵敏，眼光锐利，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分得最

清，看得最明。本刊这一期发表的工农兵群众学术批判座谈会的材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的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政治。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党和社会主义看作是自己命根子的工农兵群众，对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狡猾手段，都能看出来，嗅出来，一语道破他们的反动的政治目的。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即使对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也能够发表深刻的正确的意见。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讲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讲也讲不出来的革命的科学的道理。他们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本质，三言两语把道理讲得明白透彻。

所谓“清官”问题，曾经迷惑了许多人。而工农兵群众却用自己的家史和村史、厂史，证实了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清官”。他们说，“哪有猫儿不吃荤，哪有官儿不贪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清官”完全是地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编造出来的。

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相当流行的观念。而工农兵群众一听吴晗、翦伯赞宣扬“让步政策”的谬论，就明确指出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说：“狗走千里要吃粪，狼走千里要吃人”，地主阶级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现在地主被我们打倒了，还象“屋檐上的洋葱，叶焦根烂心不死”，不肯“让步”，怎么能够想象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后却对农民采取什么“让步政策”呢？

在所谓道德继承问题上，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把剥削阶级的道德说得美妙得很。而工农兵群众却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控诉了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吃人的道德，是“不杀穷人不富”的道德。他说，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没有一点好东西。

看！工农兵的阶级观点多么明确，旗帜多么鲜明，道理讲得多么透彻。在我们整个革命事业中，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里的斗争，要靠工农兵；文化革命，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也要靠工农兵。工农兵群众不仅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主力。没有工农兵群众的参加，任何革命都不会取得彻底胜利。只有依靠工农兵群众，发动工农兵群众，才能保

证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根子。

在文化革命中同在其他领域的革命一样，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②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当前的学术批判中，再一次证明，知识分子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和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同工农兵群众一道进行战斗，才能在文化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工农兵群众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取得文化革命的彻底胜利。

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四九一页。

②《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五四六页。*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三日转载）

二、研究资料

《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 李 逊 •

（原文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三期，发表时的标题为《〈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有删节。——作者）

◇ 江青破门而出

1963年2月，春节刚过不久，正是春寒料峭。江青裹着一身寒气，从北京来到上海。

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江青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她虽然挂着两个普通职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国务院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但因为是毛泽东夫人，谁对她都十分尊重。

过去江青来上海，大多治病或休养，很少接触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尔外出，也很保密。每次她来，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地方负责人总要去看望，礼仪相待。但这次江青来上海却一改以往深居简出习惯，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

以上是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30年后的回忆，写出上海市委领导人对即将破门而出的江青的感觉。（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江青是来进行“京剧革命”的。江青对陈丕显说，因她建议，文化部发出通知，准备1964年在北京举办京剧现代戏汇演。她要上海文化局组织人员，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的早晨》改编为现代京剧，参加汇演。

接待江青的一直是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64年4月柯庆施患肺癌，手术后身体虚弱，往广州疗养。江青向柯庆施要助手，柯庆施向她推荐已经担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据张春桥妻子文静后来回忆，江青提出要找几个人帮助她改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先后推荐夏征农、石西民去，江青和他们谈谈，都不满意，结果都退回来了。

后来叫张春桥去了。张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满意，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转引自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 1994 年未刊稿。）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逝世。以后江青来上海就由接任市委书记的陈丕显接待。

陈丕显与江青关系原本一直不错，建国初期，江青有一阵来上海，就住在陈丕显家。自1963年以后江青来上海次数多了，陈丕显感到江青越来越难伺候。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但江青对衣食住行十分挑剔，使接待费用无法压在中央规定标准线下。毛泽东得知，要求属下迁就自己妻子。一次，毛泽东很认真地对陈丕显承认江青有缺点有毛病，但又说：“如果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头上，我来付好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陈丕显只能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心应付江青，不敢出纰漏。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江青的京剧改革非常支持，要什么给什么，还指定张春桥具体协助江青。张为江青记录和整理讲话，向剧团传达和贯彻她的意见。19

63 年 12 月，张春桥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仍全身心扑在江青的京剧改革上，得到江青欣赏和信任。

◇ 上海与北京的南北两个海瑞

1965 年初，江青又来上海。此行两个目的，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来成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二是物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前一个行动在党内高层公开，后一个行动则十分诡秘。

《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毛泽东对海瑞作出赞扬后写出的一个剧本。剧中的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大臣，生性耿直清廉，敢为老百姓讲话，因上书批评皇帝被罢官。

还是在 1959 年初，毛泽东在看了湘剧《生死牌》，因戏中有海瑞，毛于是将《明史·海瑞传》找来看。1959 年 4 月间，毛泽东曾经几次讲话提倡干部要学海瑞，要敢讲真话。4 月 5 日，毛泽东讲到明朝的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毛泽东对海瑞的评价由文化部部长钱俊瑞向文艺界作了传达。一时海瑞戏在全国遍地开花，各个剧种争演海瑞。其中以上海和北京的海瑞最有影响。

上海的海瑞戏名《海瑞上疏》，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建议写的。周扬在毛关于海瑞讲话的几天后，在上海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和上海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建议他们写海瑞戏。上海京剧院经过讨论，成立了创作组。剧本完成后，上海京剧院调集强大演出阵容，主要角色都由一流京剧演员饰演，周信芳任导演并饰主角海瑞。经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意，9月30日，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作为国庆十周年重点剧目，在上海天蟾舞台首场献演。演出后好评如潮。周信芳又带队去北京演出，同样获得好评。

北京的海瑞戏由吴晗撰写。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后，中共中央另一个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一回北京就去找吴晗，希望吴晗根据毛的讲话写文章介绍海瑞，吴晗便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1960年3月又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后改名《海瑞罢官》。1960年底公演后，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饰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将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
(引自虞云国《那桩关于海瑞的公案——读〈怀念吴晗〉》，上海《东方早报》2009年11月16日)

上海、北京，南北两个海瑞，由南北两位最杰出的京剧表演大师饰演，成为全国同时期的海瑞戏中最有影响、最具光彩的艺术形象。（以上资料引自《南北“海瑞”引发的大冤案》，沈鸿鑫著，载于《世纪》2007年第1期，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辑出版）

但其实，就在吴晗撰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时，毛泽东自己提倡海瑞精神没有几个月，他对海瑞的态度又改变了。因为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看《海瑞传》后，真的以身试法当了海瑞。于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8月16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这番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话，胡乔木很快告诉了吴晗，吴晗赶紧在自己刚写好的《论海瑞》一文中，加上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歪曲海瑞的话。

吴晗的补丁没起作用。1962年3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罢官》，把戏调到北京民族文化宫演了两场。看后，让停演。剧团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打探停演原因。过了好长时间，才传出消息说江青认为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不准再演。

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江青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陆定一、林默涵、周扬、齐燕铭，要他们对《海瑞罢官》开展批判，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当场拒绝，别的部长也都不同意。

江青又去找北京青年文艺评论家李希凡。李希凡50年代曾因批判《红楼梦》研究权威俞平伯《红楼梦简论》，引起过毛泽东注意，成为文坛新星。江青派专车将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小时，说应该注意《海瑞罢官》，这出戏有问题。但李希凡就是不接翎子。他后来对人说，他当时觉得江青将吴晗剧本和

“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就不表态，装糊涂。（引自胡锡涛《“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载于 2000 年第 9 期《今日名流》，湖北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

江青转将目光投向上海。

◇ 柯庆施与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不过，此时的柯已身患绝症。他 1964 年 3 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 月 20 日做手术，6 月初出院，7 月 14 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9 月 18 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 月 23 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直至 1965 年 4 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这个日程表全部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于《党史纵览》2003 年第 9 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以及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载于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红星照耀的家庭》）

江青找李希凡的时间，李希凡自己回忆是在 1964 年，有材料说，是在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这个时间引自余焕椿所著《文革前的人民日报》，载于《百年潮》2004 年第 5 期，中共党史学会主办）大会召开时间是 1964 年 6 月 5 日至 7 月 31 日，而在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回忆录中，江青告诉他，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是 1964 年下半年。两个时间吻合。由此可推江青是在 1964 年 6、7 月间找李希凡，未达目的，再找柯庆施，时间应该迟于 6、7 月。

江青具体何时找的柯庆施？1964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夫妻俩在北戴河登门探望病中柯庆施，见面时间半小时。同年国庆节，柯庆施在北京参加一系列国庆活动，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这两个时间引自《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

由此可推，江青找李希凡遭婉拒后，再找柯庆施，应该是在北戴河或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时。不过此时柯庆施已经离开上海。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已经不在上海的柯庆施如果推荐，也只能是提个名而已。

有回忆录说，柯庆施在北戴河修养期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这是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所著《我的文革岁月》中说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陈小津在此文中还回忆说，这句话是当时在场的人记在笔记本上，文革结束后“主持审判的工作人员都看到过这句话”，但陈小津没有具体注明此话的出处）柯庆施是否“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据说，张春桥1964年夏天去北戴河，是因为谭震林夫人提出现代京剧不错，建议请毛泽东观看一次，于是让张春桥带队去北戴河。196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直至8月20日回北京。（这个日期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的1349页和1355页）7月17日和8月11日，毛泽东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后一个活动柯庆施也出席，陪同毛观看。（引自《人民日报》1964年7月18日和8月11日新闻报道，不过报道没有说毛是在哪里观看的。）

如果毛泽东是在北戴河看的戏，如果确实是张春桥带领演出队去北戴河，那张春桥去北戴河见柯庆施，应该是顺便而非专程，探望病中的上级，也是人之常情。而作为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施，毛泽东夫人上门要求支持，又怎能推卸。江青的“柯老大力支持”之说，很可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夸大之词。

即使柯庆施曾经要求张春桥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柯的支持大概只止于此。因为柯庆施此时已经不再主持上海工作，甚至从此没回上海。身患绝症的他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实质性参与。据跟随柯的机要秘书说，柯庆施离开上海去外地疗养，直至 1965 年 4 月去世，外出养病期间，从未接到过上海方面任何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件和电话；（转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于《党史纵览》2003 年第 9 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而且，《海瑞罢官》所谓要害问题“罢官”，至 1965 年才提出，彼时柯已去世多时。

当时，这种批判很多，连比吴晗地位更高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因其“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在挨批判。柯庆施即使支持，也只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安排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夫人要求的事宜。如果说有什么超出共产党行事规则的地方，那是毛泽东让夫人越界插手党务，应该不予理睬，但柯庆施包括全党，无人敢这样做。

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分管宣传口的书记，具体负责批判《海瑞罢官》，从市委书记的工作分工来说，名正言顺。他与江青结帮是后来的事情。

张春桥认真完成江青交办的事，甚至还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明史》。当时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兴趣。

柯庆施逝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 柯庆施对张春桥上升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柯庆施资格很老，才50多岁就被称为“柯老”，连比他大9岁的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他，而且据说还是毛泽东首先这样称呼。

1954年10月，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毅调任中央，柯被从江苏省委调来上海接任，后又兼上海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

在上海干部中，对柯庆施始终有两种不同评价。有人对柯反感，认为他“左”，霸道，喜欢揣摩和迎合毛泽东的心事；有人对柯尊崇，认为他有能力，对干部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尤其在上海经济建设方面功不可没。

柯庆施工作严谨，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批评部下毫不留情，甚至让人下不来台。他不但工作上对干部严格要求，生活上也反对干部特殊化。他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手下与民共苦。1958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领导干部，除年岁大的以及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园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

村与工人为邻。他自己首先于 1959 年春节前带头搬入东庙二村，那是地处上海西南的工人住宅群，都是简易建筑，条件比花园洋房差得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上海高级干部全都入住条件好的花园洋房或公寓，柯庆施提出搬出这些房子，显然是希望与老百姓缩短距离。1960 年初，柯庆施搬往康平路上的爱棠公寓，据说是因为在东庙二村办公不便。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十分倚重柯庆施，因为柯抓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令他们都满意。上海本来就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轻重工业以及科研基地，柯在上海十年，上海经济发展继续领先全国，工业总产值十年翻番。在文化方面，柯 1963 年提出戏剧舞台要“大写十三年”，即写共产党执政后十三年，得到毛赞赏。1963 年 5 月，柯又组织撰写《“有鬼无害”论》，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撰写初稿，张春桥修改。文章矛头对着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文章真正组织者是江青。

柯在党内地位上升很快，1958 年 5 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 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逝世后，被谥为“毛主席的好学生”，随之而来的文革，以对柯庆施的态度划线，伤害了不少干部。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 1917 年，1935 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 年到延安，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

总编辑。柯庆施 1954 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政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与此同时，南京《新华日报》总编杨永直已经被调往上海准备作为张春桥的接替。但柯庆施最终还是留下了张春桥。（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即使办公室门对门。如当时的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在他办公室对门，他来不和李聊天。李对他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的长李家齐 2009 年对笔者的回忆）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于是张春桥给几乎所有人留下“阴”的感觉。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转引自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载于《问史求信集》第 418 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 60 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

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李家齐回忆）

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

张春桥出名是在 1958 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 8 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告诉张春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 1949 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柯庆施将毛的想法告诉张春桥，张根据毛的这些话，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 6 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那年被毛泽东赏识的，还有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他写的是批判形象思维文章。

张春桥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 10 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张春桥的工作主要就是直接抓一些重点创作，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柯庆施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和讲话，被称为“不管部部长”。

1964 年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北京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接任分管文教的上海市委书记，兼任市委宣传部长。

◇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至于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考虑不多。他曾对人比较自己与李希凡的差别：“李希凡是搞学问的，我是搞政治的。论旧学底子，我不如他，他毕竟是科班出身；论政治敏锐性，他不如我。我最大的兴趣是写杂文。李希凡是属于学者类型，我只想做一个革命战士。”这个自我分析所透露出姚文元“表层的谦虚和深层的自豪”，给当年到听这话者很深的印象。（引自胡锡涛《“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姚文元生于 1931 年 12 月。共产党执政前, 1948 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 便已加入中共地下党。1958 年, 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 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 年底, 《解放》半月刊停刊, 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 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 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 出版过多本文集。他 1956 年 6 月 30 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百家争鸣, 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以及 1957 年 6 月 10 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这是柯庆施将他调往《解放》半月刊的原因。

在文化圈内, 姚文元口碑不太好, 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 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 艾青、巴金、丁玲, 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 是姚文元特别敏感的, 捕捉此类信息, 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 姚文元曾对人说, 1961 年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时, 又是开会, 又是出纪念文集; 可 1961 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40 周年, 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 这是为什么? ! (这话是姚文元对王知常说的。转引自李逊、金光耀、金大陆 2009 年 5 月 16 日对王知常的访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 如果只是个人观点, 也应该有存在权利, 因为只是一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 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 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据说江青因此称赞他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少言寡语，不苟言笑，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给人印象老实甚至木讷；他独往独来，与周围人除了工作，几乎没有私人交往，与人谈话只谈正题，正题之外从不谈一句私事；他为人随和，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办公室抽屉里，稿费和废稿纸混在一起，幸亏同事发现后帮他清点出来；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直到他去中央后，仍是不盛气凌人，但仍是不苟言笑，不谈任何私事。给人印象，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不谙人情世故。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对他的印象是：“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没有改变”。

他的棍子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事实上，姚文元当时也是个理想主义青年。姚文元 1958 年 9 月 11 日曾经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社不要再给自己寄稿费：又：上次你们收入论“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文，汇来了稿费。这次务请不必再寄钱来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钱。, 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是资产阶级稿费制度的残余。如果自己将来成书，岂不又多拿一次钱。有什么工人生产一样产品“拿两次”钱的吗？不发稿费，书的定价也可以低些。如果寄来，我也可以退回的。如果说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这个制度反正可改的。（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自姚文元 1958 年 9 月 11 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载于《吉迹善本》中国嘉德 2009 秋季拍卖会照相彩印本，Lot3051 方氏珍藏，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当时，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刊登在 6 月的《解放》杂志上不久，一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全国性的讨论刚展开。姚文元以不要稿费的行为，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可能以后，姚文元还是拿过稿费，但至少，姚文元当初写这封不要稿费的信时是真诚的。后来，到 1964 年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后，写作班的一帮青年也提出不要稿费，和姚文元的做法一样。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写《海底两万里》等著作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写《陶威尔斯教授的头颅》等著作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等等的作品，都是他的最爱和收藏。十几年后，当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关押判刑，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都是献给妻子金英的，他们夫妻俩感情笃深。一生以写作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历史的缩影。

1965 年 3 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一次。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撰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 1961 年第 1 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引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06—04 出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的 4 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 11 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 1965 年 5 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姚文元是从“内刊”搬入宛平路 11 号后开始正式着手写作，朱永嘉对笔者回忆过；与姚文元当时一个办公室的吴锡涛也曾对邓伟志这样回忆过，转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

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姚文元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是朱永嘉。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朱永嘉最初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还有吴晗的《论海瑞》。都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参考，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他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

第一稿 5、6 月间出来；朱永嘉直到 9 月间，才第一次看到稿子，那已经是第八稿。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 1967 年 2 月 3 日对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但江青在 1967 年 4 月 12 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引自《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此文作者是江青在文革中的秘书阎长贵，《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我

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年出版）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

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是毛泽东自己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1966 年 4 月 4 日，上海市委宣传部起草《五个月来对〈海瑞罢官〉批判情况的汇报提纲》，“曹荻秋和杨永直等一伙在讨论中闭口不提毛主席的亲自指导”，张春桥“当即严肃指出”：最主要的是毛主席的领导，从文章开始到重要关键，主席都给了明确的指示和支持。（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 1967 年 1 月编印）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 39 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手。（这 39 个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可供批判的《文学艺术资料》，很多文章都提及，虽然笔者始终没有查到原始资料的出处，但是在“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 年 12 月编辑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中的 1964 年 7 至 9 月中，有记载。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6 年第二版）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 1965 年 6 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这是张春桥 1966 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红革

会”及“工总司”代表时的谈话中说的。不过，陈丕显的回忆说是第八稿。笔者认为作为当事人的张春桥在文革中的回忆更可靠。）

柯庆施是上海市委领导，江青从一开始就没瞒着柯庆施。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又马上告诉了继任的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以上江青的话均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柯庆施 1965 年 4 月去世，柯逝世后江青即将事情告诉陈丕显。而姚文元是 5 月开始动笔的，也就是说，姚文元开始动笔时，陈丕显已经知道姚文元在为江青写文章了。虽然文章的一至六稿都没有给上海市委其他领导看，但至少从姚文元开始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起，上海市委不是不知道。

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也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写，没有背着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张春桥是作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代表来组织文章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能不执行吗？当时是执行的，还是光荣的。毛主席对上海市委是信任的，寄予希望的。并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引自《王力反思录》第 756 页，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不过，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李家齐回忆）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详，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楞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 11 月 5 日和 7 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陈守实、谭其骧、周予同以及周谷城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与姚文元的助手朱永嘉同事。陈守实教授还是朱的导师，谭其骧教授和吴晗关系比较好。两位教授家都在复旦校园。朱此时已经知道姚文元文章背景是江青和毛泽东，担心两位教授言多必失，会前找机会向他们打招呼，说文章有来头，会上发言小心。所以，谭和陈在会上讲话很谨慎。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家在市区，直接从家去参加会议，朱永嘉没有机会向他们打招呼。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婉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以上材料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 1967 年 11 月编印）

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 8 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1965 年 11 月 8 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 165 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稿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引自《铁骨铮铮，正气浩然——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糜欣祥著，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 53 辑，中国政治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3 月出版）这次因是市委书记处讨论，曹才又仔细看一遍。

看样子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只是批判吴晗的剧本。1949 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 60 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上海市委干部们可能以为这次批判和那些批判差不多，批判一阵子，职务上调动一下就结束了。

即使上海市委领导觉察到什么，也无法明说。此时，毛泽东已决定发表姚文，上海市委对文章有什么态度，根本无力回天。

姚文元的文章，“市委改了四稿”。（这是曹荻秋说的。转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 1967 年 1 月编印）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引自《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1967 年 5 月）

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曹荻秋的这段话引自 1967 年 1 月 8 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 16 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张春桥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 1949 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所以，如果说当时保密得滴水不漏，上海市委除张春桥外都蒙在鼓里，有点言过其实。如前所叙述，首先，上海市委从姚文元开始写文章时就知道，而且文

章也经由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其二，毛泽东在姚文发表前，向彭真透露过要批判吴晗；其三，张春桥曾向邓拓打过招呼，邓拓应该会告诉吴晗。

本来，新闻报刊应该有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1949年后这类批评根本不被允许。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允许，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制定的程序，也即“组织原则”。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讲话时向彭真提了一下，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彭真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由，因为就在姚文元发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这一年，1965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发文规定报上点名要经过中宣部，还要求学术批判不要戴帽子。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毛泽东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第二天，《解放日报》全文转载。

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这是张春桥的主意，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通过对姚文元文章的争论，将知识界同情或同意吴晗观点者都牵出来，便于以后进行更大规模批判。江青同意了。（引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这是姚文元家人告诉别人的）

（注：本文为作者正在撰写中的《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暂名）第一章的上半部分）

2006年11月19日初稿

2011年6月29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一章（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1965—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一、文献资料

一、上海会议背靠背地揭发罗瑞卿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罗瑞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

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林彪说：“去年（指 1964 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晚上，罗瑞卿约杨成武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罗对杨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

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杨成武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 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一九六五年五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

叶剑英为了这个会议的总结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应该报毛、林后再做。但是罗瑞卿在部分与会者的要求下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

叶剑英连同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

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

林彪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 3 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一九六五年八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

林彪主动说，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

叶剑英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或是十一月初，在杭州，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电话通知杨成武，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杨去一下，并派车来接。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杨送到毛主席的住处。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问。“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杨答。“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杨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杨谈的那些情况。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杨即回疗养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叶剑英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

毛泽东要求林彪汇报罗瑞卿的情况，林彪藉口身体不好拒绝了。

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一九六五年年十一月月四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

叶剑英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他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

×××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

叶剑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几天后，×××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听了总政治部关于即将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明年工作总的要求还是要继续突出政治，和今年的做法一样。具体有以下五项：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以上五项对各部门都是适用的。除这五项以外，机关有的搞军事训练，有的搞院校工作，有的搞施工生产，有的搞民兵三落实，有的搞军工生产和建设，有的搞国防科学的研究，等等。各个部门的业务不同，重点可以不同，可以根据总的要求有增有减。但是，都必须突出政治，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提高认识，提高自觉。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率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突出了政治，就会出好人好事；不突出政治，就会出坏人坏事。部队的工作，环节很多，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环，就把各种工作都带动起来了。几百万军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突出政治，不把思想工作搞好，不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思想传下去，怎么能搞得？做好上述五项，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战备。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

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叶群汇报的内容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毛泽东在听汇报中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辩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其中一个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叶群。

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周恩来主持小组会。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

她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

卿不会亏待我叶群。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 101（林彪代号）当面谈。”“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

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

雷英夫也揭发了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罗瑞卿到达上海，没有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 618 号一个小院子里，实质上是被看管起来了。陈丕显对罗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

罗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 7 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会上揭发的那些问题，他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开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军委会上决定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刘少奇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杨成武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刘少奇说：“命令以后再下。”

不久，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会议上，每个与会者都发言。

邓小平对刘亚楼的揭发，说，死无对证。

刘少奇也表示难以置信。

朱德说：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就是不能讲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到了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会议大量的还是表态，也有揭发罗瑞卿工作作风上的问题，说他揽事太多，锋芒毕露，得罪了一些人。

对于这些背对背的还有点同志式的批评，罗瑞卿都能接受，但他坚决不承认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毛泽东决定休会。

邓小平主持最后的结束会议，说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就宣布散会。

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

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思想不通。

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

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

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的批示

总政治部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

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

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解放军报》社论

其中指出，林彪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二、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会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

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

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批评“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罗瑞卿在会上作检查

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泽东，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

毛泽东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当面向毛主席申诉。周恩来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

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随即跳楼自杀。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第二阶段的会议，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四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 (一) “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 (二) 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 (三) 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 (四) 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谢富治说的这些内容，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不能上升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

一九六六年四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

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第六、封锁 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

第七、撒谎、造谣、挑拨、抵赖 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

第八、伸手 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

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自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全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广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

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

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国影响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

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一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三论突出政治》

三、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

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 X 月 X 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 XX 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

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 XX 日，即在 XX 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一) 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二) 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三) 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四) 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 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四月，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写信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彭真在这次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66〕268号）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

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贰、本节简论

一、毛泽东对处理罗瑞卿事件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从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对罗瑞卿的错误，毛泽东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且是作为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来处理的。处理的方法是批评教育，并适当地调整工作岗位——免除现任职务，调到一个省去当省长。

一九七一年“九·三事件”后，毛泽东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这里主要是指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

二、罗瑞卿在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他在许多问题上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的。我们还是来看看右派们是怎么说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

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又肯定“四个第一”、“突出政治”，说明毛泽东愈来愈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一些同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愈加深刻。

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是两条；第一，罗要夺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出政治。这两项主要内容，前者纯属诬陷，后者却是事实。

这就是说，右派们现在仍然承认，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及罗瑞卿这些人是反对政治是第一、政治是统帅、突出政治的。毛泽东批判他们搞折中主义并不是无的放矢。

“罗瑞卿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与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的看法有密切联系。这个时候撤换罗瑞卿，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部署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换了总参谋长，就解决了一个兵权的具体实施的问题。

三、一九七六年以后，罗瑞卿复出又紧跟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证明了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反毛泽东思想一边的。也证明了毛泽东当时撤换他的职务是正确的。

2006 年 11 月 21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 日修改

叁、本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

最近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问题。会议号召全军干部战士，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政治从来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从来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我们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大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就是正确处理政治同军事、经济、技术以及其他业务的关系，在各项工作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从而不断推进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动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因此，突出政治决不是一项任意的、局部性的、权宜性的政策，而是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根本措施。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事实正是这样。在我国，虽然私有制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但是，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资产阶级总是企图用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妄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无时无刻不在散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说明，阶级斗争还是严重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特别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更是此起彼伏，或明或暗，长期存在。我们只有突出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积极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才能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如果我们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就会忘掉敌人，就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就会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发展规律也不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是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维护他们的剥削制度和阶级私利服务的。资产阶级就是靠剥削压迫

吃饭，靠欺骗愚弄吃饭，靠物质刺激吃饭。他们是金钱挂帅，唯利是图，有了几万几十万，还要搞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只能那样做，而且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完蛋了。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能采用这种办法。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是广大群众的集体事业。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一不能靠强制，二不能靠物质刺激。我们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 and 文化生活。但是，最主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人的觉悟提高了，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掌握了，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前进，就会发展。相反，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不搞政治挂帅，而搞物质刺激，引导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 and 物质享受，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共产主义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幸福境地，也就是要最后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 and 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应当是面向共产主义，逐步缩小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绝不能背向共产主义，扩大 and 加深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远。为了逐步缩小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首要的，最根本的，仍然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地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 and 道德品质。向共产主义发展，一定要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现代修正主义者口头讲的是共产主义，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拼命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 and 自私自利思想。这样，在他们那里，阶级分化加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 and 体力劳动的差别扩大了。他们不是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这就清楚地说明了，

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残余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美帝国主义者，总是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总是把高举反帝革命大旗的中国人民当作它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搞垮我们。它不仅妄图通过武装进攻，重新骑到我国人民的头上；而且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我们还应当看到，全世界还有广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为着谋求自己的解放，正在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搏斗。胜利了的我国人民，不仅要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阴谋和破坏活动，保卫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要积极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要遵循毛主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教导，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既做国内革命派，又做国际革命派。

毛主席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合作化的问题。一个合作社是这样，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这样。突出政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正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的政治的保证。总之，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大问题，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大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大问题。

我军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担负着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任务。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把我军看作是他们的死

对头，处心积虑地破坏和腐蚀我们。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因此，我们更应当大力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让毛泽东思想在全体指战员的头脑里深深扎根，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和发扬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本色，胜利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全军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不断提高突出政治的自觉性。我们要干一辈子革命，学习一辈子毛主席著作，突出一辈子政治！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走突出政治的道路！

一九六六年四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谢富治同志揭发材料摘述)

我完全拥护中央这次会议对罗瑞卿的反党活动所作的彻底揭露和严肃批判。对于罗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拒绝党的教育，可耻地用自杀的背叛行为来同党对抗，我们十分愤慨。

我们同罗瑞卿的篡军反党活动的斗争，是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及时地把这个危险的反党分子揭露出来，消除了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隐患，非常英明，非常正确。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突出政治同单纯军事观点的斗争，是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个斗争，对于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保卫党的纯洁性，保卫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 “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一九五八年，罗大搞“十无”，无论从他的言论来看，还是从他的行动来看，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罗在大搞“十无运动”中，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大唱反调。他到处大放取消阶级斗争的谬论。他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极力鼓吹和推行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之类的“十无运动”。他一再断言：只要一年、二年、三年，在我们社会里，就会出现百分之七十的“十无”乡、社，“十无”街道，“十无”机关、企业和学校。他甚至这样讲，只要一搞“十无运动”，上海就可以变成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的城市，广东也可以搞得连反动标语都没有了。他声称，这种无反革命、无盗窃之类的“十无”单位，还将“由百分之七十，一变，变到百分之八十，再一变，变到百分之九十，再从百分之九十变到百分之九十五。”好家伙，这个变法真快，真厉害，再过几天，就变成百分之百了。他要通过“十无运动”，一块一块地制造无反革命、无盗窃之类的“十无”地区、“十无”单位。这样，全国就都变成“十无”了。

罗的“十无”谬论，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接着，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但是，罗却说什么几年之内就可以消灭阶级斗争，说什么“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了。”就在罗大搞“十无运动”的一九五八年四月，毛主席指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必须看到还有百分之五的“细菌”，中间派也可能变坏，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没有过几天，罗到了汉口，又继续散布“十无”谬论。他为了给自己的“十无”谬论辩护，竟然把苏修的东西搬来做论据。他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

问题主要是外部原因了。这就是说，只要搞了“十无”运动，我们的国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这难道还不是从老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吗？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各种各色的牛鬼蛇神，这些都是毛主席指出的政治“细菌”。就是罗自己的家里，也有这样的“细菌”，有地主分子。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十无”呢？赫鲁晓夫还只搞了一个“三无世界”，而罗却搞了一个“十无世界”，比赫鲁晓夫的“三无世界”还要多。可以说，他的“创造性”并不比赫鲁晓夫差一些。

罗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后，接着又放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他在华北地区政法片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专政的工具也是如此。”他说：“现在反革命消亡了一部分，政法工作自然也就会消亡一部分，反革命全部消亡了，政法工作也就会随之全部消亡。”按照罗的这种说法，专政消亡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政权就用不着了。国家消亡了，你那个公安部也就“无”了，还要公安部干什么呢？

罗为了在几年之内消灭阶级斗争，取消专政，实现他的“十无世界”，竟然肆意破坏毛主席、中央的少捕政策。早在五一年的大镇反后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少捕政策。多少年来，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我们在今后镇反工作中，注意不要过多捉人。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特别讲了一条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毛主席又一次指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可是，罗在大搞“十无运动”中，完全撇开了毛主席的少捕政策，大捕大捉，他只讲打击，不讲改造，只讲斗争，不讲分化，甚至歪曲总路线的精神，随心所欲地鼓吹多捕人、乱捕人。一九五八年二月，他在公安部的干部大会上说：“比如捉反革命，没有那么多不能乱捉，但按平常状态说，如果北京有五十个反革命，你捉二十个好，还是五十个都捉光好，还是只捉两个甚至一个都不捉，这里有‘多’的问题。”他又说：“北京现在还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有反革命，有刑事犯罪分子，要打扫干净，是三年扫干净，五年扫干净，十年扫干净，还是一年扫干净，这里就发生‘快’的问题。”同年六月，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公然

说：“所谓多，就是有十个反革命，就应当抓十个，或者八、九个，而不是三、四个。”说穿了，他的所谓“多”，就是多捉人；所谓“快”，就是明天消灭阶级斗争。他就是用这种简单地捉人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阶级斗争问题，来代替艰苦的群众工作。他认为，只要把人捉起来，反革命破坏“无”了，刑事犯罪也“无”了，阶级斗争就熄灭了。

罗大搞“十无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就捉了××人，是大镇反以后捕人最多的一年，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和不应该捕的人，扩大了打击面，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十无”，助长了不少基层公安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特别在个别领导问题严重的地区，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大搞“十无”，一个时候，公安部门的手伸得很长，事揽得很多，造成干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混乱。大搞“十无”，使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滋长了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大搞“十无”，在一些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中，一度大大发展了出风头、爱热闹、搞形式和浮夸的坏习气。这些恶果，在不少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延续到一九五九年甚至到一九六零年，并且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使得以后几年的公安工作，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来处理善后，澄清干部的混乱思想，整顿政策和纪律，扭转干部的作风。

罗在公安工作中大搞“十无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彻头彻尾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按照罗的谬论，我国的阶级斗争很快就要熄灭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久就可以宣布取消了。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我们岂不是也变成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了吗？罗岂不是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起，走进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吗？

这样一套“十无”谬论，这样一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行动，居然发生在罗这个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国家一个政法工作领导人的身上，这不是很难理解吗？其实，并不奇怪。这是在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在罗身上固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情不自禁的大暴发。这同他后来到了军委工作的时期，搞“大比武”，搞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一脉相承的。不论是“大比武”也好，“十无”也好，都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这同赫鲁晓夫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三无”、“两全”又有什么区别呢？

正当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大辩论、大斗争的时候，罗搞这样一套，实质上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

（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个人专横，飞扬跋扈，这些恶劣品质，在罗的身上，是非常浓厚的，根深蒂固的。罗到军委工作以后，所以发展到猖狂地反对林彪同志，不是偶然的。林彪同志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罗竟然以林彪同志为敌，以党为敌，这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发作的结果。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就有很多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拿解放初期的一件事来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军委公安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时候，罗事前不请示毛主席、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原来由军委公安部指挥的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直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属公安部建制，并召开了公安部队干部的动员会。这件事，受到了毛主席、军委的批评。他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只当作一件手续不周的事，轻描淡写地给毛主席写了一个不到三百字的检讨。他说，改编时没有请求毛主席批准是不对的，但是，开个会说明公安部队的任务，动员大家努力和安心工作则是对的。在这里，罗丝毫没有触及个人抓权，特别是抓兵权的丑恶思想。接着，他就积极地抄袭苏联的经验，扩大边防武装，搞边防公安部队。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九五八年大搞“十无”。他上不请示毛主席、中央，下不同地方党委商量，也不提到党组来认真讨论，就擅自决定通报贵州省公安厅开展“十无运动”的报告，在全国公安工作中大吹大擂地推行“十无运动”。对于这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十无运动”，一些地方党委，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却或明或暗地乱加指挥。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一贯搞“一言堂”，一长制，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他在公安部的十年时间，党组向中央、毛主席的请示和报告，向来是他一手包揽，很少让其他负责同志过问。他传达毛主席、中央的指示，也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中央的

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东西。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对警卫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多次对罗本人的严格批评，他都没有向党组织作过真实详细的传达，更没有组织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讨论。罗这种欺上瞒下的手段，是对毛主席、中央实行封锁，对干部实行“愚民政策”。

罗的上述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他一贯颠倒了个人同组织的关系。他是一个没有党性的人。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章的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党的组织原则，在罗的心目中是根本不数的。他一贯不服从领导，野心勃勃，浑身都是反骨。他完全够得上是一个“霸王”。这个人不但思想上没有入党，在组织上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罗在公安部工作期间，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原则，始终是动摇的、不坚决的，在不少问题上，都是阳奉阴违，采取两面派的态度。

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苏联斯大林时代和我国内战时期的肃反经验，纠正了保卫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的错误，确立了党委领导的原则。从遵义会议到延安，从延安到全国解放，毛主席一贯强调党对于公安工作实行直接领导的重要意义。但是，罗根本没有党委领导的观念，对于公安系统的垂直领导，一直很感兴趣。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他说：“各级公安部门均实行党组制，公安部门党组受同级政府党组领导，同时在方针、政策、业务上又接受上级公安部门领导。”在这里，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党委领导，只是在末了说：“回去要向党委作报告，取得党委的支持。”在罗的心目中，党委领导只不过是对公安工作“支持”、“支持”而已。这种腔调，在他的言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一九五零年三月，罗公开要搞垂直领导，同苏联专家一唱一和，十分露骨。专家提出：“整个公安部的中心应该放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关系问题上。”罗立即把苏联专家的话接过来，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他说：“专家建议保卫工作应实行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我们认为，这种领导关系的建立，对于建设公安工作来说是必需的，但目前主客观条件均难做到，主要是干部不足，领导机构还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三至五年的努力”。这个错误主张，被毛主

席、中央打回来了。在这个问题上，罗没有清算内战时期的错误，他不是用毛主席的党委领导的正确原则，去反对苏联专家的垂直领导的错误主张。相反地，他借苏联专家之口，来向毛主席、中央要求实行垂直领导。在军队保卫工作中，他也想建立独立系统。他曾经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有单独的保卫系统，那时候是早了一些，今天条件比较成熟，应开始考虑这一问题。”这还不是明明反对毛主席的党委领导的原则，想使垂直领导复辟吗？

为了纠正不要党委领导的错误主张，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公安部的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非常尖锐地指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这个指示，非常英明，非常重要。毛主席在这里使用了“特别”、“实际”、“直接”、“危险”这八个非常有分量的字，在“实际上”三个字的下面，还打了着重点。可见党委领导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丢掉的。

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强调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道理很明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切工作都必须由党委来领导。公安工作是搞阶级斗争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革命的工具，尤其需要强调党委领导。阶级斗争这么复杂，只有党中央才了解全国的情况，才能够掌握国家的全局；也只有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才了解地方的情况，才能够掌握地方的全局。公安机关必须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才能做好工作，才能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毛主席曾经说过，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掌握不好，就容易伤害自己。这把刀子要是被坏人抓走了，那就更加危险。所以，公安工作只能由党委直接领导，不能由业务部门垂直领导。如果公安工作实际实行垂直领导，就势必会重复我国内战时期的错误，重复斯大林时代苏联在肃反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一九五一年五月，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大镇反运动的经验，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上，亲自写了一条肃反的工作路线。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党委领导，第一句话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并且说：“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

但不完全正确的。”毛主席还强调说：“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

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而且在实践上给我们作了示范。每一次大镇反运动，都是在毛主席、中央的亲自领导下，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条原则，我们党是十分鲜明的，毫不含糊的。在毛主席亲自动手改过的公安部的文件里，多次地强调加强党委领导的作用。既然毛主席、中央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公安工作上的党委领导，并且抓得这么紧，罗也总该有一点觉悟吧！，其实不然。他不仅对于执行党委领导不坚决，而且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抵制党委领导。在他的语言中，或者根本不提党委领导，或者降低和歪曲党委领导的作用。他不是强调党委对公安部门的实际的直接的领导，而常常东拉西扯，说什么党委领导的关键是结合中心，结合生产。说什么“同生产劳动结合得最密切，最妥善，也就是最好地贯彻了党委领导。”他虽然不再提出整个公安工作的垂直领导下，但还是要在业务工作上做点文章。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业务部门分工更加专业化，有的还要实行垂直领导。”在军队保卫工作方面，他又说什么“我们政治机关，不能把保卫机关当作政治部的一个一般部门来领导”，不能把“裁缝当做木匠使”。在日常工作中，他特别强调侦察工作要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这是他用来干扰党委领导的一个重要手法。

罗对党委领导这个重大问题，始终是没有觉悟的，抵触的。由于毛主席、中央的批评和控制，他想在整个公安工作上搞垂直领导的企图，当然不能得到实现。但是，他总不死心。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灵魂深处，早就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

（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是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指导思想。大镇反运动中，这条路线有了很大发展。毛主席特别强调要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不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总

是过高地估计同隐蔽的特务间谍的斗争，忽视整个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他常常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解放初期，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五个方面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毛主席、中央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发动群众，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在一九五零年召开的几次全国性的业务会议上，罗把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说成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他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当成为战胜敌人的主要手段。并且强调地说，不这样做，“就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大镇反运动结束以后，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城乡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罗在许多业务会议上，却不断地宣传镇反彻底了，公安工作应当转向以秘密侦察工作为主了。这个错误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他向中央写的一个东北考察报告中。他说：经过镇反运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已经消除了对人民政府的对抗和不满。

“同我们作斗争的敌人，主要的已不再是五个方面较为暴露的反革命，而是隐蔽下来、伪装起来和被敌人不断派遣进来的间谍和特务。”他还说“公安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有一套严密的侦察工作。对于罗的这些错误论点，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公安工作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专门工作必须与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防奸、反特的斗争相结合，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公安工作。罗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观点。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甚至说：加强隐蔽斗争，以侦察工作为主要手段的工作方针，“是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的工作纲领”。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

“不久，中央就发动了内部肃反运动和社会镇反运动。就在这一年十二月，正当运动处在最紧张的阶段，罗在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又强调：”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人和各个侦察部门，必须切实地掌握专案的侦察工作，一定要有专案的数字和破案的数字。不掌握专案，拿不出数字，搞不出战果和象样的经验，就是没有

过关，就应当受到批评和指责。“其实，这个所谓过关的标准，发明权不是罗的，而是苏联的。苏联专家曾说：“我们公安工作的主要业务是专案侦察，专案侦察数目的多少与质量的好坏，是衡量公安干部水平与成绩的标准。”罗只不过比苏联专家讲得更神气更吓人而已。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镇压反革命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交给群众监督，依靠群众在劳动中改造他们。不久，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鼓励了我国内部的反动阶级，牛鬼蛇神蠢蠢欲动，阶级斗争又有一次起伏。在这一年十二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又片面地强调，同隐蔽的特务间谍的斗争更加突出了，强调大力加强侦察工作。

在罗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经常工作中，在一个时期，在一些干部中，好象做侦察工作就高人一等，做群众工作就没有出息。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干部之间，为了报成绩，有时互相争功，闹不团结。甚至上下级之间，也互相保密，互相封锁。在侦察工作中，又是单线活动多，在一个单位，往往一个领导干部管的案子，别的领导干部也不知道，搞得神乎其神。

罗片面强调同隐蔽的特务间谍作斗争，把秘密的侦察工作摆在压倒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位置，推行神秘主义那一套东西，是完全脱离我国的阶级斗争和肃反斗争的实践的，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肃反路线的。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的，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向着占人口的百分之四、五的反动阶级实行专政，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起来专政，只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行的。”毛主席还说：“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党，依靠群众。”毛主席这些重要的指示，罗并没有认真执行。在罗的眼睛里，历来是只有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看不见整个反动阶级的复辟和破坏活动，看不见整个阶级斗争。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侦察工作是最重要的，侦察工作第一，群众工作是附属的。可以说，在罗的思想上，根本没有解决依靠谁、压迫谁的问题。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作斗争，当然是重要的，特别是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联合大反华，

我们不应当麻痹，也不应当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帝国主义特务间谍的危害是大的，但是，同国内的整个反动阶级残余势力比较，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外部的特务间谍分子的破坏活动，也要通过我们国内的消极因素才有可能得逞。我们同这些特务间谍作斗争，同样必须依靠群众。侦察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但从整个对敌斗争来讲，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我们敢于依靠大多数，也只能依靠大多数，决不能依靠少数，更用不着神神秘秘。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他们不能也不敢依靠大多数人，他们只能依靠少数人，鬼鬼祟祟搞神秘主义。我们的公安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必须是群众工作第一，不能搞神秘主义，这是阶级关系决定了的。

我国的肃反工作，是毛主席、中央亲自领导的。几次带有决定性的镇反、肃反运动，都是在毛主席、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日常工作，中央和各级党委也抓得很紧。整个公安工作，总的说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中央的群众肃反路线的。罗的那一套神秘主义、关门主义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被毛主席、中央亲自指挥的镇反、肃反运动否定了。但是，每当运动一结束，他的神秘主义那一套又冒了出来，在日常的业务工作中，干扰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罗曾经吹嘘他的“十无运动”是群众运动，“为公安工作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开辟了新的局面”。这是对群众路线的歪曲。象“十无运动”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运动”，怎么会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呢？实际上，罗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地去做过群众工作，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群众工作。他的所谓群众运动，无非是把四类分子和一些有问题的人，甚至把一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不遵守纪律的人，都集中起来，大搞集训，大搞社办劳教，还有什么大搞群众破案运动等等。他把两类矛盾混在一起，不分阶级，不分敌我，不分主次，不分是公安工作应该管的，还是不应该管的，胡子眉毛一把抓，伤害好人，也放纵了敌人，脱离群众，损害了群众路线，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罗身上的神秘主义残余，有内战时期保卫工作错误的影响，解放之后，他又从苏联专家那里吸收了不少格伯乌的东西。苏联专家的大国沙文主义，触犯了他个人的尊严，他是抵抗的。他对苏联的神秘主义的东西，除了中央明确规定了的党

内不准搞侦察，不准搞美人计等等以外，在很多情况下，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原封不动地接受过来。总的说来，他身上的这些神秘主义，是从洋教条那里来的，也是剥削阶级的东西。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罗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作为民主革命家来讲，在他身上也还有很多不纯的东西。他做任何事情，都以我字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他也不愿意改造。他把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统统带进社会主义来了，他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是不奇怪的。

在我们党内出了罗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是一件坏事。这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是一个客观存在，想避免它也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党及时地揭发了罗的反党活动，粉碎了他的反党阴谋，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们的军队，清除了罗这个反党分子，就更加坚强了。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世界上最革命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军委、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是我们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通过同罗的斗争，全党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地利用这个大反面教员，教育干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资产阶级时刻在侵袭我们，特别是对于象罗这样一个标榜一贯正确、表面上很严肃的伪君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危险人物，永远提高警惕，永远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从公安工作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吸取的根本教训是：

公安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党在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工具。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党中央忠心耿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永远不准在党内搞地下活动。永远不准背着党搞任何鬼事情。永远不准对党封锁消息。

公安机关一定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最高指示，永远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全面地系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建设毛泽东式的彻底革命化的公安工作。

公安机关必须掌握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树立鲜明的阶级观点，坚定不移地站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彻底肃清罗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公安机关必须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党委领导的神圣原则，同一切破坏党委领导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革命的利益，不被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所利用；发现了个人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就要彻底揭露，进行坚决的斗争。

公安机关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彻底实行群众路线，树立坚强的群众观点，永远当人民的勤务员，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做好工作，彻底肃清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任何时候也不做脱离群众的事情。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主席说，个人主义把高级干部害死了。这个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罗犯错误就证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存在，可以说，都存在着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而且天天在那里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这种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在许多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不见得都是完全解决了的。这种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想躲也躲不了。只有自觉地进行斗争，天天洗脸，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战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放松了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由不自觉发展到自觉，最后必然要向党伸手，搞个人野心。罗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大个人主义者。在他的身上，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已经由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搞个人野心，搞反党活动。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切不老实的人，自以为聪明，其实都是愚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要靠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著作，靠老老实实做工作，多做“笨事”，千万不能投机取巧，千万不能靠“聪明”办事。在这两个问题上，罗都是极不老实的。他既不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又不老老实实地深入群众，认真作调查研究，而是靠“聪明”办事，甚至看风行事，投机取巧。这是靠不住的，没有党性的，最后还不是栽斤头？！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不充分发扬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我们党和

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近几年三番五次地、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深思，严肃对待。所有犯路线错误的人，包括罗在内，都有不民主，搞“一言堂”的问题。毛主席最近说：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毛主席的这些话，语重心长，针对性很强。许多事实证明，一个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好，可以发挥多数人的积极性，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即使水平低一些，有了民主作风，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主席强调，高级干部要守纪律。罗是一个很不守本分，很不守纪律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十分警惕。我们不能只教育底下的干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更重要的是自己对毛主席、中央的指示，要带头执行，身教重于言教。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时在日常工作中犯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组织上不守本分，不守纪律，这种错误是不能容许的。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主席还说过，高级干部的问题，主要靠自觉。我们应该提高自觉性，经常用党性来约束自己，做工作要兢兢业业，特别是权力大了，就要更加谨慎，否则就容易犯错误，就会损害党的利益。幸运的是，我们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主席、中央又经常教导和警惕我们，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错误；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也容易得到纠正。如果一个人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工作越有成绩，就越容易骄傲；党越信任，就越容易翘尾巴；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不守本分。发展下去，这次不犯错误，下次也要犯错误。当然，错误有两类性质。一类是一般性的，这种错误往往是不自觉的，是认识问题；再一类是特殊的，一贯的，这种错误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根本立场问题。一个人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往往是从不自觉开始，如果不改正，就要发展到半自觉的直到完全自觉的犯错误。当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明明这条路走不通，他却偏偏要往那里去；明明前面是陷阱，他却偏偏要往里跳。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罗正是这样。他不是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放纵发展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致最后让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自己，利令智昏，当了反党分子的接班人，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一九六六年四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
发言

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杨成武同志揭发材料摘述)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多年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反复地教导我们说，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它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党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就是党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林彪同志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这些精神，在军委多次颁布的海边防守则中都有明文规定。罗瑞卿对此不是不知道，不懂得，相反地他还常常以此为理由，批评过很多人，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但他自己却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的这些规定。一九六×年×月，他对福州军区副参谋长肖剑飞同志讲，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罗的这些作法，不仅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党中央、军委规定的方针政策，而且是一个人私自布置的，总参有关副总长和有关业务部门对这件事毫无所闻，党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也没有人知道，直到福州军区请示如何执行罗瑞卿的这个指示时，才知道。党中央、军委认为罗瑞卿的这一做法是非常错误的，非常危险的。以后军委纠正了这个错误。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六月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九六二年六月曾两次指示说：“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一九六四年六月又进一步指示说：“民兵工作首先搞组织落实，要把民兵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一九六五年四月更进一步明确指示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是组织落实，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民兵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

罗瑞卿对毛主席的指示却公开唱反调。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一九六四年十月在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思想落实，组织和军事才能落实”。“如果政治上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被坏人夺去了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就越会干坏事。所以，还是政治第一，要把关系搞清楚”。

罗瑞卿这些讲法，不仅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而且是公开地“教训”起毛主席来了，指责毛主席把三落实的关系没有搞清楚。这是何等狂妄！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毛主席这个指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恢复我军传统体制，即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体制的大问题，是贯彻人民战争的大问题，也是使主力军能更好机动的大问题。罗瑞卿对这一指示，既不传达，也不布置执行，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总参有关副总长和业务部门谁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两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并且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拨出××个师，给沿海各省，同时对罗进行严厉批评之后，罗瑞卿才被迫布置。但他是怎么布置执行的呢？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他一方面推卸责任说：“主席在几年前就讲过了，就是没有落实，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当然，我们也考虑过，就是优柔寡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另一方面他又告诉大家，毛主席的指示还可以打折扣。他说：“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武装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罗瑞卿的这种做法，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对毛主席的指示，可以拒不执行，可以马马虎虎，仅从军事纪律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

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一九六零年二月广州军委扩大会议，和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时，林彪同志代表军委曾经多次明确提出，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的原则，宣布了军委常委各同志的分工，并说：“党的军委会组织了常委，重大问题集体讨论。”但是罗瑞卿不仅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领导，还经常借题发挥，讽刺挖苦。

(一)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如一九××年拟制的××协同作战计划，和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均未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罗瑞卿极力辩解说，军委常委的同志，外出的外出，开不成会。但这种辩解是无用的。处理这几件事时，恰好军委常委的多数同志都在北京。退一步说，即使军委常委同志不在北京，也应该在电话上或者派人或者亲自去请示报告。用这些话作为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许罗瑞卿还会狡辩说，这些事都报告中央了，军委常委可以不必开会研究，同时当时忙得很，来不及向军委常委同志请示报告。但这种辩解也是无用的。那时罗瑞卿既然有时间去跳舞、钓鱼、看戏、看电影。接见文工团等等，难道军委常委同志报告一声就没有时间？都没有可能？都没有必要？退后一步说，即使事前来不及请示报告，事后也应该报告嘛！可是有些事，事后也没有报告。

(二)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但一不合罗瑞卿的意，他就发脾气，顶回去。例如××年×月，军委常委开了会，讨论了中印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请他考虑决定。罗瑞卿听了以后就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显然这是公开地对抗军委常委。

(三)罗瑞卿对军委常委各同志是很不尊重的，经常借题发挥，讽刺挖苦。当然，他对军委常委各同志不尊重的程度和表现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但不尊重是共同的。例如：

××年×月×日，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说：“军代表制度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聂荣臻同志知道这件事后，曾于七月七日当面告诉他，“一个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七月、八月林彪同志也曾两次指示，他完全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军代表制度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

不动。然而××年×月×日，罗瑞卿在全国科技交流与保密工作会议筹备会上，却气势汹汹地说：“有人说取消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年×月，军委××会议结束后，作战部起草以军委的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的综合报告稿中，曾提到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精神，在会议期间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对大家正确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启发很大，教育很深。这个报告草稿送罗瑞卿审查时，他要秘书邓汀同志告诉作战部说：“是军委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写这么多林副主席，不好。你们再考虑考虑。”作战部接到这个电话后，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应该写上。并认为，林彪同志再次强调突出政治和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有大预备队思想，这两个问题必须具体写上。作战部写好后又送罗瑞卿审阅，他却又把“林彪同志”改为“我们”。稿退回后，作战部认为，“我们”两字太不确切，因为一定要突出政治和一定要有大预备队思想，这些观点本来就是林彪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的，而且有鲜明的针对性，为什么不能写呢？

××年×月，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攻击国防科委说：“我对国防科学技术工作想起了一副对联，‘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横额是‘一事无成’”。并且说，这横额是他儿子替他想的。实际上这也是对聂荣臻同志的恶毒攻击。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讨论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的工作，主席不大满意，当然，有些也是满意的”。“刘伯承是老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徐向前办过一件好事，即在草地时反对过张国焘要红军打红军的主张。”言外之意是徐向前同志除了这件事以外，再没有办过好事了。

第六、封锁 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林彪同志由于罗瑞卿长期进行封锁，从一九六一年起，曾对他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通气，希望他改正错误，但他仍然不改。许多重大问题，自己不报告不请示，也害怕和不准别人去报告，去请示。例如：

(一) 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对干部工作作了明确指示，说今后军队×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向罗瑞卿和军委办公会议以及总参、总政作了传达。但罗瑞卿对林彪同志的指示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

干部的定级，罗瑞卿未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中央书记处，等到中央书记处批了以后，才送给林彪同志传阅。事后，罗瑞卿还说，干部定级的报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是政治性问题，不是原则问题，用不着一个一个请示。罗瑞卿的这种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1）毛主席早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2）这些干部都是军队的高级负责干部，须要慎重考虑。（3）林彪同志刚刚打了招呼，罗瑞卿这样做是明知故犯的。（4）罗瑞卿事后说的这些话，也是违反组织纪律的。

（二）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谈到通气问题时，罗竟然向林彪同志说：“问题是在于做的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这是何等狂妄的态度，是他坚持封锁，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的自供。

（三）罗瑞卿经常以照顾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若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打击。例如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同志由××去××之前在北京住了三天，罗瑞卿主动向××同志打招呼说：“林总今天已到北京，身体不好，叶群同志在电话上和我说，林总什么人也不见。”并说：“我不去看林总了，你们也不要去看。”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半夜，即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前夜，杨成武同志看到最后决定原子弹爆炸时间的文件之后，将这份文件亲手签封，交作战部的参谋送到罗瑞卿的宿舍。罗瑞卿看过后，很不高兴地对作战部的参谋说：“不是讲过了吗？军委传阅文件我负责，总参范围传阅的文件由他（指杨成武同志）负责。他管总参内部文件就行了，又搞无效劳动。”足见罗瑞卿垄断和封锁到了何等程度！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罗瑞卿在原子弹爆炸的问题上捞了不少资本，但实际上他对原子弹爆炸的事是很不负责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在济南看大比武。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等领导同志昼夜值班，他却照样睡他的大觉。

（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去林彪同志处，总理托他向林彪同志转达几个重要问题，他根本没有转达。林彪同志问他现在毛主席在什么地方？罗瑞卿说：“我不知道，只知道主席坐火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实际上他是刚刚在××送毛主席到××去的。

(六) 罗瑞卿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向来没有正式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过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大家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个人的东西。

第七、撒谎、造谣、挑拨、抵赖 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例如：

(一)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修改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主席讲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我们长时间对这种说法迷惑不解，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所说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是就政治思想工作来说的，根本不涉及人的阶级关系问题。而且据我们所知，毛主席对林彪同志四个第一的提法，是评价很高的。例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写给林彪、聂荣臻、萧华诸同志的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了，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又明确地指示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这是个发现”。但我们过去却没想到罗瑞卿竟敢假借毛主席的名义，也不便去查对。最近查对了一下，证明罗瑞卿说的这些话完全是假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汪东兴同志也从未向他传过这些话。可见罗瑞卿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来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彪同志，并妄图以此来挑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阴谋。

(二) 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时，有一次对罗荣桓同志说：“主席横渡长江，我组织人做保卫工作，主席大发脾气，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再也不愿见到你罗瑞卿。”罗说时还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显然，这是在罗荣桓同志面前，造毛主席的谣，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

(三) 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到林彪同志处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因横渡长江和派警卫车等问题，毛主席批评了他。因此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

开毛主席。林彪同志当即严厉批评了他。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未要他陪同，到××开会毛主席未让他一道坐飞机去，罗瑞卿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可见他对毛主席的怀疑不满是由来已久的。他和林彪同志谈这些事，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据说他对罗荣桓等同志也说过这些事。

(四)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谈到《解放军报》办得不错时，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不喜欢看《人民日报》，蒋介石也从来不看《中央日报》！显然，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的恶毒诽谤。

(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党中央曾规定：罗瑞卿、萧华、杨成武三同志不能同时外出，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北京。但是一九六五年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都病了，在外地休养，只有罗瑞卿一个人在北京，而且在中印边境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罗瑞卿却跑了出去，先到广东，以后又到广西、云南，按照他的原定计划，还要在昆明住一个月，以后再到四川去。他对周总理和林彪同志却只说到广东，如有可能再到广西去一下，根本没有提到到云南和四川去的事。这不仅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规定，也欺骗了周总理和林彪同志。

(六)罗瑞卿曾多次造谣、污蔑林彪同志，挑拨林彪同志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例如他先后向杨成武等同志说，罗荣桓同志病危的时候，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和挑拨。

(七)一九六五年五月，邱创成、方强等同志调到工业部工作时，罗瑞卿一方面告诉总政干部部门研究他们的转业问题，一方面又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二百五十次会议讨论总政根据他的指示所写的报告时说：“这些人的转业问题，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愿转的就转，不愿转的可以不转。”实际上林彪同志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第八、伸手 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

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 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行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自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全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广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 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 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 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再去管了；(4) 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

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五)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

一九六五年五月××下午，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会议的全体同志。在接见之前，罗瑞卿曾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在接见中，罗瑞卿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这些问题，事前罗瑞卿并未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其他同志，完全是“突然袭击”。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本来，罗瑞卿所提出的合并军区、把兵种领导机关变成总参谋部业务部门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意见，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一情况罗瑞卿非常清楚，但他不仅不坚决贯彻执行，向各军区强加军委××会议的同志作解释说服，反而有计划地，别有用心地向中央常委和林彪同志出难题。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

在各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这是一个阴谋。也许罗瑞卿会辩解说，我是利用中央常委接见的机会向党中央请示嘛！但这是无用的。（1）你既然知道主席和林彪同志不同意这些意见，为什么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去提？（2）你即使要提，为什么不先向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请示，得到同意以后再提？（3）你即使请示中央常委，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是活着的马克思、列宁，他不仅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新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要兴旺，要靠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要胜利，也要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公认的真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革命或反革命，是真革命或假革命，是真共产党员或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的首要标志。我们对国际革命运动，最重要最有效的援助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武器、弹药、物资和金钱。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对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都应该热爱她，坚信她，依靠她，学习她，宣传她，实现她，保卫她。但是罗瑞卿却相反，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

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

国影响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以上事实，分析说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是由来已久的。这些事都是有人证物证的。

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极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是他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他企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我们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以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军队。

二、为什么说罗瑞卿推行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呢？这不仅从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中可以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其它许多方面看出来。为了明显起见，我们不妨比较一下。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

三、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中各项工作必须突出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军事要服从政治。罗瑞卿却反对突出政治，削弱政治工作，搞什么单纯军事技术的大比武，说什么反对“空头政治家”，说什么军事政治并重，或者宣扬什么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等等。实际上是要政治服从军事。

四、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只能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罗瑞卿却妄图把军队和党对立起来，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他可以不执行，唱反调。或者阳奉阴违。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个人独断。显然，他是向党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在他看来，军队乃是他向党伸手的工具。

五、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实行群众路线，实行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罗瑞卿则处处搞个人独断。对上不尊重，对下无民主，对人对事不讲原则，常常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一言堂，训斥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完全破坏了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

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人民军队的体制应该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军队的体制应该服从人民战争的要求。罗瑞卿则只看到主力军，而对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极不关心。

七、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军三大纪律的第一条。罗瑞卿则破坏纪律，不听指挥。

八、在作战问题上：（略）

九、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人民军队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一切军事行动，首先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考虑，要服从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政治统帅军事。罗瑞卿则是单纯地从军事上、从战术技术上考虑问题，他对东南沿海作战的错误指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十、从上述两条路线的比较中，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按照罗瑞卿这样的军事路线去办，我们的军队，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会变质。就会变成一

支愚昧无知的，只懂得单纯军事技术的，只懂得盲目服从官长命令的资产阶级职业军队。就会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革命的军队就会变成反动的军队。这是何等危险的大事呵！当然，我们的军队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培育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有坚强政治工作传统的革命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伟大军队，罗瑞卿要想实现他的篡军反党阴谋，是绝对办不到的。

十一、罗瑞卿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很多问题上，他不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而是投机，看风使舵。凡是对他有利可图，有名可占，有权可夺的事，他就抢着干。什么接见呀！照相呀！登报呀！抢版面呀！写文章呀！发表演说呀！大比武呀！“工作归口”呀！等等，他特别积极，特别感兴趣。但当某件事对他不利，或者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别人只能受他驱使，为他抬轿子，决不能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唯我论者。

十二、罗瑞卿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视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因为林彪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在军内、党内有高度威望的领导者，又是罗瑞卿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行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罗瑞卿要搞野心，就非攻击林彪同志不可，他妄想把林彪同志攻倒。如果能够把林彪同志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以落入他手，而且为他进一步篡党篡国做好了准备。因此，他反对林彪同志就是篡军，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他不仅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还直接反对毛主席。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对毛主席的怀疑不满，对毛主席指示的对抗，对毛主席的造谣污蔑，和对党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攻击，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党分子。毛主席反复地教导我们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要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煽动来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这是不许可的。无论那年，无论那个时候，都是不许可的，绝对不许可的。”

十三、罗瑞卿篡军反党活动的特点是打着红旗造反。他的主要理论是折中主义，也就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他的主要手法是阴谋权术。他反对突出政治的几篇讲话，是最典型的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观点，到处都是阴阳话，从形式上看是正面的，实际上是反面的；看起来好象是辩证法，实际上是诡辩论；猛然一听好象是全局观点，仔细一想都是折中主义。至于他的言行，那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罗瑞卿为什么要这样转弯抹角呢？这是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世界革命斗争空前高涨的时代，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时代，是人民的无产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的时代。毛主席、党中央和林彪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极高，罗瑞卿知道，在这个时代，要公开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林彪同志，马上就会身败名裂。因此，只好把自己装扮起来，打着红旗造反，或者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甚至是“跪着造反”。但也正因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它的欺骗性就更大，危害性也更大，因为“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所以，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十四、罗瑞卿犯错误是偶然的吗？不。他犯错误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十五、首先，罗瑞卿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资产阶级思想在他脑子里是很深的。为了个人得权得势，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

十六、其次，目前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进行大较量的时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进行拚命挣扎，正在拚命搞反华大合唱，把它们的战略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我国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这些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自然要反映到党内军内来。我们越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越是要突出政治，阶级敌人就越害怕，越感到没有藏身之地，就越要挣扎，越要反抗。罗瑞卿近几年来之所以拚命地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拚命地搞篡军反党活动，就是这个道理。

十七、再次，罗瑞卿很可能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近几年来，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对军队的无比关怀和大力支持，由于全军同志的共同努力，由于大学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

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等，军队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主席、党中央又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罗瑞卿就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解放军工作成绩的功劳完全挂在他的账上。加上近几年来他的名望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集中，不仅军队归他管，国防工业归他管，而且很多地方工作，党的工作，他也乱加干涉。不仅国内的事他可以管，国际上的事他也很有说话和插手的机会。因此，他很可能自以为很高明，自以为了不得，自以为很有本钱，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党伸手，公然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了。真是利令智昏！其实，他完全打错了算盘。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谁敢搞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

十八、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我们和他的斗争，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斗争，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上的斗争，不是对某一个偶然犯错误者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革命利益，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颠覆反颠覆、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无情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与罗瑞卿进行斗争，彻底粉碎他的阴谋诡计，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维护党的利益而奋斗。我们党和军队，我们的革命事业，在粉碎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之后，一定会更加兴旺，飞跃前进。坏事必将变为好事。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又受到一次最深刻、最主动、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当一辈子老实人，当一辈子党的驯服工具，这是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

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一论突出政治》

突出不突出政治，是一个方向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是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是让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好些同志来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或者是没有认真想过，或者是没有想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些同志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建设当然是发展社会主义，那里还有什么方向问题呢？其实，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搞建设，首先是靠政治。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什么事情都搞不好。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又说：“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基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地主占有土地，用来剥削农民；资产阶级占有工厂、矿山等一切生产资料，用来剥削无产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正是集中表现了这种经济上剥削和反对剥削的关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它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被统治阶级要推翻剥削制度，建立合乎本阶级利益的经济制度，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依靠自己的政权，来建立、巩固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封建主义经济，在奴隶社会中就产生了，但是只有在封建阶级推翻了奴隶制度以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中就产生了，但是，也只有在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度以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奴隶制经济、封建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不可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

列宁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这就是说，任何阶级社会，都是突出政治的。不是突出这个阶级的政治，就是突出那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要靠政治来给它开辟道路，靠政治来保护它和发展它。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更加要求突出政治。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已经完善、已经巩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我们所以强调突出政治，自觉地抓阶级斗争，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发展规律提出来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远未结束。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反动阶级，总是继续企图复辟，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篡夺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他们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念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勾结起来，不断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种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阴谋活动。这些现象，都表明了在经济战线上并非万事大吉，而是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倒退，长此下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内部，在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内部，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及时加以解决，就会扩大，甚至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在旧社会里，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代之以普通劳动者之间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新的关系，并不能随着所有制的改变而自动地建立起来。旧的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管理制度，从外国照搬照抄过来的框框，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的影

响，各种各样的习惯势力，都阻碍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的新型关系特别集中表现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上。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绝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党和国家的干部同群众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应该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而绝不能有任何特权。要完全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严格实行社会主义原则，从制度上、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以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关系。否则，干部就有可能利用职权，使自己特殊化，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侵占别人的劳动果实，以至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就是由于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利用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改变了按劳分配的制度，以至使工矿企业和集体农庄都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工具，逐步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成徒有其名的外壳，实质上蜕化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这种变相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就形成了新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逐步建立和发展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新型关系，防止新的特权阶层的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一场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敌人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首先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优势。由于还存在着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文学艺术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势力，甚至还统治着某些地方和单位。阶级敌人就企图利用这些条件，在社会主义内部推行“和平演变”。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抓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势必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毒流泛滥。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人的头脑里，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去占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打退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不断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阵地。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克服以至最后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出一代新人，保证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大大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一个很长时期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不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不逐步缩小这些差别，反而扩大这些差别，那就不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而势必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要缩小这些差别，首先就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大大发展生产力。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使我们不能不严肃地考虑：怎样才能避免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没有解决的极其重大的问题。鉴于苏联的教训，我们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我们的劳动政策、分配政策、教育政策、文化艺术政策、干部政策、对外政策等等，我们的各行各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军事、公安、文教卫生、外交、党务等等部门的工作，都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建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工矿区的政策，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同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有关的。任何一项缩小三大差别的措施的实行，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社会上旧势力的反对。同这种旧势力作斗争，实质上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不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不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

资本主义势力，那末，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就会扩大，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瓦解，资本主义势力就会泛滥，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就向全党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对全党的这个告诫。

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具有突出政治的优良传统。早在三十多年前，在我们党建立起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指出政治统帅军事。从那时以来，毛泽东同志一贯地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其如此。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目前，全国出现的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和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新高潮，也正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结果。

一切部门、各个战线的工作同志，都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努力支援世界革命，并且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目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正在展开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大讨论。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这次讨论，都能够真正懂得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的真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事事时时坚持政治挂帅，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是突出政治，把政治摆在首要地位，还是轻视政治，把业务摆在首要地位？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总是企图复辟。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文艺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方面），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凭借他们的“业务知识”，装出一副超然的“不问政治”的样子，散布种种重业务、轻政治的谬论，麻痹群众，篡夺业务工作的领导权，把业务工作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的一些同志，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认识不清，往往迷信资产阶级专家，迷信资产阶级教授，重业务，轻政治，自觉或不自觉地滋长起单纯技术观点，埋头业务，不问政治，使业务工作迷失方向，以至滑到邪路上去。如果不突出政治，不以政治统帅业务，不克服我们一些同志的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不同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夺领导权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前进，就会遭到严重的危害。

那末，政治和业务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政治是方向，业务是实现政治方向的手段或技术。政治统帅业务，业务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业务是第二位的。这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一切业务都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项业务活动，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制度。由于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力图把这种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掩盖起来，把它的业务说成是同政治无关的，是为“人民谋福利”的，等等，来欺骗人民群众。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业务都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我们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其它业务活动，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了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充分的物质

条件和精神条件。这是个根本方向问题。各项业务工作，都必须坚持这个方向，而不能脱离这个方向，违背这个方向。

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就是要保证各项业务工作都沿着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前进，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是要保证各项业务工作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党对各项业务工作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在各项业务活动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就是要在各项业务活动中，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这种倾向会使各项业务工作迷失方向，违背党的方针政策，脱离党的领导，使业务工作没有灵魂，毫无生气，冷冷清清，死死板板。在这种情况下，各项业务工作不仅不能发展，而且会走上背离社会主义的邪路。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地反复地同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进行斗争。这是当前突出政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这是因为，如果政治不落实到业务上，不同业务相结合，那末，政治就会落空，政治目的就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政治就失去了统帅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就会占领业务的阵地。我们在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要努力造就各个方面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努力学习科学知识，钻研生产技术，做好各项业务工作。那种以为强调突出政治，就可以放松业务、不抓生产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解。

但是，目前各项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忽视政治的倾向，是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业务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都成为那些反对政治挂帅的人攻击突出政治的借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提高警惕。

必须了解，政治和业务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决定业务的方向和性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又要落实到业务上，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我们必须注意把业务和政治结合起来。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政治和业务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以红带专，又红又专。这就是政治和业务的正确关系。

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子，惯于骂我们共产党人“靠政治吃饭”、“靠政治起家”。这些老爷们和先生们骂对了。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共产党开始成立的那天起，我们就公开声明我们是搞政治的，是搞阶级斗争的。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这就是搞政治，这就是搞阶级斗争。就在那时候，我们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展生产，办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一切事业，都是靠突出政治，以政治统帅业务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并且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有这些都是搞政治，都是搞阶级斗争。我们正是通过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进一步强调突出政治，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事实都证明，我们必须突出政治，用政治统帅业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须如此。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认为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结束了，忽视事实上还存在着的敌我矛盾和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不去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不把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如果认为“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在实际工作中就会产生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产生强迫命令等脱离群众的作风；那末，其结果就会使得各色各样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以所谓“专家”、“学者”的面貌出现，混进各种业务部门，窃取某些地方和某些单位的领导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在“经济第一”、“技术第一”、“业务第一”、“专家第一”等口号下，依靠大批以“专家”、“学者”自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霸占了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岗位，打着“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把各项工作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严重的历史教训。

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攻击我们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不懂科学，不懂技术，说什么“外行

不能领导内行”，企图把文艺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拒绝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同我们实行形式上的合作，一有空子可钻，就破门而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实表明，如果我们放松了警惕，不突出政治，不坚持政治统帅业务，那末，我们的各项业务工作就有可能变成资产阶级实行复辟的工具，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半途而废，我国人民就会遭到绝大的灾难。这是我们需要时刻注意、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永远突出政治，把政治摆在首要地位，把业务摆在从属地位。一方面，要坚决防止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夺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权；另一方面，要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业务的重大意义，努力使自己沿着以红带专、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怎样正确看待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大事。有的同志由于认识不清，不了解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性，把两者看成是各自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他们错误地认为，突出政治是党委和政治部门的事，是党委书记的事；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县长、厂长、公社社长、技术人员等，只要抓好业务就行了。他们不懂得，各项工作都是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既没有无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无业务的政治。任何业务，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任何政治，都要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认为政治和业务可以互相分离，这是根本违反客观实际，因而是错误的。政治部门和行政、技术部门，搞政治工作的同志和搞行政、技术工作的同志，虽然在具体工作上有所分工，工作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不仅如此，进行这些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都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都要做人的思想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无论做那项工作，都必须坚持突出政治。离开政治去做行政、技术工作，不仅行政、技术工作做不好，而且会使人埋到业务堆里去，迷失方向，走上邪路。以任何借口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推卸突出政治的责任，都是不对的。

政治和业务既然是统一的，那末，能不能说业务好就是政治好呢？不能。政治是统帅业务的，是灵魂，政治好了，就会认真钻研业务，业务也就一定能好。但是业务并不等于政治。有些同志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工作上也能暂时作出某种成绩，但是如果政治不过硬，他们的业务能力就难以继续提高，他们的工作成绩就不能巩固，就不能持久。由于政治上不过硬，这些同志往往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的或本单位的利益出发办事，甚至投机取巧，不择手段，损人利己，违反党的政策。这些同志如果自恃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忽视政治，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发展下去，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因之，绝对不能脱离政治去谈什么业务好。强调业务好就是政治好的人，实际上是要取消政治。

有些同志认为，政治重要，业务也重要，半斤对八两。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前面已经说过，政治是统帅。政治和业务，当然不能平起平坐，不能轮流坐庄。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政治摆在第一位，而不应当把业务摆在第一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抓业务。问题在于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如果脱离政治，只抓业务，业务就不能真正抓好，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在哲学上就是折衷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机会主义。犯折衷主义错误的人，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人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借口政治和业务同等重要，以业务取代政治。对这样的人，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有的同志由于错误地把政治看成是完成业务的手段，有时强调一下，有时就把政治丢掉了；闲时还讲一下政治，忙时就顾不上要政治了。这是对突出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把突出政治看作是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完成业务工作的根本之道。也有的同志由于对突出政治的意义认识不清，在工作中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他们不是把政治看成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南，而是空喊政治挂帅，实际上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害的，应当切实纠正。

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政治和业务关系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次大讨论，必将进一步促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弄清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我们一定要坚持突出政治，坚持政治统帅业务，坚持突出政治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会从政治出发去抓军事，抓农业，抓工业，抓财贸，抓文化教育，抓科学技术，抓一切工作。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三论突出政治》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突出政治的根本问题。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才能使革命人民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也才能使革命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不断胜利。

人的一切行动，都受着一定思想的支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是受这个阶级思想的支配，就是受那个阶级思想的支配。革命的人民为了实现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改造主观世界，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用革命理论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

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唯一思想武器。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和壮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一系列的国家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的学说，它是随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没有碰到的或者没有解决的一系列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在，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变为现实，怎样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怎样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同志总结和概括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核心的问题，抓住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抓住了对立统一这个最根本的规律，全面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彻底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实践中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国内问题上，也在国际问题上，在政治领域、军事领域，也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毛泽东同志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特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大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都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同志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以及军事学说等方面，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人民群众，就能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我们党四十五年的历史中，凡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而一旦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就能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国际斗争的实践也同样证明：正因为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的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斗争实践的检验，经历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实践的检验，经历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极其宝贵的共同财富。在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思想正发生着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统帅一切，就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抓阶级斗争，搞革命，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争取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新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里既包括国内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包括同大自然的斗争，也包括我们自身的改造。而指导我们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革命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首先是不断地促进我们的思想革命化。只有思想不断地革命化，我们才能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比较正确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使我们能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为世界人民的大多数服务。

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指出明确的政治方向，使我们能够用阶级观点分析复杂的形势，坚持阶级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懂得，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就能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发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规律性，形成正确的思想、计划、方案，又根据正确的思想、计划、方案去行动，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毛泽东思想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从实际情况出发，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不断地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提高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工作水平，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突出政治，解决政治和业务、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真正认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狠抓“四个第一”，狠抓活思想。要切实纠正那种只抓业务，不问政治，只重视生产指标和技术措施，不重视阶级斗争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必须认识，我们的一切工作，如果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不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就势必走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广大工农兵自觉地直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锐利武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一分为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哲学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深入人心，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各个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反复学，反复用，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突出政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的一切工作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会后，党中央指定了周恩来等同志对他进行了多次的耐心教育和帮助，罗瑞卿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

受了委屈，各方面为自己辩护，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又揭发了罗瑞卿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的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由于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第二阶段的会议，只好又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罗瑞卿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指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还有天高的吗？难道没有更高了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能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有什么人再敢提个人天才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解释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登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却嫌搞多了。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同志指示，把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和军委的文件编成教材，作为干部、战士的必修课，罗瑞卿借口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了，不准印发。林彪同志指示，要在

民兵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罗瑞卿却胡说“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罗瑞卿还指责歌舞剧《水兵的光荣》中，唱“敬爱的毛主席”太多了，说要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不要单独地唱。

罗瑞卿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一贯教导，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罗瑞卿却胡说：“农民有一部分自发倾向，想搞单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胡说：“我们军队本身不存在阶级矛盾，但是存在立场不坚定，阶级觉悟要提高，要抵抗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侵蚀，以及对政治问题要有辩证的分析方法问题。”

罗瑞卿当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刚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罗瑞卿却在五八年大搞什么“十无运动”，限令做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等等，并把苏修的东西拿来做依据，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问题主要是外部的原因了，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这种做法虽然受到党中央多次批评，但是他仍然坚持错误，仍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又接着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熄灭论，1958年x月，他就公开说过“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灭，专政工具也是如此。”“现在反革命更少了，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这个意义上讲……（不清）在开始消灭。”毛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罗瑞卿却强调垂直领导，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搞苏联“格伯乌”那一套。

罗瑞卿在新疆地区反对苏联搞颠覆活动的斗争问题上，违背和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指示，他诬蔑我们在中苏边境上“制造人为的紧张”，对中苏边境的纠纷为苏修开脱罪责，说什么“不能说多数是他们挑起，要做具体分析”，一九六二年x月x日，xx地区的暴乱事明明是苏修策划和组织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却极力为苏修开脱，轻描淡写地说：“我看与他们的领事馆有点关系”，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说：“不晓得这笔历史怎么写法”。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擅自宣布边境地区的五类分子不要内迁，责备x

军区在 x (看不清) 边境制造“无人区”，他还胡说：“现代修正主义攻击我们进行民族 xx (看不清)，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罗瑞卿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罗瑞卿却阻挠和反对设地方武装，忽视民兵工作。

罗瑞卿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指示，既不布置执行，也不……（漏）竟然拖了近三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二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拔出 xx 个师给沿海各省，并且对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罗瑞卿这时才被迫去布置。但是，他在布置时指出：“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部队结合起来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结果，主席的指示还是被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xx、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运动中要自始至终地抓民兵工作，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要做民兵工作，罗瑞卿却一再反对，说四清运动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设阶段抓一下就行了”，并且规定“军队干部下去参加社教工作不要另外赋予搞民兵的任务。”

罗瑞卿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调。近几年来毛主席多次指出，民兵工作的三落实，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首先是有没有，随后是讲政治。罗瑞卿却狂妄地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他反复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越坏，被坏人夺去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越会干坏事，”“要把关系搞清楚。”罗瑞卿在这里好像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用诡辩论否定毛主席把民兵组织起来的重要指示。同时，罗瑞卿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统统给冲垮了。

罗瑞卿还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毛主席历来教导，文艺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是艺术标准，首先要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

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罗瑞卿多次在部队文艺队伍中强调，部队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突出艺术。他胡说什么“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显得太单调，太枯燥”。 “我军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到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

罗瑞卿公然修正毛主席关于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理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说什么：“我们部队不要搞先进、后进，不要提后进战士，”“后进战士这种概念应该取消”，“我们军队中，只要有党员、团员、五好战士、英雄模范、革命军人这些名称就行了”。

罗瑞卿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还对别人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并没有要他陪，到 xx 开会，毛主席没有让他一道坐飞机去，他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这证明他对毛主席怀恨在心由来已久的。

罗瑞卿这样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就是敌视、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力图以资产阶级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是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是他力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阴谋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罗瑞卿没有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和军委训练委员会，也没有请示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和军委常委，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还十三次到各地督战，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

大比武是比军事，比技术，提倡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个第一，否定了军委决定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工作的方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为了在比赛中争第一，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普遍，单纯的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的倾向大为发展，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严重地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由于大比武，部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歪风邪气上升，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为了比武，不加 xx 选拔干部和发展党员、团员重技术、轻政治。有些单位排挤工农干部，把政治思想品质好，但技术稍差的干部撤换了不少，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大比武也冲击了正常的军事训练，练为看，不是练为战，搞了一套形式主义，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比武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训练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冲击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发生了许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一贯建军思想，建军的历史经验和当时部队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比武的错误。对于这个指示，罗瑞卿不仅不执行，反而千方百计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内他对林彪同志指示内容反复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阉割其革命精神，塞进了许多私货。一九六五年初，他在军委办公室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和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院校的讲话中，他都竭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并且恶毒地进行煽动。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罗瑞卿在高等军事院校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的讲话中，公然煽动大家说，对于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以后写信来。”他到处别有用心的讲，对于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辩证的”理解。他还说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泼冷水，他到处散布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领导军事的基本观点，而强调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反对所谓“政治家”，说什么“政治搞不好别的就搞不好，但是，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搞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那里有这种政治。”“一定要明确理解林彪同志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我们训练就是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就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作战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亡党亡国”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以后，五项都遭到罗瑞卿的反对和歪曲。罗瑞卿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还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这一条说成是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几条放到次要地位。军委已经决定把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年工作的方针，他却别有用心地强调主要是解决方法问题，说什么“不解决方法问题最好的方针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是“瞎说一通”。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说过罗瑞卿个人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无运动”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严重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都是严重的错误。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曾再次明确指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的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罗瑞卿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竟然于一九六 X 年 X 月 X 日私自指示福建军区，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

罗瑞卿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往往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发脾气，要回去。如一九 XX 年拟制的 XX 协同作战计划，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缅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没有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又如一九六二年 X 月，军委常委开会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大家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最好调一个部队到中印边境西段去，当时军事工业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应加强，使常规武器、弹药能增加一些储备。会议上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同志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要 XXX 决定。他听了汇报后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

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等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罗瑞卿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〇年底，他在国防工业办公室会议上，竟狂妄宣布：“新军委成立后，中央、军委、林总队国防工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军总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的十七条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确的，加以修改，不正确的取消，他否认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以后，他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一事无成。”

林彪、聂荣臻同志不同意罗瑞卿提出的在国防工业中马上取消军代表的主张，多次主张，多次提出：“军代表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罗瑞卿狂妄地说：“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罗瑞卿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有许多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军队系统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部所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公安部建制。这个受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批评，以后他就积极地扩大公安部队，并且企图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垂直领导系统，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

罗瑞卿还利用各种机会，当着下级干部面，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威信。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

罗瑞卿身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很少认真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党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是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和他个人的东西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那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那些是他自己的东西。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后，曾对他多次教育，希望他通气。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正确指示，今后军队七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长的任免，要请示报告军委各同志，然后再报上级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名义

报中央书记处。罗瑞卿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和打击。

罗瑞卿是典型的“一言堂”，极端不民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许多重大问题，他不经过军委常委，不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不经过总参、总政，常常是个人批示决定。即使是军委常委、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决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随便推翻，任意改变。军委办公会议经常是他一个人讲话，别人发言，常常被他打断顶回去，不让人家把话说完，甚至讽刺挖苦，恶言伤人。军委常委开会，也是他讲的多，军委各位副主席的讲话也常常给他插断。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听不得半句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给他提意见，他就长期怀恨在心，寻机打击报复。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罗瑞卿个人突出，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称王称霸，想尽一切办法争名誉，争地位，争风头，不择手段地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他特别热衷于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极力为自己争版面，争头条，争画面，争镜头。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常常抢先发言表态，把自己宣扬成党和国家的权威发言人的样子。

罗瑞卿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已有，并乘机搞起来大比武，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再如：罗瑞卿还把自己装扮成反彭、黄的英雄，到处说自己是受害者，说延安整风时，他批评了彭德怀，是彭害死了他。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野政工作时他跟彭德怀是跟得很紧的。延安整风时，他看到彭德怀又担负了重要职务，到太原前线来了，于是又跟了上去。当时，彭德怀表示反对延安整风受批判不满，罗瑞卿接着向彭说：“我也觉得对你的批判过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饶联盟反党时，他又陷了进去。这说明罗瑞卿是一个很典型的投机分子。

罗瑞卿在军委工作的这几年，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从来没有到基层去作调查研究，也不愿意听取人家的汇报。他在工作上极端不负责任，严重失职，他倒装成很忙的样子，并且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战略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罗瑞卿虽然入党几十年，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罗瑞卿对于培养他几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友毫无革命的阶级感情，冷酷无情，视若仇敌。

罗瑞卿对待他的公务员殷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亲属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殷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之弟，他在罗处工作十年，照顾罗的生活，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但罗对他百般虐待，犹如奴隶，相反，罗对于他的地主家庭却很有感情，甚至把反革命的地主岳父，窝藏起来，成为反动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

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 X 月 X 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 XX 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

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 XX 日，即在 XX 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不但阴谋篡夺军队的大权，他还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手。本来他是管军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权越位，常常以个人名义，以命令口气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批过大量文件，许多事情他不加调查研究，乱加批评指示和黑指挥，这种事例很多。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颗埋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

这次小组会议，大家根据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戴了几顶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千方百计进行狡辩和抵赖，并且投下了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以后翻案。他的检讨引起到会同志的极大愤慨，当场受到许多批驳。之后，他又以来不及作好检讨为借口，要求先散会，大家回去工作，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此计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进行要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走上叛党的道路。他在跳楼前写的遗书是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反扑的毒箭，在“遗书”中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错误也全部推翻了。

会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历史和思想根源的，罗瑞卿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入党三十多年来，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在民主革命时期……（脱落几句），拒不改正错误，终于在近两年恶性发作，来了个大暴露。罗瑞卿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他不择手段，作了各种坏事，直到公开向党伸手。结果就全部剥落了自己的伪装，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及时地觉察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断然地采取处理这一问题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继中央上海会议后，又召开了支持小组会议，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粉碎了他篡军反党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证明了我们军队是党的无比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几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军队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对罗瑞卿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出了一个反党分子罗瑞卿，丝毫也无损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粉碎

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后，坏事将转变为好事，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辉煌的胜利。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 (一) 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 (二) 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 (三) 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 (四) 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 (五) 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指示。

中央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66〕268号）

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十三日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转交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

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中共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二、研究资料

二〇〇五年十月，炎黄春秋杂志第十期刊载陈虹的文章《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一 小引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著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二 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

问题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 1965 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 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 1929 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 1964 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到了夏天，5 月 2 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意的。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 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

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听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5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可以。”我答。随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

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罗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总。”“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州。

三 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在总参工作已有多年，毛主席接见外宾或开会时也见过多次，单独找我谈话问情况也有的，但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么？谈工作？自己养病已4个多月没有上班，手头也没有什么现成资料。而徐秘书在电话里又只字未提，因而想作点准备也无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准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也拿不准。因此自己抱着毛主席叫办的事一定认真去落实，问什么，就我知道的如实回答的态度，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朴典雅很幽静的房子里，我到那里，徐秘书让我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一走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主席走到我的对面，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说话。这时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来时脑子里想这想那的猜测，顿时消散了。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军队的情况怎样？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各位老帅怎样？”“老帅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彪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我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换了个话题。“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我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我谈的那些情况。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我即回疗养院。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为揭发和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做准备。

四 毛主席鼓励罗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用8个月时间写成的，上海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过多次，讨论时据说关锋、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发表后，上海各种报纸都刊登《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在上海，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他对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主席还交代：“对什么人都不要讲”。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2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

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代表军委的喉舌。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议一议”，这种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态说得很严重的导向性按语，对于并不了解真情又忠于党的军队广大指战员来说，所起的号召和鼓动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北京日报》同日也转载了姚文，并写了一篇按语。按语把问题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的范围之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阶级斗争反映”的问题。11月28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罗瑞卿离开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泽东就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在党和国家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跌落下来，并由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难。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轰击！五 出席上海中央会议

12月6日深夜。我的秘书朱欣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由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那里有事，让杨副总长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时以前赶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决。”朱秘书接完电话随即报告了我。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朱秘书问。“坐火车去来得来不及？”我反问了一句。“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到上海的车次。”

“坐汽车怎么样？” “时间更长，不能按时赶到。” “有飞机没有？”
 “我去联系。”朱秘书了解后告诉我：“南京空军有一架犁二飞机空着。”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飞机来杭州。”我向朱秘书交代。 7 日早上我们乘南空的专机准时赶到上海，在虹桥机场着落。走下悬梯时，徐业夫已站在那里等我。他一见到我就说：“主席要召开一个会，请你参加，你就住在锦江饭店。”是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徐业夫一个字都没有吐露。当时毛主席住在虹桥宾馆。我进去一看，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叶剑英、谢富治等人已在那了。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如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所以这次会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像军委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也没有明确宣布会议的名称，但就会议内容讲，就是揭发所谓罗瑞卿的问题。因此，我们姑且称这为中央上海会议。理由很简单：地点在上海，召集的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现在也有人称为“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的。 会议在 1965 年 12 月 8 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小组，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我。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 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

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我听了之后，脑子里产生另一种怎么也弄不通的想法：说罗瑞卿反对林彪，这怎么可能呢？从历史上看，罗瑞卿与林彪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以后长征到陕北，进“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虽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但“抗大”的具体组织工作，都是任教育长的罗瑞卿干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怀被打下台，将黄克诚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当了国防部长，提名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协调的，配合是默契的。罗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时，对我们说过：“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的。”然而会议上确是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还有，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事实果真是那样吗？1965年林彪对军队工作的《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和叶群在广州军区127师调查后向林彪汇报时说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却是罗瑞卿亲自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讨论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并送林彪审定后签发的。总参谋部机关1965年7月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就是罗瑞卿要我为进一步落实林彪的指示而举行的。如果他真的反对突出政治，在行动上能有这么认真并用那么大的精力去抓落实吗？！至于说刘亚楼讲的四条，我5月份在医院见到他时，刘已不省人事，是医生打了一针才苏醒过来的，根本没有谈此事。二三月份我在华东看地形，路过上海，去医院看望刘亚楼，同去的有王尚荣，在场的有翟月英以及医生护士，刘也根本没有提到这四条。所以我对叶群的所谓揭发，既不敢苟同，又无法否定，只是听着。还有小组里的雷英夫当时揭发罗瑞卿是很积极的，他凭什么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我很纳闷。因为作战部已有一个部长王尚荣出席，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副部长来参加呢？而总参其他业务部，又没有一个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这样的情况，也使人感到内中必有蹊跷。后来的事实表明，雷英夫确是投靠林彪，为打击罗瑞卿出了大力的。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找我谈话，问我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情况，我讲的与在杭州同毛主席谈的一样。因为其他方面我确实不知道。会议始终是在小组里进行的，没有开大会，毛泽

东也没有将到会的人召集在一起讲个话，见个面，合个影，更没有看见发会议简报。会中的情况都是由各组组长去向毛主席汇报的。会议开始时，罗瑞卿正在广州、昆明军区视察部队工作，进行到第三天，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 12 月 11 日下午 2 时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 618 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罗瑞卿像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事前根本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他来上海原先也以为可能是研究军事问题。也许因为是军人，带有职业病似的，领导上一通知开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军事问题。罗瑞卿一下飞机，看到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没有他熟悉的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工作人员，顿时心里产生了疑虑。因为按中央那时的规定：开会是不需要派负责人接送的。陈丕显在车内同罗瑞卿仅谈上海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对开会的事，一字不吐。吴法宪一反常态，过去见到罗瑞卿时，开口“总长您好”闭口“祝首长健康”那种令人厌恶的献媚状态不见了，在车内还用他那眯眯眼不时地盯着他们。这使罗瑞卿感到有些茫然。车飞快进城时，陈丕显告诉他这次不住锦江饭店，罗瑞卿觉得和以往来上海确实有点不同，心里只是沉默地想着，很少有兴趣说话。当车子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罗顿时感到很吃惊。他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 7 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罗瑞卿对于这个突然袭来的致命一击，精神上毫无准备，尽管他是个很坚强的具有高大身躯的男子汉，谈话后出来时怎么也没有力气登上二楼的卧室了。他被这当头一闷棍打蒙了！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罗瑞卿根本不承认，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

地重复着这句话。是啊！“关系不好！”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标准是什么？难道就凭这么一句可以做各种理解的中性语言，就能够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打下去吗？！会议是 15 日结束的，那时只说罗瑞卿不在军队任职，专做政府工作。16 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说：“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时没有在会议中传达。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自然想不通。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能够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释清楚的。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谁都知道，毛泽东走到哪里，当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总是跟着保驾，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应该说毛主席对他是了解的。既然“没有三条”，还要把问题挂起来，挂几百年到一万年，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规呢？然而又确实出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

六 我当代总长，德才资不够，难以胜任

在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中间，12 月 12 日，中央军委开了一次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军委会上要我代理总参谋长。我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刘少奇副主席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我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会后，我反复琢磨，还是觉得搞不了，确有难处，也怕给党造成损失，因此，在 12 月 16 日，我向周总理、邓总书记并报毛主席、刘副主席呈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听了周总理 12 月 12 日在军委会上说，要我当代总长职务，心

情一直紧张，反复考虑，我认为不适宜担任这一重要的工作。我德才资不够，政治思想水平低，有一点经验一般也是下层的一些经验，全军干部中比我德才资更好的很多，身体也不好，担心难以胜任。 21 日，我将报告送给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并请他指示。叶副主席阅后，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 成武同志： 信我看过了。我考虑：此件以缓发乃至不发为好。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请再加考虑。 叶剑英 12 月 22 日 遵照叶帅的批示，报告也就压下来了。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回杭州疗养。 七 讲到罗的问题时掉泪了

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总参谋部是由李天佑副总长和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回北京后，召集各部局领导同志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的。这个会的结束前夕，我由杭州回到北京，到会即席讲了几句话，当我想到过去和罗瑞卿一块工作的情景时，曾说罗很有能力，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的老首长，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就从那么高的位子上全撤下来，很是可惜！讲着讲着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掉泪了。后来这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条“罪状”。林彪骂我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在那个年代，同志间情谊友爱尽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谓政治问题就该忘却，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没有划清界限、立场没有转过来、是什么“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压得你站不起来。 1966 年 3 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 会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为了开好这次会，军委决定设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萧华和我。 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那天邓小平主持并讲了话，罗瑞卿也天天出席。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声嘶力竭地当面诬陷“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 3 月 18 日的跳楼事件。 在这之前，罗瑞卿给夫人郝治平写了一份遗书：“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

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填了一阙词，表示惋惜：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长绝。八 “跳楼事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从 3 月 18 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到了 1968 年 3 月 24 日所谓“杨余傅事件”时，温玉成说我包庇罗瑞卿，林彪据此在大会上说我“实际上袒护罗”，“本来就是一个罗瑞卿分子”。会议结束后，由萧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萧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萧华留在杭州，出席了批彭真的会议。1966 年 4 月 30 日，中央工作小组，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党中央。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文件里，中央明确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写了一大段批语：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 3 月 18 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党委。1966 年 8 月 26 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老河北厅召开会议，毛主席又向我们指示说：“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可以传达到全体干部。”从此，全军干部都知道罗瑞卿出事了，该要打倒了。九 平反正名，“前度刘郎今又来”

1980 年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恢复了罗的名誉，回到领导岗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1977 年 8 月，中央召开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罗瑞卿、萧华和我，都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同住在京西宾馆，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像唐朝诗人刘禹锡二次被贬连州 14 年后回到京城写的《再游玄都观》一诗说的：

百亩庭中半自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罗瑞卿一边吃饭，一边回顾过去，说：“对林彪的问题，我们 3 个人都瞎了眼，过去从没有反对过他，然而却都挨了整，但整得最惨的还是成武同志，他一家死了 3 口啊！我们两家（指萧华）还没有死人。”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有人说：“是因为罗瑞卿干得很出色，太冒尖了。林彪怕别人超过他，位子坐不稳。” 毛泽东说：“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 聂荣臻元帅说：“一、三军团关系不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 罗瑞卿自己在 1978 年一次讲话中却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总而言之，在林彪手下，他要你做什么，你不依着他，跟他走，林彪就嫌你碍手，就用尽心机非把你搞掉不可！（作者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原政委）（责任编辑 吴思）

2011 年 8 月 25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一章（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1965—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漆、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学术文化的垄断地

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漆、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中 央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二、研究资料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在罗瑞卿被打倒后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彭真把姚文元的文章纳入“学术讨论”范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压力下，《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

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

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利用关、戚发动新一轮攻势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讨伐，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

为了不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制订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漆、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会后，许立群、姚漆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

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

1966 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江青林彪联手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 年 1 月 21 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1967 年 4 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 2 月，

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你同肖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肖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局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

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 20 日晚形成了约 3000 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

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 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 月 23 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肖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了《二月提纲》

2 月 25 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 3000 字增加到 5500 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 月 14 日晚，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 3 月 17 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张春桥伺机攻击彭真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

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于 3 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 月 11 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 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彭、罗、陆、杨”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3 月 17 日至 2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3 月 28 日至 30 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

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作了重要修改，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会出。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彻底打倒。

因为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自然也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就在这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级干部。

2006年10月11日初稿

2011年7月5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一章（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1965—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毛泽东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1） 一 江青：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二 江青： 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四 此件（2）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五 去掉一句。（3） 六 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4） 七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努力。 八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5）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九 这样较妥。（6） 十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7）十一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8）的影响

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十二 古人、外国人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十三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十四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

十五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十六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

十七 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八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 这篇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审阅后写给江青的两个批语；本篇三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五、九是写在纪要上的两个批注；本篇四、八、十二、十八是在纪要中加写的话；本篇六、七、十、十一、十三至十七是对纪要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对这个纪要，毛泽东还

作了一些其他修改，主要有：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删去“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等语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纪要。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纪要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2) 指纪要中提到的《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篇谈话经过整理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后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3) 纪要中讲到江青这次“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一句，并写了这个批注。

(4) 四篇著作，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一句，原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

(5) 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6) 纪要中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

毛泽东审阅时，将引号内的文字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写了这个批注。

(7) 这句话原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8) 王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

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

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此件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两篇著作，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并先后同刘志坚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

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多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

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

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

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工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步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

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命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

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

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六、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学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制片厂出版和拍摄，都应制定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此件（1）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1）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 简报说，高教部党委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会上，北大等学校汇报了前一时期学术批判情况，提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得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得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会上对今后深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如下部署：（1）各院校领导必须明确，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教育战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是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

（2）目前高校的所有工作都要和当前学术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学术批判来推动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 （3）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师生和教职员积极参加这场战斗。

二、研究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刊载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及会后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纪要”曾被认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①。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界和文艺界对江青召开这个“座谈会”的阴险目的，以及“纪要”的错误和流毒作了揭露和批判。1979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但是，这次“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炮制的经过情况，人们并不知晓，由此出现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和揣测。为了准确地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深刻揭露林彪、江青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我有责任将有关资料提供出来，因为我是当时参加并了解这次“座谈会”情况者之一。根据我的工作日记、回忆和有关同志的回忆，有关档案资料，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作如实的介绍，是必要的。

一、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是有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的，

首先是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起，经过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上当时中苏论战和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影响，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的“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1963年5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9月制定的“后十条”，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11月，有人向中央报告，“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1/3的问题，而是不止1/3的问题。”1965年1月在制定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时，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在九、十月间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2月，由于林彪等人制造了罗瑞卿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要夺权)，加深了毛泽东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并考虑防“政变”问题。

其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问题的发端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

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他写条子向毛泽东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接着江青发难，她于 1963 年 5 月在上海组织人写文章，点名批判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掀起了文艺界的公开点名批判运动。9 月到 11 月间，根据江青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多次对文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 月 12 日，他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对彭真、刘仁写了一个批示，说：“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一。)根据这个批示，1964 年 4 月，文艺界进行整风，检查问题。5 月，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正在修改的时候，江青得知，硬把这个报告草稿要去送给毛泽东。6 月 27 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 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二。)这个批示引起了更大震动，文艺界不得不再次整风，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进一步检查问题，点名批判了田汉、夏衍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8 月，康生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认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借此机会，大施淫威，任意捏造罪名，点名批判了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一些尚在讨论中的文艺理论观点，如“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认为是“修正主义文学主张”，“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理论”。对文艺界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很快扩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并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相互影响，“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党内有人认为如果说全国有 1 / 3 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那么，文艺界还要超过 1 / 3，有的单位已经发生了“夺印”的问题。一些文艺作品被无中生有地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从 1962 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1964 年，康生又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开始不同意，末了还是被“说服”了。1965 年 2 月，在上海，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未同中宣部打招呼即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彭真等人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对批判进行了抵制，中央内部分歧加深。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文艺领域的批判，成了完全政治性的问题。

尽管如此，党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还是对批判吴晗不积极。彭真、陆定一等还设法对批判运动加以约束，多方保护吴晗。知识界对批判运动也采取消极态度，进行抵制。

第三是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江青早有政治野心，要“露峥嵘”，只是没机会。她曾抱怨“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1962 年后，党内在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的发展，使她有了可乘之机。她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她极力插手党的文艺工作，尽管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1962 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她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要他们批《海瑞罢官》，遭到部长们的拒绝和反对。1962 年底，江青以蹲点为名，到北京京剧一团搞所谓京剧革命，遭到北京市委抵制。1964 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抢“文艺革命旗帜”，公然污蔑文艺舞台“一大、二洋、三古”，鼓吹“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在会演总结时，周扬针锋相对地指出：“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拜师等等，本身也是对的。”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被拒绝。于是江青只好到上海找张春桥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文章出笼后，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抵制和批驳。全

国报纸，除上海外，没有一家及时转载。发小册子也不顺利，1965 年 11 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 11 月 29 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来全国报纸虽然都奉命转载了文章，但共鸣者寥寥；反对姚文元的文章，为吴晗辩护者倒不少。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就有 3000 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她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①

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找林彪。1966 年 1 月 21 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题，进行政治交易。江青想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林彪也想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也明白江青的来头，因此，二人一拍即合。林彪即通过叶群为江青开座谈会进行安排。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开始。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种党内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复杂情况下，由江青提出召开的。

二、“一人谈”的所谓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十分秘密的状况下，采取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是江青系统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名为座谈，实际上是她一人谈。整个座谈会的准备和开会都是由江青一人决定，从不征求总政的意见，也不同参加座谈的同志商量。

会前，总政治部领导和包括我在内参加会议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

1966 年 1 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

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在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〇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像《丰收舞》、《民兵舞》、《洗衣歌》等一些好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

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刚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 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

话。我们 4 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 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 8 次，每次半小时至 1 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 8 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 2 月 3 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 2 月 5 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 2 月 8 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 2 月 9 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 2 月 16 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 2 月 17 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 2 月 17 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还谈到 30 年代的文艺问题。集体座谈一共四次：2 月 2 日晚见面谈一次；2 月 9 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 月 18 日、19 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 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 4 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 1944 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剧院的信》①，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

4. 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

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江青讲话由于不准记录，除我事后让陈亚丁作了简要追记外，并没有文字记载。根据我和李曼村的回忆和陈亚丁的“迫己”，以及会后整理的“江青谈话纪要”，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自我吹嘘，抬高自己

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和主席结婚后在主席身边。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吹她如何亲自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的舞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于是她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还说《武训传》的错误也是她发现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她在上海搞的。还吹嘘她如何搞京剧改革，搞芭蕾，没有好剧团、好演员，她“像叫化子要饭似的去要演员”。说经她改革的京剧，过去的基本功都不够用了。还吹她如何和主席平起平坐。

2. 吹捧林彪

江青在谈到她搞京剧改革、抓文艺批评没人支持时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她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

3. 诬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江青多次说毛主席“在24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

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 17 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4. 攻击、诬陷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在一次谈话中，江青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总理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她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艺改革，不给她好剧团、好演员，专了她的政，主席的话都不听。她还攻击罗瑞卿，有一次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我说：“部队文艺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江青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在主席批示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后，罗瑞卿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还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中，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像《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八一厂那个陈播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当厂长。她还攻击八一厂“人员严重不纯”，“创作干部艺术思想上问题很大”，要整顿。江青还攻击、诬陷周扬、夏衍等同志，说：“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还诬陷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说，周扬、彭真专了她的政。说：“夏衍这班家伙主张‘离经叛道’，我认为他们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她攻击文化部不像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部，让他们批《海瑞罢官》就是不批，她只好到上海找人。

5. 指责和否定大量的电影和文学作品

江青看一部电影就否定一部，无端指责建国以来的电影和文艺作品，说：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的；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有的是宣传和平主义；有的是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写英雄人物，写一个死一个；有的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

《南征北战》她说也有问题，修改一下也可以。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认为勉强可以。对八一厂的〈海鹰〉，她只肯定了上半部是“我们的”。她说：“《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篇文章批判一下。”她还全盘否定 30 年代文艺，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学”好一点，是鲁迅的；“左”翼文艺运动是王明路线等等。她还说：“塑造工农兵的新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就是这么去做的。”对一些外国电影，江青也横加指责，说(静静的顿河)这个片子非常糟糕，主人翁是千土匪、叛徒。她还说，文艺问题上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有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要捉大的，要批判肖洛霍夫。

此外，江青还谈了创作方法、电影技巧和创作三大战役、修改《南海长城》等问题。

对江青上述谈话，我们 4 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她的恶毒用意，认为主要精神主席在“两个批示”中都讲过。我只是感到江青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否定过多”。我们 4 人在吃饭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议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对江青说八一厂“组织不纯”，“部队文艺方向上也有问题”等也有意见。我还感到“江青对周总理，对中央文化部太不尊重，批评得过多”。对江青反对写中间人物也有看法。我在 2 月 10 日休会回北京后，11 日上午即向萧华(当时萧劲光也在座)汇报了“座谈会”的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一是“否定过多”。我说：我们看了的电影，许多群众认为是好的，江青都说不行，京剧不行，这么多电影不行，那群众看什么？那电影院、戏院不就关门了。二是中间人物应该写，我说：写英雄的不行，写中间人物不行，那写什么？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的，还是可以演的，不然没法写了。萧华、萧劲光都表示赞同这个看法。萧华说：这些问题怎么办，开完会后再研究。

总之，整个座谈，主要是看电影和江青“一言堂”的谈话。

三、“纪要”的炮制

“座谈会”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原来是我们 4 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后来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为江青、陈伯

达、张春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从我们4人起草的第一个汇报提纲稿子算起，先后写了8个校稿，反复修改达30次之多，字数由3000来字增加到10000多字。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纪要”稿作了重要修改。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下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我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了八条，主要观点是：

1. “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

2. “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3. “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4. “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5. “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6. “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7. “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8. “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1. 预定在 4 月份召开创作会议。2. 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3. 在 1967 年 10 月 1 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4. 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5. 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6. 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7. 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8. 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0 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 30 份。当时我们 4 人还研究了这个稿子给不给江青的问题。如果“不给她呢，她知道后，肯定会发脾气，为什么背着她，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她可能会不满意。”考虑的结果，还是送她一份。2 月 21 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 日下午，我们一行 6 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 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 月 25 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2月26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稿子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清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在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27日上午，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两人又作了些改动。当天晚上，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修改稿作了讨论。江青的主要修改意见有两点：·第一，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第二，“关于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宣扬苦难的文字没有表达清楚。”她要求“再改一改，明天再议一下。”讨论后，陈亚丁又连夜改了一遍。28日上午又和张春桥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当晚又读给江青听。江青说，就这样，可以“传达了”。并要陈亚丁带几份给我、李曼村，谢镗忠看一下，有什么意见打电话告诉她。第二天，陈亚丁即带着修改稿回北京。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

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 3000 字增加到 5500 字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 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汇报提纲”在第一部分末尾写了一段：“江青同志对主席思想领会深，又作了长时间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教育和鼓舞。”这次修改时，又增加了一段美化江青把江青说得似乎很谦虚的话，说“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

2. 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在这次座谈中，江青同志对当前文化革命和部队文艺工作，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据我们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改为：由于阅读了主席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听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电影和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又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我当时就感到，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观点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当然，当时我们没有看出这是江青的阴谋。

3. 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 24 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 15 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 30 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4. 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在讲军队文艺工作一条中，说罗瑞卿关于“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的话，是“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 15 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讲的。还说：“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文艺思想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是有影响的，要彻底肃清。”

5. 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 30 年代文艺。说什么“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所谓 30 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左翼的某些领导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全盘否定了 30 年代的左翼文艺。

6. 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说：有的作品“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写了一些爱情的作品，就是“‘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 100 份。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①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 11 处，其中重要的有：

1. 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 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3. 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 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 在“要破除对所谓 30 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30 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 30 年代的后期”一句。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5. 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个字。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又指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3月 8 日江青电话通知我和陈亚丁去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3月 10 日上午，我同陈亚丁乘飞机到上海，下午，江青给我们看了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并要我们考虑意见，一起讨论修改，还说主席指示请陈伯达参加修改。3月 11 日下午，江青派人把陈伯达修改的稿子送给我和陈亚丁看。以后三天，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我参加看了一些电影和两次讨论。除了对几处提法提了点意见外，因我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些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而且 30 年代文艺上的争论我也不知道”。所以具体修改的事，由陈亚丁参加。14 日修改完毕，15 日我返回北京。

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全文由 5500 字增加到 10000 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

1. 在第一部分恢复了原稿本来提到的萧华、杨成武的名字。增写了一段话：“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成和支持，指示我们一

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2. 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

3. 增加写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作为第二条。全文近 900 字，即从“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一直到“把社会主义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4. 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5. 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6. 在讲文艺批评一条中增加了一段：“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传统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7. 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8. 在第三部分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据我回忆，林彪根本没有这个建议，这样写，是江青对林的吹捧。•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 4 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①。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给林彪的信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重要的有：

1. 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2. 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
3. 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并删去了末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
4. 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题”，改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
5. 在第九条，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的“毛主席提出的”6个字删去了。
6. 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
7. 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 17 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

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整个文艺队伍的占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钊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 3 月 19 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

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 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敬礼

林彪 1966 年 3 月 22 日

3 月 22 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我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3 月 23 日上午我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

的革命”。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

四、中央对“纪要”的批发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画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

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

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我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

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 年 4 月 10 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 4 月 15 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 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 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 4 月 18 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 9800 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1967 年 5 月 29 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 1966 年 4 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 20 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 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 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 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 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 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 10 条措施。

这些修改是何时、何人所为，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不知道。因在这之前，1967 年 1 月 4 日我就被江青一伙以“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罪名打倒了。接着，1967 年 5 月李曼村、谢镗忠也相继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打倒。

1979 年 3 月 26 日，总政治部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建议撤销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指出：“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我们建议中央作出正式决定，撤销这一文件。”5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总政治部 1979 年 3 月 26 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 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这样，那个由江青策划，以不寻常的方式召开的所谓座谈会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恶劣作用的“纪要”，最终被党和人民彻底否定了。

五、历史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座谈会”召开和“纪要”产生的介绍，联系“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可以使我们从中认识一些问题。

1. “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炮制经过，揭示了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利用的罪恶阴谋。

如前所述，“座谈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党和国家面临内乱的急风暴雨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此时，文艺战线形势紧急，总政党委和我们这些主管文化工作的同志，根本无意开什么座谈会。而党内的正义力量对“左”倾错误的抵制，使江青感到需要借用林彪的力量。她曾经几次扬言：“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野心越来越膨胀。他长期揣摩“登龙术”，以“大拥”、“大顺”、“得一人得天下”为“总诀”，千方百计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当江青想利用林彪的权力时，林彪也想到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两个野心家互相勾结、利用，结果就产生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江青和林彪在“座谈会”和“纪要”的炮制过程中，都施展了阴谋手段。首先，在军队中并无职务的江青到军队去开座谈会，搞“纪要”，是完全背着党中央，由江青、林彪两人策划的。“会议”也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其次，制造了一些假象。比如，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 3 月 22 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 3 月 19 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颇费苦心的。又如，江青既想通过“纪要”反映她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和观点，又不想用她个人的名义，而要用部队的名义；她既想通过“纪要”吹捧自己，又不愿话出己口，而要用他人的口来说。所以她不满意我们 4 人写的、记录了江青“指示”

的“汇报提纲”，只好请能领会她的意思的陈伯达、张春桥来进行修改、加工，炮制出了江青满意的“纪要”。

2.“纪要”的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事实说明，毛泽东对“纪要”的内容是同意的，有一些重要观点，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毛泽东对“纪要”的三次修改都是认真的、字斟句酌的。他在许多地方删去了歌颂自己的词句，但却保留下江青提出，陈伯达、张春桥阐述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内容。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和他后来多次所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甚至认为：“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同他认为“全国基层有 1 / 3 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也是一样的。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理论的发展。他早就认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小说《刘志丹》和《海瑞罢官》的所谓问题，加深了他的错误认识。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黑线”，来收回“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就是“纪要”所反映的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革命的决心。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按“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说法，不但完全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也否定了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悲剧。胡乔木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时说过：“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及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①

3. “纪要”的贯彻和推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如当年《红旗》一篇社论所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①。“纪要”确实起到了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煽风点火、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作用，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他们打着批判所谓“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鲜花说成毒草，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任意点名宣判文艺作品为“大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座谈会”以后，江青立即插手军队文艺工作，向部队文艺工作者开刀。3月，根据林彪、江青的指令，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文艺创作会议，会议效法江青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按“纪要”的口径对号定罪，对60多部影片加上了“大毒草”、“坏戏”等各种罪名进行批判，使许多文艺工作者受到打击迫害和株连。把一些对“纪要”提了意见，有过不满、怀疑，或者在讨论时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区、各部门和许多地方文艺单位，都召开过类似的会议来贯彻“纪要”，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而军队文艺工作者，则成了“纪要”的第一批“罪犯”。不久，参加过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我和李曼村、谢镗忠也被打倒。贯彻和推行“纪要”的结果，文学艺术上的“双百”方针没有了，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红旗》1967年第9期北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整个文艺领域“万马齐喑”。

“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推动下，很快蔓延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黑线专政”。由此而来的是，建国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被全盘否定了。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人物”，一大批文化战线的领导干部被打成“黑帮”，被“全面专政”。进而掀起了文化战线的夺权狂潮和所谓“斗、批、改”，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总之，“纪要”的错误不是某一方面、某个问题上的错误，而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的集中反映。它是江青、林彪政治阴谋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坏的作用。而我和许多有关同志，在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和个人迷信的影响下，未能认识它的危害，直到自己被打倒，才开始认识到江青的阴谋，认识到文艺领域“左”倾错误的危害。今天回顾和研究“纪要”产生的历史过程，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深刻的教训。

2006 年 8 月 30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 通知”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3）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二 恩来、小平（4）、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 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三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5）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四 已阅。 退康生办。（6）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五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7），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六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8）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

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八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 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九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十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

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一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9）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释 （1）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一九六四年七月设立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五人组成。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整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

“二月提纲”，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2）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本篇五至十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3）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稿），由周恩来等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4）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5）这个批语写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对这个通知稿，毛泽东后来又作过多次修改，见本篇五至十一。（6）这是对康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报送的通知修改稿的批语。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通知》第四页第七条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第七条末句，最后改定为本篇九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7）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个名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多次变动。（8）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一九六九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三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9）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

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毛泽东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马上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上报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

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1966. 05. 15; 中发 [66] 271 号

军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部委党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现将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和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

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希望你们接到这个指示后，应该认真地学习、研究，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执行。你们的意见和布置情况如何？请及时报告。

中 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可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拚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等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了全面大跃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情况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给了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缴了他们的

“械”，罢了他们的官，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随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由于连续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纷纷出笼，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和它们配合起来，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邓拓这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出”的。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请同志们回想一下，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骂过我们“说大话”，“吹牛皮”，大跃进是“冒险主义”吗？不是赞赏过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足够的勇气”吗？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有什么两样呢！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

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把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掌柜，放在了小伙伴的地位，把邓拓这么严重的问题，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那么一句。这不是对你们这位掌柜太委屈了吗？你们煞费心机地编制的三个版的材料，把那些次要的东西，什么“赞美长发”呀，什么“提倡养猫养狗”呀，什么“艺术越古越好”呀，什么“宣扬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呀，什么“提倡封建迷信”呀，等等，等等，放在非常突出显眼的地位，占了大量的篇幅，而对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东西，只摘录了一点点，并且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你们这种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

《前线》、《北京日报》也做了一点所谓“检讨”，说什么过去发表邓拓等一伙人的文章，“没有及时地批判”，只是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读了你们这个“检讨”之后，正象你们邓拓所讲的，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你们长期以来发表了邓拓一伙人那么多文章，放了那么多毒，搞得个乌烟瘴气，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仅仅一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够用吗？在吴晗反党面目大暴露之后，你们竟然还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吴晗的假批判，把吴晗反党的滔天罪行，说成是什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既为吴晗开脱，又保护邓拓过关。时至今日，你们还在继续玩弄花招，顽强抵抗。这难道是“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阶级斗争”吗？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

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辨真假》。

《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象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吴晗和廖沫沙早已被揭露了，不得不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照《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来，好象吴晗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而邓拓似乎是一名小卒，他不过是稀里糊涂的犯了错误，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

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重新发表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几篇文章的版面，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就是在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意图下，精心编制的。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是一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恶毒地辱骂了我们的党。这篇文章早已引起一些同志的激烈反对。所以，《北京日报》不得不重新发表它，可是却用小号字作标题。请问：是这篇文章不“重要”呢，还是你们要缩小目标，瞒哄读者呢？你们的按语，为什么对这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一句话也不说呢？

《（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突出次要，掩盖主要，避重就轻，大事化小。

例如邓拓的《王道和霸道》这篇借古讽今的杂文，它是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邓拓自己也点了题，他讲什么历史上的“王道和霸道”，是要我们“找出经验教训”的。可是，《北京日报》却把它列到《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标题之下。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王道和霸道》这篇文章是真正在讲历史吗？如果是讲历史，他说历史上王道比霸道好，怎么就是《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呢？文不对题，题不对文。所以如此，就是要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

《说封建统治阶级也知道爱惜民力》《艺术越古越好》《宣传封建迷信》之类的小标题，也都是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的手法。

不过，乍一看也有象点样子的标题，例如《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可是这里摘的内容却很少，而小标题尤其奇怪，小标题一个是《讽刺“以空想代替现实”》，另一个是《讥讽所谓吹牛皮》。请问《前线》和《北京日报》，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为什么不肯标出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讽刺”，是讽的谁呢？“侧击”又是击的谁呢？邓拓的“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内容多得很，为什么你们只摘录那么一点点呢？

很清楚，由于文化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

《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装模作样地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很深刻的“教训”？

一曰：过去“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放松”了吗？不是，你们在前几年里放出了大量毒草，恶毒地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批判这些毒草的稿件被你们扣压起来，不予发表，并且百般为邓拓等人辩护，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又发表向阳生即邓拓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力图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纯粹”学术领域中，力图把这场大辩论拉向右转，难道这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吗？不是，这正是你们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无产阶级加紧进行阶级斗争！

二曰：“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好轻松！只是没有及时批判吗？远的不说，直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以后，直到今天，你们两个编辑部为什么还不对“这些文章”进行真正的批判呢？纵火者，事后说他的过错只是没有及时救火，这能骗得了谁呢？

三曰：“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这样吗？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很坚定，这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说“丧失警惕”倒有点象。你们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在前几年你们以为“时机”已到，大放毒草，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以为可以滑过去，于是想尽法子包庇坏人。这样一来，你们的真面目，也就暴露了，这也可以叫作“丧失警惕”吧！

我们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那里去？

心里有话，不得不说；说错的地方，请《前线》和《北京日报》批评、指正。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 马泽民 阎长贵 周英 滕文生 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从一九六一年以来，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即激起了许多同志的反对，他们给《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写文章，提出了批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扣压起来，不予发表。

最近，由于吴晗、廖沫沙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的大暴露，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再也无法掩盖了。因此，《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发表了《燕山夜话》的摘要材料，加了编者按。

《前线》《北京日报》的这个编者按，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也是竭力掩盖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我们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也摘编了《燕山夜话》的材料，并加了按语，请大家加以对照、比较，进行研究。

* * *

一、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恶毒地攻击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断，是“伟大的空话”，是“陈词滥调”：

“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

“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

“凑巧得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不久以前，他写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是：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褓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

“这首诗里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褓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

“即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说得，反而越糟糕。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伟大的空话”》，《前线》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一期。

* * *

按：“东风压倒西风”这个科学论断，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来的。它形象地指明了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已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东风，就是无产阶级和亚非拉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西风，就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歌颂“东风”，憎恨“西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邓拓却偏偏把“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说法，诬蔑为“伟大的空话”，诬蔑为“陈词滥调”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经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在这里，邓拓同赫鲁晓夫唱的是一个调子。

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的领导“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

“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

“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慧。”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汉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智谋是可靠的吗？》，《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七——十九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 * *

按：在今天，邓拓大谈什么匡衡劝汉元帝“广谋从众”，郑兴劝汉光武皇帝“纳群下之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影射我们伟大的党，“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把这些话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话加以对照，就很清楚了。邓拓的话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党的诬蔑，不是如出一辙吗？

污蔑我们党“自食其言”，“不堪信任”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

“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明代陆灼的‘艾子后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写道：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我！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亦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脚踏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看来这位健忘者的症状，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据中国古代医书记载，……这种病的一个起因，是由于所谓气脉颠倒失常，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还有另一种病因，则是由于脑髓受伤，一阵阵发麻，心血上冲，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傻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那末，对这种病症，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吗？当然不是。比如……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

《专治“健忘症”》，《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 * *

按：这显然是一篇咬牙切齿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的杂文。查遍医书，从来没有说健忘症的症状是“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发疯”、“发狂”。更没有用狗血淋头和用木棍把病人打昏过去这种办法治健忘症的。明陆灼的《艾子后语》是政治讽刺小品，而不是医书。邓拓这里讲的是政治，而不是医道。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咒骂我们党的领导是“带汁的诸葛亮”

“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这个名目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庭史》第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的一条记载中。据称：“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撰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象郭倪这种带汁的诸葛亮，简直令人发笑，也令人发呕。然而，这也证明，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被天下人耻笑。”

《三种诸葛亮》，《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二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

* * *

按：邓拓大骂所谓“带汁的诸葛亮”，说什么“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这到底是指谁呢？如果是指地主资产阶级，就不必这样隐晦。因此，它只能是在辱骂我们党的领导。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污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如果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无论什么妖魔鬼怪，耍出多少花招，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穿。”

“且看《伊索寓言》吧。比如，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有五种竞技的人，平常因为缺少勇气，被城市的人所非难，暂时出外旅行去了。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很说些大话，说在别的各城市屡次英勇地竞赛。在罗陀斯地方，曾跳得那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假如下回到那里去的话。当时在旁边有一个人喊道：喂！朋友！假如这是真的，你也不要什么见证，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你跳好了！’”

“事实显然证明，说大话的只能胡吹牛皮，决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吹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

“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便于揭穿他的牛皮。

“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

“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

《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五集，第九一一九三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 *

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恶毒地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邓拓不厌其烦地大讲有“深远的意义”，值得“深思”呢？为什么叫喊直到今天，吹牛的人“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呢？既然是讲故事，为什么又扯到马赫派的“心理要素”作用呢？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经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说大话”，是“冒险的计划”，是“唯意志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唯心主义”。请看，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说大话的故事》，《燕山夜话》五集，第八八——九〇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

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

《多学少评》，《燕山夜话》二集，第八四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

* * *

按：邓拓反复地攻击所谓说大话、吹牛皮，并说，爱说大话的“决不只是文人”，而且还有“大政治家”。他这是讲历史吗？不是，这是借古讽今，这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污蔑我们党在大跃进中不爱护劳动力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②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

“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从这个故事看来，象狐偃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燕山夜话》一集，第五六——五八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

按：说古人“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规律”，这完全是瞎说。又说“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还要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这显然是攻击我们在大跃进中、在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中，不爱护劳动力。

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蛋”了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 z i @③，z i @③复生 z i @③，三年可得二十五牛。z i @③所生者，又复生 z i @③，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一个鸡蛋的家当》，《燕山夜话》一集，第七六——七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 * *

按：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扬言说，“有几分真实性，须要看看”；当我们遇到暂时困难时，他们又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垮台了”。邓拓在这篇杂文中说什么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这不也是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吗？这不是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吗？((2)(3))

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刘向）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按《北京晚报》上为“诈诈胡胡”）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王道和霸道》，《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三——十六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 * *

按：这是借古讽今，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篇文章。邓拓骂我们“依靠权势，蛮横逞强”，“不得人心”。请问：不得什么人的心呢？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心。无产阶级专政对地富反坏右，只能实行“霸道”，决不施行什么“仁政”；对地富反坏右施行所谓“王道”或“仁政”，就是背叛革命，背叛人民。

三、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他们东山再起为被罢了官的户部尚书“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养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的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盜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许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请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

《为李三才辩护》，《燕山夜话》五集，第一〇二——一〇四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 * *

按：李三才在历史上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邓拓却说他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还说他是“理直气壮”的。这是为什么呢？不难看出，这位李三才是海瑞式的人物，为李三才辩护是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是实。

宣扬郑板桥遭到“诬告”被罢官以后，满腔仇恨，“骨相难更”；号召人们学习他的“自作主人、不当奴才”的性格

“歌吹扬州惹怪名，
兰香竹影伴书声。
一枝画笔春秋笔；
十首道情天地情。
脱却乌纱真面目；

泼干水墨是生平。

板桥不见虹桥在，

无数青山分外明。

这是我前年（指一九六一年）到扬州访问的时候，为怀念清代画家和诗人郑板桥而作的一首律诗。……明天就是他的诞辰，我想趁此机会对这位作家重新进行评价，似乎还是有必要的。”

“乾隆五年他被派往山东范县当知县，到乾隆十一年又被调为潍县知县。不料山东连年灾荒，板桥积极筹赈，得罪了巨绅大贾，被扣上了‘贪污舞弊’的罪名，罢官而去。”

“郑板桥在山东救灾工作中是很有成绩的，他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和豪绅地主阶级。……他们联合起来，捏造罪名，控告郑板桥假借救灾的机会贪污舞弊。清代腐败的统治阶级在处理这个案件中，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板桥见到情况如此，愤而辞职，他的上司也乐得照准了。因此，乾隆十七年的秋末冬初，郑板桥竟罢官而去。”

“从他罢官以后，直到七十三岁死的时候为止，所谓‘板桥体’，即板桥的思想作风总是越来越鲜明突出。首先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只举他的沁园春一阙为证，词的题目就是一个‘恨’字，他写道：“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砍断，杀他风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单寒骨相难更，@④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纱百幅，细写凄清。”

“我在这里……随手介绍一幅未发表的板桥作品吧。这是《深山兰竹图》，它大约是板桥在山东范县时期画的。上面题了一首诗，写道：“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

“非常明显，这是他还在做知县而心里简直不愿做官的时候所作的，画意诗情完全一致。……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官宦生活做一对比，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据我所知，现在仍然有人在认真地学习‘板桥体’。但是，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

“板桥曾经说过：‘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这句话非常要緊。他自己为了贯彻实现这种思想，所以特地刻了一方图章，文曰：‘郑为东道主’。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处处都以主人翁自居，自己踏出一条路来。”

《郑板桥和“板桥体”》，《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 *

按：真是无独有偶。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也忽然发出思古的幽情，“怀念”起被罢官的郑板桥来了。邓拓先在一九六一年作诗，继而在一九六三年著文，一股劲地为“郑板桥”的罢官喊冤，喊得那么慷慨，那么激动！读者只要把此文同吴晗的《海瑞罢官》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实在是异曲同工，都是在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

邓拓的画龙点睛之笔，是点出“板桥体”的灵魂是“自作主人、不当奴才”，号召人们抓住这个“灵魂”认真学习，“自己踏出一条路来”。恶毒！恶毒！邓拓不是在号召人们反对党的领导吗？摆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却号召人们“自己踏出一条路来”，这条路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路又是什么呢？

宣扬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事，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为此遭到罢官

“米万钟是一位很有学问也很有骨气的人。他的生平为人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好处。他出生于明代隆庆四年，……刚刚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就被任命为江宁令尹。不久以后，他奉命改任江西按察使。据称，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和文教事业，所到之处，颇受中下层人民和文士们的称颂。”

“由于米万钟平日鄙视魏忠贤及其同伙，并且屡次评议时事，他就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特别是魏忠贤的走狗倪文焕极力诬陷好人，当时被他陷害的有几十人，重的严刑拷打致死，轻的则被削籍夺职。米万钟也受到了削籍夺职的处治。”

“他在一幅白绫上写了一道诗题《烂柯山》的绝句，笔墨飞舞，毫无馆阁气味。他写道：‘双丸阅世怪他忙，为羡仙翁岁未央。假尔片时成异代，人天却比洞天长。’这首绝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显然是反映他对于明代政治上风云变化出人意外的心情。

”

《宛平大小米》，《燕山夜话》三集，第三九——四一页。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九日。

* * *

按：此文是借米万钟这个亡灵，再一次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

为“李@⑥”被罢官而鸣不平

“李@⑥的遭遇很不好，正如郑板桥在写给他的另一首诗中所说的，‘两革科名一贬官，萧萧华发镜中寒。’当时李@⑥早已被清宫画院里临摹古画的一班画师所排挤而离开了画院，到山东滕县当了一时期的知县，又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从此他就流落在扬州依靠卖画为生，成为扬州八怪之一了。”

“再看他自己的题诗，就更觉得这幅画的意境很深。这首诗明白地写道：
黄叶飘萧处士林，霜华不畏早寒侵。画鸡欲画鸡儿叫，唤起人间为善心。”
“诗意图不但阐明了画意，并且反映了李@⑥当时的遭遇和他的愤懑不平的心情。”

《谈李@⑥和他的画》，《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

按：又是一个罢官！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邓拓四次为被罢了官的人鸣不平，歌颂他们被罢了官而不屈服的“反抗精神”，真是“运思独苦”！

四、狂妄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邓拓们的“指导”！

“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伟大的空话”》，《前线》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一期。

“健忘病者的症状……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专治“健忘症”》，《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五集，第九三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贾岛的创作态度》，《燕山夜话》一集，第十六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 * *

按：这几则材料，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夜话》的凶恶面目。邓拓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决不是骂骂而已，而是要根本推翻。所谓“健忘病者”“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这不是妄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去吗？

不是“书生空议论”，而是“力抗权奸”的“好男儿”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

攀龙风节扬千古，字字动心绝命词。”

《歌唱太湖》，《光明日报》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

* * *

按：邓拓近几年来大讲“东林党”，他还特别介绍了东林书院的一副对子，说东林党人读书、讲学都“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说他们很有“骨气”。上面两首诗，宣扬他们的“力抗权奸志不移”的反抗精神，显然这也是有“政治目的”的。邓拓之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搬出东林党来，大肆鼓吹东林党的叛逆性格，给他们的一伙鼓励士气。

五、《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是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法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语多愤慨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林白水之死》，《燕山夜话》五集，第一〇五——一〇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 * *

按：长期办报的邓拓，为什么提起报纸方面的事情，会“哑然失笑”呢？这是值得考证一番的，一考证就会发现他因为办报时受了批评，而对党怀恨在心。据说，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的报馆主笔林白水，他所写的文章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这难道不是邓拓的自白吗？邓拓“辛辛苦苦”，写了文章，如果读者不懂怎么办呢？因此，他需要借死人之口来表白一番，他讲的是瓦片，蜜蜂之类，但“归结及于政局”。这是一把钥匙，我们应该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他的《燕山夜话》。

“夜话”大都“语带双关”，有其“政治目的”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副对联呢？因为有几位朋友在谈话中，认为古人读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都是为读书而读书，都是读死书的。为了证明这种认识不合事实，才提起了这副对联。而且，这副对联知道的人很少，颇有介绍的必要。上联的意思是讲书院的环境便于人们专心读书。这十一个字很生动地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东林书院中，耳朵里好象真正听见了一片朗诵和讲学的声音，与天籁齐鸣。

下联的意思是讲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要关心政治。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他们主张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事，还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

“把上下联贯串起来看，它的意思更加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语带双关，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而言。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
 “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愈来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这种道理，宣扬这种道理，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还不懂得这种道理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比古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彻！”

(《事事关心》，《燕山夜话》二集，第六〇——六二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月八日。)

按：邓拓告诉我们，“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东林党人说的风声、雨声，是“语带双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意义“相当深长”。这是邓拓的自我表白。

煽动要用“漫画手法”，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古代的人已经懂得用绘画为武器，揭露恶人恶事，表扬善人善事。因此，以善恶对比为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一般的说来，历来的画家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但不能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毕竟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的弊病。于是有一些画家就选择了特别含蓄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最突出的漫画，还应该说到所谓扬州八怪的作品。这些画家实际上都是当时南北各地不满于现实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满腹牢骚，不合时宜。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怪’，而他们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们在这样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画出来的东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气不可了。在这里，就举罗两峰的作品为例吧。……他生平最爱画鬼，并且以画鬼而成名。人们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图》，这可以说是古代漫画的典型了。”

“（我们）知道他对鬼的讽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讽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画家如果直接用漫画去讽刺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祸；如果只是讽刺一些死鬼，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正是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后，画家终于选择了以鬼为讽刺对象的这种漫画手法。”

《古代的漫画》，《燕山夜话》三集，第五一一五三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

* * *

按：这里讲得很明白，“对鬼的讽刺”，就是“对人的讽刺”，就是用“漫画手法”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的情绪”。“夜话”当然也是这样。

形势不妙，暂时退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

“它列举了三十六计的名目，并且引述了古代兵家用计的实例作为证明，这是他的可取之处。”

“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三十六计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这里头没有增兵减灶、十面埋伏、虚张声势、诱敌深入、拖刀计、疑兵计等名目，而把打草惊蛇、无中生有、树上开花等都开列进去，似乎也不算妥当。

“究竟三十六计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解释有出入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多想想就能明白”。

“那末，在古代是否有人谈到三十六计呢？最早谈到它的是谁呢？据我所知……大概以《南齐书》《王敬则传》为最早。”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中关于这一段话有如下的记载：

‘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

同样，在《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中‘……在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的一句后面，还加了一句话：‘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

“檀道济生活的时代稍早于王敬则。他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开国武将；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以后，他被进封为武陵郡公，拜征南大将军，督师伐魏，三十余战皆捷，后以粮草不继，巧计退兵。”

“《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却写得比较清楚，它说：

‘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俱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

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

照这样的情形看来，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使魏军不敢追逼，才能安全退走。王敬则讥笑檀道济避魏之事，现在看来，恰恰证明王敬则乃是无谋之辈。

从上面所引的有关材料，加以综合判断，我们对于所谓‘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这句话，已经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那末，由此引伸发展而构成的所谓三十六计，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不是也就很明白了吗？”

《三十六计》，《燕山夜话》五集，第八四——八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

* * *

按：《三十六计》是《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党的十中全会快要召开了。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布置退却了。但是，要退得安全，必须动脑筋，用计谋。如果没有其它计策，“要走也走不了。”他开列了三十六计的名目，供同道者参考。“夜话”暂时“下马”了，“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以便保存实力，东山再起。但是，不管他是三十六还是七十二计，都是跑不了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在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

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

《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

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机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

((1)(3))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

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刻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示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一条黑线 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么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

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

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绎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

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绝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们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情怀，热烈欢呼“这半年多来”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昏地估计：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

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

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〇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

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

“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民众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盜，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盜”，“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3)(4))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 má n g @①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

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独，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独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

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讥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叫“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毫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碍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高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

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己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吗？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廖沫沙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第一兴趣”才放

肆地暴露出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退兵时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一、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

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二、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三、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四年五月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还在我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他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帮手”，当然不会再追究“三家村”了。此计不可谓不妙。

六、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向阳生即邓拓又赶紧出来写一篇“批判”文章，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思想基础”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面掩盖《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向吴晗抛救生圈，企图把讨论引到死胡同里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并不存在，同吴晗“决裂”。末了又透露一笔：“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指示吴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吴晗立刻响应号召，一再写文章对向阳生表示“感谢”，继续以“自我批评”之名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恃无恐地大捧自己，并把廖沫沙“检讨”中的法宝搬过来：“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定统治的地位”，“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又说经过向阳生的“批判”，“使我认识了错误。”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了。

八、最后，看看形势不妙，又突然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邓拓，使尽了金蝉脱壳之计，来掩护退却。

这么多的“计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却”了吧！？耍了这么多花招，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但是，他们把革命人民的辨别力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包得住么？他们溜得掉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教育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决心要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得很的种种计策，其实做了蠢事，适足以暴露自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动计划，是一小撮人组成的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当“三家村”疯狂进攻达到高潮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词，叫《黑天鹅》，其中有句道：“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么得意地以灵敏的“先知”自夸啊！但是这一回，“先知”不灵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请看“三家村”的内幕，不正在被广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来吗？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这样狠毒、这样放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竟能连续达数年之久，原因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什么在挂帅呢？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三家村”集团步步为营且战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只有经过一步步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逐步从那些“杂家”手里把阵地夺回来。

“三家村”集团的触角伸到了不少部门。《燕山夜话》在全国散布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它以“知识性”“文笔美”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邓拓自己也吹嘘，“许多文章中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远处读者来信渐多”，“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报》还用大字为《燕山夜话》的出版大做广告，吹嘘“作者抓住了当前的一些问题”，“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丰富知识”，千方百计扩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蚀极大，流毒极广。需要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肃清它们的恶劣影响。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的原则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执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魎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今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为这个资料加上了“编者按”。当天出版的《北京晚报》，也以三个多版的篇幅选登了这些资料。声势之大，是这几个报刊创办以来所罕见的。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现在如果能对这许多毒草进行认真的批判，并且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现在的这种作法，是不是在认真地批判毒草呢？是不是在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呢？不，不是。

你们批判过吴晗吗？

没有。

从一九五九年吴晗以海瑞为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以来，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间共有六年多。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没有揭露过吴晗一个字。相反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在这个期间积极发表文章，为吴晗，为吴晗所塑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热烈捧场。“老兄老弟”们那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在所有吹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是最不象样子，最恶劣的。

姚文元同志提出吴晗的问题以后，你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也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同志这样一篇重要的战斗文章，不转载，不介绍，反而质问上海的同志：“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什么背景？背景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背景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学说，背景就是你们报纸上也登载过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在全国开展兴无灭资阶级斗争的决定。难道进行阶级斗争，还要经过你们批准吗？难道不经过你们批准，就是没有党性吗？看来很清楚，你们所要的党性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是资产阶级的党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时，你们的态度转变了吗？也没有。《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正确地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对《海瑞罢官》却既不讲是，又不讲非，只是说，这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其实，你们是支持吴晗，反对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前线》《北京晚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日报》出来转载一下，这是装出一副假公正的面孔，来掩盖你们真偏袒的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前线》《北京日报》突然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发表了署名向阳生的文章，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好象你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站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前线上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一篇同文化革命唱反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为吴晗保驾。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道德继承”问题。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向阳生的文章里，变成了一个所谓“纯学术”问题。

文章的作者还打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来为吴晗辩护。其实，你们从来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吴晗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无产阶级革命者。你们对于反动的东西，一直是开放绿灯，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量出笼，而对于批判毒草的文章却一概扣压起来，不准发表，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折不扣的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哪里是什么平等呢？

向阳生文章的末尾还装腔作势地要求大家对所谓“道德继承”问题，进行讨论，企图为吴晗《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定调子，想把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从尖锐的政治问题转到所谓“纯学术”问题上去。后来人们知道，所谓向阳生者，也就是同吴晗合写反党文章的邓拓。更为严重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邓拓还在《北京日报》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并且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同吴晗的文章一样也有错误。

隔了不久，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是一篇假检讨、真进攻的文章。《北京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加任何按语，不作任何批判，这实际上是支持吴晗以检讨的形式向批评他的同志进行反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就心照不宣地对向阳生说，你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完成了反攻任务以后，就按照向阳生定的调子，在《前线》《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所谓自我批评，欣然承认自己错误的“中心”，是所谓“道德继承”问题。两个人密切搭配，一唱一和，演了一场双簧。

一篇不够，调子定不下来。你们又接连发表同类性质的文章，一个劲地想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谓“纯学术”问题上拉。发表在今年一月八日《北京日报》上的李东石（即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的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抛出来的。这篇文章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同一个《海瑞罢官》，一会儿是所谓“道德继承论”的产物，一会儿又是某种评价历史人物观点的产物，就是不肯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产物。

众目睽睽，营私舞弊是不行的。《前线》《北京日报》对吴晗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手法，迅速为大家识破了。不少报刊发表了揭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特别是今年四月以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知识分子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一种难堪的“将军”局面摆在支持、包庇吴晗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面前。于是，你们才扭扭捏捏地走出来说，“吴晗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的作者”，并且重新发表了吴晗过去在《前线》上发表的《赵括和马谡》，想以此敷衍塞责，欺骗读者。这就是你们对吴晗的所谓“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把一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当做重要秘密来介绍，而对于吴晗忠实继承胡适衣钵，甘心充当美国洋奴，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献策的种种罪恶活动却连一个字都不肯提呢？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

没有。

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①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助浪，在社会上散放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你们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谑”》，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污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污辱，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梁壁辉（即俞铭璜）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个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象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了一堆轻松的帽子。((1)(2))

这样一篇假检讨，当然蒙混不了群众。读者严肃地对这种假检讨提出了批评，但是无论是《前线》还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不理睬群众这种正当的批评。因为对你们来说，廖沫沙是必须好好加以保护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是万万退让不得的。

今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

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为“鬼”张目，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为地、富、反、坏、右张目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跟洋鬼、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你们批判过邓拓吗？

也没有。

前几年，代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在奔腾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里掀起了一股逆流。他们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邓拓在这场猖狂的进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吴晗、廖沫沙、邓拓，“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邓拓。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邓拓，在一九六一年的九月，亲自出马，纠集吴晗、廖沫沙，在一个饭店里聚餐，组织起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黑店的名称是他起的，吴南星的化名是他定的，文章的刊登与否是他批的。“三家村”开业的历史，就是邓拓率领吴晗、廖沫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九五七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有一篇化名卜无忌《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要党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极右分子林希翎，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林希翎曾经称呼他是中国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说，连资产阶级右派也早已知道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邓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梦

想失败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职务被党中央撤销了。他被人民“罢”了“官”。在这以后不久，他又钻入了北京市委，重新上台，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

邓拓颇“懂得”一些斗争的策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惊涛骇浪，使他改换了自己的斗争方式。右派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广大群众批判、斗争的情景，使他心有余悸。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不再象一九五七年发表右派言论那样赤膊上阵，而是采取更加阴险、狡猾的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他凭借《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样的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三种诸葛亮》《“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交友待客之道》《陈绎和王耿的案件》《为李三才辩护》《昆仑山人》《宛平大小米》《郑板桥和“板桥体”》《智谋是可靠的吗？》《王道和霸道》《马后炮》《古代的漫画》《林白水之死》《专治“健忘症”》等，是其中之最甚者。

对所有这些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法，十分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毒草，《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曾经作过批判没有？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

特别是那篇极端反动的《专治“健忘症”》，这是一支很恶毒的箭，它的矛头直接射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他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党。他要用“狗血”淋我们的“头部”，要用外国特制的棍棒对着我们的“头部”打得我们“休克”，以让他们那些所谓“高明的医师”，也就是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这一篇疯狂的反革命杂文，充分暴露了邓拓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刻骨地仇恨党、仇恨人民的黑心肠。

邓拓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他们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写信，提出严正的批评。但是，你们对于这样的批评信都不予刊登，不仅不予刊登，反而千方百计地为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辩护。你们嘴上说的是“百家争鸣”，实际上行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家独鸣”。就是说，只许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放资本主义之毒，不许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铲除你们的毒草。你们实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独裁，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形势陡起变化。一场新的反击战开始了，邓拓的合作者吴晗被揭露出来了。如果《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真正愿意揭露邓拓，这时候，你们仍然有一点主动权，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你们还请邓拓做报告、写文章，支持、包庇吴晗。客观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斗争不断深入。吴晗、廖沫沙、邓拓联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完全明朗化了。广大的读者对《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作法极端不满，愤愤不平，盖子非揭不可了。这时候，你们为了摆脱被动挨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才匆匆忙忙地把邓拓的问题提了出来。

提出邓拓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这种说法岂不自相矛盾？不，并不矛盾。

三个多月以前，《前线》《北京日报》不是就曾经为了保护吴晗，而积极发表了向阳生“批评”吴晗的文章吗？提出邓拓的问题，不过是这种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丑剧的重演。

《前线》《北京日报》在“编者按”里，极力回避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三家村”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里却占了最次要的地位。吴晗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将”，而邓拓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轻重倒置，掩盖要害，牺牲车马，保存将帅，这就是《前线》《北京日报》在保护邓拓问题上玩弄的一套手法。

《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批判”邓拓的资料，同样不提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占了两个版面的《燕山夜话》摘要，只在最后用两个平淡不引人注意的小标题，提了一下邓拓的“以古讽今”问题。邓拓那些恶意攻击党，攻击总路线、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动言论，那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也是为他自己的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的文章，都被《前线》《北京日报》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庸俗无聊”，“孤芳自赏”的东西，至多也不过是“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而已。

今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日报》又散发了一份“关于批判《燕山夜话》的参考选题”，说什么“邓拓是艺术上的复古派”，“站在古人的楼台上”，“宣传

艺术越古越好”，继续为邓拓打掩护，企图引导读者把对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到“崇古师古”的方向上去。

反党、反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政治要害问题没有了。这能叫做“批判”吗？把它叫做掩盖错误、包庇坏人、欺骗读者，不是更符合实际吗？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过去由于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利用报刊的专栏来开辟他们的‘自由市场’，……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在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

这能叫做自我批评吗？

“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教训呢？

“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真是放松了吗？

“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被别人乘虚而入吗？真是被别人利用了吗？

“其原因是我们在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那末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在挂帅呢？

“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只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吗？

“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丧失立场吗？是丧失警惕吗？

统统不是。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问题。你们这个阵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阵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的大门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

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别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抹胭脂搽粉，是遮盖不住丑陋的面孔的。你们过去放了那么许多毒，出了那么许多牛鬼蛇神，又耍了那么许多恶劣手法来抗拒文化革命，今天用几句空话，就能向读者交代过去吗？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到了彻底革命的时候了。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刮黑风的时候，是谁积极支持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呢？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遭到革命群众反击以后，是谁用各种办法包庇邓拓、吴晗、廖沫沙呢？后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问题包不住了，又是谁指使你们玩弄那一套“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假批判把戏呢？所有这些问题，你们掩盖是掩盖不住的，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不揭发，群众要揭发，你们不批判，群众要批判。我们相信《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辑部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一定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彻底决裂，大胆揭露和批判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

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把一批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下台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们应该看到，还会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登

台表演。不同的是他们的表演方式会经常变花样，有的是赤裸裸的，有的则比较隐蔽，有时分散出击，有时集中进攻。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前的运动，坚决地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斗争，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蚍蜉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注① 廖沫沙曾经在一九三四年用“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攻击鲁迅的革命杂文是“花边文学”。鲁迅用这句话回敬了廖沫沙，并为自己的杂文集取名《花边文学》。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四一、三九七——四〇〇页。*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由于我国遭受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一时沉渣泛起，兴妖作怪，牛鬼蛇神，纷纷登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我们必须从阴暗的角落里把他们全部暴露出来，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

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必然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人物中，邓拓就是其中一个。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几年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大进攻。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究竟邓拓等人是不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含糊不得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含糊，就是包庇坏人。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批判。

小丑跳梁，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因此，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总是首先指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

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他说，匡衡曾经向汉元帝进谏说，作皇帝的要“广谋从众”；著名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汉光武帝，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在列举了古代的帝王将相如何虚心地接受“群下”的意见之后，邓拓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首先，认为封建的帝王将相能够接受群众的意见，这是完全歪曲历史事实的。匡衡、郑兴所说的帝王听取“众”、“群”的意见，就是要听宰相、尚书等官僚的意见。说什么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能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邓拓不厌其烦地宣扬什么匡衡、郑兴要汉元帝、光武帝“纳群下之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谓“群下”指的是谁？汉元帝、光武帝指的又是谁？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而他所说的汉元帝、光武帝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第三，邓拓攻击我们党“企图出奇制胜”。革命，就是要出奇制胜。革命的时代，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创造奇迹的时代。右派分子曾经攻击我们党中

央“好大喜功”，反右斗争前夕，一九五七年五月，邓拓自己也攻击我们党中央“贪大喜功”，现在，邓拓又攻击我们党中央“企图出奇制胜”。可见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是多么的仇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歌颂党，歌颂党的伟大领袖，就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而鄙视劳动群众的邓拓、吴晗等人却相反，他们竭力歌颂帝王将相，歌颂剥削阶级的头子，恶毒地谩骂无产阶级的党。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越多，反而越糟糕”。

“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东风压倒西风”，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现阶段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个科学论断是各国革命人民的精神原子弹。它越来越被广大革命人民所掌握，极大地鼓舞了并且继续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科学论断，击中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怕得发抖。对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来说，确实是，我们宣传得越多，他们就越糟糕。如果真是一句“无济于事”的空话，那么，邓拓之流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这样拚死命地来反对呢？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做《专治“健忘症”》的杂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篇文章，一派黑话。既然是“黑话”，当然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邓拓扬言这是一篇谈医说病的文章。这是弥天大谎！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吧。

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到了，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真是欺人太甚！《艾子后语》明明是一部政治讽刺小品，哪里是什么谈医说病的？

这本书是“意有所寓”，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邓拓当然知道《艾子后语》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文章，但是他却指鹿为马，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为什么忽然发表专门谈治健忘症的文章？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管理理论宣传工作的邓拓，为什么“破门而出”，行起“医”来呢？既然是行医治病，为什么伤风感冒、痢疾、伤寒等病都不治，而偏偏“专治”健忘症？是不是因为“健忘症”在当时已经成了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以致需要《前线》发表专文，需要邓拓亲临“前线”专治？

“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这是政治概念，而不是医学概念。至于“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同“健忘症”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很显然，邓拓是在这里讲政治，而不是讲医学。((1)(2))

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遍查医书，找不到用狗血淋头或打棍子这种专治“健忘症”的秘方。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明明是政治手法，那里是什么治病的药方？

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

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在当时，叫嚣要我们党下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同时又刮起了一股单干风、翻案风。就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股逆流闹得最凶的时刻，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表了邓拓这篇最恶毒的文章，叫喊要我们党下台。

你看，钻在党内的邓拓，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配合得多么密切！

邓拓还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借古讽今地说，“王道”就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办事，“霸道”就是“依靠权势，蛮横逞强”，

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我们从这里“找出经验教训”，并且骂我们“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很显然，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所说的“王道”、“霸道”，都是剥削阶级对人民的专政。“王道”和“霸道”是他们统治人民的两手。他们所宣扬的什么“王道”，只是对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欺骗。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之后，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要“依靠权势”，即依靠国家机器和广大工农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在这个情况下，邓拓气势汹汹地反对“霸道”，声嘶力竭地宣扬“王道”，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把邓拓的上述言论，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言论加以对照，他的反党面目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则说什么“东风”、“西风”都是“陈词滥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污蔑我们“白天黑夜地叫喊世界革命，叫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是“用空洞的咒文、响亮的辞句和挥舞马粪纸做的剑”；邓拓则说，“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空话。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口号，来反对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敌视群众，更不懂得什么是“群众的智慧”的邓拓，竟然狂妄地说我们党“凭着自己的明智”，“不重视群众的智慧”。这不过是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滥调，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颠覆活动。

国内外敌人对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采取和平演变的手段，企图实行反革命复辟；而邓拓则要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要我们党“完全休息”，一切由他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

邓拓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邓拓所讲的，就是赫鲁晓夫所讲的。邓拓想要做的，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所做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蚍蜉撼大树，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邓拓用所谓讲故事的手法，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黄金和宝剑的骗局》、《说大话的故事》、《今年的春节》、《白开水最好喝》等等杂文中，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讲了两则外国寓言故事。一个是竞技人好说大话，一个是山雀夸口，要把海水烧干。

与《两则外国寓言》同时，邓拓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射来另一支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

这篇杂文的材料是从明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上抄来的。故事是讲，有一个人全部的家当只有一个拾来的鸡蛋，这个人幻想鸡蛋生鸡，鸡生蛋，卖鸡买牛，牛再生牛，翻几番，最后还打算讨小老婆。结果引起他老婆的“怫然大怒”，“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邓拓讲了这个故事之后，问道：“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邓拓接着说：这个人虽然懂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想入非非”，以致“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在这些所谓的“故事”中，邓拓讲了三个意思：（一）竞技人、山雀、只有一个鸡蛋的人，他们的“伟大计划”都是“胡吹牛皮”；（二）他们夸大了“心理要素”的作用，自以为凭着“心理要素”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宣告“破产”，“完蛋”了；（三）牛皮吹破以后，“受骗的人们”不要“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在这里，邓拓真的是讲故事吗？不是。

从来寓言故事，都是意有所寓的。江盈科讲的那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做《妄心》，是讽刺那些“世之妄意早计，希图非望者”，即讽刺那些希望早一点、快一点实现自己目的的人。邓拓也在文章中反复启发读者，要懂得这些故事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明现在的“许多问题”；“事实显然证明”，“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并且指着鼻子说：“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着汤匙去赴宴的没有？”你看，邓拓就是用这种挑战

的口吻宣告，他讲的故事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帝国主义者曾经嘲笑我们，说我们是“说大话”，是“吹牛皮”。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时，帝国主义者就叫嚷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完蛋了”。而邓拓所讲的这些故事，就是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说大话”，是“胡吹牛皮”，是“想入非非”，是“用空想代替了现实”，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把全部穷家当都“毁掉”了。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一条危险的尝试的道路”，是“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遭到了“彻底失败”。邓拓对我们的攻击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如出一辙。

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无耻污蔑，我们党早就有力地作了驳斥。我们党说：我们用大跃进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原子弹吗？中国出现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不是我们，而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

应该指出，邓拓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不只是骂骂而已，他气势汹汹地煽动说：“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这就是说，他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还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邓拓自己的说法，他这个政治骗子的面目既已被大家揭破，我们也绝不能轻易放他过去！

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为他们唱赞歌

邓拓上述攻击党、攻击总路线的言论，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现在已经查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前，邓拓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邓拓是漏网的右派。一九五九年，他被罢了官，被撤销了他在人民日报担任的重要工作。邓拓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呼冤喊屈，同时也就是为他自己呼冤喊屈。

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忽然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的文章。

邓拓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李三才“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英雄事迹“被湮没”，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对于李三才的所谓不白之冤，邓拓不仅为之万分痛惜，而且讲起来情绪很激动。李三才究竟是何许人，邓拓为什么要替他辩护？

李三才是明代万历时的一个官僚，任过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职。他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者鲜血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是人民的死敌，根本不是“正面人物”。

邓拓所以对已死几百年的李三才感兴趣，因为他被罢过官。李三才任户部尚书时，想挤入“内阁”，工部郎中邵辅忠等奏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李三才被迫“罢官”。居家时，御史刘光复告他“盗皇木私建营第”，又引起一场争论。结果李三才“落职（即罢官）为民”。《明史》对李三才的评论是：“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作者完全是用替李三才辩护的口气来写的。因此，从史书上说，李三才没有不白之冤，用不着辩护。可是，邓拓却为李三才愤愤不平，要替他翻案。他说，“李三才又一再上疏，……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李三才“盗皇木”的事，据《明史》记载是经过查究属实，并且把李三才“落职为民”。奇怪的是，邓拓在写这篇文章时，火气却那么大，他不顾《明史》记

载，添枝画叶，故作波澜，硬说李三才“是理直气壮的”，而朝廷方面“却不敢彻底查究”。

问题的真相如何，确实很明白：邓拓笔下的这位“李三才”，就是“海忠介”即“海瑞”，就是被我们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拓所以把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说成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邓拓所说的“理直气壮”，就是所谓反党骨气。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人民面前，在党面前，是有罪的，他们决不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邓拓还写了《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文章开头的一首诗是一九六一年写的，其中四句是：“一支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生平。”全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郑板桥“丢乌纱帽”。他翻来复去说“罢官”：郑板桥“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因此，“罢官而去”；统治阶级“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终于使“郑板桥竟罢官而去”；“罢官以后”，他的思想作风“越来越鲜明”。

邓拓还引了郑板桥题在自己画的《深山兰竹图》上的一首诗：“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并说，这幅画是在他不愿做官的时候画的，如果“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宦官生活做一对照，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这就是说，《深山兰竹图》的主题思想就是“一顶乌纱须早脱”，就是“罢官”。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宣传郑板桥在“罢官以后”仍旧不屈服的“傲骨”。

一九六一年，邓拓还为米万钟、李@①的被罢官鸣不平。他说，米万钟是“很有骨气的人”，“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政，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因此遭到“罢官”。说李@①“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两革科名一贬官”这句诗反映李@①“愤懑不平的心情”。

显然，邓拓是借这些地主阶级的亡灵，抒发自己对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无限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党的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当我们党对那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的牛鬼蛇神展开反击时，邓拓更借郑板桥的口叫出：“难道天公还 q i á n @②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足见仇恨之深。

邓拓在一九五九年被罢官之后，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这首诗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他自己被罢官，对党是怀着强烈的仇恨的。在这首诗里，邓拓顽强地表现自己，为自己辩解，污蔑党没有分清他的“功”、“过”；邓拓的“豪情”，就是反党的“傲骨”，所谓“后争先”，就是等待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间，邓拓所以大肆颂扬被罢了官而不屈服的“骨气”，一方面是为了同吴晗的《海瑞罢官》互相呼应，密切配合，替右倾机会主义者唱赞歌；另一方面，发泄他自己胸中对党的仇恨，为自己闹翻案，向党进攻。

不准滑过去！

邓拓供认，他懂得“瞒天过海”、“借尸还魂”、“浑水摸鱼”、“指桑骂槐”、“假痴不癫”、“笑里藏刀”、“无中生有”、“十面埋伏”、“虚张声势”等等“阴谋诡计”。他知道赤膊上阵是很“危险”的，因此，他总是“披挂上阵”。在他认为时机有利时，就狠狠进攻，在他认为时机不利时，就准备滑过去。邓拓和他们“三家村”的“兄弟们”，确是一伙政治阴谋家。

邓拓这一伙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他们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进行了斗争。

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吴晗，放出了大毒草《海瑞骂皇帝》，恶毒地咒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又放出了另一株大毒草《论海瑞》。为了配合右倾机会主义的翻案进攻，一九六一年初，吴晗“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大毒箭《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家村”的主将邓拓“上马”，《燕山夜话》上台演出了。过了几个月，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同时出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邓拓在《种晚菘的季节》杂文中，讲了如下一段黑话：“我希望能够联

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主将一声令下，就在同年同月，“三家村”黑店在“前线”开张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他们取得了“经验”之后，又联合了一批“园艺爱好者”，撒下了另一批“晚菘”——“长短录”。

一时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夏衍等人，串通一气，结为一伙，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开辟专栏，称兄道弟，说长论短，散播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狂妄地提出，要我们党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要用棍子把革命者打死。

但是，他们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们党举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他早就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教导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使人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登了一则广告，叫《奉告读者》，说是“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明明是因为十中全会之后形势对他们不利，“夜话”才“下马”的，却说什么“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这完全是一套骗人的鬼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一旦时机到来，“非写不可时”，还要再写。“夜话”暂时“下马”，“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观察形势，伺机而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揭露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邓拓便匆忙出场，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表面上是批评吴晗，实际上是替吴晗辩护。他们企图混过关去。

邓拓的这篇文章，是怎样为吴晗辩护的呢？

第一，邓拓说，《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是“道德继承论”。他装腔作势地说，“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

结论是：道德继承论。他断定，无论是《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还是《论海瑞》，它的思想基础都是道德继承论。

第二，回避要害问题。《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就是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但是邓拓却闭口不提“罢官”，而且转弯抹角地向读者说明，《海瑞罢官》的主题不是“罢官”。

总之，邓拓的文章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模糊群众的视线，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并且丢给吴晗一个救生圈，告诉吴晗，你的问题主要在道德继承问题上，对于剥削阶级道德，“决不能加以继承，而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态度”，在这里大作文章，我们就可以避开“要害”，滑过去了。

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连忙说：“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接着，在他写的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中，干脆就用邓拓抛给他的救生圈做题目，叫做《是革命，还是继承？》他完全按照邓拓的调子唱歌，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旧道德继承论者”。他说：“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是一个”，这就是“道德继承论”。并说邓拓的批评是“科学的批评”，“我诚恳地接受，并且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是“贼喊捉贼”的一出双簧戏。

他们认为一方提出了“批评”，一方“承认”了错误，进行了“检讨”，事情就可以过去了，邓拓、吴晗等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可以溜之大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是邓拓等人料不到的。他们的这些活动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今天重读这段话，是多么的亲切呵！

* * *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帅，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一整套进退应变策略的。

这说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异常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不能等闲视之。但是，他们这一伙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他们神气活现，只要把他们放在太阳底下一照，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他们就垮台了。

既然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谋已经暴露，画皮已经撕破，手法已经戳穿，我们就一定要穷追到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斗争，敢于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引导着我们胜利前进。*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三家村”兄弟中，邓拓是混进党内的叛徒，是漏网的大右派，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吴晗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是蒋家王朝的走狗，是洋奴胡适一手培养出来的洋奴的洋奴。那么，廖沫沙呢？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的几年，廖沫沙同他的“三家村”兄弟，在他们的后台大老板的指使下，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就认识了他的反动的政治面目。但是，由于廖沫沙受到了他的后台老板的支持、庇护和纵容，不仅一直逍遥法外，甚至受到进一步的信任和重用。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了廖沫沙的反动面目之后，前北京市委公然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一九六四年七月，他们故意任命廖沫沙为某代表团团长，并且给廖沫沙作政治鉴定，说他在历次运动中“政治立场坚定”，只是在“学术上有些错误观点”。他们瞒上欺下，干着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欺骗全国人民的罪

恶勾当。由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巨大政治压力，他们便玩弄另一个阴谋诡计：叫廖沫沙写一篇所谓自我检讨，应付过关。

早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廖沫沙发表了《有鬼无害论》，替孟超的厉鬼“李慧娘”张目，煽动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中间隔了三年半时间，直到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廖沫沙才发表一篇所谓“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这是假检讨之名、行进攻之实的大毒草。廖沫沙完全回避自己的反党、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问题，说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有的时候失掉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是对文学遗产“有一种错误的偏好”，因此，在文化战线上“迷失方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自觉”的。

“三家村”的后台大老板还大肆散布这样一种谬论：“难道你的头脑中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一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我就不相信！”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辩。他们首先是混淆敌我界线，把那些反共、反人民的分子，打扮成为站到社会主义立场的“革命者”，把革命者和反动派一锅煮，好人和坏人“合二而一”，然后就用“错误言论大家有份”的反动谬论，来压制革命左派对反革命右派的揭露和斗争，打击左派。

他们气势汹汹地责骂左派：廖沫沙自己已经感到难受了，你们还要批判吗？这是“揪住不放”，是“不准革命”，你们是“赵太爷”！他们把革命的左派诬蔑为反革命的“赵太爷”。“三家村”及其后台大老板，就是这样一群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蛮不讲理、专行独断的黑帮人物。

前《北京晚报》在发表廖沫沙的文章时所加的编后按，完全是按照这个反革命黑帮的意旨说话的。它说：廖沫沙是“实际上散布了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毒素”。只在“思想”中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这是什么话？直到一九六六年四月中旬，他们觉得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有些混不下去了，于是搞了一个“四·一六”阴谋。四月十六日，“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前线》和前《北京日报》，刊登了所谓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给廖沫沙加了一顶“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空洞帽子，把廖沫沙的一贯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轻轻带过。

革命斗争的进程，是“三家村”黑帮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所料不到的。阴谋被揭穿了，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事到如今，“三家村”及其后台老板对于廖沫沙的假斗争，真包庇的大骗局，已经大白于世了。

说廖沫沙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只是不自觉地散布了“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是弥天大谎。廖沫沙的一生，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生。

廖沫沙的凶恶面目，必须揭深、揭透、揭彻底。

蒋介石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鲁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功勋，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正因为鲁迅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文化革命旗手，因此，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买办文人，封建遗孽，汉奸特务，托洛茨基黑帮等等，对他进行了最无耻最凶恶的攻击。

鲁迅写的许多杂文，象锋利的匕首一样，刺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的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大晚报》，国民党党棍潘公展办的《微言》，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王平陵、叛徒杨村人，流氓张资平等等，都来攻击鲁迅。在这批反动人物中，就有廖沫沙。

当时鲁迅在报上发表的杂文，往往围绕一圈花边。廖沫沙便化名林默，写了一篇题为《论“花边文学”》的杂文，发表在最反动的《大晚报》上。这篇杂文诬蔑鲁迅的文章“不痛不痒，毫无着落”，“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说什么“这花边体”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并且狗血喷人，咒骂鲁迅是“帮洋人经营生意”的“买办”。

同廖沫沙这个恶毒咒骂相呼应，国民党的一位官老爷文公直，则诬蔑鲁迅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当时笔伐鲁迅的很多，但是，“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引者注：指廖沫沙、文公直）还差得很远”（《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三四二页）。

廖沫沙、文公直之流诬蔑鲁迅的话，同独夫民贼蒋介石完全是一个腔调。蒋介石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没有丝毫反帝国主义的工作，而且障碍破坏民族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蒋介石，骂中华民族的救星共产党不反帝；身为蒋介石反动集团御用文人的文公直、廖沫沙则诬蔑民族英雄鲁迅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及他的走狗廖沫沙之徒，才干得出来。

对于廖沫沙的“围剿”，鲁迅一方面给以毁灭性的反击，同时，又表示极大的藐视。他把廖沫沙“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来的刻毒的话——“花边文学”，作为自己杂文集的书名。

叛变革命，投身国民党反动派，充当了蒋介石对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的“围剿”的急先锋，这就是廖沫沙在青年时代所干的罪恶勾当。

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奴才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克服了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国民党反动统治则腐败到极点，民怨沸腾。因此，国内外反动派对解放区更加仇恨。一九四三年，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正是在这个时候，廖沫沙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篇所谓的“历史”小说《咸阳游》（解放后收入《鹿马传》）。故事是讲齐国的孟尝君到了秦国，秦王把孟尝君扣住不让走，并且派了特务来监视他。孟尝君用千金买了一件狐白裘送给秦王的幸姬，并且向秦国的官吏进行贿赂，终于逃出了咸阳。

文中所说的“特务”、“情报”、“侦缉”等等，都是现代的语言。显然，廖沫沙讲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不是为讲历史而讲历史，而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讲历史。

那么，廖沫沙是为了哪个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呢？

古代秦国在今函谷关以西，陕西一带。这一带，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圣地——陕甘宁边区所在地。

《咸阳游》污蔑“秦国”的“情报和侦缉”很严密，“到处有眼睛跟着”，“秦王”左右“贪黩”，到处“有鸡鸣狗盗之流存在”等等。

廖沫沙这些咒骂“秦国”的话，同当时国民党宣传机关恶毒地诽谤共产党和抗日圣地陕甘宁边区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统一出版社出版的名叫《怎样与中共斗争》这本极端反动的书，即诬蔑我们的解放区“密布侦查网”，“密令各级人员实行互相监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邓文仪诬蔑延安“白天晚上都是恐怖”，工作人员“不是贪污腐败，就是低能无能”。一九四三年六月出版的《中共割据下之政治》，诬蔑边区各地“横暴贪污，殊出人意料之外”。请读者们比较一下，廖沫沙那些骂人的话，不就是蒋介石反动派咒骂共产党的话的翻版吗？

当时，廖沫沙一方面恶毒地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方面则狂热地歌颂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一九四四年二月，廖沫沙写了《凤兮，凤兮！》，肉麻地吹捧孔子，说“孔子不只是身居显贵”，而且是“养民也惠”，“乐以其贵下人”。说孔子摄行相事以来，“就着着实实有了一些看得见的成绩，使人欣慰”，社会秩序也“不象以往那么牵牵扯扯，混乱杂凑了”。文章特地编造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一个乡下人进城，丢了包裹。人们告诉他：不要紧，“去找警察”。那警察把手中的长戈向上一指，“大包裹高高悬在街中心的一根木柱上”。警察还谆谆开导这位乡下老：“这是当今孔相爷的法令，‘临财勿苟得’”。为什么政治这么清明呢？廖沫沙回答说：“原来有圣人在上面作宰相”。

那么，这位“当今”的孔相爷究竟是谁呢？

蒋介石反动派，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消灭共产党，一方面诬蔑解放区是民贫吏贪、盗贼横行的“匪区”；另方面则美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区是吏治清

明、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蒋介石集团为了推行这种反动宣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间，演了一出吹捧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伟大勋迹”的丑剧。十一月一日，举行了庆祝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十周年的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并颁颂词。蒋介石政府的头目们，如宋子文、何应钦、张群等等，都肉麻地吹捧孔祥熙的所谓“德政”。美国主子，如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也都向他们的走狗孔祥熙发来“贺电”。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大量吹捧孔祥熙的臭货。《经济汇报》发表了红字标题的《孔总裁就任十周年纪念专刊》。群丑们一致吹捧孔祥熙“废除苛杂，澄清吏治，民繁物庶，士饱马腾”的伟大成就。

孔祥熙宣传自己是孔子的子孙，一些无耻文人则跟着说孔祥熙是“圣裔”。有一个反动政客吹捧孔祥熙是“念及乃祖‘节用薄敛’致‘百姓足，君孰不足’之义”，“废除苛税杂捐，以利民生”的伟人。孔祥熙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个既残暴愚蠢又以贪污出名的大官僚，是蒋介石集团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所以这样大肆吹捧孔祥熙，就是吹捧整个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向共产党解放区进攻制造舆论。

事情很明白，廖沫沙的《凤兮，凤兮！》就是密切为蒋介石的这种反动政治阴谋服务的。他歌颂“孔子”的那些话，几乎都是逐字逐句从当时那些无耻文人、反动政客及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和特务机关那里抄来的。廖沫沙吹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王道乐土；吹捧孔祥熙是“当今”的“圣人”，象“北辰”一样“而众星环拱之”。这些话，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宣传机器也是不敢明目张胆说的。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廖沫沙是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反动派服务的忠实奴才。

反共的阴谋家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以蒋介石匪帮为首的反动力量的决战时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

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刻，廖沫沙干了些什么呢？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廖沫沙写了一篇“历史”小说《离殷》，算是讲殷纣王的事（见《鹿马传》）。据历史记载，殷纣王统治的末期，天下汹汹，人心离散，老百姓怨声载道，局面越来越糟。而当时，在岐山一带（今陕西西北部），由西伯昌和武王发领导的解放战争，却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下，几乎用不到任何说明即可看出，廖沫沙所说的纣是指蒋介石，而他所说的西岐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廖沫沙在《离殷》中，对殷纣王采取什么态度呢？对西伯昌又采取什么态度呢？廖沫沙不得不承认纣王“作尽坏事，说尽坏话”，承认“诸侯逐渐离心”。但是他仍然竭力歌颂鄂侯向纣王进谏的举动是“忠诚勇敢”。他要人们对殷纣王的反动统治尽忠，要用一切办法来“挽救殷商的天下”。甚至还无耻地歌颂纣是“天王圣明！”另一方面，则极力刻画西伯昌的阴险和狡猾，说“西伯藏头露尾”“是个野心的军阀”，并且很“阴险”。

廖沫沙这些骂西伯昌的话，同当时独夫民贼蒋介石骂共产党的话完全一样。蒋介石骂共产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阴险最毒辣的盗匪流寇”，是“拥兵割据”，有“野心阴谋”。显然，廖沫沙上述骂人的话，就是从蒋介石的造谣公司中批发来的。

廖沫沙不仅骂骂而已，而且要杀害“西伯昌”。

殷纣的反动统治崩溃前几年，纣王认为西伯昌要“造反”，“阴谋异动，靠不住”，便把他关在大监狱里。西伯昌献了洛西一片地给纣，纣把他放了；纣王下面的一位大臣祖伊坚决反对。请看下面这段描述：

纣王：“我已经把他放了”，“我还给了他弓矢斧钺，不少的外国武器，他可以扩编军队，他可以专任征伐，永为西伯之长。”

祖伊想起西伯昌曾经伐密须、灭耆国，也是个野心的军阀，很阴险，便说：“大王其仁如天，不过天讫殷命，这样大的权力交给他，可不知道他怎么样？”比干补充说：“假人元龟，无敢知吉，我也觉得大王的心肠太好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廖沫沙这里所说的西伯昌，就是影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了粉碎蒋介石“和平谈判”阴谋，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全国人民都歌颂毛主席为人民革命事业的大勇，重庆的工人高呼：“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但是，由于全中国革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蒋介石不敢直接对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下毒手。蒋介石企图在谈判桌上，逼使共产党交出军权和解放区政权的阴谋也失败了。蒋介石手下的人，对蒋介石的这个罪恶阴谋的失败，有所“埋怨”。他们抱怨蒋介石“太仁慈了”，抱怨蒋介石在“会谈记要”中，没有“消灭”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廖沫沙借祖伊的嘴埋怨纣王把西伯昌放回西岐去，埋怨纣王让西伯昌“可以扩编军队”，把这样大的权力交给西伯昌，是“心肠太好了”。这同蒋介石手下那班人的话，不是如出一辙吗？

请读者们想一想：廖沫沙穷凶极恶到这种程度，竟要对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下毒手，他的心肠是多么的黑啊！

当西周的军队渡过孟津，势如破竹似地向殷都进发的时候，殷纣的反动统治完全崩溃了，“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都破灭了。人民群众壶浆以迎王师，大家纷纷去投奔西岐。在这个形势下，廖沫沙是何去何从呢？当时，纣王下面的文武百官，如微子、太师 c i @①，李师强，太颠，散宜生等等，大批的人都离殷西去。但是，廖沫沙所刻意描写的大臣祖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微子、太师 c i @①等都认为，纣没有希望了，只有投奔西岐。祖伊却说：“唉，唉，他（引者注：指西伯）吗，他和纣有什么两样呢？而且他滑头。”

微子主张请西伯起兵来灭纣。祖伊回答说：“那不行，灭了一个纣，难道没有另一个纣出来？我看姬昌就是一个纣，他比纣更阴险。”“不久就传说祖伊在东海造反了”，故事就这样结束。

当时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是造谣说，蒋介石固然不行，但是共产党比蒋介石更坏吗？不是说人民解放战争是“以暴易暴”吗？一些政治阴谋家不是主张另起炉灶，来挽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一直到蒋介石反动统治完全垮台的时候，廖沫沙还恶毒地咒骂共产党同国民党没有两样，甚至比国民党更坏。他要顽抗到底，坚持同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为敌。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百万雄师的大铁拳，把廖沫沙“在东海造反”的幻梦粉碎了。

漏网的大右派

廖沫沙同邓拓一样，是漏网的大右派。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党权、政权、军权。同年十月，匈牙利发生反革命叛乱。在国际反革命逆流下，廖沫沙这个反共的老手，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充当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一九五六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廖沫沙用闻璧这个名字，在《新观察》上，以《乱弹杂记》为总标题，连续向无产阶级射出了密集的毒箭。

廖沫沙一出场，就恶毒地攻击所谓“新八股”。什么叫新八股呢？廖沫沙说，新八股就是：“优点、缺点、原因、经验、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污蔑说，这种八股文，都是“搬弄一些教条或经典”，“只许为圣贤立言，讲四书五经所讲过的道理”。

解放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如饥如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使得廖沫沙这个反革命分子暴跳如雷，大骂所谓八股文，说这样的八股文“滔滔天下，触目可见”，“言之无物，通篇是废话”。并且说：“只有这样的‘八股文’才会得到领导人的赞许”。

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攻击金光灿烂的毛主席著作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污蔑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运动吗？告诉廖沫沙，我们就是不准你的“乱弹”“杂记”这些大毒草泛滥；就是要大学特学毛主席著作，大讲特讲毛泽东思想，只许讲无产阶级的“圣贤之言”。

“滔滔天下，触目可见”吗？你们说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实已经传遍全天下，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了。

一切反动派最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廖沫沙在反对所谓“官僚主义”的旗帜下，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六年八月间，我们报纸上报道了一位医师所开的吃蝌蚪可以避孕的单方。廖沫沙抓住这样一个小小问题，用了一个煽动性的题目《活吞蝌蚪》，对无产阶级专政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

廖沫沙故意提出问题：“女工们活吞蝌蚪，会不会将其他寄生虫卵一起吞下去呢？”他煽动地回答说：“那还用说吗？全吞下去了，全吞下去了！”然后他挑衅性地问道：“可是谁应该负这个糟糕的责任呢？”他回答说：介绍这个单方的医生不应负责，抢先登载这个消息的报纸不应负责，卫生行政部门也不应负责。接着笔锋一转，把矛头直指党中央：“我这样一层层思考下去，自己也觉得茫茫然，……连个被告都没有了。如果讲责任，这个责任究竟该谁负呢？”“现在据我看：这个责任恐怕只好由那些活吞蝌蚪的可怜的女同胞们自己去负担了。——原案只好作无头公案处理，着即归档！”

女人们吃蝌蚪避孕的这个责任，必须“一层层”追究下去，一直追到党中央。必须把党中央放在“被告”席上，否则，就是“无头公案”。

廖沫沙的用意是多么恶毒！一位医生介绍了一种避孕的单方，有些女同志服用了。假如这个单方有缺点，那么只要加以说明，纠正就行了。如果不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怎么会要追究党中央的责任呢？怎么竟去煽动“可怜”的“女同胞”去反对党中央呢？这不是十足的反革命煽动行为又是什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廖沫沙写了一篇《官僚主义的“下限”》，更是一支直接对准党中央的黑枪。他说，不能认为“天下最爱犯官僚主义毛病的”，只是些“官卑职小”的干部，“事实上官愈高，职权愈大”，沾染官僚主义的尘土也就“更厚更多”；因此，火力应该集中于“大官僚”，而不能让大官僚主义“逍遥于批评之外”。

廖沫沙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难关，大灾难，因此，他“请士子们——也就是知识分子们——严重注意！”，“要逃脱这个难关”，“避免这场灾难”。

廖沫沙公然叫嚣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现在发现：官僚不死，八股文不止！”廖沫沙根据他的反革命经验，他深深懂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完蛋了，他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才能逃脱难关，避免灾难。

告诉廖沫沙之流的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无产阶级的专政如铜墙铁壁一样坚固。不管你们多么狡猾，不管有什么人包庇你，你躲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反右派斗争叫你漏了网，但是，你们是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的。

“三家村”黑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干将

当“三家村”黑店在它的后台大老板指使下，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的时候，廖沫沙袒胸露腹，大吹法螺，拚死命地向我们扑来。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动了猖狂进攻。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传身护家的法宝。因此，廖沫沙这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便集中了一切仇恨，攻击、诋毁和诽谤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积极活动，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复辟。

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扬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左倾机会主义者，诬蔑我们搞糟了，叫嚷要同我们“算帐”。我们党有力地批驳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的总路线的无耻诽谤。这时，廖沫沙跳了出来，在一九五九年《前线》第十三期上，放出了一株毒草《要学会算帐》。他虚伪地说，“我们不赞成这种‘秋后算帐派’”；但是，他紧接着来一个“但书”，说“如果只谈‘算帐’，我们不但不反对‘秋后’算帐，而且赞成‘秋前’也要算帐”，他气势汹汹地叫喊：“有帐必算”，“大帐小帐一齐算”。

廖沫沙这个反革命分子同我们党斗争了几十年，现在他认为已到同我们“算总账”的时候了。

“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吴晗抛出大毒草《海瑞骂皇帝》之后，廖沫沙跟着杀将出来。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在《前线》抛出大毒草《论“太岁头上动土”》。

廖沫沙捧出死人王充，歌颂他是“不怕冲撞‘太岁’的硬汉子”，“把‘圣贤之言’剥得不成样子”。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同吴晗吹捧海瑞敢于大骂“皇帝”，是一路黑货。廖沫沙是在鼓励人们敢于“冲撞”党中央，反对“独尊”毛泽东思想，要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家”自由泛滥。

“三家村”黑帮及其后台大老板认为，一九六一年春天是他们反革命复辟的大好形势的开始。一月一日，“三家村”黑帮总管邓拓，叫喊“春风袅娜”，向众牛鬼蛇神传下帅令：“听，春雷欲动，大野昭苏，辞旧岁，展雄图。趁良辰美景，同心戮力，坚持奋斗，切莫踌躇！”同月，反革命急先锋吴晗的《海瑞罢官》急速出笼。廖沫沙紧紧跟上，一月二十日，他在前《北京晚报》上，大擂战鼓，说“春，是要‘腊鼓’来催的”，“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并且大骂所谓“和大主教差不了多少”的“天子”。

《海瑞罢官》掀起的一股妖风，冲昏了“三家村”黑帮们的头脑，他们觉得“天下大变”的时机到来了。三月九日，廖沫沙提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理论：《唯变所适论》。在发表时，廖沫沙觉得这个题目太露骨了，便改成：《孔子和（周易）作者是怎样观察“变革”的》，给反革命的理论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廖沫沙采取了“三家村”黑帮所惯用的“以古讽今”的手法，发出了反革命复辟的狂吠。他说：“当时”（应读作现在）是“社会历史的大变化”的时代，而“孔子”则很“保守”，“一切都得照老样子”，“不能容纳任何新鲜事物”。

廖沫沙大叫要反对“至死都不敢违反‘圣人’之言的历史传统”，他说：“人们面对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就只有一个方法：‘惟变所适’”。只要把这些话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同廖沫沙的那些反动言论联系起来，那么，他的用心就很清楚了。当时，叛徒赫鲁晓夫把他们那套修正主义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国内的阶级敌人则把“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这套反革命谬论当作新鲜事物，而骂我们党是顽固的“保守派”，不愿意适应新形势。廖沫沙的“惟变所适”论，翻译成明白的语言，就是要人们适应他们的反革命“变革”，跟着他们这伙阴谋家跑。这是白日做梦！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派，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最彻底的革命思想。无产阶级当然要变革，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革命的变革，对于牛鬼蛇神的所谓“变革”——反革命复辟活动——则要坚决粉碎。

一九六一年六月至八月间，“三家村”黑店纠集了一批牛鬼蛇神，在后台大老板的指使下，刮起了一阵大黑风。

廖沫沙在六月十日出版的《前线》上，发表了《调查和算帐》，鼓动牛鬼蛇神到基层去“算帐”，“既要查旧帐，又要算新帐”。不错，帐是要算的，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不仅要算新帐，而且要查旧帐，要新帐旧帐一起算！这篇文章的标题太露眼了，收入《分阴集》时，他偷偷地改为《从“无数”到“有数”》。

接着，吴晗、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射来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陈绎和王耿的案件》、《一个鸡蛋的家当》、《磨光了的金币》、《专治“健忘症”》等等“排炮”。八月十日，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出笼。当这群“魔怪舞翩跹”的时候，廖沫沙在八月三十一日的前《北京晚报》上，放出了《有鬼无害论》，替妖魔鬼怪作护法，“鼓舞”牛鬼蛇神不要“屈服于压迫势力”，要“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

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反对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压迫。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我国，地富反坏右是专政对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专政者。在这种条件下，廖沫沙号召“与压迫势力作斗争”，这不是公开地号召地富反坏右起来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作斗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吗？

当国际国内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准备大干的时候，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鬼，要开展一个打鬼运动。这怎能不叫廖沫沙之流的鬼蜮恼怒呢？廖沫沙在《怕鬼的“雅谑”》中反诬我们：鬼神一出来，你们就叫喊要打倒，可是你们是“怕鬼怕得要死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者，从来不怕鬼。我们敢于消灭一切妖焰鬼火，不管是洋鬼、土鬼、活鬼、死鬼，统统打倒，决不让“三家村”鬼群兴风作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的天下。

从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家村”黑店公开营业，到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国内阶级敌人的进攻最为疯狂。这时，“三家村”黑店也最放肆。“三家村”黑店急先锋吴晗狂呼，反革命的“浪头”将“越来越大”。“三家村”的总管邓拓则赤裸裸地说：共产党的“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会越来越多”，“大

地很快就要解冻”。他们得意忘形，公开叫喊要我们党下台“休息”，他们加紧联络人，发展组织。

但是，“三家村”黑帮及其后台大老板，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号召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惊醒了大地。“三家村”黑帮们的丧钟响了，不是什么“好光景就在眼前”，而是他们的末日到来了。

廖沫沙大概也觉得他们的大势有点不妙，一九六三年七月，他发出《身后事该怎么办？》的哀鸣。

共产党人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一个革命者死了，千百个革命者站起来。个人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永垂不朽。那些干反革命勾当的人，一生干坏事，他们怕死了受人民的唾骂，因此提出：人死之后怎么办？

怎么办呢？廖沫沙搬出了庄子的反动哲学来。他说：人死了，“万念俱消”，“朽骨、朽肉，化除腐朽，就算完事”，只要“对身后事看得如此明白”就行。我们告诉那些反革命的黑帮分子：决不是人死了，“万念俱消”，“就算完事”。为革命而死，永垂不朽；为反革命而死，遗臭万年。你们这套腐朽没落的哲学是骗不了人的。

廖沫沙的反革命立场是顽固的。过了两个月，他又在《前线》上向牛鬼蛇神提出：《学游泳不要怕水》。他说：“学游泳的人都尝试过第一次被人推下水的滋味：一到水中，立即水深没颈，真使人惊慌失措。但是经过两次、三次、四次下水，就慢慢习惯了”。廖沫沙确是有反革命经验的人。从参加蒋介石的反共“围剿”到一九五六年的右派分子进攻，他也确实是经过“四次下水”了。他供认自己对于反革命勾当已经“习惯”了，并且告诉那些第一次“下水”的人，面对着向他们冲击的革命洪流，不要“惊慌失措”。但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只不过是表面镇定，实际上心慌得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是顽而不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们砸得粉碎。

* * *

廖沫沙一生的反革命活动，可以帮助人们懂得，这一场斗争决不是什么打笔墨官司，而是剑拔弩张、荷枪实弹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你活我死，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叛徒，变节分子，帝国主义的奴才，蒋介石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三家村”这个反革命巢穴所 jūn @②集的就是这样一批黑色人物，前北京市委收罗、包庇、纵容的就是这样一群牛鬼蛇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

亲爱的读者们，象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样的牛鬼蛇神，难道仅仅是在一个地方存在吗？别的地方就没有吗？不！“三家村”黑店固然是反革命复辟的重要巢穴；但是，象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的黑帮人物，决不仅仅是个别的现象，因为这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把牛鬼蛇神从各个阴暗的角落里统统揪出来，挖掉反革命复辟的根子，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千秋万代，永远飘扬在中国的大地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个人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

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常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 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人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 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当地名义的大党阀。

(八) 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企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 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

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
中央在批语中说：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

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〇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次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烈烈，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十几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相互颠覆，内部相互残杀。楚成王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

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互相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的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反革命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什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在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

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

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在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

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地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变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

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哪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集中的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包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这场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背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这个讲话，并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正当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量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

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 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2) 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

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

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的最

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名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查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

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不去，力争越剥越少。

2，领导与群众问题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吴晗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剑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

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 1962 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 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 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3，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自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会议批判了朱德.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朱德纪要 1966. 05. 23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

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彭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XXX：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 1931 年到 1935 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 年底到 1938 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

会议决定全文如下：

（一）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 撤消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三) 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央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四) 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 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中发〔66〕278号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和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同志职务问题的决定已经下达。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和罗瑞卿二同志错误问题的材料已经发给你们。在传达这个决定时，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二同志错误的问题，可以先作如下说明：

(一) 关于陆定一同志的问题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逛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

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诬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陆定一大反党中央和毛主席最放肆的时候，也就是严慰冰写匿名信最多的时候。

反革命匿名信集中攻击林彪同志，就是因为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他们第一封反革命匿名信，是在一九六零年初，即彭德怀反党集团已被揭发批判的时候。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党中央揭发了罗瑞卿的反党篡军的阴谋不久，一封直接给林彪同志的极其恶毒的、令人愤慨的反革命匿名信就寄出了。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二）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 (1) 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 (2) 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 (3) 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 (4) 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这个文件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陈伯达讲话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讲话。一切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次对四大家族的斗争，是防止反革命复辟，政变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反对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伟大的决策。

资产阶级复辟的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封建复辟过多少次。文化革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在进行着，大体搞了七百年（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夺取政权之后解决的。要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长时期的。是不是比资产阶级用的时

间短一些？我看可以短一些，我们是依靠工农兵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性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我们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几千年来的习惯势力是不能轻视的。

这次我们同“四大家族”的斗争，他们是搞地下活动，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高饶也是背后搞地下活动。搞政变的，没有长期的地下活动是搞不起来的，我们不能有太平观念。列宁说的两条：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没死，新的资产阶级又在生长新的反革命分子。彭真在公布《二十三条》以后作了两次报告，是包庇一切坏人，地、富、反、坏、右反攻倒算。在社教运动中，存在着两种尖锐的世界观的斗争，他用生产的大帽子压人，说生产搞坏了，是保护四类分子，保护一切坏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从马列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来看，确是这样的。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恩、列经过的要多，列宁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主席有五十年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席的著作渗透着辩证法，不用辩证法是读不懂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文章很短，概括得很集中，很精辟，最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席的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是对立的统一。列宁也讲过，但是毛主席阐述得更明确，更通俗，更容易为工农兵看懂。主席说：《共产党宣言》很大的缺点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当然那时有局限问题，写过也不系统。马、思、列、斯是主张武装暴动，都是讲的城市，很少说农村包围城市。（周总理插话：斯大林讲过建立根据地是指的黑海克朗、克德两个海口的小城市）（林总插活：南昌暴动以后，朱德看见山多树多，说我是拜山教。）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一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重要，阐述了主席思想，要很好地、认真地读，多宣传。今后世界革命走我们的道路更普遍了，有普遍意义，包括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武装，在农村容易存在。这篇文章很重要。

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发展了列宁的观点。列宁讲到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反对力量，小生产者时刻产生出资产阶级分子。主席讲的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社会主义建设，列宁重视农业，但以农业为基础是主席发展了。一九五七年，主席在莫斯科向各国党讲过，要注意农业，不然打起仗来没有饭吃。科学社会主义有了重大发展。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来要按主席这封信来编制计划，作为编制计划的纲要。

“文人无行”，道德品质不好，很值得知识分子警惕。乾隆时有一部《二臣传》讲的是东林党的事。苏斯洛夫、米丁、尤金是“二臣”，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后来跟着赫鲁晓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禄熏心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为他奔走。（林总插话：宁可叫修正主义杀掉头，也要千古流芳）。局限性，是从欧洲的情况出发的，没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生讲话

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这半年期间，罗被揭露出来以后又提出了彭、陆、杨。没有上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学习。

在这个期间我听到主席七次指示。

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讲到《海瑞罢官》问题要害是罢官。是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有联系的，提出文化学术界必须从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场说，作了调查，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彭真出来后造谣说：主席说了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

（二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纲，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纲，拿到常委会上，匆匆忙忙的当场发了，叫许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认为是向主席汇报过了，也没有说明是作为文件向全党发出，欺骗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汇报，说常委已通过，欺骗主席，主席问吴晗算不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说不能算。主席没有说话。彭真就把文件改了，说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过几篇杂文，彭要整左派的风，主席说三年以后再说，主席表示很不满意。彭说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赶快发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扩大会议，主席说《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斗，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讲到严慰冰这个反革命，他们是穿的一条裤子。讲彭罗陆杨经常把主席讲的话与自己要讲的话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复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的问题，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讲到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等当过书记处的书记，是不断分化的，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讲到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卫“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党内来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斗争不斗不倒”。赞成鲁迅的意见，经本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负你，现象是看得见，本质也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的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讲彭，党内矛盾是正常现象，有矛盾就要斗争，这是辩证法。彭经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没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

“四大家族”的共同特点：（1）反对主席是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2）反对主席是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当代的顶峰、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3）完全反对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不同意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4）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贴标签。

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一百多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1）马克思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社会主义。（2）列宁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时期。（3）毛泽东思想或者是毛泽东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

从马列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来看：

哲学大大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从何而来是马列主义的精华，精神变物质，一般到具体（林彪同志插话：工人说学习主席著作要占工作

时间，这是加法，精神变了物质，这是乘法。）主席批评恩格斯的三个公式：质量互变不对，否定之否定不对，是否定了又肯定，核心是对立的统一，不能三个平列。列宁强调了对立统一，没有批判恩格斯的。斯大林搞成四条，主席否定了。概括为对立，统一，简成一分为二，是主席第一个这样讲的，大大发展了超过了马列主义，用矛盾论解决党内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的解决也是矛盾论的运用，工农兵学习哲学把学习推向新阶段是一件大事。

政治经济学。彭说有资本论就够了，还能再提高？这是不承认主席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正在写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主席一开始就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主席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两个中间地带。十大关系的理论，也叫十大矛盾，又是经济学，又是哲学。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政治挂帅，自力更生，群众路线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的典范，经验丰富的很。

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有独特的创造。革命的一切问题是政权问题，枪杆子出政权，这是最高的概括，是万古长青的，赞成还是反对这句话是革命派是与反革命派的分水岭。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说有阶级斗争，但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初期。斯大林也说有，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有，到一九三六年只有因素，一九三六年以后就没有了，到快死了又说有阶级斗争。主席认为阶级斗争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领域中。一九五七年主席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前人没有回答的问题，主席作了回答。三月二十八日同日本人讲话又发挥了。他说即使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打倒了，各个国家都成了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建立共产主义还很难讲。因为资本主义还要复辟。要经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从上述来看，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呢？怎么能说不是顶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呢？

主席对农民问题发挥的很多，懂不懂农民问题，是能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是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政权的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的理论是个大发展，这是能不能取得政权的问题。

人民军队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中所没有的，主席创造了与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是伟大的创举，农村包围城市有世界意义，有普遍意义。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是发展马列主义很重要的部分。军事问题恩格斯有著作，是唯武器论，没有人民战争思想。列宁死的早，没有讲。斯大林有，但说的不清楚。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是很重要的。（伯达同志插话，对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要有批判态度，马克思说，英国可以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英国没有地主官僚制度，没有军国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具体情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当时是正确的。这和他理论本身就是矛盾的。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批判过，说不能和平过渡了。）

英国有一教授来中国几次，他说：“主席大大超过了马列主义，提出了四个来源，加上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国辩证法从来没有中断过，（总理插话：中国武装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的哲学与打倒是分不开的。）称赞工农兵学哲学。他对京剧改革很感兴趣，他说到希腊去宣传。改革他的戏剧。

这十年主席是反修旗手，反修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党和党的建设理论大大发展了，把党的建设与马克思的世界纲领结合起来。主席揭示党内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办法，没有矛盾就没有斗争，党的生命就要停止，这是深刻的。把矛盾的普遍规律运用到论党和党的建设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把党性提高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主席第一位提出来的，理论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解决党内问题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席插话：在马列主义中没有说过。）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可以保证永不变色，超过了联共党史结束语，也超过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斗争。十中全会主席说：有人利用小说反党，传播舆论，这是他们的一个大发明。学校的历史系不出历史，文学系不出文学，哲学系不出哲学，要重新写。我们要站在孙悟空这方面，支持左派，现在好像孙中山与康有为（保皇党）的斗争，要建立起左派的优势。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1979. 02. 17；中发〔1979〕13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提出有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彭真同志当即请求中央审查。中央决定就此问题进行审查，但没有查出事实根据。林彪、“四人帮”一伙随又强加给彭真同志以“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以后转入审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中的一些问题。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作出结论，定彭真同志为叛徒、反党分子，报到中央，中央没有审批。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是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彭真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彭真同志已作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中央决定，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6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事情发生在 5 月 8 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5 月 14 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5 月 8 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

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 1500 卷书，1400 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

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是最好的形式，是武器，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影响是长期的事情。

文化领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要 5 年到 10 年时间。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不行了，你们再接着来。我们要进行一场尖锐复杂但也是很细致的阶级斗争，这要有坚强的领导。最高司令就是毛主席，最高司令就是党中央。因为这场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一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打歼灭战。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全国北京都展开了斗争。这场斗争涉及到若干方面，报刊有点名的，还有没有点名、没有拿出来的。究竟要发多少炮弹都是有计划的，都要纵深发展。下一步如何发展将来就会知道了。北京的群众都动起来了，听说北大也动起来了。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领导好，指挥好。报上点名的是有个计划的。现在已经发表了几篇号召。就按这个行动将来还会发展。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的进行。北大也要组织好，炮火猛烈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党委要把这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

这不是束缚大家手脚。报上登出来了嘛，还束缚什么？哪些地方搞得不好可以提出批评，可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报告。（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都可以）人

家动的笔杆子，是思想文化的斗争。现在解放军还用不上。要在这方面组织领导。最近北京市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去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主席说：群众来了就提提，但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讨，外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向主席请示一下。主席说“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我们要动员群众，通过开座谈会，分析批判，写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到北京日报社去抗议不要太多。大会声讨但要组织好，不要出洋相，也可以适当延期，说明不开就不开，这些会要开就开，但开会声讨不是最好的形式。敌人（帝修反）会抓住我们的小辫子。我们不怕，我们辫子粗，抓也不要抓。但最好小辫子也不让他们抓。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如果讲不通可以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提。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作出两项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 (一) 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 (二) 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同志组成，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 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今天我们将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周信礼同志的文章《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并在第二版上发表了黄丑和等同志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文章。这些文章，充满了对毛主席著作无比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严正地驳斥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反对工农兵群众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的种种谬论。《文汇报》的编者说得很对：“凡是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不管他是多大的‘权威’，我们都要有勇气批判它，打倒它。”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牛鬼蛇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对待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还是抵制，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热爱还是敌视，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我军是在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和亲手抚养下，在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无限热爱和永远忠实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无限热爱和永远忠实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什么牛鬼蛇神，都不在我们话下。任何资产阶级“权威”，都不在我们眼里。他们越是拼命地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越是证明我们学得对，做得对。他们越是无耻地污蔑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就越是证明我们学得好，用得好。我们抓住突出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反对美帝侵略、搞好战备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只不过是更加暴露了它们反革命的丑恶面目罢了。

我们一定要遵照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要和全国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推向新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强大武器，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戳穿资产阶级“权威”的画皮。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它斗到底，拼到底！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

常委决定，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及其它各报的人，来开个会。讲什么事？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撑不起来了。党中央和国家的机关报、通讯社、广播电台近两个月不像样子了，读者意见很多，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也在揣测出了什么事。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方面没领起头，实际上是解放军报，某种意义上，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领导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上，文化革命兴无灭资不是一点儿没有，可是没有把旗帜打起来。

过去在文化战线宣传上，人民日报常受主席批评，“门市”东西多，人来人往，红白喜事登得多，文化革命方面东西少。国内其它方面也有缺点，还是有成绩的。书记处对报纸也没多管。康老管国际宣传方面，成绩很大。（康老：我管得也很少，只是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些反修文章）。主席对人民日报还是寄以希望的。

文化大革命很多问题出来后，人民日报并不是不知消息，本应领导起来搞，找全国能写的写，谁不给写？主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转载姚文元文章不及时，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又把重要的东西勾掉，现在，版面撑不起来，靠东凑西凑。有的东西必须转载，大量的不一定要转载，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编些，人民群众中来的稿件也多得很嘛。要有些特色，有些自己的东西嘛。大量的都是这样那样转载的东西，并不必要。

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在文化革命方面，一被动下来，始终未取得主动。四月就该转变。从你们大字报看，四月十五日以前，比其它报早知道“二月提纲”有错误，你们四月就可有争取主动的机会却没有争取主动。四月初彭真的性质已经明朗了，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了三个版材料后，中央通知不要转发，四月下半月，有了中央的通知，人民日报应争取主动。这机会丧失了。到五月上、中旬，十号左右还可争取主动。出现了什么局面，中央机关报不带头，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带头。群众对人民日报意见那么多，报纸这个环节没抓好，通讯社发稿，电台播音稿也发生了困难。

一天出六大版，抄别人的，自己东西有一点。中央党报，国际时事这么多……。至少应说，被动、挨打是自己招来的。怎么办？主席早说了，五月十二日在电话上告诉的：“内攻外帮”。主席考虑，人民日报不在报上作公开的自我批评，因

为世界人民不理解。要帮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早先两次机会失去了，这次还来得及。如果人民日报的同志这时转变过来，也比较好。可是，又半个多月了，还是转变不过来。看到群众来信批评，上边……大字报，就不行了。初步认识了错误、责任，可是不能挺起腰杆来。

不了解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变成这个现状，人民看不顺眼，国际上也有反映。北京日报出了问题，根子在那里？好回答，可以告诉读者在北京市委，写“过去市委”就交待了。人民日报呢？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样子，是不是中央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同志未觉悟到这一点，未觉悟到处在什么地位。

自己惶惶无主，考虑个人得失，感到某些刺激，就不顾工作了，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一样。

过去几个关，能争取主动，未争，自己不认识自己报纸的性质不同于其它报，是代表中央发言的，要意识到这个。出了问题，反映出国家政策、中央领导有了问题。

首先人民日报改变了不了局面，争不得主动，中央同志也着急，总理讲得很气愤。北京日报出问题在于市委。人民日报，把自己放在同北京日报一样的地位了。看版面吧，和北京日报一样，哪里出了问题？中央出了问题？彭真四月初就没管事了。过去他插过手，这两月账算不到彭真身上吧？

这样拖下去不行了。常委决定：还是帮，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改变群众观感，在于改变版面、内容。

北京、上海各报，要帮人民日报，这也是党性问题。不要抢东西，将好东西让人民（日报）先发，自己转，红旗也要让人民（日报）。

在文化革命，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宣传不力。

国际、国内经济生活，在原班人马可以搞好，主要是领导人精神恍惚、瘫痪，挺起腰杆来，有错误就改嘛！工作组来了，不是更没主动，而是更要争取主动。常委指出：第一改变报纸面貌；第二检查错误。瘫痪、半瘫痪、四分之一瘫痪都不好，新华社一样，广播台一样。对你们三个单位交待清楚，第三做好工作，被

动挨打的局面要改变过来，靠三个机关的同志自己努力，又是个机会，改正错误的机会。也会有人不安心，大字报要贴，让他贴，但不要到处贴，乱轰轰的，可以贴在一个房子里。

多数同志第一抓业务，业务转过来以后，检查思想来得及的。各有各的账，错误性质不同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同志不要自己解除武装，自己能写也不写了，怎么能成？笔杆子一大堆，主要看编委会抱什么态度，对待工作组的领导，如何争取主动，批评自我批评，也可以做，实在不成，放一放也可以。

第一要把工作做好，多数同志转到工作上；第二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系统检查检查，等报纸面貌改观了再说。大字报还可以继续贴，系统的检查下一步搞。

大家帮，顶多一个星期就可以改变过来了。中央也要象个中央嘛！这状态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台都是中央的，大家都要理解自己应做什么工作，以后永远要理解到。其它报刊不要抢。这是党性问题。要从党性、全国、国际反帝反修的利益出发，要把报社台撑起来搞好。开工！

好机会，挺起腰杆子！

第一抓业务！大字报可以继续出，精神状态要改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

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十六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

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佩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

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今天我国正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伟大变革的新时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处于触到人们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

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必然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问题突出出来。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到人们脑子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

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敌对世界观的斗争，正如两军对战，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却硬要把我们拉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泥坑里去，挖我们的社会主义墙脚。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在毛

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只有坚决同他们斗争，把资产阶级的妖风彻底压倒下去，才能使大家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那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会有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毛主席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天天企图影响我们，腐蚀我们。当前这场斗争，完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的，而且他们是准备、并进行多年了。我们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

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要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搞理论，搞学术，搞文艺等等，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然也还在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搞理论，搞学术，搞文艺等等，在文化战线上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不要认为打笔墨官司，无关大局。匈牙利事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一批修正主义文人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他们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前奏。

因此，当前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是从思想上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斗争，是从思想上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只能胜利，一定要胜利，也一定能胜利。

我们应该重视思想的作用，重视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我们必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正义事业，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国人民要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这一切影响下解放出来，这就将发生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加强共产主义的自觉性，有意识地发展共产主义思想，要作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张贴第一张大字报：

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 1966 年 6 月 2 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祝第七届“上海之春”胜利闭幕》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下，正进入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胜利闭幕了。这一届“上海之春”，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力量，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磅礴气势，发挥了工农兵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

第七届“上海之春”的最大特点，就是它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届音乐会演出的二百多个节目，洋溢着昂扬的革命精神，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气息。在全部节目里，都贯穿着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线：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它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又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颂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参加第七届“上海之春”演出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大唱“对台戏”。牛鬼蛇神疯狂地攻击共产党和毛主席，“上海之春”则尽情地歌颂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牛鬼蛇神竭力诽谤社会主义，“上海之春”则热烈赞美社会主义；牛鬼蛇神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艺术舞台，排斥工农兵英雄形象，“上海之春”则尽情地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牛鬼蛇神宣扬什么“离经叛道”，“上海之春”则热情地宣传和歌颂毛泽东思想之“经”、人民革命战争之“道”。“上海之春”的演出者们说得好：我们的每一句歌声，每一个舞步，都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的子弹！第七届“上海之春”的举行，是革命人民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一次大反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届“上海之春”，正是遵循毛主席这

一教导而举行的。人们可以看到，工农兵群众登上了音乐舞蹈的艺术舞台，参加了创作、演出和评论等一系列活动。在开幕演出的节目中，大部分是工农兵群众自己创作的作品。许多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向资产阶级音乐舞蹈“权威”、“专家”提出了强有力地挑战。这个事实，决不止是说明工农兵会唱几首歌，会跳几个舞，而是说明一个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这标志着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大主力军，是文化的主人。与此同时，上海的音乐舞蹈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一道积极参加了这届“上海之春”，他们演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英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节目；并且把节目送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演出，受到工农兵热烈欢迎。这是他们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工农兵以后取得的成果。他们的经验证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努力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真正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才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上海是一个拥有百万产业工人的城市，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上海的革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全国起了先锋的作用。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得全国各地学习的。

第七届“上海之春”，不仅放射出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而且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蓬勃的革命形势。目前，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南京大学大学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六月一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

有一位工人写信给南大党委，对该校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出批评，指出这本书竭力吹捧“三十年代”文艺传统，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

南大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了这封信，由匡亚明亲自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按语”。这个按语，有意混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要学生“投入学术大批判运动”，根本不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按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通过运动要“初步拟定今后教学计划，为下半年教学作好准备”，企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到邪路上去。按语故意把水搞浑，要“在全校开展一次群众性‘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运动”，转移斗争目标，打击左派。这个按语还左一个“无意识”，右一个“客观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打掩护。

二日下午，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写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对分校政治处提出责问：是否愿意彻底革命？

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和苏寿祁等八人，联名写了一张《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义正词严，向匡亚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言行提出了责问。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下午和晚上，匡亚明在分校连续召开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挟持党组织，欺骗党员，先把自己说成是“绝对正确”，然后别有用心地诬蔑批评他的人是“不怀好意”，布置立即组织“反击”，煽动大家“不能手软”，对革命师生进行恶毒的诬蔑、谩骂和恐吓，把革命师生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

六月三日，匡亚明继续在上午他召集的党总支扩大会上，命令进一步“跟踪追击”，用大大小小的所谓“讨论会”（按：即斗争会）进行反扑，打击革命派。为了做出样子，匡亚明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参加所谓“讨论会”，破口大骂革命师生。在外语系，他诬蔑写大字报的学生是“反动派”，他甚至谩骂有的学生连“反动派”都不如。并且一再在群众面前，给那些革命积极分子戴上各种无中生有的“帽子”，强迫他们“检讨”，还下命令要一律取消那些写大字报的预备

党员的资格。这些暴行，完全暴露了匡亚明这个资产阶级保皇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刻骨仇恨。

在匡亚明的策划和组织下，从二日到五日为止的短短四天内，在溧阳分校的五百多师生员工中，被斗的共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他们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其中有一些是革命烈士的子女。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个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四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标兵，也被斗了。有的被反诬是“小三家村”，有的被说成是“黑帮”，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有的甚至遭受到人身侮辱。三日下午匡亚明回到南京后，竟然趾高气扬，叫嚷“反击”形势大好，命令溧阳分校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并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大肆吹嘘他在溧阳分校的“经验”，颠倒黑白地说是“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匡亚明为了压制常委会内部的不同意见，还强调“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分清敌我”，妄图继续打击革命师生，破坏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北京市文化革命的形势、方针：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党中央指导下，发展很快。首先是北京市党员、团员、大专学生彻底揭露“三家村”，党团员很快投入战斗。各个学校开批判会、贴大字报、到北京日报社示威，轰轰烈烈发展很好。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除“三家村”继续批判外，又开辟了新的方面。六月一日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大专学生首先响应。“一二·九”是在北京搞的，北京青年具有革命传统，形势发展很迅速。公布以后，其它大专学校予以声援，写了大字报，送了信，派了很多人去，很快的起来了。中小学也起来了。五十所大专院校，几百个中学的学生，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工厂写大字报、写信，有的工厂停了工进行声讨。发电厂几百个人也在酝酿停工，搞大革命进行声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发电厂一停工我们就开不成会了，我们自己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我们不能乱，我们要革敌人的命。因此，我们要作解释，组织工作组，派人到有些工厂，宣传解释，帮助工作。我们的形势表现的很好。学生要认真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

的好学生。广大群众一下子起来了，至于方式方法不当，领导来不及作报告，方式方法不当，这也不算什么，还没来得及讲，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一下子起来了，原来北京市委掌握着印把子，我们不能听他的了。这证明我们对党中央的拥护，对毛主席的热爱。市委决定要打破常规，站到运动前面领导运动，口号是：一切为着前线。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市委如此，各级领导也如此，北京市委领导出了问题，北京市一定会埋伏一小撮人，总会有的，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揭露。在革命中，反革命也在活动，运动中也发现了反革命破坏的迹象，他们混水摸鱼，打着“红旗”反红旗，实际上是反动，但只是一小撮很少数。我们要打胜仗，不能因为他们人数少而麻痹，必须和他们斗，他们动笔我们也动笔，他们动枪我们也动枪。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是好的，我们要相信，很多干部都是经党多年教育，在群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的左派，不要束手束脚，东张西望，更不能躺倒，要站起来，站到前面。团是助手，当然也要站在前面。有错误的怎么办？而且也许是黑帮，绝大多数是好的。就是有很多错误，同志们也要站出来革命，起来和自己的错误决裂。他们盗窃领导权，发出指示性文件，要各单位执行，过去没有被揭露，所以一直都是哑巴吃黄连，不能往上追。现在能讲明白了，责任属于他们。第二条自己有错误各人认各人的账，你检讨得好就会信任你，自己也要敢起来讲，和黑帮有关系的，要起义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划清界限。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聂元梓揭露，确实有这个问题，他不但不改，继续活动。有人现在还活动。我在北大讲一次，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这就是阶级斗争。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反面的东西贴它一年，对大家是个教育。有人受了蒙蔽，听风就是雨。这些人是可以原谅，还有一种糊涂虫、或是坏分子。今天以前还有人活动，今天再宣布一次，要停止活动。有错也可以站出来，你们要好好检讨，可以减轻错误。有问题如果来不及，先讲几条，现在我们首先要革命，过几天再讲，要站在运动前面领导，发动群众，还要很好掌握政策，也得划几个杠杠，不算什么框框，正确掌握党的政策，一杆子插到底，政策和群众见面。今天以前，群众还在抗议市委，今天四点钟一宣布新的北京市委，马上就在操场欢呼，拥护北京市委的改组。一个革命者怕群众那还得，一下子人家不了解你，把你包围了，受点委屈，也没有什么，有一个学校，对我们派去的工作组也不信任，工作组一去就被包围了，

问，什么人？答：市委来的。问：哪个市委？新市委，旧市委？答：新的！问：有介绍信吗？答：没有，我们去拿。质问：你想逃跑。后来打电话给华北局，证明是新市委工作组的，马上鼓掌，拥护他们，把他们拥上台讲话，不打不相识嘛！打了才知道是一家人，委屈了一天，饭也没吃上，受了委屈，为革命嘛，没什么，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要束手束脚。政策赶快给群众见面。你不领导有人领导，革命者不领导，右派就要领导，我们也派了一些工作队下去，但不能下去那么很多，主要还是靠党委领导。我们才带来几个人，几个秘书，几个做饭的，几个司机，五个书记，加到一块也就那么几个人嘛。所有的同志要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说叫坚守岗位，蒋介石也坚守岗位，我们也坚守岗位。革命也讲，反革命也讲，要保护群众积极性，不要在群众中批评，不要泼冷水。北大的万人大会，我说不开，你们要开，那就开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字报内外有别嘛！中央有指示，只是换个地方，你要贴在饭厅门口，我说你贴到里面，如果你硬要贴，也可以，不过外国人知道了，照两张照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照两张照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垮不了台。已经贴了的，自己愿意揭掉，我们欢迎，或者，再另写一张贴在上面。有的同志在下面做坏事进行造谣，好样的站出来，辩嘛！没有真理才造谣，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掌握政策，划清界限！

二、 中央几条指示：

1. 大字报可以出，可以贴

主席向来主张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很好的武器，学校可以出。（1）不要往街上贴，我们大字报是同志们看的嘛！贴到街上，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很多，帝、修、反去照象。（2）有外国留学生的学校要内外有别。留学生中帝、修、反都有，放在屋子里就是不让他们看，就这么一点，没有别的限制。（3）内容原则上不限制，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也可以辩论，揭露批判有一些可以劝说，政治斗争可以写，私生活（男女关系）不要写上去，容易引上邪路，影响团结。

2. 各种会议可以开：（1）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声讨会、代表会都可以开。（2）班、系、团员大会都可以开，只要地方允许就可以。最好在校内开，分散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在有外国人的地方开。

3. 不要上街，不要包围住宅。我们上街队伍浩浩荡荡，帝、修、反就会造谣，他们写个报导，说我们反对政府，当然也会照象啦。这样有些坏人，三个游鱼，脸上也没刻字，混进去就更危险。这场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家村”黑店，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但人数只有那么一小撮，而我们的人上街他们就会说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欲坠了。我们是革命的，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应听毛主席的话。现在还不需要上街，如果需要党委会出来领导的，需要了还有民兵嘛！还有解放军嘛！这不怪同学，我们没讲清。现在美、法、苏修及东欧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大使馆，整天在我们国家搞情报。也不要包围什么人，有人到吴晗家，上了房了，一共三起，也有一些无组织的群众，他们把吴晗拉到胡同里斗起来，打死了就麻烦了。昨天晚上又包围了陆平的房子，结果给弄了出来，推了一阵，斗了一顿，我们主要是政治上把他们斗臭、斗倒，最后还是要改做新人。“五四”时，打卖国贼，因那时我们还没有政权。

4. 声援北大，最好写大字报、写信，硬是要去是否派几个人就可以了。昨天去的人很多，客人上去就干，主人也不好开展工作，如果这样下去，北大的工作就要搞乱了。从主观愿望上来看是好的，但客观效果不好。

5. 国内国外要区分。

6. 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大家都提高，不是怕他们，万一出现了，有点破坏也没啥了不起，也不要过分紧张，“三家村”黑帮想要混水摸鱼，我们现在要瓮中捉鳖。

7. 斗争靠群众，大字报、开会都是讲道理，不要一听是讲道理，就又回到了课堂。不准打人，不准侮辱人，在四清中对农民讲清不准打人，他们也会认清的，打错了道歉；但不好，一个阶级内就不要打架，这样容易被坏人利用。

8. 防止把斗争引到邪路上去。这场斗争是严肃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是要害、是政权，有人要夺取政权搞政变，要搞赫鲁晓夫没搞成。吴晗的罢官就是替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海瑞上疏”特意安排了金殿骂皇帝一场，这是历史上根本没有的，这些是他们趁我们三年困难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经济好转，老子可以稳稳当当地瓮中捉鳖，防止转移目标，走到邪路上去。

下面着重补充一点：《北京日报》挨打挨了几个月，问题主要出在《北京晚报》和《前线》，而《北京日报》后期起了包庇作用。《北京日报》已改组了，

新的编委由《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和《山西日报》总编辑组成，这两家报是办得比较好的，是我们的机关报了。他们的责任我们不负。我们要清算（原文如此）他们，大家不要再追了，再追就追到我们头上了。新的市委欢迎批评，包括今天的讲话，有意见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不过我今天是宣布中央指示，按这个精神办是不会错的。有人递个纸条问：有些人象右派一样向党进攻，怎么办？我们要采取什么态度，答：你可以把他揭出来，他暴露了，这是好事，和老虎在一起睡觉是可怕的，但你知道你身边是老虎就用不着怕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的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革命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反动的唯心史观，即历史唯心主义，是根本敌对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能改变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帝王将相的恩赐决定一切。这两个根本敌对的历史观，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一切反动派，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倒转。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死抱着历史唯心主义不放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一批一批地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盘踞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支持这些“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这样地把自己摆在同人民敌对的地位。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同志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同志还作了这样的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史学界的资产阶级“权威”，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论断的。他们顽固地否认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地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他们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煞。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

这些史学界的“保皇党”，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重新改写全部历史。这一场伟大的史学革命，引起了史学界“保皇党”的无比仇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他们竭力抗拒和破坏这个革命。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种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的。这些“保皇党”，就是保护旧制度，保护守旧派，保护旧思想，也就是保护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思想阵地。有一批人，还借历史上的僵尸，直接地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史学界里的两军对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

在我们这个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最新最高的发展。他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必须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

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在史学领域里当然也是这样。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史学领域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史学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一放松，就被资产阶级占领。在这里，不是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就是用唯心史观解释历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在史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这条定律，对于国内的阶级敌人，是完全适用的。地、富、反、坏、右，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三家村”之流的黑帮，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史学界里的反共知识分子，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一场兴无灭资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

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象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的“东霸天”、“西霸天”。

这些“权威”们，把史学领域当作他们独霸的地盘。别人发表文章批评他们，他们竟然公开叫嚷，这是“侵略历史”。我们告诉这班老爷们，对于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我们就是要把被你们篡夺了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重新夺回来，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史学阵地，彻底摧毁，一定要把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史学体系，彻底打垮。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战士，手里有了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当代最新最高的、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能取得伟大的新胜利，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在史学阵地上。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本报今天发表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新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第二书记。一条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了工作组，到该校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这两条消息，在昨天下午四时广播以后，立即得到了北京市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各机关、院校、群众团体和驻军的热烈拥护。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致认为，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决定，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反革命集团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北京市的党、政机关许多部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执行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而是执行修正主义的路线；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北京市委，在教育方面，也是推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北京大学就是它们控制下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正如北京大学广大学生所揭发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坚决按照党中央

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北京市地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党中央的。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一旦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就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反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战斗。

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象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首都各院校的积极支持，大壮无产阶级的革命声威。“保皇党”吓破了胆，他们已经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北京大学的广大学生、职工、教员，在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领导下，正在对陆平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坚决的清算和斗争。

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看样子很凶。在他们的控制和封锁下，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但是，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群众起来之后，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就很快被揭穿了。他们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的国家是一片大好形势。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我们坚信，在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前北京市委的错误路线和它的影响，一定能够被彻底肃清。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广大工

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这是一场严重的、尖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争，革命同反革命之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这个斗争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不仅要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我们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必须遵循的正确路线和指导方针。

混进我们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把严重的政治斗争，硬说成是什么“纯学术的问题”，是什么“不同意见的讨论”，打出了一面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相对抗。他们疯狂地叫嚷什么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叫嚷什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斗争要“谨慎”，要“慎重”，不要“揪住不放”等等，等等。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欺骗群众，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就是要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就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把无产阶级的天下搞乱，以便时机一到，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这些家伙是犯错误的专家。你们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你们对工农兵的觉悟和力量的估计完全错了。你们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的估计也完全错了。你们妄想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来掩护你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办不到的。你们妄想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作为保护伞，来掩护你们退却，也是办不到的。你们妄想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同你们这一伙牛鬼蛇神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让你们来专我们的政，更是绝对办不到的。你们这些家伙，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们这些狼不要以为一披上羊皮，就可以迷惑什么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眼睛雪亮。我们已经把你们的反革命黑幕揭开了，把你们的魔爪抓住了。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伪装层层剥光，把你们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口口声声要“自由”，强调所谓“放”，实际上是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党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你们的“放”，是适应你们本阶级的需要，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党的方针不是要‘放’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打出的一个幌子。是的，我们坚定不移的采取放的方针。毛主席说：“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毛主席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特别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的放，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是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的。你们的所谓“放”，是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只许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专家”、“学者”放毒，不许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进行反击。一句话，你们是借“放”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1)(2))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多年来，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放手让牛鬼蛇神出笼，配合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一直在大肆放毒，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你们的毒草，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

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什么人批准。可是，当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反击战的时候，你们对工农兵群众，对无产阶级左派，采取的又是什么态度呢？凡是批判毒草的东西，你们都扣下来，有的一压好几年。你们左一条清规，右一条戒律，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吓唬工农兵。你们吹捧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不准工农兵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权威”，不准工农兵起来闹革命。

可见，你们所要的“自由”，不是别的，你们要的是开设“三家村”黑店的自由。是散布“燕山黑话”的自由。是大演《谢瑶环》、《李慧娘》、《海瑞罢官》、《兵临城下》等黑戏黑电影的自由。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鼓励他们卷土重来的自由。是对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泼冷水、打棍子的自由。是大肆宣扬腐朽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自由。你们要的“自由”，就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自由，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自由，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自由。一句话，就是要反革命的自由。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你们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决不能给你们这种自由。如果允许你们有反党的自由，反社会主义的自由，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口口声声要“平等”，说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一个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口号。

你们果真是讲平等吗？不，完全不是这样。当你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你们是何等猖狂，何等霸道。你们对那些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东西，奉若神明，视为至宝，大登特登，大讲特讲，大演特演，大捧特捧。你们对工农兵的东西，甚至象那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却看得一钱不值，公然污

蔑为“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的典型，一棒子打入冷宫。这难道算是平等吗？你们放了那么多毒，我们刚一反击，你们又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竟然给无产阶级左派戴上一顶“学阀”的帽子，污蔑我们的反击是什么“武断”，什么“以势压人”。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要负隅顽抗，拒绝批判，打击无产阶级左派，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这难道也算是平等吗？

你们果真是讲真理吗？不。你们是在打着“真理”的幌子搞阴谋。你们采取挖心战术，从根本上抽掉了真理的阶级性。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真理和谬论，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所吹捧的“香花”，正是我们所要铲除的毒草。你们所坚持的“真理”，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谬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有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掌握真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伟大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我们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指示和最高领导，就是热爱真理，拥护真理，坚持真理。你们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穿了，就是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代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你们的一个大阴谋！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

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在你们这帮牛鬼蛇神招摇过市的黑旗上，还标着“博爱”的字样。你们“博”什么“爱”？你们是对资产阶级充满着爱，对无产阶级充满着恨。这就是你们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让我们看看，这些充满“博爱”精神的慈善家们，究竟“爱”的是什么吧！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向党猖狂进攻，要推翻党的领导，对我们党要恶狠狠地“当头一棒”、“狗血淋头”的时候，你们这些后台老板大开绿灯，大敲战鼓，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得意忘形，拍手叫好，以为你们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可是，好景不长，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幕很快就被揭穿了。当你们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的时候，你们又慌慌张张地扯起什么“博爱”的破旗，摆出一副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伪善脸孔，叫嚷什么对那些“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要容许他们“保留意见”，不要“不准革命”，不要“揪住不放”，等等。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们对你们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是多么体贴入微，爱护备至啊！可是，你们对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却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要“整”他们的“风”，要“清理”他们，恨不得把他们一口吃掉。你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多么坚定啊！你们的爱憎是多么分明啊！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这些家伙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是一丘之貉，是一路货。我们同你们之间是势不两立的，我们同你

们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们从来也没有“爱”过我们，我们也永远不会爱你们。你们对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党，对人民群众，是那么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难道我们对你们还能够讲什么“爱”吗？对待革命的敌人，我们决不搞温情主义。对你们的温情，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忍，对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残忍。我们决不能把豺狼当绵羊，把砒霜当蜜饯。我们决不上你们这些笑面虎的当。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须给你们以毁灭性的打击，把你们彻底搞臭，彻底斗垮，彻底打倒，把一切“害人虫”统统扫除干净！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世界观。这个口号，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提出到现在，已经两个世纪了。它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虽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用来维护他们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当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用这个口号来欺骗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专政。当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他们继续用这个口号麻痹劳动人民，来掩饰他们的血腥统治，巩固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不过是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在劳动人民来说，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不过是要更多更多的人受他们的剥削，受他们的奴役；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质。

当资产阶级政权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以后，他们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并且通过他们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代理人，利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反动口号，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梦想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老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扛起过“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为了反对和破坏世界人民革命，也扛起了这面反动的黑旗，并且把它载入了臭名昭著的苏共纲领。一九五六年，

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也是利用这面黑旗，煽惑群众，进行反革命叛乱的。在我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打起这面黑旗，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曾经大肆宣扬这个反动的口号，用来对抗党中央，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现在，你们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又从历史垃圾堆里拣起这个破烂货，改头换面，加以伪装，作为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帅旗，作为你们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行动纲领，作为你们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法宝。你们继承了古今中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衣钵，结党营私，招摇撞骗，来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这是枉费心机，白日作梦！你们的下场决不会比你们那些老祖宗和弟兄们更美妙一些！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剥削阶级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总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队伍在增长和扩大中也掺进了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中，也会有些人蜕化变质。加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整我们。这些都使得我国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我们决不能忽视这种危险。对国外的敌人，我们要百倍警惕，对国内的敌人，我们也不能麻痹大意。我们要重视拿枪的敌人，也不要小看不拿枪的敌人。披着羊皮的狼比普通的狼厉害，比一大群狼还厉害。打红旗的敌人比打白旗的敌人更危险。糖衣炮弹会打死人。笑面虎会吃人。我们千万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顾了业务，忘了政治。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就是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那就是马大哈，那就是糊涂人。我们一定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只能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对待革命的敌人，不能靠劝说，而要靠斗争。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

头，立在其中。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说我们是“爆破手”，是“棍子”。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爆破手”，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村黑店炸个粉碎。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把一切牛鬼蛇神打个落花流水。谁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打倒谁。不管他是哪一号的“权威”，不管他有多高的地位，都要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目前，我们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是大好形势。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党，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住了各种风浪考验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任何牛鬼蛇神，任何阴谋家和野心家，想要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堡垒，在中国重演赫鲁晓夫篡党篡军篡政的丑剧，都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都一定要身败名裂，都一定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我们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共产主义正义事业，来激发我国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全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黑帮的猖狂进攻，坚决拔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社论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

在中共中央英明地改组了北京市委之后，新的北京市委立即作出决定，成立《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编委会。我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宣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生了！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新胜利。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堕落成为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成为“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的工具。这三个报刊曾经散布大量的毒素，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蒙蔽人民群众，压

制广大读者的批评。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抗拒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妄图把这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当他们的阴谋败露之后，又在四月十六日，制造了一个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舍车保帅”的大骗局、大阴谋。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和其他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家伙的阴谋诡计，本来早有觉察和抵制。自五月八日起，当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公开揭露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全国各兄弟报刊，各地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本报大多数愿意革命的职工，以雷霆万钧之力，高屋建瓴之势，展开猛烈进攻，到处口诛笔伐，愤怒声讨，很快地就把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近两三天，在文化革命大好形势鼓舞下，北京市呈现一片欢腾景象。许多工厂、郊区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商店，纷纷集会，庆祝胜利。这就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大灭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事实再次证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面前，不管什么人，如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当新生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今天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们郑重宣告：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也当作办报的最高指示，坚决把这两个报纸办成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报，永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斗争，推动工农兵群众和广大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一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同全市和全国人民紧紧站在一起，和全国各兄弟报刊紧紧站在一起，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彻底揭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黑帮的进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激发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全党办报的方针，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一切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坚决面向工农兵，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

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办好，使它充满工农兵群众的战斗声音，永远生气勃勃。

亲爱的读者们，本市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新的胜利。但是，这还只是我们在斗争中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坚决乘胜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仍然是光荣的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满怀信心地认为，有伟大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有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监督和热情支持，我们一定能够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坚决地冲锋陷阵！

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地、永远地飘扬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个阵地上！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

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那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

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

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象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塞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

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塞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第三朝，

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

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一九五七年时大字报，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情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六·一〇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后，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撤消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开大会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对南京大学事件作了肯定地报道。

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

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

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

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

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事件延续到第二天，

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

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

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

“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部检讨、认错。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新华社发表通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

最近，在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揭发了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反动罪行。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南京十五日电 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揭发和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匡亚明的罪行，一致表示要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二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全体师生大会，动员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声讨匡亚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大批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会上，首先宣布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十二日的大会上，刚从溧阳分校赶回来的几百名师生，受到了校本部师生的热烈欢迎。分校学生胡才基、朱英才、孙家正、王晓中和教师苏寿祁，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们热烈拥护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说：我们有伟大的党的领导，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把匡亚明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揭发出来。我们不斗倒他们，决不罢休。校本部学生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我们一定要同他斗争到底。”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我们无限地热爱毛主席，无限地热爱党，我们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干一辈子革命，永远捍卫毛泽东思想，永远和一切牛鬼蛇神斗争到底。

广大师生员工通过对匡亚明的揭发和声讨，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一致表示：匡亚明虽然被揭发出来了，但匡亚明在学校散布的毒素还远远没有肃清，其他一切牛鬼蛇神还没有被揭发出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打倒！

十二日的大会是由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第二书记胡畏同志主持的，他在会上讲了话。

参加大会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南京师范学院广大师生上午听说南大要开大会，当时就写了声援南大革命师生的大字报，下午，他们派出了二百多名代表，带着大字报和声援信参加大会。南京工学院、南京林学院、华东工程学院等院校师生代表，都当场写信，一致表示拥护省委的决定，支持南大革命师生的斗争。南京师范学院的代表在信里说：“我们坚决和南大的革命师生员工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坚决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把一切抗拒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把一切牛鬼蛇神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会结束以后，各高等院校师生还纷纷写大字报、写信、打电话到南京大学和新华社，表示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支持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罢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官，夺了他们的权，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最近以来，广大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向一切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冲锋陷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匡亚明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帮，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必然要负隅顽抗，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必然要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来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盗窃党的名义，把自己所控制的许多部门，当作进行反党活动的阵地。他们利用一整套专政的工具，来对付革命的群众和无产阶级左派。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对抗。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手脚。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上几张大字报，他们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左派组织围攻，谩骂恐吓，横加罪名，进行政治陷害。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谁要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他们这样干的结果，恰恰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完全暴露了他们这些保皇党、反革命党的真面目，也就为他们的彻底垮台敲响了丧钟。

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对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积极地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正确地指导这个运动。我们一定要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左派，以工农兵为革命的主力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集中火力，集中目

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猛烈冲击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都最害怕大字报。一切革命群众，都最喜欢大字报，都把大字报当作揭露和战胜敌人的最强有力的新式武器。你贴一张，我贴一张，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都可以揭发出来，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都可以揪出来，叫他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住。我们就是要大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长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

对那些资产阶级顽固堡垒，一定要群起而攻之。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就要在报纸上点他们的名，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坚决进行改组。像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像作为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帮凶、疯狂毒害青少年的前共青团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像这些反革命顽固堡垒的头头们，不罢他们的官怎么行呢！

我们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统统打倒，把他们盘踞的一切阵地统统夺回来，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六·一七事件”

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

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后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 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 X X、朱 X X 被定为“反革命”。张 X X 被斗了两天一夜，朱 X X 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后，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

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教学生。胡启立回忆：

“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

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

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

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6.18 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化学、生物、东语、西语、中文无线电等系发生批斗校系干部、教师四十余人，出现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打人的所谓“六·一八”事件。

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制止。当晚，张承先在全校大会上说：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经被坏人利用。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

当天，北大工作组发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十一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十七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十七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王焕同志反映，在三十斋有七个未带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

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了，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陈应复（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窜，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耍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刘佳宾，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偷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还有个名叫修治才的人，是个被开除的北大附中学生，今天拿一个一九六〇年的出入证，混入校内，到处起哄。在张承先同志讲话之后，他还在人群中高喊：“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法！”

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在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斗乱打。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调干生）杨文良，在围攻聂元梓等大字报时是个急先锋，今天捣乱又最厉害，很多同志讲应该说理斗争不要打人，他则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行”。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下午一时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形势，指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旗，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强革命警惕性。

(二) 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同时还强调工作队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支持革命群众把北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三) 今晚十时又召开了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同志讲话，主要表示工作组要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作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指出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号召大家务必擦亮眼镜，不要上敌人的当。并组织全体讨论。

(四) 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依靠革命的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喊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聂元梓认为 6 月 18 日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然后，工作组出面，把“6.18 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校园里对参加了当天的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参加“6.18”事件的学生和职工们的自发行动肯定是偏激、过火的，但是，为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准备进行严厉的处理，那就更是以错对错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处理这一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 6 月 8 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

6 月 18 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 月 18 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

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

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写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

6 月 19 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

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我们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这个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

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一下子就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露出了真面貌。

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就是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从各种矛盾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革命的大字报，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来议论，大家来鉴别，大家来批判。这对于教育群众，特别是提高青年一代的无产阶级觉悟，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革命的大字报，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长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大灭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的威风。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

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

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岗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报。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派。对他们这种做法，我们并不怕。他们跳出来当反面教员，正好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有利于辨别大是大非，这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吗！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我们充分信任群众，完全相信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所以我们提倡群众写大字报，以利于我们对敌斗争，以利于我们改进工作，以利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更健康地、大踏步地前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地质学院“六·二〇”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到地院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

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薄一波给地质学院反工作组的学生写信说：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组不可，那势必夺工作组之权，亦即夺党之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〇”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高树奎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廿二日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检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林学院“六·二〇”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

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

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XX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 24 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 10211 名学生打成“右派”，把 2591 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师大一附中“六·二〇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

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

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

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

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6 月 7 日，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盖子以后，到 6 月 9 日仅仅两天，广大革命师生被揭破了 XX 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阴谋，把 XX、XXX、XXX 等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了出来，把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但是自 6 月 9 日工作组来了以后，我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无产阶级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倍受压抑。XX 之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现在斗争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 月 17 日以勾 XX 为首的新工作组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变这种不能容忍

的现象，反而变本加厉，充分地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勾 XX 之流是我们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盗窃党的名义，利用工作组的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勾 XX 之流就刮阴风、造谣言、煽风点火、挑拨分裂，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

在勾 XX 这些反党黑帮操纵之下，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倍受打击，XX 之流却在工作组的百般庇护之下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定的依靠革命左派，围绕一切革命群众，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而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像对待敌人一样“审问”、“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选对斗争目标，放手发动群众，而是在他们制造的内部纠纷达到高潮的时候，突如其来地胡说什么“对象已经选对，群众基本发动，问题已经揭露”，勒令要在两天之内斗争 XX，三次斗争会便作定案，然后，将运动的中心引到清除革命同志的“修正主义影响”。他们的斗争对象是谁？是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

群众是已经发动起来了吗？绝对不是！

问题已经揭露了吗？根本没有！

勾 XX 之流是反革命黑帮庇护者，阴谋避开武装颠覆、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这些根本的政治问题，急急忙忙给作出定论，让 XX 轻而易举地溜之大吉，和他们主子一样玩弄一场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掩护的大阴谋。这绝对办不到！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立场坚定，眼睛雪亮。当我们认清了这个大阴谋之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无比惊恐，无比仇恨，他们给我们扣上“保皇派”、“右派”、“牛鬼蛇神”、“反革命”等大帽子，咬牙切齿地声称：要开全校大会，审问我们，斗争我们。

好一个“革命的工作组”！你们对 XX 之流温柔亲切，那样百般庇护，那样爱护倍至。可是斗争起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面孔却板得这样凶，调门却喊得这样高，牙齿却露得这样长。你们和谁穿一条裤子，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先生们，你们的美梦做得太早了，你们妄想偷天换日，瞒天过海，难道骗得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吗？XX 反革命集团的家伙

们，你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们妄想利用勾 XX 之流的掩护，溜之大吉，重整纪纲，这完全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我们把勾 XX 之流钻进我们肝脏的毒蛇彻底砸烂，正是为了把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统统斗倒、斗垮、斗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们，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全校的无产阶级左派和一切革命的同志赶快擦亮眼睛，辨明真假，把勾 XX 这些钻进我们肝脏的毒蛇揪出来，砸个稀巴烂！

毛主席教导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不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连根铲除，誓不罢休！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北师大附一中的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刘少奇说：

现在左派在争取群众，右派也在争取群众，中间派摇摆于两派之间。因此左派如何争取群众争取多数是个大问题。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取多数群众。没有多数，就不能战斗，少数人作战就不能胜利，少数人战斗一定要失败的。

现在不能斗刘超（党支部书记、校长），内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斗，中间是要出事的。

高一、高二的同学不能骄傲。高一高二参加工作组的人多（注：高一三人，高二两人），现在高三没有人，现在你们受到信任人家不服气，不服气是有道理的。他们比你们高，被高一领导有意见，怕丢面子，要理解人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们是高三，他们是高一，他们领导你们，你们也不服气嘛。高一、高二的人不要骄傲，不骄傲才能使他们服气。工作队可以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没有高三的人？因为你们当时选不出来人嘛，等以后选出来人再抽调。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你们开一千多人大会，有把握没有？要充分分析学校的形势。到底是什么形势，以后怎么办？要研究这个问题。

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出现了你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工作组长），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你去了三天，和他们无缘无故，怎么知道是好人坏人呢？这是他们的态度。要贴还让他们贴。为什么要斗你呢？是因为你靠近左派，要好好看一看，现在多数不同意他们了。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群众内部还不一致，所以斗争刘超是不是太早了。斗争刘超这是阶级斗争。他是阶级代表人物嘛。权已经夺了。工作组来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他还有什么权，问题是如何斗倒斗臭。斗这些人，是阶级斗争。你们没有参加过，如何斗法不知道，只是要斗，但不知道怎么斗。和我们革命初期是一样的。

阶级斗争怎么斗法？和打仗一样，要有战略战术。

打仗就要组织队伍，队伍组织好了没有？现在中间派，可以跟你们走，也可以跟他们走。中间派很容易被右派争取去，不是紧紧围绕在左派的周围。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争取中间派，戴高帽子，中间派不是也去了吗？队伍没组织好，打仗没队伍怎么行？打仗没队伍不行，队伍要组织好。一个团就是一个团，一个营就是一个营，说冲锋就会冲锋。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往前冲往后冲你们没有把握。这样的队伍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呢？队伍要有训练，没有训练，往左往右冲锋陷阵都不晓得，那也不能打胜仗。其次，队伍组织好了，绝大多数跟着左派走了，队伍训练好了，队伍要有枪。没有枪，棍子也要拿一根。（棍子）枪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二十三条”，就是《人民日报》社论。子弹就是材料，要掌握材料。

队伍组织好了，也训练了，武器有了，子弹也有了，再开始作战，就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争取胜仗打得多。只要胜仗打得多，打三仗胜两仗，领导就可以站得住。打三仗两次败一次胜领导就要站不住了。打败仗是不可避免的，但总要胜仗打得多，打胜仗多士气就越来越高。打仗不胜不败相持一下，相持一下怎么办？准备工作本身就是斗争。

可以讨论这张大字报（注：给工作组长贴的）开班会，工作组派人听，各班派代表，讨论这张大字报对不对，你们赞成不赞成，什么性质。这本身是组织队伍，统一学生思想的，这张大字报一煽起来队伍就不太整齐，这是组织队伍统一组织。这会有人跟他走的。讨论就有斗争，这就是组织队伍。

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

开讨论会他不来。你不开会，工作组决定一定让它开，我们召集嘛。看你来不来，不来更好，不来就分化了。不来，就作一个一个人的工作。来一半人开会，那七个人不到也可以。这样搞，全班不会一致，他们就孤立了。七个人可以分化，一分化就弄清谁是积极搞的。要开几次会，直到讨论清楚为止。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作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

各班讨论，这张大字报内容是对的，是错的，是部分对的，还是部分错的，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

如何入手？一方面作斗争，一方面学习在斗争中学会如何搞阶级斗争。首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战略战术，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二十三条”上工作方法都有，也讲了这一条。

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文化革命的五篇文章，《人民日报》社论，“二十三条”这一些都是武器。学习的时候，不要抠一字一字的，要体会精神，我们的队伍一定要掌握武器。

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我们和你们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先跟左派，积极分子商量，再跟群众商量商量之后再斗。

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我们和他们有矛盾，要对他们有压力，有压力就可以分化，找他们谈话。不要压得太厉害，要跟他们讲：不要另组织一套，要跟我们合作，指出你们高三知道情况多，你们要真革命，可以领导我们，不要自己走第三条道

路，你们跟着我们走，还是跟着刘超走？还是组织第三派？指出你们好了，可以参加领导。你们态度不明朗不行。先争取和刘超合作的学生，这是子弹。学生揭发刘超没有特大力量，教师知道内幕，他们起来揭发，力量大。先找少数人个别谈话，再争取一部分人。大部分就可以争取过来。那四个重点人物，也要去争取，也要争取他们起义，他们起义最有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要争取陶书寅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让她自己批判、揭露，刘超，前市委，让陶书寅揭发。让她自己说。不要怕她捣乱，越捣乱越好。除了刘超以外，都让他们起义，孤立刘超。先背靠背的揭。揭的材料掌握到工作队的手里。陶书寅不检讨再斗也来得及。如果她揭得好，可开检讨会，从宽处理。如果揭得不好，我们也做到仁至义尽。假起义也要嘛，要弄假成真。但要说不够，进一步交代。如果不这样做就不策略，不好。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学习。

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起义也要欢迎，找他们谈话，就是训练队伍，开会让他揭露，起义也要欢迎。对检讨要有分析，不要把真检讨当作假的。指出你们检讨得不够，要指出不交代就孤立。对学生采取团结批评团结。

旧市委领导嘛，旧市委有错误，没揭刘超之前，跟他走不算犯错误，只要坦白就可以赦免。他是书记是校长嘛。以为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现在是工作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你再跟他走就是保皇党了。把这些人搞过来使他们不再跟他走了，这样就有了多数。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要建立司令部，要分化那七个人，工作组到校以前，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有问题要交代不算犯错误，不咎既往，交代就完了，不过来就可以压他，把主要的孤立了。不然自己队伍没有组织好，打最强的敌人，如果他不低头，说我没有错误，学生就要打他，你们就不叫打，你们又成了保护他的人，学生就会不满，这样就会抵消了力量。那七个人现在不是刘超的了，至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向你们进攻，你们没有消灭他们，不能斗争刘超。对这七个人的大字报要讨论，一讨论必然有赞成他们的，他们就表明态度了。赞成他们的人有些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这七个人不一定是敌人，必然要分化，他们的后盾是地下的，你们不清楚，你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清楚。你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现在发现情况，说明刘超的人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要反对你，首先组织进攻。出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敌人

进攻了，你不打他还行！所以一定要分化高三（3），高三（2），主力部队不是他们，主力部队没上来。高三同学要站起来。高三（2），高三（3）一定要分化，要集中力量作他们的工作。一定要把高三（2），高三（3）同学的工作做好。这就是战斗，争取教员也是斗争。本来阻力是他们，他们不站起来，现在还不是你们的队伍，就是跟敌人勾结，刘超并没有真正的孤立。

愿意革命的是绝大多数，一时没有站起来，是暂时的，左派靠不稳，领导权不巩固，不要因为群众已经团结在你们周围了，敌人首先进攻你们的。就是要把群众团结起来，教员工人也讨论，很好的讲讲斗争策略让他进攻。争取高三（3），高三（2）才能作战，争取的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要有点压力，压力不要太大，太大就要使他们到对立的那面去了。不要伤感情。他们的错误是可以改的。要宽大，这样大多数队伍是可以过来的。条件成熟了，先找薄弱点，不要一下子打攻坚战。攻坚战败了就会打人，一打人就上当了，这样不能斗倒斗臭。

现在是准备斗争。要争取初三同学不要听他们的话。不好的教员开会压他一下，少数人跟他谈，工作组，学生跟他谈，叫他交代，指出你不是黑帮。既往不咎。人家攻来了，要在班上讨论，正好包围他，要马上讨论这张大字报。要宣布既往不咎。不要斗得太厉害，要压他一下，争过来。死顽固的不过来不要紧，讨论大字报也是斗争，斗争有准备，力争开好，几种可能性都要估计到。开坏了不要紧，总结经验嘛，再战斗嘛。你们热情高，能领导好。要注意坏人利用你们的热情，你们不是没有工作，这也是一种学习。

面对面斗不好怎么办？文斗还是武斗，要正面提，叫大家讨论，和大家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吃透两头。要挑一些有关语录，学习“二十三条”，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了解情况，把坏事变好事，这样几个月学习等于多少年的学习，重点搞一二个班讨论好，其他各班就可以照样子，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自己没有搞过不要紧，搞不好取得反面经验，叫他不再这样搞，具体到一个班蹲点，没有办法和大家商量，我们是革命的，要和左派商量，要叫学生做老师的工作。

刘少奇在这个讲话中具体策划如何镇压北师大的革命学生和教师：

他说：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出现了你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工作组长），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

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作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

他说：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要建立司令部，要分化那七个人；那七个人现在不是刘超的了，至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向你们进攻，你们没有消灭他们，不能斗争刘超。现在发现情况，说明刘超的人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要反对你，首先组织进攻。出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敌人进攻了，你不打他还行！

他把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都看作是敌人，是蛇出洞了，布置要首先进行打击。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

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是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要我讲话。我到北京不久，面对这样多同志讲话还是第一次，有点胆怯。对这么多同志讲话没有把握。但不要紧，反正是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我讲文化革命问题，共讲四个问题：

一、这场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

这场斗争的意义很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毛主席说：这场斗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还不尖锐吗？如果我们能彻底搞好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彻底胜利，就打下了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基础。共产主义是为了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我们共产主义经常这样讲。这是我们最伟大的目的，也是我们最高尚的理想。

解放十六年来，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人民的政权建立起来了。人民公社在巩固发展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中，名义上是公私合营，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上的问题也不大。但在思想意识中问题很严重。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通过这次运动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希望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不可能一次解决。希望通过这次斗争打下兴无灭资的基础，以继续搞两条道路的斗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兴无灭资，确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军。但在我们敌人方面：资产阶级也要拚死挣扎的，政权不在他们手中，经济上还拿定息，还有小商小贩，这还是资本主义因素。但是总的来讲也是基本解决了，军权也不在他们手中。现在严重的是在思想领域里没有解决；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统治？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要和我们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最后在思想领域里把资产阶级思想彻底粉碎，把无产阶级思想彻底确立，那么资本主义复辟东山再起，就永远不可能了。如果不把这次运动搞彻底，政权就不能最后巩固，不能在这次运动中把政权夺过来。现在不能讲资本主义是最后失败了，斗争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如果这次运动搞得不好，搞得彻底，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就有保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复辟，意义十分重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小范围内，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是夺权斗争。全国解放了，政权在我们手里，但是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权并不完全在共产党手里。一方面解放了，是搞反帝、搞民主革命过来的，有些人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搞社会主义。有些人是不革命的，混进来的，在我们内部取得了领导权。这样在内部有了斗争。不要认为通过流血斗争取得的政权就万事大吉了。这场文化革命在某些地区、小单位还要夺权斗争。通过大民主，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理人揪出来，搞臭，这是马列主义的

重大发现，是毛泽东思想——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一部分。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用枪杆子打倒就成了，过去认为用武装夺取政权就够了，但现在看起来不够。还要搞文化革命，还要把不在手里的领导权夺过来。不用枪杆子还要搞，只用枪杆子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所以文化革命在很大意义上是夺权斗争，夺取领导权。那些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只有武器是不可能的，还要有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通过这样的斗争，把一部分不在手里的领导权夺回来。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夺权的斗争，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现，没有这一条，我们国家，我们的党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是不可能的，苏联就是这样。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地方变成了修正主义。过去我们总想能变过来，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只有第二次革命才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彻底在思想文化上夺权，没有进行文化革命。苏联是我们很沉痛的教训，应该接受教训。

我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确立了，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但是不是在所有部门。通过这场革命要确立，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无法搞革命。如果这场革命搞得不好，彻底消灭封建思想、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中国革命就不会失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消灭我们，阻止我们，封锁我们，感到不可能了。我们国家是如此伟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此伟大，不可能被消灭。他们最大希望是从内部慢慢腐蚀我们，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帝国主义要用军舰、飞机、原子弹，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从内部来。如果我们把运动搞彻底，帝国主义就要永远失败。如果我们搞好运动，使和平演变不可能，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最大地发展生产，消灭一切剥削，压迫。这难道靠资产阶级来消灭资产阶级吗？不可能！只有坚持的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思想。

全世界只要中国在，能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全世界革命就有希望，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就不困难。我们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四分之一人口站立不动，如果我们国家一天天向前发展，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兴旺，共产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能够对世界没有影响吗？大家感到中国很对，要走中国之路，运用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斗争方针。苏

联滑过去了，回到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也滑过去了）当然马列主义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世界革命一定会实现的，因为 95% 的人是一定要革命的，问题不解决，一定要爆发的。但是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要使历史倒退几百年。如果我们站立不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将是多么大的鼓舞和希望！毛主席开始领导苏区，不过几百万人口，加上……不过几千万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但影响那么大。如果不是实行王明错误路线，我们不会搞得那么惨。教条主义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被迫撤离苏区而长征。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不过四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地区，三年就取得了全国胜利。世界革命只要我们强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这四分之一人口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四分之三人口是会跟着来的。不要看帝国主义那么强大，虚张声势，修正主义庞然大物，到时候他们会像冰雪见太阳一样，统统瓦解消融的。

这场斗争对国内意义重大，对世界革命意义也重大，我们要努力投入运动，把运动搞好、搞深、搞透，取得彻底胜利。

二、这场斗争要达到的目的。

对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来讲，就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通过运动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对全国来讲，是共产主义早日到来。对一个单位来讲，是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因为要使我们的国家巩固，每一个单位就要确保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要让我们的领导全是忠于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的。当然我们不要先提个数字，哪个单位一定要揪出多少来。各单位有多有少，有严重，有不严重，哪个单位是百分之百的反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呀！有，但是不多。解放十六年来，我们不断搞阶级斗争，例如三反、五反，但没有这个运动搞不透。另一方面阶级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帝修反用武力消灭我们困难，就用影响来侵蚀我们。有一段我们对毛泽东思想认识领会不够，抓阶级斗争不够，所以有些单位内部不纯，要通过这次斗争把反党分子揪出来。那个单位有多少，就靠群众揭发分析，要发动群众，有多少就是多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总的来看，相当多是不纯的，有些是严重不纯，就是领导权不在或基本不在我们手中。

通过一个月运动来看，领导的好是可以搞好运动的。解放十六年了，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觉悟是高的，只要大家擦亮眼睛，这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就是大民主，一定可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揪出来。过去那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不清，但是做坏事很难让人家不知道，不可能躲过群众的眼睛。大家来写大字报，你一张，我一张，合起来问题就清楚了。过去认为问题不多的，大家写大字报揭一揭可能就问题很大，这样可以达到目的，把内部揭纯，把这些人揭出来，使领导权确实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掌握在党的手中。

现在我来讲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和黑线。要我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可能，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现在的大字报我看了一些，反右斗争是没有提过，现在起来大革命很好，但有些问题，互相讲是黑帮，这个说“我是左派，你是黑帮”，那个说“我是左派，你是黑帮”，据我看，哪个是黑帮要大家讨论，黑帮黑线要有一定内容，不是什么人全是黑帮黑线。毛主席要我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黑帮黑线是不能团结的，要打倒的，是敌我矛盾，现在大字报是黑帮的多得很，这不可能。一方面你可以这样写，有权利，但是做为政策，黑帮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少数。从全国来讲（不包括农村，包括农村绝对数就大了）主要是国家干部、大学生以上的。农村四清也是搞资产阶级当权派，文化革命的重点是在文教单位、党的机关、工交、财贸部门。工厂农村还是搞四清，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应加强，对四清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就拿北京市来讲也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黑帮黑线只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每个单位可以不同，可以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二多，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五多一些，但就全国来讲是百分之一至五。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毛主席根据多年阶级斗争的经验和阶级分析得来的。

黑帮黑线有，有的相当严重，但总的来讲是少数。第一条是少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否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落空了。怎么看呢？根据其言论、行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反毛泽东思想。因为没有毛泽东思想，党就成了修正主义的党。中心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拥护、赞成、坚决执行，还是抵制，这是决定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只在肚子里反，要有言论、行动。决定是否黑帮，主要拿这一条来看对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一方面要看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要革命的对这次运动是坚决拥护是支持的。另一方面要看历史。特别是 58 年以后的历史，因为 59 年 60 年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大反复。遇到天灾，修正主义背信弃义，遇到困难，要看在困难的时候表现的如何。疾风知劲草，春天的时候草全是很绿的，到了冬天、冷天，有的草就枯了，有的更加挺拔翠绿。要看对大跃进，尤其是大跃进以后的态度，如果过去是好的，58 年拥护大跃进，59 年以后不反对大跃进，只是在运动中有所顾虑、犹豫，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让他积极参加运动。所以一方面看运动，一方面看历史表现，特别是 58 年以后的历史。不可能设想，58 年反大跃进，59 年反党、骂党、讲怪话，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左派，很坚强，这我不相信。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他搞秘密活动，一定会有知道的，有反革命思想总是要反映出来，表现出来的，要行动的，不可能放到肚子里。因此反党黑帮要看言论、行动、运动表现、历史表现。

过去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运动中讲了一、二句错话是可能的，不能算黑帮。但是只要讲到“打倒共产党”这一句就够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过去也讲过错话，也不能讲我是反革命思想。我把高级知识分子估计过高了一些，事实证实错了，经过一、二年也就解决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有行动、思想、立场。行动是破坏党，有些人是用讽刺，例如“三家村”、“燕山夜话”，但是味道可以嗅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是分子；一群是黑帮，要分析。陆定一是一个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但是他的秘书、科长向他汇报，和他一起开会，和他一起吃饭，也都是黑帮吗？如果和他一起干黑帮事，就是。如是一般正常关系，正常的汇报是要向他汇报的，不知道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呀！我们共产党员是有组织观念的。什么叫黑帮？就是长年来参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搞秘密活动，联系一次也是，关系正常，经常联系也不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揪出来，要有材料，有分析。大字报是最好的方法，你一张，我一张，从现象到本质，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讲黑帮不要紧，真正是，一定要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最后要落实，要有言论行动。

什么是保皇派？现在保皇派很多，你讲他是，我讲你是。比如北大，陆平，特别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四清开始搞得是对的，以后又讲不对，保过了关。

广大学生不知道。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一出，她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有一千余学生要保卫陆平，保卫基层党组织，这是错误的，但其中都是保皇派吗？其中少数是，多数是盲目的。当时陆平还没有撤职嘛！还是要服从的。学生们只知道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是党派来的。斗聂元梓多数是受骗，广大学生对校长党委还是要服从的嘛！多数不是坏人，保的不是反党分子，保的是共产党校长。

明知是坏的，还自觉的用各种办法去保他，是保皇派，不明真相，大多数经帮助教育，认识了，不能算保皇派，不然就会全是黑帮，全是保皇派了，一个好人也没有了，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嘛！对！有黑帮，有些还相当严重，总的是少数。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有保皇派，怕事实真相出来，打掩护，掩盖，但是要分析，要实际调查分析，才能下结论。

三、这场斗争能否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发动群众。

这场斗争有这么严重意义，这些人埋得很深，不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就不可能把这些人全部揪出来，不可能达到目的。如果讲我们每一个运动都是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次就是更伟大更深更广的群众革命运动。我是搞地方工作的，搞群众工作的，但是经验不多。就我们见到的，对我们党来讲，这场运动是空前的。前几天人民日报社论上讲是史无前例的。六年来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教育影响，社会主义有了空前发展，有了以前群众革命历史，才能搞这场运动。我们先烈流了这么多血，我们社会主义如此优越，有人想搞它，怎么能答应呢？非把他搞出来不可！如果没有群众觉悟，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群众中开花结果，怎么能把这些人揪出来呢？他们埋得很深。

北大一张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始了空前的革命运动。大家出来作主，这是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情。这场运动是空前的，广度上，深度上，党性上都是空前的，好极了！一个月以来，运动发展是健康的，但有些不平衡现象。总的来讲，运动刚刚开始，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提到更高的高度。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文化革命达到目的，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必须听毛主席的话，扩大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呢？就是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右派提出来的（应改为大民主是右派提出来的），今天为我们革命派利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拿在我们党手里，放手发动群众，用于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成为十

分重要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干什么呢？就是大家擦亮眼睛，看看周围事物有什么怀疑。你一张我一张大字报，揭发问题，这种大民主，反革命是不能的。只有革命派才能搞，当然反动派可以利用了。

大字报可以把长期以来不能发现的，经过调查研究到处找材料，通过这次运动解决把问题搞清，要相信群众是有觉悟的，是勇于斗争的，是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民主。

领导要坚决站出来，放手扩大民主，如果领导不站在前头，拖着尾巴还成哪！领导不站在前头，运动很难搞好，毛主席党中央要求所有地区、部门、单位各级领导站在前头。可以看出问题不多的，可以站在前头，因为他问题不多嘛！是革命派，可以领导运动。问题多的就不敢站在前头，不搞大民主，就不敢把他揪出来，也是一个暴露。领导不站出来，不在前面领导是不对的，是错可以改正，检查，这样欢迎，你越是掩盖越遭到反对。有些问题本来不大，但是不领导运动，就是间接破坏运动，本来没有多少问题，阻碍运动，罪名就不小了。要站在前头，每个领导自己的错误首先要引火烧身。领导人不交待，怎么能搞大民主呢？领导要站在前列，不要慌乱，不要观望，打破框框，相信群众，相信党、团员，相信革命群众是有觉悟的，不要像对三岁小孩那样这也管，那也管。群众起来要相信，不要到处搞框框，搞清规戒律，要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但一定要坚持党的总方针，没有这条不成，要发动群众，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要有党的领导，没有这一条，搞到什么方向去了！总的就是依靠左派，组织强大的革命阶级队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彻底孤立、分化、打倒敌人。不依靠左派成吗？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成吗？否则还叫什么群众运动？不要框框，但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相信党中央，就是要组织革命队伍，去打倒敌人，不然就是乌合之众。不依靠左派，不组织革命队伍，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怎么能把反党分子揪出来？孤立打倒就不可能。发动群众的总方针必须遵守，不能不要，要听毛主席的话，党的政策就是这个，连这个也不要就抽象了，连这个政策也不要，就无法搞下去了，党的政策就是根据广大群众利益提出来的，根据革命利益提出来的。

什么是革命左派？现在有的地方不清楚，他讲我是左派，他讲他是左派。左派是可以分清的，假装左派不成，自己讲左派也不成，是左派是客观的，就好像错误不能讲成真理，真理就是真理。

什么是左派？第一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不然就是假左派。左派是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人是什么左派？假的。因为他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所以他是最坚决搞阶级斗争的，斗争最勇敢。因为他有真理，他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可能斗争最坚决。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革命最坚决的。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的人，不求名、不求利，不怕死，不怕苦，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这种人是最坚决、最勇敢革命的。第二，同时也是最能团结人的。你是左派，你高明，你觉悟，不能团结人，不能把人家带起来提高觉悟，怎么能团结多数呢？革命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要团结多数。如果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是黑帮，那个是保皇派，只有我一个是马克思，这怎么成？第三、行动最模范。什么叫行动最模范呢？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没有杂念，个人思想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这样的左派一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把运动搞彻底。左派最重要，左派是党的依靠。但左派一定要符合以上条件。

犯了错误怎么办？过去我们觉悟不高，我们从旧社会来，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我国资产阶级势力很浓厚，我们每个人头脑中或多或少反映剥削阶级思想。我是讲我们这些人和我，我们是坚决听党的话，有些认识错误，讲错了话，做错了事，认识问题只要承认改正，就可以团结，但一定要改正错误，承认交待。革命人越多越好嘛！我们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才能打垮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拥护他吗？至少有一个宋美龄嘛，不然干什么跟他到台湾去呀！没有多数革命怎么能成功呢？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开始，只有几百万人口，打起了红旗，但是红旗能打多久？有的标语写“打倒资本家”，可是“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资本家在上海、武汉、南京怎么打倒？毛主席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好像一大堆干柴，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有错误只要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意识的，本质是要革命的，愿意跟党走，愿搞社会主义，就要帮助他，运用主席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不然讲话不就是空的吗？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表现好，不顽抗，确实愿改正，态度好的，可以轻处理、宽大。可是有些人是花岗岩脑袋，留下来做反面教员，留下几个反面教员也好，看看他，开会请他讲讲他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看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死心，可以不忘记阶级斗争。愿当反面教员你可以当，如你愿意真脱胎换骨，愿跟党搞革命，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大公无私，愿意改正，允许你革命，革命的人越多越好嘛！

四、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场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运动。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好的，是不可能胜利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或放弃领导，有党委不领导，都不可能把运动搞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你不领导谁领导？这是一场伟大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

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人，不要党的领导。反右斗争时，右派就不要党的领导，文化革命一定要彻底置于党的领导下，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区别假左派、真左派的重要标志。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是无数先烈流血取得的，不要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不是个别，哪个人随便讲，指挥你，指挥他。党的领导是一个集体，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心是执行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政策。这次运动总方针是：依靠左派，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强大的革命队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揪出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黑帮，打倒他们。坚决执行的，就要坚决拥护，不这样就反对。说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他如果这样做了，这是好的领导。工作队如是坏的，就撵；如果是好的，就拥护。一个地方原党委是坏的，由工作队代权；如是好的，就要在它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领导，工作队不领导怎么办呢？如果党委、工作队确实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提意见，经调查确实，可以撵，确实是大多数群众反对，可以重派，但不能随便讲这是黑帮，那也赶走，不成！

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我说的是到现在为止，以后你们还可以揭发，到现在为止，以后有很多材料再讲。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有错误没有呢？有，有严重错误，认识不够，应当检查，工作上有缺点，有的还要搞。我可能是黑帮保黑帮。至于医大八年制，是陆定一搞的，陆定一是黑帮，钱信忠就一定是黑帮？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呢！我新来不久，根据事实讲话，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是黑帮，不能预先说他是黑帮，要根据现有的材料。

党委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有权让工作队领导；要党、团组织进行领导。依靠党委，依靠党团组织进行领导。党组织就是我们基层组织，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我们党团员大多数是好人，少数不好的，可以揭发，内部清理，可以解决。个别完全烂掉了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少数有问题，党团组织你能不信任？党团员大多数应是左派，少数坏的应清除。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的，包括我们所有……（不清）……，要加强党团教育，让他们参加运动，少数不好可以清理，不能因一颗老鼠屎，一锅汤全不要了。党的领导要坚决，坚决掌握政权、机密、武器、资料、贵重东西，不能交出去。党团组织不能包括了全部左派，左派有的在党外，应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能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政权要由原党委掌握。我们有的部门发生了问题，夺权！这个三天，那个三天，又要赶下去，把机密东西搞掉了怎么办？同志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月革命，也有是二月革命。夺权，夺的是文化革命的权、领导权，委员会要群众选举，不好的可以换，不要紧，这些东西拿来拿去危险的很啊！革命委员会有权领导文化革命，不掌握政权，政权要由原来组织掌握，如果烂了，上级来接管。

下面我讲讲医院，因为是卫生部分嘛！医院的运动要有所不同，首先要搞深搞透运动，这点没区别。除了不在中国，不在共产党领导下，这没有区别，只是方法上有所区别。学校彻底关门，停学半年搞运动，但医院一天也不能关，不能病人来了，我们搞运动，你半年以后再来。医院不能关门，工作要正常进行，不能中断医疗工作，方法可以多样，可以写大字报，搞一个固定的地方贴起来。也可以搞小型座谈会，揭发、批判，对医疗事故的大字报，不要乱贴，搞一个房子，给领导同志、医生、护士同志看看就成了，内部看了，总结经验，改正态度，责任事故要改正，政治事故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样依法处理，责任事故不要给病人看见。没有责任事故是不可能的，但要减少，当一辈子医生一点不发生责任事故是不可能的。自己内部看看，总结改进，不要走廊里贴大字报，讲某某医师杀死

了人等等。会把所有病人统统激怒起来，这样的大字报不要到处贴，这是中央的指示，卫生部要坚决按这个执行。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的“红旗事件”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

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

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

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

十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

“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武汉墨水湖中学“反革命暴乱的典型”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

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

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

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

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形势：

当前运动特点：战线很宽，规模很大，声势很壮。群众来势很猛，把北京市许多部门都冲垮了，面对这样形势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一切革命的人讲好得很！，讲糟得很的肯定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坚定地认为是大好事，好得很！广大学生和职工，对“三家村”的声讨，对《北京日报》的质问都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的，相信党中央，拥护毛主席，一声号召，风起云涌，对一张大字报热烈欢呼，奔走相告，对新市委，团市委的改组，祝贺的人群川流不息。我们开始怕上街，现在不也上街了吗？对上街应当有所分析，对革命的上街应当支持。接着党中央公布了改革教育制度的决定，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可见，群众十分

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十字街口没人指挥，自动让路，守纪律，群众对毛主席爱戴，这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另一方面，也有些问题，我们不要被大好形势所陶醉，在群众大斗黑帮同时，也有复杂的情况，资产阶级积极活动，客观上是总动员，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现了，贴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至打人，捣乱，其性质有：

(1) 黑帮分子的预谋，尽管我们对黑帮分子批判斗争，撤了职，但仍然活动，有的电话指导，有的开会指导。我们前一阶段的布置，他们是知道的，当然知道也没关系，运动开始，擒贼先擒王。他们积极撤退，搞复辟活动，一个学校垮了，保存一个系，一个集团垮了，保存一个分子，有的学校革委会，一天改组几次，与我们夺权，他们利用历史的关系，影响搞反击，搞复辟。

(2) 资产阶级权威及其拥护者，在积极反抗，他们知道这次大革命，不会等着挨整，这些人表面上检讨，实际上暗中活动，他们都有一批拥护者，有的是临时组合起来的，有的是客观上联合起来。

(3) 右派学生，以大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带着阶级的仇恨，阶级偏见，报复的心理，进行猖狂的活动，象过去的反动活动一样，组织不大，但名堂很多，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自发的反革命产生。这些学生中有地富反坏的子弟，有右派子弟，资产阶级人物子弟，再加上前北京市委片面强调重在表现，模糊了阶级界限，产生了很坏的效果，这次教育制度从根本上一改从报上把他们这一套拔掉，他们必然起来反抗，这是阶级斗争规律。

(4) 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这种活动有矛盾也有联合，各有各的算盘，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反黑帮反党，他们在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反党，有的把黑帮打死，保存自己，林彪同志讲“在任何大好形势下都有阴暗的一面，不注意这一点就要犯错误。”毛主席讲“出不出修正主义，关键在于出”。大好形势下，要看到有人在浑水摸鱼，制造混乱，企图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风波。他们把群众愤恨黑帮的情绪来反党，这一点要和左派讲清楚。比如煽动打人，如打了有民愤的干部，把党的威信搞臭，还有利用打倒一切的口号，制造混乱，除了毛主席谁也不可信了，企图把斗争引向新市委，新市委刚成立就贴了十几张反对新市委的大字报，改组市委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

有的地方叫嚷党员团员全烂了，这不是反党是什么？有的地方借口接管民兵枪枝，查看档案，接管机要地方，这不是夺权是什么？所有搞政变的总是先抓这些他们也是抓一文一武。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坚守岗位，绝对不让，也有的同志丧失了立场让了。

赶工作组，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不能胜任工作，工作队中有保皇派，应该赶；另一种是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有缺点可以要求他们改进，改进作风。如果那里的党委烂了，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匈牙利）就要上台。

总之，形势是很好的，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声势很好，另一方面出现了反复的夺权斗争。我们夺过来了，不注意就会被夺回去。革命委员会叫右派掌握了就会变颜色。在学校里，右派学生反对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子弟，谁表现好就说是黑帮，有的左派学生就是顶住了，有的挨了打，挨了打就成长了，有的打了人，把女同学衣服剥了，这不是右派是什么？有的与黑帮孩子一刀两断，经过这场斗争，他是什么人就很清楚了，还有一个特点。一方面出现大字报，批判会，大字报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不好的，你说大字报是照妖镜，他说是“照党镜”，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侮辱打击干部党员，破坏有多大还很难讲。

有些地方出现压制民主，或一筹莫展，不会领导，放任自流，或工作队不纯。

总之，范围很广，变得很快，变化多，这就是运动特点。多数党委垮了，少数还在顽抗，有的还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有的工作组担任夺权任务。

二、出现前面情况原因和估计：

大好形势出现，由于党的威信，毛主席至高无上的威信，出现反复，由于在党内长期修正主义影响，有阴谋活动，党外资产阶级势力在抵抗，他们不甘心死亡，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前市委长期不突出政治。

三、办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华南工学院“北京来信”事件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

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

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

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

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蒯大富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北京新市委派出的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清华大学。

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把清华所有干部赶“上楼”，要求干部人人检查，检查过关后才能“下楼”，并要求干部“层层剥皮”，先揭发基层，后揭发党委，一层一层往上追。

清华大学工作组打击一大片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份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

过贺鹏飞、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鹏飞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涛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部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 （1）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 （2）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 （3）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 （4）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 （5）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 （6）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都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南翔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光美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 902 班内反蒯的十六名学生组成）讲：“蒋南翔性质还未定”。刘冰（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东昌（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知生（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

“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林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先扫外围，后打黑线”；“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顺藤摸瓜，内查外调”。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 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 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南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在数力系竟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1)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

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根除”。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一群混蛋

氯氯氯氯惰性十足

吃喝玩乐睡不问国事

(2)组织所谓“黑帮劳改队”，大刮“劳改风”

他们把干部分为三类：

黑帮分子—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

黑线人物—总支委员、支部书记；

黑帮爪牙—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

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第三劳改队（八月底—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一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3)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二步是恢复正常秩序，试图把乱揪

乱斗的学生们拉回课堂。工作组员下到班级，组织同学们学习文件和社论，提高思想认识。但是部分同学不愿再受束缚，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揪斗干部。工作组不同意学生们揪斗干部并将干部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一些工作组组员批评那些搞戴高帽游街的学生觉悟太低，没有政治头脑，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久，就有部分同学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说“工作组不可信任”、“工作组大方向错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蒯大富对工作组的大方向提出质疑。

一、工作组往哪里去？

一场严重的斗争又开始了！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九日晚上进校的，当日晚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是，我们只高兴了几个小时，工作组到校已整整六天了，大批工作队员都干了些什么呢？是否促进了我校文化大革命？是否能把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向最后胜利？这是每个革命左派，广大师生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下面我们提出一些现象和分析供大家思考。

一、运动方向问题 九日晚到十日晨，一夜之间从前顽固的保皇先生们都突然“哗变”纷纷起义，“我们受骗了”的大合唱登台表演了，各系打狗队十、十一日纷纷出去，很多狗被打得落花流水，夹尾而逃。十二日高教部各兄弟院校来声援我们，贴了些大字报，而我们学校大字报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了十三、十四日由于连续开会讨论叶林同志报告，两次到三次，除社教战线上的同志贴出一部分大字报外，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大有运动趋于尾声之势，革命左派非常着急！运动向左转了还是向右转了？

二、依靠谁 左派不香、右派不臭，左派没有树立起威信。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来的这几天，就我们班上来说，没有找过左派小组的一个成员谈过一次话。他们的活动很神秘，就现在已经组成的领导班子来看，许多班（包括有广播电台、工化系几个班）不是左派占优势，而原来是保皇派的成员占优势，这是严重的大方向问题。

三、奇怪的李世权事件 大家知道在工作组进校两天后，李世权铤而走险竟打出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疯狗跳墙，也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征兆。对于这样一个现刑反革命，我们把他从公寓里拖到阶梯教室开斗争大会，工作组同志百般阻拦不让开，并提出三条：①让大家知道；②让大家都写大字报；③我们一定处理李

世权事件。我们要问工作组，斗争反革命的大会不让开，却拼命扩大他的影响（反动大字报保留到十二日上午十点、到处转抄）。关起门来自己处理，我们怀疑这是否有问题，我们坚决要求工作组把李世权放出来让全校同学开斗争大会，糊里糊涂过关是不行的。

四、自控系一张大字报

自控系张根旺同志在三号楼贴出一张大字报，现抄录如下：工作组一同志说：“你们大学生觉悟太低了，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你们可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做法一点也不高级，不懂党的策略。”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又说“戴高帽子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又说“你们这样做，你们中毒太深了，说明你们主席著作学得太差了”。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话是出自工作队队员之中，他竟对广大革命群众破口大骂，我们要告诉这位同志，你骂我们，我们不在乎，但是你骂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不答应；你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拼命！请工作队领导同志立即核查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必须马上开除这个工作队员，并向全校作检讨。

五条大棒

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常常挥舞着五条大棒：

一曰“放”。叶林同志报告中曾反复强调要大揭发大批判：口上是这么说了，实际行动上怎么样呢？大字报急剧减少了，前天打出的数张对工作组有怀疑的大字报，被工作组采取的残酷手段压下去了；原按我们估计，在十五日将出现一场关于工作组性质的大辩论，但并没有出现，为什么呢？从我们工化系来看可以得到解答，蒯大富是我班的代表，同时也是班上对工作组怀疑最大的一个，当他把怀疑提给工作组时，工作组立刻对他施加“疲劳战术”，从十三日起早上报告、第一次讨论，下午排队看大字报，晚上八点三十分以前第二次讨论，八点三十分至十一点开代表大会，十四日上午第三次讨论，下午二点三十分至五点开筹备会，五点至八点开代表会，九点至十一点组长会，十五日刚起床早饭没吃，通知说开“紧急会议”，上午准备，下午斗争会，晚上还建议开，同志们：难道这就叫“放”吗？只准你们在台上作报告，不给我们喘息机会来写大字报，同意你们的意见开绿灯，不同意你们意见的开红灯。

二曰“先立后破”。

工作组同志几天来拼命强调，首先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当然好，但是我们前面说过，有好些地方组织系统严重不纯，你们“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

住大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出杂文、揭露黑帮阴谋，你们说，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这叫什么斗争呢？你们破的又是什么呢？先立后破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三曰反对左派学阀。各系组成打狗队，到处找狗打，你们说这是打击面过大。化 901 班，刘才堂 12 号向工作组提出详细建议，14 号得到工化系副组长张蔷薇回答：“刘才堂，你太主观了！”从前我们冒着人头落地的危险，和保皇党进行斗争，今天我们抬头了，骂他们黑帮，可是我们的广播和叶林同志的报告反复强调“不骂人”斗争游街不允许，连骂黑帮也不允许，我们要问工作组，中央有过不骂人指示没有。反对左派学阀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四曰“纯学术讨论”。十三号晚八点三十分工化副组长张蔷薇同志召开据说是左派会议，会上他说“修正主义最危险，我们要识破他，你们同学尤其是高班同学，中毒太深了，你们要从自己个人的亲身体会来挖修正主义根子，使群众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第二天天亮，有同学通过自己体会来系统的整理批判清华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保皇党分子的气焰还十分嚣张的情况下，工作组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这难道不是变相的纯学术批判吗？五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工作组领导同志反复说：真理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理由说充分，他们自然不神气。他们以此阻止我们开斗争会，不让游街示众，甚至以此来阻拦我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李世权大会，好像那些顽固的保皇派也能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我们不会上当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向保皇派反击时，他们跟踪监视围攻，开黑名单、摄黑相片，造黑档案，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从来没有和我们讲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平等，今天我们抬头了，工作组却口口声声要我们同黑帮摆事实讲道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真理，他们能听得进去吗？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对阶级敌人只有采取专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这是一个大阴谋，左派是有一些错误的，但他们和右派的反动言论根本不同，而我们工作组同志怎么说呢？“左派中毒太深了”、“太主观了”，没有秩序，右派受骗了，多数是盲目执行者，因此有些左派不得不在那里清除毒素，右派却以为自己是盲目执行者、受骗了，逍遥自在，没事干，岂不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吗”？这条大棒你们也举起来了。我们十分痛心，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是

帮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可是，他们却拿起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的五条大棒，在左派头上挥舞，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往哪里去？我们无法设想。关于六月十三日大会

六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对叶林同志的报告提出下面三个问题。

(1) 东风压倒西风问题。在十三日清华园内是否真正是东风压倒西风？清华园内政权是否真正在左派手里？

(2) 关于百

分之九十五党团员是要革命的提法上在十日前，滴水不漏，清华大学上层组织能否这样提？它会产生什么后果？

(3) 叶林同志强调说我们要建立良好的革

命秩序。是否意味着我们原来的秩序不好。斗争会游街等无纪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什么样的秩序叫革命秩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是怎样说的？

大会三个发言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身份历史表现，工作组调查了没有？据我们所知，教职工在九号前很少几个人反对校党委，他们怎么稀里糊涂上台发言的？那个教师代表竟说出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这句极错误的话，更令人气愤的是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发言稿工作组审查了没有，我们要求重放大会录音，公布三个发言者的身份。

回答几个问题 一、有人说

“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同志们，你们错了，我们无限信赖的是党中央，无限信赖的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在工作组的性质未搞清楚之前，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不负责任的，不也曾有人说过“我们无限信赖校党委”？事实是怎样呢？是黑帮。

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究竟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此时就提出“无限信赖工作组”不能不算是阴谋。任何人都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工作组尤其这样。

二、有人说：“工作组的成绩很大，刚一来局势就大变。”我们说局势大变不是工作组的成绩，而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威望使黑帮胆寒，是革命左派的斗争，使保皇派们丧魂，他们才不得不“起义”、“投降”。

我们的决

心 我们赶上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很幸福。我们没有经验，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谁，不管他威望有多高，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和他斗到底，把他斗垮斗臭！

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严

肃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非常曲折的、复杂的。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相信就一定能胜利。

一

切愿意革命的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乘胜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化 九零二 剪大富 孟家驹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王光美进入清华大学。

王光美来到清华，在群众面前公开亮相，说是“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她表示愿意参加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并成了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当晚在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说：工作组进校十天了，还站不住脚，还控制不住局势。表示不满。

同日，薄一波与蒯大富对话；

薄一波谈了一些斗争策略后谈到了工作组的问题，这时后面一个声音喊道：“工作组方向有问题！” 蒯：不是这样说是的，我是说，我们提了许多意见，工作组不给答复。 薄：这是哪个同学说的，请他进来，你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 蒯：我叫蒯大富，工化系。 薄：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 蒯：十五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 薄：噢！ 那你说说怎么办，工作组在清华园下了车站在校门口就喊，大家斗啊！这不解决问题，毛主席说：“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你知道吗？ 蒯：我知道，但工作组来了后十五日前不让我们斗人等等……所以大方向错了。 薄：你是左派？ 蒯：这我自己怎么好说呢。 薄：革命者应该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 蒯：而我以为自己是左派。 吕：你认为错了，那么错在那儿，你认为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 薄：这同学说的有道理，你叫什么名字？ 吕：吕述祖（下称吕） 蒯：我们还有很多理由说明工作组方向有问题，我们信赖党中央毛主席。 薄：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 蒯：我们是有理由怀疑的。 吕：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也希望斗他们，但我觉得是当时自己没跟上形势，斗争会要有“孕育期”，这就是调查研究，调查是毛主席思想关键一点。 薄：对！ 来到清华园，说一声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出来，只把右派留在清华园里，用机关枪一扫，这不解决问题，真正革命左派

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 蒯：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薄：好！
 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这三点叫蒯大富重复了两遍）。 一、希望你能站在左派群众中来，站在工作组一边去，不要作左派中的左派，如果作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组成，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语录，多在用字上下功夫，毛泽东思想不仅对黑帮是照妖镜，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亦是照妖镜。
 三、噢！上面两点就已经够了，希望你今天学了语录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澄清一下错误，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否敢于写，我是怀疑的，你如果不写，就会象他们处境一样尴尬（用手指爬在芦席上听我们讲话的同学），受到大家的围攻，起码他（指吕）就会写大字报攻你。 蒯：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薄：这话对！但是陆平还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蒯：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薄：我认为是恰当的，难道你让我举中国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围攻的例子吗？恐怕在这儿的同学都不会答应，那他们不都成了修正主义了吗！ 蒯：你叫什么名字？ 薄：这个我懒得说。 蒯：那你告诉我个姓吧！ 薄：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答。 蒯：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们应该告诉我。 薄：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 谈话基本结束，另薄又问过蒯大富同志：“六月九号和十号两天清华园形势大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蒯：我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薄：那么难道九号以前主席思想就没有威力了吗？我认为取得成绩其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其二是由于工作组进校了。（正当同学谈到我校基础课教研组李世权写的极端反动标语时，薄问） 薄：他写了什么标语？ 一同学：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薄：“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好！好！让他写嘛；你们不懂策略，我就比你们多读一些，应该让他们先放出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当天晚上，王光美就在她召集的工化系部分同学座谈会上，拿出蒯大富在大字报上小批的照片向同学们介绍说。“大家要注意，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蒯大富给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左派的一封公开信
师大女附中坚定的革命左派：

师大女附中全体革命师生：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针对你们学校的情况，我想和你们讨论几个问题。我的看法如不符合主席思想，请批评指正。

一、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是把世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心里始终想着正在战斗、正在流血、正在受苦的世界 2 / 3 人民，始终想着中国人民，想着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他们是懂策略，善于团结群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革命左派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权斗争。所以说，真正的革命左派脑子里想的是夺权，两眼看的是夺权，双手做的是夺权。我们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党夺权，决不是搞个人野心，当“大官”。 你们学校的权，从前在学校领导手里，你们和他们斗，把他们斗垮了。今天工作组接管了你们全部权力。那么，每个真正革命左派都应当考虑，工作组能不能代表我们？能不能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代表我们，则我们热烈拥护；如果不代表我们，则必须再次夺权！这是头等重要问题，切不可糊里糊涂，等闲视之。

三、工作组是否不可侵犯？ 工作组是帮助革命群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如果它坚决执行中央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处处为革命群众撑腰，处处打击黑帮分子和保皇派的气焰，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这样的工作组就应当拥护。反之，如果工作组象小脚女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处处压制“放”，不为左派撑腰，反长右派气焰。这种工作组不能领导，应该轰走。

“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是反动的。 “不许贴工作组大字报”的口号是反动的。 毛泽东思想，具体地说，主席的书、《人民日报》最近社论，是我们文化大革命唯一的最高的指示。符合这个，我们照办，违反这个，我们就要反，根本违反。我们就要斗！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是那儿派来的工作组，一定要和他们斗。把它斗垮、斗臭、斗烂，再赶走！ 四、文化大革命主要斗

争形式是什么？是大字报。在大字报上进行说理斗争，我们坚决反对那种不进行说理而泼口大骂的人。这种家伙是保皇派。他们特别害怕大字报，左派不要理他们，你骂你的，我贴我的。真理总会最后战胜错误。我们要大写大字报，不要怕任何围攻。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豁出一条命！五、工作组不是立场问题，但水平低，他们想搞好，而无能力搞好。这怎办？一般不会出这种情况。万一出现。也应该把这样的工作组赶走。不能领导，却抱住权力不放，拖群众运动的腿，这样的工作组要它干吗呢？赶走不更爽快一些吗？六、保皇派反对革命派的方式是什么？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压和拉束合，分化瓦解左派力量。具体地说，有五条大棒：①“放”，实际上压制左派放了；②“先立后破”；③反对“左派学阀”（过分强调政策准备细微；主张合二为一，改良主义）；④“纯学术讨论”（逃避要害问题，引向枝节问题）；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揪住左派不放”。对你们学校，每个同学找一找看，有没有这五条大棒。主席的话，《人民日报》社论是唯一的最高指示！违反主席思想的我们就要造反！提高警惕！提高警惕！！提高警惕啊！！！战友们，紧握你们的双手！奋不顾身，勇敢地战斗吧！未来的世界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致革命左派的崇高敬礼 蒜大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清华园

工作组错误估计了形势。王光美说：蒜大富要夺权。薄一波指示工作组：反击。他们认为清华右派学生正在向党夺权，必须加以反击，并且提出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蒜（大富）”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现一批反对蒜大富的大字报。

一些人围着蒜大富进行辩论。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当蒜大富提出要在大礼堂进行辩论以后，王光美说：“开辩论会好嘛，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了，你们也应该说说话了。”从此，就掀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反蒜斗争”。

工作组召开辩论会，辩论中，拥护工作组一方的发言漏洞百出，十分被动。工作组组长叶林自己走上讲台，指责蒜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是一种反动行为。他要求全校同学表态，要么站在蒜大富一边，要么站在工作组一边。工作组副组

长周赤萍也跑上讲台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组的做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认为蒯大富写的批语和大字报，只是表明他对工作组的不同意见，算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工作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乱扣帽子，不同意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有一个班一共 30 人，有 26 人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下午三时，工作组向群众传达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以北大“6.18 事件”为依据所做的 6.23 报告，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平息了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从此，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长达 20 天的“反蒯”时期。在“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无限信赖工作组”等口号下，工作组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学生群众。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现了“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一些人在校内组织游行示威，拥护工作组。

蒯大富等人到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上访，反映学校的情况。

六月二十六日，蒯大富给吴浩汀等人的信：

吴浩汀、李世雄、谢位珍、卞有为、鲍长康、邵凯胜、陈新生、曾文龙等八位同志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我在这儿，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 现在的斗争形势特别艰苦！希望你们绝不要考虑个人，一丝一毫也不能考虑，豁出去！ 在别人把我们当着“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一丝一毫的退缩。在“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们绝不能向什么人承认错误，我们退一寸，他们就要进一丈！他们现在抓不住我们什么把柄，千万不要把关键性的“把柄”送给他们，这样，他们气势更高了，更能蒙蔽群众，就将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我先走访新市委，再走访华北局。如果此二处得不到满意答复，加上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处我们就无处说话。那时，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求见中央高级首长。不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誓死不回学校！ 我建议你们做下面几点： 1. 一点不透露我在干什么。 2. 坚决不发言，不表态，不参加辩论。 3. 谢绝来访。 4. 密切地注视学校动向，随时做详细记录。 5. 好好学习社论，把着毛泽东思想方向！ 6. 特别需要警惕！防止出人身事故！ 同志们，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最需要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要在革命的车

子上坐稳，绝不要摔出去！ 紧紧握住你们的手！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鲍阅后，密传我组可靠的人看， 看完小心保存，不得遗失！ 回去给我。
 衷心地希望你们在这个时候，在这最艰苦的时候，不要离开我！ 蒯大富 六
 月二十六下午七点十分 于新市委接待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工作组召开大会批判蒯大富等人。

辩论会上，由于蒯大富发言有理而工作组反驳却无力，王光美坐在甲所收听了大会发言之后，非常生气，说“肺都气炸了”，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积极分子为什么跟不上去，不能把他驳倒？要学习农村“四清”的经验，要“亮典型”，“打活靶子”，要把蒯大富作为“典型”、作为“活靶子”来打。既要在理论上把蒯大富批深批透，还要把他的组织活动查清。

于是打击面迅速扩大，到处追查“蒯式人物”，打击广大革命群众。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多次斗争蒯大富等人，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王光美强调批判大会要开得很有声势，发言人要层层选拔，会前要练兵预演。每次斗争大会之前的预演会，都是王光美亲自主持的，并且亲自动手修改发言稿。在她的导演下，“上纲”愈上愈高，一时，清华园内“反革命”、“反党分子”帽子满天飞，搞得人人自危，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但王光美还认为不足，对工作组继续施加压力，竟当着工作组长的面说：“我看你们一个副主任，两个副部长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蒯大富。”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有的干部检查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光美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蒯大富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

(一) 不管怎么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

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对照我校目前情况，再认真分析、思考。

(二) 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 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软弱的。

(四) 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我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 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一万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

(六)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七) 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很大的压制作用。

三思啊，同志们！

一九六六年六月底开始，工作组实行封校，不准教师学生自由出入学校。

剥夺蒯大富等人的人身自由。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蒯大富致叶林的信

叶林同志，你好！

今天，我想对您说几句话。

一、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使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

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你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踏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着。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一切手段应战。

二、你说过：“向工作组夺权，这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吗？”“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行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言下之意，蒯大富就是反革命。在您的启发下，“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

我想，您是老革命了。什么是反革命，您一定很清楚。那您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呢？“向工作组夺权”这句话我从未说过，是您强加的。那么凭什么呢？就凭我把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具体应用到学校来吗？（注）难道就凭我提出“要”考验工作组吗？难道就凭我提出“工作组的大方向有严重的错误”吗？等等，就凭这些我看不能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吧。

何况，你们并没有用大量事实和充份道理来证明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反而让那些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胡说八道的人大放厥词，对我进行无耻的攻击，我不能不表示遗憾。

但愿这是您由于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非常不希望是你安排的政治陷害。

三、叶林同志，请您睁开眼睛看一看，到底都是谁在全力支持你？那些从前是保皇的人，摇身一变为“革命左派”，那些投机革命分子成为你们最得力的助手，甚至原黑帮打手叶 X 等一群，也大叫大嚷：“坚决支持叶林同志！”而那些一直是眼睛最亮的真正左派，对你们提了些正确的意见，你们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打出手，施加政治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检讨，交代什么“罪行”。我见过非常痛心！我想，这也是您——真正的革命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吧。

四、看看“六·二二”事件以后的情况吧。原来还有不少同志敢于向工作组提意见，而现在由于高压政策，谁还敢对工作组说半个“不”字呢？你们一来就拼命树立对您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以后 6 月 27 日，大会发言有人喊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样极端反动的口号时，台下鼓掌不算，主席台上竟有多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实在难以理解。这种高压政策使人们感觉到一种恐怖氧气。我不禁想起当时校党委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发言，他们怕交不了账，慌忙命令同学“提意见”。处于目前我们学校这种情况，叶林同志，我真替你担心，如果你不慌报的话，你怎么向北京新市委交账？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账？

五、我希望你好好抓一抓工作组。尽快“统一思想”。已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在工作组内，有同志支持和同情我们。要抓就抓在前面，抓晚了后，怕到一定时刻，工作组内真正的革命同志，要起来揭发你们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的很哪，赶紧安排好计划，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知怎么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拿起毛选，就像毛主席在身边似的！

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敬礼！

蒯大富 1966. 06. 29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蒯大富贴出《告全校人员书》

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

工作队同志们，今天，我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1. 差不多全校人员都说我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叫反革命。这五“反”我一“反”也沾不上。外面大字报上、广播内容中，叙述我的“罪行”，全是捏造事实、歪曲事实以后强加的。许多同志，见此信以为真，对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坚信不移。同志们，我要严正指出，如果你是真正革命者的话，如果你真正对党中央毛主席彻底负责的话，把话说绝，如果你还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的话，那末，我衷心地希望你们，（你们也有责任这样做）好好作一番深入地调查研究，按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带着“蒯大富是反革命”的框框去调查也是无济于事的。我还请你们中一些人再次走访中央，反映学校详细情况，并把我的大字报抄稿交给中央。我是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孟家驹曾对我说过：“哎！上天无门哪！”我立即反驳他：“胡说八道！在北京如听不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中国岂不完了？你是怎样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中国永远不会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天天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么宏亮有力，又是那么亲切！一方面，我相信，叶林同志他一定能如实地向新市委和党中央反映清华情况；另一方面，即使万一叶林同志歪曲反映情况的话，那么他也不能一手遮天，倘大清华，岂是叶林同志一手能遮住的？请同志们切不可低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的极大的不

可动摇的威信。我十分坚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全盘了解清华情况。蒯大富是什么样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作出绝对正确的判断！ 2. 同志们，你们注意到目前学校情况没有？现在，在全校范围内大肆制造舆论，一方面，他们公布蒯大富莫须有的“罪行”，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蒯大富“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又臭又硬”，“反革命分子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等等。而且，我再一次严正要求，在没有判我是反革命以前，你们要坚决执行北京新市委指示，和履行你们自己的诺言：绝对保证我人身安全！ 3. 有同志说：“不管你过去怎么样，起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运动引入歧途，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说，何为歧途？望大家慎重考虑！我早说过，在运动中考查工作组性质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我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势，完全是工作组所做所为造成的，要工作组负全部责任。如果说，这妨碍了打校党委黑帮，那大家去找运动领导叶林同志算账。我不负任何责任！ 但是，我再一次声明，工作组是否是黑线的组成部分，这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包括革命的工作组员，在运动中考查！我相信，只要他姓“修”，他就不会说出姓“马”的话来！ 同学们，同志们，在这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每个人必须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六月三十日写成大字报贴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蒯大富再致叶林的信

叶林同志，你好！

上次给你的信大概收到了吧，不过没得到你的回音。也许是工作太忙了。

今天，我想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一、我真佩服您的高压政策过硬，效果也十分惊人。这几天，您大概很高兴吧。除了蒯大富，差不多都被“压”过去了，您还准备怎样对待我呢？

通过这几天的领教，我很体会您大有几手。虽然你们对付校黑党委没有什么大本事，迟迟不安排作战方案，但是你们对付我的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精明，计划安排得特别周密。

压上加压，再加再压，这大概是您的传家宝吧。

叶林同志，您现在是否认识到，高压政策对我的效果为零？如果没认识到，希望您能早点拿出更大压力的高压政策，再试一试，看灵不灵。如果您已认识到高压政策不能使蒯大富屈服，那么，你是否考虑换别的一手？

二、切切提醒您注意，您千万不要这样想：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算了吧。

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论是你们挑起的。你们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北京新市委的威信。我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得不拿起大字报这个极其实用的新式武器进行应战。然而，你们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对我们施加巨大压力，甚至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将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

你们现在还想对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那是办不到的！辩论你们既然挑起来了，那么下面怎样走，就不可能按照你们的意志行事。叶林同志，我要严正告诉您，如果不把蒯大富事件作出真正符合革命利益的处理，想走为上计，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要战斗，咱们就得战斗到底，不决一胜负，誓不收兵。

三、从 6 月 22 日到今天，已经 10 天了。这几天几乎全是搞蒯大富问题。同学们很着急，都说校党委还打不打了？你们要来找我算账。我说，我不负这个责任，要叶林同志来负这个责任。

叶林同志，您大概听到很多群众的呼声吧？他们都说要立即判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专我的政。只准我规规矩矩，不准我乱说乱动。您准备怎样对待群众的意见呢？是否感到压力很大？

四、我认为，我对我自己是很了解的。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反革命。事实上，你们也拿不出任何罪状来，我心里很踏实，没有一点空虚的感觉，也不感到有什么压力。这是真的。不知您是否相信？

五、我作一种大胆的推测：也许您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由于调查不周，乱下结论所致的。产生的恶果是严重阻碍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如果我这种推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你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满足我下面十条要求：

- 1、召开全校大会，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作深刻检讨。

2、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赔偿我的政治损失。洗刷一切攻击我的大字报，广播 6 月 28 日以后所写的所有的大字报全文。

3、宣布我组原十人及史复有同志不是反革命分子。宣布刘才堂、王铁成、任传仲、张云辉、刘泉及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过我或同情过我的同志不是什么“蒯氏黑打手”，而是革命者，赔偿他们的政治损失。

4、勒令那些明知内情而蓄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人，勒令那些别有用心攻击我的少数人作深刻的交代和检讨并清除广大群众被蒙蔽状态。（大部分群众，我不责怪他们）

5、撤销工作系副组长张蔷薇同志的职务。撤换化九的四个工作队员，换上新的经过严格挑选的工作队员到化九来。

6、重新严格审查文革领导机构。剔除那些投机革命分子和不坚定分子。

7、全面总结工作组进校以来的工作。解释六·二二事件、王铁成变“疯”事件及其他事件。

8、通知附中及外校工作组，希望他们不要对与我有过联系的人，施加政治压力。

9、在做到上述事情以后，立即转入打校党委黑帮高潮，拟下详细战斗方案，揪出真正黑帮分子，七斗八斗，猛打猛冲，穷追不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0、把我校情况，真实地、详细地、迅速地汇报给新市委及中央，请求请求。

再说一遍，如果您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您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上述十条要求中任何一条。

六、如果我上述的推测，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即现在你并不认识到自己有什么过错，还是“毛泽东思想方向”，那么，也很好，您还按原计划进行。我等着应战。不过我提醒您注意一下，那我就不承认您是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认为是预谋的。十条要求已公布于大家，不管到哪一天总会全部满足的。

七、叶林同志，再一次向您表白吧，我的信心更加足。我认为，形势在按照我的估计向前发展。

您已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表面现象当本质。希望您不要一错再错，错上加错，错到底。就比如说群众的觉悟吧。广大群众在你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强加罪名的情况下，处于被蒙蔽状态。但是，尽管大部分群众受骗，我还是十分

坚定地相信，在群众中支持我和同情我的人还相当不少。别看他们没有发言，但到一定时候，他们要说话的，他们会喊出真理的声音！清华园内，真正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多得很！他们决不是什么压力所能压倒的。他们必将为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地战斗到底。您不相信吗？咱们走着瞧！

现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已被你们引入歧途，你们已经犯下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确迫切要求）我要严正向您提出要求：两天内，对我的两封信作出回答；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蒯大富事件作出正确的、妥善的处理。如果您不顾党的利益和群众要求，执意按照你们原来意图行事，想达到你们的原来的目的，因而一拖再拖，给文化大革命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失，那么，我可以老实告诉您，一方面，你们原来的目的永远也达不到，另一方面，群众不会答应你们，我也不可能答应你们！咱们把话说在前面，在适当的时候，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到那时，您就可能不可收拾，悔之已迟了！

望您三思，再三思。

祝您精神好！

致

革命的敬礼

蒯大富 1966. 07. 02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薄一波视察清华大学时与学生们的对话

薄一波：

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上次我来就听到一些议论，对工作组有人反对，有人拥护，今天再来看一次，上次有些同学向我反映情况，有一个叫蒯大富，我就和他谈了起来，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叫蒯大富，我说不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字。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真正的左派，那天我把他当作真正的左派，以前我一点也不认识蒯大富，毫不知道蒯大富，蒯大富就给我解释：“我的名字代表国家。”我说：“你的野心太大了，太狂妄了。”当时还有其它同学在旁边，他们提出了蒯大富要赶工作队。工作队我就拥护，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工作队已经夺了蒋南翔的权，你还要反对，那就是……（没听清），他说工作队不好，我说工作队好，蒯大富说：“工作队阻拦我们斗争，现在清华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我问他你自己定的还是大家定的，他回

答不出来，当时就有人说：他不是左派。我说怎么样？大家都反对你，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还没有揪出来！

他不是要夺清华蒋南翔的权，而是要夺工作组的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因而是夺党的权，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的天下，要夺党的权就不对。

他大字报上写道：“眼睛里看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夺权……”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社论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和我们站得不一样，眼里看的不一样，他是念念不忘要夺权。

这一次，我们已经夺了权，清华大学以叶林同志为首的工作队一进校就改组前校党委，这还不叫夺权？蒯大富现在总想夺权，夺共产党的权，这叫什么？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

薄：他这个人不错！有点反革命的顽强精神，刚才举手赞成蒯大富的一个人也没有，怀疑的人就是蒯大富。

当薄看到蒯大富同学给师大女附中写信时，薄问大家：“我问你们，工作组能否代表你们，怀疑的请举手。”（当时蒯大富同学举手）薄又说：“他自己对自己怀疑，但他还要坚决顽抗，蒯大富这些人是不足为奇的，自己对自己怀疑，但是他还要坚决顽抗，这种人就是不虚心一点。”

薄：那天我看到蒯大富说：我不认识你，碰到你也感到不错，告诉你几句话，他这个人不虚心，说我胖老头，我不反对我是老了，胖不是自己要的，其实当时他要问我名字，我说我不愿意告诉他，我很愿意交朋友，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如果你承认了错误，写大字报贴出来，下次来时我就可以和你作朋友。

当时给他提了三条，希望他站到左派同学这一边来，站到工作队这面来，不要在左派中间再搞一个左派，不要作超左派，超左派不光荣，他不理，他这人不虚心，当然我的话有错，他可以写大字报，我问他记住没有？他说不清楚。我又跟他说了一遍，第三遍他才拿出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这次来他没有带这小本子。

我说左派和右派有个标准，真正的左派是什么？那就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说，你这个左派超过了这一点，拥护到了反对的程度那不行。列宁讲过：“极端与极端是相通的”。这不能怪同学，他不懂，当时我给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这时薄又用手比划了一下）。

当时蒯大富说，我这个左派还要左，那他就到右派里头去了。当时我讲到这儿说：你这个极左派是危险的，是和右派一样的。

托洛茨基口号是比斯大林的“左”得多，但他是“超左”，是反革命的，什么叫超左派，有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来反对革命。

当时我就（对蒯）讲了三条，最后我说你赞成我的道理吗？当时我要讲几句主席语录，问他有没有，他说没有，我就说：“干革命没武器还行！”我说：“你回去要看看主席语录”，告诉他看第几条第几条，“而且我相信你没勇气。如果你有勇气，明天就贴大字报，承认错误。”当时看蒯大富无话说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说哪儿来的胖老头！

今天为什么还来呢？因为上次我讲过一些话蒯大富给我贴了大字报，今天我有点空就来了。我想再看一个。对蒯大富同学不够礼貌，我看也不要过分地礼貌，蒯大富要挑战，那我们就挑吧！不这样不行。

工作组进清华只二十四天，我看工作搞的还算不错，好不好？

一同学插话：很好。

薄：很好还不能说，但工作组进校还是不错，你们说得好，那我就更高兴了。但蒯大富说还在怀疑，蒯大富说他最能夺权，我说你吹牛，有什么本事？六月十日以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大发表了聂元梓大字报，清华怎么样呢？清华处在压制反抗的情况，左派刚一露头，贴了七百多张大字报，牛鬼蛇神就出来反扑了，写了一万张大字报反扑，蒯参加了没有？

一同学插话：参加了！

薄：你吹什么牛皮，当时你是保皇派，你夺什么权！你并没有夺黑帮的权，你是保皇派而不是右派！工作队进校后，六月九日进来的，六月十日夺的权，你现在怀疑了，你想夺权了，你想夺共产党的权，六月九日你不夺权，六月十日你要来夺权了，错了一天，英雄坐不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算什么？大家说。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

薄：大家作了结论，六月九日以后我们夺权了，你倒出来夺权！你这个逻辑倒很清楚，这是什么逻辑。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逻辑。

薄：我们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工作组一进村就支持左派，站在左派一边，反对保皇派，反对牛鬼蛇神，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当然工作组刚进校情况不熟，他们都是从上海东北来的，一进校他们就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教导去作，起来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蒯大富就抓住这一点说工作组来了以后不马上斗他们，蒯大富之流所说要斗保皇派，实际上要斗我们所说的真正左派，工作组没答应他们的要求，说要调查研究，调查清楚了才能斗。蒯大富不允许，我说这不对，他就说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当时我问他，他说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当时我说：蒯大富同学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那天我是开玩笑，但是说对了，我说工作组基本上是好的，但一下子没把局势铺开，工作组是有些缺点，有些人提意见是对工作组的帮助，可你（指蒯）这是反扑。

我看清华现在的大辩论会很好，现在的局面是好的局面，只准蒯大富写，不准左派起来反击，那是不行的。左派可以起来斗争嘛。同志们不要把蒯大富估计的过高，把他估计的过高是要上当的，他不过是一个到处奔走的小卒子而已，他没本事。我们左派一定要把真正的黑线揪出来，不要把他看的了不起，他刚才跟我说的（指看大字报时和蒯的辩论），就是无理取闹。

今天我不是以胖老头资格，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讲的。欢迎你们贴我的大字报。蒯大富不赞成，我就高兴。蒯大富不高兴，我就落实了。如果大家都不赞成我，只有蒯大富同意，那我今天就出不了清华园了。

蒯大富说：信任蒯大富的还有一二百人。

一同学插话：没有，吹牛。

薄：一二百没有，五六十总有吧！

一同学插话：没有。

薄：十个八个总有吧……（不清楚）请左派同学注意，我有点“保皇派”，对跟蒯大富走的人，包括蒯大富自己，你们要是死命地跟他们走是要上当的。对那些受蒙蔽的人要抓紧工作，不要跟蒯大富走了。我们都是新中国的人，跟我们来吧！要把他们拉过来，争取他们，如果他承认错误，那是欢迎的，这一条大家是否赞成？这才叫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对这些人是交枪不杀，这些同志可能认识错误，因而每一个左派同学……（不清）什么叫左派？

一同学插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薄：五条我都赞成，但还不够，还要团结 95% 以上的人，要把真正的右派孤立到最少数，一个二个三个人，这就是我们说 1%、2%、3%！最多不要超过 5%，把包围圈缩小了就是要最少数。如果蒯大富有勇气承认自己错误，也算“英雄”。我们还团结你，还有我们的教员，教授，职工都是这样。要把 95% 的人都团结我们这边来，如果左派同学没有这个本领，那我就要批评他们，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工作队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就要作工作，说服教育，可以等待他们。这不是蒯大富的等待，蒯大富是等将来夺权的，这是反革命等待，我们要等他们交枪。

今天，我给蒯大富抹了黑，但还要作保黑派，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甚至斗争，再达到新的团结，蒯大富我是对的起你了，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你的斗争才是真正对待矛盾。

对阶级敌人就不能这样，对阶级敌人要斗争，要专政，要逮捕。

我看他（蒯）的论点也不是很难驳倒的，他说了一些反面的话，这样欢迎他。如果这里没有蒯大富，我就认识不了你们，你们这里运动搞的好，就是由于你们这里出了蒯大富，这个反面教员是不易多得的。我们要这些人。将来斗他不要给他戴高帽子，也不要揍他，向他这个反面教员学习。这是政治课，白天跟你们讲政治课，多讲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有时还教育不过来，就是要有一些象蒯大富这样的反面教员。

讲的多了……（不清）今天就讲到这里，两个星期以后再来，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与刘涛谈话：

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

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

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蒯大富发出《绝食抗议非法政治迫害！》的公开信。

清华大学工作组：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现在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自由权！而现在呢？我出门，你们跟踪监视；我打电话，

你们不准； 今天出新斋门，你们不准； 上强斋，你们不准！甚至动武，流血！ 我要去中央，你们不准！ 你们要犯法吗？你们要封锁中央吗？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现在我提出一个要求； 誓死明天去中央 你们可以派人跟着，但没有限制我行动的任何权利。 如不答应，我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晨六点零分起，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政治迫害！ 剌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二十三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剌大富给叶林的信

叶林同志，您好！ 今天，我在绝食过程中给您写这封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咱们已经打过多次交道了，彼此之间均有所了解。下面我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1. 我的前两封信您阅过了吧，有些什么感想呢？我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两封信中的内容，句句打中要害，我想，您肯定是深有体会的。 2. 我坚定地相信，您肯定已经认识到在处理剌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给文化大革命造成巨大损失。您准备怎样对待以前所犯的错误？这是考验您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下面，我提供四条路供您选择：

当前情况：（我正在绝食，争取去中央） ①以基本满足我的十条要求为谈判条件。或者干脆全部满足十条要求。这样，您就不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②答应我去中央反映情况（你们拿不出一条理由来拒绝！）这样，在中央全盘掌握清华情况的前提下，由中央作判决，这种判定是绝对正确的，我口服心服。如果您答应的话，表明您不怕中央，信任中央，也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③在我绝食未死之前，您就作出判决，说剌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准许我上诉中央，（您也无有理由拒绝！）此时，您就很难算得上马克思主义者。 ④既不判决，又不准去中央，听我绝食下去，直至死亡，这是最最下策，您大概不否认，只要我因不准去中央绝食而死，此事非同小可！您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包不住，中央肯定知道。那时，您就不好办了的，不但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也不只是普通的黑帮分子问题，而是负有人命的大黑帮分子！那时，不只是身败名裂的问题，而且能有更大横祸降临！您不信吗？咱们就试试看！ 目前，摆在您面前的只有这四条道路，何去何从，由您选择。不过。我衷心希望您走第一条路，最起码也走第二条路，尽可能不走第三条路，切不可走第四条路。三思啊，叶林同志！ 3. 的的确确您从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您低估了党中央和

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低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威力，低估了群众觉悟，因而犯了错误。但愿您能重新估计形势，作出符合党的利益的行动。

4. 我的革命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这点您已知道。我的确是无限信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唯一的最高指示。我这次之所以敢于无限期绝食下去、力争去中央，正是我坚强的革命意志的反映。我庄严宣告：如果您不准我去中央，我就下决心绝食到死亡。决不会有丝毫的动摇！我对党是赤胆忠心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我自己的一切！望您能在明天内给我答复。越早对您越有利。（我七月四日晚上吃了三两面条后，从未进食、喝水）如果超过明天，事情将难办一些，如果超过后天，就可能不可收拾。

您是老干部了，经验很丰富，您一定能迅速作出最符合党的利益的处理。我耐心地等着。三思啊，再三思！ 祝好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晚七点三十分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蒯大富给叶林的信 叶林同志，您好！ 昨天给您的信收到了吧。我提出的问题，您是怎样考虑的？四条路您到底走哪一条？ 我可能不行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是夜以继日的干！吃饭少了，睡觉少了，也不锻炼，原来的身体棒，大大地削弱了。在绝食以前，我身体本来相当虚弱，绝食已经五十小时了，在昨天和今天被他们从床上硬拖起来辩论四次。搞得我精疲力尽，大有分崩离析之感觉。据我现在自身体会，我大概熬不过明天！因此请您在我还能说话的时候，和我谈一次话。我有很多话要对党中央、毛主席说，要对我的爸爸妈妈说，也有一些对您们说，请您有空千万来，作我死前最后一次谈话吧。如果您太忙，派一个全权代表来，并带一个速记员来，把我的话作为遗书吧。 祝好 时间：今晚七点——八点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下午六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王光美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在反蒯斗争中，工作组将 700 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调查了解情况，曾经到过蒯大富的宿舍与他进行过长谈。王光美却说：“就这么谈一两次活，也不到群众中做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能认为他是革命的？”

在中央文革找蒯大富谈话后不久，王光美就专门找蒯大富班上的其他同学座谈，说蒯大富是错误的，应当批判，煽动这些同学继续“反蒯”。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为了帮助王光美认识错误，曾找王光美谈话，但她极力申辩“反蒯”斗争是做得对的。特别是在七月十三日毛主席刚回到北京的那几天，王光美特别注意抓材料，她亲自组织人整理关于蒯大富的材料，一会儿要写大事记，一会儿要写报告，报告亲自改了又改，有了一个初稿，就马上送给刘少奇看。一面又继续再改，企图证明“反蒯斗争”是正确的，“反干扰”是必要的。王光美并说，在定稿之前，还要送给刘少奇看看再印。

当年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后来说：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推广到全国，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群众，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那肯定也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这个话有些见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工作组召开批判黑帮大会。

此时，蒯大富等人仍遭禁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工作组对蒯大富等人解除禁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左右，王光美回去了，并说她不准备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陈毅对外事口运动的讲话

这次运动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议论。

一．运动已开展一个月了，十九号（五月），中央通知已一个多月了。这运动意义很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是没有的，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敢于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许多问题，是成功的。可以看出牛鬼蛇神不认为头子揪出来了，就不出动了，出动的不少。

文化大革命马、恩、列没有预料到，历史上没有的。斯大林晚年也没有这样做。这么大规模的，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假如斯大林晚年也搞这样一个大革命，彻底革命，就完全可能把赫鲁晓夫揪出来。也有些身居高位，老弱无能了。

这次大革命对每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用火烧一烧，把毛病烧掉。主要干部有了锻炼，群众有了锻炼，思想改造了，这就是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打美国鬼子，内部没有根子，就是打进来，也会很快打出去。要充分估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一种人认为，大敌当前，内部要团结，而毛主席不避讳这个矛盾，而是要充分揭露出来。回避这是虚伪的，消极的，这才是革命的东西。

二、从运动中暴露的情况看，不仅有他们的死党，还有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所以运动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牛鬼蛇神。他们有的钻进党内，钻进机关高校。有的出身地富，有仇恨，对党不满，第一外国语学院的大部分是地富。

三、我们的干部有一部分脱离群众相当严重，官僚主义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群众不满。因此给牛鬼蛇神一些借口，机会可以利用煽动，兴风作浪。有些同志与黑帮并无牵连，就是因为对黑帮五类分子丧失警惕，加上自己身上的灰尘又多。平时领导还不错，反动分子一煽动他就下台了。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干部不脱离群众怎么能这样呢？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不民主。

这三个问题群众不满，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所以要觉察到了立即改正。不要因为运动中被整倒就背起包袱。有的人不是黑帮，要保护过关。但这次过了关，不改，以后还会吃亏。有的人停职反省了，认为吃了亏，就是因为你不能领导运动。所以要多看大字报，多与积极分子谈心，多与群众商量，不要运动一过，万事大吉。

有些单位群众听了牛鬼蛇神的话，对着干部，有的单位造成混乱，这为什么？一个是牛鬼蛇神的煽动，另一个是干部有缺点。

主席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把牛鬼蛇神揪出来，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同时干部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在运动中改进工作作风。

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没打过这个仗。多少年不了解的事，一搞运动，都揭出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仗值得打。通过运动，全党大大提高一步。

从外事口九个单位证明，党，毛主席威信高。党一出来讲话，问题澄清，群众过来了，牛鬼蛇神孤立了，打退了。这是毛主席，全党威望高。如果干部没问题，牛鬼蛇神怎能起来呢？

当前工作：

1、有些单位提出撤销党组，赶工作组。赶工作组无论如何要顶住，有意见可以提，权在上边。怀疑中央负责同志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是反革命的。中

央揪出来的，证明中央伟大正确，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央才能揪出来，下边不了解。

2、对于停职反省和不领导运动的人要和他们谈话，做他们的工作，讲清楚，停职反省不是最后的结论。群众的话讲完了，允许他们答辩。中央可以根据情况做结论。教育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不要甩在一边，要帮助他们。他们只有积极参加运动，听毛主席，中央的话，根据外事口的指示办事，具体地说就是根据上级党派来的代表，工作组的指示，积极检查，消极不行，恐慌不行，煽风点火更不行。对在运动中点了名的要做工作。告诉他们从积极方面对待这个问题。允许申辩，有申辩机会。现在不要申辩，妨碍群众运动。有的不值申辩的，连辩也不要辩了。应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领导运动，用这股压力改造自己，逃避不行。

3、不要整群众，不要整一般干部。这个运动最多只能整科级以上，科级以下只能是牛鬼蛇神。在群众中不要鼓励互相贴大字报。如果要，劝说在小组会上谈。不要压，要说服，一定要贴就贴，要逐步把运动引导到正常化，着手批评科级以上干部，批评在政治上、政策上、思想上、作风上的错误，帮助同志，欢迎他改正错误。只能科级以上的，广大群众就安心了。不能设想，一次运动什么问题都解决。只能达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提高。对群众讲，要帮助领导改正，不是指那些是牛鬼蛇神的。对牛鬼蛇神与一般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不让批评，也不能一批评就得罢官。但牛鬼蛇神就得罢官。但牛鬼蛇神就不分科级以上以下了。

4、在运动中要逮捕、停职反省的要严格控制，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有严重行为，要采取措施，特殊需要做的，要经过报告，经批准，才能做。从上周看，牛鬼蛇神确实有联合行动，目的是制造混乱，混战一场，挑拨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5、现已控制局势的单位（外事口大部分可控制，部分单位还未控制）要跟踪追击，要分析大字报，组织好辩论。大字报要继续写。用大辩论的方式，用层层剥笋的方法，依靠群众，把牛鬼蛇神揪出来。要锻炼群众。如果辩论不下去，停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敌人也搞联合行动。流言蜚语也差不多。工作组不宜多讲话，依靠群众，讲多了他跟你纠缠。大字报已发挥了很大作用。要继续提高。外交部是黑帮可以讨论，什么是黑帮。戴高帽子好得很。要

注意党的政策。可精选一些带有路线性、原则性大字报题目进行辩论。一时辩论不下去，停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组不要代替群众。学习毛著从现在开始，从这里开始，要在运动中学，不要等运动后再订了计划学。

6、外事日常工作还要指定专人负责。运动要搞彻底，搞半年，日常工作要抓，外办自己也要搞。所以八月份外出收回一批搞运动。不能光革人家命，自己也得革命。

（编者按：从陈毅的这个讲话来看，当时，他对文化大革命、对揪出彭、罗、陆、杨还是拥护的。但是，他对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仍然看不清。因此，他说“怀疑中央负责同志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是反革命的。”既然彭、罗、陆、杨揪出来了，处在中央领导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就没有任何责任、就没有任何问题吗？对他们产生怀疑正是路线觉悟提高的表现，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看不清，因此，他说“有些单位提出撤销党组，赶工作组。赶工作组无论如何要顶住，有意见可以提，权在上边。”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作组在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是促进群众运动的开展，还是阻碍群众运动的开展？

根子还在于，在陈毅的思想上，他认为：端出了彭、罗、陆、杨，中央的问题就解决了，以后就是下面各单位“有他们的死党，还有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所以运动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牛鬼蛇神。他们有的钻进党内，钻进机关高校。有的出身地富，有仇恨，对党不满”。虽然，他也在口头上说：“不要整群众，不要整一般干部”“外交部是黑帮可以讨论，什么是黑帮”？但是，在他思想上认为，工作组是部党委派出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部党委，部党委是中央任命的，反对部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主持人）：

中共中央今天约请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内发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大家已经看了党内的五个文件，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就请刘主席同大家谈这个问题。

刘少奇讲话：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因此，应当让我们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负责人，知道一下党内的这个情况。前几天，徐冰同志已经同各位谈了，并将党内的五个文件送各位看了，各位也举行了座谈。今天我就文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况谈一下。

不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个人都是掌握我们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负责人，要害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在党内，在人民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付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人大、政协他也都有负责的位子，并且也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经常参加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公安、政法，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还有统战部）的事务，都归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也提不出。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彭真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反对的、抵抗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运动，是当前伟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彭真是坚决反对的，他极力把运动拉向右边去，拉到与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对城乡四清运动，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实际上也都是反对的。这是这几个人的共同点，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到当前紧要关头，他们就过不去了，他们就不能不出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玩了那么一些小手腕，这从“大事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迫不及待地用非法手段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针。这不是偶然的。这件事情上，暴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彭真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也是很猖獗的，他极力争夺领导权，反对群众的革命运动，包庇坏人坏事，他对主席亲自主持的“二十三条”，表面赞成，实际抵制，他在河北厅的几次讲话，都不是“二十三条”的精神，相反，他是要按照《前线》发刊词办事，以发刊词来领导运动。有人讲，每年要学习一次发刊词，有人讲，工作队队员要人手一册。这个发刊词，是不讲阶级斗争的。这是彭真的纲领，他要以发刊词来代替“二十三条”。华北局派工作队到北京，参加四清运动，都被他赶走了，有的地方，四清搞得好的，北京市委却去翻案，进行打击、报复。因此，北京市多数单位的四清是搞得不好的。当然还要调查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是基本好的，多少是基本不好的，但就现在已经发现的，都证明是坏的。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也不能批评，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彭真领导下，北京违反中央政策，违法乱纪的事是不少的。彭真参加了一些国际反修斗争，我和邓小平同志出去，都带他一道去的，是想在斗争中培养他，但他在多次斗争中，我们亲身看到，都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我们中央写了许多反修文章，是康生主持的班子搞的，文章发表以前，我们看过，也都送彭真看，他也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反修斗争，只有一次是由他负责，当团长，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同去的还有康生、伍修权同志。这是一次激烈的斗争会，那时中央每天都有一个电报指示去，抓得很紧，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但是就是在这次会下，他也是表现得不够坚强的，是比较勉强地去进行斗争的。还有一次，由他带队，代表党中央去参加印尼共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他没有履行党中央讨论的任务，却用了绝大部分时间去拜访印尼政府的负责人、拜访苏加诺，对党的活动不积极参加；他在印尼共马

列主义学院的演说，内容是好的，但那篇东西，是北京草拟好带去的，我也看过（康生：他也是没有提过一点意见），不是他写的。他在同外宾接触中，有多次讲话是丧失立场的，送外宾礼品，外交部是有规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礼品，却超过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表现了北京的特殊地位。我和周总理合送三千，他却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彭真上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他在干部中多次讲，毛主席犯了许多错误。他也反对党内外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各省、市委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中央批发了，到今年年初北京市委才不得不也作出了学习决定的通知。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深入到当前阶段，他就不能不站出来，反对毛主席思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站出来表演，表现自己，顽固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一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

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全国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取得很大成效，工农兵学哲学，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这些文章关在屋子里是写不出的，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也写不出来。陆定一反对工农兵学哲学，杨献珍也反对，他们对工农兵哲学是看不起的，冷嘲热讽，说什么“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等等。陆定一还反对毛主席著作进课堂，教科书上也是不许写的，长期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同彭真一道反对文化大革命，右派写的文章不积压、不审查、也不用批准；对左派的文章就要审查，一审查就没有下文，长期扣压左派写的文章，有的压好几年，打击左派。他们

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陆定一多次同外国人、中国人谈话中都是大反斯大林，不反赫鲁晓夫。这是这个人的特点。斯大林有缺点错误，但重点不应该反对斯大林，而应该反对赫鲁晓夫；陆定一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这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请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搞。他对康生同志搞的反修文章是不提意见的。作为副总理，对文教口却不大管，但副总理是要当的。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了，很难讲。现在还查不清楚。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窃听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邓小平讲：搞窃听器，尽听一些小话，结果是自己上当，大方向要看清楚，不要靠听小话。）我们到外国去，在室内就讲相反的话，真正的话是不那里讲的。历来党内是禁止用窃听器的，杨尚昆在五八年以前，中央开会杨是公开按装录音机录音，后来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窃听器。五九年毛主席发现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还是不听，仍然背着主席搞，我们常委开会、谈话，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我们常委几个人的谈话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给毛主席发现了。搞这事他一个人搞不了，总还要别人来按装，要有人收听，还要放。事情暴露后，毛主席就要严加追查，是谁搞的，就要开除谁的党籍。这时杨尚昆就把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来承担责任，说他自己不知道。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按装的窃听器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是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纲纪的。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后有些会议，要公开录音的，都要经过请示，批准；按窃听器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情况下也一律禁止。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他们的企图不是个人要点什么东西，而是企图

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要按照他们的路线办事，要按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全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就可能实现政变。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变成风吗？亚非拉地区自六零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就是用政变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亚、捷克等也都是政变性质。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不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这次事件的揭露是党和国家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党内发生这类事件不足为奇，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后，党内发生大事件有三次：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次是第三次。历史上也有过。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不发生那才奇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好事。少数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了，可以教育千百万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的加强了。

现在党内外，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为什么要搞，是他们的阶级要他们搞，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到一定时候，就要站出来。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须在党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之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

非斗不可。苏联赫鲁晓夫不搞世界革命，搞和平共处，美国高兴，但是到最后美国还是不会饶过苏联的。帝国主义之间还要打仗，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就会搞得那么好、那么一致，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搞世界革命，世界的反革命就要搞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阶级斗争高潮过去，会有低潮，但以后还会有更大高潮。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一直要到消灭一切阶级，阶级差别也消灭，不然总是没有完，停止不了的。不论你地位高也好，不高也好，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革命的打倒反革命，要么是反革命打倒革命的。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内发生这种事解放后有三次。办法只有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用剥笋政策，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一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历史上造反的事情多得很，修正主义要把中国统一，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结果只会有二个，办法只有剥笋政策，剥不掉，搞修正主义，就应当造反。

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个难问题。从中国的形势看，大概是这样，各民主党派自己来搞政变是不可能的，谈不上的（陈毅同志插话：章伯钧、罗隆基是想搞政变的，但是没有力量），是没有力量，搞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党内有人搞政变，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你们如果同他们搞在一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识别他们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红旗，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邓小平说：赫鲁晓夫也是这样，拥护列宁反对斯大林）。识别他们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是可以识别的，需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

场就是站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阶级的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就可以识别。如果站在某一个阶级的立场上，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场或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就可能看不清，识别不清。特别是迎合你们的某些需要，就会被迷惑更看不清了。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识别那些违反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反党分子的面目。因此，彭、罗、陆、杨事件不是说同各位没有关系，不是说同各党派没有关系，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拥护还是造反，要不要表示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是增加了你们自己的责任。党内发生这个重大事件，各位是很关心的。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有不少党外朋友担心这个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党外的当权派是幕前的少，幕后的多，总起来讲为数不多。有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变，不知不觉地放了一些毒也要批判，进行帮助，不但是重点，对他们还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要改变，但不能太急。在这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只要你不对抗群众运动，在运动中认真考虑问题，可能会改变得快一些；有些人的世界观是固定了，不能改变，只要不是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作为重点人物批判。批判的方式也要考究一些，要采取帮助的态度，团结的态度，善意的态度。如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要批判，但不能同批判邓拓、陆平一样。你们关心文化大革命，恐怕主要就是关心这点：怕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是都一样的批判。可能有些中学生、大学生乱搞一气，但他

们以后也会懂得的。联系到资产阶级权威的问题，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翦伯赞、吴晗是党内的，还有是党外的。党内权威统治了学术部门、统治了一个系的情况，要改一改，不要再垄断的。不论中国和外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旧文化，作为体系是必须彻底攻破；但在这些文化中间，对今天人民斗争有些有益的东西，还应该吸收过来，做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的养料。对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一切旧文化，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不研究就不了解。但是，必须在彻底批判分析后，才能吸收有用的精华。不彻底批判，对为什么要吸收，为什么要扬弃就搞不清楚。同时，必须创造性地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仅仅吸收旧的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有很大的创造。要把旧的吃掉、消化，好的吸收，不好的扬弃。马克思主义就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要在马列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吸收旧文化中有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都要消灭。剥削阶级的文化也要消灭，要吸收有用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搞彻底的革命。当然不是斩断历史，否定一切，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斗争，要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三个差别，同时并进。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就吸收了好的东西，如唱腔，动作，基本功等。芭蕾舞是外国的，是从来不敢动的。中国的两个芭蕾舞就搞的不错，这是开始，是成功的典型，发展前途是无限的，远大的。

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完整的新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同一个体系，是在马列主义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的思想体系还会有发展，还没有完结。马克思死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以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体系。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就是机械唯物论。毛主席亲自经历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比马克思、列宁多得多，斗争激烈多得多，也伟大的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继承了

人类一切先进思想，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有很高的预见，预见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就去世了，没有同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重大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列宁活了五十四岁，在十月革命后六年就死了，他是了不起的天才，也有很高的预见，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但是，列宁也没有经过同毛主席经历的那样的长期的、激烈的，复杂的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超不过的。我们是经过各种事变，胜利，失败，再到胜利，既打国内的敌人，又打国外的敌人，有公开的斗争和密秘的斗争，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现在我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功，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为革命群众所掌握，就化为极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亿万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在改变我国人民群众的面貌，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来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说工农兵不能学理论、哲学，这完全是书生的话。工农兵写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我也写不出，没有丰富的经验，不经过反复实践，是写不出来的。学了而且要用，要经过多次失败，成功，最后才能成功，写出文章，用毛泽东思想解释一切。山西的解悦是个细纱女工，写了一篇哲学文章，这样的文章工农兵喜欢看，我也喜欢看，文化水平不一定高，小学毕业就可以，不识字也可以，文盲的记忆力就很好，我们是把事情记在本子上，他们是记在脑子里。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就有可能尽快地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物质面貌。现在是否可以说，少数人垄断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房子里搞东西，总是要错误百出的。毛主席著作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用工农兵的语言，通俗的语言，写出马列主义高水平的理论著作。毛主席说，马列主义的通俗化是个大问题。通俗化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的文章比较容易看，但是毛主席的通俗化比斯大林更进了一步，把毛主席著作给工人、贫下中农一念，他们一听就懂，不识字也懂，因为是代表他们讲的。（陈毅：毛主席著作没有学生腔。）知识分子故意把文章写的人家不

懂，好象人家一懂就水平不高了，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没有解决。很高的理论水平，又能为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二者的统一，许多人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在全世界普及，但就其规模深度讲，没有象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普遍深入。我们国家的文化、理论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由此再联想到那些讲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人，会认识到应当把他们打倒。这样，要搞修正主义，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企图篡党，篡军，复辟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逞了。因此，这是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根本条件。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已经延期一次了，上半年是开不成了，文化革命搞的大家抽不出时间来，势必要延期。（康生同志：这是全国最大的民主。）改到什么时候开，人大常委可以讨论，是下半年开，还是明年开？可不可以改成不定期？宪法规定一年开一次，有时多开，有时少开，战争来了也可能几个月开一次，有时几年不能开，这个问题请各党派交换意见，什么时候开现在不定，请从大常委决定。（完）

小平：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文化革命才开始，连我们自己也还要经历新的改变，高校招生将用选拔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还要不断的接触新的事变，都会接触到各阶层，要经常引

起内心的斗争和社会斗争，很值得大家研究这些问题。根本观点是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来考虑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

为着纪念中国共产党四十五周年的生日，为着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二十四年前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它不但对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也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它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二十四年的斗争实践证明，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界线，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针对以周扬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

二十四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解放以来，窃据文艺界领导的周扬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顽固地贯彻执行他们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这条黑线的控制和影响下，谬论百出，毒草泛滥，把文艺界搞得乌烟瘴气。他们把文艺变成进攻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正是针对周扬这些人说的。

最近几个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建国十六年来文艺界黑线统治的盖子，把一批又一批的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斗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现在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是十分重要的，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

《讲话》是指南针。它指导我们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辨明方向，鉴别香花和毒草，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

《讲话》是照妖镜。它是彻底摧毁一切牛鬼蛇神的最锐利的武器。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在它的面前，都将原形毕露，无处藏身。

《讲话》是进军号。它号召广大工农兵群众充当主力军，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积极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化，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

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掌握了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战胜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在当代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各个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四篇光辉著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现在我们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伟大著作重新发表，供广大读者学习。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编辑部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向前发展。一批一批的牛鬼蛇神被揭露出来，一个一个的反动堡垒被冲垮。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支持下，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揭露了、推翻了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集团。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充分地暴露出来了。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的重大事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这条黑线的主要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

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实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就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上海市委，公然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们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视作洪水猛兽，运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封锁。他们使用种种卑鄙恶毒的手段，压制和打击一切坚持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包庇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帮分子。在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前北京市委以后，他们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企图牺牲车马，保存主帅。《前线》和《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就是他们玩弄这种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的一个集中表现。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地下的、非法的活动，死守阵地，并且收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材料，准备反扑。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为他们自己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一帮在党内隐藏了很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革命面目，就这样地被识破了。

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北京市委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们几年来一贯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他们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城乡基层的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地、富、反、坏、右。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要“刹车”，并且大搞翻案活动，为地、富、反、坏、右撑腰，打击贫下中农和革命的积极分子，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攻倒算。前北京市委的这条路线，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前北京市委顽固地对抗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他们在文化教育、工业、农业、财贸等各项工作中，都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

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能不陷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泥坑。他们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是很鲜明的。他们在各条战线上，残酷地压制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放手让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这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市党政机关的一些单位和一些部门，实行“和平演变”，使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权，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篡夺。

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实际上力图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独裁。他们对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压制和打击，专横独断，丝毫不讲民主。他们的“民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民主，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民主。他们是一批恶霸，是一批阎罗王。

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非常重视制造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舆论。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散布修正主义毒素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能够掌握的报纸、刊物、广播、书籍、讲坛、文学作品、电影、戏剧等等，大肆放毒，腐蚀和毒害全国人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的。

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所控制的一些学校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服务。他们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资产阶级分子爱护备至，对广大的革命师生进行排斥和打击。在他们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动的顽固堡垒。

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前北京市委一小撮人竭力反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十分仇视毛泽东思想，一听到毛泽东思想就反对，就咒骂，就暴跳如雷。他们对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压制和打击。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做坏事，他们最害怕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暴露自己的原形。他们最害怕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穷的武器，来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

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前北京市委那些主要负责人为了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实行一套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前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采用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等等卑鄙手段，收买拉拢一帮人，结成死党，充当他们的忠实走狗。

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党分子，他们把北京市当成一个“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谁也过问不得，谁也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但他们却要到处伸手。他们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的集团。

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隐藏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挂着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反对毛泽东思想。挂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着反共的勾当。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所干的这一套，同赫鲁晓夫维妙维肖。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被揭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是党的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非常伟大的。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它告诉我们，要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回在文化领域里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领导权，必须首先揭露、批判、斗争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这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复辟反反复辟的斗争，是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意气风发的北京市广大工农兵，广大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战斗的批判的武器。他们正在新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的党团员、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无限地热爱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他们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北京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毛主席的话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在新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彻底肃清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新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一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千百万革命群众，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以雷霆万钧之力，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牛鬼蛇神陷入了广大群众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他们遭到了空前的严重打击。

发动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伟大的创举。

亿万人民群众起来批判旧世界，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特点。

毛主席告诉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革命战争是这样，无产阶级的一切事业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这样。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同样，没有群众运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过去，我们党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战争，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正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今天，我们党进

行触及人的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无论用枪杆子批判旧世界，还是用笔杆子批判旧世界，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群众的革命事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有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阔深入地开展，才能把一切牛鬼蛇神暴露出来，把他们打倒，才能真正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胜利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历史已经证明，广大的革命群众是反动国家机器的埋葬者，是反动社会制度的埋葬者。历史也必将证明，广大的革命群众是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埋葬者。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文化革命的积极性。近几年来，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他们用毛主席著作用得很好。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毛主席著作也用得很好。他们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他们是摧毁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盘踞的思想文化阵地的主力军。如果低估了这一点，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几个月来，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牛鬼蛇神的识别能力最强，他们看得最清，认得最明；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牛鬼蛇神战斗得最好，他们瞄得最准，打得最狠；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最善于进行斗争，最善于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驳斥得体无完肤。

几个月来，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

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的正确领导，就是要善于走群众路线，就是要自始至终把放手发动群众作为运动的根本。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无限力量的源泉。信任群众，

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

是否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岭，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一切修正主义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我们党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只有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放手发动群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那就违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党的领导原则。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全国各地，到处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可以信赖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核心。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在革命中最勇敢、最坚决，他们最善于团结多数，他们能够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他们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我们党必须依靠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坚定的左派。不要受级别、资历、年龄等等错误框框的束缚，把坚定的左派组织起来，作为运动的骨干，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

只有依靠坚定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才能辨明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领导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群众路线是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人民群众是我们一切革命工作的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做好一切工作。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毛主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今天，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是经历了革命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我们党的四十五年的历史，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历史。我们党四十五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我党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总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反动派斗争的新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总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吸取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党、篡军、篡政，而把苏联由社会主义制度引向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严重的、痛苦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

象毛泽东同志经历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的革命领袖，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善于随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总结各种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所以，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唯一正确的指针，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一切反动派的强大的革命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内外各种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从成立以来的长时期中，贯串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红线。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曾经先后同两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重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过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的整风运动，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全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的革命，是比民主革命深刻得无可比拟、广泛得无可比拟的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和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虽然阶级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着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极端仇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国内，被打倒的和正在逐步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拚命挣扎，拚命反抗。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并且同那些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互相勾结，时刻企图实现反革命复辟。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阴谋进攻、破坏、瓦解和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激烈的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

建国十六年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反党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大的斗争，是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这场斗争，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紧要关头。这时，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高岗、饶漱石这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在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再也耐不住了。他们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一九五四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一九五五年党的代表会议上，彻底揭露和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

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大的斗争，是同另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

一九五八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新高潮。这是一个新的大跃进。在这个大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对我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对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极端恐慌，极端仇视，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攻击。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抛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企图用来代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妄想把我国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致奋起，给这个反党集团以坚决回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保卫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保卫了党的团结，保卫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人们看见，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播下的种籽，已经结下丰硕的果实。

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三次大的斗争，是同最近揭发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3))

这一些反党分子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里，窃踞重要职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的活动，比前两次被粉碎的反党集团更隐蔽、更狡猾。他们长期地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假招牌，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勾当。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逐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竭力抵制和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他们所控制的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出版界以及其他文化界的一些重要阵地上，他们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向毛泽东思想、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千方百计地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革命运动，抗拒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手伸得很长，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党、篡军、篡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演出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政变。

他们抓笔杆子，就是要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揭露和粉碎这个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的胜利。这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的大事，是关系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从广义上说，也是关系世界人民命运的大事。

十六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三次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还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我们党每经历一次大斗争，清除一小撮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完全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每经过这样一场斗争，我们的党就更加团结了，更加巩固了，战斗力就更加坚强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梦想从这里面捞取一根稻草，完全是枉费心机。

十六年来我们党内三次大斗争说明：那些反党集团的一切罪恶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反革命政变，为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把他们的罪恶阴谋揭发出来，他们肯定是要对人民下毒手的。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无产阶级江山，人民的江山，就会废于一旦。我国人民就要重新受压迫、受剥削，过牛马的生活。帝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会骑到我们头上，我国就会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我们共产党员，革命的无产阶级，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一定要严正对待。

由于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党，我们完全能够识破和揭露这些反党集团，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够得逞。这些反党分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的阴谋一旦被戳穿，就立即陷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就显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反党集团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样，一提到毛泽东思想就反感，就骂街，就跳起来，就歇斯底里大发作。谁

拥护毛泽东思想，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反对谁、攻击谁，造谣、诬蔑，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特别害怕广大工农兵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他们以“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为罪名，来反对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下禁令、贴封条，就是不让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见面。但是，他们越是禁止，越是封锁，越是反对，广大工农兵越是热爱毛主席著作，越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党四十五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是我们党的命根子。反党野心家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就一定要贬低、歪曲、攻击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为了使我们的党永不变质，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我们就要永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现在是这样，一百年是这样，一千年也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衡量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反革命，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尺度。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死敌，就是人民的死敌，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早在二十一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周恩来同志说：“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干部和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是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其重要的条件，也是克服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本方法。”

林彪同志提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忠实行于党、忠实行于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人民解放军响应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号召，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已经收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的成效。

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宏伟的思想革命运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前普遍化。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在变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几亿人民，有了千百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才能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使我国由社会主义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才能够使我国对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

反革命黑帮分子陆平，对党的生日从来不庆祝，他们只庆祝“一二·九”，这是因为他们对党没有感情，他们仇视党。今天，你们获得了解放，你们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你们隆重庆祝党的生日，这很好，你们要永远庆祝下去！使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最高学府！

你们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你们干的好！你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现在我讲文化革命的个人意见。

（一）文化革命要达到什么目的？

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从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把全国都带动起来了。你们一个月来，除了六月十八日少数坏分子打架外，运动开展是好的，在全国走的最快，取得成果是大的。运动第一阶段，要彻底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要夺权，要革他们的命。你们揪出了陆平、夺了权。以陆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但陆平的毒素很多，他的思想要彻底肃清，还是要经过斗争的。撤他的职容易，要清算他的毒，彻底打倒他，挖掉他的根子，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下一段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陆平，才能清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影响。给他戴高帽、让他低头、这个容易，要清除他们的影响任务就不那么简单。

有的同志认为这一段没有前一段热闹、轰轰烈烈、心里有些急。你们斗陆平，不仅是一个陆平一个人的问题，还有彭真的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搞这样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过去是没有的。意义大得很，要很好地总结。这仅仅是开始。要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必须全校团结起来，把所有愿意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今后的斗争是很细致，很复杂的。可继续贴大字报，每个同学都要控诉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把它搞臭，不管他们打着红旗及红旗的手段多么狡猾、多么阴险，只要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识破他们。他是假革命，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会识破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同他们斗争。全校师生都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在中国没有他们的基础，这就要比前一段更艰巨，更复杂，要分析批判。喊口号是必要的，戴高帽没多大作用。今后运动味道更大，把校内修正主义根子挖掉，农民锄田地里的草快，你们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之草，就不是那么容易。艰巨性，复杂性还在后头，你们要保持顽强斗志，继续前进。

全校那么多大字报，你们要收集起来，编排印出来，发给同学。大字报里线索很多，从大字报来分析，继续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更重要的材料还在后头。要练兵，全校搞批判，各系也搞批判，把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透过现象看本质。

以后，每年都要搞，揭发、分析、批判是打倒敌人的重要一步。群众运动，就是要运动，要运要动，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可交换观点，互相支援，进行革命串连，这很必要，越搞越有味道。把修正主义分子搞掉，把社会主义巩固

起来。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把陆平搞臭，使他低头认罪，把打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让大家起来，贴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支援，我们中宣部也在开展斗争，敌人还在狡辩。运动要从一般大字报揭露，到进一步揭露，不然，就成了表面大字报，等于没有大字报。

学校领导烂掉了，首先要夺权。另一部分领导是官僚主义，群众关系不好，也要引火烧身，使问题解决了，群众信任了，再起来领导。第二阶段，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都打倒，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们解放十几年了，二八年我在北京，不敢进燕京大学，这是一所十分资产阶级化的学校。

在全国解放以前，北京的学生还南下宣传，当时傅作义说：我们让大学生吃大米白面，他们还反对，你们让大学生吃高粱米，他们还拥护你们。当时学生爱国热情高，坚决反对国民党，渴望建立一个新中国。解放后，燕大同北大合起来，组成新北大，但是，资产阶级毒瘤还在。学生在校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下降。我调查了一个学校，关心政治，思想好的，一年级占 8%，二年级占 6%，三年级占 4%，四年级占 2%。工农出身的青年，到大学后，慢慢就变了。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多，想个人成名成家，不劳而获。学翦伯赞那一套，这很引起我们深思。贫下中农、工人供养你们上大学，而资产阶级却把你们当作资产阶级接班人培养，我们不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就对我们国家变颜色起影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有他的思想基础。现在苏联领导人，都是建国初期的大学生，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一小撮特权阶层服务，在他们手下，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葬送了！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学校变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陆定一当了二十一年的宣传部长，还有一个周扬，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思想，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我们就要革他们的命，我们贴他们大字报，就把他们拉下马了。前中宣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修正主义的宣传部。他们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控制学校，怎么会办成社会主义大学呢？现在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旧的没有得到改造，这一次要大革一次，大家起来彻底革命！

我们打倒了前中宣部，陆定一也打倒了，把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者打倒了。高校也改革，广大学生都拥护。我在广东当了十一年省委书记，五年中南局书记，每年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都要作几次动员报告，还有许多人有意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到工农兵中去锻炼。现在把学校搬到农村，你就认为农村有味道了。我们认为，首先要破，立就在其中。而彭真说要先立，这是个反动的理论。我没有出几次国，但我看到一些，还是我们国家好。不破就不能立，长江大桥很好，但不把龟山蛇山破了就建立不起来。一切都是这样，不破就不能立，打倒旧的，才能建立新的。原来，在解放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卑。现在，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感到最光荣，因为世界革命导师毛主席就住在北京！马克思、恩格斯破了亚当、斯密，破了黑格尔；列宁破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毛主席破了很多“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破了赫鲁晓夫，所以，毛主席是世界革命导师，毛泽东思想就特别伟大。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无产阶级思想就立不起来。你们要来接班。有些人说文化革命要消灭知识，这是诬蔑！我们消灭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才能建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过去知识分子高薪制，对他们迷信，哲学家讲哲学，人家越听不懂，他就越高贵！现在劳动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知识，写出了非常好的文章。把高考废除了，劳动人民进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当然，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如果政治表现好，也可以上大学。德、智、体都好，可以选拔。首先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及格了，才能上大学，不搞阶级斗争，就不能升学。现在的学制太长了。麦贤得初中毕业，他能在战场上脑浆流出，还坚持几个小时的战斗，因为他思想上只有消灭敌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世界上任何学校都培养不出来的！我们不要上十几年大学，教学要重新来。翦伯赞再也不能上堂讲课了。翦伯赞不写农民领袖，不给他们地位，而给刘邦、刘秀很高地位。戏都是才子佳人，现在我们要看“红灯记”，看革命戏、革命电影。我们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我们的文化发达了，世界文化得到了发展，没有这个文化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就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同它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有人说，无学无术的人搞有学有术的人。这完全是胡说。我们的学是无产阶级的学，没有资产阶级的学。而陆定一是大学毕业，他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我是小学生，对资产阶级的学术不懂，而毛泽东思想我们懂，而陆定一不懂这一条。毛主席的书是最

好的，资产阶级读不进去。工农兵写的文章很好。文化革命，就是要没有资产阶级的学术的人来搞。读毛主席的书，一切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主席早就提出的，你可以出来放，我们也就可以除掉你。两个敌对的阶级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杀害我们。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也没有他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都有言论自由。历史上所有的阶级统治都是这样。凡是毒草，我们就批判。资产阶级说我们“言不由衷”，“自食其言”，我们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不给他们言论自由。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批判资产阶级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戴高帽，因为戴上高帽，就看不到他的表情，他就会在高帽里边打瞌睡。（全场大笑）只有摆事实，讲道理，才能真正打倒。解放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谁反对他，就要杀头，押进监牢，他们不敢辩论。

在批判中，要注意区别对待。一般有资产阶级思想，说几句错话，是允许的。五八年以来，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有一些错话，也要进行批判，但要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过分析、批评、帮助，达到团结他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总以什么“权威”出现，如翦伯赞有什么权威？他只有反共反人民的“权威”，是资产阶级给他们的权威，革命的人民没有封给他什么权威。她自以为自己是权威，以我看，你还是老实点，有多大本事，就拿出来为人民服务好了，不要拿那么一点知识骑在人民头上，装腔作势。你们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了，学校才能面貌一新，现在的大学，都没有突破资产阶级那一套。

（二）自始至终贯彻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党就是靠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多数人起来了，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放手发动群众是运动搞好的根本。放手了，发动了群众，才能夺资产阶级的权，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才能搞好教学改革。首先要发动左派，依靠他们去团结群众，决不能包办代替。放手发动群众，去团结95%以上的人。反革命是少数，革命者是多数，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这是主流，真正死心踏地跟陆平、彭佩云跑的是少数。我们要分化敌人，只有分化了敌人，把最少数死心踏地的坏蛋们孤立起来，才能彻底消灭它。要正确区分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要对犯有一般错误的人抓住不放，更不要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溜走漏网。原来一些干部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群众关系不好。群众起来了，就要引火烧身，只要他愿意革命，我们要帮助他，批判他，鼓励他革命。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死心踏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三）重点的问题是组织一个好的左派队伍。

依靠坚定的左派队伍，他们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要革命的。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左派要作中间人的工作。他们有受影响的，有上当的，我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就可以孤立极少数的右派。

在我们中宣部，也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派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的问题。

左派的条件是：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这要有实际表现，要历史地看他。运动前你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开始，你就成了马列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要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一贯好的，总是好，一贯不好的，一下子变成左派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是要对革命最坚定，最勇敢。因为他们掌握真理，他们敢于革命。他们冲锋陷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第三个条件是能团结多数同志一道革命，不骄傲，不盛气凌人。他们能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四是能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真正为群众树立样板，不要口头上马列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

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有的同学也反对，但“保皇派”不是他们。有少数人是真保皇派，多数人是好的，可以团结他们。有些同志还可能是组织性很强的同志，上了当，当然应该进行检查，在那个时候他们看不清，不觉悟，现在觉悟了，我们就欢迎他们革命。

不要把保皇派的面划的太宽了。“保皇派”是他本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而挖出了他的主子，他就要保皇；也有的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是保皇派，使他们的阵容不被瓦解，保存阵地，待机而动。保皇派是少数，但是有。

什么是黑帮？黑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或分子。虽然也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但是，只要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叫黑帮。黑帮就是我们的

敌人。黑帮分子是一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始终如此。如果仅仅是在某个阶段，对某个具体的事件有错误，也要批判，帮助他检查、改进。把这些搞清楚了，经过斗争，团结 95% 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四）分化孤立敌人。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集团或个人，只要他彻底交待，我们允许他革命，可以挽救的，就挽救，只要他们彻底划清界线，脱胎换骨，可以挽救他们。对那些死心踏地，死不回头，顽抗到底的黑帮分子。要孤立他们，彻底打倒他，他带着花岗岩脑袋，我们就要搞臭他，打倒他。当然，还不是肉体消灭，还要留下他，废物利用，当反面教员。

最后，我要讲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十分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考虑的余地，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就是反革命。什么是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只要他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如果他们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反对他。党的领导，就是要宣传、交待党的政策，要组织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强大的左派队伍，进行革命斗争。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有些党外的同志比党内的同志表现还好，可以收到文化革命委员会来参加领导。

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团员，我们可以提意见，以后再搞。你们不要把一切党员团员都搞臭了，不能说都是保皇派，你们有几千名党、团员要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向黑帮开火。

有些人想搞我们的枪枝、档案，这是不行的。我们要严防敌人破坏活动，警惕坏人乘机捣乱。

同志们，原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北大犯了错误。我们新中宣部要支持你们革命，要向你们学习。

（此讲话，是根据王武同志记录整理，未经陶铸同志审阅、核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给毛泽东的信

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 40—45%，现在只能完成 35—36%。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 40 万职工的企业，决定以文化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中发 [66] 336 号

目前，全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广大职工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猛烈开火。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正在兴起。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力地促进生产建设高潮的发展。一切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必须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力争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

今年上半年，无论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总的形势都是很好的，各项指标和去年同期比较，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最近时期，一部分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多，设备维修计划完成得不好，某些产品（如钢、钢材、木材和煤炭）的产量开始出现下降的情况，某些基本建设项目的施工进度，也开始出现迟缓的现象，外贸方面开始有所下降。对于这些刚刚露头的问题，各级党委必

须看得见，抓得起，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高温、雨季已经到来，防洪、防汛、防暑工作也急需妥善安排。

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和四清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一致的。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生产建设遭到损害。

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还没有进行四清的单位，可以组织职工群众，集中精力学习主席有关文化革命的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批判《三家村》，批判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的修正主义谬论；本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批判斗争，要和四清运动一起，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已经结束四清运动的单位，确实达到了搞好运动的六项标准的，可以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课工作；没有达到六项标准特别是领导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要重新派工作队去，从文化大革命入手，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所有单位，不论属于上述那一种情况，都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这个通知，也适用于财政贸易基层单位以及医院等。

这个通知下达到各工矿企业、基本建设、财贸、医院的基层党委，必要时可向职工群众口头传达。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

刘少奇：今天谈谈乌兰夫同志的问题。看了华北局工作会议的简报，上面反映的都是些重要问题。今天同乌兰夫同志正式谈谈。

乌兰夫同志同我们很熟了，是很老的同志。中央的各种会议你大都参加了，中央的方针你都知道。内蒙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当然并不知道那样多，情况不十分清楚。比较起来，几个自治区，对内蒙情况了解的多些。

邓小平：对生产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对阶级斗争情况知道得少一些。

刘少奇：中央对你是信任的，你也知道。培养你，让你参加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担负了重要职务，让你当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小平：还有民委主任。

刘少奇：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解放以来，我们历来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义。全国都反对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这些，乌兰夫同志都是知道的。

邓小平：在朝鲜族中也反对过。

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批判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并不比大汉族主义好一些。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是压迫阶级、剥削者；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搞民族主义的必要。

剥削阶级首先剥削本民族的劳动者，汉族、蒙族都是这样的。搞地方民族主义就是代表牧主、富牧利益的。如果不想剥削，搞民族主义干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不分民族，不分国家。这样可不可以？可以。马克思这个口号，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基础上是能团结起来的。不是搞民族主义，而是在反对压迫、剥削的共同基础上团

结起来。阶级斗争是共同的，只要那个国家有剥削阶级，就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压迫者、剥削者总是少数，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多数。所以，毛主席提出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一边。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根本立场问题。

内蒙古也有压迫者、剥削者，他们首先是压迫、剥削本民族，凡是能剥削的都剥削。大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剥削本民族也剥削别人。这是共同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就是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内蒙古就是被压迫者团结起来，靠共产主义吃饭，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民族主义吃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内蒙古的阶级斗争，就没有团结的基础。我们看了你们《实践》的元旦社论，说什么“三个基础”。政治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还搞什么其它“三个基础”？“三个基础”不通，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共同的，难道内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阶级斗争，也有新旧斗争，新旧斗争了也包含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总是赞成旧的，站在旧的方面，提“三个基础”就把方向、阶级模糊起来了，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我们多年来反大汉族主义，现在有还要反，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注意不犯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对蒙族人民、蒙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好处。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反，就害了他们。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搞民族主义有什么饭可吃？吃民族主义饭就站到百分之五那一边去了。汉族中有民族主义，也要注意。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是不在蒙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民族地区，除壮族外，不是你们先进！内蒙条件好，有牧区，有森林，还有包钢。不要以为对国家支援就满足了，认为生产上去了，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

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你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要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

刘少奇：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在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新疆那时也没有划。不是没有阶级，不是不要划。到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划阶级，新疆在土改后就开始划了阶级，有牧主、富牧……。王震同志一到新疆就要划，那当然早些。新疆也是依靠贫苦牧民搞清四清，你们一直没有搞牧区阶级斗争是不对的。牧区并不是不划阶级，不搞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要划阶级。

邓小平：新疆划了，青海划了。搞公社时牧区划不划阶级，你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民委有两派，一派主张划，一派不主张划。你是不主张划的。你的理由是不划阶级也发展了生产。直到去年你还是强调不分、不划阶级能发展生产。其它自治区划了阶级，生产不是更可以发展了吗？划了阶级管的不是更长吗？有的牧主坐上飞机到处逛，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剥削来的！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你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五的人一边，没有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九十五一边，立场错了！

刘少奇：新疆牧主有一部分到城市，一部分在牧区。他们捣乱有办法对付。采取赎买政策，给牧主一点定息。赎买，如果他杀了牲畜，或者叛变了，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

邓小平：牧区不建立贫苦牧民专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永远是个课题。不要以为生产发展了就掩盖了阶级斗争。

刘少奇：生产发展不能掩盖阶级斗争，相反要引起阶级斗争。任何制度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可以使生产迅速发展，大大发展。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四清是搞阶级斗争的，是搞社会主义的。本来各族劳动人民可以在四清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你把四清也搞成民族问题，偷梁换柱，把四清性质和重点根本改变了，是根本错误的。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民族问题，在一定时期有革命性，因为有民族压迫。民族遭到侵略，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时候要团结本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人走了，蒋介石打我们，阶级矛盾就突

出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不明显，突出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如果自己本民族不是受压迫，而是侵略别人，煽动起来赞成他，那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是利用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如德国、日本，终究必然失败。如果本民族不是受压迫不是去煽动侵略别国，内部矛盾就要暴露出来。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内是平等的。成吉思汗时代对外侵略，那时俄罗斯还是部落社会，成吉思汗可以横行一下，但不久就完了。现在即使是希特勒、日本那样的民族主义也不行。没有希望。内蒙也不可能。现在你保卫民族，没有什么人去侵略压迫你们。小的缺点是有的，批评、改正就算了。有大民族主义，中央历来是批评的。

用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代表蒙古地主、牧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你说阶级问题实质是民族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立场，根本错了。反修斗争过去内蒙提出的早，你说搞得还好，中央还通报了。

邓小平：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的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下来了。

刘少奇：新疆要驳苏电台，内蒙电台不反驳外蒙电台。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地富思想。外蒙对我们广播宣传修正主义，我们也要反广播。揭露外蒙修正主义。最近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个地方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中央是马列主义、搞社会主义，地方就不能造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不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四清，不搞阶级斗争。所谓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就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你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毛主席的民族观是什么？就是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共产主义的民族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联合起来的民族观。不是大汉族主义观，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观。你自己在那里篡改歪曲毛主席思想，强调踏出自己的路来。是什么路？自马列主义以来，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的路，就是世界上各民族独立平等互助的路，就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路。

乌兰夫：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刘少奇：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时间很长了。

乌兰夫：在筹备纪念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这个时期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过去没有这样批评过你，批评也许好些。

邓小平：不是去年起，还早。你长期思想是右倾，站在李维汉一边。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五年平叛，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平叛，你都是右倾的。但中央一讲话，你就把话插开好，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中央的观点。其实，你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你同李维汉是一致的。如文字问题，用什么字母，你主张用俄文字，俄文词汇。你说同外蒙把语言文字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零年我们就觉得刘格平思想不对头，一九五三年就觉得你也有些不对头。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能从筹备“二十周年”算起。如果你要说是从筹备“二十周年”开始的，你就根本接触不到问题的本质。

刘少奇：一九三五年《宣言》，当时是有革命作用的，是反蒋反日的。察、绥已经特殊化，外蒙性质也不同。你的民族主义是相当系统的。

乌兰夫：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

邓小平：是啊，没有根，一下子是钻不出来的。

× ×：你是要把内蒙人民引到何处去？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搞你的一套，而且在组织上有布置。你是打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旗帜，还是打乌兰夫、民族主义的旗帜？

邓小平：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刘格平打自己的旗帜，你懂得我是有所指吗？

乌兰夫：我懂得了。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检查时，戴了几顶帽子。大家不满意。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为什么出那么多案件？就是要搞剥削、搞特殊。

乌兰夫：这次要好好挖深。

×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你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急于打自己的旗帜。

邓小平：这次你已经被动了。要你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想你会得到启发，但你只讲了五分钟的话，那么浮浅。性质相当严重了。你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未作交代，未作检查，很不主动。在华北局会议上你又躲躲闪闪，不接触实质问题，越来越被动。

刘少奇：你在中央会议上不采取主动。那是很好的机会。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而你没有。如有，可以替你说话。华北局会议上有一篇好的讲话，也较主动。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雪峰同志找你谈过两次，谈的相当深。现在不能不采取更多一些人来过问。现在是在一百四十多人中，如果拿到群众中去，群众会把你与彭、罗、陆、杨一样看待。你的组织活动相当多，不是一般政治思想问题，而是打出自己的旗帜。这多危险！中国只有毛主席一面旗帜。杨静仁不搞民族特殊，刘格平打了自己的旗帜。赛福鼎比你共产主义多，他站起来做了一个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主动了。你在组织上做了活动。有相当一批力量。现在还有那么些人，要打你的旗帜。“打游击也干。”你们还能打起来？！你搞代常委，呼市夺权，包头市也要夺权。夺谁的权？你的夫人搞的什么事？你那家乡搞的什么事？相当惊人啊！这些事出在别人身上不奇怪，出在乌兰夫同志身上很奇怪，今天向你交底。

刘少奇：在同志中间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干部如何看你？你丧失威信了。

邓小平：再不能搞地下活动了。再搞，搬出来。越搞越糟。老同志嘛，要说老实话。

× ×：不讲老实话，就要身败名裂。

乌兰夫：检查不深刻再检查，过去思想不清楚。

刘少奇：为什么不不清楚？是资产阶级利益迷了你的窍！对形势估计不对，对中央也估计得不对。我们信任你，但你搞这么一套，中央要批判。一个时候，总有那么几个人，一捧就昏头昏脑转向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是站在那一边，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不仅可以在内蒙，而且还可以做全国工作。你的屁股是坐在少数人的一边。中央对你的认识并不坏，当然也不认为你那样坚强。你不应当只看内蒙，共产党人不看全世界怎么行！没有全国的解放，哪有你内蒙古的解放？！怎么可以把功劳记在你自己的账上。哪里有这个道理！干这些

事，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搞不清楚，我们感到奇怪。雪峰同志两年前向中央谈了你 的问题，也向你谈了，那时没有那么注意。今天向你坦白地谈一次。三干会你应该自我批评，谁知你现在又反三干会。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

邓小平：积累那么大一堆问题，相当恶劣了。你要很快转过来。要革命，要下决心，要知道这是相当疼的。

刘少奇：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小团体，小集团要立即解散。你要训斥那些人一顿。向他们说，过去我害了你们，你们也害了我。批评那些打着你的旗帜的人。政治上要彻底检讨。说明阶级根源，代表谁的利益。组织上要采取痛快手段，要有几手。就这样人家还要看。不采取彻底办法，人家不相信。彻底了，人家还要看。要搞痛快的。敢和错误决裂。昭盟副参谋长云成烈的活动，要立即处理。

乌兰夫：代常委已经解散了……。

邓小平：你这个态度不行的，不深挖不行！要搞得疼一点，不要象彭真那样，也不要象蒋南翔那样。

刘少奇：凡是打你的旗帜的人，不是好的，别有用意。

邓小平：奎璧同志你也帮一帮，老同志嘛。

刘少奇：要走在阶级斗争前边，走在反地方民族主义、反修正主义前边，组织上立即采取措施，训斥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真正认真改正错误。就这样人家还要看。

邓小平：一百多人在此，多开几天会，让同志们帮助帮助。把问题解决了。当然，你必须下决心，关键在你。×××、奎璧、刘春同志可以帮助一下。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

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做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

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编者按：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二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办公室主任闻师功的职务。因为孙友渔，没有贯彻中央的方针，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害怕民主，压制民主，拒绝革命同志的批评，打击了革命群众，把锋芒转向革命同学。

六月廿日早六点，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志贴出一张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三点批评，这张大字报是正确的。孙友渔同志没有听取批评，检查自己工作组中的缺点，错误，反而把这些同学和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使这些同学受到委屈，实际上是压制民主，拒绝批评。廿二日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这是正确的。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对这张大字报仍采取不正确的态度，使谭厚兰同志同样受到委屈，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检讨。

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革命的同志，这是非法的，上级指出后仍然没有改。今天我指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有一些同学在孙友渔的蒙蔽下，围攻另一部分同学，这两部分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发生这种不正当的事情，责任不在这些同学身上。还有些同学是受孙友渔错误思想，错误办法的影响，把他们当作党的领导。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责任应由孙友渔来负。我们的工作组不管来的人职位多高，官多大，都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工作组有毛病，都是可以批评的。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拥护，不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反对。我们同学有责任提出意见，甚至罢他的官。即使我们新市委在工作中也常出错误，同学发现了也可以批评指出。孙友渔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中央很关心文化大革命，也关心师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十三号知道后就找师大工作组主要负责同志去汇报，汇报后指出了他的错误。回来后孙友渔思想搞不通，不肯承认错误，没有执行中央指示，一直到现在对一些同学的压迫还没有解除，这就是错上加错。过去，市委也曾对孙友渔的这些做法提出了意见，六月二十八日找孙友渔谈过话，指出问题所在，提出了市委的意见。孙友渔表面接受，实际上并不传达下去，按新市委的指示把这件事办好，而且还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用工作组名义给市委及康生同志写信，其他一些工作组员都不知道。根据以上理由，决定撤除孙友渔工作组组长职务，决定刘作级为工作组党委书记兼组长。

总之，市委是坚决支持同学革命的。让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因贴大字报而受压迫的同学解放出来，把受孙友渔错误思想影响的同学解放出来。让我们两部分同学携起手来，向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同学们！我们一定能取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编者按：这是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预下，由北京新市委出面因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而撤销工作组长职务的第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指示

那几个人怎么样？（指陈永康，何方方等）姓牛的学生是他们的后台吗？陈，何他们能承认吗？你们没有打他们吧？现在都在学校吗？（工作组：陈，何等人

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德龙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给他家讲：不到学校来，我们没办法，这是你们家里的事，我们不管，你们家负责好了，可以不要来了。假若真来了，也还可以。青年人嘛，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

你们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特别是对学生，不要压制自由。他们要反就让他们反嘛，要大胆放手采取宽大政策。只要改就行嘛，只要心里改，就可以了。否则口里要改，心里不改，还是改不掉。

这些人高三毕业了，还得留在你们学校，就交给你们了。反动的，留给你们去改造。他们不能到大学去，到农村又不愿干，留在家里遛达在马路上，不是乱搞没人管嘛。他们有三条路：一个是下乡，一个是在家还留在马路上，一个就是留在你们学校。

你们没有定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吧？（工作组：我们宣布他是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还可以给他们说，只要你不要再反，就可以了，给他们留个出路嘛。

工作组，团委不要讲人家是反革命，同学们可以讲，可以骂，我们不能。他们能骂勾德元是黑帮，为什么我们不能骂他是黑帮？不要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戴帽子还要经过法律手续嘛。青年人不戴帽子为好，再看看他们嘛。以后可能还要闹的，以后就不怕了。上次搞得你们措手不及呀。现在，你们有经验了，群众也有经验了嘛，争取多数群众，使他们孤立起来。最后让他们再闹嘛，再闹，可以教育群众，这是好事嘛。教师有没有参加他们的？（工作组答：没查出来。）这些假左派是真右派。

革命委员会可以加进来一、二个教师，进来会有争论，这好嘛，你们不要怕。左派有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真正的左派，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可以了。不过左派要团结多数，一不团结，百分之三十就要孤立了，右派力量就大了。右派不会多，百分之几的右派势必是有的，不过有些人你们还没发现，右派有百分之五，这很好嘛。这样中间派有百分之六十多，中间派是大多数，这是合乎情理的，中间派是要变化的，右派也是要分化的。

没有武器就不能斗嘛，要准备发言呀。初中可以组织他们学毛主席著作嘛，可以学习乙种本，没有事的就组织他们学嘛。

初一的大多数愿意放假，就放。初二、初三的要在学校闹，就让他们闹嘛。可以派几个好教师去，派高中左派学生去，一个不行，派两三个嘛。对初中学生不要让他们广泛讨论划分左中右，可以组织学乙种本，看谁学得好，看谁用得好。

现在读乙种本，可以学到政治，学到语文，要学了就做。不要按着顺序学，可以选着学，先学老三篇，还可以学些语录。可以组织他们开些会，但不要开得太多。

初中学生闹到什么时候才散呢？等到大多数都要求放假了，就放。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放手让他们干，但不能自流，自流也不太好。

初中学生学毛选能学下去吗？（答：可以学，就是念一遍，大家讨论一下，不好深入。）念一遍没有用，要念上多少遍，学了还得用。

高中学得怎么样？高中就应该带着问题学，根据你们学校的情况带着斗刘超的问题，带着斗假左派的问题来学，要好好地抓。

你们（对在座的几个学生）一个多月学到的东西多不多？（答：学的东西很多。）一个多月等于多少年。让你们闹半年好不好？半年以后再上课。

初中还要上课，九月一日上课，你们看行不行，你们有准备没有？初中下半年不上课，对小孩子不利，没有好处。

将来还要招生，还要毕业，怎么安排，你们要考虑了，如果九月一日上课不行，就拖到十月。到十月可以了，就那么几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还是那么几个问题，再讨论就没有味道了。你们要考虑考虑。

昨天发了通知：招收新生，要选政治上好，学习上好，身体上也好的。三好才能升学。第一条是政治好，再加上学习也好，身体也好。学习好要放在第二。政治上不好不能升学，这是一种压力，这也是一种动力。政治上不好，就要去好好学毛选嘛。政治上反动，政治很坏，功课再好也不能升学，宁可要政治上较好，学习上不好的。政治反动，功课就是五分，也不能升学，肯定的不能升学。政治上不很反动，学习上好的可以考虑。

小学问题不大，一般都可以升学。初中进高中，小部分可以升学，大部分不能升。要回去算一算。大部分要回乡，这是很大的动力。全区要算一算，恐怕一

大半不能升。不能升学怎么办？不升学，又不愿下乡的人，各种学校都不要收，一个也不要，明年还不要收，不准收，这回要宣布。这回可以从已经下乡的青年中招一批，这就是说非要下乡不可嘛。去年，前年没考上高中的一个也不要，包括干部子女。这个事你们要安排一下。这个问题一宣布，初三左派就会多起来了，这有个压力。

初中准备下半年开学，招生，要准备教员。给学生讲清楚，不会没有教员的，教员是有的。高中毕业生中，好的，可以抽出来教书。

斗刘超，可以先搞背靠背的批判斗争。先在班上练习嘛。先在班上练，然后再在年级里练，看哪个讲的最好，然后选那么几个。这可以出人材嘛，我们要搞集体创作嘛。这次斗刘超，发言要争取比上次更好（指同假左派的辩论），要多练几次。练习中，也可以让刘超参加几个班级嘛。一定不能在斗刘超大会上讲不下去。讲话的不是个人意见，可以是班级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出来，再讲给群众听，这样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教员。

要求大家很好调查研究，充分准备，才能讲出好话，才能有教育意义。学生讲得好，工作队可以不讲，同意学生意见就可以了，有讲不全的，可以补充一下。要事先准备好，没有练习不行。

斗刘超，要积极把教师工作做好，多数学生去准备刘超的材料，少数人可以做教师工作。

多练习几次，不练习好不开会。越搞越有水平就好，不要越搞越不行，批判斗争刘超，是要教育大家，教育对象是学生和教职员。

黑帮里的，也不要个个都那么恨他，他们中间还有能用的。如四清运动中的贪污犯，这样的人转变过来很有用，他们去挖贪污犯，比我们还有办法。

要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反革命分子是消极因素，黑帮分子是消极因素，可不可以变为积极因素呢，变了有利于人民。

教师工作没做完，要争取多数，实在不好的，历来反动，教书也没本事，原来是三青团，伪军官的要清理。工人中也有不好的，都要清理一下。逃亡地主跑到城市来的，有的还搞不清。教师中要清理的恐怕不多，搞太多了也不利。对于那些可以教育改造的，教书还比较好的，还可以用嘛。

老教师，教了几十年书，这种人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这些人没出路，批判一下，还要他教书。他不改，还散毒素，那你们也不要怕，可以批判嘛，自然科学他们可以教。政治教员和辅导员就一定要政治好的。语文教员也要有政治观点的，历史，地理也要政治好的。至于教物理，化学，数学的，可以看，用他对我们有利，还是不用对我们有利？撵走对他不利，对人民也不利。政治可以和语文课结合，就是历史课有问题，不学也不行，要有政治观点才能教。地理倒可以教。

教师工作相当多，要争取多数，老教师批判一下，还可以教几年书，过几年再退休嘛。还能教几年的不要轰走了，让他走到哪里去呢？还是要吃饭的，又不能饿死他。他们教书还要放毒，放毒你们就消毒嘛，随时放随时消，你们有经验了嘛。

教职员里还会几个人（指不能再教书的人），这种人不多了，这几个人怎么办呢？赶走？！赶走你们就轻松了？赶到哪儿去呢？还是留给你们，在你们那里吃饭，放在你们那里改造。就是法院判了几年刑，也还放在你们那儿改造。这些人又不能杀头，不杀头就要吃饭，如果他要杀人放火，就抓起来，其余的一律留学校。他们就是不老实，也不杀人，也不放火，就是放毒，你抓不住，不能杀，这就是个大麻烦。这是有困难，但是要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这就是左派的责任。什么叫无产阶级左派，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你们不是无产阶级左派吗？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解放全人类吗？所谓全人类就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些人不多，这些人不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也就不能最后解放。

无论资本家也好，地主也好……有一小部分杀了头，还有一小部分坐了牢，大部分不能抓，也不能杀。他们还有子女，你杀了他的爸爸，杀了他的父母，他就有对抗情绪，没有对抗情绪的很少。所以杀了头，问题也没最后解决。解放全人类也包括这些反动派，他们也解放。他们不解放，无产阶级也不放心，还只能说无产阶级占优势。你们的斗争进行的很激烈，实际是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解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了生产力……做了许多大事嘛……能不能把阶级斗争停下来？不行，你不斗，他要斗。坏分子只占百分之几，可是造反的能量大得很。七个人就要把你勾德元赶走嘛。你们几乎站不住脚，所以阶级斗争不能停，

要一直斗下去，斗个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为止。你停他不停，你不注意他注意，他天天在那里斗。所以我们不能不斗，我们不注意阶级斗争，就是让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斗，势必就会搞成资本主义复辟。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就可以争取过来，团结过来，那百分之五的，让他留在社会上问题不大。

对三类也是大部分争取，对四类也要争取起义。老教师批判一下还可以让他教书嘛，只有几个不能教书，留在学校给他事做。

下半年初中要上课，初中高中要招生。初中毕业不必考那么多，这可以根据情况做结论嘛。不要照过去那个格式，什么毕业考试啦，什么招生啦，等等。

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把学校经济清理一下嘛，没有贪污分子？我就不相信，查一查。一个学生每年花了多少钱，了解了解嘛，你们现在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以后的经济要向学生公布，要制定一套财务制度，要节约，教师学生都要节约。

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这恐怕搞不完，开始了就好。教学改革怎么搞？没考虑过？中学六年就是净读书，没别的事。小学读六年，中学也读六年，结果什么事也不懂。不会做工，不会务农，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当服务员……这个制度还是老制度，解放以后也改了改。说是改，实际上没有改。高中毕业就那么聪明？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地。高中毕业只有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工人，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服务员。到底是教好了，还是教坏了？这事国家要负责任，教育要负责任，领导的人要负责任。你们是高三的学生了，你们会做工吗？你会种地吗？你会做生意吗？扫马路呢，扫马路学过几天还可以。搞阶级斗争这次才开始学。既不会搞阶级斗争，又不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读这么多年书，实际是不聪明的。

你们的知识，实际上没有工人多，没有农民多，没什么可骄傲的。考上大学又是五年，大学毕业什么也不会，还得重新学，医科大学毕业的不能看病，要实习几年才能看。护士学校出来好一些。护士不能当医生，医生又不会当护士，这怎么行？用什么办法改？这个问题是个困难问题。我们国家的事，没那么容易，

不是一喊就能搞好的。这个问题先不要在群众中讨论了，领导的人要慢慢想这个问题。

这次文化革命不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那就不好了。要彻底改革，反对的人一定多。首先教员反对，因为学生劳动，教员也要劳动，恐怕是这样的。怎么安排呢？可以和工厂挂钩，让他们让出两小时来。听北京市委的万里讲，北京工人有八十万，学校，机关中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是八十万，一半一半。那八十万做工，那八十万读书或办公，这就不好。如果这八十万，拿一半时间去劳动，八小时工作就可改成六小时工作。如果能真正行得通，工人一定会欢迎你们。绝大多数人能读书了，你们跟工人，农民结合起来了，这样工人、农民、学生（包括家属）的面貌，就可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

你们可以学做饭、买油、买菜，晓得怎么买法。大师傅相当累，让他们也读书，大师傅会很喜欢你们。当然有读的好，有读不好的，你们不也是这样吗？反对我们的人也得想一想，就可以使他们不反对了嘛。这些问题都是设想，现在也没有办法，你们大家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还可以考虑把学校分成两部分，把一半或一小半搬到乡村去。搬去一半就不错了，搬到北京附近的乡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教师在这里上完课，再到那里上课。在这里上两天，再坐上火车到那里上两天。到农村去，学生就要劳动，那里劳动的门路就多了。可以跟农民结合，或者到山区开一些荒，最好和农民一道种地。没有房子怎么办？到那里去自己盖，农村盖房子简单，有土和木头就可以了。看看这样行不行。这样子一年可能办不到，准备一两年。在那里半年或者大半年读书，同时学习庄稼是怎么种的。那里有阶级斗争，还可受到阶级斗争锻炼。只要你们认真劳动，又能虚心学习，农民就欢迎你们。你们不认真劳动，态度又不好，农民就不欢迎你们了。

搬一半到农村去了，不是就空出一半房子了吗？就开工厂，安机器。再有一部分同学可以搞服务行业，扫马路，当营业员。有一时期不是要背粪桶吗？可以背背粪桶。商店忙的时候，你们去搞几个钟头就好了。电车上去卖票也好，人大会堂不是有服务员吗？还有些人可以跟工厂挂钩。首先可以搞学校里的服务行业，自己做饭嘛，读书读了十二年，不会烧饭，烧菜，让你们烧就都吃生饭。校工的工作让学生做，就不要请校工了嘛。一出门就有马路，商店，电车，不是什

么事都有干的了吗？一天里有三、四个钟头，你们去劳动，服务员就可以有三、四个钟头学习，这不是很好吗？你们懂得了如何作许多工作，他们又读书了，可以快点提高嘛。

我看卖票的都是些年轻人，至少是小学毕业，要让他们读点书嘛，你们就专门读书，他们就专门工作，这不好。让他们也读点书嘛，就许你们读？什么事都做，有好处嘛，这不是现在考虑的问题，斗了黑帮，“权威”之后，清了经济之后，要搞教改，才能解决这问题。你们是师大附中，要跟师大商量好，师大附中是实验性质的，你们不搞新学制，不搞教改，哪里搞？你说，你不搬出去一部分，办工厂就得重新盖房子。一部分当工人，一部分当农民，一天有三、四个钟头上课，三、四个钟头劳动，两个钟头自修，这样对青年最好，对体力，脑力都好。马克思讲过脑力体力轮流休息。文化革命后期，要搞这个。讲起来大家都赞成，消灭三大差别谁不赞成？实际做起来，不赞成的就多了。家里有不赞成的，教师里也有不赞成的，学生里也有不赞成的。这也是阶级斗争嘛，这是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斗争。

这样学六年，虽然一天只几小时，出来就可以当工人了。晓得怎么开拖拉机，怎么种地，怎么做生意，知识就是多方面的了。神经衰弱，近视眼就没有了。不要你做八小时工作，而只是三、四小时，要认真做，努力做，当一个普通劳动者。这样毕业以后，可以升大学，不升学可以当工人，当农民。高中毕业以后，不当工人，农民，当干部行不行？当干部也行，搞阶级斗争嘛，这总比读十二年书，什么也不会强的多。如果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推广开来，全日制中学就不吃香了，全日制学校的毕业生就不能升大学了。现在要实验一下，没有经验嘛，几千年没有搞过，中国没有搞过，外国也没有搞过。你们搞个经验给我，有些什么问题和经验，怎么改法，还要和各方面协作，你们区委跟各方面讲通了，城市里就好办了。农村还不那么好办。你们师范大学就是研究教育的，你们不实验，什么地方实验？首先让几个学校搞。不搞试点不能推广。首先在

师大几个附中试验，你们受师大领导，要和师大讲通。

你们在运动中基本上站住脚了，这时候要小心，要听学生的意见。学生可能出大字报，有的意见对，不管哪派提的，凡是讲得对的，你就接受。你也得改，要不然还是站不住脚。犯了错误，还是要赶你们的。真是那样，我也保不住你们。

(有人提出要派工作组兼任支部书记，恢复党组织问题时)可以派工作组同志兼支部书记，召开党员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吸收非党员教师和学生参加。我不是党员就不能开你们的会？可以参加嘛，参加会就有发言权。不许三十几个党员单独开会，开秘密会干什么，参加会的群众，至少要为党员人数的一倍，至少一个看一个。为什么怕恢复党的活动呢？要立即恢复。参加会的这些人有发言权，支部会讨论什么问题，要让群众知道，搞秘密活动是不行的，只许公开，不许秘密，这就不怕了。做个错误决定也好，大家可以反对嘛。支委开会也不许开秘密的。

团委开会也要吸收非团委委员参加，不能搞秘密活动。学校里没有党组织，不是很正常的。到底什么人好，什么人不好，可以从开会看出来。属于争取的人，也让参加。就是刘超参加，那也好嘛。就用这个办法，不是怕他搞秘密活动吗？团委，支委也找点非团员参加，就是不许乱搞，这样大家就放心了，你们通不通啊？同意不同意？那你们很好通啊。允许人家没想到办法嘛！你不是也没有想到办法吗？有人主张斗完刘超再恢复支部活动，这不好嘛。没有支部书记应该工作组派人去干。只要有一条，不是开秘密会就不怕了。以后可以这样，可以经常这样，这样他就难做坏事了。支委会也要吸收非党员参加，不然他们也会做坏事的。

别的学校，工作组强的也可以成立临时支委员会，也可以这样做嘛。

* * *

(刘少奇问到区里工作怎样，区里汇报了工作，提到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后，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清思想，同时清经济。)清政治就是清思想，思想是贯穿整个运动的，斗陈永康是清思想嘛，斗刘超也是清思想嘛，清经济也要清思想。

(讲到恢复党团组织问题)开几次党员会，自己批评，自己整风嘛！

(有些工作组不强，抓不起来)教职员比较复杂，你们斗不过他，他们斗争经验多，社会经验多，你们斗不赢他，斗不赢只好打败仗。

(三级干部会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主要解决领导核心的问题？)领导核心，主要是教职员的问题。教员在这里交待，大部分教员可以在这里交待。左派在这里提意见，听了教员的交待再回去报告嘛。学生里大部分背靠背，一部分面对面，两边通消息。教员里多数人可以解放，可以分几批解放。大多数要解放，最后留下一批不能解放的。要拿回去斗的，也先在这里斗。老教员也在那里批判一下，

把教职员的问题解决。谁是不能回去的，谁是回去也不能教书的，谁是还能用，但是问题多的，可以向学生先讲清楚。不鼓掌嘛，你可以做工作，以后再看表现，这也是个压力，学生看着你嘛。人哪能一下就做结论，你们年轻人经验少。看他几个月，几年，不好再斗，好就留下嘛。

学校里要开斗争会，工作组不强的，上级可以派人去领导嘛。主要是解决教职员问题。学校里要留工作组的人。不能都集中。多数群众还在学校嘛。好的教师也要和同学见面，好的教员也要来开会，教员里也会分化嘛。支部会也在那里开，支部改组也在那里改组。

教师，他不怕工作组，也不怕教师，就怕学生。学生一鼓掌就高兴了，就高兴得不得了。搞一个月压力很大，没有压力不行。有了这个压力还不赶快加劲，没了压力就不好办了，压力太大也不行，太大就压扁了。这个压力已经保持一个月了，再保持一个月，大部分教师就要解放。对教师要宽大处理，要从宽，一、二、三类都要从宽。当然仅仅从宽也不行，还要有从严的。不然三类不会低头。刘超当校长不行了，支部书记呢？搞一个从严的，开除党籍，三级干部会上，要拿出一个从宽的，一个从严的，你走这条路，他走那条路，大家就要想一想了。好的解放一批回去，还可以有一部分参加斗三、四类，他们可以回去宣传，争取多数。假若三类都从宽，他们是不会改的，搞一个从严的就会改，只有宽，没有严，也就没有宽，好的坏的都从严就没有宽，也没有严了嘛。没有宽就没有严，没有严就没有宽，主要是从宽，多数人从宽，极少数从严。

（有人说：有教师去检查，不深刻，不老实，被轰出来了。）轰出来这好嘛，这就是从严。这是个细致工作，做思想工作。开三干会集中起来，二个星期，二十天就搞个差不多。他们吃了饭没事嘛，光开会，两礼拜，时间就相当多了，还可以休息一天。如果两个礼拜不够，可以搞二十天嘛。最好两个礼拜把大多数解放。然后还可以搞第二批。可以开大会，开小会，还可以分组开会，两个礼拜到二十天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剩下少数人也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一批，两批就解决了。解决了第一批，就有经验了。没有经验就很难办。

（编者按：这时，刘少奇仍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反右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伯达康生等关于北京广播学院文化革命的谈话

北京广播学院从七月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对“一切权利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提法，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接见了丁莱夫和工作组组长李哲夫、王殿举。

康生开门见山问：广播学院是一派学生同另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还是工作组同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你们这里有些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口号对不对？是不是反党的？

李哲夫、王殿说：新市委和国务院有人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康老问：“国务院是谁答复的？新市委是谁答复的？”

康生问：现被围的是什么人？工作组站在哪一边？

李、王说：被围的人，多数是首先发动进攻党委的人，工作组站在多数派一边。

康生生气地说：“过去左派，现被当成反党的！”

丁莱夫解释：“这个问题我表示过两次意见……”

陈伯达说：“这样一个办法好吗？一部分群众围攻一部分群众不好。这样如何搞大辩论。要走上轨道，脑子放灵些。不对的话可以收回。组织群众打击一部分群众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正常的！对外文委二十九个积极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到处说是中央谈的，假盗中央名义。”

康生说：“你们回去立刻出一个大字报，说明你们工作组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给我们贴大字报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陈伯达重复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是错误的。要保护少数。”

康生说：保护左派。工作组有权保护他们。

陈伯达说：“对群众什么态度，是根本的立场问题。群众中多数、少数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要以势压人，专横武断。工作组一定正确？就不能提一点意见？群众就不能说一句错话？工作组首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一去就武断，这如何能搞好运动呢？首先听听群众的意见。我们是学生，我们要重新学习。”“你们随便开刀可不成。不要认为多数拥护就正确。不要拿工作组到处压人，组织一部分群众，打另一部分群众，要解围。工作组要声明是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组。回去宣布：向群众学习。”“这个问题上（指广播学院关于一切权

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辩论），你们有错误。你们要承认。共产党毛主席开始也是少数，正确的有时可能是少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列宁提出来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写进毛选的。”

康生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谁说是反动的口号？”

丁莱夫说：“是张彦说的。”

康生说：“你们为什么对张彦那么感兴趣？他是犯了错误撤了职的。”

陈伯达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说这是反革命口号。这是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出来的。文革小组权力，就是帮助群众嘛！党领导革命委员会，党组织要经过运动考验，要受群众监督，不能骑在人民头上。”“工作组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工作组不能不让人怀疑。不能自己封，要人家封。自己也要声明，领导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工作组的错误，就是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派头大极了，说几句话也不行。说一点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不对。党信任群众，工作组不相信群众。现在打的都是反革命？是否这样多？……广播学院有那么多？防止中了敌人的反间计，造成混乱。”“现在许多工作组不会领导，不把自己当成劳动者。”

康生说：“你们要解围，不能再打击报复！丁莱夫，不罢你们的官，就要犯错误。过去你们给戴的高帽子都不算！所有过去戴的帽子都不算！不得再斗，不能受监视。如果有监视，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工作组要表明态度，不要在群众中搞阴谋。你们有上方宝剑，所有被监视围攻的一律释放。要向全体同志宣布，不许监视，不许盯梢，如果这样就是犯法的。不要对这些人实行专政。不管是谁这样办，工作组要坚决反对！你们工作组在群众中有反感的，要公开撤掉。”

陈伯达说：“回去出安民告示，说工作组是广播局党委派来的。来此学习的，同群众在一起，坚决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有苗头，有些工作组有意无意地领导学生斗学生，所谓排除干扰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重要问题是打击目标对不对。（广播学院）第一批起来闹革命的，受到围攻，受到打击。他们可能有错，个别人也可能别有用心，这一大批人遭受打击，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一派学生对那一派学生的斗争，实质是工作组直接或间接去领导斗争。你们工作组矛头是打击了第一批革命的人。”

陈伯达说：“广播学院与某些学院情况有相同的。运动开展得很猛。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准备。对中央方针政策了解很差，5月16日《通知》，有必要很好地学习。从四清立即到学校，不懂得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只有向毛主席著作学习。学习毛主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工作组要考虑一下，已处在什么地位。副局长、政治部主任（指李哲夫）去广播学院，站在这样一个地位，非犯错误不可。张彦他不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所以犯错误被撤职。”“这次你们运动主人是谁？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这一千四百余人（指广院同学）有什么权力，他们欢迎你们去，很热烈地欢迎。工作组考虑没有，在一定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们，让你们滚蛋！这个权力归他们，不归你们。人大常委委员长可以罢，你组长副组长就不可以罢吗？！”“群众有权对工作组批评，大鸣大放嘛。大字报说得不对，仍有权批评你，监督你。党领导群众，又受群众监督。工作组进入学校，要经党和群众教育工作组组员。要承认群众有此权力。”“另外，学生斗学生，大、中学都发生。形式上是学生斗学生，实际是工作组同一部分学生结合起来，斗另一部分起来的学生。结果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了。不少地方如此，你们广播学院就是一个。……”

最后，陈伯达、康生给丁莱夫和广播学院工作组下达三点指示：

（一）“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不是反革命的。他们（指广院革命群众）这样提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前发展，不能说一提这口号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二）广播学院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应该的，不是反动的。这样对革命是有利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不是不要党。

（三）一切高帽子取消。说明我们（指中央文革）认为那个方法是不对的。要停止那样围攻、监视、盯梢，一律取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不对的。

陈伯达说：“丁莱夫还企图替自己辩解。一百余人斗争一人，还不残酷？！哪怕反革命也不能用此方法，这不是对反革命的办法。发生这些事情，还不知道，或知道很晚，这是失职。”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毅、陈伯达、康生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陈毅讲话：

同志们：

一、文委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多月了，现在正式宣布李昌同志停职反省，这是代表中央做出的决定，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三月份李昌出国，在运动开始时李昌还在国外。我们打电报要他回来参加文委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文委的干部和群众要求李昌同志作检讨，也贴了不少大字报，有的同志是直接反映的。工作组同志把意见反馈到中央和外办。我们考虑李昌这样的老党员、老干部，本应敢于引火烧身，希望他引火烧身，尽管问题很多没马上停职反省，但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中央决定的，不是我个人的决定。

李昌同志，家是大地主。有两千多顷地，有血债。他母亲是个血债累累的地主婆，他通过湖南省委某人包庇了这些，丧失了立场，相当严重。我们考虑李昌同志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关系。在领导文委运动中有严重错误。他领导文委这段运动有没有毛泽东思想呢？他的外交路线是否合乎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呢？要考虑这个问题。是我的建议，中央批准的。不包庇的，群众有意见我同意的。作检讨由领导决定。要检讨需要时间。不是群众要斗就斗，不然党的领导到哪里去了？群众有群众的看法，党有党的看法。贴大字报不能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贴两张大字报就定案是不对的，我们完全要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李昌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我不想多讲，我不划框框。我向群众学习。希望你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二、宣布杨纯同志调回北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如果大家认为不合适，在文委参加一段运动也可以。看看大家的意见，这是得到中央同意的，现在有很多说法，李昌迟迟不停职反省；杨纯有人包庇。主要是慎重起见，没有谁包庇，谁也包庇不了。杨纯跟彭真、刘仁的关系要作深刻检查。不能隐瞒。我们不搞逼、供、信。对李昌同志问题和杨纯同志问题都要摆事实讲道理。29号回来发现张彦问题，考虑是否把杨纯调回北医，当时没决定，但要看大家意见。

三、宣布把张彦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外办。这是中央同意的。派工作组是我决定的，是合法的，中央点头的。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撤回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中央同意，我也同意，这是经过多次慎重考虑的。我们不是一般的群众、干部，什么问题都可以贴大字报。中央依靠群众，把群众意见经过研究作出决定。我是中央工作人员，也是国务院工作人员，要不我就自由了。我以

普通党员的身份来投入斗争，来贴大字报。现在我一张也没有贴。我赞同贴大字报。文委、外办、外交部的大字报总的是好的，是代表革命意志的。外事口有两万多人，贴了十六万张大字报，代表伟大的革命热情。把工作中严重问题揭露了，我们欢迎。张彦同志没经中央同意宣布文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有 29 人是反革命事件的骨干。这同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不符合。应由群众揭发，不要打击。我宣布：（1）张彦同志的宣布一概取消，文委没有反革命事件。（2）没经外办和我的同意宣布 29 人是反革命骨干，是错误的。没有反革命事件也没有反革命骨干。工作组我个人不能随便派也不能随便撤。主要是这两条，还有其它错误：（1）违反中央文化大革命指示；（2）压制群众革命运动。

有人提陈总怎么没有责任？张彦以我的名义，扛着我的大旗，都没得到我的同意。张彦同志有以上两大错误，搞政治迫害、逼、供、信，都没跟我讲。28 日开斗争会也没得到我的同意。有人对我提出怀疑我不见怪，我在这里不作辩护和回答。我在全国各地讲了 30 多次话，是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心中有数。象我这样一个党的负责干部，群众能给提意见是件好事。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才能做到。美帝国主义办不到。修正主义也办不到。我不是发火，是喜欢动感情。我今年六十五岁，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感到光荣。有人不是这样，要人说好话，这不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真金不怕火炼。外交部贴了五十多张大字报，我一字不改地交给中央审查。远的不说，我是一九五八年到外交部工作的。在工作中，在部分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大家提的意见有几张很有帮助，有几张我不同意。说外交部是反革命我不同意。说我们有路线错误我也不同意。有人说你在这里为自己辩护，那么你们也可以贴大字报。外交部还没有贴到我最主要的错误，今天不讲，在适当的场合作自我批评。作为中央委员、外交部长任意地泄漏中央机密这是犯错误的。

有人说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你去陪外宾。我是请示周总理的。1958 年周总理曾说过：外交部授权有限，重大问题要请示。尼伯尔王太子是我和周总理请的。他是尼伯尔的接班人，未来的国王。以我的名义请不好。决定周总理请我接待。后来总理不在，由我陪他到鞍钢，他很高兴。我走时交代：（1）9 个外事口要放。提高大字报质量，揭工作中错误，肃清彭、罗、陆、杨的影响。工作中有缺点不要定性。对我也不要定性不然会阻碍运动。对贴大字报的人不要说别人是别

有用心；（2）别搞逼、供、信。要揭、要交待。李昌问题严重，我说李昌停职反省也不要定性质，他有最大的回答权力。我走时告诉张彦有重大问题请示李富春、周总理，回来请示周总理，有重要问题，打电话到沈阳找我也可以。搞政治迫害，逼、供、信李富春同志一定不同意。张彦的错误是严重的，应该进行自我批评。现在不处分，我们不搞政治迫害。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要教育改造，要看长期工作表现。我不扣大帽子，700 多人反映意见，我也可以发表意见。工作组同志也有错误，有的错误大，有的错误小，主要张彦负责。否则影响党的团结、伟大。

四、决定由罗贵波等二十一人组成新工作组到文委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考虑到由外办派还是由文委派，最后决定由外交部派。不要发生错觉，罗贵波是四十多年的老干部，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做了检讨。中央认为很好。他们不是圣人，他们有错误有可能撤回去，也可能很好。他们没和群众一起商量。张彦犯错误撤回去，不一定别人就没有问题了。29 人中可能有的是好人。文委形势很好，有可能搞彻底，有光明前途。第一个不行撤回去，第二个不行再撤回去。张彦违反了中央方针、我的指示。运动的重点是处长级以上的干部，而不是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不是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可以经过运动改正。

今天我很乐观。在这次伟大的运动中看到了群众的伟大。把坏的东西都揭出来，只有新中国，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做到。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李昌身上，结果落空了。李昌在哈工大问题很大。哈工大打电话要他回去，我们没同意。他回去文委就搞不了了。工作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不要错误，可以在工作中弥补和改正。张奚若、丁西林等党外人士不要他们做检讨，群众也会批判。起码有两个重点批判。李昌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作风很严重。文委的机构怎么办？是否需要那么大的机构，一千七百多人。为什么要把文委变成第二外交部？那么多人没事干就要闹事。外交部、文委，对我来说是大难问题，对外友协为什么要二百人，我看 20 人挂个牌子就行了。李昌在文委工作是有成绩的，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个机关搞了不少工作，外国人也说了好话。不要一概否定。我不是划框框，而是为使运动走上正轨，更轰轰烈烈。

陈伯达讲话：

陈毅、陶铸、康生等同志要我来听听会，根本没有想到在此讲话。我不会讲话，更不会讲中国话，我说中国话很困难，我拥护陈毅同志刚才的讲话和采取的措施。决定李昌停职反省，我赞成；撤走张彦的工作组，我赞成。这些措施都是很适当的。

文委我从未来说过，有人说我是反革命事件的后台老板，贴了我一百多张大字报，我为什麽到文委来看大字报呢？因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收到了文委的信件，对工作组有意见，有人还打电话，所以我和陶铸来看了，否则就是官僚主义。我来的时候脑子是一张白纸，有一张大字报宣布五十一人的反革命政变说有后台，我想指的是我，我回去仍然是一张白纸。

陈毅同志今天要我来开会，我是不是反革命事件的后台老板，没有表白的必要。文委文化大革命有反复是好事，陈毅同志说有可能搞得比较好，因为这样有各种经验。世界上走的路是曲折的，革命不可能象列宁格勒大街那样直。五九年毛主席到苏联去，我们坐车子经过列宁格勒大街，觉得不怎麽直，也还是曲折的。天安门前的大街也有高低。文化革命有反复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以后有没有反复呢？我不敢肯定，但是大的反复可能不会有，中的、小的还会有。对新的工作组来说，首先要根据主席的教导，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张彦来了不接近群众是错误的，脱离群众，以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来搞文化大革命是必然要失败的，会被群众所抛弃。张彦所做的是毫无道理的蛮干。毛主席在延安时说过，要分清什麼是共产党的作风，什麼是国民党的作风……

康生讲话：

文委的文化革命运动，特别是张彦工作组的工作，与周总理研究过，感到很有问题，有很大错误。周总理，陈副总理委托我和陶铸来了解情况，我们从各方面进行了解，证明总理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张彦的错误是严重的，张彦的工作违反了党的方针路线，违反了陈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委党组，张彦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根本没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指示，讲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凡是按照主席思想办事，工作就能胜利；违反了，就要犯错误。文委的工作和张彦的错误，再一次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陶铸同志和我把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刚才陈毅同志宣布的四项决定，前天总理报告了主席，毛主席同

意。文委的情况陈总讲了，陈伯达同志讲的是党的重要政策，我完全同意。我现在谈一段主席的话，请同志们对照检查自己。主席在六四年提出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条原则，九评中又把这五条写入。

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年三月份毛主席问我们。你们有多少马列主义？有百分之多少的马列主义？我们也要问同志们，你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不管是犯错误的，没犯错误的，不管是党委同志，党员还是工作组同志，都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看李昌的马列主义少得很。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马列主义。在以前也许你们有，但在文化革命中很少或没有。张彦同志对党的政策，没有很好研究，违反了最高指示。为什麽犯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去挂帅。以后工作是否能做好，要看他是否能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文委工作有成绩，但毛泽东思想挂帅单簿或没有挂帅。能否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能否清除毒害，就要看能否突出毛泽东思想。

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所有的人好好想一想，是为中国革命，还是为修正主义。大多数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想一想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李昌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张彦和工作组在文委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张彦为什麽对贴大字报的群众进行压制和迫害！

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这一条正是张彦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你们是否团结了群众？向你们提意见，贴大字报的，我不承认都是好人，群众中有各种不同的阶级，有个别的可能是牛鬼蛇神。大多数人怀疑杨纯，工作组，写大字报的绝大多数是好人。要孤立坏人，但把怀疑工作组的当成反革命，不允许！这在中央机关发生是十分恶劣的！你们团结了多少人？拍马屁的人，彭真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个野心家。我看了一张《质问李昌从古巴回来后到彭真那里去干了什麼？》的大字报，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警觉。李昌，你和彭真关系很深，是赖不掉的，须向群众交待！一个工人揭发周一萍到那里去了，党组干部到那里去了，陈忠径是我的老部下，过去是算入胡宗南内部干革命工作的，有贡献。我找陈忠径谈话，结果使我非常失望，他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动动摇摇做投机，态度不明，毫无原则。

我们不否认你过去有成绩，但是不能原谅你这样激烈的斗争中不表态，怎麽能算是共产党员呢？

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张彦要把这一条对照一下，当然不是说你是赫鲁晓夫，但是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提到的那种不读书，不看报，专横独裁的帽子可以戴在你的头上。《人民日报》说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可你却怀疑群众，打击群众，以势压人。因为你是外办第五副主任。谁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人？群众，群众有资格罢免你。我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以罢免，难道你一个工作组组长都不能罢免吗？要让群众贴大字报，甚至贴错了也没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张彦是以上级和领导的资格来的，眼睛向上看，不是向下看。实行民主集中制很重要，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彭真说总理、陈副总理、康生是中南海的三颗定时炸弹，长久以来收集我们的材料。北师大有人说康生要搞暴动，也有人说陶铸在广西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应该让群众说，应该让群众审查，检验，群众怀疑是可以的。象张彦那样就要犯错误。

五，他们必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李昌和张彦完全违反了这一条，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想蒙混过关。张彦和我谈话，我以为他觉悟了，结果大失所望。我七十多岁了，他倒象一百五十岁。我很盼望同志们有自我批评精神。这五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讲一万句话还不如主席讲一句话。

（编者按：这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报经毛泽东同意，国务院系统因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撤消的第一个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总政治部发出了在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刘英俊同志的活动的通知。总政治部指出，刘英俊同志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号召，他是最高指示的模范执行者，是全军同志学习的榜样。总政治部的通知中还说：“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念念不

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号召我们大抓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在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刘英俊同志的活动，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这些指示，推动我军干部战士更加积极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促进我军的革命化建设和加强战备，都有很大的意义。”

解放十六年来，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轰轰烈烈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它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更加深入和广阔的阶段。这个斗争，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阴谋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我军是党和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同广大工农群众一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参加斗争，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切挑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的每个同志，都应当成为象刘英俊那样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要象他那样，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象他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象他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敢想、敢说，有勇、有谋，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做文化革命的闯将，做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员。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刘英俊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原因。学习刘英俊，最根本的，是学习他自觉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真理，是在伟大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

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最好的课堂。毛主席的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就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能够在斗争中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我们一定要在这场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学，经常学，反复学。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才能战胜敌人。只有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今年下半年，全军要继续大抓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这是我军建设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才能保证我军在革命化建设的道路上飞跃前进，从根本上做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

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是一个反复教育、反复斗争的过程。我们必须在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落实的过程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反对和克服单纯军事观点等不良倾向。

刘英俊作为一个年青的战士，能够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突出政治的方向，坚决同单纯军事观点作斗争，这是十分可贵的，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我们每个同志都能够象刘英俊那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这也就是最好、最根本的战备。

全军同志们，我们要热烈响应总政治部的号召，掀起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学习的热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在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中，在执行战备和其他各项任务中，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进入一个更深入、更广阔阶段。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同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外的代表，进行大斗争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

的斗争的特点，是在广大群众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人物为了自己发财，千方百计地盗窃国家财产，不惜千百万人倾家荡产的真面貌。

在三反五反斗争的基础上，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党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这是斗争的第二个阶段。

斗争的第三个阶段，是一九五七年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个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企图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他们所谓“轮流坐庄”、建立反革命专政的阴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方法，待机而动。在我们暂时经济困难的期间，他们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城乡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反复”。党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采取的一系列的保卫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和措施，使资产阶级右派和它在党内外的代表人物的企图归于失败，并且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斗争的第四个阶段。

斗争的第五个阶段，是以一九六三年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开端，一直到最近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刚刚开始，但已经显出了它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学术，无产阶级的文艺，在广大的范围内，进入了文化的阵地。解放初期，我们把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公开反革命的以外，都包下来。党的政策是要让他们为祖国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逐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旧知识分子中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同旧社会的基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他们说来，是一个换头脑的问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在旧知识分子头脑里面，当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去占领的时候，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还在继续起作用，并且在政治生活以及其他方面总是要顽固地表现自己，力求扩散他们的影响。他们总是企图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已经被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力求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上。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征服群众，迷惑人心，达到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目的。

所以，归根到底，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前就英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逐步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在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们在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越是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发展越是巩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冲突，就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时候排在我们的重要议程上，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客观的规律。要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取得最后胜利，就必须随时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

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丧失革命警惕性，对阶级敌人，对阶级异己分子，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每个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都应当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掌握无产阶级意识，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提高共产主义的自觉性，树立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不要固步自封，而要善于从斗争中进行学习，从斗争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社会主义这个新阶段上，战无不胜地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在历史所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三项决定：

第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第二、所有被关被斗的群众一律放出，一律停止斗争。

第三、在未弄清事实之前，尹达同志暂时不要到历史研究所去，不要同历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关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康生、伯达同志委托我们来宣布这三条决定，同时要我们找有关同志谈一谈。下午我们找了付崇兰、王恩宇等十位同志谈了话，刚才又同东光等七八位同志谈了话，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些情况。

从昨天我们了解到历史所运动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昨天来看了大字报。康老、伯达同志了解了情况，立即指示我们前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尹达同志。下面我讲一点意见，是个人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大家可以批评，回头他们几个人也可以纠正。

据我们了解，历史所运动存在着很大问题。很多做法是违背中央指示的。我们指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从五月份，付崇兰、王恩宇等许多同志，贴了许多大字报，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他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当了第一批闯将。他们出来揭发、批判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侯外庐，他们做得很对。可是到了六月三日，以郦家驹领衔出了一张“反击”大字报，还称侯外庐为同志，说侯外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要批判，但有人想“夺权”，说运动中出现了一股逆流，把矛头针对第一批揭发侯外庐的同志。这张大字报是完全错误的。在郦家驹贴出大字报前，尹达同志回来讲了一次话，这次讲话有很大的错误。“六·三”下午郦家驹贴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又贴出了批判付崇兰、王恩宇的大字报，以后付崇兰、王恩宇等有些同志到中央去告状，康老、伯达看了非常注意，伯达同志立即找尹达同志谈话，批评了尹达，批评得很尖锐，说他不对，绝不能压制群众，叫尹达同志回来公开检讨。我和穆欣同志也在座。尹达同志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并没有公开检讨，只与付崇兰、王恩宇等少数人谈了话，说他们不是反党。他回去后，伯达同志问，你公开检讨了没有？尹达同志说没有，只在少数人中谈了谈，伯达同志说，这不对，你一定要回去公开检讨。后来我们知

道郦家驹这个人很成问题，人家叫他“二所长”。为什么撤他职，等会儿再讲。我们为了爱护尹达同志起见，伯达同志为了尹达同志免于被动，建议尹达同志回来撤郦家驹的职，尹达同志同意了。昨天下午我们了解，并没有撤郦家驹的职，后来我们听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因结一致把矛头指向侯外庐了。昨天我们才了解，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但没解决，还制造了“六·二〇”反革命事件。从大字报上可以看出，第一批揭发侯外庐的积极分子被说成反党阴谋家，或说成反党阴谋家利用的工具，大会小会斗争；逼供信；将王恩宇关起来，罪名说他要到大使馆区去自杀。当然，有自杀念头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伟大，相信广大群众。但王恩宇同志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产生这个念头，并没有将绳子勒在脖子上嘛！危言耸听，说他要叛国，要往大使馆跑了，做法非常恶劣，这些账主要是郦家驹的，还采取关起来、盯梢监视，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是国民党的作风，这是不允许的。

刚才我们几个人商量，把被关被斗的同志一律放出，逼供信的材料一律还给本人处理，不算数。甚至他们上告中央次数也要追查，问：多少次呀？（答：十四次）把他们写给工作组的控告信公布出来批判，将他们给中央写的材料印发公开批判。这是非法的，任何人都有给中央、给毛主席写信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扣压，不得追查。

前阶段在郦家驹以及东光同志，在有那么几个同志错误的领导下，方向搞得是不对头的。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实际是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的。人家贴大字报，揭发侯外庐，就说人家有野心，“六·二〇”以后就斗了二十七天，把侯外庐放在一边，你们说要斗争，为什么不斗争侯外庐呀？而斗王恩宇同志、付崇兰同志等，并击揭发侯外庐的积极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再一条制造“六·二〇”反革命事件。这是不是说历史所的群众不好呢？不是的。我们相信历史所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郦家驹，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多数，那是虚假的多数。今天张老收到一封匿名信，这写信的人不是被斗的人写的，而是参加斗争的人，被迫派去盯梢的，他说越是感到斗争“胜利”，就越是感到有怀疑，越怀疑就越是感到付崇兰、王恩宇不是反党。好多人心里想的不是那一套，并不相信你们那一套，郦家驹、东光你们以为是多数，在你们控制下，很多人不

得不那么走。绝大多数的同志是会和侯外庐以及其它牛鬼蛇神作坚决斗争的，有的人是不明真相，上了当，有的人是心里有话不敢讲。现在一方面那些被斗的群众，一律停止斗争，不准斗争他们，真正解放。你们不是说要解放吗？现在就一律解放。另一方面，上了当的同志，一般的同志，在郦家驹、东光等人操纵下，在他们错误的指挥下，贴了付崇兰、王恩宇大字报的人不要作检讨，这笔账不算在群众的头上，应该算在历史所领导的头上，首先是郦家驹的头上，责任主要在郦家驹头上，不怪群众，不怪大家。被斗的，在郦家驹以及支持操纵下很多斗了人的，两方面不要有任何隔阂，谁也不要怪谁，应该团结起来，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首先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斗倒、斗垮、斗臭。

郦家驹为什么停职反省呢？几条就够了，不用多说。一条是“六·三”反击，打击揭发侯外庐的一些革命同志；一条是制造“六·二〇”反革命事件，破坏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条，郦家驹本人家里是大地主，有说四千亩的，有说两千亩，而且他二十多岁时，本人亲自收过租，在大军渡江时，转移过财产，变卖成黄金，这样一个人是不能重用的。自然我们不是唯成分论，没有经过大的运动锻炼，其它运动的表现不讲，就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是完全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面，抵制运动的地主立场方面，敌对立场。

东光同志，你们好好想一想，究竟谁领导谁，是郦家驹领导你们，还是你们领导郦家驹。为什么群众给你们提意见就不得了了，太岁头上动土了，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事实不一定都完全符合，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正确的，怕什么呢？！难道你们贴大字报的每条事实都核实好了吗？！你们要求每件事实都那么准确，那谁也不敢贴大字报了。动不动就拿反党帽子扣人家，群众提了意见就不得了啦。有的同志贴史绍宾的大字报，说史绍宾的文章是一棵大毒草，你们抓住人家，说是反党。唉呀，史绍宾呀，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呀？！那篇文章（按：是指《人民日报》上的《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一文）最近没有看过，以前看过，就是有不少错误嘛！没提反党反社会主义嘛！群众就是高明一点。不让人家说个不字。我们几个同志和尹达同志都很熟悉，最近在一起工作，说老实话很想帮助尹达同志，但是怎么帮助呢？能包庇吗？不能。伯达同志就尖锐地批评了他，坚决叫尹达同志公开检讨，这就是帮助。同志式的帮助。“六·三”反击和尹

达有关，应该作检讨。这是同志式的帮助，让他摆脱这种局面。让他撤离职也是如此，为了让他摆脱被动的局面嘛！但是以后知道尹达同志并没有这样作。有的同志很拥护尹达同志，怎么拥护？要用党的原则，应该在党的立场，党的利益，党的关系上。有的人说，听尹达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这是非常错误的，是群众讲的也要解释、纠正嘛！同志们要记住，只有毛主席的话，才是最高指示！必须了解“毛主席著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尹达在“六·二〇”以后起了什么作用，一定要查清楚，也一定能查清楚。伯达同志说，文化革命小组一定不包庇任何的成员。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有几分就是几分，不管你当了多大的官，什么员！不能说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共产党没有这个道理，要实事求是，有多大错误就是多大错误。现在不要尹达回所和历史所工作人员发生直接、间接的联系，这也是为了弄清事实，让尹达同志自己想问题，有多少就是多少。伯达同志在这里讲过，尹达同志你是否当保皇派，如果你做了保皇派，我不能做保皇派的保皇派。这话说得很尖锐、很深刻。历史研究所的文化革命运动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一定能搞好。看来要重新发动群众，不准挑动群众斗争群众，不能改群众搞逼供信，集中抓侯外庐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人物，还有工作组帮助大家的，我们相信一定能搞好。

我的话可能有很多是错误的，大家可以批评，写信、写大字报都可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开两天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好。“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

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表报。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知指谁）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自没有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工作，也是同样的。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就是因为那里的负责人，他们能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地鼓励群众贴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领导群众投入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去。

这些好的负责人，能够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

他们能够多听，多看，多想，多倾听群众的意见。

他们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引火烧身。

他们对群众贴大字报揭露和批判自己，采取欢迎态度，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样，他们就获得了群众的信任，获得了在工作上的主动权、发言权和领导权，就能够把运动领导好。

但是，也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并不是这样。他们象叶公好龙一样，口头上也讲群众路线，等到群众起来了，他们却害怕了。他们怕这怕那，怕群众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来，怕群众抓住自己的一些小辫子。其实，这些犯了一般错误的同志，只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虚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并且在行动上有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表现，群众是会谅解他们的，也是会欢迎他们的。

另有少数人，对群众摆出做官当老爷的架式，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群众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群众贴了他们几张大字报，他们就受不了。他们甚至找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他们这样做，就不可能领导文化革命，日子就混不下去，结果就会被群众所抛弃。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员绝不能够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进行革命。共产党员如果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对群众摆出一副官架子，这哪里有什么共产党员的气味呢？这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过，要分清什么是共产党的作风，什么是国民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的作风，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象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一样，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国民党的作风，就是脱离群众，骑在群众头上，欺压群众。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绝不能保存国民党的作风，绝不能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

对于什么是共产党的作风，什么是国民党的作风，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分得清的。但是，有些人有时候分得清，有时候又分不清；或者在一些问题上分得清，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分不清。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竟然分不清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界限，那是最危险的，那就站错了队，站到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的位置上去了。

任何革命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平坦的，总是有曲折的，有高高低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样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在运动中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出现一些曲折，这是难免的现象。问题是要力求把领导运动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使运动发展得更健康些，力争少一些错误，少一些曲折。

能不能够做得更好些呢？完全能够。那就是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之迅猛，对不少人说来，是缺乏思想准备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在这场大革命中，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他们应当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忠实的勤务员，证明自己是确确实实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当作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象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

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王××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做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约十一点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江青说：党中央万岁！北大同学革命万岁！同学们，我没有多少话可讲。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听了你们的意见，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情况不太清楚，没有什么可讲的，请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说：我没有什幺话好讲，因为情况不太了解。我是来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工作方针，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要听大家的意见，你们看到昨天《人民日报》社论没有。还是这个态度。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多倾听群众意见，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还是要回去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就说这些。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

中发〔66〕373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范围内广阔深入地发展，形势很好。全国生产建设的形势也很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生产建设更进一步促上去，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上，应当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先后缓急，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已于七月二日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现在，再作如下的补充通知：

一、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地专以上的党政机关一律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县以下的党政机关，农林水利方面的基层单位以及城市的基层组织（如公安派出所、街道居民组织等）的文化大革命，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财政贸易方面的基层单位一样，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省级商业部门的各个专业公司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单独开展，还是结合四清进行，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目前在工矿企业参加劳动实习的大专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可以全部调回，参加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

二、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党政机关，必须集中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同时，要指定必要的人员，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抓建设、抓业务、抓科研（这些人员也要轮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掌握情况，作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争取超额完成，并且从现在起就抓紧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以保证年度计划之间的衔接。

当前，要抓紧夏季粮、油的收购，丰收地区应当在坚决不购过头粮的原则下，力争多收购一些，以丰补歉。城乡都要抓紧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要很好地安排农民生活，力争少销和不销；城市也要严格控制销售，反对浪费。

三、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单位文化大革命，应当在积极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原则下，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先后，妥善安排。一线和二线地区基本建设单位开展运动的时间，可以早一些。大小三线地区的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抢时间，加快建设进度，这些地区的建设单位，特别是国防尖端项目和民用骨干项目的建设单位，开展运动的时间，要在保证建设任务按时完成的前提下，根据任务的紧迫程度和主管部门能否派出工作组的情况，进行安排，有的可以早一些，有的可以晚一些。中央各部派到三线地区担任指挥工作的负责干部（包括总工程师），应当坚守岗位，继续执行工作任务。个别人员必须调回参加运动，应当派相当的负责干部去顶替。

四、设计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般应当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地进行。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设计单位，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必须保证完成设计任务，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按时交付设计图纸，保证设计质量。正在现场进行设计工作的人员，仍应留在原地坚持工作。对原单位有意见的，可以写大、小字报送回原单位，必要时，可以派代表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特别严重的人员，经过有关领导部门的批准，可以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如果被调回的人员担负着重要的设计任务，原单位要选派适当的人员去顶替他的工作。

五、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同其他文教部门一样，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点。但考虑到许多科学事业单位，担负着当前生产建设和国防尖端技术迫切需要解决的科研课题，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因此，这些单位的运动，在步骤安排上应与一般的文教部门有所不同。凡是本单位领导力量较强，或者上级部门已经派去较强工作组的，可以开展运动，如果本单位领导力量不强，而上级又派不出工作组的，可以暂不开展运动，先安排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进行科学的研究工作。开展运动的单位，对于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课题和中间试验项目，以及新产品、新材料的审批试制任务，必须按期完成。承担其他单位协作任务的人员，不要调动，应当继续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科研试制工作。外出的人员对本单位有意见的，可以向本单位送大、小字报，揭发问题。这些单位，某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和非急需的科学情报工作，必要时可以推迟进行，而先进行文化大革命。

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对某些商标、图案和商品，提出许多改革意见。关于商标、图案和商品的改革问题，应当区别出口商品和内销商品。出口商品，除了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以外，目前一般不要变动；以后的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要。内销商品，应当积极地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努力争取在商品和图案方面反映社会主义的新风貌；至于商品的品种，则不要轻易取消。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除了商标、图案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以外，应当继续在市场出售。

七、暂时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应当认真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开展和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同时，还可以有领导地采取适当方式，对正在开展运动的上级领导机关提意见，送大、小字报，揭发问题。这对于搞好上级领导机关的运动是很有帮助的。

八、这个补充通知发到县团级，并且可以向有关的基层党委和职工群众口头传达。在传达的时候，必须分析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肯定运动的伟大成绩。同时，要说明，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的必要性，使大家认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动力，更好地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战略方针，加快大、小三线建设，搞好生产。不论开展运动的单位和暂时不开展运动的单位，都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要号召广大群众，象刘英俊同志那样，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阶级觉悟，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搞好生产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做到革命同生产建设双胜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陈伯达、江青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讲话。

江青说：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一块。

陈伯达说：我讲点个人意见：对于“六·一八”这个事情，说是个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这是我个人给大家讲这么一点。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是会有一些反复的，这个，比如你们就有些反复，“六·一八”以前和以后，以及到最近这几天，是一反复。是不是？斗争总会胜利！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同学们！你们坐下来，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坐下来要有好的秩序，现在不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吗？我指挥不动你们！

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字报，你们的大字报贴在外面，我只能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天亮了，你们起来了，就不让我看了。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乱发议论，我要来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

我把你们学校当作试点，我要来连看三天，你们每天让我看一个半小时。到六点三刻大家到礼堂去，我和你们讲几句话，你们不要打电话给其他人，这也是保密。不是我怕见人，我们还是不“自由”的，我又不能化妆，丁国钰也来到调查小组加强工作，大家要听毛主席的话。最后，我建议一起唱个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好不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讲话。

江青说：你们之间有分歧应互相谅解。你们之间的意见是可以统一的。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许采取围攻，迫害。现在有的同学不被谅解，以后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不要采取这种迫害手段。有人把我们的子弟看成特务一样，搞围攻、盯梢、迫害我们的子弟，我很气愤，我反对！这只能怪背后的人。

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说什么什么人不准进来！你们广播学院的大门比中南海还要紧，比进中南海还要难。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红门涂成黑门！

康生说：在广播学院文化革命运动中间，谁是主人？你们有什么权力？比如说，工作组来了，你们有没有欢迎的权力？你们有没有贴大字报的权力？你们有没有批评他们的权力？你们有没有罢免他们的权力？你们怕不怕这个权力？别人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帮，怕不怕？“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对不对？毛主席说过：“一切权力归农会”。也是不要党的领导？我赞成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听了大家的发言，撤回广播局派来的工作组，由你们这里的同学、革命师生员工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你们的上级机关、党委派联络员、观察员，他们只有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如实反映情况，而不是站在你们的头上。你们的班、系、校的各单位，大家充分讨论文化革命委员会名单，酝酿后，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选举。不要性急，要大家通得过的名单。当选的人如果他不好，不称职，可以罢免撤换。党信任你们，信任群众。你们一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文化革命是革灵魂的命，革资产阶级灵魂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的命，只有群众自己起来才能革得好，不是外面可以包办代替的。文化大革命中，相信你们能自己教育自己，互相教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使中国不出修正主义，不让修正主义当权，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永远是红色的。

有的同志提出来“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这些人是不是黑帮？提出这个口号，不是反革命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难道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吗？现在见之于宪法了。这个宪法是在毛主席直接主持下起

草的。宪法中提出“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难道这个提法是反动的吗？难道说这种提法有错误吗？是不是宪法这样规定就否认了党的领导呢？如果是这样看，就是错误的。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把党的领导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小组”，是讲文化革命中的一切权力。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代替党组织，取消党的领导。如果这个党委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那就证明这个党委是有错误的，或是资产阶级的，或是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的。

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说反对他的领导就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们用这样的公式给革命群众扣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任何一个党员、党组织，要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起作用，就应该象主席说的，要站在群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群众之上。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写信给江青

我认为，目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出现一个逆流。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我很满意，很感谢你们，你们很守秩序。你们写了很多大字报，让我看了俩个小时。我从大字报中学习到不少东西。昨天看了两个小时，今天看了两个小时，你们懂得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比较、研究事情了。我第一次来你们这里。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这个地方呢？因为你们学校在东郊，没有旁的学校，我要有机会去八大学院，消息就保不住，两个小时都保证不了。我既来了，就要抓下去。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热烈鼓掌）不管你对革命认识有多少，多一些，少一些，或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只要你们革命。我也犯过一些路线错误，但是仍是做党的国家工作。

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看有没有错误，有了就要改。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精神力量就会变为物质力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工作就会搞好。

总之，一句话，只要革命，总会有前途的！（热烈鼓掌）

你们回家的都回来了，我就和你们在这里见面。你们还没早餐，我找个捷径，还是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朱德讲话

横扫旧的习惯势力，要夺权，必须横扫一切旧的习惯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利用这种势力，孤立革命左派，保护自己，而旧的习惯势力也恰恰起着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恶劣作用，陆平黑帮，张承先都是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欺骗群众，组织对左派的围攻。

我们要打倒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冒充辩证法，其实抽掉了辩证法的革命灵魂。这个月的事实证明，折衷主义影响很广，在需要夺权的时候有人站出来摆成绩大讲“一分为二”，实际上是“合二而一”，反对夺权。折衷主义是机会主义，不敢造反，忘记了革命中心问题——夺权问题。

我们要打倒奴隶主义。奴隶主义不分敌我，对敌人也讲服从，讲拥护，不敢反对，被那套资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纪律”死死地束缚了。奴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被奴隶主义俘虏的没有革命人民的思想了。他总觉造反无理，不敢造反，安分守己，成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奴隶。旧的习惯势力往往影响很多人。因此左派往往处于一时的孤立地位，成少数派，革命派决不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革命派不要怕暂时的孤立，形势对他们暂时不利的情况，他们顶得住，用自己不倦的斗争，排除万难，争取群众。被暂时的少数与多数所迷惑放弃原则立场，就意味着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这样习惯势力，一百年也肃清不了。

打倒折衷主义！

打倒奴隶主义！

打倒旧的习惯势力！

康生讲话：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来看你们，问你们好。我们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候。现在我介绍下来的几个同志。

副组长：江青、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姚文元、戚本禹。

文革小组办公室：曹轶欧。

江青讲话：

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如果有什麼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快走，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现在请他们来讲讲。我们听听。

康生讲话：

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这不是谦虚，因为主席说过了，一切革命的正确的领导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谁做呢？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我们，首先是靠你们，同学们，教员们。因此，我们想在这一伟大的文化革命中，运动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听说，同志们在若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加清楚了。比如“六·一八”，有人说所谓“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有人说反革命的，还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两个月了，工作组怎麽样？听说有各种意见，有的讲是好的，有的讲有一些错误，有的讲有路线性的错误，有的讲是路线错误。敞开思想讲，什麼话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讲工作组在这儿好，有的讲工作组不在这里的好。文化革命是靠你们来搞呢？还是靠工作组一手包办？文化革命怎麽做法？陆平，彭佩云怎麽斗？翦伯赞、冯定之类怎麽斗？怎麽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工作组，这正是毛主席首先要叫我们告诉你们的重要的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下车伊始，不能哇啦哇啦讲，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的报告讲了四个钟头吗？要“精兵简政”嘛！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等在北京大学参加辩论会并讲话
会议由江青主持。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穆欣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李雪峰等参加会议。

江青讲话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

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小组长王任重同志，副小组长刘志坚同志，副小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

我们今天来继续昨天的调查，继续听你们的发言，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能说说，这很对。什麼意见都听，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希望你们百花齐放，最后，达到在毛泽东思想上万众一心。有同学递条子说“让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现在请同学们发言。

（同学发言略）

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我从早到晚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有见到他呢。我了解，他没有来。但是同学们的每个条子，每个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不是装了一包吗？

有同学递条子说“首长同志们”，我们不是什麼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个条子是错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麼非要我们都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候就不鼓掌了。

（北大同志发言，略）

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他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点休息。（时已二十三点十分）我讲几点事实好不好？（答：好）

我来北大四次了，但张承先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还没有见过，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是打字的，也没有签字，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不妥当，不严肃的。

有同学问“六·一八”事件是什么事件？陈伯达同志已经代表我们说了，“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

二十一日我和陈伯达同志来找聂元梓同志了解情况，这时候有个叫徐庆的同学也来要反映情况，后来又来了五位同学说……（以下有关北大的具体问题从略）

江青：同志们写条子叫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叫他们听着。

刘昆林：（法律系）控诉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因激动没讲完）。

刘青华：《彻底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技术物理 122）并控诉技术物理系工作组讨他的迫害。

康生：有人送条子给我，叫我说一下，叫各种意见上台来讲，我们一万多人可以达到千言万语，可以达到万花齐放，达到万众一心。

江青：有人建议今天的辩论会应将专题出一下，我们今天就辩论《张承先进校后所犯的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赶走他还是不赶走他。同志们讲话要短，不要长篇大论。下面是聂元梓同志讲话，她昨天很谦虚，很想听一听大家讲话，放在下面好不好？（好！）反对聂元梓的贺晓明、雷于平可以上台来讲，哲二有五个同学想发言，可以派一个代表，把你们鲜明的观点精炼地摆出来。

孔立明：（工作组组员、秘书处）张承先是不革命的，应该赶。

江青：一个写血书的同学，叫耿佩荣，叫她优先上台讲话。

康生：一个同志写血书说《我有苦、我要诉》。

耿佩荣：（东语系越四）揭发工作组在“六·一八”问题上对她极为错误的处理。结论是张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要踢开他。（讲完时，台上首长热烈鼓掌，耿佩荣走下台时，首长们招手目送）。

宋晓明：（西语系法一）（《舍得一身剐，敢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拉下马》的作者）我说错了他，他要是革命家，决不会躺倒不干，如果他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那我就骂对了。

申叔南：（生物系一年级）成绩是主流，犯了错误正在改。

崔建昆：（地球物理系二年级）不同意罢官论，对千篇一律一边倒批驳。坐下学文件必要。错误是由于没有经验，结论是：成绩是主流，还是有缺点的。

牛忠林：（法律系）反对上述意见，（指申、崔）控诉工作组对法律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的迫害。结论是：张承先不是我们的领导，让他滚蛋。（读《告北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公开信》）

江青：有人建议把工作组领导介绍一下。（不同意）

李扬扬：（文五、四）代表贺晓明等 31 名革命干部子女讲话，全面评价工作组。1. 反对说成是路线性错误，是严重的右倾思想。2. 《功与过》。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更不能说是反对，突出政治不够。3. “初步发动了群众，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说是镇压运动”。工作组在权夺得好。4. 斗陆平问题，他是犯了战略步骤上的错误，一直拖延是由于客观原因。毛“关于‘六·一八’是群众自发的革命运动”。5. “工作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党，不是保皇党。6. 错误的根源，认识与实践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现了老问题。

江青：郭来舜、刘昆林要与李扬扬辩论（好！）

石小阳：（物理系）不能将陆平与张承先同志一起相提并论。

康生：有人写条子写“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不是你们的首长。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双方的意见都鼓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叫我们都鼓掌是不行的，我们对双方都鼓掌，岂不成了中庸主义了吗？

江青：我每次来，你们写条子，意见书，他（指毛主席）都一件件地看了（全场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我们认为正确的就鼓掌，不正确的就不鼓掌。）

郭来舜：（东语日二）反对李扬扬的讲话，要求罢张承先的官。

彭小蒙：（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发起人之一）反对李扬扬的讲话，坚决要求罢张承先、张德华、沈宁的官。（彭小蒙讲完后台上热烈鼓掌，彭要走下台，江青同志又把她拉回来，热烈握手，久久不放，继之热烈拥抱亲吻。然后又与诸领导人一一握手）。

哲二代表董小结：提两个建议。1. 保留工作组；2. 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

江青：今天发言到此为止，因为我们工作小组也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伯达同志昨天上夜没睡觉，今天又来了！（场上群众激动不已）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我来讲一些事实。

关于“六·一八”是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代表我们小组发表了意见，这是革命事件。（场上再度沸腾）我到北大有四次了，我们认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张承先是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他不见我们，刚才他写了封信给我，也不签名，也不是亲笔。这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其事的。21号我到了北大，找了聂元梓、郭兴福（东语系朝鲜科）谈了一个钟头，有5个同学在外面听着，后来这五个要找我谈话，说聂元梓、郭兴福不能在座。我说，刚才他们讲话，你们听了，现在你们讲不让他们听，这民主吗？最后聂元梓、郭兴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们代表31人就是今天李扬扬代表的29人。20日张承先给他们开了会。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还以为张承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当。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生病的孩子——笔者）结婚！气得说不出话！还有一个郝斌，是现代史（历史系）支部书记，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个人到乡下搞社教2个月搞不起来，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讷（江青同志的女儿，原我校历史系学生——笔者）给和另外一些人提意见，前市委派人攻李讷，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毕业后，我叫她作自我批评，对郝斌讲清楚，郝斌嚣张得很，李讷作检讨时他竟不见，他们说我的孩子态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几年了，

要不要我说一说（要！）那天谈话的五位同志贺晓明、雷于平，我讲得对不对？贺晓明来了没有？我们的子弟不能盛气凌人。我们的子弟如果不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工农子弟可以批评，但不能笼统地对待。我痛心，这是张承先搞的鬼名堂！这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

陈伯达讲话

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我请一位翻译。

今天会上听到了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很激烈，很尖锐，这是种正常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应撤掉这个障碍物。这里好象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可以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些迷信，就是说得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进行革命了，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你们的盖子，我建议北京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

我们有许多人还受到旧社会的影响，受了旧社会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好像革命当然要有一个工作组，没有工作组就革不下去。要破坏这种旧的习惯势力。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重复毛主席经常说过的一句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那你们怎麽办呢？（答：可以）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呢？（答：有）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的，都不能由外来的力量包办代替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产生这样一些新事物，新东西，新问题，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才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的。

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是文革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它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我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成员都是你们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样看看有没有把握把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我想你们一定能搞好的。你们在选举时要注意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教职工中应该有他们的代表。这些成员，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

这两个建议如果你们赞成的话，那么你们可以考虑，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看档案，电台，武装的一切管理制度，这方面的人在没有改选以前，要负责到底，要受群众监督，其中有打问号的人，也可以提出来，请文革委员会考虑。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之后，是不是你们就没有饭吃？要学会管理生活，现在管理你们自己伙食，行政事务工作的，还是不动，希望他们还是做好，以后要做得更好，将来文革委员会成立以后，可以考虑成立生活管理委员会或者小组，他们不是代替，而是监督。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建议。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们有同学递条子说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现在关于“六·一八”事件还在争论，有人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件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我们党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重要的，谁代表党的领导呢？党中央。同学们说“六·一八”就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康生讲话

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三个问题供同学们讨论，听同学们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六·一八”事件，同学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请同学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麼性质的错误，到底怎样？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多方面的意见，我们的小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个问题，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建议，我赞同我们小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麽样？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利不归我们，而在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说革命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完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有看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吗？

有的为张承先工作组定调子。张承先到北大五十多天来，挂帅真正教育同志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由北大的革命师生来搞，他们没有进行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

第二个，五十多天中，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刚才有个叫李扬扬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象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象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麽说的？要依靠自己救自己！为什麽在文化革命中不依靠自己救自己，而是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是要依靠行动来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的事实证明了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若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受失败。

因此，同志们，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就会前进，就会胜利。共产党员好在哪里？好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离开群众就不是好的，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斯大林讲过，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毛主席讲，群众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希望党员，团员，革命干部子弟必须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掌握好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革命委员会。有的同志也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麽办呢？你们北大是不是独立王国呢？还是接受新市委的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要真正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没有党的领导。

再一次重申一下，这是一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讲，还可以千言万语地讲，你们可以百花齐放嘛！真理越辩越清楚，经过辩论达到万众一心，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的万众一心。

同志们，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也好，你们的工作方向是什麼呢？我们提一个建议，请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条。这五条，它不仅是接班人的五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那里讲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里讲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而不能自私自利为资产阶级服务；那里讲要团结大多数，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并且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里讲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那里讲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你们今后工作的最重要的指针。我相信你们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方针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取得彻底胜利，关键在于你们自己和能否把真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北大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了解，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所材料是你们揭发呢，还是靠张承先几个人整理材料呢？

五十多天以来，没有广泛地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佩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

干什麼？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要斗翦伯赞、斗冯定。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的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看得多呢？

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麼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下一步就要搞建议改革。学制怎麽样？课程怎麽样？专业怎麽样？教科书怎麽样？这些东西都要靠你们了。是不是我随便说的呢？不敢。现在我解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条子，没有签名，不赞成我们在会上质问张承先。条子上问我们：“你们是干什麼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革命的，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他还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很简单，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张承先在这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问问吗？难道这就叫逼吗？为什麼他们把人逼死，你们不说一句话，而我们一问就是逼呢？（江青：有胆量的就站出来嘛，我们不怕！）同学们让我把话说完，一个逼，一个供，我们问他应不应该答复我们？（应该！）这叫什麼“供”？还有一个“信”，我们恰恰不相信他哩！他上次检查你们信不过，这次检查还是通不过，我看你们不相信他嘛！他才是喜欢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信。当然，写这条子的有两种人：一种思想糊涂；一种是不赞成我们，想保护张承先。你糊涂，别让我们糊涂！你出去讲讲。一种是想保护张承先，也可以，也允许嘛！这么多人还不允许有几个保留他们错误的？他们保留意见也就好嘛，这是教员，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打麻将吗？有方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方子，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我一念这条子，你们大家不是兴奋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上讲，你们可以知道为什麼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住房，还留在那里，如师大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觉、聊大天。那是我们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你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愿讲，明天讲。

另一张条子问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左派，镇压革命的事。也是六月三十日，师大的王运良同学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问郭影秋晓得不？题目是《郭影秋是什麼人？》孙立刻作了报告，有四十

个字说这个同学煽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对这个同学进行打击。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我说过在北大，人大驻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军委晓得，华北局晓得，不一定是彭真搞的。决不否认以下两件事：

一、彭真是否要搞政变呢？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要搞政变的。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在时机成熟时就要搞反革命政变，搞反革命复辟的。至于什麼时候搞，我不知道，只是说是时机成熟时搞，没有说今年二月搞。

二、彭真是否要夺军权？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勾结××就是要抓军权……，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麼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已经和××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驻军？军委、军区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

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麼孙友渔要利用这个来围攻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是不是要建立组织？我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心情是好的，是要贯彻阶级路线。过去陆平黑帮反对阶级路线。第一，我很理解同志，们在陆平黑帮统治下受迫害，受打击，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打击，这种心情完全是对的，我完全理解。第二，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革命的左派队伍如何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清楚。学校里是否有阶级组织呢？有！是共产党，是共青团。共产党你能说不是阶级的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也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嘛。问题在于前市委统治下，党团组织有很多问题，北大校党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瘫痪了，就要另建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是否需要再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呢？江青同志已经说过阶级队伍要通过党团组织来表现，不需另搞一套了，而且那样会被孤立起来的，使团结受到损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干部子女怎麼办？我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第一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很好的领会毛泽

东思想的党团员，好统治。第二条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中国，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离开了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第三条，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团结他们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向彭真式的人物，向陆平、彭佩云黑帮作斗争。左派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弟要警惕，时时刻刻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在给清华红卫兵的信里就讲到这个问题，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是不是？我希望同志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很欣赏李杨杨在发言中的一句话，她说：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

李雪峰讲话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红旗》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

求立，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象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五月廿五日的报告（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五月廿五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六月三日，新市委宣布成立，六月四日那几天敲锣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六月四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六月廿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六月廿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二十三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六月一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廿

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七月十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陈 xx 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麽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做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北京是首都，要看北京工作如何，对支持越南也作了一个好的开端，检阅，这是国庆演习，证明了北京人民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们不仅搞文化，也搞武化，大搞军事训练，当兵保卫首都，把北京搞成坚强的地区。

聂元梓讲话：

我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来讲话。从北大长期的尖锐的、激烈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 50 多天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斗争中，再一次证明了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今天康生、陈伯达同志都讲了话，提了建议，我完全拥护他们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江青：

这里都是自己人，谁也不会传出去。你们来的信，我们都看了，你们这样做，是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有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中国不会变颜色。向你们说两点：

(1) 你们是受迫害的，他们那样做，只有反革命才干得出来。要是再对你们进行迫害，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对你们是怎么迫害的？你们回去准备材料，准备控诉。

(2) 不应该死，应挺起腰杆革命，你们要是死了，问题就搞不清楚了。与其自杀，不如干革命，让敌人给一刀，这样还光荣。

你们学校是要夺权的！工作队、党委可以不信任嘛，反对工作队、常委，不一定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本没派过这样的工作队，一个也没派过。

这样的工作队光撤了还不行，还要斗它。

你们来时，他们知道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他们又要布置了，又想溜了。你们回去后要串联，要准备材料，简单扼要，要击中要害。

你们敢不敢控诉？（答：敢！）我们给你们撑腰！我们要排着队去。你们讲话后，我们还要讲话。

你们要注意斗争策略，你们之间的分歧是工作队挑起的。不要把群众放在后边，不要光靠你们几个人。不要互相斗争，要争取中间群众。工作队员也会起义。同学说了一两句话错话，做了一两件错事，没关系。那些大人物说了些错话不算，为什么要对同学抓小辫子呢！

戚本禹：

前一个工作队包庇黑帮，被他们赶走了。后一个还是这样。他们说开门整顿十天，实际想蒙混过关。邓是个不小的官儿呢，可这个人糊里糊涂，连话也说不清楚。上次做了报告，想把责任推到同学身上。上次我在那儿看大字报，点名的全是学生，有几十个，实际上都是他们指挥的。

江青：

你们回去，把精确数字统计上来。他们不是要找“后台”吗？我做你们的“后台”。毛主席给你们撑腰！

戚本禹：

你们学校还有“党委领导万万岁”大字报，连这样的党委也保卫？！连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院党委也要保卫？！

江青：

你们回去要好好干，你们是主人嘛！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近又一次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破浪前进，畅游一小时零五分，游程近三十华里。象十年前一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喜讯传来，全国振奋！

亿万人民怀着最亲切最激动的心情，为毛主席的健康同声欢呼，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万里长江，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象征着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最喜欢在波涛滚滚的大江大海里游泳，他总是鼓励人们到江河湖海里去锻炼，去锻炼身体，锻炼意志和勇敢，去同大自然搏斗。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总是号召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要革命，就必须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毛主席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几十年来，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征途上，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风大浪，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凶恶的敌人。当年那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什么蒋介石匪帮，什么日本军国主义，什么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何等的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英雄的中国人民面前，它们统统“不在话下”，统统被击败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充满着阶级斗争的风浪。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和一切牛鬼蛇神，配合国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逆流，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黑风恶浪。它们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进军中，已经或正在把这些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一个一个地揭露和粉碎。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就不是在风平浪静中前进的，从来就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每经过一次惊涛骇浪，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就更加坚强了，革命力量就更加壮大了，革命经验就更加丰富了。

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是大无畏的英雄人民。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可以创造出来。

要革命，就必须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

毛主席说：“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革命也有规律，掌握了它的规律，才能有驾驭整个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能力。毛主席在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学游泳，不下水不行。光在岸上研究这样那样的游泳术，是一辈子也学不会的。干革命也是一样，必须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掌握革命的规律，学会阶级斗争的游泳术。

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哲学。只有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

要革命，就必须紧密地联系广大群众。

毛主席时时刻刻都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欢呼：“人民万岁！”我国七亿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的周围，最坚决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进行战斗，我们就无敌于天下。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必须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锻炼。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经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见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健康地成长起来。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是动员人、教育人、改造人的巨大力量。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吸取和总结了我国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针，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

我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理论，也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党，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康生说：

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

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

江青说：斗争矛头不是对准黑帮分子，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革命的师生，这是错误的。

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档案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有道理的。现在来查这些人的出身，这些人的历史，就是什么家庭出身，过去干了些什么事。修正主义者有它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的陆平黑帮，你可以把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列一张表出来就可以清楚了，原来是这些人在这里掌权。为什么陆平这个黑帮要排挤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照顾地、富、反、坏、右子弟？就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基础，有了这个社会关系。所以，查黑帮的档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档案要有一定的手续，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可以订出条例，按照正确的手续、条例查档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要保管好，不要随便动。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我第一次来时见了你们一部分人，第二次见了你们全校师生员工，我讲了三件事，今天我就扼要地重复一下：

一、我谢谢你们给我自由和机会看了三天大字报，今天又给我机会听了你们的发言。

二、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重新温习了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原意革命的就有前途。

当然在运动中，在这过程中，在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同样，能够革命还是有前途的。今天再补充两点：

四、只看看大字报，听听几位同学的讲话还是不够的，还要分别谈话，交换意见。我通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一些本质问题。……六条那样的提出是不对的，毛主席没有那样说，中央及陈毅没有授权张彦那样说，张彦这样宣布是错误的。今天所做的仅是我工作的开始，我还不能多说，我想把这里当作典型。

五、确实在你们当中，大致有两类意见，但决不单只两类意见（一、三、五类，二、四类）其实一、三、五中间也不一样，二、四中间也不一样，任何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但毛主席的话是经过周密思考研究提出来的。我们都承认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代没有一个超过毛主席的。

你们拟定每系推出两个代表，也不太好，一个多数，一个少数，或许还有三类，要允许少数人的代表讲话。一个系如果少数只有两个人，那就不好推举代表，但是其他代表应该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出来。

我今天下午不能来，我的事情都订满了，我准备看你们的笔记，明天上午来继续听。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陶铸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江青说：对工作组的成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有多数是好同志，但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做了不妥当的事情，错误的事情，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对待这样的同志，我们要说理，说服他们，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麼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嘛，对于工作组中另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的或是混进我们党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斗争他，要说理。你们说对不对？（对！）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陶铸说：我们建议大家串联，班与班，系与系，甚至到外校去串联。群众运动就是要运，要动。说不运，不动，几个人蹲在屋子里，你看看我，我看你，这是不行的。学生运动历来是各校串联，互相通气。

（编者按：这说明，发动学生大串连是陶铸提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群众大会，王任重、关锋在大会上讲话。

王任重说：有人说北大有股风，什么风我不知道，北大七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我参加了，陈伯达、江青、康生、雪峰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方针，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本人完全同意他们的讲话，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方针来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闹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关锋说：回答一张条子。我先把条子念一下：“王任重、李雪峰同志：我们工作组说，北大会只适合于北大，请示了新市委后，我校不放录音。而且领导人讲话要取得本人同意才能放，可是我愿意放，我认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有普遍意义。二物系一同学”。工作组请示了新市委没有？新市委如何答复的？我不知道。我不是李雪峰，我是关锋。我回答下面一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同意放他们的讲话录音，当然，什么地方不愿放也可以，如果你们愿意放那就要求工作组拿来放吧！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致“保蒯派”的信：

刘泉、张云辉、孟家驹等一切曾经支持过我和同情过我的同志们： 我十分坚定地相信，你们中绝大多数人是革命派，是无限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但不排斥极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家伙！）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你们曾经给工作组贴过大真字报，提过意见，发表些议论，就飞来横天大祸，“立场”问题几乎都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你们不得不“低头认罪”、反复“交待”、“检讨”问题，还不得“下楼”，你们高亢的革命精神完全被压抑了。 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人来给我们撑腰，工作组一手没有把天遮住！北京大学又吹来了革命的东风，清华园内一片大好形势，让我们站起来，挺直腰板顽强地战斗！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拿出我们青春的生命吧！ 我知道，你们中不少人对我很是怀疑，你们怕我是反革命分子，怕上我的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这种革命警惕性是可贵的。但是，你们从你们自己亲身经历还不了解吗？工作组对保蒯派采取的什么手段你们体会还不深吗？你们暂时低头了，他们还死揪住你们不放，何况我从未低头，他们更是对我恨之入骨，使尽了种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左边澄清事实的大字报可见一斑。 是时候了，是清算工作组所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用我们亲身经历来揭露工作组在前一阶段在大方向上严重问题，他们不引火烧身，我们放火烧他们身！我昨天编辑了一个语录集，你们好好看一看，向刘英俊同志学习，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无所畏惧地前进吧！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蒯大富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澄清几件事实》的大字报：

现在全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把我当成“反革命分子”，我已多次声明，我一点不责怪大家。在工作组让人造谣、捏造事实、歪曲事实的情况下，以及大家处在高压政策下，谁敢说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呢？所以虽然直到今天我并不承认，（也永远不会承认）但我由于被剥夺发言权，不能澄清事实，大家的受骗状态仍得不到解除。现在我重新获得发言权，先解释主要的吧。 一、关于我“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一条是最引人痛恨的。为什么你说“毛主席的话不一定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也有错。”这一点在 6. 27 大会上曾解释过。（记录稿别有用心地记错了！）我班同学文龙和我争论主席的话是不是句句是绝对真理，我说：“不一定”，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主席的话大多数是相对真理即在一定的

时间与空间内成立，但是上面两句话，我从来没说过，有人故意捏造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永远是正确的。虽然我水平很低，但我竭力想把主席思想当着自己行动的最高指示。二、关于我“怀疑新市委、怀疑雪峰同志”。这一点是我班 X 同学捏造，我已辟谣，我是非常信任新市委的，尤其信任雪峰同志，我写了多次信给新市委和雪峰同志，要求他们帮助我。这一点有案可查。三、关于我“要考验党”。这是歪曲，在辩论小会上我说：现在全国各地人民正在用毛泽东思想考验他们领导（指基层领导！）这是符合主席思想的，我们的考验是从爱护观点出发的是从保卫党中央出发的。但是他们歪曲成“我要考验党，考验党中央”然后再批驳一通。实在可笑。四、关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我从未提过这个口号。在六月六日我说：“在目前情况下（按当时已经揭出大量蒋南翔的问题），宁可错怀疑九十九个，不放过一个象蒋南翔这样的黑帮，放过一个高等学校黑帮可不得了。”他们断章取义，先说成“宁可怀疑九十九个，也不能放过一个”，后说成“怀疑一切”，又说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甚至说成“宁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随心所欲到无以复加地步。我说，我们怀疑是有根据的前提下怀疑，而且不是怀疑一切，我们信任党，信任群众，我已经说过多遍。但是有些人就是强加歪曲。

五、关于“我绝食”。我是绝食了五十小时，（七月四日至七月六日）在七月四日晚，我向工作组提出我明天要去中央，工作组不让去，我说你们想封锁中央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去？工作组说：“不让去就是不让去，你得听我们的”，我说“我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组说：“把他赶出去！”立即上来几个纠察队员，强行拉我出屋，我抵抗不行，还被拖出屋（右手指被他们指甲划破两块，流了血）。最后，他们把我关在屋里，不让出门，我盛怒之下，绝食抗议这种非法政治迫害，可是工作组老爷们真是狠心，在我绝食期间，他们不但对我要去中央事不闻不问，每天上午、下午还组织人和我“辩论”，我不能起来，就拖我起来，想必欲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他们对外面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同学知道。想让我不明不白死去。我想不行，他们不怕我死，怕我活下去，我偏要活下去，就用退兵之计停止绝食。工作组怕之极，并且强加罪名，说“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反党”、“叛国”等大帽子接踵而来，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七月七日我腹部较痛、头疼不能下床的情况下，他们硬拖我到讲台上去受“审判”、

我无力抵抗，只好听其摆布。 我绝食的过程，是受迫害的过程，而绝非是我“反党”的过程。 六、关于我的大字报。 我在六月十六日出一份《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注意！工作组的大字报选集内容不全，别有用心删去一部分），二十三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字报，以及六月二十八日后六份大字报。信件有我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公开信，给鲍长康的一封信，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来分析，看它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尤其是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一封信如谁有底稿，请重抄出来（我没有！），这些大字报、信件上那些是反党的呢？实在无法想象！ 澄清事实暂时澄清到这里。以后将陆续澄清，谁有问题请写在右边白纸上，编号、问题、班级和姓名，我将陆续用大字报，或小字报，或走访去回答大家所提的一切问题。 蒜大富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蒜大富贴出《对学校从前几点异常现象的看法》的大字报：

从工作组进校后，发生了许多件异常的现象，我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可知的，正如宇宙是可知的一样。但不是一切现象都能立刻能得到正确解释的。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切，考查一切。下面我对几点异常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供大家参考。

一、六月二十四日以前为什么不组织斗校一级黑帮？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准备不足的问题，据当时揭露的大字报内容来看，五次大会开不完，但是就是迟迟不斗，同学多次要求，工作组不闻不问，我认为工作组可能与黑帮有牵联、甚至是一家人。

二、六月二十二日事件的答案是什么？以工作组秘书崔×代替王光美同志参加我班讨论。后经追问，二十二日答案是“听电话听错了，把联络组秘书要求，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求！”二十四日。张茜薇说：“是我联想的。自相矛盾，不可理解，至今还想不了了之，但是这是办不到的。我认为，这是想方设法搞无产阶级革命派材料准备组织反扑。

三、六月二十四大会上原说六月二十五日继续开，后为什么又不开？有许多同学抱怨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让同学来辩论。同志们，工作组心有苦衷，实在不敢在六月二十五日继续开。因为大家知道，六月二十四日大会形势对我们大有利。尽管大会主席团要不民主手法，叶林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但大多数革命同学还是支持我们的。二十五日又出来许多锋芒毕露的大字报，围攻的大字报虽然

数量多，但质量极差。而且六月二十二日事件工作组实在想不出妙法向同学解释，于是利用职权，强行勒令推迟，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动引起部分同学不满，但没关系，我可以施加政治压力，全校出大字报围攻，把蒯大富的性质说得越严重越好，学校广播台大肆造谣；各班开斗争会，你给工作组提出怀疑就给你扣上立场问题，以至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工作组甚至组织大群人向蒯大富游行示“威”。经过三天准备，学校形势对工作组大为有利，于是他们得意洋洋就召开了名为辩论实为政治迫害大会。

四、六月底到七月中旬为什么封校？不封不行。因为斗争矛头已指向同学，严重违背中央精神，让外面知道，特别是中央知道不好办。

五、为什么不让我去中央？答案同上，因为中央知道这件事，实在难于交帐。

六、为什么工作组老是为自己定调子了什么“代表毛泽东思想方向”什么“我们代表党的，代表无产阶级的”等等。说实在的，自己不定就没有人来定，自己定了后，有些人不加分析就照搬，“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无限信赖工作组”、“伟大的工作组”等等一起出来。

七、为什么剥夺我等人二十天左右的人身自由？因为工作组怕见真理，怕见事实真象，不敢让我们出澄清事实的大字报。

八、为什么七月二十一日又统统放掉？不放不行，因为中央同志要求，随便关人犯法的，这一点叶林同志知道。

九、为什么原准备继续批判蒯大富，又突然转向校党委，使同学措手不及？因为中央同志要求，怕交不了帐，北大形势也逼得紧，无耐忍痛把校党委抬出打，好应付门面。

十、为什么罗征启、饶尉慈、邢家鲤、方惠坚、陈圣信等人能慷慨激昂指出黑帮罪行而艾、刘、胡、何等顽抗而不在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想到罗、饶、邢、方、陈流根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有那么大转变。我想，很可能是工作组要“牺牲将帅保车马”的阴谋。

十一、为什么工作组能掀起打“保蒯派”高潮？因为①施加高压是空前的。②原校保过皇的人极多，他们对于反蒯极卖力，人人争当勇士，想捞一把，来个“依然 X 我”。而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一切工作组说了算，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③因为高干子弟全力支持工作组。

十二、为什么昨天一天就刮起一股革命风？内因是同学们的革命热情不是什么高压压住的，他们要革命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外因是北大形势的影响，大的有全国形势的影响。

十三、为什么工作组不闻不问？不，工作组在紧张活动，不

信你看看周围许多工作队员同志，只是暂时不能发言。 十四、为什么又突然提出选文革代表？这可能是一个大阴谋！他们想借此束住群众手脚，来个假选举，依然是他们那一套机构。以“最高权力机关”自居，原状原封不动，在工作组性质未搞清楚以前，千万别选举，选举则上当！ 对上述几个异常现象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完全不一定正确。但事物本质只要一个，总会搞清楚的。只是时间问题。 蒯大富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三致叶林同志》的大字报：

敬爱的叶林同志，您好！ 大概您这两天很高兴吧。因为您多次欢迎的大字报昨天一天就贴满了清华园，真是喜出望外。向您热烈祝贺！ 我在被关禁闭时，曾写过两封信您。其中有一封上说。“咱们在下一局棋，而这局棋远远没有结束。您还是要认真地下下去。不要以为大局已定，胜利在握了。”看来，这局棋还远未结束。不过棋局稍有些变动。下一步您怎样走呢？我们全体同学拭目以待。 您还记得吧，我曾在公开信上向您提出十条要求，今天，我再次向您提出那十条要求，（内容原则不动，具体的稍更改）希望您能答应我。 这股风来得可真猛，我差点儿无法应付。不知您怎么样。想来，您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了，这种风浪经过，一定会成竹在胸，下出一着好棋来，但是，时不等人哪，还是果断些好。 我们是老相识了。因此，我为您打算，望您不要再施加政治压力，估计压不下去。同学们革命热情很高，我很高兴，我想您一定也很高兴吧。您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很高理论水平，您一定认识到在前一阶段犯了较严重的错误。错误既然犯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向同学们公开坦白、检讨，改掉就行了，咱们还是一起干革命。但是如果你们迟迟不表态，同学们可不答应，中央也不答应，快一些吧！同学们对你们寄以热忱的希望，望你们迅速行动起来，重新革命，我也满怀信心等着你们拿出果敢的革命行动。祝您身体好。

致革命敬礼蒯大富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的大字报：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为革命坚持真理，更要为革命修正错误，近几天来，许多同志对我提了许多中恳的批评，我非常感谢。在这里，我向全校革命师生检查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 1、在四月十六日以后，我是原黑党委手下所谓“批判三家村小组”里的一员干将。我当时对他们面目认识不清，怀着对“三家村”的仇恨，夜以继日地进行批判，星期天也不休息。为他们捞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帮助黑帮转移视线。五月八日后，我虽然发现他们有些问题，（比如，批判邓拓只从人生观上批判，热心于大文章，大兵团作战，事倍功半），但我从爱护观点出发，提了意见，使他们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六月三日还写了一张围攻热零零二革命左派的大字报。六月七日大会上，我由于轻信了广播台同志所提供的材料，虽然直观上想反校党委，但客观却帮了他们的忙。

2、校党委被揪出来以后，我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

随着前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各高校揪出很多黑帮后，我深深感到这太触目惊心了。随之而来，我想，清华党委真过硬，在六月九日前竟没有一个辅导员以上的干部出来揭发，真可谓“铁板一样”。于是，我就说，党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总说是完全适合的，但具体到清华园这样一个大黑窟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做不到的，把毛泽东思想在清华园的威力估计不足，产生了敌情扩大化的形势估计。

3、一些过左的行动。 由于对形势估计有错

误，所以带来我们执行党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方针有问题。对于我班从前保过皇的人虽然是把他们看作是百分之九十五范围内的，但在团结的过程中，强调斗争多了些，而且耐心的帮助和等待不够，不利于一道团结起来打黑帮。而对于黑帮们，我就想迅速地七斗八斗、斗臭、斗倒，对工作组迟迟不斗，表示不满。

4、对王铁成的认识犯过严重错误。 六月十九日当我得知王铁成变“疯”并被工作组看押不让出校门时，我就怀疑对王铁成进行政治迫害。王铁成十四日贴出的大字报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与结论，但我总觉得他的革命精神是可嘉的。六月二十日，走访数力系文革，得到一些关于王铁成情况。六月二十三日我见到他，谈了一个多钟头（仅仅见过一次）他澄清一些谣言。并发表他是怎样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他表示支持我，于是我觉得王铁成是受过迫害的革命同志。他业务能力很强，善讲话，回到宿舍时，我对组同学说过：“王铁成现在遭迫害，将来抬头时，可以做负责干部”但我对王铁成没有做过其他调查。直

到七月十日批判王铁成大会上，得知他家是漏划地主出身，干过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自己承认的），我才知道我轻信了他。他不是一个革命左派。而是一个有很多反动观点的。是反革命但是否就定案，是否就应该扣押专政，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只要我们做法得当，铁成还可能被改造过来。从王铁成事件我得到深刻教训，就是说怀疑工作组的“保蒯派”人物不是百分之百是左派，而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家伙。 5、采取绝食斗争是错误的。 虽然工作组无理不让我去中央，并强行拖我出屋关起来，但我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表现我过于性急，但对党中央的威望估计不足，对形势有些悲观。但后来当我发现工作组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就停止绝食，反其道而行，非要活下去不可。我树立一个坚强信心，不管到哪天，党中央总会了解我们学校全部情况的，也一定能对我作出最正确的结论。于是，我准备长期斗争，原准备七个月，想不到一个月不到，中央首长就下来了，我就意外地被释放了。

6、我犯错误的原因 一句话，我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完全改造，在政治上，我由于本阶级经济地位的不稳而导致政治上左右摇摆。经常犯革命急性病，或有时表现出悲观主义。在思想上有片面性和表面性，对情况不作深入的调查而经常下一些符合自己愿望的然而是不正确的结论。在组织上，有宗派主义倾向。过多信任同意自己观点的人，而不作分析；而对反对自己观点的人则表示不信任，听不进他们的话。 我还有很多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一个多月的斗争中我经常表现出个人考虑，比如自己的前途，家庭影响等等。在尖锐斗争面前表现不敢放手斗，有时我还想“露一手”出出风头。在取得局部胜利时，往往骄傲起来，看不起同志。 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我自己有很多幼稚的想法，以为一切都会顺利，而且往往以感情代替党的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多损失。 我第一次检查就到这里。我请求全校革命师生热忱地帮助我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监督我的言行，随时提出批评，我保证知错必改，并好好学习主席著作，争取以后少犯些错误（看来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我也希望那些现在反对我的，但真正要革命的同志，也请你们提出意见。如果你们自己有错也希望能改正。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打不相识。我希望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如果大家对我有意见有要求，请写在下面白纸上。凡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忠恳地提

出问题，善意的询问，我都将以充分解答。恶意的指责，我区别对待。必要时回答你们问题。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贴出《站住！叶林，把帐算清再走》的大字报：

一声春雷起大地！党中央发布命令，撤销高等院校工作组。好啊，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我们从心庭里喊出：“毛主席万岁！我们永远跟您老人家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但是，我要正告叶林，你从这项决定中捞不到一丝一毫的便宜，你不要以为，唉呀，我正下不了台，这下可好了，撤销就撤销，卷起铺盖走吧。这是妄想！永远办不到！原来，我对你抱有很大希望，虽然你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我总以为你是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受党教育多年，一定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下决心改掉。所以，我一再委曲求全，忍让，再忍让。在我写给你的六封信中，把我的心里话全掏给你，遵照主席教导，帮助你认识和改正错误，并以最大耐心等待着你拿出行动来。但是，你，叶林，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把我的忍让当着软弱的表现，你不但丝毫不承认犯了什么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倒打一耙，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们检查错误，低头认罪，交出幕后策划者。昨天大会上，你的发言，最后表明：你是下决心不承认错误，准备和广大革命师生对抗到底，和党中央对抗到底！那么好吧，你自己硬要走上绝路，我们也无法挽留。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决不会让你任意横行下去。你说你自己仅仅是“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仅仅是走群众路线“不彻底”的问题，呸，谁听你这一套！你定调子定得够多的？事到如今还想用定调子来束缚住我们，太幼稚了一些吧。既然你不要脸，那我们也不留情，揭一揭你在文化大革命所干的勾当吧。

一、顽强地抗拒和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到清华，看到全校师生员工高涨的革命热情，慌了手脚，大泼冷水，压制群众革命，你们使尽种种毒辣卑鄙的手段，残酷地打击和镇压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革命派。清华工作组是谣言制造厂，叶林是这个厂的总经理，只要对破坏文化大革命有利，什么谣言都能造出来、你们还制造六月二十二日事件，收大字报底稿造假档案，大搞无产阶级左派材料，组织反扑。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了几张大字报，你们就暴跳如

雷，谩骂恐吓，横加罪名，组织围攻，轮番作战，进行政治陷害，甚至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权。二、盗窃党的名义，大肆制造对叶林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他们以“当然党的领导”出现，拼命无耻地吹嘘自己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谁要提意见，谁要怀疑他们，他们就扣你大帽子。“反党”，“夺无产阶级权”，“反革命”大帽子满天飞。甚至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一切工作组说了算，谁也不能吭一声，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前一阶段清华园内一片恐怖气氛。三、不走群众路线，做官当老爷，国民党作风十足。工作组一进校，哇拉哇拉，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一手包办，“选”出文革，坐在楼上等着汇报，不进行三同，来去小汽车。发号施令，盲目指挥。只听得进奉承话，听不进批评话。对群众提的大量意见从来不闻不问。一句话，不想当学生，只想当先生……只想做官当老爷。——十足的国民党作风。

四、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 清华工作组十分害怕我们广大师生掌握主席思想，来识破他们原形。因此极力抵制和反对学主席著作。到校十多天，从我班来讲，从未组织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或社论。他们怕主席思想怕得要死，“革命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是主席思想。“应该考验和监督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是主席思想。我写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信是基本符合主席思想的。可是叶林见此就害怕，就骂街，就跳起来，就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学毛主席著作或念语录，他们骂我“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他们的政治迫害大会却是什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会”。关键性的好社论，如《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或者迟迟不播，或者放在次要节目里播送。迟迟不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五、抛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大搞改良主义。处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面前，工作组惊慌失措，大叫“过火了”，“打击面太大”，“无秩序”，“像一群羊”。他们不让对大黑帮分子七斗八斗，对各种的错误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而片面强调“准备”、“细致”、“团结”，企图搞改良主义，合二为一。第六，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清华工作组，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对真正革命左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不要国法，随便关押同学。他们依靠从前在反校党委时保皇过硬的同学，捏造事实，强加罪名。打击左派同学。在高压政策下使广大左派同学不敢吭声，抬不起头来。他们丝毫不讲民主，专横独断，大搞“一言堂”。第

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虽然对革命左派咬牙切齿，但他们对前校党委黑帮却亲如一家。他们开始借“从下往上”的名义大整辅导员，最多整一整系党总支。企图牺牲小卒，保卫将帅车马。后来，干脆把斗争矛头直指革命左派，狠狠整了二十多天。只是由于向党中央交不了帐，向广大同学交不了帐，才不得不忍痛抬出大黑帮让同学打，他们还要“牺牲将帅，保住车马”的阴谋。他们让黑帮党委纷纷登台“揭发”，这些黑帮们个个精神抖擞，英勇不减当年，慷慨激昂，大骂原黑帮党委。企图借此大捞政治本，埋伏下来准备将来东山再起，来个反攻倒算。工作组还卑鄙地使用许愿的方法拉拢一批人，为他们当打手伙计、造谣专家。支持我吗？给你干部当。你给我提意见吗？罢你的官！就是实行这样一条组织路线。

第八、封锁对抗中央，大搞“独立王国”。工作组知道：他们所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让中央知道了不得了。于是他们不顾党纪，不让左派同志去中央反映情况，甚至非法没收同学给党中央写的信。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工作组还经常封锁校门，人家来支持我们革命，他们不让进。也不让我们去支持外校革命。他们步前校党委后尘，大搞“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谁也过问不得。谁也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以便关起门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第九、打着“红旗”反红旗。清华工作组领导，叶林等人，言行不一。说得好听，做起来一塌糊涂。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说要发动群众，可是拼命压制群众斗争。他们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见了毛泽东思想就怕得要死，他们说欢迎同学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可是叶公好龙，一见给工作组的大字报就冷汗直流，脸色发白。一句话，他们披上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拼命反对毛泽东思想。

够了，甭多举了，难道以上这些仅仅是“缺点和错误”问题吗？不！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以他们的行动，给我校文化大革命造成巨大的、不可饶恕的损失。

清华工作组是一块不折不扣绊脚石。他们比起北大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过之无不及。

这样的工作组要它干嘛呢？赶走不更爽快一些吗？党中央关于撤销高等院校工作组的决定，说到了我们心里。但是走也不那么容易，得把帐还清才能走。

为此，我严正向叶林提三点要求：

- 一、必须彻底坦白，深刻检讨你自己和工作组在前一段时期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全校大会上，回答革命师生提出的一切问题。
- 二、必须由你自己亲自宣布绝大部分“保剃派”同志是革命左派，打击他们是完全错误的，

非法的。尤其是被你们扣压的同志。 三、必须由工作组自己出来澄清自己造的谣言。 叶林，你在全校大会上曾宣判我是“假左派”，真右派，“保皇派”。我坚决要求你承认这个判断是非法的、胡说八道的、别有用心的。并且，要你重新如实地向全校同学反映我的情况，而不许造谣歪曲。 以上要求，叶林必须完全满足，除了你被党中央判决劳动改造，那和你没有事。但是，你要想滑过去，想还去做领导，告诉你，办不到。你一天不答应，我一天和你没有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还要和你把这笔帐算清！ 有人说，你想翻案！我说，这个“案”翻定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撑腰。难道还有革命者算不清的帐吗？ 雷蓉、王小平二同志的大字报重新点燃了清华园内革命的大火，一股被压抑的革命力量抬头了，叶林纵有天大本事也压不下去了。让我们欢呼清华园内一片大好形势！ 我坚信，清华园内坚定的革命左派多得很，他们对党最忠诚、最肯学习主席思想，斗争中最勇敢，最聪明，他们不迷信，无框框，实事求是，敢闯敢干。他们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死对头。 让我们团结起来，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一切牛鬼蛇神迅速暴露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 再一次正告叶林，站住，把帐算清再走！ 清华大学化 902 剌大富 七月二十九日 关锋同志：请你把我这份大字报转给党中央。并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人下来，依靠清华广大革命师生，严格审查清华工作组、叶林同志和我本人。致 敬礼 剌大富 七月二十九月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感到北大的革命火焰已经高高地升起来了，要揭穿张承先，张德华之流的挑拨离间的罪行。你们要分清是非，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上团结起来。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至於革命干部子弟，他们有何罪？他们有缺点，有错误是难免的，他们上了当，他们是我们的好儿女。张承先，张德华欺骗了他们。你们欢迎不欢迎他们归队呀？至於工作队员，我希望你们对他们要一分为二，不都是坏人，大多数是好人。我收到他们很多信，特别是海军同志的来信，他们痛哭流涕，说上头压着他

们，他们没有办法。对这样的同志，就采取不同的态度。至於张承先，张德华死不悔改，坚决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应该斗倒，斗臭，批倒批臭。大量事实证明他们不是来革命的，而是来镇压你们革命的，到今天还不老实，要他们交待，继续检查，什么时候你们不想听他们那一套了，就让他们走。

我刚才收到你们的条子，说要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的什麼协会，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坚决参加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麼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他们对聂元梓这样的左派有很多的流言蜚语，进行挑拨离间，难道他们就不会对你们这样做吗？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要识别他们是什麼东西，揪出他们的后台老板来。聂元梓同志给我和康生同志一封信，有一要求，我念一念：“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我要求工作组二组和海军同志留下来继续担任北大的保卫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目前我们一时很难接下来，他们全部撤走，会给工作带来损失。敬礼！聂元梓”

革命的同学们，教职工们，你们信得过他们吗？（信得过）好，那我们就建议把他们留下来。我的话讲完了。

朱德讲话

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支援你们的。你们两月来的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也是夺取政权。两个月来夺取政权的这个反复，你们胜利了。这是北大师生的光荣胜利。你们夺下了北大的政权，也只有你们才能接收。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办事主要靠主体，主体是学生，其他人是为你们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来还没有无产阶级的学校，怎么办？头一次靠我们夺过来，以后怎麽办好，是你们的事。你们是接班人，接学校的班，今後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你们的事业，要好好办下去，相信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思想比过去强。以后学校毕业了不同以前的，专做官做皇帝，以后任何事情都得做，军的事要做，工的、农的事都做，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共同向前进。我希望你们大家更加努力，更加办好。

康生讲话：

几次到北大来使我得到很大教育。从六月一日到现在，我们看到北大文化大革命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是，又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两个月中经过了很残酷的阶级斗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六月廿日看到一份〈北大简报〉，也看到张承先在北大工作二十天来的〈工作简报〉，这两个文件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文件，残酷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在一个革命的文件和两个反革命的文件中，希望同志们好好分析研究。在这些文件中，为什么说“五·二五”大字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呢？大字报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如果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算起，即从去年十一月十日算起，到今年六月一日为止整整七个月减十天，整整二百天。二百天的历史很短，但是当中经过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展开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当中经过中央书记处十几次革命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你们党团员都看过了吧，称为“五·一六通知”，有许多干部知道中央指示，因此在二百天的斗争中产生北大“五·二五”大字报决不是偶然的。五月廿五日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是揭发了彭真、陆定一这个黑帮。但是，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当时北大在陆平，彭佩云黑帮的统治下，通过他们的一些亲信爪牙，蒙蔽同学们，造谣说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七点以前，广大革命师生欢迎这张大字报；七点后，陆平布置后加以围攻。五月廿五日后受到陆平反革命的还击。

五月廿五日大字报点起了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火火焰，陆平想扑灭。但我们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六月一日看到了这张大字报，就采取了措施。一下午四点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并且明天登报。我接到这个通知，感到聂元梓解放了；当时我、杨克明、张恩慈等同志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也受到压抑，我们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晚上八点钟一广播，整个北京城就爆炸了。中央广播电台半小时内收到北大九十多电话，有的赞成，有的怀疑，有的指责说：“谁叫你们广播的？”……他们是不了解的，以后就清楚了。同学们说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你们常讲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看到了大字报，看到了从群众中来的大字报，马上广播又回到群

众中去，一夜就点起了文化革命的火焰。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什麼叫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要支持革命，赞成革命。

巴黎公社不是马克思发动的，但是发动后马克思就热烈支持，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现在我们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北大“五·二五”大字报，毛主席使它点燃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掀起了全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什麼性质呢？这是廿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是北大全体革命师生的一种光荣，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点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个革命，不仅关系我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对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革命师生要珍惜这个光荣，要爱护这个光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一般的阶级社会，不仅存在于经济范畴内，在政治范畴内，而且存在在思想范畴内。我们从北大这次斗争中，看到了我们经历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北大的广大革命师生同张承先，张德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我上次出了个题目，我问：张承先到底是什麼样的错误？当时有的说路线错误，有的说路线性错误，有的说右倾思想。今天你们答复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回答的完全正确。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呢？不单是阻碍革命，不仅仅是个绊脚石，绊脚石躺在那里不动，绕一个弯就过去了。而张承先不但阻碍革命，而且利用职权和工作组的名义，跑到北大来镇压革命。这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是代表资产阶级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来北大实行什么？“六·一八”以后，实际实行的是白色恐怖。今晚，西语系揭发有个女同学服安眠药自杀，这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张承先你回答一下，（张承先答：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你为什麼不报告？（张答：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罪，有罪。）

同学们，你们从这件事得到了什么教训？他对陆平、彭佩云这样关怀备至，对革命同学自杀了也不汇报，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了。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们这些镇压群众的活动，也集中的表现在北大六月廿日的简报上，这个简报实际上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有一个报告叫什麼<北大廿天工作经

验》，完全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把革命群众说成是反革命。”六·一八”后，根据他的指示，班与班、系与系，不准联系，校外更不准联系，工人农民支援也不准进入校门。过去陆平不敢实现的事情，他却实现了。虽然有的同志直接受压迫，有的受蒙蔽，也是间接受迫害。今晚雷俞平，李仰杨自我检查讲得很好，我十分欢迎。他们有个时期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赞成留下工作组，这是要由张承先负责的。是间接受迫害的，同学们应当原谅他们，这样才能在毛主席教导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

江青同志说得对，对工作组要个分为二，把张承先，张德华同工作组的好同志分别开来，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张德华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罪过，必须彻底交待，马马虎虎过关是不行的，不仅对群众是通不过的，对他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张承先你要把自己廿日的汇报和简报好好地看看，把你们镇压革命的文件，同聂元梓的革命大字报对照一下，这对他有好处，对我们大家也有好处。说实在的，我在北大的阶级斗争中深受教育，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是活生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虽然我们运动出现曲折，但可以接受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革命群众，革命左派。六月廿日有个同学叫王运良，贴了张大字报，听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就问郭影秋知不知道，题为《郭影秋是什麼人？》只有两行字。孙友渔立即作报告，五千字中有四千字说他是挑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这样要流血，对这个同学打击。结果挑动同学打击同学，打击左派，甚至流血。从这个问题上说，人大，北大要驻军是千真万确的。北大团委丁监写了一个材料，郭影秋也是知道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也是千真万确的。至於驻兵的目的，是要调查，调查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人大说军委和华北局都知道。彭真是否有阴谋，不一定。一，彭真要搞政变，中央文件上有。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就是要搞政变的。这种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分子，时机成熟就要搞政变，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什麼时候搞，我不知道，只说时机成熟，没说今年二月搞。二，彭真是否真的抓军队，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和罗瑞卿勾结，就是要通过罗瑞卿抓军队。

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麼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权？要。已经和罗瑞卿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有驻军？军委、军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孙友渔利用这件事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麼孙友渔要拿这个来围攻革命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蒯大富贴出《当前必须解决的八个重大问题》的大字报：

处在目前我校形势，我们觉得下列八个问题，是必须马上解决的。现提出来，供全校革命左派以及一切要革命的师生员工、工作组员们认真考虑：

1. 目前这场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能不能半途而废？要不要进行到底？如果不进行到底将发生什么严重后果？
2. 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没有？（包括六月二十四日以前和以后），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矛盾性质是什么？是否能完全排斥敌我矛盾？
3. 有人说，工作组现在在搞阴谋。他们名亡实存，阴魂不散。他们以退为攻，假惺惺地道歉，先来舍基层保大头，大头保住后再来保基层，他们想转移视线，急刹车，想使个金蝉脱壳计，滑过去。……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望大家结合我校目前情况分析。
4. 工作组能不能合成一个整体？为什么工作组员现在不敢说话？他们受到什么压力？怎样解除？怎样使他们敢于为革命而坚持真理？即：怎样揭开工作组的盖子？
5. 教职员大多数不敢说话，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除他们的压力，使他们革命？
6. 现筹委会是否合法？能不能由他们提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他们是不可缺少的机构？还是绊脚石？有必要剥夺筹委会的政治权利，让它只负责事务性工作？以后通过充分酝酿再选举？
7. 从前有大批左派遭到迫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不要进行控诉？
8. 现在有不少人为革命左派翻案，为革命的大字报翻案，为革命书籍翻案，为革命会议与革命串联翻案。一句话为清华师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翻案。大家看，这种翻案有无必要？它反映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志们，我们要对革命彻底负责，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彻底负责。坚决彻底革命，决不搞改良主义！一切要

革命的人们，慎重考虑我们以上八个问题，用大字报提出你们的看法吧。蒯大富
八月四日中午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晚，李雪峰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
李雪峰同志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由新市委主持，请同志们发表各种意见，特别是批评工作组和新市委的意见，欢迎递条子，热烈欢迎批评，贴大字报。两个月来，新市委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缺乏彻底革命的精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虽然也谈了放手发动群众这句话，但是群众起来了，就怕，怕这怕那，怕字当头，一句话，怕群众大民主。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说过北大“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我们说过“右派”学生、左派学生争夺领导权，因而发生学生斗学生的事；我们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是原则性错误。不论哪个时候都是原则性错误。因为新市委可以批评，也可以反对。新市委还有个错误是派工作组，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认识到，使同学长期迷信工作组，觉得没有工作组不行。这是不信任群众，这样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这个责任应由新市委负责。至於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有什麼错误，应由你们批评，应听你们的意见，他们应该欢迎批评。

今天大会先由叶林同志检讨，再由同学们发言，是不是可以？（众：可以）同学们发言后由周总理讲话，（全场欢呼）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讲话。（全场欢呼）刚才有好些同志递条子，要求把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介绍一下，现在我来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周总理，（全场欢呼）那边那位是董必武同志，董老，（全场欢呼）这边第二位是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欢呼）那边第二位是李富春同志，（欢呼）这一位，边上这一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同志。（欢呼）下面我介绍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我首先把组长，副组长说一遍。组长陈伯达同志（欢呼）顾问康生同志，（欢呼）他没有来，他到北大去了。今天北大也开同样的大会。副组长江青同志，（欢呼）她也到北大去了。还有副组长张春桥同志，他也到那边去了，今天在这里的有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刘志坚同志，下面是文革小组成员：这边第二排是王力同志，那边倒数第二个戴

眼镜的是关锋同志。这个是张平化同志，这是穆欣同志，杨植霖同志，刘文真同志。其他的都是外地来参观的同志，不另介绍了。

周恩来在辩论大会上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

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就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内只要愿意继续革命，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来考验自己，检查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我首先讲讲今天这个大会。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件工作对我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会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回的。确实在开各种会当中，又像廿九日，卅日一样，廿九日找工作组开会，卅日找工作组同志，找同学谈话，看文件，看抄来的大字报，到今天才六天，我对清华的详细情况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也就在客观上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北京的）对于前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党中央指定的新北京市委敲锣打鼓地欢迎，要求新市委对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仓促决定，仓促上阵，没有仔细地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当前的政策是什么，应很好地交待，甚至整个北京市派到各学校，机关的工作组加起来近一万人，是从各个战线，各个方面，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没经过充分讨论，向他们交待政策，也没有交待任务，这就给工作组本身造成很大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带着行政机关的老办法，有的还带着行政命令，包办代替，不走群众路线，不跟大家商量。所以，即使是很好的工作组，也很难取得很大的成绩。把方向搞错了，就是说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在学校进行三大任务：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不是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集中力量向这个主攻方向战斗，而是转过来，工作组在群

众中找岔子。找毛病，发现问题，就领导一部分同学斗另一部分同学，必然引到严重的错误方向上去。而今天这个会上的表现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有同学递条子上来，问今天这个会的布置是不是有很大的阴谋。我向你们回答，我是过问了这个事的，没有阴谋。可是会上的情况反映了大家还是互相对立，争论不休。这是把工作组引向错误方向的结果表现出来了。我在七天以前，到另外一个学校去，第二外国语学院，那里的工作组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也批判了工作组，双方同学对立争吵，隔阂很深，互相争吵了两三个礼拜了，吵得眼都红了，我走了以后，看来还要继续吵。这是工作组引导错误的。结果。我劝大家应该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在学生中打架破坏同志的关系。在主席斗批改的方针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他们都赞成了，但是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宿舍里硬是不说话，在饭堂里也是瞪眼睛。这个情况今晚在清华也看到了，是最好的客观表现。我们台上的许多同志不满意这种情况，可是客观是这样。在会上的发言次序可能有错误，前一个，后一个还是对立的，如果有错误，这是我到清华来第一次犯错误，可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但他们还是要讲，讲一讲也好，听一听。今天全国来参观的同志很多，听一听嘛，看看理由，到底站得住，站不住。但不管怎么样，总是证明工作组，在根据新市委召开的中央文革几个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这个时期的方向引导错了，不只清华，整个工作组方向错了。即使初期有必要，客观需要派工作组，也应该很快地发现派工作组在客观上是阻碍学校文化革命的发展。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自己当家作主人，依靠群众闹革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因此，我们应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我们检讨。工作组应该检讨，更不应把责任推到同学和革命的教职员身上。

现在我来讲一讲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学校革命靠你们，应该肃清错误根源，应该做彻底的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是毛主席的战友，学生，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误。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民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人，依靠人民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如此，世界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在我们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是这样，解放后十几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基本上的精神、路线就是要放手反动群众。我

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年轻的同学说得对，就是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有革命造反的权利。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同学们，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阻碍革命运动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学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革命的学生，教职员。而工作组来了，如果起个战士的作用，那还许可，可是我们在工作组派来后，又加了一些限制，生怕群众运动搞乱了！这都是旧的观念，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在作怪。正如主席常常批评文明的那样前怕狼，后怕虎，对群众运动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限制这个，限制那个，一句话，怕乱，怕字当头。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推行的那种修正主义秩序搞垮，只有把旧的修正主义秩序斗垮，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这种怕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想维持资产阶级的旧秩序，是想维护当官做老爷的旧秩序，不是文明需要的革命的秩序。

我在这里应该说，凡是党中央过去的指示和新市委决定中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应该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应该把它废除。我们应该承认在北京工作的常委同志有错误。这一点，一说你们就懂了。向学校甚至机关派工作组，不是好办法，在客观是起了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的作用。它只是代替旧的党的领导，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灌输的方法，而不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它的缺点，有的地方想了，想得不周到，一直到主席亲自抓这个问题，才认识到工作组应该撤回。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年轻一代，特别是大中学校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有机会自己起来革命，自己当家作主，其实中国学生运动的传统，远的不说，清朝末年，就是在北洋军阀时五十年前的“五四运

动”和三十年前的“一二·九”运动，都出在北京，而且都在大学生之中。我们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两代学生。我们那时幼稚得很，比你们幼稚。我们那时敢於闹革命，闹抗日运动，为什么在今天，在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反而不相信你们这一代呢？这不是对你们的信心不足吗？不是对形势估计错了吗？对工作组估计过高吗？这是为了使我们更有信心，打破中国局面。不错，拿清华来说，在蒋南翔领导下，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清华园。但是没有什麼了不起，只要你们两万多革命师生，教职员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进行斗批改三大任务，相信清华的革命志气会比现在高涨，矛盾不会像现在这样多。革命的师生互相作对，互相不相信，互相争论。根据我所知，在一个班不说话，在一个屋子里也不说话。今天在会上发言的两派都是一班的，就是相对立的。这证明工作组处理这件事做错了，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更错了。同学中有争论，这是内部问题。不应当用二十三天的时间，甚至更长，二十四天半，在同学中挑起这样大的对立，把同学内部的问题引向敌我矛盾，限制自由，监视，压制，盘问，围攻，轮番斗争，直至按手印，造成绝食等等。这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我不相信这个扣子解不开，我和两边同学谈了，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谈通，所以今天大会上还是有这种情绪的反映。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我不回去。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们上面要负起这个责任，没有向工作组交待好任务和政策，……以致造成北京市几乎无例外的工作组与一部分同学对立，引起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同学斗争，转移了主功方向，整个方向错了，这是上面的责任。具体到清华，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问题，及各系扩大了围攻，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要负更主要的责任，叶林应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甚至划押，盘问的这些同学赔礼道歉。刚才说的这些事，应结束这些争论，结束这种对立。当然，我不是说原则问题不要争论了，而是说同学之间的敌对状态，互相攻击的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及时地把主要矛盾转向斗黑帮。叶林同志是初步检查，同学们对他们的检查不满意，觉得检查不够深刻，可以继续开这种辩论会来进行讨论。今天会上宣告解决的问题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争论了。今天就有新清华的新革命精神，主要转到斗批改方向去，要进行这三大任务。首先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辩论，批评是需要的，应说明，五百多工作组同志总的是好的，是革命的，是愿意为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效力的。

是老革命，好心肠，没做好事，给文化革命带来损失。我们上面要负责。明天下午我们要单独找他们开会，更彻底地说一下这个问题，使他们不背包袱，心情愉快地，真心诚意地接受你们的批评。总的方向是领导小组负责任，叶林同志负主要责任，如果各系、各年级，对系、班的工作组开中小会批评也可以。什麼时候，哪一部分检讨完了，搞完了，建立了革命的友谊，相互达到团结一致的结果，就可以离开了。五百多人不是浩浩荡荡一道来的，也可以分批离去。如果你们发现问题，要他们回来，我想他们会高高兴兴回来的。只要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对任何错误，批评都是无所畏惧的，只要是善意地批评，一定会接受，愿意改正。在这里我还向工作组说几句，你们留在学校里还要和同学接触，不应象过去那样，把自己和中央，市委等同起来，要遵守纪律，不要在会上这样宣布，回宿舍，饭堂又嘀咕，下次还是这样对立起来。这就是工作组的影响。要承认这一点，对这一点，应向工作组同志郑重要求他们这样做。现在清华园的同学，教职员，凡是要求革命的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究竟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这样的锻炼，就在这半年的实践中证明，有现在不同观点，究竟谁是左，谁是右，谁是中，不能自己定，这不能由自己封为好汉，也不能由上面赐给，只能由他在斗争中说明自己是哪一种。你们都很年轻，中学，大学同学二十岁左右，不能不犯错误，只要不是执迷不悟，左点，右点，青年人是允许的。

列宁这样说过，毛主席也这样说过。当然犯错误要懂得改正，而且要多次改正，不会一下子就做对了。青年不可能，我们自己也是从青年过来的，当然比你们更幼稚，犯的错误更多。只要决心革命，有了错误知道了就改，跟毛主席走，跟不紧，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我们还经常勉励自己，做毛主席的好战友，好学生，我们还要保持晚节，不要因为老革命，有四、五十年革命历史，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的老同志，董必武同志可以作证，董老在五一年会议上说，我们老一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遇到新事物往往脱口而出的话，猛一想常常是错的。要是冷静想一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想一下，就比较接近正确。这是具有四十五年党龄的八十岁的老同志，我们全党的老同志还这样说。我比董老晚二十年，我要很好地向他学习，你们更要向他学习，你们这样年轻，就保险不会犯错误吗？我相信你们读毛主席著作读得比我们多，记得比我熟，常常你抓这一句，我抓那一句就吵起来了，但是你们用得那样准吗？就没有一点旧

习气？就没有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的影响吗？就家庭出身好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仔细研究一下也有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进行社会调查，阶级分析，常常要从自己家庭开始。我经常拿我的封建家庭来解剖，今天不能讲了，以后到你们这里来讲一次。有人问，今天为什麽不把蒋南翔拿出来批判，今天主要是结束工作组检查，不要把题目混淆了。工作组批评好，更有力量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你们清华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并起草了章程。上午在中央书记处，文革小组开会谈了，党在学校的政策不是这样。相信你们这样想会有一定的考虑，更相信你们会按毛泽东思想，按中央政策办事，因为这样才能按党的要求争取团结。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这个政策在清华园也不例外……。当然这不是一下子能达到的。只有通过斗批改才能达到。

今天只能回答这些，希望以后大会，中会，小会常开。工作组不负责任了，临时筹委会还不是自下而上推选的，但是总得有人办事！最后一位同学代表几位同学发言，进行了自我检查，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就让他们暂时工作几天，给他们一个考验机会，做给你们看看，不行就改选嘛！而且他们要马上筹办自下而上的选举，正式成立筹委会，总之要有人管事。清华园这么大，两万多人的事，还总要有人做，应该信任他们，考验他们，并且还要进行正式选举。所以，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过去清华受蒋南翔控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提倡旧清华精神，革命的精神受到压制。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在清华大学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炬，进行斗批改三大任务，同时要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今天仅仅是叶林同志检查，其他人还要讲可以在中会、小会上讲，以后应满足这个要求，或登台发言，或书面发言。刚才说过，这些错误必须也只能由工作组和上级负责，至於学校本身革委会的同学 他们不能负责，他们是在工作组指示下办事的。本来任何同学应该独立思考，自觉地进行工作，可是在工作组这样的领导下，他们是被动的，最後一位同学说他们是自觉执行的，讲自觉也对，他们自觉相信党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相信工作组是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因

为……又忙于事务，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据我们所知，你们每天有两小时学习毛著的时间，可他们上面的同志到现在，到十二点以后才有时间学习，这是实际情况。他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我批评，促使他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同学们对他们一方面给以善意批评，另一方面给予应有的原谅，这样才能达到团结，推动大家进步。

董必武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对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的意见已经讲了，我本来没有什麼话可讲了，有许多同学递条子关心我的年龄，要我早点休息，我不愿休息。为什麼呢？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几十年没有见过，我是来学习的。我参加这个运动，我不是老了，我是年轻了一个甲子！（热烈鼓掌）

我和你们一道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对我来说，脑子里的旧思想不是比你们少，而是比你们多些。当然在旧思想方面，跟毛主席走了几十年，搞掉了一些，但是还有好多没有搞掉，现在应该搞掉。毛主席思想多一点，就把旧思想挤掉一点。脑筋是物质，物质旧，装进一点东西就可以挤掉一点东西，多一点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把旧思想挤一点出来。

我祝你们彻底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祝你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我祝你们建立一个大体满意，不是彻底满意，彻底满意不可能，（董老说到这里笑了）只是大体满意的教育制度。我的话完了。（全场热烈高呼“祝董老身体健康！”长时间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热烈拥护周恩来同志今天发表的一篇很好的革命讲话。（鼓掌）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鼓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热烈鼓掌）

邓小平同志讲话

陈伯同志讲了三句话。我也讲三句话。（笑声）第一句话，我不是来讲话的，我是来学习的，向你们取经。（笑声）第二句话，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同志

在这里讲的很好的讲话。（鼓掌）第三句话要说的，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常委同志决定派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阻碍了群众运动。

我相信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广大师生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己的智慧，能够纠正前一阶段由于工作组所犯的挫折和错误，把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得更彻底！（鼓掌）

清华的革命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邓小平在会上说：

同志们：

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现在市委宣布从大专学校撤走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大专学校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很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学生和教师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学校的工作组，一种是在新市委直接派的；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河北省以及四清工作队抽调的干部，临时集合起来，由新市委派出的；另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派出的。

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于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必须加以改变。

自从中央宣布改组旧市委，报上公布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北京市大中学校掀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猛烈地冲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冲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在这样大的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运动中，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以我们大学中学革命师生的觉悟程度和思想水平来说，是不难解决的。我们对待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办

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还有的决定，例如中学集训，军训等问题的决定，也是比较仓促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而工作组到各校又是非常仓促的，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作具体交待。工作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导运动，有些不好的工作组还违背我们党历来对群众运动的方针，自己搞一套，瞎指挥，乱闹一通。结果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搞得很糟糕，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基本的教训是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估计过低，对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引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革命的伟大意义估计不足，从而推动和带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实行广泛民主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这一个多月是一个曲折，要从这一段反面经验中得到益处，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掌握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领导群众运动。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训，市委工作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训，工作组的同志也要从中得到教训。

再重复说一说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可以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领导上对他们的帮助也不够，上面已经讲了；加上没有搞过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多数同志没有学会运用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仓促上阵，用过去在工厂，农村中工作的经验，有的甚至凭自己的想法去领导运动，所以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些责任要由上面来负担。工作组不少同志受到群众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工作组的一切好的同志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应该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得到群众的帮助，这对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会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是很有好处的。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很必要，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的根据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才能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搞好，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才能保证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这三大任务不但工作组担当不了，市委和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担当不了，只有依靠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来实现。因为你们了解情况，你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担当起这个任务。中央完全相信，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能够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用群众自己革命的组织形式革命师生员工代表会议，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动员师生员工自己闹革命，也就能够通过运动，包括教育犯错误的人。来实现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的大多数的方针和政策。

我们相信，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运动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相信，群众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夺取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刚才小平同志已经代表我们中央工作同志讲了话。我现在根据他讲的话补充几句，特别是站在做政府工作的这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礼拜下去，向群众们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想讲几句。

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

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进的地方出现了高潮。但是刚才小平同志说了，就是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说，开始是轰轰烈烈，中间有点冷冷清清的现象，也有些地方转为各个学校或各个机关内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现象，那么，现在又在转，又转到新的高潮。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曲折呢？依我看，我们做领导工作，不论是中央的，在地方的。在政府里的，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是估计不足。第二点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在北京，过去旧的北京市委，旧高教部的领导，旧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都犯了严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黑线性的错误。这就是一种罪行了，不单是普通的错误喽！这些部门的领导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文教工作，首先是北京市的文教工作，教育工作，如学校哇，许多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各个文化团体单位。

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起来了，他们就要问自己机关里，学校里的党的领导是否也是黑线，黑帮，起码他要怀疑，都不信任了。所以六月上旬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大家一方面敲锣打鼓，欢呼新市委的成立，改组；另一方面要求新市委派工作组，帮助他们搞文化大革命，不相信原来的领导，原机关的领导，这是很自然的，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问题在于我们做领导的，要想一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的要求。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工作组是从另外的机关另外的地方调来，仓促上阵的，他们没有经验，特别是从政府各行政部门调来的工作组更是习惯于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象我们报纸上号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工作，这样，新的工作组去，开始同学们不论大学，中学都是热情欢迎，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从隔阂走到对立。那么，一个情况，刚才小平同志讲了，也有的工作组是好的，但工作组大多数同志主观上是好的，主观上不是想这样做，但他们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尽管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但是效果就是这样冷冷清清，或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学校和学校的联系也隔开了，那势必就冷冷清清了。这套方法完全不适合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运动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出现了些问题。有些问题在群众运动中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现象也把形势估计夸大了，就是怕乱，怕群众。群众斗群众，互相批

评，因为青年批评起来，斗争和辩论的界限很难分，斗争中必然有批评，有时候卷起袖子，站起来了，马上紧张了，搞不好就打起来了。这种现象我们以前也有过，我们也是从青年来的。当年，但是比起你们，我们惭愧得很了。那个时候搞学生运动幼稚得很。因为你们是在毛泽东时代，你们进步多喽！

当然，凡是学生，老师都不可能那么按框框办事，创造性就在这里创造出来了，按框框就不可能。对当时出现这种形势，个别事件有坏人挑拨，但整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的选择不当，造成这种形势。因此，出现了问题，就是怕乱，造成这种形势，使北京各大中学校的运动就更走向冷冷清清了，有点停顿了，把我们斗争的主要目标也转移了。这么一个形势，这就是六月下半月到七月上半月。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形势如何估计呢？那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第一，我们应该求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翻一翻群众运动应该怎么做，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套求教于毛主席的书还不够，解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环是到群众中去，自己去实践，这才能看出问题。到群众中去学习，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这是几十年来的革命真理嘛！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亲自给我们做了最伟大的典范，示范嘛！我们怎麽能忘记呢？所以只有我们做领导工作的都到群众中去，去实践，去学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一到群众中去，就会看出来了，的确有的地方从轰轰烈烈变为冷冷清清了；有的斗争转移了方向，主要的斗争方向改变了，斗争了群众；有的斗争停止了，甚至有的同学很不满意，这个是很自然的喽！所以一看就会知道。第二，再看看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照老办法，老一套去做工作，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方法，不是接近群众的方式，不是启发群众，不是依靠群众，不是启发帮助群众，叫他们自己作主，就看出来了嘛！就是说，只要去接触，就可以看出问题，就可以发现问题。那么看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然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就清楚了。在高校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首先是革命的学生，他们做主人，由他们来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校的当权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人，把他们斗倒，接着，我们就要批判学校里反动学术权威。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要斗那些人。再进一步，我们就要改革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也就是

我们平常所说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这是我们在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我们的矛头要指向这些，要在破中来立。

那么这个任务依靠谁来完成呢？只能依靠各校的革命师生，首先是革命的学生。只有你们才知道，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上面去的人只能帮助你们。其它没有能力。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员中谁是反动的学术权威？如何在我们的各个学校来施行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就是如毛主席所说的，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个教育，总之也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挂帅，首先是思想领先的这样的劳动者。这些只有你们大中学校的同学，革命的教员学生懂得。人民大学七个同学给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写得很清楚……，怎样实行半工半读，只有你们清楚。用什麼组织方式来作，你们已经创造了，就是你们作的，成立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或者开全校的群众大会或各系的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你们已经创造出来了，当然不是那处每个学校都创造出来了，但雏形已经有了。这就是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作主人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一看就证明了，那点小毛病，或个别的乱子那是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局的。不信。这月二十二日那天，天安门前六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满有秩序地走出来，你们大中学校的多数同学还不是整整齐齐，威威武武地，浩浩荡荡地走向天安门吗？那不就是一通知就行动起来了吗？那样的革命秩序就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经验就证明了你们的革命师生员工中绝大多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们是适应毛主席的战略的号召，备战要求的。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到群众中去学习。我们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铸同志和其他同志到群众中去，他们去体验，我们现在跟着去学习。但是在中央负责同志未下去时，我代表我们全体中央的同志向你们提出个要求：给我们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自由。我们要求自由。我想台上的同志会赞成我这个要求……因为我们下去一下，面孔熟一些，就围起来，看大字报也不自由，谈话机会也困难。所以今天我向你们提出要求，你们回学校去说，中央同志下来时给我们自由，给我们方便嘛！一句话，当然我们要跟你们谈话，大会谈，小会谈，也要参加你们的讨论。上千上万人围起来，就没法谈了。尤其到大学区，电话一打，一下子几万人来了，那这样我们的革命秩序就乱了，这样就容易挤伤人。现在的办法，我们只有在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偷偷地去看

大字报，这样不好嘛！这样就只能看你们写的，不能听你们说的了，这个感性知识还只是一半，还不完全，还很不完全。林彪同志说要抓活思想嘛，不直接接触，怎麽能抓活的思想呢？建议你们回去传达我们这个要求，大家注意一点。（热烈鼓掌）

好，谢谢你们的支持！今後我们首先是下去学习，学习，再学习。跟着就是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学习你们的创造，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创造，刚才讲了，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提出你们所创造出来的办法，这就是在各个院校成立了革命师生员工的委员会和代表会议，各级代表大会，成立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和文化革命小组，根据你们各校具体情况来解决。有的学校现在已经有了，还不完全，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过去有的学校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常常是指派的，不是完全选举的，当然有的经过群众讨论以后，充分地酝酿，又讨论又酝酿，然後自己选出来的。如果没有过经充分的讨论，酝酿，现在可以进行筹备工作，现在可以成立筹委会，负责成立全校的代表大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文化革命小组。因为学校有好多事要办，要靠文化革命委员会来管，你们自己是主人，所以筹备工作，市委重要决定也说了，要由你们自己解决。（鼓掌）经过筹备，把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全校的组织就解决了嘛！革命领导解决了，进一步筹备全市的大专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产生它的领导机构。这要很快进行，这样不难嘛！今天市委要各校派积极分子来开会，不是很快就选出来了吗？当然有的推选的比较仓促一点，有的已经成熟了，很快就推选出来。你们各院校成立了，全市的也不难。只有全市成立了领导机构，常设机构，才能领导全市的文化大革命。有的学校党委，总支，群众信任，还可以领导，通过学校党团组织领导。中央工作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要到学校去接触，到学校去学习。只有学到东西，支持你们，才能说得上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下去，我们不可能去那么多学校，北京市六十多所大专院校，三百多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学校，一共五百多所，最好都能去学习，但不见得都能去。

但是如果发现了问题，你们还可以找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或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室解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或通过必要手段帮

助你们解决问题。这样能上下通气，互相支持，从群众中得到经验。有很多外地来北京取经验的嘛！北京是将近五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嘛！那时是反动统治，现在是毛泽东时代，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得更好！应该上下通气，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所以你们把工作做好是对我们的帮助，你们做好，得出经验，全国来学习，也是对全国的支持，帮助。换言之，你们有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文化革命经验，也是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嘛！（热烈鼓掌）各校师生员工作了主人，工作组撤离要留下学习，主要的首先向你们学习，如果工作组做错了事应该向你们交待，你们提出批评，他们听，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们不熟悉的新东西的经验。他们不熟悉的，犯错误免不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改正就是好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经过几次接触，可以互相了解。清华最多，接近五百人嘛！这是不少的接触，经过这个接触，虽然有错的地方，但是老年，壮年，青年建立了革命的联系，革命的友谊嘛！（鼓掌）这样才不会忘记工作组的工作，工作组的同志也很辛苦嘛！我相信革命师生懂得这个道理，一说就懂了！如果原单位工作组的同志，有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要他们回去就回去，这是个学习经验，锻炼的机会。不管是政府的或军队的，不能他们年纪大就不听你们的，那不对！你们是主人，他们跑到学校搞出乱子，应该到学校交待。还有，有些地方派了调查组，联络组，那么他们只能是调查，联络，仅仅是联络，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们不能指手划脚，乱说乱道。所有现在机关中派了工作组，他们不属于这个范围，我们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这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新的经验，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轻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热烈鼓掌）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

我同意刚才邓小平、周恩来同志他们两位的讲话。在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的总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主要的要靠你们革，要靠各学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革命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们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青年，也学得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你们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少得多，比你们更加幼稚，更不晓得怎么革命，只有革命的热情，就革了，在革命中干，革命中学，经过一些曲折，后来就慢慢地慢慢地学会一些了。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我们过去遇到的事情，你们以后不会遇到的，因为以后的革命不是我们以前的革命。这是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要重新学习，你们要学习，我们也要重新学习。

怎么革命？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们，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只能讲这个办法，更具体的办法你们同学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现在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就是要你们闹革命！如何闹，在这半年里，你们可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我相信，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特别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希望你们真正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你们在这次运动中更多地熟悉，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更努力地学习。

刚才邓小平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针。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请你们做。

刚才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同志已经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他们就走，不让他们走，你们要提意见就

提意见。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够了，没什么批的了，他们也检讨了，你们也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就走。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他们和你们在一起，做的好的，做的错的，也是和你们一道，你们都看见了，看得很清楚，他们在运动中间的错误，缺点是由你们做结论，当然他个人的历史情况，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也没有办法做了，你们就不能做了。

现在你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你们为主，你们是主人，工作组留在你们那里是听你们的意见，听取你们的批评。你们要选举你们相信的人，选举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怎么选呢？你们大家讨论、酝酿，酝酿成熟后，选举出来，那么这样，因为你们当了主人，以后学校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你们去组织起来进行。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现在我只能向你们学习。一句话，包括我在内，我们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因为我不了解情况，首先向你们学，学习了一个时候，过后有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经验，那时我们可以提。你们的责任更大了！也只有你们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如果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对全国有意义，对将来有更大的意义，对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有更大意义。刚才周恩来同志要求给我们自由，我也有这个要求，如果你们给我们自由，我们领导同志就跟你们一道，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到处发表长篇大论，演说，不可能，我不懂。今天我可以向你们提点经验，请你们考虑，斟酌，由你们决定。

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因为以后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要讨论，有时候要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辩论会上发生各种可能，那么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可能是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已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也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是少数，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运动才能正常。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的人，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讲了各种话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不要去成天和他们辩论，使他们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不能

睡觉，这不得了了，更可以保留了，不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辩论。大家骂他，辩论什么都来了，什么没有分寸的话很多，青年嘛，我知道的，不同的意见是有的，溜嘛，凡是不愿讲的意见可以不讲，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不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打他们，不要成天跟他们辩论，使他们不能休息，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保护少数？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少数的坏人贴大字报，写反革命大字报，写反动标语，发表反动言论，也要保护，也只是写了几张大字报，贴了些标语，说错了几句话，做了些错事，和右派，反革命不一样，要多教育，保护一些时候，让他多搞些活动再做结论。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保护一个时候，保护一个月，根据群众的认识，群众的要求，这样做结论不会错，这样不会冤枉好人。不要怕乱，经过辩论可以弄清楚，让他们自由，让他们活动，可以抓住线索，有好处，怕保护了坏人，主要为了保护好人，也可能保护坏人，保护一下，保护一个月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天下是不会垮台的。同志们是能够识别的，这样可以使同志们知道什么是反革命，那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你们那个薛恐，那个思想反动得很。让她活动，让她讲话，让她写大字报，在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们进行活动。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做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到了时候，定案后，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他活动，怎么能定案呢？定案怎么定，当然要大家讨论，还应有一定的手续，一般应运动后期做结论，在做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们活动一个时期。我就是一点建议，是否同意你们考虑，请你们做决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革命的同学万岁！

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陈伯达在撤消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刚才汪延群同学所说的这样的事情，（汪延群同学念了孙宝鼎，恽国桂，苗宗奇三位同学写的血书）是不是政治迫害呀？可以容忍吗？我们要说理，我们不动手，叫他们站到前边来！我们来了，我们坚决站到你们这边，坚决站到革命派这一边！

他们这种做法是违犯党纪国法的。他们迫害三个青年人写了绝命书，还要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这有没有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工作队长叫万东哲（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刚才汪延群同学在这儿读这三份绝命书的时候，他笑嘻嘻的，你们要不要认识他？我们不要武力，你们要认识他。

革命的同学们，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职工们！你们这儿的政治迫害我早就知道了。革命的主力应该是广大的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职员，你们不应该上他们的当！他们挑拨离间，挑起一批学生来斗另一批学生，这是非常不能容忍的事情，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没有一天停止，这是不能容忍的！

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人，应该有所交待，你们说对不对？革命的师生应该团结起来，认清是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坏家伙作斗争！

陈伯达说：

按照中央的指示，所有的工作组撤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由群众自己来搞，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现在大家对工作组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工作组撤销了，就算了吗？就已经了事了吗？他们犯了很多错误，迫害了很多同学，能够了事了吗？他们没受过教育，没受过群众的教育。工作组撤了，人要留下，受群众的教育，听听你们的意见。能够在这里改正错误的就在这里改正错误。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毛泽东同志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领导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拜群众为师，向群众求救，当群众的小学生。凡是这样做的，就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群众就发动得比较充分，运动就发展得比较健康。

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主观地定调子，划框框，那就会束缚群众的手脚，损害群众的积极性。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发号施令，就会两眼模糊，分不清是非，分不清敌我，抓不住要害的问题。

这样，就不能正确地领导运动，就会阻碍运动。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当群众的小学生，就要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眼睛向下，恭恭敬敬地向群众请教。要象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那样，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做群众的先生。能不能这样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首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观点。不少同志在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是一到实际工作中却又忘记了，又不承认了。掌握毛泽东同志这个思想，这是一个换脑筋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是思想上的大革命。

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要听各个方面和各种不同的意见。既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

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赞成自己的意见，也要听反对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对于赞成自己的意见，总是容易入耳的。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就不大听得进去。其实，听听反对的意见，对于全面地判断情况，往往是有必要的。

向群众学习，不仅要多听，多看，还要多想，多动一动脑筋。就是说，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对群众提供的多方面的材料和意见进行分析，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整理、提高的功夫，从中发现问题，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样，就能把群众中原来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有条理的系统的正确的领导意见，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加以实施。

我们要认识，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标准。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问题、新事物不断出现。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只有自始至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永远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领导运动朝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

我们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是一个弱国，解放前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弱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是“低能儿”，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决驳斥他们，粉碎他们！

过去，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让外国人去搞。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搞出来。你们知道，去年上海青年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又叫人造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权威贬低了，说：“这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明”。他们不承认这项发明。后来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承认这项发明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斗争，今年才公布了。在这里，我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致敬！向工农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致敬！

陶铸说：

我作为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一下态度，全力支持这个运动。如果我们不支持，就同陆定一那个宣传部一样了，大家还可以把它砸烂，因为它是修正主义的；假如我们不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打烂。应该打烂，如果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麽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态度。

讲两个具体问题：

一个是工作组的问题：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人民日报》不派不行，不派，出不了报。像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不派工作组，工作组阻碍了运动的发展，这个责任我们负。至於工作组在学部的工作有些缺点，有些错误，是由于旧框框产生的。有的从四清前线回来，不适应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些人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好。因此，接受同志们的意見，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组撤销。撤销后，不能马上走，你们也不会同意他们马上走，留在你们那里，听取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批评，你们认为可以走了再走。

第二个问题：张际春同志是工作组的组长，是学部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现在的文革小组二十三人，有四人是指定的。其中有张际春，有潘老。看来不好，是改良主义的。以后一个也不要指定。二十三人全部选举。从现在起撤销张际春的小组长职务。你们的要求，我们同意，还有什麼手续？没有什麼手续了。张际春是我们派去的，原来是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动机还是好的，因潘老年纪大了，派他去帮助潘老，但效果不好。张际春同志在社会科学部所犯的错误，你们可以继续提意见，要留在你们那里，听听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批评，向你们检讨。有些方面，我们帮助不够，因为张际春是我们派去的，这个我们也要负责。哪些由张际春负责，哪些由我们负责，将来我们还要到你们那儿去，开两千多人的大会，再讲。你们讲罢官嘛！这也是算个小官，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嘛！

陈伯达说：

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从东方转到西方，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东方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的文化转了一个圈，来了一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东方了。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来是个落後的国家，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中国人被看成是“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变化，有很大成

功，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在内，谁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不要二十年，只要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努力，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同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是同每个人都联系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界，对我们自己来说，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对古人的迷信，破除对洋人的迷信。

破除迷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破除迷信，科学就不能发展。过去，在西方资产阶级刚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他们否认封建主义的文化，经过残酷的斗争，去破除封建的文化。在几百年以前，凡是圣经上没有说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谁说了，旧势力，反动势力就起来说：“这个亚里斯多没有说过呀！你胡说八道！发疯了！”几百年以前，欧洲资产阶级要建立他们的剥削制度，反对封建制度是经过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要搞工业，就需要科学，需要与封建文化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走上反动，变成保守派，变成一切反动势力的保护者。中国的，亚非拉美的，主要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的阶级，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进行了一些斗争。如孙中山就进行过一些斗争。还有改良主义谭嗣同也进行过一些斗争，但他们的思想还跳不出老框框，孔夫子的老框框。“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虞提出的，后来他也不干了，他抽起鸦片烟了，也不再“打倒孔家店”了。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起来之后，很快就走向反动了。解放后还有一些象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一九六二年搞了个“朝圣会议”，到孔夫子的家乡搞了一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可见破除孔夫子的迷信也不是一见容易的事。几千年来，不是孔夫子说过的话，不敢说。资产阶级起来的时候，讲“打倒孔家店”。从解放到现在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还想保护孔家店，这是保皇派。“朝圣会议”不是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标志，这就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保皇派。

破除封建主义迷信，这个担子中国的资产阶级挑不起来，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挑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对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做得还不够。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做外国人的奴才，他们很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情。鲁迅曾嘲笑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现在是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成了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离人民的要求，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毛主席要求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过的苗头。现在应该把这一点看成最大的任务，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呢，还是从“赶”字着眼呢？我赞成从“超”字着眼。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中，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赞成超字派，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只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敢于与修正主义斗争，就能创造西方和苏修所不能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

在社会科学上，毛主席就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无产解决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接触过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或没有完满的解决，完满解决的是毛主席。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个普遍真理，不仅在中国，在亚非拉美，而且在整个欧洲、美洲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适合。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进城市。无产解决革命的最根本问题，就是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战争。

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城市暴动的经验，后来武器发展了，新式武器发展了，城市暴动就有问题了。恩格斯在当代就对城市暴动提出过疑问，以后修正主义产生了。修正主义说：“武器发展了，不好搞暴动了，街垒战不好搞了，城市暴动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的议会斗争，和平过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社会

民主党就是这样欺骗群众的，现在修正主义也是这样。现在亚非拉美人民首先起来，把欧美变成孤岛，然後欧美各国的无产解决再进行农民革命战争，看来这是可能的。

当法共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希特勒战胜了法国，法共在农村就组织了游击队，但是後來不去武装夺取政权，没有坚持下来，这是个历史的错误。他们把农村发展起来的武装完全交给了资产阶级，换得了副总统、副总理和议员等，这都是靠不住的。资产阶级要踢就踢开了。当议员有汽车，别墅，这样慢慢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们变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主席的名言，是主席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发展。对此，修正主义的党否认，半修正主义的党也否认。其实，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城市比较狭窄，可以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活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证明，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得到了胜利。革命最根本的问题，马。恩，列。斯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毛主席站在最前面。

无产阶级取胜了。怎麽办？有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这个问题上作了伟大的贡献。现在有些修正主义的国家，半修正主义国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厉害，越否认，越厉害。在哲学问题上，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过去我们说辩证法三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後來斯大林给变成四条。毛主席说，不论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的统一，不论怎麽说，都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社会充满了矛盾，都是这个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的世界，也没有矛盾的社会。有时是具体的矛盾，我们可能提不出来，但矛盾永远存在。

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我们是否可能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超过欧美呢？完全可能。我们要相信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性，这是我们在科学上的一个伟大革命。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把理论同实际，理论同劳动，理论同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战胜一切困难。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不论自然科学，还是

社会科学，都不能乱来，都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毛主席把它变成马列主义的语言，用来解释我们的科学态度。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它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雄心大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性。

这场斗争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痛苦的，在他们的脑子里发生了新与旧的冲突，脑子里的旧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都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有矛盾。在这个矛盾的冲突中，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掌握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每个人应该革自己的命。毛主席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革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才能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懂得了这个群众性的口号有深刻的意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群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做不到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我对这里情况不了解，因此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是来了解你们情况的。今天会议准备的不够，有同志讲是搞突然袭击，匆忙开这个会。错误的话是我的，这是我的错误。开这个会主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今天看来，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意见至少有两种。至少有两种不同意见，可能有三种不同意见。有没有第四种意见？有不同意见也好。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错误，谁的就谁负责。

明天晚上有时间我还来，找你们不同意见的人谈话，有两种不同意见，找两方谈，有三种意见就三方谈。请你们准备一下，看哪些人参加？我也要提些问题，看哪些同志把你们意见讲完，看什么时候再开这个会？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么，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

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同学们希望我们听取你们不同意见，不论明天、后天，三、四次我都愿意。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请同学们给我自由。今天见了没见够再见见，不能围住我们。你们还有行动不自由的吗？有就不对了。请你们不同意见的白天准备，明天晚上我来。不过，我还要留个后路，如明天晚上不行，就后天晚上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你们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学生是主人。工作组已撤销，停止职务，工作组不住在学校里面，有的听说还去活动。有没有？如有，就不对。你们叫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就什么时候回来。工作组留下好？走好？是不是你们要留多少就留多少。同学叫工作组干什么听你们意见，让他们听你们的批评，决不许他们发表议论、意见，对什么人也没有这个权力。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没做多少好事，现在让他们为你们服务，给你们扫地，给你们开饭、洗碗，给你们贴大字报，字写的好，给你们写大字报，写的不好的不让他们写。工作组要不要住在你们宿舍？为同学服务是光荣的，别看参加体力劳动耻笑，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工作组过去给你们做好事不够，现在给你们服服务吧，做做好事。工作组同志在不在？你们要不要这样办？要参加体力劳动，看你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做就慢慢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邓小平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邓小平讲话

同志们：

今晚我和陶铸同志，市委的负责同志，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市委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吴德同志，副主任陶鲁笳同志，他们都到人大来参加这个会。

我们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你们学习的。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国家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走向共产主义，防止象赫鲁晓夫那样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我国复辟。我国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都是教育全体人民，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建设，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的危险。

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件新事情，我们也没有经验。同志们听了七月廿九日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我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我们确实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搞了一个派工作组，派工作组看来在开始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很快感到这是障碍文化大革命。群众是有能力，有政治思想水平，是能够自己进行革命的。我们发觉迟了，在这一方面，中央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大家提出批评完全应该，你们应该经常提意见，提批评，帮助市委，中央的同志和各级领导更好地领导革命。我现在重说一下，工作组是新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派的，在北京的中央负责同志负主要责任。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是相信同志们的自觉革命，相信广大革命群众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样的基础上决定的。工作组的情况也不同，工作组仓促上阵，我们没有向他们交待好方针，政策，工作方法等，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于他们的错误，他们自己要检查，同志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批判和揭发。

今天会上提出了郭影秋同志的问题，今天这个辩论会开得很好，给我很大教育，使我更加相信党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工作组这种形式是阻碍群众自觉革命的。今天不管哪一方的发言，都有相当高的水平，不管对的错的，经过思考辩论，最后一定能搞清楚问题的。工作组撤销以后，摆在革命师生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敢於革命，一是善於革命。我感到很高兴，绝大多数师生是要革命的，是善於革命的。现在没有工作组了，大家自觉地进行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我没有经验，希望同志们努力创造出经验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次文化大革命不容易，正象〈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任务就是主席说的：一斗，二批，三改。一斗，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二批，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所谓学术“权威”；三改，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今天发言只是在斗字上，只是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只解决郭影秋的问题？同志们要思考研究。斗也好，批也好，要选中目标，选得好，选得准，才能打得狠。人民大学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央帮不了你们的忙，市委也帮不了你们的忙，要靠你们自己。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比斗资产阶级当权派更困难。改革教育制度，方针，方法也不比批

容易，你们面前摆着艰巨的工作，要看你们去做，需要你们创造经验。你们创造了，我们学习。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把群众经验加以概括，去领导全面。我们没有别的本事，离开你们，我们什麼也做不成。我们相信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一个人都表示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共同点，这就是革命的共同点。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创造出经验来，敢於革命，善於革命。

关于郭影秋的问题。对于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在七月廿九的万人大会上也说过，对一个干部多少年的评价，历史的评价，你们不能作。你们学校是评价他的重要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地考虑了郭影秋同志的问题，在人大的问题，你们有发言权，你们要充分地揭发批判，你们还要辩论下去。辩论会不一定很大，大小结合，恐怕很有必要，同志们考虑一下。第一阶段是斗，第二阶段是批，第三阶段是改。没有工作组，党委马上恢复是不合适的，现在需要的是学校师生员工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正如市委决定所说的，应由全体师生员工代表会议产生全校文革委员会，系要有文革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班也要有小组。听说你们还没有产生文革委员会。（对！）我和陶铸，吴德陶铸商量了一下，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先成立筹委会。筹委会意见不一致不要紧，采取协商的办法是正常的必要的，没这个办法是不行的。还有个办法，无记名投票，选得不合适可以再改嘛！总之，要比较快地成立员工筹委会，积极准备召集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再选文革委员会，领导运动。这样对运动有利，使运动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便于总结经验。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天天辩过来，辩过去，拖长了也不好，提这个建议供同志们参考。

此外，其它的问题我还要讲一讲。刚才纸条上问“二月兵变”的问题，我们已查清了，没有这回事。那是因为当时有些军队要驻扎到北京，用一些民房，军队领导考虑学校不方便，军队和学生混在一起不好。在这里我郑重告诉你们，我们军队彭真调不动。这件事澄清了，以后就没必要提这件事了。以后辩论，这件事就不算个事了，就这样。

陶铸同志讲话

同学们：

刚才小平同志讲了话。现在夜深了，快到一点了，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我的话不好懂，我在北大讲话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听得懂，所以就不多讲了。

今天我们将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各大学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问好。

我的讲话是有中心的，不是应付。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过去干过许多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小平同志就是老革命，土地改革搞过几个省，搞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四清蹲过点，但文化大革命没有搞过，也不知道如何搞，毛主席提出一斗，二批，三改，这些我们都不会。比如斗吧，人民大学到底斗谁？谁是当权派？没定下来。我来中宣部才两个月，也不知道情况，只有你们知道，你们今天的辩论是“斗”的开始，是选择目标，就是认清真正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不容易的。要让大家辩论。你们不把目标选好，如何打得准呢？这个问题只有你们有发言权。郭影秋同志我根本不认识，最近才见过一面，对郭影秋这个问题，你们清楚。在学校里到底干了些什麼？要充分地揭，大胆地揭，最後是什麼就是什麼，是黑帮就要解决的打。现在市委撤销他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市委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另外方面也是支持你们揭发他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态度不太明朗，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我们支持你们打黑帮，我们的鼓掌是上台鼓下台不鼓，这是我们商量好了的。现在是要你们揭，要调查研究，不要看我们的眼色行事。如果工作组对你们进行政治迫害，我们就坚决支持你们反对迫害。今天这种现象还没有，现在是很好的形势，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判断，靠毛泽东思想斗争，只要你们作结论，将来你们辩清楚了，我们就大鼓掌。我们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把目标选中了，打倒了，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们一清二楚，谁讲得好，谁讲得不好；谁放了毒，谁没有放毒，你们最清楚。人民大学到底怎麼办？我刚来不久，听说人大是“老大难”，这决不能怪你们。如何把人大变成一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学校。我们没有什麼本事，只有向你们学习。

关于辩论问题。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就能确保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会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放手反动群众，搞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也就是要批判旧世界，用新风俗，新习惯，代替旧的，不把旧的彻底打破，就不能建立新的。工作组撤走以后，我们要更好地进行大辩论。今天的辩论会是一个好的辩论会，不同意见可以讲，我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有采取这个

方法。今天你们旗鼓相当，不用我再讲了。要保护少数，少数不一定正确，但要保护，否则，多数就会很快地将他们压下去，这样就辩论不起来了。不能把辩论会开成斗争会。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真的说不成假的，假的说不成真的；黑帮说不成左派，左派说不成黑帮。在郭影秋这个问题上，大家是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的。保护少数，什麼叫保护少数？就是要让人家说话，不要轰。今天有的同志担子很大，轰也要讲。我让人轰了后就讲不下去了。在这一点上，我也要向你们学习。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人家作检查。一围攻，人家就讲不下去了，心里也不舒服。

建议迅速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工作组不起作用了，学校文化革命完全归于你们。听说今天开了一天会，你们可以协商嘛！过去民主党派可以搞政协，你们怎麼不能协商呢？绝大多数同学，教员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如果没有领导机关，明天大家开会再协商，把代表选出来，把革命担子挑起。搞临时的，不行再推翻。苏联不是搞过二月革命，又搞过十月革命吗？二月革命也有好的方面，它是反封建的。

人大有人问，为什麼是“老大难”问题，因为人大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学校。

有人问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个问题我不解释，大家用主席思想去分析，从主席著作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

还有外交学院的同学，希望让陈毅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农大同学希望谭震林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工业学院的同学要求我们去，我们答应去一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

辩论会看事实怎样，有人材料知道很多，他也不揭，他也不斗，他们的话是站不住的。他们抓人很多，要抓根，谁冒点头很短，一打就缩回去了！你等他完全露出来就好了，这就可打倒了，他不完全出来是打不倒的。有些人刚刚出来点就回去了。

工作组有什么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

两点意见：

(一) 学校成分不好的不少，对这些人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二) 对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可以改正错误，要给出路，给重新做人的出路。

马克思讲过：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全人类指无产阶级劳动者，还包括剥削阶级子女，还包括没有枪毙的，给他们饭吃，还种地或劳动使思想变化，改造他们，劳动改造是有变化的。对不枪毙的人还算人，你要枪毙他，他就不反（原文如此），你就改造他。他要不改造，就永不能解放。这包括帝国主义、地主、坏分子、右派分子。地主阶级枪毙了一部分，现在还有他们的家属，他儿子的父亲被杀了，他儿子有杀父之仇，他要报仇，就不能解放。解放全人类，包括那些不被枪毙的犯人，无产阶级还要镇压坏人，无产阶级不专政，就不能解放自己。把所有犯人都枪毙，杀父之仇就更多了。

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人也可能不反，反的是一小撮。你们要团结，不管人家怎样跟踪你们，你骂我，我不骂你，你造谣我有认识，团结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有人“八一团”也不加入，“革命团”也不加入，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昨天不开大会不行，不开大会就围起来了，今天说不完，明天还可以谈，摆事实，讲道理。讲几点意见：

有党员，有团员，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组织改选，改组原支委，原支书你们不喜欢可以改选，如暂时成立不起来，可成立临时的，你们可罢官，选不出来，成立临时支委。院党委要改组，开全院党员大会，要改选。能选出来就选出来，选不出来暂时慢些，把旧的院党委、院团委罢了，选出临时的院党委，院团委，选不出来也不急，等一时再由你们选，院党委能改选就改选解散。

以后支部开会不要秘密，还有非党员。党员开会不开秘密会，吸收非党员参加，由院文革决定，一半一半，比如两个党员吸收两个非党员参加，他们议论怎么办？要采取多数，不要把党员搞成黑帮，搞成反党。他们多数是好的，秘密会（指党员秘密会）由市委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

我提个问题，党总支，党支部是否要联系群众，联系非党员，非团员？你们党员开会，可以让他们参加，总支委员也不要开秘密会，团总支、团支部、团委会亦可以让非团员参加，这样他们放心了。文化大革命是大家的事，要一起商量。

你们“革命团”党员多，他们“八一团”团员多，不要搞得党员、团员对立起来。党的支部委员会是否改选一下？改选嘛，你们自己罢，要罢官可以，选举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如果相持不下，可以临时找个召集人。非党员认为不好的人，你让他（她）当委员，结果全体党员丧失信心。选不出来，临时找个召集人，今天你召集，明天他召集，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首先是党和非党团结起来，团和非团团结起来。群众不满意一、二个委员，党会丧失威信，处理党员在最后嘛！谁最后入党，看最后决定，是不是省得他们罢你的官，说你们保皇。你们保什么皇呢？保个党总支书记、总支委员怎么叫保皇呢？校党委你们不信任他，你们就罢嘛！统统罢掉，统统罢了，好人呢？罢了再选嘛！信得过再选出来，信一个出来一个。你们不罢他，群众有意见，党就处于被动，你们这么一做就好了。以后除了市委通知让党员开秘密会的可以开，市委没有通知就不开。

（插：群众都来了，该怎么办？）

他们都来，来多了不好，可以加倍，二十个党员再加二十，他们可以轮着来，反正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这样就不被动了，就不会有意见了。

我到你们学院，你们只知道来个负责同志，你们不知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我来了，你们才知道，你们认识我吗？这个问题不要争了，不要发生误会，这里没问题，没有阴谋。

你们要求两个合并，你们首先提出来，好嘛！我们赞同。你们说，范兴慧不是左派，又不肯定她是右派，你们就团结吗？她也是你们的团结对象。（李雪峰：她贴大字报也可以，新市委的可以贴，黑的说不成白的，白的说不成黑的。）她们写大字报你们可以反驳，也可以象你们说的不反驳。让她说够了，她就不说了，范兴慧是你们的团结对象，你们不让她写，禁止不了。他贴，我不贴，你们可以让她嘛！你们党员要比他们高点。

工作组的问题，你讲讲。（指李雪峰。雪峰：两方面的人都来了再讲吧，他们那边人不在。）你们不满意×××的讲话，他的话不完全符合事实。你们提出

罢官，这要求有点大，他们的错误就这么大。范兴慧是不是左派，以后还得看，市委同志讲范兴慧是左派，可能不对了，运动中，运动后，左派是有变化的，开始的左派，中间有可能就不是了；中间的左派，后期有可能就不是了。这个运动中是左派，另一个运动中就可能不是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到大风大浪中锻炼，不够左派怎么办呢？努力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点上不是左派，另一点上可能是左派，市委同志讲了这话，你们不同意，这再争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他就不来了，干脆换一个吧，是吧？（雪峰：他已经不来了。）讲错一句话，可以嘛！改嘛！我来了，没有作准备，又没有讲话稿，讲错一、二句，你们批评。

你们说范兴慧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我们可以团结嘛！即使范兴慧真是右派，你们亦可以团结！五七年有些大右派，现在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搞专政。五七年右派，他们想改了，就摘掉帽子嘛！是不是？摘了，他又来了，我们就再出嘛！抓起来容易，扣起来容易。你们听了我讲要保护少数，主要是保护好人，可能保护了坏人，保护一下吧！短时间，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年也可以，材料够了，就做结论，作结果。有的就抓起来。大部分还是不逮捕，反革命分子定了，你们监督改造他，一般右派不抓，让他吃完饭做事，他还要讲话，让他讲嘛！他讲话亦没人听，有人听也不要紧，怕什么？所以抓起来容易，扣帽子容易，改造他难。党的基本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除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外，有些犯了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让他改过嘛！你说不准吗？有的改得不好，有的改得很少，再看看嘛！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不解放就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是谁呢？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嘛！地富反坏右算不算人呢？（插：算人，不算人民。）算人类呀！不是动物，地富反坏右抓起来也得改造呀！你们把他们的子女改造好了，自己才能获得解放。枪毙了还有子女呀！他们的子女要报仇啊！有杀父之仇，儿子报不了，孙子还得报，过去不是枪毙了一批人吗？

就有资产阶级权威生活比我们好，改造就改造这些人，变坏人为好人，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是国内任务，国外也是，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改造一切坏人，改造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枪毙人容易，可是他们死了还有子女，子女不高兴，你们学校有出身不好的，有地主的、有资本家的、也有干部不好的，

他们的子女不要歧视他们。对之反动言论要提高警惕，不要歧视，歧视他们有反感，今天只能提这么一个问题，以后的任务，就由你们了，不团结他们，他们就请示建筑部、市委、中央。

资产阶级权威允许你们批，加上比较坏的教员，斗、批、改全靠你们。你们可能犯些错误。青年人不犯错误怎么能行呢？让你们有错误就改，就行嘛！有人问我有什么经验，错了就改就是经验。你们会想出办法的，需要党中央、市委帮助一下，帮助不了，你们自己搞。当然了，斗争当权派也好，教改也好，都要有准备，也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干，斗争中有准备嘛！一边斗，一边准备，准备好了再斗，斗一次不行再斗一次，慢慢地就好了。教改，你们看的书那么多，你们把书分下去，大家看，大家批，教育革命也是这样。边改边学习，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什么事亦不一定都准备好了再打，斗争中学斗争。这是你们知道的，我讲这么几点。我是不是讲错了，可以批评。不要是我讲的就不能批评，允许人讲错话，特别是你们青年同学，不仅是你们青年同学，我们亦不能。有的话改来改去改了几十年，还有问题。基本上对，大方向对就行了，好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的讲话

你们犯了错误，是什么性质，主要讲思想，你们理解到什么程度？我问了他们（指“八一团”代表），××，×××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的错误。你们考虑光说方向，立场问题够不够？中央现在还有人在考虑有没有路线问题，过去你们对×××，×××不好，抓了“游鱼”，你们走不了，我去也没有办法。

你们这样检查是过不了关的。现在的问题错误要讲够，×××准你们出来。你们得走掉。

要认错，不得再推了。抓了多少条“游鱼”？

革别人的命行，自己革命就不行呀！“六·一五”事件，抓“游鱼”，改组三个班，只能否定，不能肯定等等。你们是听了党员，党组织的话嘛！这些人的话听不得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们还是依靠党组织系统搞，你们可以改组吗，如改组也选不出来，临时召集嘛。

将来要开大会，你们要检查，市委要替你们担责任，中央也要替市委担责任，你们不要往上推了。

活动不能怪你们，问题是有一批人拥护你，另有一批人不拥护你，还是走开好；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运动的方向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个别的错误，具体工作的错误，还是方向错了？是站在运动前边？是站在旁边？是站在对面反对群众？开始校党委在运动的对立面，反对群众运动。北大字报公布了，害怕了。怕的结果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指手划脚，基本上是站在对立面反对运动。校党委垮了工作组掌权，你们是支援运动的能不能给群众一些帮助？不给帮助跟着干也行嘛！你们不是的。你们成了新的统治者，站在当权派的地位，怕把运动搞坏，就怕运动不按你们的想法搞。你做主人还是群众，是赞成是帮助。工作组当权不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有点架子。现在学生比你们聪明，办法多，又是多数，像你们这样有点当官做老爷，你们有架子，就是我领导你们，照我的办，不照办就是“游鱼”啦！干扰啦！开始时市委、国务院也规定了内外有别等办法，现在看也不行，如不上街游行，大字报不上街等给你们一些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不派工作组好一些，这些中央负责，没有快撤，最后才定。工作组有时阻碍群众，甚至是镇压群众运动，学生是搞当权派，批判、教育改革，你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做。工作组没有必要，看来工作组站在群众方面，帮助的很少，个别有作得好的。一般是反对群众运动的。不让学生闹事，那么，学生不上课放假作什么？一般工作组都是想按我们的办，不是跟群众闹，鼓励群众闹。特别是怕反革命，怕反革命闹事，怕反革命上台，公安局也不要怕，看看反革命上台也好吗！反革命上台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前市委，中央军委上台了吆？反革命上了台有好处，给彭真上台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吗！用两年也就解决了。让反革命搞几天不好么？如果反革命闹事上台，而且群众拥护他，而且不用很久群众就会看出来，暂时群众分裂几天也不怕。如果反革命冒头，你就打回去，蛇一露头，你就打，结果一个也抓不住了。蛇出洞了就好打了。不要一出头就压下去。

最近主席讲：“造反有理”，原来统治者造反有理，有些人造别人的反有理，一上台，人家造他的反就没理了。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造共产党的反就没理了。如果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那就要造反嘛！现在学校及文教机关阵地是在资产阶级手里，在那里党没有领导权，即使党委领导，

他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根本的问题是反对别人可以，反对我则不行。人家造我的反，我们不让人家反，怕大民主。我（指工作组）有错可以揭，你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赞成他引导好他，可以不造反，因此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不能反，不能赶，部长、校长、书记都有这个问题。不怕就好，越怕越怕，结果做的坏事就越多。你们不做事倒好一些，两个月倒可以学点东西，你工作越积极错误越大。还有一个怕反革命上台，两个人闹就是反革命来了，不是反革命也成了反革命，把×××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嘛，对反动学生批判嘛。要让他们活动，直到夺取领导权，让他们统治一个时期整了共产党员就暴露了。怕大民主，怕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秩序，革命群众运动的秩序不是以我们主观的框框为主的，群众起来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批评你们，我问过×××，××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是不是呢？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怕破坏资产阶级的秩序，修正主义的秩序，陆平，原市委不是么！工作组的秩序也是那一套，不比他们好，和他们差不多，凡破坏（秩序）的，你们就阻碍，以至于镇压，你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对维护你们秩序的很感兴趣，有的学生党员说你们的方向对，你们的立场思想感情和“革命团”一样，他们的思想感情，立场和过去党委，总支的立场感情一样的。我们告诉党员学生主动团结这一派（“八一团”），彻底改选，选不出来搞临时总支，不开秘密会。总支委员会通通滚开，就是这些人影响你们吗！虽然他们一千多人（指当时“革命团”）一冲就垮。群众和党员一齐开会，没有秘密会，否则群众斗他们，怀疑他们（党员、干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造反了，也可以造自己的反，造新市委的反了。修正主义还统治了中央办公厅，真反革命用反革命口号，用右派口号不可能，他们用的左的口号，左的面的，出现这样（情况）很难识别，不让他们统治一个时期很难识别。现在×以左的面目出现。××被整，党员感情流露怕整自己，我说你们自己罢官好不好？市委说×是左派，你们说是右派，我问过“革命团”×是左派？他们说不是，右派也不是，至少是个中间派嘛！应团结她嘛！发动党员，团员是对的，发动起来要革命，破坏原来的旧秩序。不这样恐怕党员将来有当保皇派的，党员多数是好的，搞好可能还是党团员当领袖，“革命团”

不对，“革命团”以后在斗批改时还可能是主要力量。也有可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很难说，如果是右派上台更凶。

×××是站在运动前边，她要闹事，你不让她闹，闹事不怕，可以讨论是文斗还是武斗，由群众决定，你（指工作组）十五日上午讲话是鼓励他们的，下午讲话就不好，这个问题应在群众中讨论，主张武斗的人在大会上让他讲话，他的面孔不就暴露了嘛！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风格打倒，不能靠打，要批透。农民是斗了地主的，青年感情这是好现象，他赞成戴高帽子，打一打他们威风也好吗！你们的感情不对头呀！你们有的领导同志是地主出身，你们也有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可能是自觉不自觉作的，我们许多同志过不了这个关。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历代统治者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的。

群众讨论你们的检查过不去嘛！迫害事实客观就是镇压群众运动，你们对×××和×××的感情不对，你们思想就是有个立场问题，就是怕大民主。主席讲话没有大民主，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迟早要霸王别姬。在大民主面前你们害怕，实际是你们没有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你们勒令停止选举，采取指定的办法，实际是法西斯的统治，民主集中制，我看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就可以实行民主集中制，怕民主的必垮台，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这样的民主制度就搞不好。你对×××同志的态度不好，就是他的年纪轻，资格没有你老，你敢和他顶，我的资格比你老你不敢和我顶，×××同志说你几句就不行吗？你有架子，不是采取小学生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必垮台不可，你也是解放军，你的作风不好，我讲的是根本问题，你不通，也是检讨不好的，要当勤务员，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她们就是孺子嘛，你要当他们的牛。如果通了，让×××看一下，我也准备讲几句话，你的检讨不好，我也不好讲话了，大会只能再来一次。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领导的讲话

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向，是站在前面领导，鼓舞群众前进，还是指手划脚？院党委站在群众运动对面反对群众运动，抵制运动，势必被运动冲垮。工作组当权，不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有点束束手。

现在青年人超过我们。

工作组又被冲垮了。有点做官当老爷，“一定要照我的办！”工作组看来不派好一些。工作组阻碍运动，许多事情工作组都不会做。一般地讲反对群众运动，不让他们闹事，让他们干什么？工作队是带着框框办事。

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怕反革命出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了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

“造反有理”，历来统治者就怕造反。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不能造反。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也要造反。如果不让人家反，非把你反掉不行。还是引火烧身，让群众的火焰烧到自己身上来。不许群众运动造我们的反，都有这个问题。你立场方向是资产阶级的，阻碍以至镇压，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改组支部，群众和党员一齐开会，不开秘密会，恢复活动。可以造新市委的反，当然可以造你工作组的反，让他统治一个时期。通通罢官好不好？破坏原来旧秩序。

六月十五日事件可以提交群众讨论，是文斗？武斗？进行辩论。社会主义机关没有过（主要指我们）学生运动镇压不了的，怕大民主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大的群众运动，党内民主就搞不好。

实事求是（检查），可以大会、小会。两面（做工作）：工作队员和受工作队影响的群众。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服工作队员。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群众大会的讲话

好不好，我来开始讲话了（鼓掌）。

亲爱的革命同学们，和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员工们，工人同志，我们第二外语学院全体同志：

我今天到你们学校我本来是看大字报的，来读大字报，用大字报来学习，广泛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学院里究竟有没有黑帮，有彭罗陆杨的党组没有？有没有？有就清除，保持我们学校党的纯洁，作一个革命的学校。有黑帮是会捣乱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我们全国都要肃清这个东西，各机关也要肃清，我们院里也要肃清。第二个就是要斗争资产阶级当权派。即使不是黑帮和彭罗陆杨没有什么关系，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路线当权的，还在我们学校掌握权利的人，这一些反动的学术专家、学术权威，同时吆，

最后我们在斗争中找到我们办大专院校的革命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机关革命化，学校革命化，教学改革，我们的目的大概就是这个。

毛主席号召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中央也同意了，因此我们停课半年，要解决这个很重大的问题，啊，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最中心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来考虑，来行动。围绕这个东西，我们能够解决附带的许多问题或临时产生的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需要加以解决，但不要把我们的主要目标丢掉，把次要的问题提到第一位。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讲了吆，主要矛盾是本质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嘛！在主要矛盾的周围，可以产生许多偶然的现象，临时的现象，次要矛盾吆！我们也要加以注意吆，也要加以解决，主要的矛盾解决了吆，矛盾也带动而解决了。这个见解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发表的，但对不对呢？由同学们来评论。你们学习毛选比我学得好，你们学得好。我这个意见对不对，可以批判的。我总是想，在我们外语学院、外交学院，第二外语学院是归我领导的，他们都共同的是这个问题，也有些其他学院没有的，但主要是这些问题。北大也是这个问题，清华也是这个问题，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广州大学、成都大学恐怕还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周总理在你们这里呆了五天，周总理通知我要我来，要我跟他一起来，我没有来，因为确实事情忙，不能来陪他，今天我还是要来，抽出时间要来，不止来一次，我要来第二次，第三次（鼓掌），我过去来少了，过去你们开学我来讲了一次话，以后就没有来，这是犯错误，向你们承认错误。（鼓掌）你要办这个学校，又不到这个学校，你怎么能办得好呢？应该多来，周总理来了五次，我至少起码要来六次（长时间鼓掌）。还是重复了那一句话，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刘主席、邓小平讲的要给他们自由，不要包围，这要这个……我跟你们各位同学讲，我倒是很喜欢热闹的（笑），但总还得有个秩序，怕踩坏了人，有小朋友，有小娃娃，他也挤着来看，踩坏了人，有教授把表挤掉了。（笑）后来，又找到了，给了他。我们就不敢来了，不好来，引起损失，不能办事。我们来应看大字报，等以后运动结束了，我们正式开课了，我还是愿意来到班上来找几个同学谈话，教员谈话，或职员工人谈话，你们要把我当成一个同学吆，平等待人嘛（鼓掌）。你们把我当成一个领导人，当成一个负责同志，我们很感谢，热情欢迎，

我们很感谢，但这个东西热烈过分就不太好，弄得我不敢来了。五九年我们到城隍庙，我当上海市长，没到城隍庙去过，到城隍庙去看看，一发现就包围了。在那里斗争了六个小时，硬走不掉，一定要讲话，我只好讲话，最后从后门跑了（笑）。几万人堆在那里，一下子堆了三万人，完全是好意，完全是好事变成坏事了。那天还挤坏了人，有人掉了东西，这是个问题哩！周总理、刘主席、毛主席负总责的同志，他们更困难，根本不能在人群中被发现，一发现就走不了，但是领导人不能够接近群众，但无法接近群众，一接近群众就走不了，这个错误又不是他的，是我们犯的，是不是呀！是我们犯的，他很想接近我们，很想和我们谈谈，所以我说要平等待人，你们认为我们是负责人对我们表示有好感，看到我们要谈谈，要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到处可以……问题哪儿也不能去。我现在连东安市场也不能去，王府井百货公司也不能去（笑），中山公园、颐和园，我们就要下午去，晚上去，礼拜天是绝对不能去的。自由就很少了，了解人民的痛苦，了解工作中的缺点很受影响，自由往来。自由去，这个比较好，到那个地方，一两个人都可以坐下来谈谈，谈了就走，以后还可以再去。农村里看看，工厂里看看，学校里看看，医院里看看，了解很多问题，就可以跟毛主席反映，可以和周总理反映嘛！我下次来就不要欢迎了，也不要围着来了，不是围攻（笑），不要围得来，要有秩序，你们自由办自己的事，读毛主席的书，你们写大字报，你们讨论，开讨论会，最好你们班上讨论，我悄悄坐在旁边，我听，听完了我就走，最好了，使我用脑筋，好听你们原来辩论的情况。这对我是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的嘛！了解你们的思想感情，了解你们争论的性质嘛！要我帮助你们，我这样才能帮助，提供一点贡献，情况不了解就到这大讲一通，这个是张彦的作风（笑），非犯错误不可。张彦这个错误很严重，这个要你们来批判，我也参加这个批判。今天我不准备讲这个问题，严重的错误，他是不是牛鬼蛇神，现在还很难讲。我说他的作风就是不调查研究，又不向大家求教，又不接近群众，又不了解情况就上台乱吹（笑），这没有不犯错误的。

有的人说：你是不是说过包庇张彦这句话了，这个我怎么好包庇他呢？（笑）他这么大的错误，我包庇他？他到处整人，我就要被整掉，我跟你干？我不干那（笑）。他讲我的旗号，这个人的处理，要你们揭露、批判，看你们的意见，我们就处理了。不征求你们的意见是不对的。他在那个地方犯了错误，就应该在那

里检讨，他在你们这里检讨，他在对外文委也要去作检查。到外办还要作检查，作了检讨以后，这个处理的意见，征求你们的同意，然后报中央解决。当然不能再作外办副主任了，当然不能作了，不能作外事政治部主任，当然不能作了。究竟将来怎么处理，下放劳动还是怎样。但总而言之，总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犯了大错误，不能包庇他，但也要看他这个人将近三十年了，在共产党里边三十年工作了，这次犯了大错误，也要看三十年，也要估计在内，不仅追查这次的错误，还有过去三十年也要清算一下。也要看他三十年也还作了些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思想是敌对的，思想是敌我矛盾，完全资产阶级当权派作风，国民党当官作老爷的作风，主观主义比泰山还要大，还要高（笑），高傲自满，横行霸道，到处整人，这个不能减轻他的错误。几十年来也不能说他完全没作工作，这个问题我有责任。主要责任是我对这个人相信过份了，不应该这么相信他。给他那么大的权，我和他的关系是七、八年，58年、59年到外办作主任和他在一起，那时还不错，他蒙过我的，说明我眼不亮。但是你们这里同学，他一来作报告，你们就看出来了，你们比我高明（笑），学习，我要向你们学习。

他也没常来，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谈那么大一套，言行毕露，裸体跳舞，没有过呀！他从来都是很恭顺、听话、跑腿呀，要他办些事情也不错，我讲这个经验，希望你们同学们要特别重视我这个话，你们总有一天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不管你是什么同学，你总有一天要领导一个单位，领导一个支部，领导一个公社、一个连队，领导一个小小的机关，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们领导一个县，领导一个专区，你们要领导一个部队，三十年之后你们还要到最高领导岗位是有可能的。你们青年人有广大的前途，你们要牢记我这个话。张彦是很重要的教训。对周围左右的人不能够疏忽，那样相信他，要上当的。我讲这个是很沉痛的。同学们，要取得教训，不是愤恨他呀！恨得要死呀！这个用处不大，要化这个愤慨为力量，要取得这个教训。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因为我对张彦犯了错误对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也不行。一个张彦，一个人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发生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了，只靠我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单帮，我也没有办法（笑）。你还是要相信同志，要取得教训，就是以后要对同志进行考查，起码什么地方作报告，要把他的报告提纲拿来看一看，领导职责没

有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来执行这个领导职责，这个很重要。你们青年学生不感觉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这个问题，你们一旦当了支部书记，多少你们就要觉察这个问题。支部书记，你也有几个支部委员，他乱讲话，他给你闹出乱子、你支部书记没有责任啊？当了总支书记这个问题就升级了。一个系主任，你周围的几个人，你没有管好，我没有资格来教训你们，但我们可以把我多年来我有一点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讲给你们听。

张彦这个人，又没有什么知识，又不懂什么事，到处整人，不知为什么，哪一个给他的权，典型的国民党官老爷的作风。张彦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会现象，也是个人现象，着重是个人现象。姓张名彦，这个人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有的同学就问，希望你们在这里批判，我不来定调子，定调子过早，让大家广泛发表意见。错误当然是真正阻碍文化运动的，打击民主的，有很多地方是政治陷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可以进行批评，都可以研究怎么样，大家来批判我不多讲了。我着重讲这个问题，这是个个人现象，发生在张彦个人身上，他们出身怎么样，工作的经历，这个人参加革命很顺利，一直一帆风顺就爬这么高，这很有原因的。在过去斗争中间，受过挫折，挨过整可能就好些。你们这次文化运动两个月，你们挨过整的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呕气，整一整很有好处，尽管他整错了，你是有道理的，他们不该整你，但整一整也有好处，什么道理？你记着这一条，你就不至于随便去乱整人了（鼓掌）。这不是很好吗？毛主席讲要取得教训，张彦这个过去没有被整过，专门整人，胆子越来越大，所以这次犯大错误，要罢官，还要劳动改造（笑声），在你们这里看到一个条子，有个同学写信给我，很气愤，搞我的逼供信、陷害我，我作了四次检讨都下不了台，我就劝这个同学，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很好的一次教训，你是有理由的，但是你挨了整，千万的，这个，这个……所以说这个人，别的什么本事没有，毛选没有你们读的好，因为你们有时间读，我们确实没有时间读，确实不是撒谎，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只能抽空看一看，抽一段看一看。有系统地读，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时间排得太满了。你们比我们强，有时间读，我这个人跟其他领导同志一样，经验倒多，可以给你们讲点经验，也许对你们有帮助。你说挨打、受压迫、不公道的待遇，最多还是毛主席，你说我们全党没有哪一个有毛主席受的委屈大、挨的错误斗争大，1921～1935 年整整十五年都是挨斗争的，

遭斗争又罢官，宣布是机会主义、宣布他是枪杆子主义、宣布他是农民意识，留党查看嘛！罢官嘛！就是沉得住气，他能够取得教训。这个十五年内，他都是正确的，都是人家斗争他，有好多次我都参加了，我是犯错误的，有两次我是犯错误的，也是斗争了毛主席（笑），毛主席也并不见怪，还是用我这个人，还跟我合作，不记这个仇。如果毛主席他还记这个仇，他不能够成为伟大的领袖，这个地方要有宽宏大量。对立很大，伤了感情。对立很久，几十年不讲话，几十年不忘记，这不够共产主义风格，一个同志他犯错误嘛！他没搞清楚，他就斗争了你嘛！为什么不准许他考虑呢？看清楚再跟你道歉，不道歉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还可以合作，共同打败美帝国主义嘛！共同来搞文化大革命嘛！共同来斗争当权派！为什么要记这个仇啊！那一个人不犯错误呢？毛主席就这么讲，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主要是犯就能改正。我们就看不出毛主席在什么地方犯过错误，在总路线政治上、战略上、组织上，总路线几十年完全是正确的，所以他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袖，成为世界人民的领袖，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就是不记旧仇，不念旧恶，跟拥护他的人团结得很好，跟历来正确的人团结得很好，就是跟犯过错误的同志他也跟他团结，完全不是从这个人出发。我个人受了委屈，我个人挨了打，从这么一点出发，从阶级利益出发，这个人整了我是错误的，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就不见怪了，从整个阶级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跟敌人斗争。他在整我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的，但是只要能够有觉悟，他在对敌人斗争这个问题上很有用，我们就要支持他。我这个人也不是自我吹嘘，我希望你们不要到外边去传。你们这些年轻人，记忆能力很清楚，笔来得快，一讲话你们就记下来，录音到处去放。我在这儿的录音不要到外面去放，了解水平也不大同，各个有各人的感情，一传就好影响就不大、坏影响很多（笑），讲话也很困难，不是我在这里自我吹嘘，我这个人过去整过很多人的，人家也整过我很多次的，我讲这个问题是有经验的。今天对你们青年同学，因为你们讲这个问题缺乏得很多了，所以我讲一讲，有助于你们挨整的人也就大量一点，思想也就通了一点。整别人的人，也懂得这是很不好了，取得一次教训。我们团结起来了，这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劝你们无原则地团结，这是有两原则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记，也不要传出去，我只限在你们这儿讲。这些属于我们党内的高级会议，我没有理由来宣布。过去人家整了我五年，

讲我是 AB 团，讲我是反共团的总团长。那时我作省委书记，作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你们现在挨整，张彦把你们整了，这个不算，哎呀！这不能算挨整（笑）。

你要真正讲讲我革命这一段历史，那个讲起来，所以你们包围我，我还是欢迎，你就是围住我，我满不在乎，你可以围住我四十小时，三十八小时，五十二小时，那没关系，无非是不给饭吃，不给觉睡。过去我们受的围攻我讲起来很伤心，拉出去就枪毙了。根本没有道理，根本不讲道理，那个错误领导，那个错误领导正是这样，（不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酷刑拷打，我不愿意讲，整了五年，后来才证明了不是啊！是革命的。我也并没有要求那些人来给我道歉，要给我作决定，给我平反。蒋介石不打，把中央一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敌人来解决的，敌人来作结论的。我们那个时候继续斗争，拿起枪杆子跟蒋介石干，证明了这个人不错，不是反革命。外交部就有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满不在乎，我在三十年前，人家就叫我反革命了。现在讲太迟了。他们就坚决要围攻，我说无论如何不要去围攻他，围攻他干什么？这个不但得围攻，这张大字报完全是错误的，不是去围攻他，所以我对这些并不记仇，也许有些反对我，斗争我的人，也许继续在我领导之下工作，我就没有报复他，他们有些同志还说对不起，那时候我犯了错误，我说，这个事情过去了，不要提了，能犯这个错误也是有原因的，不能怪你，也许我们自己也有缺点，我们自己也讲过错误的话，因为我那时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就不相信有 AB 团。我说革命的队伍里都是好同志，有个右倾观念，就这样引起他们的怀疑。这个人奇怪呀，总是讲没有 AB 团，……（听不清）一见有右倾观点就把他处理一家伙，就处理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当时对这样的问题，也不那么去追究了，也不去影响到我们同志之间的革命的团结。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队伍里编队伍，一去编队伍就把我们抓起来了，你们今天进学校欢迎这是另一回事。把手捆起来，把我的手表、衣服、帽子都分掉了，就吊到一个棚子里。说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你要招派你来干什么来的？你不招就杀你的头。那时就一直搞了四天四夜，第五天才放，不给吃饭，不给水喝，两个手脚捆起来就丢在草地上，就那样睡觉，我那时候认为过几天就要完蛋了，被枪毙掉了，说不清，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一开口就讲你是反革命。你怎么能跑到西安、跑到南昌、跑到兰州、自由地跑起来，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

说我是党派来的，来解编新四军的，新四军在前线抗日。“我不相信”。我说我有介绍信，“介绍信是伪造的”。你也没有办法啊！我明明是党派来的，他不相信，怀疑啊！你有什么办法？从早上起一直骂到吃午饭，吃完午饭就去休息了。吃了午饭、睡了午觉、他精神好了又来骂你（众笑），又骂你，又不能开口，不能反他，那有什么办法，拉屎拉尿，四根枪把你逼着，绳子吊着。你跑我把你打死，那时哪敢跑，跑就把你打掉。这就是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哈哈……当时，我想革命呀，干革命得到这样一个下场，也有很大的感慨。流眼泪也流不下来。

后来第三天，大概他们骂得很疲倦了。我说在你的面前，我还是让你怀疑，你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我不能说，你这个怀疑一点根据也没有，你可以怀疑，怀疑我是国民党派来的，怀疑我是背叛了，是叛徒，或者跟国民党当土匪也可以，但你肯定了就是不对的。你可以派人到延安去找毛主席，还可以到江西中央局去，到那里去证实，我是派来的，还是怎么样……你讲的硬你是个大反革命，一个烟盖帽，一下打过来，结果没有，也没有打到这里，就是个大窟窿（大笑）。我说你动武是不对的，野蛮是不行的，要讲道理，共产党打共产党，这个不对。“你是共产党？你是反革命”我说你这么样有什么办法，拉出去枪毙吧！我不怕死，我革命就准备革到自己头上的。我来革命，我原先就准备把自己的命革掉。我从来没有这个投机取巧，光革人家的命，我那时有一个道理，他一直攻了我三天了，我说你要懂得现在爆发了。现在问题要转新形势、新政策，就是停止土地改革，停止这个苏维埃政府，取消了，土地革命暂时停止。土地革命暂时停止，我们和国民党合作，先解决民族矛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壮大我们自己。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取得政权。合作是策略。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不合作，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后方打他，就说我们是汉奸，群众不了解，全国人民的愿望是要打日本、停止内战。我们不打日本、搞内战，但是全国人民不了解，我们党不能发展。说道理，那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到了第三天，围攻的火力就弱了，“你还有道理”，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有很大的道理，就是有点道理（笑），我是中央局派来的，是毛泽东同志派来的。“啊！什么中央，什么中央局，什么毛泽东？我不承认，那个来我这儿都要抓起来。”我后来看来整你三天三夜都是让步的，一直很让步不行，我要抓住辫子，我说：你搞我三天

三夜，我总以为你是反革命，我都忍受了，我都不讲话，我总想说服你，你终于暴露了本来面目，中央你不承认，毛主席派来你要抓起来，究竟你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反攻，哎，他这个反革命倒来问我，（笑）我就转到主动。我就说同志呀！你作为一个省委书记，共产党的负责人，讲话总没有点政治意义，有点组织观点，怎么乱讲呀？你怀疑是有各种理由，你怀疑毛主席是没有理由的，你怎么领导我这个人，我就挖苦他，“你不象省委书记”，“好，你拉出去枪毙！”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作结论，根本你的立场发生问题，你拉出去枪毙，我不怕死，我好汉不怕死，怕死就不是好汉，我是共产党员，拉出去问题很简单，你根本就想在这山上当土匪，假借共产党名义当土匪、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根本没有一点政策，我坚决反对，这个同志这样一搞，他本质很好，过早了弄错啊，满硬啊（笑）我说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井冈山上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的，为什么一到这里就把我抓起来，要枪毙，要杀头的，骂祖宗，骂爷娘，乱搞一通，完全是不对的，不让我讲话嘛！“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不跟你谈，我是对共产党谈党的政策，你是根本反动的，我为什么跟你谈，谈也谈不通，对牛弹琴，你要枪毙就枪毙，我干革命干了 20 年，我不怕死呀！我也就挖苦他，我身上打好几处伤了，你身上一个伤也没有，他又发脾气了“啊！你这个态度很坏，我就要杀你。”我说：“你就没有权力杀我”，你为什么杀我？我是共产党员，你杀我，你是反革命！（笑），我相信你要是共产党员，你就没有权力杀我，你是陈毅，为什么不认识你，我们在井冈山当赤卫队拿枪杆子，你们当老爷的在上面讲演，作大报告，我还听了很多，我可以认识你，今天把你揪住了，就由我来处理了。我说：“你处理我没有权，你应该在我领导之下”（笑）。这一搞，他就泄气了，首先改变态度了，把所有游击队都喊过来，要我讲形势，作形势报告，待遇就改了，当晚就给我饭吃了。我说：“这个样不行，手也捆着，脚也捆着，怎么作形势报告呀？共产党作形势报告没有这么个报告法。”他说这个犯错误，犯错误我给你讲，哈哈……解决了。

这个同志现在还在，是很好的同志，阶级斗争的考验是个很好的同志，一见到我总是要道歉，我说没有这个必要，阶级斗争，你犯这个错误，我也犯过这个错误，乱斗乱打，乱斗一场，他那个队编成新四军一个团，这个团很能作战，是新四军的一个主力，这个团在我的领导下，在我直接领导下，那些指挥员、连长、

排长，拿绳捆我的，押起来，拳打脚踢，鞭子抽的，这些同志很好的，见了我，司令呀，总对不起。几十年前这件事，再犯错误把你枪毙了，给党造成损失，我说这个不在乎，这个没关系，我过去也乱斗人，乱捉人，也犯过这样的错误的，犯的错误比你们多，今天我们主要是抗日，我们打蒋介石，你们那个时候是执行命令，你们是执行命令怎么能怪你们呢？我说我那次没作很好的准备，没有先派人来商量好，突然跑进来引起你们的怀疑，我接受错误，我应该先有准备，先把文件送来给你们看，先派一个什么人进来了解情况，先跟你们的游击队代表会一面，使他们不怀疑了再来，这就避免了这一场误会，革命斗争中间，毛主席讲革命不是绣花，革命不是文质彬彬，革命之间会出现这种错误，那种错误的，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过去我斗争人家噢，把人家搞得吃不过饭、睡不得觉、这也有过，我也给人家道过谦，或者人家错误没有那么大，我就拿来一整，戴了很多帽子，把他们工作取消、撤销、降级，我们搞这些东西的，但是我有这两次经验，我以后对这个问题比较谨慎了。今天这个问题多少有点积极意义，我多少年不愿讲的。有一次在民主党派大会上，周总理点了我的名，他说，象我们的陈毅同志，这样的负责干部，过去也遭过误会，给别人也打仗，要我讲，我简单地讲了几句，我不愿意在这暴露共产党的弱点，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是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偶然现象，没有什么奇怪。所以我们这里有人被斗了，我劝你们要从我们整个阶级利益团结大多数，团结那个乱斗的同志，要有一种雅量，一个革命者要有宽宏大量，宰相肚里可以撑船、要学习毛主席，你们不要到外边去传，传了引起错觉。今天这个中共中央委员里有很多人反对过毛主席，不少，有很多人坚决拥护毛主席，一直是正确的，有不少人是屡次犯错误反对毛主席，但毛主席还和他们团结，他有这个雅量。你们不是读古文，泰山不拒土，才能称其高，渤海不拒细流，才能称其深。所有灰尘都留在泰山，泰山不拒绝，聚起来，泰山就高了。长江大河、对于小河流，它都容纳。你要到我这儿来跟我合作，我们一直奔向大海所以长江的流越来越大。

毛主席连李宗仁这样的人，李宗仁难道是好人，完全是牛鬼蛇神。他杀的共产党还少吗？他杀的共产党不是一个，杀的共产党是几万，几十万。现在他来了，还要给他一定的安排。主要是对打击美帝国主义有作用，对解放台湾有作用。毛主席说叫“废物利用嘛！”（笑）我们说你们学毛选。读语录，你们摘录这个东

西，你们比我们高明，比我们记得熟，我要向你们学习。但是讲经验，你们确实不如我们。你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没有什么毛病吧？这句话不是黑话，是白话，不是，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家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嘿，我总是希望给人家讲经验，讲经验我还是可以讲。你们如果不拒绝，我将来有机会，可以多来讲经验。（鼓掌）

那么我还要劝一劝你们斗争大家的同志，你们明斗错了，还讲自己有理，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反妖风斗了许多人，斗的不对的就要给人家道歉。我们斗错了，证明这个妖风是张彦搞起来的。张彦犯了错误，我们被他蒙骗了，我们觉悟了，我们把你斗错了，握手谅解了。被斗的人把错误放在张彦身上，不要去怪这些同志。你们这些同志。我千万告诉你们，你们几十年还要合作呀！你们革命是不是革到晚上就不革了？（笑）你们几十年在战场上要见面的呀！要同患难共生死。美国人打进来，你们大家都要拿起枪杆子打仗的呀！应该比兄弟还要亲，比姐妹还要亲爱（鼓掌）。为什么人家斗错了，就那样不能谅解？为什么把人家斗错了，就连一句话也不讲？不能使人信服。

当然妖风也要分析，这个话我是不是讲错了，我还要讲。讲错了，你可以给我批判，马上贴我的大字报，我可以承认错的。妖风是张彦煽起来的，但是张彦他来扫这个妖风，你说他一点根据没有？我要替张彦说几句话，这绝不是包庇张彦。在外事系统里面，二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对外文委、对外文化出版局，外交部还少一点，这几个单位，就有那么一些什么攻击毛主席，攻击刘少奇同志，攻击周总理，攻击林彪同志，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有这么一些人，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说不要去追查，这些话是不好的，也许是一个同学，头脑发烧，乱讲那么几句，这是他一个错误。不要去追查，将来他自然知道他错了。讲错了一句话，就说他是反革命，这不好。也许他还有什么人。不是他讲的，是人家这么讲，他作了义务宣传员。是不是要追查呢？现在不要追查，运动一深入，自然会搞出来的，是不是有地富反坏右在里面搞流言蜚语？也有可能。讲了些什么话？我今天不作义务宣传员，我今天不讲，因为那些话没必要给他们作义务宣传员。你们外语学院全体两三千人，我来给他作，把反革命的话我在这里照样重复一遍，我有什么必要？我是共产党员，你这个人很奇怪，你在这里宣传，这是大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些挨斗的同志是不是你们确实讲错了一句话，两句话，人家抓辫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考虑一下，人家更信服。

少奇同志的录音你们听过吗？说清华出了个标语：“打倒毛主席，拥护党中央。”这样的标语当然是反革命的，当然是属于妖风。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账。我讲错了话我承认。你作错了事你承认。我受了委屈，我自己宽宏大量，不要求人家给我道歉。但是，这个委屈是我搞错了，我就应该给人家道歉。这才叫政治家的风度。什么叫政治家？政治家不是很简单的，不是从个人感情、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整个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看到大的、主要的，不纠缠在枝节问题上。我有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很充分。我还是把本质问题讲出去，是不是能够解你们二外语学院的同志们之间的对立情绪，我认为没有把握。把握不在我，在你们大家把握。你们还可以对立一个礼拜，还可以对立二个礼拜，还可以对立一个月，甚至你们继续，甚至你们终身都记这个仇。一到美国人打进来。大家去打仗，你们就不记这个仇了。所以我不悲观，并不悲观，将来总有一天会解决。听了我这个报告，听了我这个老革命。多少年革命中间，不断犯错误的，还来讲了十分忠恳的话，你们愿意听，我想你们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我不是人家打了我五年 AB 团，最后遭了冤枉，人家把我捆起来。要杀我的头，搞了我五天五夜，还有很多，人家整我十年，就说我反对毛主席。十年来我一句话不讲，最后证明我是对的。毛主席对我讲：“陈毅同志，作为政治家，要有最大的忍耐。”要有最大的忍耐，这个对我教育意义很大。我经常记住这句话，要最大忍耐。人家整了你，人家对不起你嘛。人家罢了你的官，人家处理你有问题不公正吗？要忍耐，要看到大局嘛。为了小小的一点事情不能忍耐，一触即跳，眼睛里面卡不住一点点小灰尘，这个人不能成大器。青年同学啊，这样的人不能成大器。什么事一触即跳，什么事就冲动，轰轰隆隆洋油桶，这个人不能成大器。毛主席，你看一直在压抑。1921～1935 年能够很大忍耐，打入冷宫，什么事情都能办，不让他管事，我们不好去拜访他。鬼都不上门，冷冷清清。毛主席最大忍耐，毛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到 61 年、62 年才反对，作了最大的忍耐，希望赫鲁晓夫改变苏联的修正主义，直到他公开反华才反击。

我讲我这个例子是不足为训的，主要是毛主席的例子。他被制止发言，被斗争了十五年，毛主席在三五年遵义会议——上台，全党拥护，众望所归，如果他

十五年不忍耐，搞一些其他活动，遵义会议上不了台。上了台人家还是不服他的气。所以使人很服气。我这样反对过他两次，犯了两次大错误，反对他的人，我现在心里很服气，今天毛主席上台，我们欢呼，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念旧恶”，孔夫子讲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今天要我们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才能把第二外国语学院办好（鼓掌），把一部分同志除外，办不好这个学校。当然，今天这个左派，讲老实话，什么人是左派，什么人是真左派，什么人还不够左派，现在很难定。我老实讲，就是光有这个左派，把这个外国语学院办不好，还要有这个大多数的同学。光是有大多数同学，还要跟教员团结。教员大多数是好的。我要替教员讲一句话，教员有少数专家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这些人，只要他们改正错误，我们要团结他。光有学生、教员、员工不团结，不团结也不好，不给你做饭吃，我看你怎么办。我说呀，院里面管事务工作的，炊事员同志，他们有权可以给你们饭吃，可以不给你饭吃。他们一天到晚辛辛苦苦，这么大的热天气，难道他们的命就是苦呀！一天就要搞这劳动呀！我来参加斗争，我来贴大字报，我就不做饭吃，这怎么行？这要讲良心话。旧话叫良心话，新话讲毛泽东思想，讲马列主义。但是我们主流是好的、健康的、正确的、轰轰烈烈的。张彦这么一来，就把它搞得冷冷清清。搞逼、供、信，搞政治迫害，乱斗，这是错误的。逆流是张彦搞起来的，犯了错误，破坏文化大革命，主要就是这些，这是主要的逆流，逆流中包括张彦的，另外还有一些人运动初期是不是有些行动，不是那么正常的，也还是应该允许人家批评，是红绳黑线的斗争。工作中没有犯错误，我们这里哪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圣人啊！社会主义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人，这个女同志想当武则天并不好哇。就是那个教育局，那个工作组把这个反映了。我说这个值不得重视，这个人头发烧了，说错了，乱喊乱叫，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这样就给人家作个结论，说人家怎么样。年轻同志嘛，就楼上楼下，什么戴高帽子啊！喊啊！叫啊！自己也没有头脑，丧失冷静，一喊，这个，这个……冷静一点，就一个同学或工作组鉴定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对的，这样不好，对运动不利，算了吆，我们就是不让同学斗同学。主要的是院领导，主要是系领导，党委的同志以下的教师就不要斗了。教师的权威、专家，权威首先有浓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还得给改造了以后，承认错误以后，还是跟他们合作，这样一个政策比较好。这个问题要由你们来定，我是建议。打击面不大，同学斗同学斗不出

个结果，保护少数是完全正确的原则。但还要补充一个，刘主席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你不尊重大多数人意见，所有少数人，七亿人口就有七亿个少数。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办事，那怎么办？尊重大多数，同时要保护少数，保护少数要尊重大多数。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在人民大会堂。我说，我来补充一点，不是我来反对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是我的先生。毛主席更是我老师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保护少数，我的意见我不放弃。不放弃怎么办呢？外语学院二千多人，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办事，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永远不开课，永远这么革命下去。

有人说我是不是讲过“包庇张彦”这个话。我讲过这个话，我讲过“我就要包庇张彦”，我讲过这句，我讲过的话，我不推给人家，不过我在什么情况下？我是在运动初期讲的。运动初期就是讲了很多攻击中央同志、攻击我们中央首长，各单位都有。就是我们外事单位也有吆！我叫张彦去查，你们工作组查一查，但不要追，不要去斗。可能是有些同学，有时有些愤慨，冒叫一声，那就不足为凭了，这就不要作为一个大问题来谈了。也可能是有人有意识散布的。现在不能说外国语学院，有一个教授，就是现在还乱说，他就是有意识，我就说他有意识去散布。有证据，有些同学讲出来。但现在还没有斗他，要他交代。不交代就过一个时候再说，不要去组织围攻。因为在那时候就攻击张彦，我说“我就要包庇张彦”，张彦还没有犯，23 日、24 日，张彦犯错误是从 22 日开始的，24 日在这里第一次犯错误，最后发展到最高峰——6 月 30 日在对外文委报告犯错误。这个我就不包庇了。我是支持工作组的，22 日、24 日、30 日以前，我是支持工作组的，我说工作组不撤退，你们要反对工作组，我决不撤退。我要工作组顶住，我就包庇工作组。你说我包庇，我就包庇，将来犯了错误我可以检查。那现在证明这个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就检讨。我使用工作组，使用错了。我派工作组犯了错误。但中央给我们承担了责任，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是中央派的责任中央是比较轻了，主要责任还是我这个具体领导，是我派的。工作组也要一分为二，工作组组长责任更大，工作组组员责任就比较轻了。工作组长由你们决定，你们要他回来作检讨。检讨不够再检讨，检讨不够再检讨，检讨十天半个月满可以（掌声），由你们作去。我决不包庇他。我现在包庇他就不对了，工作组员就是一般同志，要犯错误也是一般性的错误，恐怕不必把它提得这么高，这个由你们决定，

我只能建议。现在第一期工作组发生的问题，同学们，什么问题啊！他们立即回到外办，外交部立即就变成了群众，他们又要到那里去搞斗争。在工作组，他拿权斗人家，他回到那里呢？他就有斗人家的资格了。形势变化很快，一个人立场没撤除。工作组搞这个材料，搞那个材料。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他说了就算话啊！他这次作检讨，回去了。一回去了，他变成一个普通干部，他就要贴大字报，要贴人家的大字报。

工作组撤回去了。我前天找所有的工作组开了个会。我说你们这些同志，你们的工作组搞错了，你们回去要作检讨。检讨完了，你们就回到单位。希望你们还是有勇气发动革命。你们要向那些青年学生学习，勇于揭露错误，勇于冲锋陷阵。你们不要因为在学校里在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回到机关，哎呀，我就谨慎一点，我不要又犯一个错误，我大字报也不贴，意见也不讲，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悄悄地就过去了，那样不好，在工作组里也可能受到谴责的。一个他回机关，他变成个英雄，很勇敢，一个他变成一个典型的中间派，也不哼，也不哼气，不表示态度。讲赞成我都赞成，你们大家反对，我都反对，随大流，也可能变成一个右派。因为他正在作检讨，你们也检讨不出他什么东西。因为他在这里只有一个月、两个月，他的问题，还在那个原单位。他在那个原单位，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他的错误言语，反党事实，工作的成就在那里才能够解决。他是个好同志，在这个地方是个考验，他要回去作最后的考验。

我今天问题很多，我觉得有一点意见。就是周总理在这里搞了五天，你们这里几个方面不同意见的人，团结起来，恢复感情。很好地酝酿一个，选一个，认为现在的这个革委会、筹委会不好，或者不适宜了，选一个能真正代表你们革委会，使我们的运动走上正轨。我看你们革委会成立了，马上就叫张彦和他工作组全体到这儿来参加革命，来检讨。你们一通知，打个报告，我马上就叫他来。叫他早上到他就早上到，叫他晚上来他就晚上来（掌声）。不过，我们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根据毛泽东思想，还是讲道理。讲道理让他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让他有辩护的权利。因为现在这个人的威风已经打下去了。我已两次见到他了，见到我就大哭。我说你哭，我说你哭也没有多大用处，你光哭也没用。你坦白，老实承认错误，办法就在这个地方，希望还是有的。回来的时候，检讨的时候，革命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让他把话讲完。

关于包庇的那个话，我已经给你们说明了那是在运动初期，他还没有犯错误。当初有些人要当工作组刚刚到就要把它赶走。我说这个不行。我们就是要包庇他。斗争中那个火力针锋相对，是讲这个话的。现在看起来，张彦犯错误，已经暴露出来，我就不包庇他了。我再包庇就是错误的了。那时候，讲这个话也不好。所以这个犯错误呀！同志们，怎么办？只好承认错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呀？

（笑）

另外有人说，停职反省六个，以后停职反省十二个，这个问题是我们争论之间的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地方简单地讲几句话，是六月十三日周总理从外地回来，找我去，还找了其他同志去，他传达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指示，是在周总理家里，在客厅里。我去了，张彦也去了，还有其他人。张彦说，他在十三日五点钟他讲了准备在二外院把张天恩等同志六人停职反省，向我请示了的，说我和周总理点了头的。后来周总理说记不起来了。问我，我也记不起来了。周总理那天还在你们这里讲话，讲了这个事情。后来张彦，他又说他确实讲过，确实我们点过头的。他准备到文委、二外语学院、外办作检讨，把这个事实查对一下。他说是那天五点钟到七点钟开始讲了二外的情况，他准备停职反省六个人，请示总理，请示我，点了头的。我们说我们记不得了。那么他现在是一个犯错误的人了，我们不能说他是犯错误的人，我们就压他，说他是造谣。他核对事实的权力没有，我们核对。就抓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他是讲过，是讲过二外的问题。但讲没讲停职反省六个人呢？他们记不起了。你们没点头，他们也没有注意。你们的头是怎么……哈哈……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就去看我的日记。我这个日记，对我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还可以查对。我查到六月十三日上面记：周总理从外地回来，找我们到新华厅谈，传达毛主席指示，就是这个。就没有讲张彦汇报“二外”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讲停职反省六个人，那天，七点半结束了，就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去，就没有这个，本本还在。那么第二天记了，14 日 11 点钟找张彦同志到我的家，他详细地讲了你们这里开大会，停职反省 12 人，张天恩等同志，他们自封为红线，展开了斗争。二外开得很好，这个记得很详细。十三日就没有记，这个案子查不清楚，当然不能拿这个日记本子说张彦撒谎。首先，我看这个问题要交给你们解决，张天恩六个停职反省，停职对不对？（众说 12 个）又加六个。不要急，你们这么性子急，不好，我还没有讲完吆，他又加六个，

12 个究竟停得对不对？要不要翻案？由你们决定，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人不对，你们就翻一个，两个不对，两个停得不对，就翻两个。三个不对我们就给他翻三个。你们认为 12 个都停得不对，由你们大多数决定。今天，张天恩他们这些同志有权利为自己辩护，这也是保护少数的问题。张彦他就没有多数，他俩公婆，他俩夫妇，恐怕他俩夫妇也有矛盾，他们孤立到最后一个人。所以还是要给他这个权利，给他查对事实的权利，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大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拿一个多数来压人。准许犯错误，毛主席说这个话，你们把这句话记得是不错的，很深刻。要准许犯错误，要准许改正错误，要准许革命，要准许重新做人。

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同志就是不准许犯错误，一犯了错误就得了，要把他整个死，张彦就是不准许人家犯错误的，一犯错误就整得人家要死，现在他老人家犯了错误，怎么办？（笑）所以物极必反呢，这个暴力就很快的，你看看，特别是在二外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我全部都看了，60 几页我全部看了，那付神气呀，好大呀！这是个国民党官老爷的神气，这个可以给你们每人一本，刚才有人提出来（鼓掌），很典型的一个报告，非常典型错误的一个报告，多读几遍，把它作为反面镜子，对我们很有好处，我倒不是在这里找张彦的错误，错误很多，性质很严重，要态度、当官作老爷，整群众、整同志，把运动方向搞错，我特别欣赏。我也不要象他那样搞，我从这点取一点经，我以后不要象他那样搞。象他那样搞，总有一天要落到他那个下场，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塌不下来，只要你承认错误，广大干部、广大群众、毛主席和中央总是谅解的。

我讲到这里，回去还有事，我就走了。我下次还要来，我至少要比周总理多来几次，我才对得起同志们（鼓掌）我要看大字报，要找老师，找被斗的同学谈话，也要找 12 个人讲话、当家作主是你们，我总想能够有点帮助，什么思想水平，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问题不如你们，但是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就有资格讲话，这点有点本钱，讲点经验，还有很多同学，我着重交代。他们写了信，我都看了。每一个同志的信我没有一一回答，这我确实很忙，有些问题我是一定要回答的，但是这里没有时间，我讲到这里，那么批准我离开了吧。好不好？（鼓掌）你们还是酝酿一整套，成立代表大会，系革委会把这些套成立起来，大会套小会，小会套大会，开始斗争当权派、黑帮，你们认为时间抽得出来，叫张彦和

他整个工作组来检讨，就检讨，争取时间，今天揭露他，帮助他，你们通知我，我就叫他来。他在你们这里过了关，还有对外文委，还有外办，然后我们才能给他下结论。还是要把革委会这个问题，在革委会的领导下，这个革委会要包括各方面人，纯粹是左派也是不完全的，左派是定义，现在各有各的看法。我认为我是左派，你是什么左派呀？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斗过我，你不是左派，我挨过了，我是左派，我又没挨过斗，我也没斗过人，我就是中间派，哈哈，哈哈，不要在这些问题上争，主要是选一个有工作能力的，能代表大多数的，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人要我讲国际形势，有人要我讲当前的问题，将来有机会、时间，我尽量发表我的见解，即使是错误的，我也还是要勇敢地讲出来。同学们之间不要有界限，特别是我，很关心是你们这些同志之间有隔阂、有对立情绪，伤了感情，我主要是来解决你们的几点意见，由你们去解决，走上朝气蓬勃非常健康的道路。你们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其他学校完全可以到你们这里来学习，现在好几个学校根本开会都开不成，这个当主席，那个把他推下来，他想当主席，比你们这里对立更厉害，选票根本不集中，没有一个多数票的，集中不起来。学校革委会成立不起来，那个没有什么奇怪，大革命，我们长期革命，经常遇到各种情况，总会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消除对立情绪，不是搞折衷主义、搞调和路线。不是这样，我们还需要革命的伟大的团结，我不是替牛鬼蛇神替张彦解脱，今天我讲了话，可能讲得有些是好的，也可能讲得一些话是错误的，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揭露，我们总要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经常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道，我们工作可能改得好一些。我长期不来，就是一个错误。领导人家，长期不来征求人家的意见，这必然犯错误。好了，检讨也没有办法，检讨到明天上午，会还是要结束的。好啦，就结束了。（鼓掌）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听说你们为一付对联争执不下。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看一个人，第一要看阶级立场，这是本质问题。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是表面。那付对联。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讲了，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觉得应该少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康生讲话：

几个月的运动中，我们年老的人，从你们年青人那里受到很大的教育。同志们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是为了坚持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你们的一切辩论，一切争论，基本的本质的问题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不是对联这个字或那个字改不改的问题。为什么同志们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统治下实行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条路线是与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相对抗的。同志们提出要坚决地战斗，为无产阶级路线而奋斗，完全是对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无论大学教育，中学教育，要不要阶级路线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就是为了这条阶级路线——毛泽东阶级路线而斗争。我对你们很钦佩。

其次，在过去彭真、陆定一黑帮的反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在各类学校里，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同志们是深受这种迫害的。同志们提出问题来表示抗议，提出坚决反对对于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的这种迫害的抗议，提出要造反，这是很对的。

第三，我从同志们的活动中，从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活动中，感到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过去我们共青团工作中有许多毛病，甚至有严重错误。我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有些学校团委瘫痪了，看到北大团委瘫痪了，看到团中央有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彭小猛同志在北大控诉了张承先，是完全对的，是有道理的。同志们起来革命，人大的和其它学校的红卫兵提出要改造共青团，我看这一要求是正确的。我赞成今天晚上要开辩论会。今后如何把我们的共青团改造成真正的毛泽东的共青团，我希望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成为改造我们共青团的重要骨干。过去的青年组织涣散，我看有点像“全民团”，就是说有些青年团阶级路线不明显。我希望你们坚持无产阶级路线的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把你们

坚持阶级路线的精神彻底贯彻到青年团中间去。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要在文化革命中当先锋，当前要把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改造你们青年团的任务相互配合，很好地结合起来。你们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也是很光荣的。

同志们，坚持我们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坚持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但是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和贯彻毛主席的阶级政策。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是分不开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贯彻阶级路线，同时我们要更善于用革命的阶级政策。这个阶级政策，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们，同我们共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了我们这样的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希望同志们要拿出很大的，很多的，很深入的力量，去研究毛主席接班人的五项原则指示。我应该说一句，要拿出百倍的，千倍的，万倍的力量，而不要因为研究对联，妨碍了我们研究毛主席的五项原则指示。

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头一个条件，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就是要革命，要阶级斗争。同时我们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善于分析。对每件事情要分析，善于把问题一分为二地来看，就是说辩证地看问题。

我很欣赏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这些呼吁书是什么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思想的。

毛主席的五条原则的第二条叫做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服务，这样一个革命者，他不是为一小撮资产阶级服务，也不是为一小撮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服务，是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也就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不是半心半意而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二条。

第三条，真正的左派，真正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必须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同志们。怎样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权就是要领导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领导权就要落空。团结绝大多数人就是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他不同意，我们怎样

说服，等待，团结他们，甚至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也要争取团结他们，不是看到他们的意见与我们不同，看到他们的意见错误就不管他。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地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在我们共青团周围，团结在党的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周围，彻底斗垮黑帮，彻底斗垮资产阶级权威，彻底把教育制度进行革命。

第四条，就是要有民主作风。没有民主作风就没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没有民主作风就不可能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一条，青年同志们要特别注意，要倾听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一种意见与我们不同就不愿意听，甚至那种意见是不对的，我们也要听，不对的意见更可以证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要让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讲话，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意见，真正实行民主。同志们要记住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政策的一条原则。

第五条，就是要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点青年同志们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容易的，讲起来容易，遇到现实斗争，就不一定能实现的，但它恰恰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生命就会停止，同时革命就会停止。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真正地很好地进行，我们的观点，路线就不能正确地很好地贯彻下去。

最后，我同同志们讲，我很赞成拥护你们坚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观点。同时也希望同志们要善于去研究，实现这种阶级路线的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政策。这方面同志们还要多加努力，要把阶级路线同我们的阶级政策密切结合起来。政策是路线的生命，没有政策，我们的路线就不能实现。希望同志们真正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看到同志们朝气勃勃的革命热情，我是很高兴的。我常说，你们这种豪迈气概有一千丈。陈伯达同志给我改了一下说，你们的革命豪杰气概有一万丈。我赞成，我说你们是豪杰气概万丈的青年。

你们碰到什么？碰到有些工作组是官气十足，是钦差大臣。你们豪迈万丈的青年遇到官气十足的钦差大臣，当然当中发生了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的是敌我矛盾，总起来讲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感谢同志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我也希望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变成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的革命战士，变成真正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

员，变成为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这是对我们同志们的希望，也是对同志们的要求。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八月六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小组成员穆欣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同学代表，举行了座谈会。

张春桥问：是哪几个大学来的？（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什麼时候到的？（众答：昨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说：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麼？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麼问题来的？

一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麽做？

张春桥问：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麼问题？

一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麽不一样？（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问：你们的革委会是怎麽选的？（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然後，由张春桥同志作了解答。）

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

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二百天，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从六月一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所谓“六·一八”事件。为什麼会发生这个事件呢？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麼？是反革命事件！六月十八日以前，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六月十八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六·二零”事件，“六·二三”事件，“六·三零”事件……经过调查，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为什麼有这个事件发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

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了。这是第一句话。至於你们怎麽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高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天大有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麽办？）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麽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麽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麽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穆欣同志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娄平的时候，让娄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麽结合，辩论怎麽结合？)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麽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贴在哪里都可以。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

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了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你不说话，怎麽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麽办？)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麽办？)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麽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穆欣同志插话：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麽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麽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毫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大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从同学来说，你

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

《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麼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一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长问候！

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讲话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

工作组有几种情况：少数对上边这条路线有所抵制，但也给运动增加了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程度不同的犯了右倾的错误。

另一种是忠实地执行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最甚的是发展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有意把一些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有些虽然撤了工作组，但其错误并未加以彻底批判，甚至由于某些人的阴谋，根本未加批判，那里的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还未平反，这些必须立即从根本上改变。

是不是每个工作组成员都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每个工作组都有右派分子？要进行阶级分析。从总体看多数还是革命的，不同程度的犯了错误，极少数

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是不是黑帮分子要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揭发，由那里群众决定。派工作组及工作组所执行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一切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陈伯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大字报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陈伯达

完全拥护毛主席八月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在大的政治斗争关键忘记了群众，忘记了阶级分析，看不见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进行镇压群众，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恰恰会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向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德国首先发动，而由法国来完成。但没有实现。列宁也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法国、美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在的历史可否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实现呢？看现在修正主义苏联篡军、篡政、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那里从革命走向反动，走向对列宁斯大林的背叛。难道这不象人们所说的国际希望在中国吗？

看种种因素，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确实是这样。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能使我们新中国在世界上建设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扫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让毛泽东思想能够为最广泛的群众所掌握，再而变成更宏伟的力量。我们相信能够做到这样，中国的伟大成就将进一步象翻山倒海地激醒全世界。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 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 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 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 (一) 好的。
- (二) 比较好的。
- (三) 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四) 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

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谈话

八月十日上午，林彪说：

军队的干部中，有些人太落后，又不改正错误的要罢官。我们不能有腐败的干部政策。

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

要注意，不要迷失政治方向。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到底那一条是第一位，那一条是第二位，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

人缘也好，是和事老，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重大节。

干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老。所谓人缘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们不要选这种干部。我们要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好干部。这是方向性的问题，我们的军队按照这样作是一种面貌，否则就是另一种面貌。

对于小节，有错误的人，为了用他，就要批评他，就要帮助他。玉不琢不成器，能认真改造，就大大地欢迎。要按主席的五条标准办，要用他，就要批评他，这是对他的信任。用他，他就一定要改，不改，就无法用。要把好人，能办事的人，拿到领导机关来。

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这是我的话，请你们向军委常委报告，看看有什么意见。这个要到军队中去讲，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

两种政策，两种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军队。对犯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罢官。

干部政策要注意，请杨成武同志注意一下这个方向的问题，请好好和立清（即徐立清同志）谈谈。现在我们解放军地位那么高，干部不要再出乱子。军队干部中再出反对毛主席的人，是最大的耻辱，要坚决按主席指示的五条接班人的原则和我们讲的具体意见来办。

委托××同志好好把《解放军报》搞好。《解放军报》搞好了，部队突出政治了，抓好了这一主要环节，全面工作就带动了，主席思想就挂帅了。

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政治落实到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

八月十日下午，林彪说：

干部有几种。一种干部，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有毛病，有缺点。一种干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毛主席，不突出政治，没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这

两种人之中，应用那一种？要提拔第一种人，不用第二种人。对第二种人教育不改的、不可救药的，要罢官，大大的罢官。这样做，就使我们军队有朝气，有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军队，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北洋军阀的军队，当然，第一种人中间小节方面有毛病的，也要批评，要他改变，批评他是为了用他，信任他。

还有一种干部是全材，大节也好，小节也好，当然很好，但是全材是不多的。

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该升级的要升级，该罢官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科学地总结了近几个月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个决定一定会把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决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制定了党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方针和政策。

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前我国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就英明地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我们党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逐步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

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夺取领导权的斗争。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场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我国防止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阴谋和实行“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是关系我们伟大祖国前途的斗争。

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正如决定中所指出的，第一，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现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它反映着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欣欣向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在群众运动真正起来的地方，轰轰烈烈，势如破竹。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一个一个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被冲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但是，应当看到，运动的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许多地方和单位，还处在似动未动或者比较冷冷清清的状态，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或者根本没有揭开。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曲折，出现了反复。那里的负责人，或派到那里的工作组的负责人，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负责人，对贴大字报批评他们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的那一个负责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围攻革命左派，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当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经过曲折和反复，运动就走上了更加热烈更加健康的道路。

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敢于领导这场大革命，善于领导这场大革命。党的领导的决定性的关键，就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同对待其他革命运动的态度一样，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能不能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标志。

这个决定贯串着的精神，就是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要怕出乱子。那些“怕”字归结到一点，就是怕群众。任何人如果不去掉“怕”字，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甚至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要让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革命秩序，是不能够用预先划什么框框的办法制造的，而要依靠群众根据自己斗争的经验来建立。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些同志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总是迷信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高明。其实，只有广大的群众，才真正高明。群众能教给我们许多事情。我们必须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集中起来，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如果不向群众请教，任何领导人就什么知识也没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新事物，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等，都不是任何人凭空想出来，硬加在群众头上的，而是群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自动地创造出来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总结了群众的经验，在这个决定中肯定了它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最初并不被人重视，甚至遭到压制和攻击。

对待新事物采取什么态度，也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待革命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

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键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有一些同志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就是热心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他们比起那些无名小卒，那些敢闯的小将，在政治思想水平上落后了一大截。但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只习惯于包办代替，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使群众冷冷清清。他们往往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反对群众、压制群众。他们往往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吓得发抖，不知所措，而当他们惊魂稍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把革命运动拉向后转。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迫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经验已经证明，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要靠那里的群众自己来进行，不能由上级机关包办。在一般情况下，不要由上级机关派工作组。上级机关派出联系的人员，都不要有“钦差大臣”的派头，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听到一面之辞，就先入为主。要诚诚恳恳地接触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多看，多问，多听，多想。

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怎样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呢？那就要求各级党的组织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认真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广大群众共命运，同呼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的同志把党的领导同放手发动群众对立起来，这是很错误的。

要正确地放手发动群众，就要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这个决定的公布，使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都直接同群众见了面，这就更有利于放手发动群众。

在运动中，要让群众彻底揭露那些还没有暴露、或者还没有充分暴露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批判他们，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就要求首先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力求抓得准，揭得透。

群众完全懂得，要积极地争取那些动摇不定的、认不清楚大是大非的中间派。当然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在本单位贴大字报，可能点了他们一些名，这是难免的。只要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也允许他们贴大字报为自己辩护，那就不会伤

害他们，并且会促使他们进步。我们相信，在运动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中间派变成左派。

依靠左派同广泛发动群众，更是一致的。只有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左派，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在斗争中，要不断提高左派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定要有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坚强的左派队伍，才能取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面，认识一下。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经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了困难，有很大的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重整旗鼓再进攻，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但中间应有大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结合，正规战和游击战结合，总攻击与战术斗争结合，这次是大战役，是总攻击。今后若干时期，还要出现大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结合打到底。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这个任务不是简单的，不是临时任务，不是短时期能够结束的。十六条讲：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是临时的，要长期存在，这种提法是正确的，正确的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这是一个长期任务，要连续打几仗，不是一个战役性的总攻击就能解决问题。战术性的战斗，每个时候，每个地方，每个问题上都有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可能把文化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我们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旧思想深入人心，影响是很不简单的，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

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象这次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大家动脑筋，在灵魂上大震动，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在这种基础上再改变一种缓和的形式，进行经常工作。质变的形式和量变的形式，革命的形式和进化的形式交替进行，相互渗透。毛主席是统帅，你们是作战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革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社会主义革命是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即使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大差别消灭了或减少了，也一定会出现新差别，新矛盾。

我们不是单纯从思想着手，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生产力主要因素是人。发挥人的因素，就要改变私有观念，提高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事，一句话可以说完，做起来要经过反复，经过无数次斗争、批判、表扬，在整个思想战线上进行大的斗争，才可能把人改变过来。斗争通过许多低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两条战线：物质战线，精神战线。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就是搞这条精神战线的。我们从两条战线向前进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前进的总火车头，我们象火车一样在两条轨道上前进。不要象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那就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我们一切工作要由毛泽东思想领先。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一精神战线抓住不放，要把这场战斗顽强打到底。脑袋里打了胜仗，物质上才能打胜仗。这绝非小事，是大事。

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要起更大的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了，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了。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

我是打仗的，对毛泽东思想拼命想学、想用，但是了解很少。毛主席说：破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新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是能改造人的思想的马列主义。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的行动。七亿人口的大

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张三一篇，李四一篇，不能统一全国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没有把列宁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大错特错，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要把人民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统一起来，变成全党的指南，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封建统治用孔孟之道来巩固了它的政权，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要用代表我们无产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新思想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驳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他们的思想体系。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我们全党，一定要把主席思想传播开去。在部队里百试百效，那里学的好，就出好人好事，战斗力加强，工作就搞得好。那里学得不好，工作就减弱。现在要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财富，大破旧的思想，打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威风，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树立毛泽东思想。在部队中这样做，大见效果。拿到全国人民中，也大见效果。过去中宣部不让印毛选、语录，他们是大错特错的。陆定一、周扬还有下面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想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他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反共分子，名义上是革命者，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不少人不能正确地评价主席思想，认识主席思想的伟大。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我们不以此为武器，为动力，不重视，就要犯大错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视这一点，就是很大的错误，如同苏联人民丢掉列宁主义一样。

要使我国强盛起来，繁荣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最根本的因素，这样干下去，干几年，就会有很大效果，如果几十年，一百年，就可以站到世界最前列。如果搞的不好，就可能后退，从先进变成落后。我们要很自觉很有意识地掌握这个武器。现在鱼目和珍珠混在一起，必须把鱼目和珍珠分开，把珍珠给工农群众，免得人民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鱼目混珠，让他们自己挑选有困难，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毛泽东思想就是珍珠，大家要负起这个责任。

总之，一句话，大破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进行的精神建设。这种精神建设，如同总的火车头带动火车在轨道上前进。

要贯彻执行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阶级碰到阶级，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每一步的前进，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国内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近四年，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是：

-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
-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国际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

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全会认为，近几年来，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公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等等，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全会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会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全会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会完全同意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关于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采取的行动。

全会强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抗美斗争的问题上，执行假支持、真出卖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全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

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的党，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坚信，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一定不辜负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对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鼓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今天开会议论一下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我先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化革命问题。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

准备搞三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

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在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了主观，丰富了思想。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即先搞主观世界，动员人的积极性。主席说的思想领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认真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苏联没有搞，所以革命失败了。我们就要搞。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这方面的工作一削弱，资产阶级复辟和颠覆的可能性就要增加。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路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们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棉、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其实粮、棉、油、钢铁、煤炭，怎么才能上去呢？只有把人的思想面貌改变过来。每行每业，如果都由我们想办法，不行，我们没有那么多办法。我们应该抓政治思想革命，从思想解决问题。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群众起来了，就会有办法了，亿万人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办法都会有了。这是我们党领导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根本办法。

毛主席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了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思想传播给群众，就能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的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发挥群众的智慧，把人的精神面貌改变过来。

思想革命不是一个大运动能彻底解决的，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具体的做法是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字字句句都要按中央的决定去做。

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十六条是我们具体的行动纲领。

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战略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的干部问题。

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报告过主席，主席也同意，叫我来向大家讲讲。

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

一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入学得好，挨打击。因为那时候管思想的最高机关中宣部，陆定一那一帮人，上边还有根子，反对学毛泽东思想，他们污蔑学毛著像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污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著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都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

一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或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

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

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他们。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是掌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还是掌握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反革命颠覆的考验。只有组织机构革命化了，我们的党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留的留，特别是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不然，在组织上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组织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方针路线就不能贯彻。毛主席常讲：出主意，用干部。一个是办什么事，一个是什么人去办，这两个缺一不可。“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用干部就是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用可靠的人，要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人多得很，为什么不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很多，青年学生中就有很多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团中央的许多人，不如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为什么不用青少年？当然，有些人也可以照顾使用，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最重要的物质，人是一切物质中发展起来的最高物质，人是能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是同大自然斗争的力量，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力量。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历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而人，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没有人，没有劳动人民，就谈不上社会生产力和它的发展。所以，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阶级的人。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有阶级性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发挥人的积极性，是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重视，也不可能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们要极度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产力，依靠群众去创造历史。否则，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单纯业务观点，不发动群众，只自己单干，那就是少数人创造历史，不是群众创造历史。把我们整个机构来个革命化，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力量，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才能轰轰烈烈地、干劲十足地做好各项工作。政权如果不掌握在革命分子手里，就会蜕化变质。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犯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像就照像，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二、研究资料

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 何云峰 •

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

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

少的重要文献。自从它公布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

就 20 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不当之处，还望学界

同仁批评指正。

一. 研究概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对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致江青的信的研究

几乎是一片空白，之后，对毛泽东这封信的研究逐渐起步。20 世纪 90 年代

，研究开始出现深入的趋势。但总的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研究毛泽东

致江青信的专题论文太少，只有几篇，主要包括

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

胡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

许全兴的《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

辛鸣的《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

刘林元的《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等。

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研究论著或者相关论文中，其中，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陈东林的《毛泽东诗史》、

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

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

等论著都对毛泽东的这封信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毛泽东信中的某些论断、提法进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

尽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学者们对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视却是共同的。

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动乱的年代》中，极为看重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他声称：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破”的意见；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1）。

胡哲峰、孙彦编著的《毛泽东谈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纵论 20 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左、中、右各派，又预言他去世后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同寻常的信。这封信连同《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个重要材料（2）。

许全兴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文辞优美，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3）。

同时，学者们都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研究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说：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内容深奥离奇，表述曲折晦涩，评价众说纷纭的，恐怕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给江青的那封信的了（4）。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知难而上，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着，取得了若干重要研究成果。

二.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学者们的叙述大同小异。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此信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在毛泽东身边长期负责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 1996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

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张耀祠还提到，信中的一些话，如“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毛泽东在滴水洞时都说过。对于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话，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自在，说：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5）这些材料，都印证了学者们的上述看法。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6）。张耀祠的回忆录否定了这一说法。张耀祠说：“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5）在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构思于滴水洞，写于武汉。

关于这封信写出以后的一些情况，各方就说法不一了。

党史专家谭宗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一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写到毛泽东这封信的时候曾在注释中引用了谭宗级的这段记述。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的这段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 1972 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作了如下记述：“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9）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

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4）。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周恩来在 1972 年 5 月 21 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主席写这封信是在 1966 年 7 月 8 日，在武汉写的。我是 7 月 11 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4）

综合各方说法，有几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当时看到过毛泽东这封信的人有徐业夫、王任重、周恩来和江青，林彪即使没看到信，至少也知道信的内容；第二，信的原件已经销毁，抄件还在，保存在中央档案中，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第三，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后。1972 年批林整风时，这封信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信的内容才广为人知。1998 年出版的《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全文收录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并在文末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

近年来，有学者据此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有可能是事后之伪作，即使信真的存在，这封信在林彪垮台后公布时也已经被作了大量修改，搞得面目全非了。这种质疑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根据上面众多的权威记述，所谓“修改件”，当是指“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毛泽东仅仅是改了一些抄错的字而已，并非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所作的内容上的大变动。应当肯定地说，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伪造的问题。

三. 关于信的动机和主旨

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动机和主旨，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们争论最多的热点话题。江青及其党羽在批林整风时宣称毛泽东写这封信旨在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认为毛泽东在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刚出笼时就已看出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4）。

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金春明教授指出，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某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他把林彪视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

刘林元教授指出，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在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是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

在否定了“揭露林彪说”之后，学者们对信的主旨展开了争鸣。在讨论中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为“自我解剖说”，提出者是金春明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信的侧重点似在于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毛泽东通过“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自喻，中心似为了说明，自己虽然不是天生的英雄，有时也不那么自信，常感到“盛名难副”，但既然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已经使自己坐在“大王”的位置上，自己反复解剖自己，认为还是有虎气的，而且“是为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对于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自认还是能够胜任的（4）。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备忘录说”。提出者是许全兴教授。他认为，这封信的中心点是林彪，整个信是围绕着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感到不安而铺陈下去的，毛泽东的自我解剖也是为了说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表明他对林彪不完全放心；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了“备忘录”的作用（3）。

第三种观点可称为“阶级斗争说”。辛鸣在《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封信的着眼点是而且只能是四个字：“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许正是这封信最好的注解。毛泽东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嗅出了火药味，这便是“牛鬼蛇神”和“右派”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反对与破坏。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牛鬼蛇神”和“右派”正是新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宏图大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可以说是一颗蕴涵着超高能量的思想

原子弹。它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主旨，并成为进行“一次全国性演习”的导火索（10）。

第四种观点可称为“不安心态说”。刘林元教授在《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一文中认为，自我解剖和评论林彪讲话都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对“文革”中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不安，担心“文革”失败，并由对“文革”前途的忧虑，继而引申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忧虑。总之，这封信表露了毛泽东在“决战”前的不安心绪。这方面虽然着墨不是很多，但却很浓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后半部分，作者强调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这种强调，衬托了作者对前进道路曲折反复的忧虑和不安。阅完全信，人们会感受到作者当时被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情笼罩着（6）。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给江青写信这种特殊方式来阐述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研究者也各有推测。

胡为雄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向江青论述自己发明的社会一乱一治的政治哲学，遥控着江青这个被自己扶起来的‘文革’旗手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去全面点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务”（11）。

许全兴则反驳说，倘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此信应当秘而不宣，不能示人，不但不能公之于世，也不能给周恩来、王任重看，显然，这与事实相悖。许全兴认为，毛泽东此举有着复杂的隐衷：他一方面决心让林彪取代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存有疑虑，有点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这种微妙心理，毛泽东在当时无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让后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开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过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曲折、隐晦、含蓄地表达他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这样做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一是为了万一以后林彪真的成了修正主义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后人的某种谅解（毛泽东 1972 年公开此信就含有此

目的，表明他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的）；二是为了让江青了解他在林彪问题上的全面看法，希望江青对林彪要留心一点（3）。

刘林元也认为，毛泽东给江青写此信确有告诫江青之意，但他与许全兴的理解又有不同。刘认为，毛泽东在信中做自我解剖，用意在于告诫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江青当时已开始显露峥嵘了，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表毛泽东控制这个组织，即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重任在肩，毛泽东自然要嘱托。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向来要求严格，不准骄躁，他深知江青的弱点，因此在信中讲了戒骄戒躁的话，既合情理，也属必要（6）。

张耀祠的看法综合了以上意见。他认为，毛泽东信中涉及的问题当时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5）。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1）。

金春明也认为，毛泽东本来应当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那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商谈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和设想，他却选择了向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倾吐心声，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当时毛泽东已经同他的老战友们有了隔阂。当然同时也包含着要江青去担负某些特殊使命之意（4）。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谈论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把自己的内心隐秘讲给江青听，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对于林彪则存有疑虑。而

陈东林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并不是因为他把江青视为真正的知音，也不是如后人解释的那样，看出了林彪的反骨。他实在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12）。

综上所述，搞清楚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是正确理解此信的动机和主旨的关键。学者们围绕信的动机和主旨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对于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如何，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四. 对信中若干论断的不同理解

（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对于毛泽东信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论断，最为重视的当属王年一。他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1957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因而愈来愈对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左”倾主张的中央第一线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

线，也是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觉得惟有诉诸群众，惟有大乱一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方针。因此，王年一强调，如果对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缺乏应有的注意，就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13）。

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也被视为毛泽东这封信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结论”。该书指出，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决心，花极大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毛泽东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总之，在毛泽东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9）。

金春明、席宣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打倒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不能采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而只能直接依靠广大群众，造

成天下大乱的形势，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无所遁逃，方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所以他赞美乱，鼓吹乱，支持乱。

如何评价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文革”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的渊薮；

但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毛泽东向来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青年时代就注重研究历史，认为“治乱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乱“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同时，不怕乱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性格和气质。

许全兴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14）。

张宇燕博士也肯定了“由大乱达到大治”的历史合理性，但其观点比较独特。他是受到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启发，从打碎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的。他举法国为例：法国今天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

国，并且长期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这个国家，几乎是连续不断地经历种种“动荡”：从 1789 年的大革命开始，接着便是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再就是 1848 年的欧洲革命，随后是普法战争，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哪一次也没少了法国，1968 年全球性的学生运动法国也属于闹得最欢的国家之一。社会动荡频繁居然同经济成长健康并驾齐驱，何故？在动荡环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发挥”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15）。

有学者还分析了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落空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敌我关系，本来是乱敌人，结果却乱了自己；二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利用，当他们的夺权阴谋没有实现的时候，是决不会结束这个大乱的（16）。

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相关的还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运动的思想。

对此，学术界总体上持否定意见。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这纯粹是一种武断、臆断，是阶级斗争的循环论和宿命论，是一种历史的唯心论（17）。

胡为雄则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是空穴来风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与“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是毛泽东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而提炼出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20 世纪 50 年代的高岗和彭德怀“自己跳出来”，时间间隔约为七八年；而 1959 年至 1966 年，恰又间隔了七年，这次“为自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牛鬼蛇神”刘少奇等人又要“跳出来”了。毛泽东正是由此为发动“文革”找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11）。

张宇燕博士提出了一种另类的观点，他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视为“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

为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15）

（二）“虎气”与“猴气”

对于毛泽东信中“虎气”与“猴气”的自喻，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

有人认为

这一比喻充满了辩证法，反映了毛泽东多元化的个性：“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单纯，又复杂；既猛烈，又温和；既进取，又腼腆；极为敏感而又迟钝，谦恭而又高傲；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又决不坐失分秒……”（18）

许纪霖则从毛泽东文化性格的角度指出：“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19）

陈晋赞同许纪霖的理解，同时又作了重要的补充，认为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退自如，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而虎气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刚健有为、努力进取的人格精神（20）。陈晋还联系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钟爱美猴王孙悟空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作出大胆推断：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很有可能从孙悟空的性

格中受到了某种启发。因此，不妨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20）。

金春明认为，要准确把握毛泽东自我解剖的真正涵义，必须结合“文革”发动之初的具体形势。他指出，虎气可以解释为“大无畏的造反者的勇气，敢于独树一帜的反潮流精神，藐视一切敌人的革命家胆略，机断专行的领导者魄力”；猴气则与上述精神相反（4）。

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春明所理解的“虎气”内涵中的大部分内容，在陈晋那里都属于“猴气”的范畴。两人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分歧，原因在于陈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的性质，是借用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来描述毛泽东的复杂个性；而金春明则充分注意到“虎气”与“猴气”在信中的语境，即毛泽东强调自己不是折中主义，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种语境决定了毛泽东的侧重点在于虎气。在“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强调虎气，可见虎气是指造反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尽管孙悟空是猴，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却是虎气而非猴气。

胡为雄对虎气与猴气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他认为应当把虎气理解为马列主义

思想，把猴气理解为非马列主义思想，即遗存的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因素。对毛泽东所说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胡为雄作了独特的文化阐释，认为其深层涵义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文化环境中无法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虎，而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东方“猴子”通过学习马列，逐步锻炼成长为领导中共革命的“大王”。毛泽东说自己身上“虎气”为主，是指马列主义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猴气”为次，是指自己还有未曾尽脱的非马列主义思想，所以还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和改造。毛泽东此说意图在于表明他并非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谈不上超过马克思，林彪的一些提法显然是过头了，使他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11）。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是承接上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而来，虎气是指自信的一面，猴气是指不自信的一面。

许全兴教授在遵从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三层涵义：从直接的字面上看是为了表明自谦，说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时也告诫江青多想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深层涵义是为了剖析自己的气质与个性，坦露自己性格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更深一层的涵义则在于简洁含蓄地表达他对政治形势和接班人的看法：既对搞“文革”、打倒右派有信心，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不很自信，担心死后右派当权；既决心选定林彪做接班人，又对自己的抉择不很自信，对林彪存有疑虑，以致准备将来被人打得粉碎（3）。

（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泽东信中颇费思量、值得反复玩味的一句话。这个鬼究竟指的是谁？

金春明认为，这个鬼也就是信中讲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横扫的对象。虽然当时还没有具体点明，但不久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与鬼相对的是朋友，在这界限分明的营垒中，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因此，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4）。

金春明的理解也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因此长时间内少有异议。

不过，也有人虽然同意金春明对打鬼的解释，但认为毛泽东对林彪这样的朋友并不是绝对放心的，他充当钟馗的心理要复杂得多。

许全兴具体分析了毛泽东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理：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毛泽东认为，他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中国有句古话，“拍马是为了骑马”，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作打鬼的工具而有所警惕吗（3）？

还有人对“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中的“鬼”作了不同的解释。

张聿温认为，这里的鬼是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毛泽东怀疑林彪是为了打倒“彭罗陆杨”，才借助他这个“钟馗”，林彪是在利用他（21）。

刘志男则推测这里的“鬼”是特指邓小平的。刘志男根据有关材料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初，曾经考虑让邓小平配合林彪共同接班，并没有打算将邓小平和刘少奇一齐搞掉。但林彪和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他认为邓小平是他接班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心要整倒邓小平。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林彪、罗荣桓发生意见分歧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并且批转了“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提出批评。所以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除指责“彭、罗、

陆、杨”之外，还点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毛泽东感觉到林彪别有所指，因此在此处用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猜”字。虽然林彪并未点名攻击邓小平，毛泽东也只是在“猜”，但毛泽东却明显地怀疑“他们”与自己存在着“本意”上的不同：毛想倒刘保邓，他们却既要倒刘，也要倒邓。毛泽东怀疑他们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图，企图给邓小平加上“反对学习毛主席

著作”的罪名从而彻底打倒邓，也就是说，是想把毛泽东当钟馗借以打倒他们想要打倒的“鬼”。

”——邓小平。总之，毛泽东的一个“猜”字，道出了对林彪等人为了打“他们”的“鬼”的做法的疑惑（22）。

许全兴、张聿温和刘志男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毛泽东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不纯，有可能只是把自己当作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对“打鬼”作了正面的解释，指出：“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9）。据此推断，书作者显然是认为，毛泽东肯定林彪搞个人崇拜的本意、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打鬼”，只是觉得林彪搞个人崇拜搞得有些过头了，有些提法提得太高了，“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令他“总感觉不安”。虽然毛泽东从心底里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但为了“打鬼”，他不能公开给左派朋友们泼冷水，因此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尽管他也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是“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但毛泽东下了决心：为了“打鬼”，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可见，在《毛泽东传（1949—1

976）》的作者看来，毛泽东并不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他只是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一些过头提法有些不满意罢了。

（四）“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他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

那么，他究竟是对林彪的哪些提法感觉不安？为什么感觉不安？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

王年一认为，毛泽东的不安既是针对林彪的“吹”，也是针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1）。

李君如认为，毛泽东既对林彪专讲“政变”经不甚满意，也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提法甚感不安（2 3）。

刘林元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毛泽东对于林彪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9月22日的中央“

指示”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没有根据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有批评之意，没有根据说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令毛泽东不安。

有的同志认为林彪讲政变讲得毛骨悚然，令毛泽东“不安”，因而就发挥开了：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政变经，会不会怀疑这个专讲政变经的人以后也会对他搞政变呢？刘林元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当时决不会怀疑林彪会对他搞政变，否则，后面毛泽东、林彪亲密合作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6）。

刘林元指出，真正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讲话中关于他个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过分的提法。毛泽东在信中说到：“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当时是需要搞个人崇拜的，但他对林彪的过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别是要把这个讲话发到全党，毛当然要深深地思虑一番。思考的结果，尽管他“不安”，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只好违心地接受。参照9月22日的“指示”，根据后来毛泽东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肯定，为毛泽东所“不安”的是：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夸张说法；还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

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些违背科学的过分夸张的提法，在 1966 年 9 月 22 日中央指示中并没有提出来加以肯定（这跟评价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提法不一样），毛泽东后来几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这些“提法”的反对意见〔6〕。

刘志男则认为，毛泽东的“不安”还包含着他本人没有明言的内容，即怀疑林彪的讲话话中有话，别有所指，不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进一步指向他仍打算重用的邓小平。毛泽东担心批发“我的朋友的讲话”可能会使邓小平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为了除去“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虽然他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说“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里的“重大问题”，在刘志男看来，不仅包括鼓吹个人崇拜，似乎还应当包括批判邓小平〔22〕。

当然，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不安”还是对林彪讲话中一些过誉之词的不安。刘林元的分析或许代表了多数研究者的看法。

对于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研究和解读，是学者们公认的高难度课题。研究时既要注意认真研读文本，又要注意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抛开文本语境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脱离历史背景作牵强附会的理解，都是不足取的。到目前为止，围绕此信的研究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但真正有深度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还是寥寥无几，人们期待着这样的成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2) 胡哲峰, 孙彦《毛泽东谈毛泽东》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
- (3) 许全兴《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0, (3): 85—90。
- (4) 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 党校论坛, 1989, (5): 54—58。
- (5) 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 (6) 刘林元《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 南京社会科学, 1995, (11): 24—31。
- (7) 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 教学参考: 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下辑),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 1980。
- (8) 张志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若干史实辨证。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8, (4): 112—124。
- (9) 逄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 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03。

(10) 辛鸣《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 毛泽东思想论坛, 1994, (2):
79—81。

(11) 胡为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 党校论坛, 19
89,

(8): 45—49。

(12) 陈东林《毛泽东诗史》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13) 王年一《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党史通讯, 1987, (4):
18—29。

(14)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
995。

(15) 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 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公
共论丛
, 1995, (1): 175—179。

(16) 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17)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 教学参考: 全国党校系
统中共
党史学术讨论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上辑),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
1
980。

(18) 陈登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19) 许纪霖《毛泽东: 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 书林, 1988, (9):

2

— 6 。

(20) 陈晋《毛泽东之魂》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21) 张聿温《“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与裂痕》 党史博览, 2

004

, (4): 4—8。

(22) 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 (6): 22—38。

(23)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4年第4期

2007年3月12日初稿

2011年7月20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旬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中发〔66〕416号

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得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学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二、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

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

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

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以上规定，希各单位切实遵照执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中发〔66〕410号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公 安 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正确道路，纠正了错误路线，扭转了错误方向。

党中央这个决定发表后，人心振奋，斗志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高潮开始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种种阻力。毛泽东同志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会采取种种办法，种种手段，抵抗十六条，压制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

广大革命学生起来闹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是件大好事。他们贴大字报，是好事，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好事。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他们敢于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本单位党委和上级党委的错误，正好可以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至于那些死顽固，死不悔改的，垮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

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广大工农兵群众，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拥护毛泽东思想。党中央决定的十六条，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的体现。一切违背十六条的，危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都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革命学生在斗争中，也可能有一些缺点。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相信他们会在斗争当中，自己能够分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相信他们在斗争中会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敢于革命，善于革命。

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学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地团结起来，擦亮眼睛，千万不要受坏人的挑拨，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人民警察，由于所处情况不同，岗位不同，他们可能不了解那里学校的情况，不明真相，就不要去参加学校的辩论。

我们伟大的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一直是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同样的，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认为，必须信任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才能完全解放自己。正是因为这样，党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不论有什么曲折，有什么风波，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终归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如暴风骤雨，如迅雷急电，从无产阶级的革命首都北京，向四面八方，向全国各地，蓬勃勃勃地开展起来。

令人非常高兴的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说得出，做得到。

大字报，是小将们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进攻的有力武器。他们的大字报，如利剑，如匕首，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刺伤了敌人的痛处，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因此，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争相传抄，不胫而走。

但是，有一些人对这样好的大字报，却多方挑剔，摇头不已。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残酷无情地打击这批革命的青少年，把他们的革命大字报诬蔑为反革命的大字报。

本刊特选几篇大字报，公之于世，让广大人民群众来作鉴定。

我们认为，这些大字报，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魄力大，气势壮，读了令人心胸开阔，精神振奋。真是：笔力雄健，横扫千军威尚猛；文锋犀利，“刺破青天锷未残”。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壮丽诗篇。这是革命青少年的天才和智慧的结晶。这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革命的小将吼声震天：要革命，要造反！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文化革命的暴风雨，来势迅猛，如泰山盖顶，如怒涛汹涌，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在小将们的革命进攻面前，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爷们，感到大难临头，混不下去了，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强加种种罪名，对他们进行迫害。

“你们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封为党的化身，“老子就是党”，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革命的青少年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反革命”的帽子吗？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支持着他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鼓舞着他们。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擦亮了眼睛，开通了思想，豁然大悟：必须革命，必须造反，必须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他们欢呼：让革命的烈火烧得更猛更旺吧！

“你们捣乱”。讲对了。革命的青少年们就是要捣你们的乱。他们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捣得乱乱的，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统治捣得乱乱的。如果不这样干，那还叫什么革命？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旧章法、旧规矩、旧秩序统统打乱，就是要用革命的铁扫帚，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马厩一扫而光。

“糟透了”。革命的闯将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向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无情的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威风扫地，体面丢光。于是，他们大喊：“糟透了”。奇怪得很，有些同志也跟着乱嚷一气。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看一看，你就会觉得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打倒阎王殿，革命的红小鬼解放了。他们抡起金箍棒，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打得落花流水，打得天翻地覆。这是千百万群众的盛大节日，这是空前未有的奇观。

“你们狂妄，你们幼稚”。被人们讥为“乳臭未干”的年青人，藐视一切资产阶级“权威”，敢于向他们挑战，敢于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革命的青少年，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旧世界，彻底改造旧世界，彻底破除几千年来层层堆积起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把整个旧世界翻过来，按照毛泽东思想创立一个新世界。这是狂妄么？不，这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大志。

从古以来，敢于闹革命，敢于创新的，大都是“幼稚”的年青人。他们一抓到真理，就藐视老古董，向老古董宣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但是胜利的总是那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青年。

一百多年以前，两位年青人——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共产党宣言》，他们宣布要向旧世界开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让反动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他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时，就主编《湘江评论》，发表许多彪炳显赫的革命雄文，提出打倒旧世界，让贵族、资本家在我们面前发抖的彻底革命的战斗口号。

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那些代表旧势力的人物，看起来似乎是庞然大物，不可一世。但是，他们逃脱不了革命辩证法的惩罚。那些代表新生力量的小人物，不管在斗争中将遭受怎样的艰难曲折，遇到多么大的阻力，他们最后必将战胜旧势力。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如春风化雨。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少年们，是多么的可爱呵！

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有坚定明确的政治方向，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闹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他们“敢”字当头，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下，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他们是敢于“冲决罗网”的“狂飙”式人物，而不是小心翼翼，生怕革命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政治庸人。他们是敢于在革命大风暴中搏击长空的雄鹰，而不是蜷缩在屋檐底下的家雀。

他们爱憎分明，对人民一颗红心，无限热爱；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无比仇恨。

他们充满着革命的朝气，敢于披荆斩棘，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力量的唯一源泉，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们的斗争经验还不多，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浪中，他们一定会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把自己锻炼成为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和希望。有了这样坚强的革命后代，我们伟大的祖国，就能千秋万代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是像慈父般地关怀着革命的青少年。毛主席对革命青少年寄予无限的希望。毛主席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革命的青少年们，一定会牢记毛主席的这个亲切教导和殷切希望，更加努力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革命的青少年一定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迅速成长。

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未来属于革命的青少年。

向革命的青少年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中发〔66〕429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同意总政治部这个电报所提的三条意见。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的党委。

中 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

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学院、总参、总后、国防科委政治部：

根据内蒙古军区报告，最近有些学生群众到部队来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街，进行斗争；有的地方要求部队交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学生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这方面的问题，要很好处理：

一、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二、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

三、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总 政 治 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国防科委，要求曾经在该院担任工作组长的赵如璋作检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的身体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由，不肯交出。学生开始在科委门前静坐。一直到九月二十日左右，中央文革小组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学生的要求。九月二十一日，陈伯达接见了学生。国防科委领导仍然不肯交人。九月二十二日晚，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学生也撤回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北航“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引用的毛泽

东的两句话。此前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学习，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我们革命的青少年，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从来都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他们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中学校的革命青少年，以解放军为榜样，建立了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组织。我们热烈地支持他们这种革命行动。

广大革命青少年，决心在这个斗争中，进一步向解放军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革命的青少年，应当像解放军那样，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人人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人人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当前，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述，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当作一切行动的指针，坚决贯彻执行。凡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反对。

革命的青少年，要向解放军的英雄模范学习。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风暴中，解放军涌现了董存瑞、黄继光、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刘英俊等大批英雄模范。他们都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断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改造思想，树立起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要像这些英雄模范那样，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长起来。王杰说：“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刘英俊说：“决心按毛主席讲的去办，把自己培养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应当成为我们青少年共同的努力目标。

革命的青少年，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在工作中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员。红卫兵和一切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坚决执

行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保卫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

革命的青少年，要像解放军那样，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要讲究斗争方法，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在斗争中，要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十六条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用文斗的方法，就能够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只有文斗，才能彻底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彻底把它们斗垮，斗倒，斗臭。只有文斗，才能通过这些反面教员，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

革命的青少年，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我们要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做得对的，要坚持做下去，不要动摇。如果有些事情由于缺乏经验，做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完全对，那就要及时改正。这样做，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革命的青少年，应当像解放军那样，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我们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泽东思想，改造一辈子思想。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任何大革命运动，都必然是群众的革命运动。没有群众起来，敢说，敢干，敢闯，就不可能有什么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也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卷进这个运动，就不可能大破，也不可能大立。

照一般的历史情况看，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先导。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可能不触及到政治，不可能不触及到经济，实际上已经触及了。

文化大革命不能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能只是批判几个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事情，不能只是批判几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规律，完全冲破了这些框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文化革命开始取得胜利的重大新标志。

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我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恰进一步地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预见。

现在正在进行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以红卫兵为急先锋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而且必将大大改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我们现在还存在着的许多不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旧社会残迹，旧习惯势力；必将大大革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扫除资产阶级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的一些威风，进一步清算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当然, 红卫兵随时需要在斗争中学习, 学会文斗, 学会思考。

最根本的问题是, 大家需要在斗争中进一步学会毛泽东思想, 掌握毛泽东思想, 运用毛泽东思想, 把自己锻炼成为顶天立地、掌握革命本领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好战士。

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的批示

中央同意公安部党组的四条意见, 请各级党委向学生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并督促公安机关执行。此件可发到县, 传达到学校、工厂、公社党委和全体公安人员。

中共 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附:

公安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

主席、中央:

最近一些公安机关报告, 有些学生和群众到监狱和劳改工厂、农场、斗争惩罚犯人, 相当多的地方打了民警和派出所, 其中一些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受过各种处罚的人, 乘机进攻派出所, 不少地方, 学生和群众要公安机关公布机密, 也有个别公安人员向群众公布了机密材料。

广大革命学生和群众起来闹革命, 勇敢地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是件大好事。公安机关一定要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了使公安机关能够正常地执行职务, 做好文化大革命的保卫工作, 有利于充分放手发动群众, 把这场伟大的革命搞深搞透, 对以上问题, 需要作妥善的处理。

一、有些学生和群众要到公安机关斗黑帮分子, 要向他们说明, 这种革命热情我们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公安机关的革命派, 一定能把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垮、斗臭。我们欢迎群众对公安机关和公安干部送大字报、提意见, 但不要进

入公安机关，不要打派出所，以免被五类分子和坏人利用，对保卫文化大革命不利。

二、公安机关的机密，是国家机密的一部分，不能向群众公布。

三、革命群众要求到监狱、看守所、劳改队去斗争、惩罚犯人，这种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不使犯人乘机逃跑、暴乱，欢迎群众向我们提供材料，由专政机关惩罚犯人。

四、公安机关确有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需要改革。凡地方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凡涉及全国，需要统筹研究，或一时难办到的，各级公安机关、公安人员可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要互相发呼吁，特别是不要向群众发呼吁。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级党委。

中共公安部党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

用文斗，不用武斗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这些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

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用脑筋，要用文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我们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文斗，就是要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种文斗的办法，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最害怕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人民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文斗，是因为我们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因为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同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怕人民的敌人捣乱。如果敌人胆敢动武，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律，那就坚决依法制裁。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斗争目标是共同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同呼吸，共命运，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互相鼓舞，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信赖，争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明确指出：“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中央这个规定，明确了斗争的方向，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加强了工农群众之间、革命学生之间、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之间、以及一切革命同志之间的团结，使文化革命的浪潮在全国范围内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但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却直接违背了中央这个规定。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挑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闹对立。他们这样做，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我们工人农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形式，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

我们工农群众，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党，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是决不允许的，一定要坚决起来斗争的。但是，我们也决不允许任何人

利用我们工人农民对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播弄是非，制造我们同革命学生的对立，让他们从中钻空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我们工人农民，应当热烈欢迎他们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是要革命的，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他们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一定能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我们决不要只看到他们一些缺点，就轻信某些人的挑动，去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在斗争中，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问题是有了矛盾怎样来解决。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以十六条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经过适当的途径，协商解决。决不要一有不同意见，就去干预对方，造成对立。

我们工人农民一定要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同志要团结起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模范地贯彻执行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胜利前进。＊＊＊＊＊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

(中发 [66] 468 号)

林彪、周恩来、康生、伯达、江青等同志：

此件请看一看，西安、青岛、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兵整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外地这样，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挑动工农整学生，除了人民大学曾调动六百农民入城来保卫郭影秋，其它都没有，依北京经验告地方办。

毛泽东九月七日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症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

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 二、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 向工农兵学习》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指出：“……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同样，如果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离开了工农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以及由他们的子弟组成的人民解放军，从来就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他们同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他们推翻的。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人民的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这个被人瞧不起的落后的东方大国，也正是依靠广大工农兵群

众勤劳的双手，依靠他们的勇敢和智慧，改变旧面貌，创造新奇迹，使我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变成一个屹立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

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向工农兵致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所肩负的任务，是光荣而繁重的。他们响应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他们既要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本单位的革命运动搞好；又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

进一步搞好工农业生产，是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进，密切联系的。越是在文化革命高涨的形势下，越是在阶级斗争深入的情况下，就越要按照党中央十六条的要求，抓革命，促生产。

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农业秋收丰产年景已定，完全可以实现工农业的大增产。这就要求，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所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经贸易、服务行业，以及其它各行各业的同志们，都应当付出紧张艰苦的劳动，力争超额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工人、贫农下中农是完全能够把本单位的革命运动搞好的。同时要指出，工人，公社社员，机关企业干部不能像大、中学校的学生那样放假，也不要到外地去进行革命串连。广大工农群众，应当把从文化革命和“四清”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用到生产劳动中去，促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很多工矿企业，很多农村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做的，做得非常好，很有成绩。在那里，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生产热情空前高涨。那里的出勤率增加了，产量增长了，质量提高了。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一切农村人民公社，都应该努力向这样的先进单位看齐。

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们，应当坚守战斗岗位，大力突出政治，发扬三八作风，加强政治、军事训练。要保持高度警惕，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迎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

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党结成了血肉联系，同毛主席心连心。他们最热爱毛主席，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样做。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必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处处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为建设和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他还号召“全国人民要向解放军学习”。

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于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红卫兵和革命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以工农兵为榜样，虚心向工农兵学习。学习他们的勤劳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学习他们朴实和谦逊的作风，学习他们对敌人狠、对自己人和的革命品质，学习他们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革命风格。

我们一定要在文化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成为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

现在，全国革命人民争夺红卫兵。

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震动了全世界。

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们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我们的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毛泽东思想。他们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高的职责。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坚决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一切牛鬼蛇神，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之后，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首都检阅了红卫兵。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直接鼓舞下，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革命组织一起，掀起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

红卫兵干了大量的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红卫兵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革命的青少年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希望的象征。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后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是要赞美新事物，歌颂新事物，为新生事物的发展，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我们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地赞扬他们的冲天革命精神，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他们的革命行动。

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真是好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

红卫兵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他们要求自己，不仅敢于斗争，敢于革命，而且善于斗争，善于革命。他们正在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地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十六条。

革命小将们受到了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赞扬之后，他们提出戒骄戒躁，要虚心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工农群众学习。他们下定决心，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决心在革命熔炉里，把自己锻炼成雷锋、王杰、麦贤得、刘英俊那样的革命战士，培养成为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对待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革命的阶级认为好得很，而反革命的阶级则认为糟得很。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拍手欢呼，向红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则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红卫兵。他们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攻击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违反人类尊严”，是“破坏社会传统”，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的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少年狂热分子”。革命的敌人总是极端仇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并诬之为“狂热”。敌人所恨的，正是我们所爱的。革命小将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并且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冲天的革命精神。

“违反人类尊严”。红卫兵无情的鞭挞、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文化，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于是他们大叫：“违反人类的尊严”。老实说，我们不仅要违反你们的“尊严”，而且要把你们打倒在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破坏社会传统”吗？你们说对了。红卫兵就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革命的小将们，对于封建主义的余毒，资本主义的病菌，修正主义的祸根，

就是要扫清，灭绝，斩断。只有彻底破坏了剥削阶级的种种旧传统，才能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挖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埋在我国的定时炸弹。因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感到震惊、恼火和愤恨，这是很自然的。

反动阶级的代言人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无可奈何地供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对他们来说“是死亡的象征，而不是生命的象征”。不错，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确确实实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最后灭亡的象征。而我们的红卫兵，则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欣欣向荣，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东方升起的红太阳，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上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股红色的巨流，冲垮着形形色色剥削阶级的旧事物、旧思想、旧习惯势力，教育着亿万人民群众，推动着我们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广大的革命青少年，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如果违背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大战役中，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要集中力量打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顽固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打垮了资产阶级右派，就能够有力地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伟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总是要通过党内那些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最主要的最危险的敌人。在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政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运用窃夺得的权力，包庇资产阶级右派，镇压无产阶级左派。如果不把他们打倒，他们就会像赫鲁晓夫一样，一旦有机可乘，起来篡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我们整个国家变颜色。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抽象的超阶级的当权派是没有的。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应该支持，支持他们，正是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打倒他们，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包括十六条中第八条说的一、二类干部。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那第四类。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

林彪同志指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牛鬼蛇神，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候能够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好人。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他们就显出了自己的原形，他们就会陷入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群众的包围之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群众之间是会有不同意见的，有时甚至会有激烈的争论。对于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包括对于群众中的错误意见，都应该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恰当地进行解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说：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上述决定，我们每个革命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地贯彻执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场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势必涉及到人们灵魂深处的各种问题。这次运动，对我们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破四旧，立四新，革命的风气迅速地普及全国，这是大好的事情，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都应该自觉地在革命的烈火中锻炼自己，按着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群众的批评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就整个运动来说，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一般矛盾的关系。人们的一般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觉改正，但不应作为运动的重点。解决这类问题，也要采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说服教育，防止简单粗暴，不要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对待一般作风的缺点和错误问题，不要把这类问题当做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以免干扰我们的斗争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这一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而且是会有曲折和反复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只要我们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随时总结经验，就一定能使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一步一步地胜利前进。

（编者按：八月下旬以来，一些中央的负责人如陶铸等，在对群众讲话时，不加分析地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口号，造成了混乱。一些地方出现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情况。

既然社会上存在这些问题，当然应当警惕。但是林彪的讲话，《红旗》杂志的社论锋芒决不是针对学生的，决不是针对群众的。它是针对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是针对着社会上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能够用“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也决不能用这个口号来拒绝革命学生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来保护自己。

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对于一些革命学生提出“炮打××省委”、“炮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火烧××地委”或者“火烧××党委”的口号，说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说提出这些口号是反革命。这样利用林彪九月十五日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在这个重点中，斗争中的主要对象，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有同学问，这个当权派譬如说从本学校说还比较容易知道这个当权派是好是坏，总有一个亲身经验可评的，而对于走到社会上来，曾领导这个学校的市委或某些机关他不清楚，要从学校的斗批改走到社会的斗批改，他不清楚怎么办呢？所以昨天夜里有同学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当权派呀？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轰他几下子看一看，我的回答就是这样，确实从学校进入到社会不是那么简单，从本学校走到另外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些党政机关总是不同于本学校。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用毛主席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来解决问题，你总要有个最初步的调查研究，毛主席说了，作任何事情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嘛！毛主席又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果你对那个领导机关完全不清楚，别个学校或别个机关你去乱轰几炮，这个不能解决问题，革命串联是把那个学校的同学的革命精神鼓舞起来，革命劲头发扬起来，然后他跟我们站在一起，来进行批判错误的东西。如批判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事情，错误的言行里发现当权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个别错误或严重错误，或是敌我矛盾的坚持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必须在调查研究当中，在初期的批判斗争中，才能逐步的深入，这是一方面，就是同学们方面应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能简单一哄而起，骂几句，打几下就能得出结论来，另一方面被批判，被斗争，如果他确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拿我们同学的语言，不是黑帮，你不要怕嘛！青年来批评你几句，戴个高帽子有什么不得了啊！（鼓掌），我得声明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鼓掌），要从两方面去看，同学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调查研究，从斗争、批判中逐步深入，被批判被斗争的领导方面应该有勇气走向群众，敢于在群众面前，在斗争风浪中接受批评，洗澡，错的承认就是错的，不是错的，也不要承认是错的，得有这样的勇气，在我们革命的队伍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这样双方就会把问题解决得好了嘛。一方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轰他几炮再说，大闹大骂大打，另一方面怕得了不得，吓破了胆，总是不见，这样感情就越搞越激动起来，那就势必闹翻，这个并不好，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样子。并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不可以批评，不可以斗争，也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斗争起来就一定不会发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可能发现，反过来以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斗争的结果也不完全吗，也不要紧，这种反复是长期会存在的。只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精神，革命干劲跟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那就会搞得好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炮轰司令部”问题：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

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各种干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伟大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的工农兵，向全国的革命师生，向革命的红卫兵和其他战斗的青少年组织，向全国各民族的革命人民，向全国的革命干部，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在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曲折道路。国内外的敌人曾经是强大的，但终于被中国人民推翻了，赶跑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纸老虎，都被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戳穿了。

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我们相信，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会按照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像中国人民一样，夺取最后的胜利。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来庆祝这个伟大节日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要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出现修正主义的统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在我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帝国主

义和反动派，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

现在，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资产阶级威风扫地。我们正在前进。我们已经奠定了伟大胜利的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想革命化，因而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的推动力。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农业可以获得又一个好收成。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攀登新的高峰。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繁荣，这样生动活泼。我们的国防从来没有这样强大。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同志们，朋友们：当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几年来世界的大动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他们的寿命不长了。美帝国主义力图从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中寻找出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当前斗争的焦点在越南。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只要全世界人民擦亮眼睛，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二十年前，毛主席就说过，全世界人民要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来打败美帝国主义。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世界的前途，一定是这样。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同各国革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把全国变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要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盛，更加兴旺。这是我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中国各族人民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今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中，庆祝伟大的国庆节。这是一个最不平凡的节日，这是一个革命精神空前高昂的节日，这是一个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节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七年，是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凯歌猛进的十七年。十七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我们的成就，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使得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胆颤心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使整个世界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十七年的伟大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把我们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

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我们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始终，贯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

十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抓住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生动活泼，就欣欣向荣。凡是离开了这个纲的地方和部门，就出现歪风邪气，就迷失方向，就受到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告诉我们：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

这次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并且势必触及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由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用各种办法腐蚀共产党的干部，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教导我们，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是向全体共产党员敲起的警钟。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也有一小撮人却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们身上。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者是在他们包庇下进行的。所以，只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粉碎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的公布，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主席还说：在共产党内发生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一时被他们蒙蔽和欺骗的群众，一定会觉悟起来，同他们划清界限，反对他们。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号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从人民解放军发展到全国人民群众，取得了伟大的效果。这个运动，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飞跃，必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十七年来，毛泽东同志总是紧紧把握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统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统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胜利前进。

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其他的叛徒、工贼，天天疯狂地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咒骂呢？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这场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无法阻挡的。它必然会唤醒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唤醒广大的革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他们统治的宝座是岌岌可危的。

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他们都将被自己的掘墓人革命群众所埋葬。

不管敌人怎样叫骂和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都将沿着自己的道路，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昂首阔步地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从胜利推向胜利。*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修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从语法上来说，更加合乎规范。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周恩来曾提出疑问。经过毛泽东说明修改的过程以后，周恩来说：我明白了。后来一些人借此宣扬；周恩来反对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说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周恩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引用了周恩来十月三、九、二十二、三十一日的一些话作为证据。他引证的那些话，完全是断章取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二、阶级斗争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条道路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中心，是主要矛盾。有时紧张，有时松弛，这个时期是个高潮，因为要挖他们的根子喽！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所以我们首先要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就是领导核心，必然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甚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对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定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对抗。这是一个主要问题。这就要反映到党内来，就得首先解决党内问题，把这问题解决了，就能解决其他问题。一部分革命的同学，一部分教职工首先关心自己学校内的领导问题，然后就要关心一个地方、一个区的。你们放假闹革命时间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可能的。当然要回答一下，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反抗和敌视的。公开的反动势力、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已经注意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斗争和改造还

有没有改造好的分子，这是一类。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毛主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这些敌人要十分警惕，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造反，对他们就要给予揭露、反击。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党内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这样的人，经过党内斗争，经过群众斗争，他们改了，仍然可以站在人民队伍当中。我们希望犯这些错误的同志改正。毛主席提出惩前毖后，而不是象左倾教条主义那样，对另一部分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这样，对没有犯错误的人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更不对了，错上加错。

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的领导，是发展了列宁的建党思想，毛主席的建党精神，就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精神。所以他能领导我们大党、大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愿意改正我们就欢迎。不管工作组、党委，他们愿意改正错误我们欢迎。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当然，那种坚持错误不改的人，结果一定会使他的行动为敌人所利用，就给党外敌人混水摸鱼机会。就会把革命阵营搞乱，就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混在一起。另外有些人只要不作非法活动、地下活动就不能说他就是反党集团。彭真就超过了。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公开做的，讲的革命话比我们讲的还好，但背后搞的是另一套。文化革命以来，开始逐步的暴露。彭真也不是一下暴露的，也是逐步暴露的。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一个长期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这和犯一般方向、路线错误的人要分开，坚持不改也会走到那一边去。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是欢迎的。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敌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是很强烈的。

一个时期的错误，只要不反党、无反党活动，就是非对抗性的，如果坚持不改就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要区别，又要联系起来看，怎样才能认识这个问题呢？最近连续几篇文章，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红旗杂志及人民日报社论都讲如何在实践中辨别；尽管如此，你们还要在实践中鉴别。

三、炮打司令部的问题

司令部就是指党的领导机关。一个地区、省、市性的领导机关，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设想怎么可能哪！如果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都是黑帮，那怎么解释？总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全国的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十六条指出的当前运动的重点。但不能说统统是黑帮，这也不可能。要一分为二。有是有的，但是，是少数。黑帮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集团，搞阴谋活动，象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彭真、刘仁在全国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性质，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种可能大。因为派工作组来代替原来的党政领导，凡是派工作组都是由上而下，凡是派了工作组的地方，几乎都是执行同样的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新的领导还想维持原来秩序，但是很不理解要依靠学生、依靠革命的教职工的道理。他们应该帮助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而不是压制学生。而我们的工作组，习惯于过去的领导方式，特殊情况也许可以，但一般的，还是维持原来秩序。同学当然不满意，要求撤换和改组工作组。而工作组看不顺眼，说他们是反党，说成是右派，说成是反革命，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因而造成学生的对立，社会上一部分职工参加了多数学生斗少数民族学生，工人农民也参加了。就象十六条里所指出的，新的领导，工作组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规律性。对毛主席提出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很不理解。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些领导，很不理解放手发动群众的道理。这些错误，应该由上边去的负责任，当然，每个工作组都有自己的责任，因为不都一样，但主要责任应该由上边去的来负责任，因为派工作组是上边决定的。那时在北京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决定派工作组。工作组有的好些，有的差些，因为没有利用革命的学生，特别是红卫兵的新东西，破旧、立新。上级负的责任更大。因此现在提出炮打司令部。

摆在你们面前的，不可能是清清楚楚的，哪个是黑帮，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图索骥这是不可能的。并不反对同学对学校里自己的领导提出要求，甚至怀疑，我们也不反对，对当地领导有错误的要批评，要斗争。当然也包括工作组在内。经过斗争才能看清犯错误的程度，你们要辩论是可以的，示威斗争是许可的，我们劝各级领导，不要怕，如果怕，就会惹出更多的事来。如果不怕，同学们还是讲道理的。据我们知道某个省委就是这样，犯了错误，来了几万群众要开大会，拥上来，要省委书记出来，有戴高帽的可能，他们请示了中央，

我们就对他说，出去嘛！不要怕。结果出去一讲，问题就解决了，同学们没有给戴高帽子。以后一开会叫他们来，他们就来。这就合作的比较好嘛！不是错误的不要承认嘛！就是被误戴了高帽子也会取下来嘛！不要让同学们去争论，学生斗学生，或群众斗学生。但是，我们同时可以说，我们不可能预先告诉你们哪个是黑帮，哪个不是，哪个领导是不是犯错误。八百五十一个学校，不可能都说出来，哪个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黑帮，要通过你们自己斗争，通过自己实践。我无法告诉你们是不是路线错误，没法讲是不是黑帮，要你们判断，不能由我们回答，要由运动证明。省市领导，中央各部都是如此。所以，你们炮打时免不了要打空炮，有许多事情，我们也不能回答。要靠群众揭，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们揭出来了，我们也很感谢！这些都要通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证明。怎么能每炮都打得准呢？你们事先要经过调查。总要有个互相调查、互相串联，来判断工作组是对的，还是错的。不要到机关、工厂、公社去串联。去访问一下，也还是许可的。一般的公开的报告、文件，就可以看出领导的情况。查档案是第二步，你们提出来，由上级党委告诉你们，非常严重才查档案。比如：彭真，你们揭露的只是一个侧面，真正的档案，要由中央专案委员会调查。陆定一也是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调查，你们可以做。比如，你们可以回家调查他的事情。比如：陆定一、周扬、蒋南翔、李昌……社会调查很有好处，这种调查更详细，更丰富。档案牵涉许多机密问题。所以要经过上级党委研究批准。要防止打空炮，就要调查讨论，这样就比较接近实际。被批判的领导，要敢于接受批评，对的就接受，不能模棱两可。群众问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黑帮，你要回答。有人说：“你去调查好了！”连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革命的你都不敢回答，这样群众就更怀疑了。这个你要回答。你的行动作的对不对，要由群众来鉴定。有错误就承认，是黑帮就低头。不是黑帮就不要低头，低头你就犯错误了，中国有句俗话：“低头认罪”。有罪才低头。炮击司令部，无一个规章框框。哪个可以打，哪个不可以打，你们要去调查材料，我不能定框框。具体地问我，哪一个省委是不是黑帮，据我所知，不是，是革命的。因为我们不和他们在一起，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也许我回答错了，你们揭发出来，我们谢谢你们。比如彭真也是慢慢暴露的，我们以前对认识不够，自从去年姚文元的文章和同志们的揭发后，才逐步认识他。人的认识有早有的很晚，有敏感不敏感，时常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为什么对一些省市委没有

改组？我们还要看一阶段，在未看清以前，我们还要找他作事。同时还可以把犯错误的人暴露在群众面前，又可以把问题搞清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解决。

（编者按：这就是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理解和解释。在中央，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人确实是有的，那就是陶铸。十月三日《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一发表，他就不赞成，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中发〔66〕515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附件：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来说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

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全国在京革命师生誓师大会通电

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红小兵，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十六条，捍卫毛泽东思想，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

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人民，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不两立。不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就不能正确进行斗批改，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切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同志们，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神圣天职。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不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不罢休！不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收兵！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多大的“声望”，如果他顽固不化，死不回头，我们都要跟他拚个你死我活，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踢开一切绊脚石，扫除一切害人虫。革命的红卫兵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迎着阻力走，迎着阻力行，迎着阻力向前进，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闯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毛泽东思想普照的红彤彤的世界！

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向同学们问好，向同学们致敬！现在请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向大家讲话。

江青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问你们好，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中央在十月五日批转了军委关于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现在请张春桥同志向同志们宣读，好不好？（群众高呼：好！）

张春桥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我来念一下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我先念军委和总政给中央报告，然后再念批示。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周总理讲话：

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

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所以我们应该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不仅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决议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所做的检查提纲

同志们，同学们：

近日来，广大的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市委在前一段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市委对于同学们这种革命的英雄行为，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市委的批评，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前一个时候虽然作过检查，但认识是不深刻的，检查是不彻底的。我们决心在广大师生的帮助下，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市委在六、七月间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市委在前一段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迷信工作组，包办代替，总是想让群众按我们的旧章法、老框框、过时的经验行事，不了解革命群众思想、感情。没有同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支持革命群众大造反、大民主；没有鼓励革命群众大揭露、大批判。对于革命群众的新创造以及他们创立的新秩序、新形势，感到突然，不知所措。开始领导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后来，逐渐从落在群众的后面，发展到站在群众的对面。当群众要冲破我们的框框，要赶走工作组，不按我们的错误轨道行走时，我们就轻信了一

些错误的反映，认为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于是就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最后在若干单位就发展到围剿革命派，打击革命群众，这样就铸成大错。

在犯错误的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个讲话，没支持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而是怕乱，怕上街，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造谣污蔑，强调内外有别，强调组织纪律等等。这样就实际上给群众泼了冷水。而且很长时间，不觉悟，曾经还辩解说：我没有反对聂元梓同志等的大字报，只讲了个贴的地方问题，是技术问题。其实这明明是个政治问题，哪是一个技术问题呢？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大大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象火山爆发似的起来了。新市委就在这个时候，奉命成立，本来应该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而这时我们却害怕群众这种革命造反的“乱”，以为一个单位没有党委领导就不好办，就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市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地进入各个单位。他们在六月三、四日接连召开的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上，不适当过早地讲了一些政策界限，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当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有许多工作组在市委的错误指导下，硬要广大群众按我们所规定一套清规戒律来行事，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这就在事实上站在群众对立的立场上去了。后来虽然发现有些工作组害怕群众、压制民主，以至镇压群众的情况，发现了五十几所大专学校中，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总觉得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并且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要拥护工作组，而没有觉悟到派工作组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当时提出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不能理解。这就看出我们还没有理解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我们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六月中、下旬，本来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们却信

了错误的反映。例如听信了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报告和其他校的有关报告，对广大学生的革命行动，作了极错误的分析，这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我们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话中，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过高估计了阶级敌人的力量，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强调运动出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右派学生在争夺领导权，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总起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予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因而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结果就在许多大专院校又引起了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师生受到迫害，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就倾倒了敌我关系，实质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对受迫害的革命师生，应该按照中央规定，给以彻底平反，销毁有关档案，并且我在这里向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各个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例如在六月间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当聂元梓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根据形势，提出了要站在运动的前面，一切为了前线，缩短工作会议的时间。但又认为已经接上了火，停不下来，结果开的很长，领导没有深入前线，削弱了对于运动的了解指导，而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本来这个会是要彻底揭发批判前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却想先整司令部，实际上前市委这个司令部已经烂掉了，要解决它的问题，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关起门来开会是不行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前市委的委员，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当一些单位的群众起来要斗争他们的时候，而他们还在市委开会，这就必然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当要散会时，我们还笼统地希望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能站起来领导。我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还再三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还可以易地革命”等等。这个会虽然有某些收获，但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极其错误的会议。

在六月下旬，还错误地让北大、工交系统等几个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错误的经验。另外，还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错误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同时，市委还过早地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实际证明这种主张是根本错误的。特别是象北大这样的反动堡垒，党团组织必须认真、彻底地改造，简单恢复，只能导致旧领导、旧思想、旧统治的复辟。《北京日报》在六月三十日还错误地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

我们还错误地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正当群众起来进行大革命、进行革命造反的时候，这样讲，只能是起压制群众的作用，必然导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应该说在任何时候，新市委做错了事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

总之，在我六月二十三日的极其错误的讲话以后，不仅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的事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而还自以为得意。

市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这样严重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大的政治斗争中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敢字当头，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而我们却是怕字当头，怕出乱子，怕打乱旧秩序，怕炮轰司令部。总之，一句话，怕革命，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所以对旧习惯势力、旧习惯观点、旧思想、旧框框，仍然具有深厚的保守感情，舍不得与之决裂。这就必然和革命群众敢闯、敢干、敢斗、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尖锐的对立，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就毫不奇怪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而我们却只相信自己，不相信

群众，做官当老爷，以领导者自居，高高在上，不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习惯于包办代替，不放手发动群众，以致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运动中，发展到同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压制群众。这就说明，在我们灵魂深处，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我们在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对改造自己的灵魂缺乏思想准备。

当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之后，文化大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生龙活虎地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不仅创造了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而且创造了红卫兵等富有非常战斗性的革命组织。红色的革命小将们敢闯、敢干、敢革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从学校的斗批改，进到社会上的斗批改创建了伟大的功勋。北京的革命师生到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联，外地的革命师生也上北京来大交流经验，首都充满崭新的革命的景象。

十六条公布以后，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纲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根据林彪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的精神，市委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

正当十六条决定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掀起新的高潮的时候，市委曾经错误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七万人参加的斗几个小流氓的大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放，仍然是怕字当头，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惊慌失措，生怕出“乱”，结果适得其反。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新市委在清算自己的错误，并且帮助工作组去批判错误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的很不得力，很不彻底。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批评的对，批评的好。工作组撤退时，有一部分工作组没有检查或者没有很好检查，因而工作组虽然已经撤了，但其影响并未肃清，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师生没有给他们彻底平反。而对于过去受错误影响的部分同学，也没有下狠大的力量，采取适当的

方式，帮助他们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消除两派同学之间伯原则分歧。

同学们，同学们：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仍在继续，这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我代表市委，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欢迎全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继续向市委前一段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彻底的批判，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肃清。市委一定要坚定的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党内外、国内外震动很大，对资产阶级威风，对反革命的威风，是杀了他们的威风。

现在要干部思想搞通，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要讲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辉煌战果。要讲清不要怕，怕什么呢？把各种各样的怕，都摆一摆，怕这怕那，究竟有多少“怕”，摆得清清楚楚。“怕”有两重性，有好有坏，好处更多。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怕”有必然性，对群众的伟大作用要认识清楚。过去推翻了统治阶级推翻了什么？争取了什么？在政治上夺取了政权，在经济上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思想上改变了私有制观念。

我们二十多年的战争，全国解放也有十七年了。政治，我们夺取了政权，经济有公私合营、土地改革、合作化；思想有社会主义思想，革命也干了一些，如三反，五反，反右，但是干得不够得很。现在要大干一场。我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是要用较长的时间，要经过大大小小的战役。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个大战役，或几年之后还会来大战役，既有暴风骤雨的大战役，又有和风细雨的小

战役，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斗争，才能把几千年培养出来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打掉，如果不把私有制观念打掉，就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无产阶级政治变色。因此，推翻统治阶级的私有制的思想越彻底，无产阶级政权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人的思想更加革命化，生产力更能解放。要巩固公有制就要推翻各种私有制的观念。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破除私有观念，如果不破除会使社会主义停滞、甚至倒退变色，成为修正主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文革以来，十一中全会前后，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相同的是我们党内战胜了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相同的是我们各级党的领导很多直到现在还处于被动状态，还是防御的，限制的，抵触的，对于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不通，大多数人长期以来没有提到自觉性来革自己的命，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因此，要向干部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数干部怕革命怕群众，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怕群众怕革命是一样的。一小部分人反对文化大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具体表现不同，用各种各样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要作深入的思想工作，打通思想，使文化革命搞得更深入，更广泛。有的干部表现坏，被革命的群众运动洪流冲掉了，这是好事情。有的干部或是中间状态的，想革命的，那我们要向他打通思想，为着帮助他，使他敢于到群众中间去的，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为着挽救干部提高干部，锻炼干部，要作政治思想工作，把大方向，大道理讲通，至于还有一些具体政策和办法好解决。总之，要干部树立信心，解除顾虑。

(一) 当说到对红卫兵所起的伟大作用时，林彪同志说现在对红卫兵外国清，中国反而不清。群众清，领导不清。

(二) 当说到红卫兵战果辉煌时，林彪同志说：形势好不好，要加分析，拿事实来说明问题，各地都要搞红卫兵造反成绩展览会来教育我们干部，把怕字丢掉。

(三) 当说到当前的运动根本问题是什么时，林彪同志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怕字多，敢字少，要拿事实来教育大家，从解放以来，公安工作最好一次走群众路线的是肃反工作，要以理服人，又要以事实服人。现在有多少“怕”，通通列出来，搞一个分析，得出结论，“怕”得到什么坏处，“敢”得到什么好处，充其量会怎样，都要讲得清清楚楚。

(周说：乱要乱出一个道理来。)

(四) 当谈到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时，林彪同志说：群众看问题是非常辩证的，群众斗群众是有自发的，有非法斗的，即使是非法的，也有统一组织的，有领导支持的。当问题看不清主流时，就要摆事实讲道理，有些人口头上不怕，实际上是怕，真正的思想上就是怕。群众运动起来了，领导人要挺身而出，这比躲躲闪闪要好。

(五) 当谈到成分问题时，林彪同志说：红五类也有不红的，黑五类也有不黑的，不要唯成份论，还是分左、中、右好。

(六) 当谈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林彪同志说：成绩可以算出好些来：

- (1) 学毛著已成高潮，
- (2) 揪出一些反党分子，
- (3) 搞出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搞出一批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
- (4) 严格地打击了四类分子，
- (5) 冲击了当官作老爷的威风，
- (6) 已开始体现到大民主的味道，
- (7) 在党内，社会上是一次大清理，
- (8) 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 (9) 会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也一定会促进生产、促进工作，
- (10) 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接班人，这些小将是敢闯、敢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但是，现在有些人就看不到上述主流，只看到那些个别不好的现象到处乱传，甚至扩大化，这是贬低文化大革命，而实际上不拥护，有的还对抗，其原因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不愿意革自己的命，所以唱反调。现在要扩大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为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干部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是不好的，所以要从思想上搞通，下大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讲话
听了韩光的检查和张本宣读《科委机关少数派同志联合揭发韩光同志的错误》第一部分以后，插话如下。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过去他总是推到聂荣臻身上，实际上韩光对聂荣臻同志也是阳奉阴违的。六、七月份李富春、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同志都批评他，他总是找借口，为自己辩护。

八月十三日，我与聂荣臻同志商量好，科委的文化大革命由我来管，韩光对我也是阳奉阴违，除了张本同志刚才讲的那事之外，还有几件事证明韩光是有组织搞的。我本想把群众引导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辩明是非，结果倒发现韩光方面有组织地搞示威，当我的面闹事，对付张本同志。在计量院的大会上，举起预先准备好大字牌子，不让张本上台。我预先打过招呼，韩光、张本同志不上主席台，只要计量院革委会协商的主席台。开始有支持张本同志，递条子要张本上台，大会主席没有念条子，最后靠近韩光党委那方面的主席（人），递了一个可疑的条子，交给大会执行主席念，要张本上台。接着下面就举起了不要张本上台的大牌子，轰闹。我和我同去的人看得很清楚，是有组织的。

还有一件事，双方准备在辩论会上的发言稿，请把清样送给我，我说过清样印出来后允许修改。韩光那一方面负责人个人发言稿是十九日送来的。这时已经学了十月五日军委总政的指示了，伯达、江青同志讲过话了，这些难道他们都不知道？代表你韩光方面的三个发言，太不象样子，完全不对头。完全不对头！韩光完全是有组织的阳奉阴违。我同意刚才韩光交给我的计量院的要求，今晚将全部人事档案封存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月，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马纯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中央这次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很及时，对进一步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重大作用。

在全总机关、在全总党组和司局长以上干部中，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据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司局长以上干部有严重错误的共十九人，占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以上这些人，有四人是在全机关大会斗争批判，七人是在部门斗争批判，还有八人是在大字报上批判，尚未斗争。其中性质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赞成三和一少搞修正主义的六人；或多或少直接参加前北京市委、前中宣部、前中直党委反党活动的四人；包庇地主、反革命的三人；一贯对党不满，反对大庆，反对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一人，人数虽少，但他在全总有思想基础。机关革命群众除了对上述人员进行斗争批判外，同时也对全总过去和现在领导上的一些缺点与错误，如工会消亡，业务改革，彭真、杨尚昆对全总的影响，全总领导人的一些生活作风，以及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不够大胆放手等等，进行了揭发与批判，在一时期内，特别是从团中央改组时起到炮打司令部，群众向整个党组或党组一些成员开炮，我们都表示欢迎。九月三日刘宁一同志贴出了大字报，进行了自我检查，同时揭露了全总机关两条道路的斗争，群众逐步认清全总领导内有一小撮反毛泽东思想和听从苏修一套，勾结彭真、杨尚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石油工业部与大庆送来大字报，揪出了王维昕之后，机关阶级斗争的形势更进一步明朗化，大家集中力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还揭露一些地主、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个八百亩地的大地主，一个狂言要杀害主席的反革命分子。

以上这些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我们机关的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过去不大参加政治运动的，这次参加运动了。青年干部在这场斗争中打先锋。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不断地克服旧思想、旧作风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克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压制民主或故意扭转运动方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上述那些坏人坏事，事先我们虽知道一些，但知道的远没有揭露出来的这样严重，过去我们和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过斗争，但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这些坏人坏事的揭露，对于教育我们自己，教育群众，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全总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之所以有这一些收获，主要由于：

(1) 我们从运动开始即抓学习主席著作，每到一阶段，召开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讲用会，涌现出一些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凡是运动健康的单位，都是学习主席著作较好的单位。

(2) 富春同志指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高群众觉悟。我们根据富春同志指示，放手让群众去贴大字报，对批评我们的大字报，即令是说过头的，我们也一律表示欢迎。对那些错误的、污蔑我们的、用打油诗讽刺我们的大字报，我们不组织人去反驳；有些干部和群众要反驳，凡被我们知道，我们都进行劝阻，说这些事群众将来是会弄得清楚的。

(3) 牢牢抓住主攻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和牛鬼蛇神。我们是如此，大多数群众也是如此。一个时期，全总党组准备先做工作上的全面检查，群众不同意，说放到斗了牛鬼蛇神之后再安排，这说明群众对党组的看法，以及对党组一些成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4) 组织左派队伍，建立文革领导小组、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选举经过了三上三下，群众很认真，被选举出来的人，都有代表性。我们也说服群众，选上了反对我们的人。我们支持把机关红卫兵组织起来，他们在斗争中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同时组织了接待组，做好来访和送大字报的群众工作。

(5) 掌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政策斗争了反大庆的王维昕之后，机关整个形势转变，提高了群众认识，明辨了大是大非。一些不明真相受到王维昕蒙蔽的同志纷纷检讨，我们发觉后，告诉他们用不着检讨，并召开他们继续对党组提意见，写大字报，为了使这些同志进一步解除顾虑，于是又树立样板，宣布与王维昕混在了一伙的王敬贤与王维昕区别对待，那些受蒙蔽对党组不满，提了一些意见的同志逐渐安定下来，与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那些右派分子在群众中相当孤立。

我们在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

(1) 对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做法的认识很不够，我们受过去历次运动的框框影响，总想由上到下，由内到外，进行检查，一个时期形成关门整风，群众不满。

(2) 不是敢字当头，有一定的怕乱情绪，放手不够，把北京市委束缚群众运动的报告和北京大学六月十八日简报也在机关作了传达，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

消极影响，我们发觉之后，又再次在全总机关群众中传达了富春同志的意见，纠正过去。

(3)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们也是积极赞同北京市委的要求，派了干部参加市委派的工作组。对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派工作组的精神很不理解。直到十六条公布后，我们才逐步理解，坚决撤回了派到北京市总工会的工作组，撤回时做了检查。其他一些参加产业部门的工作组同志，有的作了检查，有的群众还要揪着，准备进一步检查。

今后如何办？

(1)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彻底清算《刘志丹》小说的案子。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

(2) 在斗批的基础上，系统检查全总领导工作，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大辩论，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系统整改，改革工会的各种条例制度，精简机构，整顿组织，对干部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

(3) 坚决执行林彪同志指示，发动职工群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促进职工思想革命化，工会组织革命化。使工会真正办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讲话（修改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一) 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的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三次接见群众和国庆检阅规模之盛，在国内外罕见。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说明他总是信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向他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自从《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运动更深入、更发展。

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中外，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来得汹涌澎湃，是国际上更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惧，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亦即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却反对，他们搬来国民党的“训政”来对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比做诸葛亮，把运动引向相反的道路上，这是无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强加于群众，不过是为了强行推行路线罢了。工作组撤了，但有些反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仍用各种办法推行他们的路线，如违反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推荐出一个他们理想的“筹委会”、“革委会”……，甚至当各地大量革命师生来京见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来“串联”，企图打击来京革命师生。九月廿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来京师生，我曾有个建议：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最好让给工农兵、普通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但如高干子弟有的的确很好，群众选他，我也不反对，但调查材料说，有人听了我的话，很快就采取对付措施了。他们说：中央有指示，高干子女不做红卫兵领导，于是辞去职务，指定了“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花样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对于这些花样津津乐道。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群众，施行白色恐怖，还自以为得意。

有人仍不听毛主席的话，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是资产阶级本能地在他们头脑、行动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八月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之前，是否全国凡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后，各地对待大串联，多数、少数民族上，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是否要承认都是反动路线？这实质是一个认识、估价问题。我的看法：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一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无所畏惧。十六条也说要“敢”字当头……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仍是怕字当头，有人甚至怕得很厉害，很古怪，而且越发花样多。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头衔。于是怕群众、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方面说，有的想做维持现状派，但有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历史上从怕群众到反对群众，从怕革命到反对革命者不少。希他们不要再蹈复辙。

有些人口头上讲并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了真龙，六神无主。毛主席这故事已讲了四十年，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德国进步诗人海涅，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说：“未来是无产阶级的，我是以忧虑的心情说这些话的。”从海涅看来，一旦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到来，无产阶级掌权，他喜欢的艺术品会毁坏，他的诗也会毁灭。列宁说：“海涅是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还将保留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说：有些同志担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丢乌纱帽，怕失尊严等，于是就同群众，同无产阶级大革命抵触起来了。他们挑动工农、干部斗学生，标榜自己是受到多数拥护，他们主持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组织围攻，却说：“这不过是辩论会。”围攻，辩论其界限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屁股坐到群众一边，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样对待群众上打主意，谁也不能代替回答这个问题。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全国学生大串联，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们在串联的革命熔炉中受锻炼，辩明是非，熟悉群众和斗争，革命的意义深远。把全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串联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可以提倡步行，让他们演习长征。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大连走来的同学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如果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人，难道会成为可靠的接班人吗？

“串联妨碍生产？”今年农业形势大好，工业以高速度上升，粮棉大增产，棉花可达五百万担，粮食二百亿斤，工业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中央提议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乘火车、汽车，一定会有很多学生这样做。毛主席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联，并且大推广。红卫兵刚露苗，而且还在受摧残，谁支持了呢？是我们伟大的统帅，七月卅一日他就写信给清华红卫兵说：“我表示热烈支持。”星火燎原，几个月，毛主席高瞻远瞩，一小批红卫兵发展成为广大队伍，牛鬼蛇神为之丧胆，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缔，至少也纳入我们的轨道。红卫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倡议，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实行，战果必须开展览会，用事实教育群众：“造反有理”。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在看了红卫兵后断论，两个多月的历史，已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组织，大概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和生活。还说：“如果西方世界的苏修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短暂热情，那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的观察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本是我们祖国的事，为什么会使敌人感到危险呢？现在已经不是封锁国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响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进国内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认真而不马虎地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大大促进生产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新飞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力量和对象是有变化的，但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永远适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

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一种“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谬论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学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迷惑一些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唯心的，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立的。毛主席和党是重视阶级成份出身的，同时反对唯成份论，人们都需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实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一个阶级。思想意识是天生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反映那一个阶级。马列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会地位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以至于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前进。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现在学生接受“自来红”、“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不重视阶级出身是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离开阶级分析去看多数和少数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党内，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却恰恰代表广大人民、马列主义，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都失败了，被群众抛弃了。不作阶级分析，处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数，也不支持少数，这是不行的，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指出：我们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按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类，否则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策略叫做孤家寡人主义，单兵独马的策略。无产阶级相反，是要招收广大人马，

好把敌人包围消灭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取得一个个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新人超旧人。

无产阶级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定取代资产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编者按：对于陈伯达关于两条路线的讲话，右派们是坚决反对的。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列了八条罪状：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第二全文引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对两人态度的变化表明错误的发展。第三错误地说明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国民党训政，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了党的领导，这中革命成为内乱的症结所在。第四错误地指出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第五指责怕字派。第六提出了对路线错误要区别对待的观点。分开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实行。第七批判了“血统论”，血统论是阶级斗争“左”倾理论的派生物，是红卫兵运动的副产物。这种批判是用来打击不听话的老红卫兵的，因此是不完全正确的。第八提出了多数少数问题，它的真正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

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

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原文如此）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 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发现了当年的预算有几十亿赤字，因而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大三线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

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的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

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

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

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

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

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

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泽东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答：回去看看再说。

毛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问周恩来会议情况，

周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问李井泉：廖志高怎么样？

李答：开始不大通，后一段较好。

毛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 Q 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说：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说：明天我要出国。

毛说：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

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说：大权旁落。）

毛说：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固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

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

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正当毛主席提出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路线呢？我在十月十六日的报告中提到对错误路线有提出者和执行者，但各有轻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些委屈情绪，为什么错误路线的创造者就不出来承担责任？

即使是错误路线，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但如果指出以后，犯有错误的人还不改正错误，那就有滑到反革命边缘的可能，到那时矛盾就转化。

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历来是一、二个人或一个很小的集团搞起来的，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所犯的路线错误就是少数人搞的。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说穿了，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

在怀仁堂的会议，主要就是他们两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的样板去办。这很明显是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立的，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路线能在全国推行呢？这是因为主席

外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路线，不是站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场上。把一场有世界意义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刘邓搞得冷冷清清。

刘邓的办法，是孙中山训政时期的办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把群众看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诸葛亮。把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企图按照他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进行。这条错误路线是刘邓联盟搞的。对刘的错误大家了解的较多，对邓是不了解的。对他的大字报也不多。其实邓的问题是很明显的，而且也是很严重的。工作组的形式，便于执行错误路线。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后台是少奇，邓的女儿在师大附中，后台是邓，刘的女儿到清华附中，也是有后台的。这里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工作组撤出之后，还是有人在那里操纵的，那里许多消息比我们还快，他们顽固地掌握学校的统治。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他就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办公厅来谈问题，还有二个人押着来的。那时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是王光美，后台是刘少奇，把蒯大富打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是严重违反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对全国都有影响的。

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没有人批评他的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凭他的聪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科全书，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不做调查研究，净乱决定问题。

每次开中央会议，他是以批评为主，对于其他大事无所用心。对群众是不接触的，对群众路线不感兴趣，可是什么事他都爱“拍板”，总理也只好陪绑。要同邓谈问题，真比登天还难。

一九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时，邓搞南三区、北三区分开搞，也没有和主席商量，主席批评说：“哪个皇帝决定的”，以后陶铸打电话，叫北三区的到南三区来开会，而邓当时坐火车游遍全国，不做调查研究，不了了之。对国际反修做了一些工作，但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主持的。在北京起草的二十五条反修的纲领，根本不能用。以后到杭州，主席亲自搞了二十五条。

去年起草二十三条时，主席对刘邓也批评过，主席批评两个独立王国，但没有触动他，这次批评错误路线还没有触动他。

刘邓的思想作风是和毛主席对抗的。邓的面貌如不在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是打着一样的旗帜。

去年九月中央会议，如果党中央有一两个搞修正主义的人，就会把中国变颜色。苏共的教训，只要一变，就会有很多糊里糊涂的人跟着跑的。

六二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六三年提出一、二线的问题，主席退到二线，这是组织上的措施，邓以为大权在手了。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刘、邓利用毛主席休息时把错误路线往下推行。有些地方的同志错误路线很适合于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观未得到改造好，习惯以势压人，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有的是盲目地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现在只要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回头，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就是好的。我们还是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去做先生。我们的年龄也不轻了，不要再跌交子了，跌了的爬起来再走。刘邓的错误路线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但是时间很短，只要主席一点破，他就不能得逞了。我们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党还是兴旺的，现在要求我们大多数同志，当错误路线一指出来，赶紧清醒过来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现在刘邓并没有承认错误，他还想进攻。最近中央组织部的乔明甫同志说，代表中央的是刘、邓、彭，还有的人说邓彭是实力派。

我们有些同志在组织上、工作上，必然要和他们发生关系，清醒过来就好了，我们批判反动的错误路线，要有无产阶级无所畏惧的精神，只要一切为无产阶级事业，党的事业，我们有什么不能丢掉呢？毛主席在七大上说过，只要我们一想起先烈，还有什么不能丢掉呢？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所丢掉的是锁链，是压迫。我们丢掉的是思想上的错误锁链。这对全世界的革命是好事，对个人是好事。现在刘邓还未丢掉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更顽固，现在有人说十年以后再算账，这是郑天翔说的，我们这些人年龄老了，更要看破人世，为世界革命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让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上头是毛主席。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毛主席以很大的魄力，很大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发动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干这件事。一个普通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可能有这样的魄力，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决心。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有极其丰富的斗争

经验，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才敢于发动这样轰轰烈烈的、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些同志也很得力，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执行这个路线的。

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程度有差别，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改得快一些，有的地方改得慢一些。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最近这两天，大家才明确，各地的这种情况是有两个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本地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

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一个方面是经济，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

通过军事战争，推翻一个政权，这是暴力的行动。我们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四年的时间（当然以前还有很多年），就把国民党打垮了，我们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于搞两种所有制的革命，即推翻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时间就短些。可是，另外一个战线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曲折的斗争，这就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这要比取得政权需要的时间更长，比搞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苏联的革命胜利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你看它的资产阶级思想肃清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思想增长了多少？五十年来的一个结果，斯大林死了以后，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产阶级采取新的形式来复辟，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复辟的。除此之外，不单是苏联，还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胜利一、二十年，因为这一方面的斗争没有抓紧，放松了，因此革命停顿、倒退、复辟等等现象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一点的话，我们同样的要发生像苏联那样，南斯拉夫那样的情况。苏联搞了近五十年，今天修正主义上台统治。我们如果不始终一贯地来抓文化革命，也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毛主席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把文化革命当做国家大事，当做政治。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意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

我们平常抓经济建设是抓得紧的，这是好的。但是，对于文化上的破和立，思想领域上的破和立，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象我们毛主席这样抓得紧，这样的重视。有人还觉得是一个额外负担，他觉得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又要搞文化革命？其

实，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要搞经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意义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搞思想建设。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不是小破，也不是中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代表新思想的，代表人民的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共产主义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足以对抗旧思想的，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应该大立这一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多同志没有抓紧的，大破的方面没有很好地抓，大立的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抓。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刘、邓对毛主席思想的传播所采取的态度，这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过去宣传部陆定一所采取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那简直是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国内任务来说，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搞经济建设以外，就是要搞文化建设，文化方面的破和立。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尽管以代表全社会的面貌出现，但是，实际上是代表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劳动人民的思想，在过去那些时代，不能占统治地位。而劳动人民大部分是长期被愚弄的，被欺骗的。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路线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地来开展这个斗争。斯大林搞了几十年，并没有解决这个斗争问题。毛主席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我们来解决，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看来远远不是几十年，恐怕是百把年或者是几百年，才能够肃清旧的思想。当然，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的对立在将来的社会也是存在的，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它总有新旧对立的。这样，就必然还有一个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总有新的要反对旧的，也总有旧的要保存，不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情况，同今天我们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有共同点：新的要战胜旧的。

相信将来还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斗争。所以，这个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进行的。

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旧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最本质的旧，旧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人类社会没有文字的历史，那是很长了，至少是五十万年。地球的形成有六十亿年，这是科学家的一种说法。可是在人类有文化的期间，这几千年，都是阶级社会，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各式各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可以分成十样八样二十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土地也好，工厂也好，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意

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象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我们所要培养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有新道德的人，要培养这种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这样一种人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相反的就是为“私”，只顾个人的名利，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等等，处处是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总之，只记得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

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很多这种为公的人，现在更多了。在毛主席思想进一步深入普及的情况下，这种人就更多了。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来，好人好事出的真多。

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机器和人比较起来，那当然人是重要的。毛主席说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是人。在军事上，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机器只有

通过人才能变成生产力。孤立的机器只是一堆铁。机器是人所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离开了人，就没有机器，有了机器，也不能起作用。机器是一种可能生产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必须通过人同机器的结合，才能够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机器无非是一个人工的器官。同动物不同，我们的手是我们解放的一个“工具”。现在各种各式的机器，实际上是代替我们生产的各种器官，代替我们的手，帮助我们的手，加强我们的手。所以，各种机器统统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器官的。实际上都是加强人的能力，是以人为中心的。忽视人就是忽视了最伟大的生产力，在政治上就是忽视了干革命的力量，闹革命的力量。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械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毛主席很早就提出解放军要革命化和现代化。可见他不只提一个化，他是提的两个化。解放军如此，我们全国也应该如此。就是一方面要搞机械化，一方面要搞革命化，而且应该以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问题是这样摆着，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放在什么地位，有没有必要搞；是额外负担呢，还是我们份内的事？如果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搞它，那我们就是失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我们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毛主席的理论，就在他的著作中间，他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必须学习的基础，还有大量的不上书的毛主席著作，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那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榜样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紧跟上去，应该仿效、应该学习。我们应该把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战线。这样子才是相称的。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

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历史唯物论主要是说明人民群众历史的向前发展，是活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样才有社会革命，才能引起所有制的变化，才能引起生产的变化。所以，群众是各个历史时期进步的动力，最基本的力量，贯彻始终的力量。群众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你提一点，他说一点，许多人想的办法就多，智慧就多，就可以有创造。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

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得很多，伯达同志列举了，我就不重复了。

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就说，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怕出乱子。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

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在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这次我要谢富治同志搞了一个说明红卫兵战果的材料，我还派过人去参观。事实上人家就是准备造我们的反。那些人的确把变天账都准备好了。有人对旧的地契简直是当成命根子，破了的时候，拿个纸补一补，快坏了的时候，拿照像机把它照下来，保存起来。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藏得那么秘密，无非是妄想等到国民党来的时候，帝国主义来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他的，那个地是他的。他们就是妄想变天。剥削阶级虽然打倒了，但这些人还活着，他们头脑里的思想是很反动的，对人民是很仇恨的。我们党内也有想变天的人。彭、罗、陆、杨，这些家伙就是妄想变天的，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革命，我们不去搞他们，他们就要搞我们，进攻我们。现在有不少流言蜚语，反动传单，反动的匿名信，很仇恨革命。这些都是妄想要变天。一旦有时机，那些坏家伙就要出来闹事的，就会起哄，就会造人民的反，有的家伙就会拿“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发号施令来篡夺政权，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事实上在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不搞、不进攻他们，是不行的。我们不给他们打击，他们就要给我们打击。所以说蕴藏着、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出了个赫鲁晓夫，全国就变色了。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点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不信任群众就是大错误。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而是只相信他们自

己，只相信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资产阶级世界观，只相信资产阶级路线。

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吗？保持晚节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就这三条。实质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一条就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第三条是团结大多数，第四条是民主集中制，都是相信群众问题。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高明，其实我们不过是资格老一些。真正讲智慧和品德，未见得赶得上一个雷锋，未见得赶得上一个张思德，未见得赶得上这些同志。所以，许多同志的地位虽然高，资格虽然老，但不等于思想就比人家高，不等于才能比人家高。群众中间的智慧可以说是真正的多。你不要小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很有头脑，能够说出我们几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人说不出来的话。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五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应该怎么看法呢？应该一分为二。可能有些长处，但是一定有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对自己的缺点，要不断地进行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一定要先让自己跳出自己的范围，不要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这是一种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超出这种局限性。我是那一个山头的，我就只顾那一个山头，不顾其他的，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一部分同志只想自己一个小单位，而丢掉了七亿人口和几十亿人口不想，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局限于现在地位高一些，就觉得要特殊。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从这一个局限性里面、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顾大单位，顾全体。毛主席讲：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本身也不能最后解放。所以，一定要努力打破种种局限性。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晚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晚节。我们自己应该很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晚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如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许多人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注意量变会引起质变，把不同的量当成相同的量，把不同的质当成相同的质。比如说水，在零度结冰，零度以上成水，一百度以上变成气。它就是因为温度不同，变成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我们的同志只要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学会党中央的政策，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在工作中间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可以改正过来，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就可以心情舒畅地来做工作，就可以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好地、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编者按：对林彪的讲话，右派们当然也是反对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林彪的讲话，从总体上说，颠倒是非，强词夺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它不过是假群众之名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罢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根本不合事实。人民群众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完全不符合群众路线，倒是中央第一线和全党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倾向符合群众路线。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道理”：把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符合群众路线，反对镇压群众倒是不符合群众路线！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中说：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表明：“五十天”的路线问题，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而“两个月”的路线问题，矛头主要针对当时仍然居于领导地位的各级干部，在中央主要针对周恩来、陶铸同志。

这里说主要是针对周恩来，是无中生有；说主要是针对陶铸，陶铸是自己跳出来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不让批评刘邓路线，不许批评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

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编者按：对毛泽东的讲话，右派们的“心情”是矛盾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毛泽东的讲话更为平缓，突出的是他没有说八届十一全会以来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在思想上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又支持红卫兵对广大干部的冲击。这是矛盾的。

到底是毛泽东的思想是矛盾的，还是右派们的思想是矛盾的呢？！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尽管林彪、陈伯达一伙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却为刘、邓说了一些保护的好话。

他的伎俩也高明：把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对立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晚，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昨天各小组分组开会，研究了具体问题，征求了各省、市的意见，今天向主席、林总请示，经过他们同意，今晚作原则的回答。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目前的形势还处在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还可能持续五年到十年，主席说五年才能取得经验。那还不是初期吗？一浪推一浪，运动是方兴未艾，继长继增，欲罢不能。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每个人都要自己放在运动中去锻炼。修正主义是不可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提高警惕，不提高认识，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这不能仅仅看着是个人威信的问题，要看成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运动中经受锻炼，（举了几个人）经得起考验，就更有威信了。大家要下定决心，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要在群众中进行锻炼。现在我来回答两部分问题。

第一部分：

（一）两个会如何传达的问题：主席提议各省回去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要开公开的会议，不要开秘密会议。你们下车以后有可能被捉去。所以中央要发布公开通知，宣传讨论，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精力开好会。抽出几个同志处理接待工作。昨天，河南大学学生到中南海，预先并没有通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两派斗争，既然他们来了嘛就不能让他们静坐绝食，要让他们吃好，睡好，不然，又要叫刘澜涛、霍士廉笑话我们。这是学习，群众逼着我们学习。红卫兵参加会议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党内高级会议，红卫兵不能参加，实际上一说就通了。

(二) 传达的内容和范围：刘、邓检查要发到县、团级，是否要扩大，须进一步考虑。

林总、伯达的报告，按主席的指示发到支部和红卫兵小队。伯达要求街上的乱传的稿子要收回，不要传出去，一句话说错了，将来就不好变，修改后两本同时发下去，好满足要求。

(三) 林总和伯达的报告要分两段传达。先在三级干部会上传达。吃透了再发给支部和红卫兵小队。这是主席想的，想的很周到。会议结束后再向下发。各省会议时间最好大体一致，免得互相冲击。主席廿五日的讲话，也要向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如何向下传达，以后再通知。

(四) 其它文件（简报、会议材料）大区、各省可带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带一份，如果机关不保险，可以放在军区保存，省市、各部不带回文件了，因为自顾不暇，如谭××（启龙）。

(五) 对文化大革命这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委。（主席意思，天津可恢复直属中央，减轻河北的负担。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属市再加 26 个省）大区、各省、市委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是否能办到，这要看那时的情况，这是设想。富春曾设想，部、司、局长十月半结束，但现在已过了，现在有不少部长被学生扣起来了，比如吕东、荣高棠被扣，开会时还没有回家，仍在学生那里进行争论。主席说春节前初步告一个段落这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也不要以为春节后日子就好过了，要考虑还有反复。昨天，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去时主席说：“你是常指挥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才好。”结果打了胜仗，打得很好。常胜将军也要准备打败仗。总之，要时常准备两手，不要限制在一手。

第二部分：有关政策和措施。十六条订了，还要经常补充，事物是发展的。

现在回答几个问题：

(一) 革命大串联问题。

这是学生的创举。革命的学生冲破了我们多少次的设想。主席不是说了吗？一张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把运动推动起来了。由学校到社会，由北京到各地，全国大学生不到二百万，到北京的已经有五百万了，

这里面有许多重复的，有出去的，有回来的，有转车的。中学生不是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原来打算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现在到二百万。来就来吧，来了也就得住了。原来估计九百万，现在不行了，一百二十万的时候北京就哇哇叫，主席说：来就来嘛，三百万也能住下。

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十一月十八日以后各地师生都要回去，天气冷了，学生病的不少，先让外地的走，北京的学生先不要出去，十天内不要出去，这对照顾外来学生有好处。招待不了，要外来的学生自己做饭、扫地。还有徒步长征进行串联的，要摸出一套办法再实行，不然他走累了，在半途上要上火车，那就更被动。

第二件事，十八日以后来的，已经一百三十万，我们说准备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主席说要增加到二百万到三百万，现在一天二十万，要很好准备，十天以后有可能超过二百万。林总说，要研究如何接见，开始接见在七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现在二百万以上，得多想几个方案。

第三件事，北京准备同一时期接待二百万到三百万，同时南方城市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冬季燕子要往南飞，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不要想十万就不少了，不要一百、二百万就叫，上海准备二百万人不算多。要做好充分准备，要迎接大串联的高潮。

第四件事，还有经过北京转车的，停留的，希望铁道部想一套办法，吕正操问我怎么办？我说，办法要你想，否则咱们换一下，我就去当部长，越接近基层越有办法。

第五件事，拟定一个徒步串联的办法，不能中途上车，那就更被动，特别是在东北已有大连、蚌埠两个例子，要时时宣传，还要订出一个计划，还要设想行军式的全程徒步串联，还要搞军事训练，设联络站，让转业军人去协助，真正做到备战。

第六件事，国家给什么补助？大连来的十五人每人给二十元太多了，大大超过了助学金。我们设想把助学金给他们就可以了，不然贫苦学生就不能串联了，粮食按定量发给自己，超过的国家补助，希望各地把办法搞出来，逐步修改。串联十二月开始到六七年暑假，要搞各种试点。

（二）红卫兵问题。

红卫兵主要还是学校的红卫兵，三十岁以下的革命的青少年组织。学校以外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城市的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一般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的可以保留一个时期。不发展、不串联，看前途如何。全国广大团组织瘫痪，将来是否红卫兵能代替青年团的作用呢？青年团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红卫兵可能加入到青年团里来，改造青年团，因此不能完全否认农村、工厂、企业、机关的红卫兵，可以等等，看看怎么办，要蹲点，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主要是看领导。

思想问题和政治态度问题。思想上，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不管处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总是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这是主席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目前青年还有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成年人里，思想和政治态度是统一的，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要经过多次变动才能固定政治倾向，不能一次就看出左、中、右，不能因他受工作组操纵蒙蔽，就说他是右派，他还是要变的，过早的肯定是不实际的。我与几个方面的红卫兵都谈过话，就是在十六条宣布以后，也还是这么个情况。

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我和在京的外地的红卫兵谈过话，他们是革命青年组织，说他们是保守派，他们也承认，说是右派，保皇派他们就不干。有的同志接近最多的是多数派，如王观澜到农大就被多数派包围起来了，他就不能兼听则明。我到清华，就先找反面的蒯大富同学，两方面都接近，不先入为主，青年的思潮是起伏不定的。不要过早的盖棺定论嘛！这样可以教育多数，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了，今年又印发了，但未能行通。我们习惯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别人指鼻子骂，就坐不住了。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主席说：“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要敢于造反。”林彪同志也说：要巩固政权，中心问题是掌握毛泽东思想，要学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

想，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无敌的了。那样我们的头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丢掉了。要掌握这一点就要很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提高嗅觉，明辨是非。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敢于坚持，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当然也不要骄傲，一骄傲就容易走向反面。青年一起来，我们就受不住了。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给红卫兵讲了民主集中制。他们要关人扣人，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不好？现在就来接班了？主席说，五四运动当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们说，给你们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呀！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解放军是最可靠的专政工具，不能不尊重解放军，有缺点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来，而且解放军还保护你们，解放军还有纪律，不生气，不动手，不还口，打伤了也不开枪。不过你们打解放军那可是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可不好呀。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有意见可以提，人选不当可以改，有错可以承认，但不能代替，不要干预。

三是宣传机关，新华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也是专政工具。红卫兵可以贴大字报，你们的稿子，报纸不能全登，这些不能乱，不能干扰，否则就会影响毛主席的声音。这是可以说通的。讲清利害，说清道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的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这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有利于保卫民主。再就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你们团体的领导可以换，但不能将各级领导宣

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乱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当然宣传以后，有的人也会再犯，但也不要责备他们，要再宣传。干部应该做到这样四条：首先要敢于挺身而出做工作，宣传政策；第二条热情支持革命群众闹革命；第三条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第四条站稳立场，不要什么都怕。

关于徒步串连问题，不仅经过大城市，而且还要经过小城镇、农村，要接触农民、居民，接触社会。要锻炼也必须与工农兵相接触。要有计划、有组织搞，要欢迎他们，组织参加劳动，主动欢迎他们。

（三）四清问题。

社教要划分几条杠子，十六条以前的按社教对待，按廿三条对待。没有镇压群众的就不要检查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以后，就要按十六条办了，按文化大革命处理。例如人民日报党组瘫痪了，派人去改组了，这是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派人去执行了正确路线，要看主流，如果说人民日报是修正主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廿三条也是毛主席制定的，如果说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如四清工作队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当然要检查。工作组要更精悍，依靠贫下中农、工厂的积极分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以四清社教为基础，以文化革命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既是廿三条，又是十六条。当然问题也要看发展。

（四）档案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过关的问题，这是我们搞工作组留下的后果。要以文化革命期间（五月十六日以后）工作组搞的档案为限，不是这个期间，不在此限，要有界限，不能没有界线。什么事都连在一起不好整。有错误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案件，可以专案处理。档案问题的处理，按中央补充通知办事。各级党委和工作组，应按指示主动处理。现在能主动的，就主动解决，被动的也应主动做工作，本级能解决的本级解决，本级不能解决的报上级解决，已被人拿走的，要回来，封存起来。工作组不行了，找部，部不行了，再找口来解决，不行，然后再找我们这里来。省委，大区、各部、各口都要过问，不然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说假话，不能放任自流，要变被动为主动，先要

和群众站在一起，才有说服力。我们打算写一通知，今年处理方针说恰当些，和红卫兵一起处理。

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其他如小学开学问题，有的已开学，没开学的，也要开学。学校一个是革命化的问题，主要是要按主席教育方针办事，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小学校要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可以考虑五年一贯制，三、二制。（现在是四、二制）高年级的小学生要学主席著作，搞轻微体力劳动，也可搞军事训练，要改革教育，要改造教职员队伍，改造也有好的条件，转业兵有几万，大专红卫兵，还有在乡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可以改造教师队伍，这只是一个方向，还不能最近做，问题很多。只能讲这四个问题，抓住大问题，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就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得到锻炼。我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晚年了，要认识到如何保持晚节，过好社会主义关。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六〇年以来写了很多东西，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六二年写了财贸决定，六三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六四年写了工业问题还未写成，六五年写了廿三条，六六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编者按：对周恩来的讲话，右派们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但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却造谣说：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两天后，姚文元等人就影射攻击周恩来。十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指责“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先驱鲁迅》更为显豁指责“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那种所谓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联系到蒯大富等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张春桥主持的座谈会上污蔑周恩来搞调和，这里的恶毒用心就昭然若揭。

即使蒯大富等人在会上的发言是“污蔑周恩来”，王年一又怎么能证明姚文元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是在“影射攻击周恩来”呢？当时，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搞“调和折中”的人，确实是有的，但不是周恩来，而是陶铸那些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广大革命群众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了解。他们的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近来，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认真思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种群众性的批判遍及全国各省市，各部门，各学校。一切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都遭到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判。

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和当前形势大好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

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直接为群众所掌握，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亿万群众这样地关心国家大事，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对于那些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同志，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对于那些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同志改正错误，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对于进一步纠正错误路线，清除它的恶劣影响，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是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去斗争党内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手让群众斗争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

这两条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一条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使文化大革命夭折的路线。

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需要做很多工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小撮人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因为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这些同志从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应当把提出错误路线的（只不过是一两个或几个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区别开来，把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的）和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区别开来，把执行错误路线的轻重程度区别开来，把坚持错误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

一般说来，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类干部、三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但是，必须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

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一个共产主义者，犯了路线错误，应当有勇气承认错误，检讨错误，同群众站在一道批判自己的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在批判错误路线当中，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一贯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起来积极进行批判错误路线的革命群众，革命的青少年，都要注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至于一时受错误路线蒙蔽的某些群众，则不应该责怪他们，也不要给他们扣“保皇派”之类的帽子，而应该耐心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

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虚心地诚恳地全心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像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应当同革命群众站到一起，共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对于群众批判中某些过头的语言和做法，不应当产生任何对抗的情绪，应当看到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当理解他们的心情，应当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犯错误的同志，要去掉脑子里的许多“怕”字。这些“怕”字，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这样，才能纠正错误，变被动为主动，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

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

在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成绩。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有力的打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一批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横扫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整个社会的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有力的促进了生产。

但是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工业、交通、地建、财贸、文教等企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作队或者有些单位的领导人，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这是违反“十六条”规定的，是十分错误的。

为了全面的、彻底的执行“十六条”，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同时必须坚决、认真的给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的革命群众进行平反。为此，市委决定：

(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查，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

(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阶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为给工作组领导提意见而被开除的职工都应恢复工作。

(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整理群众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规定，认真处理。

(四) 凡是因为把革命职工打成“反革命”而停发、扣发了他们的工资的，都应当予以补发。

本通知要向全体革命群众宣读。

中共北京市委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中发〔66〕553号

十月五日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

中央对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补充规定如下：

(一) 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 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 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 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部长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档案问题的讲话

划分一个界限：

处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工作组的档案。文化革命以前的档案，即使有问题，与工作组无关，留待以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反动档案（不属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案的），要组成专案进行处理。

（一）处理档案的方针：

（1）凡错斗的错镇压的，都应该平反。这些人的检查材料都应退回本人，帽子一律摘掉。

（2）凡可以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材料，凡不是影响群众斗群众，不影响大局的都可以退回群众。比如工作组对学生的讲演稿、报告稿、大字报等。

（3）凡是能够引起群众互相斗争的材料一律不交。但应当众销毁，比如左中右排队，排错的别人反映的材料这是对军委文件精神的一个补充和修改。

（二）各级党委应按此指示精神主动处理，承认错误。

如果处于被动的，可按此精神和群众谈判，如果谈不通，可以交上级党委帮助处理，如果仍然不行，就将此材料暂时加封起来，谁也不准动。现在各大学的主动权已经不多了。中学还可能有些主动权。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各省委、各个党委，各区党委都要过问这一问题，帮助处理这些问题，不能放任自流。只有把它解放出来，你们才有可能脱开手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说服他们不去占领你们的办公楼，才能将被动变主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中 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重 要 通 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2007 年 3 月 19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中发〔66〕445号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形势很好。这个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大大促进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为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服务的重要部门。铁路的运输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昼夜不停地协同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路还必须保证安全地运送进行革命串连活动的广大革命师生。同时，铁路员工还要搞好本单位的文化革命，自己动手破四旧立四新。这些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并保证更好地完成运输生产任务，做到革命和运输生产双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一、全国铁路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四清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二、各铁路管理机关，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必须指定必要的人员，组成专门的领导班子，切实负责管好各项运输生产工作。铁路分局和分局以下的单位，可暂缓开展文化革命运动，已经开展的单位，应当讲清道理，说服群众，暂时停止进行，集中全力保证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

三、铁路工厂承担着铁路运输设备的制造和维修任务，是直接保证铁路运输正常地运行的技术基地。因此，铁路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也应当分期分批地进

行。凡是生产任务很重、暂时不宜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说服群众，适当推迟进行。不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或推迟进行的单位，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完成机车、车辆的制造和修理任务，并保证完成冬运防寒的准备工作。铁路工厂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具体部署，由铁路部党委与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商定。

四、铁路系统暂不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认真的组织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同时，还可以有领导地采取适当方式，对上级领导机关提意见、揭发问题，帮助上级领导搞好运动。

五、为了保证铁路运输的安全，更好地完成运输任务，铁路系统各单位要在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进一步整顿车站和列车上的革命秩序。在车站和列车上，不要打人，不要搜查；任何人不要对旅客进行政治审查；不要拦截列车和阻止列车的正常运行，全力保证列车按规定时刻运行。铁路职工和铁路民警，应当坚守岗位，敢于负责，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努力学习十六条，积极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六、本通知下达到铁路各基层单位，并应向职工进行传达。在传达时，要说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铁路企业分期分批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重要意义，并反复说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运行，就是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有力支持，动员铁路广大职工积极参加运动，努力做好工作，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运输生产的双胜利。

本通知可在车站和列车上张贴。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边境地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决定
(中发〔66〕461号)

兹将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电转发你们。这个电报所决定的办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省、自治区的边境地区，如东北三省靠苏联、朝鲜的黑河、富锦、虎林、鸡西、绥芬河、图们、延吉、辑安、临江、丹东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内蒙古靠苏联、蒙古的满洲里、海拉尔、二连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广东的海南岛、深圳、拱北、沙头角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广西的凭祥、东兴、宁明、龙州、水口、靖西等城镇和边防要点；云南的允景洪、潞西、腾冲、西盟、

河口、金平、孟腊等城镇和边防要点；福建的厦门；西藏的阿里、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望各有关省、区严格掌握，并向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多做口头解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

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联。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工人群众、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工业农业的大发展创造新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末期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整风运动，也就是思想革命运动。他所说明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作用，认为必须及时抓住这两个环子，使我们的斗争继续前进。这些，对我们现在，是完全适用的。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生产运动，是相互联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

更省。我们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我们搞社会主义，有精神战线和物质战线。精神战线是改造旧思想，提高社会主义的革命觉悟。物质战线是改造自然，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先进的思想领先。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在这两条战线上前进的火车头。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人的灵魂，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而在精神战线上打了胜仗，从而激发人的自觉能动性，也就保证物质战线上能够打更大的胜仗。

今年，是执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的广大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劳动者，都应当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的革命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我们应当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使工农业生产出现更新的面貌，更新的繁荣。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要紧紧抓住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个环子，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要适当地分工，搞两个适当的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抓生产的产量、品种和质量，特别是要狠抓质量。抓生产的班子，也要参加文化革命，但是，应当以主要精力领导生产。两个班子要有统一的领导，不可各自为政。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事业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如果群众认为适当，又进行得很好，就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工人、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完全能够把本身的革命运动搞好。而且那里的情况不同，生产任务很重，外边的人不明了情况，去干预，容易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现在，秋收快到了，看来是一个好年成。各级领导，特别是县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领导，一定要不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农忙的时候，“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勤劳、革命干劲和优良的劳动品质。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精神武器，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我们坚信，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末期说过：“……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他又说：“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英明的论断。

当前，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大运动，那末，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难道还有疑问吗？我们认为，这是明白无疑的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中发〔66〕478号）

一、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二、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城市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应动员下乡，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三、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这件事，也应当依靠本县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去进行，必要时可由省、地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下乡帮助宣传和协助行动。

四、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革命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问题特别严重、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向上级党

组织反映，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调动或撤销其工作。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则依法处理。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

五、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已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突出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改善领导作风，对工作要勇于负责，坚决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附：

黑龙江双城县人委办公室张凤山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来电话反映
双城县八月二十二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在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斗了。到九月二日为止，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斗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社队干部出走了，有的不知下落，生产无人负责了。

目前秋收生产临近，不少公社、生产队已陷于瘫痪，对秋收生产将会有很大影响。

县、社、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县、社、队？中央和国务院七月二日和二十二日通知和补充通知是否仍然有效？如果省、县安排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和群众不听，不相信怎么办？急切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以明确答复。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中发〔66〕469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意义极为深远。当前，我们应当乘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照耀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全面地、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

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为此，各地方，各部门，各厂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事业单位和服务行业，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人民日报九月七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应当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外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

二、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三、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国防工业项目和新工矿区，无论已建成的或正在建设的，都是国家的机密，更应说服其他单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不能随便进入。

四、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五、不论是中央直属的和地方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该单位领导干部须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

六、各级生产、建设的指挥机构，必须认真负责，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质量、品种、节约、安全等项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原料、材料的生产、

供应工作，注意做好防火、防爆、防寒和维修等工作，保证重要设备、交通枢纽和仓库等要害部位的安全。

此件，请迅速传达到中央直属和各地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并督促他们安排落实。

中 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各部、委、国务院各所属机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推动下，目前全国经济状况大好。秋季作物生长良好，是个好年景。现在已开始秋收，市场旺季即将到来。在财贸工作上，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保证两不误，双丰收。在财贸工作上，应当特别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以粮、棉、油、烟、麻、糖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工作和各种出口物资的收购工作为中心，把农村一切要出售的物资都收购起来。收购起来的产品，要妥善保管，保证安全，防止损失。

二、工业品要及时调运下乡。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物资要做到及时供应。要在农村积极销售猪肉。城市人民生活的供应也要进一步做好。要注意活跃城乡物资交流，防止停滞和阻塞现象。

三、要切实抓紧组织财政收入。

四、凡是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各级财贸领导部门，要组织好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当前市场收购供应工作，特别是粮、棉、油、烟、麻、糖的收购工作，保证革命生产双丰收。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七月二日和七月二十二日两次发出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仍然应继续贯彻执行。其中关于财贸工作的部分，望注意抓紧。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中发 [66] 508 号）

中央原则同意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现在作为试行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一面执行，一面进行仔细调查研究，就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意见，以便补充修改。

这个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和工交、基建、财贸、文教各系统的基层单位，并且向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进行传达，同时，和他们进行商讨，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倡议。目前这些问题不要登报。在传达时，要由负责干部亲自讲解说明，组织群众讨论。

附：

主席、中央：

最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横扫“四旧”，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创举。他们在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也提出了许多革命性的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当采纳办理。也有些是目前还不能实行的，需要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现在把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各地已经在实行，应当继续积极地有领导地实行。

二、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关于取消定息，将有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实行。在未通过前，暂停支付。

三、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有的也可以不转，照旧营业。转为国营的，人员要经过甄别清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作安排。小型的合作商店，不转为国营商店，不要停业。小商小贩，现在还起着社会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群众所需要，应当让他们存在。但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投机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贩应当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商业网、点的设置要便利群众。

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生产比较灵活，品种多样，又便利群众需要，目前一般不要改变。

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以及家庭服务人员（例如保姆等），应当允许继续存在，以利于安排社会就业和满足社会某些方面的需要，同时，对于这些人，应当积极加强管理，加强教育和改造。凡是有条件组织起来的，应当组织合作小组或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

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侨汇存款的优待利率应适当降低。拟于明年一月作出规定。反革命分子的储蓄存款应当没收的，依法处理。

七、公债已经归还了绝大部分。剩下的很小一部分，应当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

八、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的目前暂不变动；以后要坚决改革，推陈出新，表现我国人民高尚朴素的民族风格，也要适当考虑国外不同市场的需要。仓库里已经生产出来的出口商品，应当继续出口。已经签订的出口合同，应当履行，恪守信用。国外市场需要的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应当继续生产。

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应当继续销售。其中商标图案有浓厚的封建或者资本主义毒素的应当经过改制以后出售。呢绒、绸缎、烟、酒以及劳动人民和舞台、银幕需要的化妆品，还要继续生产和出售。商品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脂粉、香水这类的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

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粮标准，目前不要提高。要继续严格控制吃商品粮的人数，如农村半农半读学校、民办中学、农业中学的学生，自带口粮

进入半工半读学校的农村学生、农村医务人员、兽医人员等，不要转为非农业人口，吃商品粮。要严格控制粮食销售，注意节约粮食。

以上意见如属可行，请批转各行执行。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

（中发〔66〕509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但是有的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已经建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的，可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动，不要动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进行内外串联，也不要再发展红卫兵等组织；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机关、团体，招待外宾的旅馆服务单位也可经过红卫兵等组织群众的酝酿，自动的取消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不论保留与否，都应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六条，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三次在天安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的讲话和最近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首先加强这些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

此件发到县、团，地方传达到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公社，学校党委，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党委、党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

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卫生部：

中央同意华东局九月二十五日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现将华东局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医院内部应按中央九月二十五日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办事；其中，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联，并且要经过红卫兵群众自己的酝酿，做到自动地取消这些组织。

中 央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

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电

中 央：

近来上海有些学生和红卫兵到医院进行串联，有的还检查病人的政治成分，因而有些单位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为了避免发生医疗事故，保证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我们建议，医院的文化革命运动，按四清运动的部署，依靠医院内部的革命群众去进行，不要学生到医院去串联。当否，请批示。

华 东 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

中发〔66〕532号

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十月十六日电悉。

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联的问题，请按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十四条和中央九月十四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精神，对工人群众进行正面教育，要他们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联，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中 央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的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

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决定还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这个方针，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的热烈拥护。全国到处是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好得很。

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地方，那里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就很高，那里的生产就上升。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或者相反，只抓革命不抓生产，都是违背毛主席的方针的，既不利于文化革命，又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五个月来，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城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城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积极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遵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党中央十六条的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克服各种阻力，坚决反对压制群众和打击报复的行为，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集中力量斗垮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然，在城乡生产单位搞文化革命，同学校搞文化革命，条件是不完全一样的。为着闹文化革命，学校可以暂时停课，搞内外大串连。而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却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因此，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要自觉地遵守

劳动纪律。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工农群众可以向上级，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决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连。至于本城市的有关企业，以及邻近的人民公社，相互交流经验，那是正常的，必要的。

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并且要有计划地参加生产劳动，做各种调查研究，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宣传文化革命的十六条。

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为了使得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一定要学会领导，加强领导。一刻也不能中断对生产的领导。凡是开展文化革命的单位，都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领导文化革命，一个班子领导生产，既分工，又合作，不要各自为政。文化革命的领导，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办法，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生产的班子，如果原来的是健全的，或者基本是健全的他们应当更好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如果发现有问题，就应当适当地解决。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把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

十分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更迅速、更高度地革命化。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只要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严肃地而不是草率地，抓好文化大革命，就必然大大促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

（编者按：很明显，这篇社论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说的。但是，它没有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提出解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新办法。）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关于你们的情况我已了解一些了，我也很想见你们大家，但今天夜里确实不行了，我们要开一个紧急会议，所以不能来见大家了。
我们很想和大家好好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靠大家谈情况，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怎麽搞，现在我们头脑中空空的，要了解工厂的情况。现在工厂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工厂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我们抓晚了应该检讨，没及时抓，现在再不抓就要犯错误了。现在要同你们谈，要深入细致地谈。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要市委吴德同志负责，使这些同志回去不受迫害。还有什麼困难可直接联系，可写信。

现在我还和吴德同志打电话，不准拿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整你们。还有关锋、戚本禹同志还想和大家谈谈，向大家学习，听取情况和意见。

第二个电话：和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希望市委出面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关于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中央现在还没有研究，咱们保卫自己作一些联合，这也是许可的。咱们应该充分相信自己，成立什麼组织也不一定要中央去承认这个组织。

现在你们提出要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这一下子出了题目，中央也要好好想一想。

过几天就要找你们工人代表进行座谈。我们现在很重视工人的问题。表面上的事是容易做的，我们还要扎实地做工作，要彻底搞好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开大会还解决不了问题，现在要找少数人商量，对北京的典型的工厂，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怎麽搞，同你们大家商量。

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过去同工人接触少，办事不多，现在同大家讨论，我们要多做一些事，请大家放心，不要发愁。现在中央也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厂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迅速向上反映，请大家再次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

和大家商量後，制出一套适合於工厂的政策，这些都要靠群众自己来想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全文如下：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

二、各级党委、厂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不能因为群众一起来就害怕，就逃避责任，就同群众对立，而要坚定的和群众在一起，对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敢于发动群众批判自己的错误。绝对不能挑动工人大斗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三、当前的问题，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口实，来打击革命派保护自己，不管生产，有的以抓运动为口实，抵制文化革命运动。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正如一个职工同志所说的：“他们怕群众、怕革命、怕罢官，就是不怕影响生产任务”。中央认为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很正确的，必须引起厂矿企业各级领导的充分注意。

四、应当充分认识到，广大工人群众既关心文化大革命，又关心生产任务的高度觉悟。充分估计到工人阶级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如一个钳工组长说：“不完成生产任务，让他弟弟到车间帮助生产。”有的革命职工怕完不成生产任务、缺了工就补上，这就说明了有高度的责任感。

五、党中央号召各级领导按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积极地到工人中去，抓革命，促生产的大道理向群众讲清楚，让群众充分讨论，由群众根据本单位的情况，自觉地做到既抓生产又促生产，妥善地而全面

地安排。绝对不要犯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死守框框，害怕群众。对过去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工人一律平反。

六、许多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都提出文化革命和生产时间给予适当的规定。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

七、为使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运动顺利进展，要组织两个互相配合得好的班子，须层层落实，文化革命组成两个班子，文化革命的领导机关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组织不能背后操纵，必须按巴黎公社的选举制，经群众的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实行全面选举制，并且可以随时更换或改选。

工厂的生产指挥系统不能中断，原行政、党委领导机构没有瘫痪的，应从工厂的有经验的政治可靠的老工人为主、有技术人员参加组成领导班子，指挥生产，现在有的虽说存在，但很少见他领导，有名无实。

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革组织的权利，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和革命群众之间，都要充分发扬民主，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执，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严防宗派主义，不要武斗，不要因为纠纷而妨碍生产，不要停工。

九、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协会、代表大会等适合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一切好的组织都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人员一般地不要脱离生产。

十、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要照顾大局，绝对不能放弃生产劳动，成群结队的到外地串联，以免影响本单位和其他单位的生产，自己外出串联的，应赶快返回生产，担负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也应这样做。

十一、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在业余时间可以到本地的其它厂矿学校单位去参观访问、互相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十二、革命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生代表要去，应该首先同那里的厂矿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纪录

〔参加座谈会的有：首都职工红色革命造反总联络站等单位五十馀名工人代表，姚文元、戚本禹、王力、余秋里、唐平铸、高扬文、刘建勋、谢镗忠、谷牧等。〕

王力：同志们，今天来开个座谈会，今天主要靠你们来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麽搞，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小组人力很少，对工厂的情况了解很少，我们是勤务员，没当好！大家问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麽搞，我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对工矿企业的工作做得很少。工厂究竟怎样搞法，存在什麼问题，过去我们搞得很少，有意见也没有很好研究，今天的会是个开端。大家提些问题，我们带回去。

姚文元：大家提提有什麼问题，大家提。各种意见和要求都可以讲，今天开不完，明天还可以开。

（光华木材厂，机床厂，起重机厂，内燃机厂等代表发言）

王力：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我们不要这样发言。是不是谈谈大家都关心的事，就是咱们怎样贯彻好十六条，怎样贯彻好。工厂组织怎样办好。有的要成立全市性的组织，要不要？怎麽搞好？有的对《人民日报》社论有点意见，有什麼都可以谈。我们是当小学生的，听取群众的意见。各厂情况可以写材料，可以写信，寄给中央文革，我们就可以收到。明天三点继续开。

戚本禹：明天还有事。

王力：开会先不定，再开另通知。怎麽开好，大家可以提意见。

姚文元：什麼时间开，另行通知。

王力：今天晚上有会，就谈到这里。

陈伯达回答问题：

问：成立全市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说我们是非法的。

答：不要成立什麼司令部，成立个什麼红卫兵代表大会呀，什麼联合会呀！司令部本身就有司令，总指挥……司令部本身就有点衙门性质。红卫兵搞个什麼游行，开个什麼大会，可以临时选出个总指挥。

姚文元：他们可能是从大专三个司令部那里学来的。

陈伯达：要学习革命学生的好经验，不要搞宗派，首先开个联席会，大家商量商量。首先创造出一个典型，起模范带头作用，抓革命促生产。

问：市委对工人运动很冷谈，怎麽办？

答：那个不对。

问：学生到工厂很困难。

答：进去做工人的学生。我是你们的学生，小小的学生，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向你们学习。今天的讲话，是和你们商量的。我们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生产搞得更好，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的国家，不许把生产停下来。

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开除的怎麽办？

陈伯达：开除的，中央有指示，都算无效，过去凡是打成“反革命”的一律无效。黑材料一律烧掉。

姚文元：一律当众烧掉。

问：有的他们偷偷地烧掉了，怎麽办？

陈伯达：偷偷烧掉要做检查。

问：他交出来，又保存一份，怎麽办？

陈伯达：保存起来就犯错误，就违反了国家纪律，党的纪律。

问：有的不给，放在档案室里，是否可以砸？

陈伯达：不给吗？要革命，要斗争，最好不要砸。中央新的指示即将发下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办事。

姚文元：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个会，就谈到这里。再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唐平铸接见各地来京串连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时的谈话

参加座谈的有五十馀剧团，三百多人。】

吉林省京剧团演员左航问：

1、文艺单位是文化革命重点之一，为什麽至今有关文艺单位的问题，《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也没有？

2、关于文艺单位属不属於抓革命促生产？文艺单位属不属於事业单位？如果是事业单位，怎麽理解这篇社论？文艺单位有没有特殊性？

3、这篇社论在定稿时，是否研究了文艺单位的问题？

山西省话剧团编剧齐长义问：

1、请谈一谈文艺界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请和教育界文化革命做一对比。十六条指出文艺教育是两个重点，我们如何理解“重点”的意义？

2、范荣康同志（《人民日报》评论组负责同志）转答文艺界不包括《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范荣康同志讲，在讨论时没对文艺界考虑过，不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要求《人民日报》在这方面补正，要求采取革命的行动，了解文艺界的形势，做适当的处置，或上报，或发社论。

3、文艺界的大串联是不是革命行动？林彪同志提出的五大，没指出只是学校，所以要问文艺界大串联是否革命？

4、我们可以停演搞四清，是否可以停演搞文化大革命？

张家口专区话剧团学员温德波问：

1、集体经营的剧团在运动期间影响开支怎麽办？

2、学员算不算学生，许不许搞串联？

济南市东风文工团晨明问：

1、《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写的吗？背景是什麽？

2、《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这篇没做深入调查的社论应负什麼责任？对当前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派，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损失应该怎样尽快弥补？

湖北省话剧团演员郭大金问：

1、我们领导批准我们出外串联，发了这篇社论，又召我们回去，如何理解这篇社论的精神？又如何领会领导的两次决定？哪一条是正确的？

2、这篇社论指导我们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文艺单位文化革命不搞好生产怎麽搞？

唐平铸解答：

从六月以来，文化革命开始时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开展的。六月份仅仅限于报上批判，在北京批判“三家村”，全国各行各业也进行了批判。六月一日以后，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界，大专院校斗争当权派。以后是机关，工厂，其它各界，包

括文艺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领导重点放在学校，组织学校的斗争，以后放在党政机关，各省市委。现在又有新的发展，运动逐渐在工厂，工人阶级里展开了。由于全国文化革命形势展开了，许多工厂起来了，按过去的办法不行了。北京许多工厂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辩论，工人阶级运动与学生运动开始结合。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同志也讲，正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如何搞？工人阶级不能脱离生产，最近正在召开工人座谈会，前天召开座谈会时，陈伯达同志也参加了。造反司令部有个宣言，陈伯达同志提了一点意见：“我同意你们”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有一条建议，不要叫总司令部。总司令、副总司令容易沾染官僚主义，可以叫联合会，工人协会。

工人搞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北京的工人运动最近几天搞得轰轰烈烈，以后天津，武汉等地很快就要发展起来。

文艺界的同志们要迎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很好地体验这一生活，定能有很好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农村也搞起来了，农村结合四清分期分批来搞，领导要抓重点，以免分散精力。

先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背景向打击介绍一下：

在工人中，文化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急於要有一篇指导工人文化革命的文章，中央进行了讨论，并讨论了几次。毛主席参加了没有，我们不知道。据我所知，毛主席非常重视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有位同志的内部讲话，主席看了说很好，要加一段抓革命促生产。这社论是中央批准的，如大家认为有问题，我们编辑部都可以承担，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是工人运动起来了，认为要按毛主席思想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正路。另外，工厂与学校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不能停止生产。文艺界演戏可以停，不看戏也可以生活，但是工农业生产不能停，冬小麦如不抢种，就很严重。现在我国农业问题上还没有过关，每年还要由加拿大进口粮食。由于苏联也没有过关，也需要进口粮食，所以外国就提高价格，需要很多外汇进口粮食。工业十七年来有很大发展，但工业还是比较差的国家，钢铁、煤炭、电力和先进水平还差得很远。中国人民要争口气，生产一定要搞上去，才能摆脱“一穷二白”的地位。生产是全局性的问题，电力，

发电站停工就直接影响整个工业系统。煤炭从北方运到南方，由于运小将，运输就差些。红卫兵小将什麼车都上，毛主席提倡徒步走，这也是个原因。东北煤、木材不运到上海、武汉，就等於一个人没饭吃。现在为什麼生产下降呢？是不是工人捣蛋呢？不是！是有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派把工厂文化大革命压住了，不叫革命，他就要来京告状。但是不管怎样，生产停下来就不好了。这个社论有些不恰当的地方，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产生严重後果，说得有些过份。当然也有的是会产生严重後果的，如电力。还有社论上写“我们的工厂不同学校，学校可以大串联”，这样一来，就连小学也搭上了火车，以为中央的精神变了，其实中央精神没有变，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中学十人投票，每人都写自己的名字，（笑声）都想见毛主席，这个也打破了。现在北京招待任务很繁重，一天来一、二十万，走的少，来得多。工人、农民不能串联，军队也不能串联，守卫边疆的战士到北京来，人家（指敌人）跟着屁股也来了。工人说，学生串联，我们主力军为什麼不能串联？几亿农民，几千万工人都到北京来串联，怎麽行？有多少个北京也装不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把背景情况告诉大家。

中央讨论这篇社论时，没有研究文艺单位，後來加上了事业单位，是指与经济有关的事业单位。文艺是另外性质的生产，这社论主要是指生产单位。没有文艺单位。他们让你们回去，你们可以说，中央的这个社论不是指文艺单位。（鼓掌）

因为你们不是游山玩水的，你们是来造反的，闹革命的。你们有些单位抓社论要你们回去，你们可以置之不理。我这话是大胆地讲，也许中央决定不串联，那由我负责。这和工厂，农村不一样，工农业停止生产，就不能前进。工厂不能那么讲：“暂时饿几天肚子，为了将来更好的吃的饱！”我很赞成那么也搞徒步串联，到工农中去，可以接触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可以写出最好最好的东西。我认为可以串联，也可以徒步串联。

不是学员，老将也可以串联吗？学员当然可以。王力同志也讲过，我们反对拿这个社论来压住群众运动。伯达同志说：他们那样做是错误的，是打击报复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王力同志讲，那么应当反对他们拿“抓革命促生产”来压住你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唐平铸对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的讲话

写这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酝酿已经很久，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指示，当时我们作了调查，作了了解。关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一直在研究。工厂单位怎么领导，怎么发动，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中央也正在研究。前一时期文化大革命重点在大专学校，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中央有意识首先从学校发动。在工厂、农村有的地方开展了，有的地方还没怎么开展。但全国革命形势很好，已经从城市，从学校发展到各工厂、各部门。因而中央文革要很好地来领导这个运动，中央文革已经派人去工厂调查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把工厂的文化革命搞起来。目前工厂单位搞得最好的是黑龙江富拉尔基机械厂。这个厂的文化革命搞得很好，生产也有很大上升。富拉尔基另外有个工厂，成天讲搞好生产，不搞文化革命，千方百计地压制文化革命，这个厂的生产反而不如机械厂好。文化革命与生产不象有些人所讲的文化革命会影响生产，而与十六条所讲的一样，文化革命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当前各工厂文化革命正轰轰烈烈开展了，上海就是搞得轰轰烈烈，北京也是这样。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和一个纺织工厂搞得很好。上海、北京一搞起来，全国很快就会搞起来了。总的讲起来，继学生的文化革命高潮，工厂很快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运动规模很大。”工厂与学校有类似情况，工厂文化革命也遇到很大阻力。这个阻力来自各地方党委、各工厂党委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这些人有市场，采用蒙蔽群众的方法，欺骗认识觉悟比较低的工人。所以工厂文化革命一直到现在还很不理想，有许多工人贴大字报批评工厂党委和省委，他们就组织力量反击这些工人，有的甚至把工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这是一个很大的阻力。他们也搞文化革命，但是要按照他们的一套方法来搞，不妨碍他们的秩序，不触及他们的利益。所以工厂开展文化革命要冲破很大阻力，要做思想工作，说服受蒙蔽的工人。前一时期，一部分工人听了当权派不正确的言论，一部分工人就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去打击工人和打击学生，甚至把他们抓起来不给饭吃！逼、供、信。这些人只好逃出来告状。我与四川的工人谈话，

他们之中有的被打伤。在工厂一方面形势很好，同志们革命热情很高，要求组织起来。北京已经组织了职工造反司令部，上海也成立了很多的工人组织。地方上党委工厂党委不承认，但也组织起来了。昨天我们开会陈伯达同志提出个意见，因为宪法上有规定，除了党团组织外，我们还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权利。根据工人自己的要求，成立了战斗小组等等，我们应当支持，不应该泼冷水。但组织名称不叫司令部、总部，因为一有司令部就要有司令官，会产生官僚主义，最好组织名称用“工人联合会”，“工人总会”等名称。学生光在北京就成立了三个司令部，三个司令部经常打架。前几天第三司令部的官章大印被人家搞掉了。学生好的经验我们要吸取，不好的地方要加以改革。北京有个中学、六十六中，红卫兵总司令搞了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来去都是小包车。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要反对的，我们工人不能这样做。但总的说来，工人要搞文化革命，工人要组织起来，我们要支持。看来要依靠工会来领导文化革命是不可能了，非得工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成立组织不可。总的趋势，正确的，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组织会发展壮大，不正确的组织只会逐渐淘汰。但组织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大，慢慢地发展起来。北京市有的成立全国性组织，成立了人家不承认，是空的，没有用。江阴或无锡都可以成立联合组织，以后可以慢慢地发展为江苏省的联合组织。因为你开始就成立那么大的组织，人家不承认，会成立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这说明实质上在群众中还没有基础，还没有威望，所以组织需要在运动中象滚雪球一样慢慢壮大。（有人问：这与中央指示工厂不成立红卫兵组织有矛盾吗？）红卫兵原来控制在大中学校党政机关的，我们单位也有红卫兵组织。据我了解，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限制了。今后工厂成立什么组织都不会受到约束，因为现在的文化革命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要积极诱导，加强领导，引导到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路线上来，不至于象学生那样走很多弯路。比如学校一开始就派工作组，那时毛主席在南方，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纠正了错误，但工作组错误路线还有影响。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纠正错误路线的大会。现在工厂就不搞什么工作组了，工人运动究竟怎么搞，怎么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这是我们工人最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责任，党中央正在研究，今冬明春我们在迎接工人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学生怎么与工人结合起来，原来说学生不能去串联。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要与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划了这道线就有问题

了。我报这篇社论也谈了，允许学生到工厂去，但是学生被赶出来，情况复杂得很。学校和工厂的文化革命政策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任务都是一斗、二批、三改，是一样的，放手发动群众也是一样的，总的说来没有区别，都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是完全一致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区别在两个问题上，1、革命对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的对象搞到群众身上去，把工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2、依靠谁来革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依靠广大群众，工农兵是主力军，放手发动群众；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依靠少数人革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包办代替。基本的东西就是革谁的命，靠谁来革命，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

工厂、农村与学校有不同的方面，虽然是次要方面，但也有它的特点，就是毛主席讲的：“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止生产，因为学校没有生产任务，放一年半年假没问题，工厂农村不能停止生产。这点工人同志更清楚，我们国家刚成立十七年，过去我国一穷二白，为什么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因为旧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突出政治，经济战线上取得很大胜利。现在，我国在某些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如导弹上了天，原子弹爆炸了三次。但整个水平是不太高的，我们要用很多工业品去外国交换粮食，机器，这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问题，任何影响生产都是不好的，工农业生产不能中断，吃、穿、用各方面，科学技术方面，都要很快赶上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所以现在我们的生产一定不能停下来。

有些文化革命抓得好的单位，生产力发展提高，有些文化革命抓得不好的厂子，领导上压制工人运动，使群众的积极性提不高，甚至停止生产，这就影响生产。责任在厂党委领导，不在工人身上。

毛主席几次会议上都谈了对生产问题不能忽视，工农业生产是一个整体，是有机联系的，如果望亭电一停了，那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工业就都要停顿瘫痪，象这样的事同志们很清楚。生产也是要很好强调的一个问题，现在问题是在

怎样把生产搞下去。我们工人同志在党十几年的教育下，总是希望把生产搞好的，使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在数量上、质量上超过外国，怎样把生产搞上去。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革命，政权在自己手里，不是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垄断资本，工人磨洋工，把机器砸坏。党领导工人罢工斗争，是为了推翻反动政权，把它们搞掉。在今天则与过去的工人运动不相同，不是闹增加工资，不是砸坏机器，不是推翻无产阶级政治，而是扫除障碍，把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掉，剥削阶级的四旧，资产阶级思想都要扫除。因而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抓革命促生产，就是用文化革命武器促进生产，一方面搞掉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一方面树立毛泽东思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样使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成为增加生产的巨大推动力。

有些单位生产搞得不好，是不是和一些当权派所说的一样因为工人捣蛋。不是的，而是他们压制革命，扣工资，把工人打成反革命甚至开除，连户口都不给，把工人赶下农村。这样怎么搞得好生产呢？责任应该由这些当权派负。他们是压制革命搞生产，因而搞不好生产。陈伯达说了，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文化革命不一定在生产时间搞，八小时工作后，四小时可以搞文化大革命，还要注意休息。工厂与学校的情况不一样，工厂领导生产不能中断，学校里面实际院长、党委书记有很多黑帮，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他们搞搞伙食，领导是中断了，工厂不能中断对生产的领导，生产是有机联系的，没有领导是不行的，一定要坚持领导，好比海上航行一定要有船长。现在有几种情况：1) 厂领导基本上是好的，要大胆领导，大胆领导文化大革命，大胆领导生产，如有错误，我们就要揭发批判，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要维持他们的威信。2) 厂领导一些是坏蛋，一些是还可以的，坏家伙要把他们搞掉，或上级委派干部，或其他干部提拔。3) 都糟糕，应该重新改组。总的说，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工厂领导不能中断，和学校不一样。至于成立文革是另一回事。

第一篇社论写了《抓革命、促生产》，根据反映情况和中央指示，现在又写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以后还有很多要写。一篇社论限于篇幅，不能都写上，每个社论有重点。今后要多写关于指导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社论，一篇社论解决一个问题。中央没有意思通过《人民日报》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如果有人利用社论打击我们工人同志，这是党纪国法都不允许的，要受严重处分，绝对不许可

这样做。同志们来北京了，是不是违背中央指示了呢？是不是错误呢？我们工人同志完全是革命行动，中央研究后坚决回答，我们工人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你们不是来串联的，你们完全是被逼迫来北京告状的。江阴县委、无锡市委不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只好来北京，你们不是串联。你们先来了北京，那时我们这个精神还没有下去，你们事先也不知道。当然回去后一方面搞好文化革命，一方面搞好生产，把江阴县、无锡市面貌改变过来，一定在文化革命中做个榜样，做模范，不要让他们找借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比学生好，我们工人的文化革命应该比学生搞得更好。

我们的工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道旧社会苦，新社会甜。我们之中有很多老工人，有些年轻工人参加了集体生产，大工业劳动，觉悟很高，应当比学生运动搞得更好。

这篇社论中央讨论过，请过有关中央同志修改。是不是毛主席看过了，我不很清楚，但不是每篇文章都要经过主席看了才发表。毛主席事情忙，要照顾他的身体健康，我们要相信中央的同志，社论中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不能怪中央，责任应该本报负，是本报的疏忽。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提得不好，说得过分。社论的其它地方也有些是框框，话说得太强调，太过分了。

《人民日报》经常受到同志们的监督，使我们提高警惕，更认真工作，对办好报刊是有帮助的。但这篇社论不能叫毒草，应该说，对我们当前运动是有指导意义的。至于被坏人利用，钻空子，不光这一篇，还有许多文章，甚至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来作护身符。上次林彪同志的讲话：“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得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有些党委公然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来批评我，你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牛鬼蛇神。我们要防止他们来歪曲、利用，如果我们写的不恰当，他们就更可以利用了，这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写了这篇社论后的效果，我们正在观察，好的反映很多，不同意见也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社论把你们打成反革命，这不要怕，我们会给你们

说话的。我们工人是愿意搞好生产的，是革命的。文化革命本身就会促进生产，客观后果怎么样，我们正在调查研究、分析观察。中央以后可以再写几篇社论，解决工人运动中的问题，正确阐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抓住活思想，打主动仗，尽量不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空子钻。

《红旗》和《人民日报》。都是党中央领导的，互相之间不会有矛盾。都是陈伯达同志负责的，这些东西都要他来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一篇社论解决一个问题。

文艺团体和生产事业单位不一样，文化革命从开始到现在，文艺团体是重点，北京市演出很少，上海市也是这样。这些单位是停止演出搞运动的，因为文艺团体中，反动路线更严重，如上海的周信芳、贺绿汀等都是反动的，停止演出，半年不演，问题不大，对工农业生产不会有很大影响。

另外，就是工厂四清与文化革命情况，这也没有完全定下来，究竟怎么搞，中央还在研究。现在有的工厂已经搞完四清，现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有的工厂，没有搞四清，直接搞文化革命；有的单位正在搞四清结合搞文化革命。总的的趋势是大家都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四清工作队与现在情况不一样，四清工作队是专搞四清的，与文化革命是两回事。过去四清工作队是适合形势的，现在形势发展了，对农村还合适，在工厂的四清工作队不能包办搞文化革命。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重复犯派工作组的错误。工厂形势看来，四清与文化革命不能分割，如果把四清代替文化革命，就是把文化革命的意义看得太小了。过去四清搞得不彻底还是因为不突出政治，只抓了组织和经济，没有抓思想。

（众问：“上下左右无框框，两类矛盾一起解，三个横扫一起扫”，这种提法是不是正确？）

这种提法是不好的。中央方针很明确，缺点每个人都有，除了一些中央首长外，一般的干部都有缺点，一般人民都有缺点。如果两类矛盾不分主次一起解决，会削弱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力量，放松了主要矛盾，把矛头钻到群众身上，会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这种提法属于资产阶级的，是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举个例子：学生对校长、党委他们究竟干点什么，还不很完全清楚，但是同学之间的事情倒是很清楚，写校长、党委的大字报不会很多，但写同学的大字报材料到处可取。把主要矛头搞错了，把对象搞错了，会挑起学生斗学生的事，

这就是反动路线。北京有这提法，有什么讲什么是错误的，现在不是搞群众中间的事，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不作处置。北京某些人提出“抓游鱼”（抓右派），就是混淆矛盾，是错误的。

（问：档案可以不可以借阅公布？）

档案是保密的，人保干部应负责任，不可以借阅，更不可以公布。举个例子：一个工人有些历史问题，贴了领导的大字报，但他们早不公布晚不公布，写了领导人的大字报以后公布了，这就是挑剔，就是打击报复行为，压制别人写大字报，挑起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讲话

工人同志们：

我同戚本禹来看望同志们，向同志们问好！

我们在这个会上听了好多同志反映了重要情况、问题、意见，我们一定负责地把同志们提出的情况、问题、要求，意见反馈给中央文革小组及党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很感谢同志们提出这样多的问题，我们是当小学生的，向同志们学习。

关于工厂的文化革命怎样搞？谁最有发言权？是同志们！

中央文革小组总是坚定地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总是坚持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

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工人动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很好的事情。我们感到工厂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究竟怎样搞，还要听取意见，继续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争取迅速反映给党中央，迅速作出适合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意见。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因为群众起来就害怕了，这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假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全违背主席的指示的。听同志们讲，有人怕群众，不怕完不成生产任务。工人同志们对当权派的批评是多么一针见血，是多么正确。在场的大多数同志都关

心革命又关心生产，各级领导都应充分估计这一高度的自觉性，认识到对国家的责任感。很多工人同志看到革命与生产的这种情况，都积极地想办法，妥善地安排，缺产的还补上。一切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反对工人运动的错误观点必须批判，纠正。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商量，到底怎样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定要按党的政策、按十六条办事，要把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交给工人，应相信工人是会妥善安排的。大家充分讨论共同商量，一定会做出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决定。不能再象学校那样，再犯包办代替，工作组那样下框框定调子的错误。

下面谈谈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文化革命和生产的时间问题完全会适当地安排。有的同志提出：八小时生产绝对保证，文化革命用业余时间，大约三到四个小时，不占生产时间，同时又不影响休息。这个意见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一般的安排，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要按十六条，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相信群众，要信任群众。工厂中一定要抓住运动的大方向来搞，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还要强调。不许斗工人，不许斗一般干部，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不能挑动一部分工人斗另一部分工人，挑动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

（一位工人说：他们目前就是这样！）

这样做不对！是完全错误的！

（工人说：他们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工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对的，但是不能对工人。

（一位工人建议：听首长作指示，先不要乱插话！）

第一，我和戚本禹都是老百姓，不要用首长这个词来对待文革小组的同志，这里没有首长，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指示，而是同你们商量，问题的解决还要靠你们，我们的意见反映了你们的要求。

（有人提问题，王力同志解答）

矛头对工人这是不对的，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党支部向工人开炮，要斗争嘛！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准斗工人。

很多工人关心这个问题，很多工厂工人提出这样迫切的问题，这就是“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是否适于工厂、机关？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指示，

紧急指示是适合工厂、机关的。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个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除将群众在运动中检讨的材料交还本人外，另外将一切材料要全部的，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私自销毁，要当众销毁。

（有人讲：他们不给）

不给就斗争嘛！中央要有指示的。

许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问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见，这一点，我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怕什么？有什么害怕的。有人组织压迫工人，不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组织，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我们需要他承认什么呢？事实总是事实，有些问题按宪法办事嘛。同志们商谈另外建立组织，要注意保持工人的勤劳本色，不要专搞办公室，不要搞特殊的装备，不要搞财产的特殊。学生当中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但要注意，要适合工厂的情况，而且不要学习学生运动中错误的东西。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搞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它的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

（工人齐声喊：对！）

串联的问题：

在本市范围内，厂与厂之间的串联是正常的，是完全必要的。交流经验，互相支援。关于出去的问题，一般是不出去的。必要的原则没有什么规定，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解决本地的问题，本地解决不了的再问上级。到北京来，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来的，大家是否可以同意这样的原则。（大家高喊：同意！）

关于学生到工厂去的问题：

认为学生与工人、农民结合是正确的方向，应该欢迎学生到工人中去交流经验，好不好？你们赞成吗？

（齐答：赞成！）

学生到工人中去，虚心做工人的小学生，向工人同志学习。宣传十六条，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全心全意地为工人服务。

（到会学生喊：坚决支持！）

住到宿舍中去要做艰苦的群众工作，适当地参加劳动。除劳动以外不要到车间去，要遵守劳动制度，保密厂和车间不要去。另外有什么经验和问题以后再商量。

关于《人民日报》的问题：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六月份已经造反变成革命的了。从总的原则来讲，应该支持、相信。第一是它的威信问题，第二是国际、国内的影响。另外，不对的，有缺点，有批评，有言论的自由。比如《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人民日报》许多问题不对是可以改正的，应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要积极要求改进，应支持工人，并改进工作中的缺点。编辑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要听取群众意见才能办好。

（有人问：平反是否适合文艺单位？）

文艺单位更可以比工厂搞得凶一些，不好的戏可以停一停。什么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找文革小组（中央），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依靠十六条，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信自己起来闹革命。

关于农村，县以下中、小学搞文化革命的问题。

还应请在座的同志们提意见，这个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掌声雷动）今天没研究，不能回答。要掌握十六条，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回去自己斗争，相信一定能斗好，一定能取得胜利，相信能将文化大革命搞好。

（有人问：来北京是不是革命行动？）

你们不是已经来了吗？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嘛！你们来北京反映情况，检举压制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这是革命的。但是，不要大批地离开工作岗位，影响生产。

应该有计划地派代表。具体情况要反映，解决要靠自己。上海的工人要赶快回去，联合起来造反。

我要解答的原则就是这些，下面是不是再由戚本禹同志讲几句。

戚本禹讲话：

我看具体问题你们还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大革命，怕的不得了，象怕老虎一样的怕，

（王力同志插话：怕字当头）

就是想把它压下去，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你们刚才讲的嘛：“最关心生产的是工人群众，而不是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就是希望把生产搞坏，然后给我们施加压力”“文化革命小组，你看生产搞坏了吧！你看革命不能搞了，搞下去就不成了。”这是忘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忘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革命领导生产呢？还是生产领导革命？

生产和革命，究竟生产怎么发展？问问历史。总之，有历史以来生产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当中发展的，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群众：对！掌声）是不是，你们想想吧！封建社会几千年，地主压迫农民，生产就不能发展，生产就落后嘛！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就把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很快的程度。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的一百多年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封建社会几千年还快嘛！那么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呢？还是资本家压迫工人，所以搞社会主义革命嘛！你们看吧！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生产力发展的多厉害呀！这些人是忘了历史，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中国解放以前，大家想想嘛，生产是怎么个情况？什么都是进口的嘛！旧社会搞了几十年，才搞了一个九十万吨钢，那么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你看看，我们的导弹上天了嘛！这不是世界上没有的事情吗？——用导弹来运核武器呀！那么精确地击中目标，这个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外国人不敢搞的！（掌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的钢的产量，我们的农业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庆油田，这是怎么搞的？都是革命搞出来的！没有革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绩！所以说，要是有人压你们说是革命就影响生产，你问他：你说现在生产是怎么搞出来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他们都不懂得。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是有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

么建设？苏联就是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修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而且这个革命化加机械化，还不都是折衷的，平起平坐的，而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所以我们国家就能建设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不搞革命化，那么我们国家同样也要走苏联的道路，搞来搞去，搞个机械化，搞了个修正主义。只搞一化不行，也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才能把我们国家带上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就是搞革命化，把革命化丢了，还搞什么生产？只有革命，把革命化搞好，生产才能发展。所以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说：“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革命挂帅，毛主席没说生产挂帅嘛！所以，他们要用生产压革命，压你们，你们就拿毛主席的理论来驳斥他们。毛主席从来给我们讲的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是讲政治挂帅的。违反这个东西统统是修正主义理论，要批驳！痛驳！这是一个问题吧。革命和生产，我看你们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到处都是拿这个东西来压，好象他们怎样关心生产，实际上他们关心什么生产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中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他们破坏生产。太原市纺织厂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个党委书记，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人罢工，挑动保他的那一派工人罢工，他关心什么生产？

第二个问题就是王力同志刚才讲的大方向，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掌握这个问题。要革命一定要紧紧掌握大方向，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大方向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干什么？一句话，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就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就是大方向，要掌握这个大方向。我们的革命不是斗工人，也不是斗一般干部，而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种家伙！这些人是一小撮，不那么多。大多数人是革命的，就那么一小撮搞资本主义的，搞修正主义的，但是这一小撮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占据领导地位，不仅仅是你们工厂，就是现在工业战线上掌握领导权的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可以调查去，那是大头头，还不是一般头头，是大头头！你们想一想，你们给你们工厂领导提问题，你们是执行他们的路线呢？还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到工厂里面去调查，到学生里面，学校里面。那些人以前是在工厂里推行修正主义路

线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怕文化大革命触及他的灵魂，就到工厂里去镇压学生运动。工厂这一镇压，很好！一镇压以后，学生就起来造他的反。学生光造他的反还不行，还斗不了他，就到工人里面去结合，这一下子可就把他轰下台去了。我讲的是谁，可能你们都明白。你们不明白，可以到学校去，到清华大学、轻工业学院、邮电学院、师范大学去，你们调查去就明白了。就明白你们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斗争是整个国家反对修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把这个修正主义路线搞垮的话，那么工人阶级不能得到真正解放。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将来他们上台以后，我们重新要变成奴隶。现在工厂里存在修正主义，有些人就是相当厉害了。我去过一些工厂，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搞资本主义经济方针，当官做老爷。本来是革命的，由于当官做老爷，自己变为特殊阶层，工厂的特殊阶层。有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个恶劣程度不比黄世仁差。你们看过黄世仁，看过《白毛女》吗？（群众：看过）那个压迫，对工人的压迫不比黄世仁差。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收到了很多信，有的提个意见，就给人家开除嘛！有的就给搞成“牛鬼蛇神”强制回乡嘛！那当然，强制回乡的有很多是牛鬼蛇神，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很多借这个东西来整工人。

还有北京××工厂一个同志给我写信，就是因为他那个工厂的书记对工人提出不正当要求，那个工人拒绝了——是个女工，马上就开除。那个恶劣程度，我看不比黄世仁好一点，更坏。这样的人不反怎么行啊！不反的话，我们国家还会不变颜色吗？这样的人不反的话，我们的工厂就要变颜色，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所以我们要大造其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革命以来，在有些工厂是相当严重的，学校里学生还比工厂好一点，在工厂里我看到一些情况要比学校严重得多。

（某工人：现在我们一家子还没饭吃呢？）

刚才这里也有很多工人，我们看到了许多材料。这个我们当然没有进行调查，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发言权，我们调查清楚再处理。一方面要处理，一方面你们自己要斗争，自己去开展斗争，写大字报，斗大的字写在外边！

（某工人：他们不给白纸！）

不给白纸使报纸嘛！想办法嘛！不给纸一样革命，毛主席革命的时候也没多少纸，你们看延安出版的书都是黄纸的嘛！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最重要的是你们的革命精神，你们的造反精神，要靠这个东西。所以你们斗争要掌握大方向，靠革命精神，靠革命造反精神。那么怎么进行这场革命呢？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刚才王力同志也讲了一些意见，都是属于商量性质的，还不是中央的决定。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可给中央写信，也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来，也可以批评。

（群众：你们收得到吗？）

收得到，你们直接写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中央文革小组，邮票都不用贴，就可以收到。

（某工人：我给毛主席的信和给中央的电报，省委都给扣住了）

你们可以打电话，电报，可以写信。主席的信是中央办公厅办，你们可以查问怎么处理的。写给文革小组的信，有的是给你们办了。比如今天王力讲的一些意见都是根据很多信件，很多意见来研究的，因为不可能每封信都给你们答复。搞革命怎么搞法，你们还可以考虑。我们还要再继续研究，研究好了以后，中央就会通知下去。

（某工人：我们领导讲这次运动群众不是不斗，群众也要斗）

革命的运动从来就不是斗群众的。

（他就公开这么讲）

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建议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我告诉你们两个方法：一个方法依靠毛泽东思想，错误的东西，你们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最高指示嘛！你给他念语录，语录本拿出来给他念，毛选拿出来给他念，你执行不执行最高指示？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要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

（某工人：把我们都解雇了，县官不如现管）

是呀，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依靠青天大老爷行不行呢！没有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就是你们自己，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就是青天大老爷。你们依靠我们会得到失望。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不可能一项一项都处理，要依靠群众，依靠毛泽东思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太原市我昨天也看了些工厂的问题，那问题

拿哪儿也不好解决，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就能解决。上海工人要成立团体，不让你们成立，有的几千人，有的上万人，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了。

用四大武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依靠这些武器来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如果你们不能团结群众，你们是个搞折衷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变成孤家寡人，那么谁也不可能帮你们的忙。你们到这里几十次，一百次，也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呀！来取北京的经，来取毛泽东思想的经，拿起这个武器来去搞革命。在革命当中会有很多阻力的，你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无非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斗你们，一个是打你们，一个是把你们抓起来，一个是开除。这些问题，我看你们自己会解决，你们充分讨论一下，根据群众意见办事。这无非是把你们斗一下，开除一下，我看好嘛！对你们是个锻炼。这是越压越革命嘛！他不斗你，你怎么能革命呢？那舒舒服服怎能革命呢？对不对。

（群众：对）

不要怕他们开除你，无非开除嘛！还要一个是老婆离婚，是不是？

（群众：大笑）

这不要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你不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吗？能斗垮它吗？是呀！革命总是曲折的，总有困难，那有笔直的道路呢。你没看见天安门大街也不是那么直。你不信？测量一下！你们从上海、从浙江、从四川到北京来，那路上弯弯曲曲拐多少弯呀！那是一条直路吗？不要怕。马克思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导师，一个人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毛主席那么几个人，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共产党，把这么一个整个中国，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打垮了，把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打垮了。你们工厂嘛！革命再困难我看也不比中国革命更困难吧！还有毛主席领导，还有毛泽东思想嘛！还有那么多群众嘛！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解决，相信自己的力量，这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的。你们要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儿，要团结起来。有了团结，你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你们来了许多人，我看到都是青年人，老工人很少，我看这就是你们的弱点，很大的弱点。我知道工人在工厂里的地位，他的作用，你们不把老工人发动起来，不把老工人团结起来，你们想要革命？要依靠老工人，你别怕

老工人落后啊！他们知道的事情可不少，他们要提出一条来就够你十条，你信不信？那他斗争起来，坚韧性那比你们青年工人还能斗争。

(有人问：我们单位里当权派说三十以上的人，不能参加红卫兵、赤卫队)
那么你们就组织别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嘛！你们可以组织赤卫队，可以参加赤卫队，什么不可以！（鼓掌）为什么不能参加赤卫队？

(插：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这样说法对不对？第二，我们单位里没有搞四清的单位，文化革命搞不搞？)

分期分批是总的来说，你们北京市，上海市，那工厂都搞起来了，怎么分期分批法？（笑）啊！他搞你们反革命分子怎么不分期分批？（对，鼓掌）现在要平反了，就要分期分批了。

(插：四清单位搞不搞文化大革命？)
四清跟文化大革命是一件事情，都是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四清搞得不彻底的话，还要补课，还要搞文化大革命。

(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数人压制我们少数人怎么办？)
怎么办？你看怎么办呢？依靠你们做工作，如果你们有真理的话，就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没有真理的话，当然团结不了，那只能怪你自己。

(杭州××厂工人提了个问题……)
我要是在你们工厂做工的话，我就不来了，你有那么多人，还来啊！还要到北京来找毛主席？毛主席的方针这么清楚，你们那么多人，如果有真理的话，那么多人你还怕。（插：不怕）那你来干什么？

(插：杭州××厂工人谈了具体情况，并提出要工作队撤退，罢官)
我教你们个办法，象你们这个工厂里有三千多工人，你们分几班？

(插：我们有四千多人，分三班)

三班制？你把三千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

(插：可以吗？)

可以包围的！（好！鼓掌）

他不答应你们的要求，你就不走

(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就跟他去喊这个口号。你到北京来是干什么的？

(插：到北京告状的)

告状啊！我看你们要向群众告状，要向杭州的群众告状。

(插：我们没法才到北京来的)

我看你们赶紧回去。

(当权派把业余时间全部占去了，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安排时间？)

你们自己安排，一个安排生产时间，运动搞革命的时间自己安排。

生产的问题，你们是要注意的。我们革命工人是最关心生产的，因为我们的国家生产是不能停顿的。关于生产，我刚才跟杭州的工人建议，你们要革命，包围省委也可以，但是你们要上班，生产要坚持，而且要把生产搞得更好，比他们搞得好！分期分批是总的来说，从总的全国范围来说，是分期分批，但是象你们杭州那儿，我看那个厂就是分到这一期，现在就搞。

(插：这分期分批是党中央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说的？)

过去有个总的方针，这是有的，分期分批。但是北京这个地方，上海这个地方，它都搞起来了，你怎么分期？就是分的这一期嘛！你们要求分到这一期嘛！

(插：根据你刚才的解释我们要求全面开花，不要分期分批)

我刚才说过了，分期分批是中央的总方针，但是已经搞文化革命，你怎么搞分期分批？(对！)打你“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你整我们工人有没有分期分批啊？(对！)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打，他现在没有搞起来，当然可以分期分批罗！你先慢慢搞嘛！如有些地区，象××地区它就是慢慢搞嘛！你的工厂已搞得热火朝天，你还分什么期，分什么批呢？分期分批是党的总方针，在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说，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讲的，要把生产搞好。至于你们什么时间搞文化大革命，时间怎么安排，由你们工人自己安排，刚才王力同志讲的，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安排，你们有问题实在要派代表，由你们工人自己商量，派那几个代表，那么这几个代表走了以后，他们代表所留下的许多工作，留下的生产任务，要由其他工人来完成。(对！)你们如果回去，不把生产搞好的话，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借此向革命小组施加压力，说不行了，生产搞坏了。那个时候，就给你们……，要坚定的相信毛主席的指示，只要抓革命就能促生产。所以我相信，你们只要把革命搞好，就能把生产搞好。我希望你们不要给他们一种口实，事实上，

他们是最要破坏生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把生产搞坏，他们不搞生产的时候，你们自己组织劳工委员会，把生产管起来。（对！鼓掌）我们相信你们管生产比他们管得更好，（对！鼓掌）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天享乐、腐化，还搞什么生产？他们不搞，你们抓起来，建立临时的指挥生产系统，把生产搞起来，生产是不能停顿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停顿的。你们看生产象个火车，来来往往，火车要一停的话，马上就要碰车，不能停顿，要有指挥，没有指挥是不行的。

（插：我们是到北京告状的，他们不会说我们旷工吗？怎么办？）

你们工人自己讨论一下，如果你们革命派变成多数的，大家讨论，当然不算数，如果你们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是少数、是孤立的，那么人家要怎样处理你就怎样处理你，你说是不是？我说不算旷工也不行，你们厂里也不能答应。我看最好的办法，依靠你们斗争，

（插：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我们群众能不能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叫他们靠边站。）

你说可以不可以？可以！这还用问我吗？

（插：那为什么要经上级党委批准呢？）

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轻易地提出罢官要求，那个，你罢了他官以后，他挺舒服地，他靠边站站，什么事都不管了。罢官是斗争的最后结果，而不能把它搞成斗争的序幕，斗争是第一幕，不要罢官，如果你们一下子就给他们罢了官，那群众认为革命完成了呢？不利于发动群众。

（插：县以下学校、工厂的问题怎么办？）

县以下学校、工厂问题，我们中央会另外研究的，这里不答复吧！

（插：有人问刻公章问题）

工人能制造机器，难道一个公章问题还要问我吗？

（下面许多人说了具体问题）

同志们，你们看我是不是讲到这里，我们下午还要开会，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为止。下午的问题，你们去讨论一下，你们吃了饭再研究

（插：还有学生的问题没解决）

什么问题？

插：有人站起来回答学生的问题，毛主席在二七年以前就下了指示了，只要我们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没有问题。齐声说：“对！”（鼓掌）
戚本禹同志说：看，他答复的比我还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唐平铸等和首都革命职工代表举行了座谈，在会上由王力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

王力说：工矿企业的工人起来了，现在有些人怕得要死，但形势好得很！
工人代表：党委会已经瘫痪的那些干部，应当自觉到车间劳动。他们不去怎么办？

王力：我们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的方法，使他们自觉地参加劳动。

北航（红旗）同学问：是否要和每个工人组织联系？
王力同志答：不！不！不！跟一个组织。这个意思就是联系一下。”
同学们又问：他们可以说你们支持一派，反对一派，挑起群众……

戚本禹说：你们就说“那一派革命就支持那一派。工人生产时不要去车间，保密车间都不要去。

一个工人问，我们自来水公司算不算保密（车间）单位？（群众大笑）他们不让学生和别的单位串联，说我们是水源单位，也是保密单位（群众大笑）。

陈伯达最后指示：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再加十六条，军委紧急指示、中央批示就作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记录

〔地点：政协礼堂小会议室。出席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及小组其他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市委书记刘建勋。各工矿企业工人代表六十余人〕

王力首先发言：

这次座谈，围绕几个问题，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大家。上一次和同志们谈了，以后还要和外地同志谈。上一次散会时，陈伯达同志讲了很多意见，供同志们参考，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定了些初稿。也是先当你们的学生，提出了几条意见，看行不行。和大家召集座谈会，同志们交换意见，现在先把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来，供大家围绕这几个意见来谈。

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持我国永不变色，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起来了，有的怕得很，但不能阻挡。

第二个，各级党委和厂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能因为群众一起来，就害怕，就逃避责任，就与群众对立，而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起，对准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的当权派。决不容许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三个，当前问题是由于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运动为口实，打击革命左派，保护自己，不管生产。有的以抓生产为口实，抵制文化革命运动，怕罢官，就是不怕完不成任务。我们认为，这样批评是很正确的，地方，各工厂必须引起注意。

第四个，应该充分认识广大工人群众，既关心革命，又关心生产的高度自觉性，充分估计工人群众对自己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北京一个钳工工人说：“工人完不成任务，还要加班加点补上。”一切不信任工人群众的观点，都必须纠正。

第五个，党中央号召各级党委，都必须按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把抓革命促生产放在工人面前，充分商量，充分酝酿，自己作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妥善安排。对工人决不能犯包办代替，压制工人，弄框框，在过去凡是把工人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关于军委紧急指示，是完全适用的，已经发了下去，有关的指示，这里只提一下。

第六个，工矿企业里的工人群众提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时间，应适当安排。例如，八小时工作时间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每天 3 至 5 小时，不能占用生产时间。每天必须保证八小时休息，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第七个，为了抓革命促生产，运动顺利发展，组织适当分工，两个班子，过去党中央有指示，必须层层落实。这里有两个问题，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没听清），不能包办代替，必须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必须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群众充分讨论后进行选举。这是文化革命的准则。第二，工厂的生产指挥系统不健全，原来的党委没有瘫痪的，必须积极负责地把生产搞好；已经瘫痪的，由厂内以老工人为主及技术人员负责把生产班子搞起来，要保证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现在的企业是有名无实，很少见到生产领导人的面，这样要不得。

第八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必须使革命群众懂得，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革命群众的内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同意见要经过讨论，严防宗派主义和工团主义，不要纠纷、打架，不要停工

（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与工人打架可以吧？”大家说：“可以！”）
不要武斗。

（×××同志问：“什么叫工团？”王力同志说：“工团，小集团”）。

第九个，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联合协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等等，适合于工人组织形式，一切组织形式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品质，不要脱离群众……。

（有人谈到工会也是工人组织，但有些工会作用不大。

陈伯达同志关心地问：“你们的工会能不能代表工人？”

有人答：“不能”。这时，我厂×××站起来说：“陈伯达同志，我在发言之前，先向您检讨一下，我今天就是停工来这里的。”陈伯达同志说：“知道就成了嘛，检讨什么！”我厂×××向陈伯达同志汇报了我厂 11 月 15 日晚上车明说的话和他说的工交、城建、财贸系统工作组的四种情况，并说，车明在那天上午还听您的报告。陈伯达同志乐了，说：“怎么？还听我的报告？”×说：我们把车明的讲话记录了。让他签字，他说中央对签字没指示。陈伯达同志说：“为

什么不签，当然要签吗？”并不再逐字逐句地重复车明说的那四种情况。随后王力同志又接着念：）

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卧车主义，

（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

有人反映有的工会排场如何如何，

陈伯达同志说：“工会这么大的，没必要。”）

工人组织中的成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陈伯达同志说：“个别的也可以嘛！”

这时一个工人站起来，诉说了自己被打的情况。

陈伯达同志说：“私设刑堂、拷打，都是不合法的，挑动工人斗工人的开除党籍，按照国家法律做极为严肃的处理。”

这时有人说，我们单位把时间安排得很紧，没有写大字报的时间。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他安排，你们的代表不是群众选的，一律无效。”

工人说，他们有多数。……

陈伯达同志说：“要做工作，要给多数人谈话。”

工人说，有些人，为了入党，老说上边好。……

陈伯达同志说：“这种理想要出修正主义，不是听党的话！”）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照顾大局，绝对不要脱离生产岗位，成群结队的外出串门。已经外出串联的，一定要赶快返回生产岗位。

（陈伯达同志说：“赞成不赞成？”

大家说：“赞成！”

这时，有位被打伤的群众发言后，文革小组当场和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了一个紧急指示，由王力同志念：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刑堂，私自抓人拷打，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严厉处分。”

陈伯达同志说：“大家同意吧！”

众：“同意！”

这是文革小组的意见。一定要写成大字报，标语贴出去，贴遍大街小巷。）

第十一个，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可以在业余时间到本市的其他厂矿和学校去参观、访问、学习，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第十二个，革命的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换文化革命的经验，有的代表要去，应该先向那里的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取得联系，工人生产时间不要去，不要进生产车间，保密厂保密车间都不要去。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青年学生应该逐步作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逐步作到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切大中学校的学生，都要当工农大众的小学生、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工农，到工厂去串联的学生代表，应当在工厂的统一安排下，应该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劳动。这些意见，是同各个地方商量，听了你们很多意见，从你们这听到的，从下面集中了的。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今天要和大家商量，大家赞成那些。意思和大家见面，不贴出去，不同意可以写信来。

（这时有人提出厂里有很多组织，跟那个组织联系？

陈伯达同志说：“你们怎样讨论：工人组织同学的联系问题，如几种组织，提一提，我们文革小组做过斟酌。两个组织都可以联系，不要互相吃醋。今天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放下去，应全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下团结起来，工人之间不要记仇，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很多人是从农村来的，家乡里姓陈的姓王的经常打架，他们都是农民，这都是背后有土豪劣绅在操纵，现在是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操纵……好利用在工人之间造成裂痕，让你们互相打下去，他们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多种组织要互相商量，互相交朋友，慢慢来，不要急于结合，要慢慢地来往，彼此来往……要以革命的利益为重，团结起来。……”

接着，大家说到平反的问题。

×××问戚本禹：“我们那有人强调要给群众认真平反，干部打错了要平反吗？”

戚本禹说：“当然要平反，干部也要平。”

×××说我们单位不执行。

陈伯达说：“现在中央有个指示，他不执行要犯大错误。”

×××问：那些工人的材料如何处理。……

陈伯达说：“从五月十六日运动以来，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一律无效，现在中央有指示。”

这时我厂×××站起来发言，把车明在我厂的讲话，扼要地向首长做了汇报
陈伯达说：

“现在就是因为有些情况，所以中央还是要搞几个文件，工厂文化大革命要按着十六条。就是要把车明这一套冲垮了，一切要按十六条办事。中央的文件有没有好处？（众：有！）再加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的社论，但还会有困难的，有抵触的，有一些人不会自动交械的，你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掌握在手里，他们采取的方法，压制群众的方法，你们不要学他。

关于平反问题，应该有个专门指示，马上就发。”

（市委刘建勋同志同意把这个指示贴到每个车间）。

这时有人说：“这些指示领导不执行，说是处分，可谁处分他们呀？北京市委和他们一个样！”

刘建勋说：“有些地方我们也处分不了。我们一去，多数派找我们。”

戚本禹说：“为什么不能管，必须管。”

陈伯达说：“大字报贴出去，这个一贴广大群众会拥护的。”

大家说了某些单位拷打工人等情况，

最后当场确定，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立即处理。

王力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都是纸老虎，有中央和市委作指示。市委可以抓，有一个人叫×立功，现在就关在公安部。”

×××问：“中央首长说工作组百分之九十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不指工交系统？”

戚本禹说：“指工交系统。”

×××问：“犯了严重错误的工作组成员在群众要求下，是否要回去检查？”

曹轶欧说：“应当检查嘛！”

随后各位首长随便地和大家进行了交谈。

会议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王力讲话：

你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讲得很好。同志们反映了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不要变颜色，大家不要受二遍苦，不能让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自己掌握起来。

工人阶级是最关心生产的，大家离开生产岗位是被迫的，大家迫切希望解决问题，很快回去搞好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口号，我们相信靠工人自己是能够妥善安排好革命和生产的。

我们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一定很好地研究。党中央正在研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彻底。

大家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大家最关心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作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行！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但革命要靠自己。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有好几千人，为什么不能回去干！坚决向与毛主席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斗争到底。你们要精神变物质，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

文化革命的命运你们自己掌握起来。工作队在背后操纵搞起来的文革委员会，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工人自己创造的原则）进行全面选举，选举前要充分反复酝酿讨论，真正选出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来，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罢掉。你们文革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建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

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果不能领导就以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说得对，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好生产为谁？说得很好。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来压你们，你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毛主席和你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你们。革命、生产都靠你们。工人阶级是最拥护毛主席路线的，对一切反对毛主席路线的都要批判斗争。

你们一个厂的力量就这么大，杭州市还可以联合起来，你们要团结绝大多数工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主义机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主义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

罢官问题，（指大家要求罢工作队长徐钊的官）她的文革职务，你们不赞成就算罢啦，至于其它职务，是否今天定要在这里罢？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要求的，认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里罢掉不合干部处理手续，对你们的斗争也不利，为什么不能由你们自己回去把她斗倒、斗垮呢！

（姚文元插话：革命要有反面教员）

你们回去自己去斗，我们支持你们，斗出个结果来。你们把她的事情都摆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她斗倒、斗垮，罢掉一个人，换一个人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要把错误路线

批臭。但应叫她随叫随到。签了字还不来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还要求刘钊（副省长）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钊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

同志们这样多的人到北京来，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你们对华东局有意见也可以提。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提。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出个样子来。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的心愿，我们一定负责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想见大家。毛主席的心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的。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产。

姚文元讲话：

我们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姊妹。你们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不是首长，是你们的同志、勤务员、战友，是和你们一道来闹革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大家批评有些人这样怕群众，这样压制群众，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非常关心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把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学校里搞，现在我们工人阶级起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毛主席思想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大家不受二遍苦。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不仅要关心一个厂、一个市，还要关心整个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徐钊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个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

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一定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搞掉，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要罢徐釚的官，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个时期的经验证明，革命需要反面教员，把她留着进行批斗，由你们回去斗争。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

过去搞土改就有过两种搞法：一种是领导把地主抓起来；一种是群众起来把地主斗倒。后一个办法才是真正巩固的。你们要靠自己斗争。

总的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方针。有人把这个口号说成抓生产压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工人阶级应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精神化为物质。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做出妥善安排，做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大家回去再继续去斗争。有些人对你们来北京是仇恨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就没有问题了，要靠你们自己去进行斗争。

大家回去后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纪要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陈伯达、王力同志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在一床厂半工半读学校与各派代表开了座谈会，记录如下。〕

陈伯达同志：

任何方面如果有问题，都必须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辩论把是非弄清。要按十六条办事，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听毛主席的话，只用文斗不武斗。过去打过人的，今后不准再打人了。过去打过人的同志要向被打的人赔个不是。（王力同志解释说：就是道个歉。）谁对谁错，以后再说。不要动手打人，这才象文化革命的样子。说不定你们这里面有人是赞成打人的，因为你们有力量，但不能那样做，这样说你们是否赞成？（众：赞成）

打人是错的，今后如再动手打人，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对方如果有错误，你打了他也不能帮助他改正错误。

不准打人，不准打架，有什么纠纷大家谈。你们以前闹得很厉害，有些同志也许急了些，说话就强制的讲，容易动感情。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讲清事实和道理的。以后不要武斗，不要打架，慢慢地讲道理嘛！说服对方。动手就打人、抓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对的。以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还怎么搞革命呢？今后要形成这样的风气，摆事实，讲道理。

问：学生要进工厂怎么办？

陈伯达同志：以后学生来，你们要欢迎他们，无论那一派都要鼓掌欢迎。我建议你们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时间安排好，八小时的工作制一定要保证。产量要高，质量要高，任务要完成。剩下的时间可搞三小时到四小时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你们太累，你们中断生产得不到社会上的同情。业余时间搞文化大革命，不要由行政安排，生产搞好了，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才好。

问：有人不上班对不对？工资发不发？

答：工人不干活就不对。过去没干活去搞文化大革命，工资还是发，因为以前没有规定。

（工人插问：我们厂原来规定不干活不发工资）

文化革命是特殊情况，发工资是保护少数的一种措施，以后你们订出条例来。

问：现在少数派办公室有十几个人整天不干活对不对？

问：（少数派）现在革委会脱产不干活行吗？我们的办公室都封了。

答：工人不要脱产，除病号外，统统回生产岗位。办公室封了可以打开嘛。

问：他们学生要进厂闹事，影响生产怎么办？

答：你们和学生交流经验，学生可以派代表谈判，你们和学生开座谈会。学生进工厂学习、劳动有好处，有问题可以商量，他们有错误你们可以纠正。不要把他们当成洪水猛兽怕他们进来。

问：学生跳墙对不对？

答：学生爬墙可以原谅，

（王力：因为你们不让他们进来）

爬墙我是不赞成的，你们可以说理，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学生来工厂向工人学习，工人是学生的先生，学生是工人的小学生，开始不一定学得好，你们要帮助他们，生产时间可以不接待他们。你们是三班制，可以轮流接待外地学生。可以找间空房子接待他们。学生宣传也可以到宿舍去，提倡学生到宿舍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对学生不要有敌对情绪，不要有成见。

问：学生晚上来闹事好不好？

答：以后不要晚上来，这样会影响工人休息。我们来了你们鼓掌，我倒没有给你们解决什么问题，我感到很惭愧。我是来了解情况，来向大家学习的。学生和其它单位的同志来了要鼓掌，各方面意见都得听，不能只听相同的意见。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要按十六条办事。今天的会大家缺少十六条的风格，大概大多数反对见少数派，我建议多数派、少数派一起去看吕嘉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首先是无锡市各行各业的职工提问题、讲意见，接着刘宁一同志根据大家提的问题讲了话。〕

大家讲了话，昨天我和两个同志谈了。中央文革小组把你们的问题交给我，我听了你们的发言，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了你们的许多情况。

一、关于来京问题：

你们不管受到了什么委屈，来北京告状，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讲讲怎么不能呢！这是革命的行动。谁要说你们到北京来告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不对的。

有人说你们的行动要自己负责。向毛主席告状，我们就是要自己负责。我们就是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情况向文革小组反映，向中央反映，都是革命的行动。如果不反映，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如果瞒着毛主席不讲，对不对？（众答：不对！）

二、关于平反问题：

你们是在运动初期贴了大字报。毛主席给了我们六大自由、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后加大串联）。革命的大字报以后还要贴。你们回去敢不敢贴？（众答：敢。）

因为这样被打成“反革命”的，回去立即平反。来北京告状是允许的，不仅不开除，工资还要发。因为你们是被迫来北京告状的。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是的话，我和你们在一起算什么？唱毛主席的革命诗词，怎么能算反革命？今后还要唱，要唱到全国去。

你们剧团演戏，不要再演帝王将相。社会主义不要这些，要把它彻底破除。要演王杰、欧阳海人物，演“32111”人物。我们就是要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再搞落难公子中状元，怎么行！这是几千年的私有制文化。毛主席早就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们要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把错误的东西统统批判。要破四旧，立四新。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全国人民一开会，就宣读最高指示，全国人民都要革命化，以革命化带机械化。今年工农业形势很好，两弹上天。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关于组织问题：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组织，算不算合法？宪法上规定有结社自由。革命中成立的组织，当然是合法的。组织有各种各样：有厂的，有厂里几个组织联合的，有厂和学校联合的，有地区性联合的造反司令部。联合的可以叫代表会，或者联合会。怎样对工作合适，需要研究。

把工厂、报社、电台成立联合组织，为了革命造反是可以的，将来运动深入了，还是要各行各业搞。叫工厂去研究剧团的问题就不行。

同志们为了相互支持交流经验，联合在一起是合法的。将来全世界革命，还要互相串联呢！

新组织要和老组织不同，过去好的要学，不好的不要学。搞个大机构。就要大办公室，就要很多人，就要出文件，就要买打字机。咱们就是要批判官僚主义，你们造反军就不要搞大机构，大办公室。

（有人说：我们每天接待两三千工人，怎么行？）

你们想想办法，要一个脱产人员没有，把工作做了。

（有人说：我们每天只睡两三小时。）

不依靠群众，四十八小时不休息也不行！能不能搞轮流值班？我是做总工会工作的，我想今后工厂里的群众组织都不设脱产干部。不能依靠人海战术，要靠大家自己闹革命。

文化革命，就是要靠大家自己起来闹革命。你派几十个工作队，将来又会有人打倒你。革命不能包办代替。

（有人说：不脱产同意，纸张费用怎么办？）

事情不是绝对的，开会总要有个地方，纸张总要，现有经费要大家使用，要研究用的合理。

四、关于工作队问题：

派工作队问题，不久有个文件，大家会看到。《红旗》十三、十四期社论说，搞文化革命派工作队本身是错误的，这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起来说就是怕革命，怕群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闹革命。

派工作组进厂去，就是不相信群众搞革命，去了怕群众提意见，就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制止。如果有人反对工作组，就成了反党、反毛主席、反革命。为什么有几派？也是工作组的遗毒。

毛主席号召大家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开火，刷了几张大字报，当权派一看就恼火，“怎么造我反”，老虎屁股摸不得，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压制群众。压不住，就怕得要死。

（有人说有跑到部队去的。）

还有跑到高粱地去的，真是怕得出奇。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了错误就要改，和大家一起闹革命有什么怕呢！

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不是无锡市自己首创的，各地有轻有重，轻者保姆，重者打击群众，压制群众。工作组让人写大字报，这样就有一些人上了当。你们回去不要追查他们，多数人是受了蒙蔽，你们不要去整他们。

干革命要很好学习十六条，学习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思想的、符合十六条的，就干；不符合的就不干。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错

误，不要以错误对待错误。人家把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回去回敬他。应该你骂的，我不骂；你动手打人，我不动手。否则，就不能把群众团结起来搞革命。我这样说，不是给对方打保险，而是给你们打保险。你不信，过几个月就会犯错误。

（有人问：工作组该不该撤？）

我的意见还不要它撤呢！有错误就批，让他们检查，不能让他们回去睡觉。要摆事实，讲道理，治病救人，检查好了，也是帮你们做工作。对厂长、党委书记也是这样，有错误要彻底揭发批判，不要简单化马上罢官。

（有人说：工作队不愿检查，说他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办？说他们有权不能批判，怎么办？）

我看现在不会，如果这样，更要贴大字报。越保越被动，你是马列主义思想，怎么也批不倒！你是错误，就得拿出来，怕也不行。

（有人说：工作队是毛主席派来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毛主席是反对派工作队的。有人说工作队的大方向是对的。你说工作队错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但派工作队是路线错误。至于组织群众斗群众，更是错误。

五、关于《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我理解大家提这问题不是反对抓革命促生产，而是有人利用这口号不让大家革命。

抓革命，就要把资本主义那一套打掉，生产要超过帝国主义。人的思想不革命化，生产就搞不好。有了革命化的人，才能思想革命化，才能把工厂面貌改变。要把工人培养成毛泽东思想的产业大军，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人想利用《人民日报》社论，变成以生产压革命是不对的。《人民日报》准备再写一篇文章，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口号，放弃了也会犯错误。应该抓起革命这个纲，促生产。

六、关于文革委员会问题：

你们认为现在的文革委员会不行，可以改选。厂长、书记都不能当文革委员，选了可以取消，因为不能自己监督自己。

（有人问：文革委员会和本单位党委是什么关系？）

党委很受大家欢迎的可以，已经瘫痪了的要采取措施。文革委员会是否在党委领导下？如果党委很好，文革委员会自己会和它商量的，但文革是群众组织，党委不能直接下命令。如果瘫痪了，就不会理会。工厂的生产不能断，工厂的生产领导班子要健全，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七、关于阶级路线问题：

我们是无产阶级闹革命，阶级路线是肯定的，但要很好研究阶级路线和阶级成分问题。工人阶级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至于工农子弟，我们要作具体分析。是否每个工农子弟都是无产阶级思想呢？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好的，就会是“唯成份论”。工农子弟一般是好思想多，不好的思想少，但要经过锻炼，不能是“自来红”。非工农子弟也可以改造，工厂应注意阶级路线，但也要改造非工农出身的人。

赫鲁晓夫就是矿工的儿子，矿工的儿子怎么成了坏蛋！不能说“自来红”，要注意改造。

八、其它问题：

（有人问：原地方国营的改为合作社，现在要求改回怎么办？）

我不清楚。

（有人问：我是学生，不让我们到工厂去宣传，和工农结合。）

学生到工厂去，我没有研究。串联要在业余时间，不要到车间去，要考虑不要影响生产。你们具体研究一下。

（有人问：我们都是少数派，文革委员会是多数派选的，少数派应不应该选到文革委员会去？）

文革委员会的选举，应在群众中讨论，不能少数几个人决定。

（有人说：少数派肯定选不进去。）

文革委员会有多数人支持，你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解散。你们做工作嘛。

（有人问：黑材料怎么办？）

除本人检讨书退还本人，其它的统统烧掉，不能保留在谁那里，以利团结，不要把大家的关系搞坏。

（有人提出，要毛主席接见我们工人，见不着，回去会给别人笑话！）

我把这个意见转给国务院接待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有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五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七市和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座谈讨论主要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展开的。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他们认为：

1，对工交系统要有正确的估计：

一些人说：工业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对于这一点，在《十二条》里要有明确的估价。谷牧草说：工交系统的干部状况也要估计一下，这样写文件时才好提出问题。

2，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

国家计委主任李人俊说：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铺开，时间集中，问题集中，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很难预料。生产已有停顿趋势，科研和尖端项目、协作项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设也开始受到影响。还有人说：当前生产主要靠吃老本，库存材料已经很少，问题越来越多，马钢、武钢都有停产危险。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期分批进行。

3，一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一些人说：建国十几年来，工交系统的领导还是好的。《十二条》不提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很难理解。工厂里无论如何要由党委领导，下面再分两摊，一摊管革命，一摊管生产，不然生产非受影响不可。

4，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

一些人说：这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担心建立了群众组织会出现两派对立的现象。如果各种组织建立起来，麻烦就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现在工厂里组织已经不少了，有工会、民兵、党、团，还建立那么多群众组织干啥？对于他们要求建立全市性的工人联合造反组织不要松口。上海、哈尔滨的干部主张取消已经建立的全市性的工人选择组织。

5，不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连。

一些人担心学生进工厂会搞乱工厂。一位部长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是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大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6 一定要搞好生产。

一些人说：对于闹革命不能放手。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哪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水电部部长刘澜波说：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那么，我们的方针就得好好研究了，现在弄得人心不舒畅，人家积极生产，说人家是保皇。

（编者按：正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的：从以上种种意见来看，工交战线的领导人实际上不赞成在工交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件要修改，改后送中央，林总要听一听。

大势所趋，因势利导，方兴未艾，欲罢不能。不能阻挠，要采取大禹治水的办法，不能采取鲧的办法，要疏导。

企业存在不少落后的东西，旧框框，洋框框，都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都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分期分批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工交欲罢不能。有各种原因，首先要看到内因，没有内因，外因搞不起来，不能光看外因。工交内部有很多问题，光看外因，不看内因，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消极情绪，要犯错误。看内因首先要看积极因素，不要光看消极因素。积极因素是主要的，消极因素如不纯、动机不纯，这不是主要的。老工人、青年工人，这些工人起来闹革命，青年工人敢说敢闯和青年学生一样，还有些积极分子对领导不满，老工人生活好了，儿女上学了，翻身了，很爱护厂子，容易带来保守性，当然也不能一般这样说，他们也有的对领导不满意，不愿意看到厂子搞坏，要闹革命。青年工人、老工人都是积极因素，要依靠、团结、组织这些积极因素，领导这些积极因素，领导他们起来干革命。

抓革命，促生产。改进领导，要因势利导，说服他们按照十六条闹革命。先分析积极因素，而后分析消极因素。有人混水摸鱼，这种人确实有，但也要一分

为二。有的人有大毛病是不好的。有的有大错误不能平反，有的有点小毛病要具体分析。现在闹革命先看积极因素一面，然后看消极一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先看积极因素，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闹革命。然后再说外因，就是串联的因素，先解决内因问题，内因问题解决了，外部因素就好说了。内部确实压制了一些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是严重的，把内部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才能克服内部消极因素，内部调动起来了，对外部的积极因素也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分期分批文件是写上了，大势所趋，欲罢不能，挡不住，不如疏导的方法。因势利导的方法是写上了，能否做到还要看实际情况，做的时候不能硬卡。当然有些单位确实不能搞的，放后再搞，如电站、自来水、电业、重点国防、运行中的车船，写上做两手准备，能说服的说服，不能光靠这几句话。

四清以文化革命为主，结合进行。当前工交企业运动，现在才是开始，未动的也很快起来。也不要幻想学生回到学校搞斗批改，就不出来了。不要存在这种侥幸心里，不要怕打乱旧秩序。不破不立，在主席领导下大方向不会错的。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潮冲掉。总的要以内部积极因素为主，利用外部的积极因素，就能因势利导。

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过去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没有完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干部路线、执行政策、工作作风都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比五十天路线错误影响还深。比如过去党不管党，宣传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工作神秘化、特殊化作风，这些影响都很坏。在这些情况下，主席思想受到干扰。现在用大民主，宪法定的三个自由，再加上学生放假这一冲击，许多人精神上没有准备。要不是毛主席伟大，放手搞大民主，不能解决这问题，各部门都要准备受冲击。

运动中可能有些毛病，干部子弟学父母一些坏东西，做的可能不恰当，但这些青年比我们当年闹革命还好。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才半年，不能要求那么高，运动还要继续发展，有些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

要有思想准备，要受得住，过去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惩罚，受到教育。等于打个仗，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磅。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

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地点：中南海小礼堂东厅。在与代表一一握手后，座谈开始。这时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动身上北京告状了。为了不使运动影响了工业生产，中央是不同意大批工人赴京告状的。据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工人已到了武汉，还有五十多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为了弄清情况，周总理询问代表，工人造反团有多少组织？有哪些单位？是国营的，还是地方性的工厂？

在汇报中代表们谈到了 65 厂林荫组织围攻我院同学的情况，以及刘正庚揭发林荫的情况。总理细心地听着，还问：“刘正庚是哪个庚字？”代表答：“是陈庚的庚。”总理说：“啊！知道了。”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要我们把电话中向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劝说他们不要到北京来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我们详细地讲了。

总理说：“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给工人，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 2—3 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要打破框框，工交系统也有东西可革，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些都是代表旧的东西，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应该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彻头彻尾地打破旧的东西，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用十六条、十条破旧立新，出现新面貌、新的精神，社会出现新的跃进、更大的跃进、持久的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新的精神，社会出现新的跃进、更大的跃进、持久的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环节，过去取得了两个革命的胜利，即取得了政权和改变所有制的胜利，不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思想仗打胜，政权不能巩固，生产关系不能巩固，生产力不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不能调动。

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摆法？要以革命推动生产。你们忧虑抓革命会误生产，照十六条规定不会误生产。既然生产八小时，又是政治挂帅的，怎么能够误生产呢？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要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当然讲重要性是革命第一，在时间上还是生产第一。强调革命不等于把时间占得很长，有时占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磨刀不误砍柴工，个别的时候搞六小时生产或占一两天生产时间，可能还需要，但是整个的要坚持八小时，文化大革命时间不能占生产时间更多，要两个兼顾，这两个问题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生产岗位的人也不要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纯落到生产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多方面的，应当达到巩固政权，巩固所有制，必须思想革命化，这是就国内来说；对国外来说，在马列主义的阵营中要树立抵抗修正主义的典范。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但是我们要注意生产，文化大革命本来促生产，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部分可能挫伤生产。认为失败是不对的。文化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促进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不好，还可以立竿见影，但搞得不好，可能生产下降。在北京

就有两个材料，一是机床一厂，文化革命搞得不好，生产日日下降，二机床厂文化革命搞得好生产就上升。同样在北京，同样是机床厂，搞得好就上升，搞得不好就下降。照十六条、十条办事，用新的思想就能搞好，不仅将来大跃进，而且当前也可以上升。

靠我们干部用的姿态，（原文如此），高姿态、充分的革命精神去工作，要使干部深入群众，承认错误，不要躲躲藏藏，吞吞吐吐，顾前顾后，怕狼怕虎，要真正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诚诚恳恳地到群众中去承认错误。相信同志是好的，革命是有成绩的，这是一面。但天下的事都有相反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成对立地产生，即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我们应当将坏的一面向群众讲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什么是薄一波的东西，什么是自己的错误。这次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是当权的党，有伟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破了这一面，对斗争就有发展，克服了这一面才能立。不破不立，马列主义是批判的，是破的，是革命的，是斗争的，是揭露的。马克思、列宁用的话，用的语言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本质是相同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事物发展总是有两个方面，批判坏的一面才能前进。任何事物都有先进和落后，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破修正主义，不破四旧，无产阶级专政保不住，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去批判。不批判自己就不能过关。批判自己不等于打倒自己，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面，越批判得好越立得好。越怕倒，不批判，越容易倒，事物总是向另一面转化，向对立面转化。物极必反，黑格尔讲过，一切东西，一切限制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对立面转化。越是怕垮，怕批判，越是要垮。越是不怕的办法，越是不垮，越批判越是不会垮。我们不想垮，是要保，靠这些同志掌握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些同志要垮下来，只有让他们倒下来了，不垮的办法就是批判。干部同群众对立的问题，是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就不服气，就对立。所以我们说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是当权派，总是有错误，错误重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轻的也有资产阶级思想萌芽，也要批判。事情是相对而产生的，只有承认差别。错误大了就起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错误小的是萌芽，发展起来也会变成资产阶级当权派。不是××有人

都到群众中脱裤子，大量的要到群众中去批判。这样可以使干部和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扭过来。没有这个决定，还是对立下去，群众之间也会对立。干部用种种办法组织保守派同革命派对立，保卫自己是错误的，要完全用新的姿态摆脱被动，改造自己，团结群众。

不了解情况实在无法办事，无论怎样聪明，马列主义读得怎样多，业务怎样熟，不了解情况办不了事。不是靠天才聪明解决问题的。我没有别的经验，就有打仗的经验，就是靠情况。聪明天才都不能代替，百闻不如一见。汇报的人是各取所需，有些大量的、生动的、重要的材料省略了，省略的是主要的，专靠汇报不成，只有到实践中去，光靠汇报不了解情况，好像在云里雾中。我打仗靠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总是打败仗，就会被人家消灭。这和工作不一样，工作效果以后才能看到，打仗马上就见效，我的唯物主义就是这样。被迫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地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火的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打，长期的打下去，军事战场是可以停火的，思想打仗的程度不同，有大打，有小打。要使社会前进，就得实行辩证法，实行对立斗争，破旧立新，斗旧的东西，要斗彻底，要势不可挡，要席卷全国，席卷各个领域，方式不同。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批判的。忽视这个思想上的革命，不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只看见它，不看这个战线上的胜利，一切成果都会化为乌有，会背叛无产阶级，有利于资产阶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李富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工业“十条”定下来了，大家有意见还可以提，明天（十二月四日）中央还要开讨论。“十条”是根据毛主席路线提出来的，向工人、向厂矿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毛主席新的群众路线的体现，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书记、部长（指到会者）的位子上，还是坐在群众方面，这是当前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敢不敢领导，敢不敢深入到群众中去，信任不信任群众，敢不敢、

怕不怕、信不信，讲来讲去还是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希望规定细一些，多一些，规定越细越多，还是会被冲破的。总之，如果不改变过去老一套的做法是不行的。

工厂的情况要具体分析，随时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谁站在革命路线方面，谁就是革命的。如果我们深入群众，与群众在一起，住上几个月就会弄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是过不了关的。我们工交部门欠债很多，文化革命要冲破做官当老爷的作风，冲破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这一套，我们要和群众一起商量如何还债的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很困难，说话人家不听，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取得群众的信任，还是想靠中央规定几条框框过日子。

总理讲：“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深入群众中去搞一个时间，解决一个问题算一个问题，积累经验，不然我们怎么能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还是怕这个，怕那个，当前还是怕把生产搞乱，我们要深入群众商量怎么能把革命搞好，把生产搞好。

目前大民主是空前的，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学生一起来必然影响工人，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了。有了十条好办事，业余时间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可以串联，但不是强行干涉，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了这几条就不怕了。到了一个工厂摸索经验，然后把问题再提出来，有问题的再补充，再发展。与其这个揪那个揪，不如到一个工厂搞一个时期。现在工厂已经搞起来了，继续解剖一个麻雀，一机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同志所蹲的点）的问题，我们要始终搞清楚，我们应该摸索一个点，取得经验，我们要坐到主席路线上去，各级领导的主要矛盾是深入群众，与群众站在一起，摸索经验，就有发言权了，不是这样就被动挨打。我们要在实践中执行主席路线，肃清反动路线的影响，与其被揪不如到工厂去，摸各种问题都要和工人一起商量研究，一些经济要求中央可以另行补充规定，其它问题要靠自己到群众中去滚、去解决。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在群众起来后得到群众拥护了，成为群众的领袖？没有（指到会人）。我们现在欠债很多，时间很长，有十几年啦，还是自己到一个工厂去摸，取得群众拥护也是一个收获。拿上十条到群众中去，等中央说话是不行的，中央必要时也是要说话的。到工厂去看看，取得经验，否则肃清影响是不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也不行，我们就处在这个十字

路口，抓革命促生产，思想革命化了，生产就上去了，短期影响一点生产是不可免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大家到这里来，担心生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也可能说不对，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是语重心长的，毛主席要搞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搞共产主义，勇往直前，我们是想也没想，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解决了，把几千万学生发动起来，什么也不怕，把工厂、农村也发动起来，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颜色，全世界人民现在是看我们，我们有大道理懂不懂？懂了就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一些。目前的根本问题还是怕字当头。不要怕挨斗，不要怕受委屈。当一个靶子，发动起来群众就是好事，工厂确实有许多压制群众的东西。冲一下，生产就会大大发展，我们要坚信毛主席，跟毛主席走，许多同志有些抵触，忧心忡忡，顾虑重重，大的路线抓，抓不准就要犯错误，大的路线抓住了，犯了错误也是小的。我们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本质，本质的东西是群众要革命。要跟毛主席。十几年来，我们一方面有进步，一方面有当官作老爷、怕群众、脱离群众很厉害，中央给我们那么大权力，得不到群众信任。山西周明山，学生要揪他，可是一了解就不揪他了，原因是周明山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

主要还是靠自己去工作，取得群众信任，从两条道路上解决问题，这不是最近几个月的问题，而是十几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变，客观上还是助长了反动路线，我们如果怕乱，还是要做他们的俘虏，我们不警惕这一点，还是要犯大错误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亡羊补牢”，现在牢骚那么多，实际上就是抵制毛主席的路线。现在工人刚刚起来，不敢怎么啦？要相信群众会搞好的。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是放的问题，不是堵的问题。十条从目前看已经够了，不能再多了，十条的实际要靠我们做工作，十条很好，但要靠我们做艰苦工作。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除非是搬到工厂去，革命的就支持，

比较差一点的就团结争取、提高他们。过去我们搞秘密工作有什么条件？现有一点地位，完全可以做好工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罢官。过去规定群众不能自己罢官，虽然这样规定，现在还是把我们揪到北京来了，基本问题是取得群众信任，革命要改变旧的一切，维持旧的是不行的，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群众刚起来你就规定这个，规定那个，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改变被动状态要靠我们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林彪主持会议。

谷牧说：

这次座谈会，中心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问题。大家认为在具体做法上，必须从工交企业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工矿企业的三个特点：1，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2，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3，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出毛病，就可能影响全局。有些行业，如冶金、电讯、航运、电力等部门，生产的连续性很强，一刻也不能中断。大家还担心工厂中的派别斗争，如果处理不好，发展下去，在生产建设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南京 720 厂，因两派斗争，已停产半个月；哈尔滨电机厂今年约有 20 多万千瓦的发电机完不成。还有一个领导问题，有相当多的基层企业组织瘫痪情况严重，各级领导讲话不灵，中央精神贯彻不下去。中央关于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的指示，从中央工交各部到省市委，迄今大部分都不落实。建议工矿企业党的领导不能中断，抓生产的班子要尽快落实，抓生产的领导主要精力应放在生产上。

《工业十条》照顾到了一些特点，因此大家同意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另外采取措施：1，从全国来看，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对工矿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3，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集体所有

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简下去的人要求回厂。等等，这涉及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

大家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和要求：1，大家担心厂矿企业派别组织发展下去会带来恶果，要求做好下厂学生的工作，向他们交代政策。2，工交企业领导讲话不灵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反映出来的问题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建议认真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鼓励干部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决不能让工厂里的党组织中断工作。

十二月四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讲一点个人意见，大家讨论商量。

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来的，而且已同各派工人商量过，并陆续有些补充，先搞了八条，后来根据各派的意见，补充成十条。十二条太长了，工人不容易记。根据当前冒出的问题和主席思想，提出这个十条，这十条各派都赞成，不能说是折衷主义，实际是按主席思想搞的。

主要讲一讲派别组织问题，我的想法不知对不对，大家研究。

工厂出现这些派别问题，关键不在群众，而在于工厂的领导。当群众向工厂领导提了些意见，工厂的领导干部就组织一部分人保自己，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更大的，这样就出现了各派的组织。比如北京机床一厂，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捍卫团，厂的领导把老工人、党团员组织起来，不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是捍卫他们自己。所有的问题，症结在领导，而在群众。领导不和群众一条心，不去说服群众，而匆匆忙忙地组织保护自己，所以沟就越深。我不懂工厂的情况，但工厂和学校基本是一样的问题。工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群众一提意见就怕整到自己头上，所以群众意见一出来，就赶快组织一批人保卫自己，使问题复杂化了，把少数派说成不象个样子，少数派受打击确实有，我在这方面不懂，平时同工人接触少，同学校接触多。我和五个工人谈话，文化革命一开始，工人向领导提意见，就说大家是“地主出身”，“有血债”。有的就千方百计硬把人家打成反革命。象吕家才，说他家有血债，父亲是保长。经查实，父亲是工人，祖父是上中农。这个人并不可怕。我们文革小组并不高明，我们是小学生，我们认为这些人并不可怕。为什么把他们说成青面獠牙。我们和他

们谈话，他们是讲理的。厂里当权派，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式的口气，同工人谈话，这是不行的。特别是青年工人有气。那样愈弄愈糟。我们当过青年学生也是一样。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因态度不好，就闹起来了。问题在于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十六条对工厂完全适用。我接触到发生的问题和学校一样。派别组织问题关键在于领导，有什么捍卫的必要呢？这种搞法还叫多数派。有一天晚上我到机床一厂，找政治部谈话，副书记提出两派间闹得这么厉害，还是派来个工作组吧！搞四清，整顿工人队伍。我听了很生气，发了脾气，说明他没有学十六条，很糊涂，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办事，我说了算，这样怎能把运动搞好呢？因此领导是个关键问题，一切责任在于领导，在于领导是否执行十六条。有些事情做错了，对不起群众，你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就是有些纠缠不清的，最后也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的，没有什么可怕。总觉得保卫自己是对的，那怎么行？有一个徒工，父亲在另一个厂，把他打成一个什么反革命，并通知他父亲那个厂，非要把他父亲也打下去不可。实际他父亲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光听报告，听领导的报告，问题就大了。但一深入群众里面去，其实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同工人一谈就好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各级领导没有决心执行十六条。

武斗问题，少数派不会比多数派厉害，多数派人多，人多手段更多，但少数派的手也不敢软。

××讲，派别问题究竟责任在群众，还是在领导，要讲清楚。如果责任在群众，领导是怎么领导的，那么，相信群众就有问题了。当然我不是说群众不会犯错误，有时也会犯错误，还是要教育群众。但责任还在于领导方面，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问题。如机床一厂闹得那么厉害，我们不想一想，很多乱子是领导自己挑动起来的，为什么不让少数派说话呢？我看一说就了事嘛！工厂和学校一样是由于领导上挑动群众斗群众、压制群众，所以就出了派别。为什么少数派不能说话，少数派说话了，多数派就压制少数，有一个工厂多数派不讲理。有个不属于两派的工人说，工厂是不对的，为什么不让少数派说说话呢？我看这种现象不满意，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学生和工人。大家如果欢迎了就了事嘛！我看有些工厂的领导是利用工人的弱点，让党团员，老工人参加，制造工人之间的

分歧。有个老工人说，不参加多数派，一百另五元的工资就保不住了。工人的这些话都反映了工厂领导存在的严重的问题。

关于党团组织活动问题，现在在工厂里提不得，任何党团组织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接受群众的考验。匆匆忙忙，恢复党团组织活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经过群众考验，好的还是可以站住脚的。只要有个生产班子就可以了，大家关心生产是好的，是对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我给上海工人的电报，讲搞好生产是大道理，但少说一句话，革命也是大道理。两个大道理要兼顾，出了我很多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多数派是拥护的，不一定对。少数派反对可能对，因为说抓生产是大道理，没有说抓革命也是大道理，两方面说就好了，有片面性，批评了就改正，因为上海发生了问题，匆匆忙忙写了这个电报，有毛病。因此对工厂的党团组织也不要匆匆忙忙恢复，要经过一段考验，群众看清了，再恢复有好处。主席说，同意组织两个班子，只要八小时坚持了，利用业余时间闹革命。党的领导应该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是正确的领导。说各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领导，这是靠不住的。我接触的这个厂，有的干部不学习中央的十六条，让他们领导会走上邪路去。所以要强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

这十条是广泛听取多数派、少数派的意见，还有文革小组的意见，然后东凑西凑，凑起来的。现在，工厂文化革命，用压的办法、堵的办法，产生的后果必然会出现乱子。有错误就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不要不让人家去串连，也不要采取捍卫自己的办法，不要挑动群众去捍卫自己的权力，我想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员要有一个风度。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管那一派，都要敢于谈话，要在群众中承认错误，不要怕群众批评，使群众同领导打成一片，那事情就会搞得更好。加上必要的措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有个生产班子，生产班子先健全是不行的，还要加上改选。抓住两条，生产就不会乱了。一是抓革命，是大道理，二是抓生产，也是大道理。用革命统帅生产，两者必须兼顾，过去给上海的电报有缺点，可以纠正，只讲抓生产不全面。

两个大问题，一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一是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即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十条是不完全的，因为许多工厂的具体问题都未涉及。以后在实践中再加以补充和修改。

对厂矿的派别，厂的领导不要主动去搞，要主动接受少派的意见，和少数派接近，不要造成对抗情绪。学生要去，要欢迎，不要对立。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在对待少数派、多数派的问题上也要这样。少数派对领导提意见，你们欢迎、鼓掌，问题就没有了嘛！学生进去，也鼓掌欢迎嘛！越对立越不行。不要人家一提意见，就整人家，那就没有自由了。学生到工厂串连，我们对北京少数派谈了，鼓励他们进工厂，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他们很同意。假如工人欢迎他们那不就好办了吗？我一直以为老工人比较好，无产阶级意识多、觉悟高，但是十几年来学苏联的办法，我们把一些老工人提上来，脱产了。他们脱产，又有了一百零五元的工资，就容易脱离群众，老工人都有一定的地位，班组长都是他们，同领导有联系。告诉他们不要自以为资格老，有威信。青年起来闹革命不要同他们对立。我们要帮助他们。

十二月四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对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没有调查研究，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算第一次。对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认识，对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认识，我也不大很了解。

近来，同波兰的左派的一个同志，谈了三次，十个钟头，从同他谈话来看，受教育不少，谈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波兰的同志，过去是中央委员，搞过工业，谈得很详细。社会主义工业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情况，他们形式是“公”，实际上“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资本主义。过去对这些问题不大理解。

（林彪同志插话：形式未变，内容变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徐向前同志插话：挂社会主义招牌，实际是资本主义。）

我们过去对苏联，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领导变，我们比较清楚，文化上也比较清楚，比如叶甫图申科到美国，到处受到欢迎；农业上，他们有自留地……等，我们也还知道一些。对工业就不大清楚是怎样变的了。

（林彪同志插话：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工业、文学、艺术、党各项政策怎么变的，要找人研究一下，怎么复辟的，我们还对这些到底怎样变的，不甚了解，怎能塞这个漏洞，要研究。昨天同周总理谈话，还谈到这个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是经过多少次反复的，法国革命从一七八九年，路

易十四上台，后来就上了断头台，拿破仑上台又恢复了帝制。从××年到××年，三次革命，五次反动复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很多次反复，克伦威尔后来也上了断头台，坟墓都被挖出来了，尸体被烧，活象赫鲁晓夫斯大林一样。可见资产阶级革命也是经过了多少次反复。中国革命，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做皇帝恢复帝制，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是几次反复。）

（周总理插话：剥削阶级代替剥削阶级，还经过这样多次反复呢！）

（林彪同志插话：社会主义革命，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存在着反复问题，几千年人类有文化以来的历史，就是个剥削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的，如何复辟的，现在我们只有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事实，没有说服力，请康生同志组织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从波兰情况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工厂方面，关系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

（林彪同志插话：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

波兰的情况是有三种经济，一是私人可以开工厂，私人可以开饭馆、旅馆、舞场，法律规定雇佣工人不许超过三个，但是学徒不算数，

（周总理插话：我们半工半读学校，剥削也很厉害，他们每月只有二十元，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什么学习。）

二是他们农业劳动合作社，形式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村的富农经济更突出，一个人可以有五十公顷土地。

（李先念同志插话：这就是富农经济。）

有的土地并不多，在郊区经营蔬菜、水果，可以变为百万富翁；三是国营经济，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他们除贪污盗窃以外，同国外有勾结，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叫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我感到我们的工厂，是否那样干净，我没有研究。要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根子，怎样搞文化大革命，林总讲的“我们的经济基础是新的，上层建筑是旧的，不行。”这是对的。什么是新的？我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所谓新，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

（林彪同志插话：所有制由私变公，其它一切都跟着变了。）

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毛主席五八年就

说过，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列宁说：“小生产者可以随时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基础，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它是经济基础，工厂也有上层建筑。

（林彪同志插话：不论工厂、农村，都有上层建筑问题。）

因此我们工厂文化大革命，对防资、防修很重要，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文化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次要一些，更重要在于工交系统怎么认识工交文化大革命，需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问题上认识不够，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谷牧汇报的第一条、第二条理由站不住，对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须要认识。要调查研究什么叫修正主义根子，要深入调查研究，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林彪同志插话：问题是不摸底，一摸不是问题少，而是一堆。）

（江青同志插话：工厂里有成本、利润问题，从修正主义那里抄来很多东西，我们的脱产人员太多，生产工人一表现好了，就马上提拔上来，脱离生产。××是劳模，让他脱产了，坐上了汽车，提高了待遇，这个问题很大，他怎么革命呢？）

（林彪同志插话：吃了饭不革命，就镇压人家革命。）

我们有些工厂，恐怕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工厂，工交口的同志要很好地对待这个问题，教育干部，认识这些问题。

（林彪同志插话：前车之鉴，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工厂权力比学校干部权力大的多。

（林彪同志插话：有身家性命、生杀予夺之权。）

苏联专抓经济工作，政治不挂帅，检查起来，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比学校还厉害。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我参加共同讨论的，完全赞成。但是，第一条是否再加这几个句子：“工厂文化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发展生产力，有更大的作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不是二元论，而是主席说的，抓好革命才能促生产。

北京第二机床厂一个车间的材料不错，由于抓革命，促了生产，精神变物质。不好的地方是领导搞的不好。

(江青同志插话：凡是革命的地方，生产总是搞得好。)

我补充一句。波兰同志说，修正主义的力量，一是党的上层领导，一是基层企业领导。

十二月四日，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呢？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之不变？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大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后有了苏联，才引起了我们警惕。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经过了很大反复。资产阶级革命也并非是一次胜利的，封建社会也有过反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经过了五次反复，拿破仑最后也做了皇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了反复。现在有的国家还保持着皇帝，英国就有女皇，日本有天皇。中国戊戌变法到袁世凯、到蒋介石也有反复。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旧的社会总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反扑。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而且也经过了一个反复，而我们现在是完全推翻剥削阶级，斗争一定更尖锐、更复杂。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工矿企业的问题不大，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工矿企业，有党的领导是好的，但我们要看到基础是旧的。尤其是开国以来我们没有经验，学了苏联的一套，什么“厂长制”，“物质刺激”等等。现在是上层建筑的革命，经济基础也要革命。工矿企业的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比较轻，而是更严重。

领导干部一定要接触下面，到群众中去，抓感性知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抓情况。工矿企业的事我不太懂，打仗懂一些，打仗如果不看地图，不派侦察，不看地形，你怎么下决心？领导干部如不亲临前线，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工矿企业也是一样。文化革命首先是政治思想上打先锋，接着组织上跟上去。有了思想没有组织，就会落空。干部是关键，必须是合乎三个条件的干部，有了这样的干部，才能把生产搞好，否则必然会落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十二月六日王力在会议上发言：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6月，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被刘、邓的错误路线镇压了。中央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工人又起来了。9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又变成了不准革命，压革命。

到10月1日，林总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第13期社论，10月5日军委紧急指示，在这样一个号召之下，工人运动就又起来了，规模更大。这本来是很好的，形势好得很。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这个事件以后，我们明确感到工人起来了。

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关于工人串联问题，也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学生运动期间，那条错误路线就是不准校与校之间来往。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工厂与工厂之间不能来往。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为什么不能来往？

毛主席说，学生必须与工农结合。学生不同工农结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学生往工厂里跑，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欢迎，应该鼓励。但是，现在有些人一看到学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兽”。过去说红卫兵组织是非法的，现在

工人组织变成非法的，不予承认。我昨天就提出来了，中央过去说工厂、农村一般不成立红卫兵其他革命组织，这样的指示还适不适合？中央还批了一个什么地方的材料，说厂外不能串连，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原来就不应该这样说。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按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9 月 14 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农村五条是农忙的时候，现在也不是农忙了。所以就不能说这方面的指示和其他规定还都适用。如果都不适用，有好多地方压制工人运动的人就很希望有这些规定，那么，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 20 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

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虽然有错误，比如没强调三线，不应该砍的砍了，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秋里同志说了嘛，今年的计划总还完成得不坏。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但具体的领导者总也还有点作用。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

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 180 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十二月六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

要澄清几点意见。

第一、这十条作为安民告示出现的，工厂中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到，但十条是包含一个完整性。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割裂了它的完整性。汇报提纲说赞成十条，实际是反对十条的。所有各条都是同工交企业相适应的，可能有许多缺点，也许还要补充，但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如果把革命打掉了，十条就打掉了。

第二、谈一谈工作方法问题。说工作方法问题，不是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就很好，可以说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不好，我的工作方法特别不好，不会做工作，不会商量问题。但汇报提纲是不好的，事前也不同我商量，特别是没有请示过主席和林彪同志，我是计委的成员，大小计委都有我的名，但没有和我商量，那天看了提纲，的确是突然袭击，这个方法不好。

（总理插话：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不能在汇报时光凭口讲，要有一个提纲，是开夜工搞的，可是来不及征求意见。）

第三、对于多数、少数的问题。我说明一下，当然多数、少数都带有阶级性，那一天我讲的所谓多数，其中老工人一种地位提高了，过去在天津蹲点，老工人脱离了生产，参加车间当干部，我动员他们参加劳动很不通，他同我是有感情的，但是说不通。另一种老工人象北京机床一厂，有些人参加了捍卫团，工资一百零五元，不参加就怕丢了。工人阶级是有阶层的，有的阶层容易受资产阶级拉拢，有的受当权派拉拢当打手。多数、少数是会有变化的。这个问题我在工作会议上说过，不要多说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学生，特别要注意容易听到首先闹革命的被说成是流氓痞子。在北京机床二厂听了一个青年工人讲话，说得很有条理，口齿很清楚，但当权派把他当成是流氓痞子。所以，有些报告的提法要注意，不要把这些人说成是流氓痞

子。在历史上首先闹革命的，冲锋陷阵的总是少数，然后大多数才参加过来。历史上很多少数人起来闹革命，如法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来革命的也说他们是流氓痞子，现在还有人去争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写这本书的不是马列主义者，他找了很多书的材料证明，就说这些首先起来闹革命的不是流氓痞子，毛主席在农民调查报告时，就批评过这种错误。我们现在不要重复这个错误。

十二月六日陶铸在会议上讲话：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林彪同志插话：革命洪流的“洪”字，应改为红色的红。）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

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象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第一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林彪同志插话：我还被他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他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他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薄一波说他同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往是很密切的。

（康生同志插话：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同志插话：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谢富治同志是单枪匹马到公安部去的。罗经常给他出题目，也受到他的干扰。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十一中全会后，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问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都同意，但各地回去后，一炮打自己，事实证明，到现在都没有过关。过关的只是个别的。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查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象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

那末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挤伤了几十人，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都感到很高兴。这些青年人都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来闹革命，见主席什么都不想了，就是要回去闹革命。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还不好好闹革命呢？

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外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有话当面说了，把思想搞通就好嘛！但违反组织原则，欺骗中央，那是不允许的，这样就会变成黑线人物，就会变成反党。这次会大家老老实实把思想摆出来了，脱裤子，就好嘛！但不能当面这样，背后一套。那是不行的。主席讲了，对我们寄托了希望，但还是要靠自己过好这个社会主义关。现在革命已到了更高阶段。我们不能拿过去的成绩来衡量今天自己。要看这次运动的态度，以新的要求来看自己。重要的是要过好社会主义关。无非是组织了群众斗群众，对不起党的事业，有什么不可以交待的呢？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首先是引火烧身，两派对立是领导造成的，应当承担责任，作检讨，敢于批判的是革命派，要教育那些保守派不要对立，对两派都要引火烧身，就不会造成对立了。二怕被揪，缠住不放。三怕坚持原则、讲政策，发生了问题，不是矛盾对着自己，而是群众一逼，什么字都签了，把矛盾就上交了，就到北京来了。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领导革命化，首先要请教主席的著作，林总的讲话

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材料，下头要深入请教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到实践中去，抓典型，树样板，拿出经验来。吃透两头在于领导的以身作则。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有什么舍不得。青年人都敢上刀山下火海，我们过去敢于入虎穴，入地狱，现在有什么舍不得一身剐，要革命关键是革自己的命，彻底承认错误，不搞两面派。搞两面派的，要彻底交待。没有这个决心，在运动中就会被抛弃。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思想上反映很坏，天天反映这个被抓去了，那个被抓去了，大家都有股怨气，这股情绪是不利于搞文化革命的，不如让他们到工厂去看一下，从工人中体现一下生活，不然回去后思想还不通。

文化大革命，从五月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要求大家做彻底的革命派。我帮助林总担负这个责任，每天都诚惶诚恐的心情。一个要摸出一些经验，一个要有革命的火热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总学习，有时请教伯达同志。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第一、学生问题。有多数，少数，如何帮助左派争取多数。外地学生要求在北京设联络站的问题。还有打人的问题。以前是左派对我们出大字报，批评我们，很好！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林总插话：匿名信现在收到不少。）

这些是坏人，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是对工人的问题。

第三、是对商业的问题。

第四、是对机关。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很不放心，我和他们讲，抓革命，促业务，怎么进行的，不晓得，不跟他们讲好，就习惯于压、堵、挡。

第五、工人提出很多问题，不能用老框框对待，要研究答复他的问题，比如，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等等。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劳保福利，这些都是学苏联的，都是有毛病的，这些问题，要研究解决，他们有权利提出批评。提的对的，你就答复！

第六、农村文化革命，很快就要来了，现在已经有串连，不搞不行。

第七、县以上的中学，他串连回去要革命，宁可承认它搞好些。

第八、小学校，小学教员有问题，要整顿，不搞不行，小学教师也要求组织，不能挡。

第九、红卫兵全世界都承认了。是一个时代的组织，带个红袖章就很帅气，我还在设想可能代替青年团。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

（林彪同志插话：我们也是同意的。）

现在看机关初时不发展不出去，也有些框框，其实也挡不住。这各地红卫兵到北京来，最后一批到了二百六十万，调了十多万解放军，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军训训练，帮助他们过政治军事生活。他们表示欢迎，感觉很好。以后在中学，在大城市可以搞。

第十、关于徒步串连问题：将来也会突破我们的思想，本来想搞试点，现在要座谈一下，将来机关干部斗批改完了以后，也可以要求出去串连。一定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去搞。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要划分路线，目前都集中到井冈山去了，井冈山弄得很紧张了，韶山也很紧张了。将来黑材料搞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批完了，就没有事可做了，就会出去徒步串连。

复员军人的问题，他们已经组织起来了，就承认，可以由武装部帮助他们，搞好登记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不搞全国性的，可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组织起来，做些通讯联络工作，不能象军队一样，将来有事会有用的。

关于各级党的领导形式，也是一个新问题，瘫痪怎办？可否组织领导小组。在科学院曾设想搞个临时小组，到现在还选不出来，工厂党委如产生……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由工人选举领导生产的班子，只要有一个领导生产的班子，把工人的多数团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可以不受影响。生产上是不会受一点影响呢？在一个时期肯定会受一点影响的，不要紧，不要在这个问题面前，前怕狼，后怕虎，总之要以积极的态度，有困难要设法克服，有问题要承担责任，不要推卸责任，矛盾不要上交，凡是出了事的，都是领导没有搞好。干部要在群众中过关。极而言之，影响生产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只要工作做好了，出乱子就会少，当然不能睡大觉，要兢兢业业，要孜孜不倦，积极工作，矛盾不要上交。要彻底地革命，彻底地解放思想。目前革命还在初期阶段，现在学生几千万，将来会几万万人都要走到大风大浪中去。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先当

学生，后当先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现在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国家看看他们的领导是些什么人，来自什么地方？主要来自机关和企业单位，大部分是企业干部。所以工交系统的文化革命搞得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比文教系统不重要，而是比它更重要。所以一定要把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进行到底。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不能认为工交企业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不认识和不承认这个问题，我们工交企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言，不认识这个问题，工交企业就会采取右倾的态度，走过场的态度。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用文化大革命发展生产力，用文化大革命肃清工交企业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修正主义影响，用文化大革命肃清薄一波的错误，薄一波不但是路线错误问题，他是一个两面派反党性质。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里举一些例子，例如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讲的很多，有几句最尖子的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放以后中国还要发展一个资本主义，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又如解放初期，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我们党员有的走富农路线怎么办？并没有坏处。又如五四年中央组织部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党？是无产阶级

半无产阶级的党，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说不要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这个思想主要是少奇的思想。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民主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放债自由、贸易自由），这就是土改以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这四大自由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杨献珍办学校，他有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少奇的思想，少奇是亲自领导党校的。五六年少奇在党校讲过，我们的党校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啦，学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少了。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再如五七年反右派进攻时，刘少奇根本不提反右斗争，不提阶级斗争，只提党内整风。以后刘邓还有许多错误，如“二十三条”出来以前，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为什么是右？不相信群众，派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以及这次文化革命期间犯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归纳起来，就是他们执行的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问题很多，在中央会上讲过了，有的没有讲，这次座谈会上又揭发了很多问题，他们对待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实际是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体系，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实际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他们发动群众的办法是上面包办代替，把一系列的框框定好，下面照章办事，不能超越离开一步。用他们的办法久而久之，我们的许多干部习惯了，久而不闻其臭，很多干部还觉得他们这一套很不错，觉得很舒服，可以不动脑筋，不触及灵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很多矛盾掩盖，群众脱离我们，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流于形式，官僚主义大大滋长。这种作法我们的干部还觉得舒服，实际上就是舒舒服服的过渡到修正主义。这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讲对立面的，是斗争的，革命的，揭露的，批判的，这样才能推动事物和社会前进，使阶级斗争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去。刘邓一套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彭、薄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很大干扰。就这一点看我们工交企业不是没有东西可革，而是有很多东西可革，我们受了资

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很深，加上我们自己有很多错误，应看到我们工交企业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应看到我们企业中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更应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大立，大破旧的、大立新的，不是大破大立就不能大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的影响，就破不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从大破大立中树立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路线以什么为武器？以“十六条”，最近的“十条”。彻头彻尾地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样工交企业才能出现新面貌、新成果。我们还会出现更大更持久的跃进，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关键，过去我们取得了两个胜利，一个是夺了政权，再一个是改变了所有制。但是如果仅仅取得这两个胜利，不把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搞彻底，不把文化革命搞彻底，人的思想不革命化，人的积极因素不能调动起来，不能兴无灭资，我们的政权就不能得到巩固。所以我们要巩固胜利，要巩固我们的成果，就必须打好思想文化战线上这一仗，否则就会产生修正主义。现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是没有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没有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中国要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就要打好这一仗。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复辟，一个是美蒋的武装进攻，这个不怕，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我们现在正大力搞后方建设，对这一点我们是有准备的。第二个复辟是和平演变，从现在已有的情况看这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都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更要防止，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因为工交系统是搞生产的，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关系如何摆法？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会议进行了讨论，任何事物总有两面性的对立统一，抓革命是主要的，推动生产带动生产解决这个关系。有人认为搞革命影响生产，这次通过的“十条”很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如果按照“十条”办事，就不会影响生产。有的同志讲生产占八小时，既然革命是主导，是主帅，抓革命的时间是否可以在八小时以上？不能这样看，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矛盾，时间用不同方法去解决，要讲重要性，革命最重要，革命是统帅，时间安排生产第一，我们强调革命是统帅，但是不能把生产时间占用过多。有时间占用一点也可以，比如个别时候搞六小时，或最高潮最关键的时候占用一点。但从总的来看，还是坚

持八小时生产，要兼顾，我们这次文化革命在生产岗位管生产的人，单纯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单纯的这样认识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成果是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为了发展生产力。它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有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以上是对国内说的。文化革命的成果从国际上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树立了一个思想革命化的典范，树立了一个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典范，树立了一个对抗修正主义的典范，这个意义就更伟大。所以光从生产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片面的。就是单纯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搞出生产成果来，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用物质刺激等，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仅仅落实在生产上，文化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单从生产的下降来评文化革命的成果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更大的胜利。当然我们要注意安排好当前的生产。文化革命必然会大大促进生产，大大发展生产，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在生产的某些部分可能受到影响，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认为文化革命失败了，这种看法是不对头的。应看到文化革命，不仅将来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搞得得好也可以立竿见影，促进当前的生产。搞得不好，文化革命期间生产可能下降。我们这个会发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文化革命期间生产上升的，一个是文化革命期间生产下降的，北京机床一厂文化革命期间生产搞得不好，生产月月下降，北京机床二厂一个车间文化革命搞得，生产月月上升。两个材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两个都是机床厂，同样在搞文化革命，一个生产上升，一个生产下降。我们工交企业搞文化革命一定要按十条办事，按十条办，只要按这个精神办，生产、文化革命一定搞得，不仅文化革命以后会出现生产大跃进，就是在文化革命中也会促进生产的发展。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的发动群众，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搞这样大的运动，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气魄，只有我们毛主席才能真正相信群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搞这样的运动？由于几千年来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对我们头脑里有很多影响，还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我们工交企业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夺

过来的，开始搞建设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还由于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中受刘邓的影响很深，对毛主席思想有很大干扰，加上我们自己头脑中的很多错误，很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对我们影响很深，框框很多，很厉害，没有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不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是解决不了的，私有制观念小破、小立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这次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首先是我们青年一代打先锋，这次大民主不但冲击了观念，不仅冲击了我们这一代和锻炼了老一辈，而且我们年青一代也受到了很大锻炼。现在看的很清楚了，我们仅仅九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年青一代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材辈出，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民主下锻炼出来的。如果照刘邓过去一套去做，去办学校，十年二十年也锻炼不出这样的人才来。这样的大民主也使我们老一代受到很大锻炼，没有这样的放手发动群众，没有这样的大民主，触及不了我们老一辈的灵魂，改造不了我们的旧思想，清除不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只有这样放手发动群众的这样的大民主，才能改造我们的立场、思想作风。现在大民主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次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但青年一代受到很大锻炼，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会出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年青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经过这样大的锻炼，我们就真正有了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这一场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在很明显，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抗拒不了。如果我们照刘邓一套同样会出现修正主义。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世界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毛主席亲自发动这样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搞这样大的民主，有很深刻的战略思想。毛主席的这一深刻的战略思想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这一思想不是今年去年才有的，自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后，毛主席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深思熟虑都是为了我们当前、长远利益，都是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为了中国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毛主席这一思想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我们很不理解，所以我们就犯错误。过去我们在战斗中经受战斗的考验，现在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大民主中经受考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很多干部仍然很不理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领导被揪了。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我们的干部用新的姿态、高姿态，也就是要我们的干部向群众认错。彻头彻尾的认错，不要吞吞吐吐，不要顾前顾后，不要躲躲闪闪，不要怕痛怕痒，要真

正承认错误，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承认错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我们相信我们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天下的事总有两面，成双成对出现的，我们的干部既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坏的一面，我们把坏的一面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群众讲清楚，承认错误，就是要把我们受到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向大家讲清楚，把我们坏的一面向大家讲清楚，这是关键的关键，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是讲到底了。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我们的党有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有不好的一面，破掉这些不好的一面，才能立新的一面，立好的一面。对立面的斗争坏的去掉，好的才能发展，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批判的、揭露的、革命的、斗争的。马克思和列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讲的本质是一样。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斗争，这一点是从事物的辩证法渗透出来的普遍规律，不批判坏的，好的就不能前进，不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就不能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先进的和落后的，有好的和坏的，批判落后的和坏的东西，好的才能前进。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批判修正主义，马列主义就不能发展，不批判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马列主义就站不住脚，无产阶级就不巩固，就会被资本主义侵蚀掉。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批判自己，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批判自己，不批判自己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批判自己不等于打倒自己，我们是不会打倒的，因为我们还有好的一面，批判了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才能发展，越是批判的好越不会倒，不批判就容易倒，事物总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过去的。你越是怕倒，越是患得患失、躲躲闪闪，越是会倒，这叫物极必反，越是怕越不批判自己，就越是要垮。我们是不想要干部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靠我们的这些同志掌握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对干部的态度总的是不让他们垮台，如果要垮就让他们垮下去，要不垮的办法就是批判自己，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干部同群众对立，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问题的关键还是有些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就不服气，这样就对立起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我们是当权派，当权派不可能没有错误，有的当权派错误严重的叫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

也有错误，也要批判，错误大的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错误小的发展下去也会变为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事物总是成对的，有两面的，都有错误，但程度不同，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在群众面前脱裤子（彻底批判），但是大量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受批判，真正这样做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扭转过来。我们要批判，就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主动检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大的决心，几年后就尖锐起来，上面讲的是干部和群众的对立。下面讲群众和群众的对立，关键也在领导，原因是什么？怎么出现的？首先我们在工作方法上违反毛泽东思想，受了刘邓的影响。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的立场、方法、工作作风，对群众的态度等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很多错误，由于这样错误有相当多的单位，带有普遍性，都有一部分群众受到压制，受压制的人当然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次文化革命以来，大民主以来，部分群众就起来闹革命，开始是一部分少数人起来闹革命，揭发问题，当时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欢迎支持呢？还是对立抵制的态度呢？过去我们压制他们，现在如果欢迎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批判自己的错误，这就不容易和群众对立起来，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态度，就必然使我们和群众的矛盾尖锐起来，这是对群众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在群众面前是采取高屋建瓴彻底检查、彻底批判、脱裤子的姿态？还是组织一部分群众保护自己的姿态？如果采取彻底批判自己、放下臭架子、脱裤子的姿态，就能发动广大群众批判自己，矛头指向自己，如果采取这种态度，对准干部，这样就会减小群众的对立，尽管主观认识有不同，如果不是采取这种态度，群众和我们对立起来，我们就会把群众之间的对立尖锐起来，所以我们要让群众彻底批判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样丢掉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得到的确是马列主义。如果要保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丢掉的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希望我们严密注意，组织人保自己是错上加错，最后彻底垮台。现在很多事实说明了被组织的人觉悟起来了，揭露得更厉害更深，如果这条不改变，那自掘坟墓。还有一条，你们对开始起来的部分群众怎样看待？是把他们看成“痞子运动”？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急先锋？在一般情况下，开始起来的群众是少数，不可能是多数，都是一些受压制的不满的人起来，总是青年人先起来，因为青年人框框少，最勇敢，然后是多数人卷进来，这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部分

人首先主要看他们大方向，看主流，不能过多求支流，因为这次文化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批判干部。群众起来既然是向这个方向开火，大方向是对的，就应肯定，缺点也是有的。如果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就是刘邓思想。所以他们起来了，首先要看他们主流，不要过分追求枝节问题，否则就不能放手发动群众，是训政思想就不能让群众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对很多事情总是有两种反映，如果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是诚心诚意把自己的旧东西冲垮，我们对群众起来就应采取欢迎的态度，如果我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刘邓框框，就看不到他们的大方向，就会对他们看不惯，看成是痞子运动，所以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一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任何历次运动都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看法。对群众之间的对立也有不同的看法，是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还是从群众中找原因？如果站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立场上，就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他们为什么会起来，首先他们受到压抑要起来革命。问题的关键，根子在于领导方面，很多问题是现象，本质是领导，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让群众批判自己，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斗，才能解决问题。否则从群众中找原因，越找矛盾越尖锐，问题越严重，因为你的立场错误，解决问题的办法错了。态度端正了、立场鲜明了、方法对头了，到群众中去敢于接受群众的批判，接受考验，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逐步把关系搞好，如果不是采取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就使我们的问题严重起来，当然我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并不是说凡是群众提出的都要解决。但有一个根本问题即态度问题，我们一定要站在群众之间与群众商量，凡是合理的，目前的确可以办到的，或经过克服困难能办到的，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办到；这些问题很合理，目前条件办不到的，我们要与群众商量研究想办法解决一批问题，有了这个态度，有的现在办不到的将来也办不到的就要反复说明道理，有了这个态度，有些问题即使不能解决，群众也会原谅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办法办事，这次“十条”是放手发动群众的，大的政策界限是明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好的。当然“十

条”没有包括很多东西，因为参加会议的同志还不了解很多情况，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业务怎么熟，不把情况了解清楚，就办不成了。了解情况这一点是任何天才、聪明伶俐、业务熟代替不了的，经验也代替不了的。这和打仗一样，打仗尽靠了解情况，如果不了解情况地形等，任何天才代替不了的，百闻不如一见，老听汇报不行，汇报的人各取所需，他是什么看法就汇报什么，甚至把大量的生动的材料去掉，有些情况下，他舍掉的又恰恰是些最重要的材料，打仗不了解情况就打败仗，办事不了解情况就办不好。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要使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扩大到各领域，改造社会，学生到工矿企业也要欢迎，外地学生更要欢迎，当然工矿企业不是停产闹革命，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指武装斗争）可以停火，思想战场不能停火，只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一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要使社会前进，必须实行辩证法，就是要破旧立新，不能挡，挡也挡不住了。文化革命要涉及到各个领域，只是打的方式不同。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命的，批判的，忽视和忘记了思想战线，或者只看到其它战线，看不到思想战线，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马列主义的，就使我们别的胜利化为无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工矿企业文化座谈会汇报提纲》送毛泽东时写的信

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了这封信。

这是谷牧同志在 12 月 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

林彪、伯达和常委少数同志当面来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发
[66] 603 号

（这一文件发至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一切革命串联，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参加工交座谈会和来京的省市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讲话

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涛。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关锋对中央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
汪东兴和童小鹏同志要我讲讲话。

大家做接待工作，这几个月很辛苦，我们应该首先感谢大家，慰问大家。许多同志做这个工作态度是非常热情的，能够任劳任怨，可是我们对大家没有帮助。从我个人来说，对大家的关心更不够，请大家原谅，并向大家致敬。

要我讲话，一定使大家失望。一个是我是一个不懂事的书生；第二个对接待工作没有调查研究，只是看了一些片断的材料，今天要讲的只是一些空话，这些空话说的对，对你们不一定有帮助，说错了会有妨碍。既然来了，我就要讲。

讲讲个人的一点意见，讲错了大家批评，送大字报小字报都欢迎。另外是不是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不要把我的讲话写成传单公布出去。可以不可以？（下边说可以，热烈鼓掌）

讲三个问题：第一，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第三，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意见。前两个问题题目很大，内容讲起来很空洞，所以说明一下，这些意见都是我个人的意见，讲错了我个人负责。

第一个问题：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比一个月以前有很大发展，形势是越来越好。当前的大好形势，主要的特点和一个月以前比较起来是什么呢？

依我个人来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广大工人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一些小城市的一些工人起来了。你想压也压不住。现在各地的大中城市工人纷纷成立了群众性的组织，我们的工会实际上并不能够代表工人，只是搞了一套“福利主义”，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意见，红卫兵起来把团中央冲垮了，现在工人起来了，他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这样的组织，那样的组织，组织起来闹革命，这件事情好得很。在前一个时期，那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曾经挑动不明真象的工人来围攻革命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工人明了真象，就起来揭发，起来进行斗争。前一个时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曾经利用工人中的劳动模范、工人中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发表他们的观点支持保守派，压制革命学生，也有的劳动模范和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上了当，现在明白过来了。大家知道东北有个叫李素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的很好，大家也看到她在报纸上写了不少文章，前几天我到东北去跟她座谈，这个同志有相当高的觉悟水平。她说，前些时候，只能从广播电台见到李素文，电视台见到李素文，讲台上见到李素文，就是柜台上见不到李素文。这个同志很自觉，运动一开始，被党内外当权派动员出来做报告，讲了一些不好的话，后来明白过来了，支持了革命学生。因此受到打击。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这不是个别的，其他地方也有。当前的特点，总的说来，就是工人起来了，投入了运动。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下边我还讲。

中央发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意见，就是除了“十六”条在工厂适用以外，还根据工厂的特点，中央发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意见，看来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工人来访来信要大量增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们能不能把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问题及早告诉我们，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同志们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事物，新形式，不可能主观的提出几条来。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实践在前，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群众干起来了，才能形成概念，有了概念才能做出规定。这十条是不是把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都回答了呢？我说没有。因为现在要搞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还缺乏经验，这十条意见只是一个“安民布告”的文件，规定十条，工人干起来了，再研究他们实践的经验，然后做出决定，主席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搞了一段，实践的经验丰富了，有一些问题才能够回答，现在有些问题，他们还没有提出来，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提出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事先不知道的，更不能够回答。这算是一个特点，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起来了。

再一点，革命的学生开始和工人相结合。有一些学生到工厂向工人学习，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一个开端是一个大事情。毛主席在十几年前，就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原理，在今天也还是完全适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有学生运动不行，学生运动不和工农结合就没有根，和工人农民一结合，工农起来了，力量就大了。学生和工农相结合，他们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得到更好的改造，得到更大的提高。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有一些学生围攻了“人民日报”唐平铸同志，把我找去了，要我和他们谈谈，我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我说现在是在搞大民主，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讲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也不怕把意见讲错了，你们也不要怕把意见讲错了，你们允许我讲错，只是大家把意见摆出来，讲错了不要紧。这样大家就发表了一些意见，有一个同学说，“现在的运动是六十年代的‘五四运动’应该允许学生到工厂去串连，当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是学生运动，后来工人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同时也有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更应该跟工人相结合。虽然今天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运动内容，性质和五四运动都不同，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这一点是应该的。”这个话讲的很对，“抓革命，促生产”这十条意见里面就写上这样一个意思。提倡革命学生与工人结合，革命学生要有计划的到工矿企业去串连，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有些同学到工厂去，还有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在不久以前，一批同学跑到第一机床厂去，有一批工人就欢迎，有一批工人就拒绝，特别是一些负责同志，鼓动工人把大门关起来，不准进去，有些同学就不顾那些翻墙头爬进去，发生了一些冲突。最近在方法上有些改进，到那里首先向工人学习，不是把自己说成包打天下的好汉，成立一个什么工作组，把工厂包下来，那不行，进去以后要听听两派工人的意见，要学会跟工人谈话，感情上能够交流了，慢慢地接触他们，向他们宣传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这样工作就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有极少数人怕革命的学生进工厂，怕的了不得，简直把他们当做洪水猛兽，如果不是一些别有用心人，那也完全是错误的。学生有什么了不得，无非是宣传宣传，贴贴大字报，发表发表他们的意见，学生的意见不对你怕什么？如果真理在学生那里，你错了你就应该修正错误。

现在的形势主要特点就是工人起来了，革命学生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今后接待工作要大量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工人运动将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许多革命学生到工厂里去，依我个人看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随着运动的发展，也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出现一系列的争执，在学生中、工人中、各级党委领导中反映出来，在我们的接待工作中也可能反映出来，也会大量的碰到一些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中央可能要做出一些规定，有一些不可能做出规定，这样就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不断地研究反映。以上所说的就是当前形势的一个主要特点。

另外，最近两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广大革命学生，广大革命工人，还有广大的机关革命干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想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没有群众性的批判那是不行的。群众性的批判，有没有过头的语言，过头的作法呢？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不可能没有，但是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支持群众进行批判。（如对×××的批判，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经过这个群众性的批判，有一些在前一阶段犯

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已经改正错误或者正在改正错误，群众性的批判促进了这些领导同志的觉悟。对革命的左派来说，经过批判也有很大的提高。有一个地方，要开大会向学生做检讨，开始的时候很害怕，学生的口号提的很高、很厉害，认为检讨以后下不了台。因为他们的检讨还比较诚恳，检讨以后，台下热烈鼓掌。事后又把那些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了，真正在工作中依靠了他们，团结了他们，对那些被受蒙蔽的同志也做了工作，这样他们就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真正取得群众的谅解，就能够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就能够重新领导文化大革命，现在有一些省就是这样搞的。

还有一些省，革命学生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他们不去冲击三级干部会，也不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并且说要保卫三级干部会，但是有一个要求，要在三级干部会议补发参考文件，他们并且搞了一些展览，把参加一些三级干部会议的省长都请去，请他们参观，给他们介绍情况，请他们吃饭，对他们很客气，还让他们看“黑”电影。所谓“黑”电影，就是在当时镇压群众运动的时候，指使一些人把它拍下来的电影，是对革命学生进行污蔑的。革命学生这样做，对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一些人启发很大。有的人说：过去认为学生那么无法无天，现在一看电影，觉得省委没有道理，省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看到革命学生这样进步，要革命，我们心里很高兴。同样，我们听到这些消息，也心里很高兴。

左派学生在斗争方法方面有所进步，必然有一个摸索过程，在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做法不适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应该责怪他们，而应该帮助他们。在座的有很多老同志，我们年轻的时候犯有不少错误，今天还仍然在犯错误，他们只是一些十八、十九岁的年轻人，看起来他们比我们高明的不知多少倍，我们那个时候看不到毛主席著作，现在他们常常比我们敏感。当然那种敏感是不是一定都对呢？那不一定。但是有许多事情比我们敏感，应该向他们学习，要相信他们，对他们的缺点不应该指责，经过实践会有很大提高，我们应该相信这点。

有人说“北京第三司令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支持的”，甚至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挥的，”有的人放出谣言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说：“反对第三司令部就是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样的话我们从来也没说过，我们也不会这样说，这纯粹是谣言。我们对第三司令部

的革命行动是支持的，没有从背后指挥过他们的具体行动，他们也向我们诉过苦，我们和他们的接触中，他们说有些学生……（漏记一小段）你不给我们出主意！？我们不能够给他们出什么主意，也不应该给他们出主意，搞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出主意可能出错了，左派要在革命斗争中摸索着前进，扶着拐棍走路的人算什么左派！斗争中出一些差错不要紧，他们会接受教训，得到提高，那就进步了。这就是说，最近以来，革命左派队伍发展壮大了，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当然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中央开了工作会议，主席讲了话，林彪同志讲了话，周总理讲了话，陈伯达讲了话，由于上下两方面的原因，各地党委有了变化，有的地方三级干部会议以后下级干部起来造反，因为有一些省委领导被一些受蒙蔽的学生弄去了，有一些躲到军区去了，那些下级干部就起来选举自己的领导小组，领导三级干部会，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讨自己犯过的一些错误，这也是很好的现象。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事情要看本质，要看主流，不要被现象所迷惑。现在的形势大好，运动在不断发展，这是本质，这是主流。我们不要被一些现象、一些假象所迷惑，不要被谎报军情的东西所迷惑。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谎报军情。在中央十一中全会开会的前夕，团中央的胡耀邦就谎报军情，说有五十多个学生去批判他们，围攻他们，要求罢胡启立的官。胡耀邦这样向中央谎报军情，说他们受包围了，要立即罢胡启立的官，他就要中央表态，说现在要不要纪律，罢官要不要中央批准。其实当时的学生那有今天这样激烈。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我们提出议论，是不是谎报军情？可是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不以为然，就叫我和王力同志去，我们去看了看，果然是谎报军情，有什么围攻，就是几个人坐在那儿谈话，要求罢胡启立的官，并没有要求非答复不可，当时胡启立不承认错误，我当时批评了他，他就在学生面前反驳我，他说：“这些错误都是右派搞的，自己没有错。”在学生面前不敢承担一点责任。今天也有谎报军情的人，今天谎报军情的人是通过他们动员来的学生、动员来的工人向中央、上接待站谎报军情，我们千万不要贸然相信。前几天就有一个地方，向我们反映说工人与学生发生了冲突，抢走了三挺机枪，还有子弹，我想这下要搞武斗，可不得了啦！后来一了解，没有这样的事，武器放在那儿好好的没有人动。所以我们不要被假相所迷惑。

不要被支流所迷惑，要看清本质，看清主流。

我上面说的形势大好，是不是因为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停止了呢？没有停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采取的一些花样，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运动还会有反复。我上面说的那两种人，他们也打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和我们对抗，因为广大的革命群众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他们也拿起这个大旗和我们斗，打起这个旗帜来煽动一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斗一部分群众，制造流言蜚语，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套强加在革命左派的头上。鲁迅曾经说过，有些人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他们这些人就是借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来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也有一些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在《红旗》十二期社论发表以后，（《红旗》十二期是根据林彪同志讲话写的。）有的地方就利用了这个东西，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来作报告，下动员令，抓“黑鬼”，（这里名堂很多，有的叫“假左派”，“真右派”，湖南叫“黑鬼”，山西叫“伸手派”、“野心家”，）他们说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什么“黑鬼”，就是什么“反革命”。中央提出一个什么口号，那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加以利用。列宁说过：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利用我们革命的口号，进行他们反革命的勾当，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躲在幕后，更隐蔽地进行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武斗，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后把他们干的罪恶活动强加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现在不是有这样的论调吗？十一中全会以前，如果说有错误是由那些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负责，十一中全会以后，群众斗群众由谁负责呢？言下之意，因为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那你们得负责。当然中央文革小组有错误应该负责，特别是我个人有错误完全可以批判，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大规模的武斗，那个不能够由我们负责，那应该由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负责，你的流毒还没有肃清，还必须由今天在幕后指挥的人负责。现在武斗的现象，我个人看来有发展。打人我看也应该加以分析，有三种情况：一种就是革命群众出于义愤，打

了黑帮几下，我看这没有什么，不能够去责怪群众，当然我们不提倡，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够触及灵魂。再一种，小孩子一时糊涂，互相打起来了，说明白问题就解决了；再一种性质就不同，有人在幕后操纵，制造相当大规模的武斗，这后面就有一只黑手，在那里进行破坏，据我们所了解，搞什么拘留后，抓人打人，打的非常惨。因此，我们搞了一个通告。他们这些人，不简单，提出什么“法不制（治）众”。我怀疑这句话还是出自少年之口，我看这是有老子在后面指挥。现在看起来，犯错误路线的同志有的回头了，有的人觉悟起来了，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会负隅顽抗，这些人总是错误的估计形势，企图反扑，躲在幕后支持一部分群众和另一部分群众对立，进行武斗，他们是“坐山观虎斗”，自己费不了什么力气，这样天下就大乱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一时不明真象的群众受了他们的蒙蔽利用，一旦明了真象，就会起来揭露他们，抛弃他们，斗争他们。大多数人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一旦明白过来，就会造他们的反。学生对资产阶级的新反扑，体会得比我们深，在街上写了很多标语口号，这些标语不一定都妥当，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在后面指挥，因为他们看出了是资产阶级的反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旦群众明白过来，他们就会垮台，不是说，今年“一二九”要搞什么活动吗？并没有搞起来，那些人是想激怒我们，让我们犯错误，然后抓我们的辫子，在这里我们要非常冷静，不要被坏人激怒，坏人只是少数，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大多数。

在《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就有那么一批学生到《红旗》杂志来质问，我看那些学生是好的，跑到红旗杂志来，我和戚本禹接见了他们，见面以后他们对我们不客气，他们要主持会议，我说，你要主持也可以。他们提出质问说，到底是十二期社论对还是十三期社论对？我们说，都对。他们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底有没有？我们说：有。你们不是看了贴了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吗？这不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呢？他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们说确实存在，而且必须批判。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步也没有让。当然我们也说，是不是每句话都对呢？让时间来考验吧！现在幕后操纵的坏人，利用群众的名义，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干了一些坏事，干了一些工作组不敢干的事，工

作组干了要承担责任，幕后指挥的人反正我不出面，一切后果我一点也不承担，是你们群众干的，跟我没关系。现在居然有这样的事，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中学生活活打死了。就在前几天，有一个学生贴了一张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受到围攻被迫自杀。自杀后背后被人捅了四五刀，那个学校有个学生给陈伯达写信，连名都不敢署，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呢？前几天，我接见了一批工人，事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组织的，两派工人都来了，势均力敌，一方六个人，反市委的六个人，支持市委的六个人，在会上就吵起来了。不久以前，在那个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打伤一百多人，被打伤的有工人，有学生，轻伤来了重伤没有来，有的现在还在协和治疗。他们所描述的情景当时我听了都止不住要掉眼泪，因为两派人都在场，不好表明态度，不然要吵起来，止不住要掉眼泪怎么办呢？我只好把帽子一个劲的往下拉。另外一派，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他们来的时候，工厂里还发给他们五十元钱，人也多，所以对我们这些接待站的同志说应该有一个清醒头脑，有一些是民方的代表，有一些是官方的代表。当然官方代表当中有些人是没有觉悟，将来是会觉悟的，这些人来了都要到接待站反映问题，前一阶段看传单也能反映出来，官方派的传单纸张好，标题最大，非常醒目，并且有的是随着省委的报纸散发的，造反派就不一样，他们的传单是油印的，最近这样的情况是不多了，而用的是告状的办法。总而言之，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然魔高一丈，道高十丈。

在接待工作中接触一些现象，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来分析问题，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来分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要有一个正确的、基本的指导观点，不要跟着现象跑，不要轻易相信，这种意见，那种意见，不要听到什么就发表谈话，帮助他们谎报军情。

红旗杂志有个接待小组，在接待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有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就是说话没有个准头，有人提出一些问题套他上勾，问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还是连以前的也批判？批判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转移斗争目标。这个问题本身是一般性的问题。那位同志就发表了谈话，他说：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前的有以前的政策，现在有现在的政策。正是给人家作了武器。那些人就回去大做文章，说什么走访红旗杂志社，得到一些指示，利用谈话结合他们的情况大

肆反扑。我说这些话你们不要传出去，不然又要到红旗杂志社去造反。我批评了那个同志，最后由红旗杂志社文革小组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某同志，伯达同志有指示红旗杂志接待组只是倾听群众的意见，无权解决各部门具体意见，某同志那个谈话有错误，欢迎批评，这个大字报贴出以后就有人来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澄清，过去你们发表那么多的谈话都没有发表声明，单这个谈话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把我们围攻很久，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志要顶住。某某人发表谈话，他利用这些东西跟你斗，走访红旗杂志，又是某人发表的意见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所以我们搞接待工作的人不要轻易发表意见，不然很容易上当。

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

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分析的课题。林彪同志讲话讲了这个问题。根据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做了原则性指示，我们做接待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在接触这个大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好些同志不习惯，看不惯，甚至抵制。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对这个东西也不自觉。林彪同志的讲话讲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大民主，就是发动亿万群众来监督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负责人，监督我们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对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各负责人进行批评监督，意义非常重大，对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蜕化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列宁在逝世以前，曾经提出怎么样改组工农监察院，同时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谈到这个问题，列宁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有变成官僚机构的危险，怎么办？列宁有很多没想，当时主要是改组工农监察院的设想。但是当时由于实践经验的限制，他不可能象今天毛主席这样提出大民主的方针出来。用民主这个方式来监督我们的国家各级领导机关，这是非常重要的。造成一种社会空气，群众可以批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宪法给人民的自由民主，真正变成实践行动，这样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将发生深远的影响。有一些省的负责人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今天叫群众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省委第一书记做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做过检讨，历次运动又是整下面，更没有向广大群众公开做过检讨。当然要这些同志公开向广大群众做检讨是不容易的，我看叫群众冲一冲没有什么不好。大家知道前几年安徽发生什么事，山东发生了什么事，腾景禄是舒同的第一打手。腾景禄

搞的简直是法西斯专政。有一个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的爱人就向省委告状，同时要到北京来告状，腾景禄知道了这个事，他就指使公安局派便衣队把那个人抓了去，关到公安局，关了一年多，中央长期不知道这个事，如果搞大民主的话，那就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贴大标语，到北京来告状，把大标语贴在天安门前，这样就可以查清。

没有群众监督，象我们这样一些人，包括我在内，有什么办法不和平演变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新的事物，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好些高级干部被贴了大字报，大标语，我们用往常的习惯概念看起来觉得很不顺眼，这是没有从根本想想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过：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条让他得逞，再一条就是造反。怎么造反？在国民党统治我们的时候我们造反有经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出了修正主义怎么造反？如果没有大民主，我看那些野心家会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可以用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套，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压下去，我是上级，你是下级，你得服从我，用这一套推行修正主义的东西，你怎么办？造成大民主的空气，出了修正主义就起来造反。我们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国家可以保证不出修正主义，是不是能够说得那么绝对，不能够说得那么绝对，如果万一几十年以后出了修正主义的话，群众就可以上街，就可以游行，结社来反对。群众说毛主席这样干，如果怀疑错了，也不要紧，过去怀疑错了，领导同志也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关到公安局去。如果你反对群众搞大民主，不允许群众搞大民主，就公开把自己置于反对毛主席的地位。他们要反对大民主，要抓人，自己就剥去了外衣，就会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共诛之，共讨之。我们各级领导机构没有群众监督不行。这里我想说一个例子，前北京市委最高法院的事，六五年上半年我和戚本禹在一个地方搞四清，因为刘仁在北京北庙蹲点发表一篇修正主义的讲话，戚本禹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把我的名也写上了，这一下就把刘仁、彭真得罪了。以后我们那个队搞出一个漏划的富农，此人是北京市培养的党员对象。贪污盗窃且不说，就在六二年困难的时候，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配合蒋介石的活动，把生产搞坏，我们一配合，共产党就要完蛋了。各种材料证明，这个不但还是个漏划的富农，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后来逮捕了，在审讯过程中诱导罪犯翻案，他们不仅诱导翻案，还在这过程中审讯工作组。工作组撤出以后，

刘仁、赵凡指示法院、公安局几个人组织一个调查组，群众把它叫做翻案组，到了那里撇开新建立起来的党支部，撇开新建立起来的大队小队贫协，单找那些地富反坏、四不清干部了解情况进行翻案，有一个四不清干部不愿意翻案，就对他进行威胁。这些材料是证据确凿，可是当时我们没有办法，准备挨整。今年文化大革命中法院提出了这个问题，开始他怕搞不开，后来他们那个文化革命小组几次找我和戚本禹了解情况，由于当时工作很忙没有见他们，我说了解情况不多，那个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了解得多，据我看把贫下中农请来最好，后来他们请来了五六十个贫下中农参加他们的斗争翻案大会，经过他们的揭发帮助了法院的革命群众，贫下中农摆事实讲道理，讲得很有说服力，没有贫下中农参加就斗不下来，贫下中农他们感受翻案的压迫深，他们知道事实最多，这样就斗下来了。有的学生群众要冲击你们的机关，你就叫他们进来。你们看北京高级法院把贫下中农请来，开了两天会，帮了他们很大忙，起了很大作用。贫下中农向我们讲些问题，讲些意见，我们坐机关的同志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你不听听贫下中农的意见，翻案组就斗不下来。政法学院的学生要冲击高等法院，你叫他来，为什么不可以，北京高级法院请了贫下中农来，革命同志满意，贫下中农也满意。从许多材料看，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大民主，没有广泛性的群众性的大民主，怎么能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质，我们的同志不变质，我看大民主是保证我们国家不变质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联系群众的问题，在座的有不少是打过游击的干部，我们当时联系群众是不是自觉的，对我个人来说，不是那么自觉的，并不是真正懂得毛主席关于联系群众的理论，因为那个时候客观有压力，你不联系群众不行，在游击区你不联系群众就没有吃的住的，群众不理你，你就活不下去。那个时候，虽然不自觉，毛泽东思想也不多，可是客观形势逼得我们非联系群众不可。以后进了城，住了大机关，就不联系群众了，不象当年，不联系就无法过日子，今天，不联系群众，可以躺在床上，坐在沙发上，日子过得满好。这样，如果没有大民主，包括我在内，官气是难以打掉的，这是一方面。

另外方面，恐怕有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还要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极少数坏人是不是利用我们的大民主，干一些坏事呢？应该说是有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保证这个大民主。这次运动对我们各级领导机关是一个很重要的

考验，也是对我们专政机构一个严重的检验。据说有这样的事，有少数组学生（这些学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跑到我们公安部门，把一个民警打得头破血流，打了以后，这些学生名字也不留，问他名字怎么也不说，怎么处理呢？不留名字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只好用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走。这一下民警很不满意。要起来造反。虽然说我们国家专政机关决不能动用武力镇压群众，但是还要坚持原则，不能够软弱无能。有的地方，由于专政机关表现得软弱无能，造成了白色恐怖。我前面说过，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被迫自杀，有人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连名都不敢署，象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大鸣大放大民主呢？杀了人能够逍遥法外！有的地方对中央发的通告不理采，这是不对的，必须坚决执行。十六条不是也有规定吗？对那些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应当依法处理。文件上已有明文规定，有的人就不敢这样做，我看今后这方面要加以注意。还有这样的公安人员，革命学生向他反映那个地方刺杀了人，你们知道那个公安人员是怎么答复的？他说，现在专政权力下放，人人可以行使专政的权力，我们不介入。我们只是说双方争论我们不介入，打死人，杀人你公安部门怎么能不管呢？没有大民主，不能够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但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人民的民主。至于具体的作法方面，步骤方面怎么样搞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斗争中不能表现得那么软弱无能，有一些人屁股原来就是坐在那一边的，支持一些人搞破坏，给他们出谋划策。中央那个通告，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有他客观的原因，一些造反派把他叫成大毒草、大阴谋，因为那个通知是经过省市委的，有些省市委是镇压革命群众的，你发那个通告，人家就不相信，所以中央最近又发表了电报，要各省市印上中央批准的字样，我看要革命的人民是会拥护的。有些坏人，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利用了这个东西。“刚才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个问题，说中央那个通告为什么造反派要反对？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由于我们考虑的不周到。我们有的接待站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你们不应该同地方上勾结起来，到招待所抓人，他们说是坏人，到底是不是坏人我们不清楚，如果是坏人也不要抓，坏人送上门来他也跑不了。所以我们对一些问题要有分析，不要光听一面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意见

关于接待工作，我看我们大家是不是要有这么两条，一条就是要有两个“极端”，对群众要极端的负责，极端的热情。这是对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再一条，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是站在那一条路线上，是自觉的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呢？还是不自觉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边呢？这两上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具体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同志们搞接待工作很辛苦，困难也很多，前几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诉苦的，那个材料虽然是诉苦的，但是有道理，在一定意义上我同情你们，因为我们对大家的帮助太差了，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给大家讲一讲，在十一中全会以前，我们的认识还不够，也不好讲，十一中全会以后，应该说也可以说了，可是我们没有组织大家学习，没有帮助大家对两条路线对立的特点、实质、内容搞清楚，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头脑就会清醒一些，从这方面说我同情你们，我自己也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诉苦以后还要罢工，这就不对了，我们应该象毛主席所说的对群众的事情要极端负责，这里就包括任劳任怨，我们做错了事，讲错了话，群众为什么不应该批评呢？就是我们没有做错群众误解了，骂我们几句这又有什么了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是一个锻炼，如果你是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那么接待工作也就搞不好，十几年来，干部自以为民之父母，现在反过来了，是人民的儿子，你不放下架子那怎么能行？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无非是批评我们一顿，这一条要认识清楚，我们相信大多数接待人员是要革命的，但是都有一点跟不上形势。在座有个叫吴先容同志（记录），跟他不太熟悉，我经过一件事感到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今年六七月份能够来支持科学院的群众革命行动，在跟他接触过程中，他的态度很明朗。后来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自觉的，后来也是跟不上革命形势，工作抓不起来，跟不上革命形势，这不奇怪，我也是这样。江青同志在“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讲，她说：“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就是跟一头、追一头，我这个人跟一头也没有跟好，追一头也没有追好，有时候似乎懂了一点，事情一变化又跟不上了，大家提意见，说领导上帮助不够，这是对的，但是，特别是在座的老同志，应该强调一下自己的主观能性，要独立思考。我在这里谈一下丁莱夫同志，在今年四月十六号，《北京日报》不是搞一个假批判吗？丁莱夫同志就把那篇假批判文章给广播了，五月

份在一次会议上我和他吵了一顿，那个事情是个大事情，当时他跟我吵，理由是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通知他，所以广播了。这个老同志不应该强调这东西，我当时跟他说，如果彭真反动政变搞成功，谁给你打招呼？他拿几个政变的文件用什么名义要你广播，你是不是给他广播？那么老的一个同志，还要强调人家给他打招呼？做什么事，要想到对党对人民负责，对我们的老同志来说应该强调自觉性，主观能动性。

在接待工作人员里头，有没有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呢？有没有我不太清楚。如果有就应该揭发，就应该批判。“比如说许民同志就应该检讨，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我说的不对你们就批判我。”我们的同志作了很多工作，有的工作做的不好，这不能怪大家，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要革命，要革命作错了事不能责怪他们，只要改正错误吸取教训就可以了。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人，应该领导好而没有领导好，把工作搞坏了，这就应该负责任。比如，商业部，煤炭工业部那些机关的招待所工作就搞得很糟糕。如果我了解的情况不确切，调查研究不够，说错了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我们是一个接待站，怎么能够去挑动或者支持一方斗一方呢？支持什么“八二五”战斗队，也可能一方有坏人，但是我们要相信坏人是少数，你支持的那一方就没有坏人吗？很难说，你们参加到一方去，给人家出谋划策制造纠纷，又不请示报告，这不是群众斗群众又是什么呢？就是在红旗战斗队有一个叫什么海的，在商业接待站政协俱乐部旁边搞了一个拘留所，在那里残酷地打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把人家打的很残酷。这个事情李瑞桂同志当时告诉了熊××同志为什么不报告，我们发现了那个拘留所，批评了接待站的同志，许民同志，当时也去了，据李瑞桂说，到底是什么搞不清楚，还有的地方到招待所抓人，据说抓的那个人是拿了公安厅的公函，据我了解不止一个，有的同志说招待所和接待站，带了公安厅的公函来抓人给不给他抓，我们应该有一条，不帮助地方上到招待所捉人，他可以向我们反映问题。为什么不帮助他抓，就有一些好人被人家污告了，跟公安局勾结起来，捏造一些事实，叫公安局出公函，虽然他有公安厅的介绍信，也不一定是真的，我看不允许他们抓好，如果抓的是那些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样我们就容易上当，就要犯错误，据我得到一些反映，张文彩同志做了许多很不好的事，刚才说支持招待所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他至少是一个执行者，如果说的不是事实，可以批评我，给

我贴大字报，现在外头还传说，张文彩是江青的秘书。这一派说，那一派也说他是。张文彩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这个事实？还有人说，有人当着张文彩的面说，你是不是江青同志的秘书？张文彩说你看我是不是啊！当着人的面搞的那样真不真假不假的，这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企图？

在我们接待工作中，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我看大家要考虑。有就要批判，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或者那一件事情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应该检讨。就应该揭发。李瑞桂同志在公开的场所，说他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关于张文彩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李瑞桂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我们都辟了谣。

在我们发觉政协俱乐部旁边的拘留所以后，李瑞桂就去（责）问我们，说你们“解放军报”记者怎么搞的，把我们破获反革命计划给破坏了。你有那么一个伟大的计划，为什么不拿出来，跟中央商量呢？而把那三个革命师生放在那里被人家严刑拷打，有那一条法律能够允许这样做呢？还是中央通告以后。据说现在有人把责任推到李瑞桂一个人头上，如果这是属实的话，那是很错误的，为什么把错误推到他一个人头上，李瑞桂同志你应该出来揭发，自己的错误也应该出来检讨。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相信，接待站的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能够适应当前的斗争形势，不能够适应工作的要求，说了一些错话，出了一些岔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属于这方面的错误也不难改正，首先要怪我们领导，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但是由于帮助的不够，我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就要求我们加强学习，发现路线错误就跟他斗，在工作中我们要任劳任怨，我们要想一想，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好同志被那些执行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打伤了，杀害了。贴第一张大字报被人家活活打死。这当然不是太多的，也不是极个别的。我们要想想人家受压迫，想想人家要革命的精神，我们受一点苦，受一点累，受一点埋怨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做工作就是要任劳任怨。要想到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我们来接待毛主席的客人，这里就要我们好好地动动脑筋，想办法，把工作做好，这样就可以帮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下情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接待站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晴雨表。“六一”事件以前、“六·一八”事件以前来的学生就很多，以后呢？来的学生就少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呢？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为什么有的时候来的多，有的时候来的少？十一中全会

以后，那个段落来谈的问题都有一个中心，我看每一个时期来反映的问题都有一个中心。这些问题就要我们很好的研究，可以向中央反映情况，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中央就可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接待站的工作重要，是群众向中央反映问题的渠道和纽带。当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哪有时间来研究，一天上了班，到下班，搞的精疲力尽，没有时间分析研究问题，这是事实，能不能够想一个办法来解决一下呢？前几天我和汪东兴同志、童小鹏同志、王力同志在一起研究了一下，汪东兴同志发表了一个好意见，他说是不是整顿一下接待站的工作，把人力调配一下，比如说我们接待站有四百人都一下弄上去，有那么三百来人去搞接待工作，和群众接触，留下一百多人，等那三百多人搞了五六天，把一百多人补上去，换下一百多人，就让那一百多人在那里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如果这样替换几次，那么工作质量就会提高。刚才我说，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中心问题，我们就对一些中心问题加以研究，把各种意见反馈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建议，这样对我们的工作就帮助很大了。你们帮助了我们，反过来对你们也有帮助，是不是可以想这样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能不能够实行？有待实践和检验，我看工作困难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工作中碰了钉子，犯了错误，接受了教训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好，主要是要有这样一个革命精神，要有两个极端，极端的负责，极端的热情；再一个就是抽出时间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的政策，我看工作是会做好的，会变被动为主动的。

接待工作搞了半年多了，是不是要总结一下呢？分几个阶段来总结，十一中全会以前，群众的来访中心是什么？我做错了那些事，是怎么做错的，我做对了那些事，又是怎么做对的，有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国庆节的时候群众来访来信又是什么中心，我们是怎么做的，又有些什么教训。研究研究，群众提问题为什么有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些什么？你们经过研究自己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够解决的提出来，领导上帮助你们解决，今后的接待工作要根据前一个阶段的摸索取得经验加以改进，这样搞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我看会更好一些，有的接待站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一些来反映情况，经过一段时间，把他集中起来，请中央同志来接见解答，至于那些重大的问题，个别的问题，那只是少数，大多数的意见

和问题，可以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分析来解答，我看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你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研究一下，中心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被动的局面变为主动的局面，我看大家研究研究会有办法的。

请同志们不要误解，我不是来批评一般的接待工作人员的，你们提出了一些困难，有些意见和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但是要罢工就不对了，这里我只是提，大家在工作中要任劳任怨，我们一些老同志应该独立思考，领导错了就应该批评，如果你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该批判应该揭发，我们也欢迎那些同志改正错误，有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不敢下断语，我所知道的，你们那里有一个叫许明的人，做了些很不好的事，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可能你们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一些，也可能我说错了，说错了就请大家批评我。好吧！就讲这么一些。讲错了请你们批评。我的讲话也可能是毒草，是错误的东西，是毒草就应该铲除，说的不对，我下次再来承认错误，你们递了很多的条子，有的在讲话当中回答了，有的没有回答，我们要回去研究研究，我们很重视你们递的条子，一定要很好的研究。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今天想给你们谈谈领导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中央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你们看了吗？

（众答：没有看。于是刘西尧同志当场念）

十一中全会四个月了，这是四个月摸索的经验总结得出来的。大的原则十六条有了，这次比十六条更进一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以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党政机关为主。十一中全会已有四个月了，从五月十六日起算已七个月了，接触了一些工厂的情况，比十一中全会初期更加前进了一步。我是九月七日到你们那里讲话的，当天有社论，（按：指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九月十五日有农村五条、工业六条，十一月十日有《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群众把社论冲破了一些，领导同志和干部也不大懂，运动比设想的更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比如红卫兵接待外地师生，我们认为一百万就差不多了，你们也认为耽误生产，我们赶紧号召大学欢迎，态度不好的，我们批

评了，把学校占了一些，十一月来势更猛，冬季到了，大家赶着来，我们准备一百五十万。主席说：“准备二百万、三百万。”现在整个是接见了一千一十万，设想被来势冲破了，这时看你采取什么态度，应该欢迎，拒绝就是保守。碰到新鲜事物，是进步的就支持。林彪同志跟主席跟得紧，我们也要紧跟，一点明就跟。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贴，谁知道有这样的形势，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有梦见，你们梦见那是你们。潮水总是要涨的，每年涨潮，（问一个同志）你看见过涨潮吗？哪一年高，只有到现场才认识，去弄潮。如果怕，可能会被潮水吞没下去。站在旁边就是观潮。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吞没的，观潮的三种。

柔石写《二月》的时候，鲁迅是观潮的，那时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我们是弄潮的。后来柔石牺牲了，过了快四十年演这个电影是堕落了。一个革命者，有革命壮志就可以跟上形势。

（总理指着“十条规定”说）

不会每一个规定都准确，经过了四个月，好一些，也不能再具体，太具体反而束缚了。大家可以比较，是进步了。在同志们中争论多的是抓革命促生产，主导是革命，抓了革命就可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就错了，不是真革命。有的人口头革命，使革命、生产都未搞好，那就更错了。

十六条强调思想革命化，来促进生产，这是用狠抓革命来促生产，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群众成立了组织，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文化革命是中心，阶级斗争是纲，以革命促生产，就是深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来促生产。

第三、四、五、六条是说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八小时工作，业余闹革命。科学院重点工作要八小时，不太重点的可以把工作时间占用一点，将来思想革命化了以后再补。机械生产不允许这样，你们很懂，有一些确实要八小时。有一些不一定，思想革命化以后六小时可以做八小时的工作量。劳动要遵守纪律，要提高质量，生产没搞好是思想革命化没搞好。

我们用革命推动了一下业务，两弹上天是事实，有的参加试验的人的家都抄了，是高级知识分子。抄家不对。把保姆解雇了，夫妻二人都上街买东西，但革命意志仍旺盛，两弹还是上了天。这是要很准确的，核弹在天上掉下来可不行。

红卫兵不知道，看他们生活高了一点。以后我们要减少差别，减少资产阶级法权，有人对这不满是合理的，但抄家在行动上不十分恰当。科学院抄家的很少，你们做了这个工作。真正的革命者总不会影响工作。

关于老干部，揪了几天，有的比较好，有的有闷气，还是应该心情舒畅，要在革命中经风浪，既经受革命考验又搞生产。

搞一个生产班子。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以前总是要有统一领导，《人民日报》社论上也有，但我在科学院试验失败了，要谁来统一领导呢？中央不能派，这等于工作组，张劲夫拉下来了，裴丽生又不行，你们同意，我们也不同意，我作了各种试图都不行。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一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全，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第七条是矛盾如何解决。应该自己解决，不要跨级。一闹就到我这里，我不能一请就到，这样耽误了你们。党委现在不行，也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允许他犯错误，让他改嘛！

主席不赞成功不动就停职检查，应放在后期处理，停了职他休息，不好锻炼，群众也不好监督。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

今天在北京体育场斗旧北京市委的彭真等六人，彭真是两面派，你们对彭真还不如对张劲夫了解，对彭真你们只是粗线条的了解一些，就知道那么多材料。今天有七个人发了言，只能讲那些，其实彭真的罪恶大得很。可是他现在最轻松，当然，精神上不轻松，他不可救药，只能靠边站去了。如果是一般的，就应该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处理，就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继续游泳。

第一种人是善于游泳，自由自在，如主席仰游长江那样。

第二种人有勇气，有干劲，不会游，喝了水，学会了。

第三种人不会游，又怕，不敢前进，慢慢退回来，就落伍了。

第四种人又不会游，起又起不来，最后淹死了。

不外是这四种人，大多数人在游泳中，不怕喝水，敢于喝水。

主席一般不主张停职检查，停职了反而不好处理，不好做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也不要保，靠自己。以前我们保过，比如说民主人士，年纪很大，快死了，何

必一棍子打死？如章士钊，反动的东西很多，但近三十年来不反共，对我们同情，解放后，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他八十多岁写了三十万字的柳（宗元）文，这是古典文学，他是拥柳的，柳宗元文章严谨，有独立见解，这是纯古典文学，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可供参考，但不作主流。文章写好后，准备印，正好文化革命开始了，没有印，否则会被批得体无完肤，现在看来还算有先见之明。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我们保了，后来红卫兵要他在门上写一付对联：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红卫兵有很多起，要是今天去一起，明天去一起，他骨瘦如柴，八十七岁，几天就完了。

干部要在风浪中考虑，身体不行，可以修养，养好了再批。革了几十年命，政治思想不好，不可救药，身体还是要养好。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不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有矛盾要自己解决，斗争矛头要向上不向下，矛盾不上交。在科学院，革委会不好成立，大体上两派还存在，经过思潮起伏，要在大原则上团结多数人，这还需要一个过程。革委会可以做一些联合的事情，如对外，这有好处。有矛盾自己解决，不好解决时，双方谈判，非万不得已矛盾不上交。工厂更是如此。

第八条是不要互斗。第八、九、十条都是这样。第八条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压制了的，办错了的要平反，不要压。矛头反过来对领导，在科学院，矛头对院党委，第一名是张劲夫，但也不限在张劲夫上，整个院党委都要批，他们要彻底检讨。

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要自觉。参加过一部分领导，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把院里搞完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查。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查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自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第九，第十条属于群众之间。要文斗，不武斗。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解决。工人有组织权，你们已经实现了宪法。只要接受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各派组织都允许。有激进的、（左的、

造反的）中间的、保守的，各派竞赛，人的思想会有变化，各组织的成员也会有变化。初期组织多是正常的，科学院现在有十多个，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一个时期。在串联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现在学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联，只要不妨碍业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一般在本市进行业余串联，必要时可派代表进行上下串联，或者轮流出去。上次我接见六个分院的代表（按：指十二月八日的接见），答应了可以串联。但长期串联不行，业务要保证，必要时派代表轮流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人数要少，时间十多天，他们很赞成。工厂也可以这样，以后要讨论。

这个文件（按：指“十条规定”）供讨论和试行，在试行过程中，可提具体措施，提上来明年修改。

这个规定是九日公布的，我想用科学院作试点，今天首先召集造反派、左派的同志，以后还有别的同志，然后提方案报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

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越来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

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扫除一切绊脚石，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是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有些人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并没有做认真的公开的检讨，不肯给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他们还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群众，继续组织被他们蒙蔽的群众，来打击革命左派。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包庇他们自己，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人，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

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来打击革命群众，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坚决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派工作组也好，不派工作组也好，撤了工作组也好，只要是采取这样的反动方针和反动政策，就是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形式，而在于实行什么方针，什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由原来的负责人领导，也同样犯了错误。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实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并没有犯错误。

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来整革命群众，来压制革命。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在幕后，操纵受他们蒙蔽的学生群众组织、工

人民群众组织，挑拨离间，制造宗派，挑起武斗，甚至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这些人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这样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最愚蠢的。他们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一些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觉悟起来，揭发他们，反对他们。群众的绝大多数总是好的，总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暂时受蒙蔽的群众，一旦认清了那一小撮玩阴谋、耍诡计，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的真面目，就立即会唾弃他们，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坚持文斗，不许武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个政策对无产阶级有利，对革命群众有利。只有坚持文斗，坚决反对坏人挑动群众之间进行武斗，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故意制造事件，挑动武斗，就是为了破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有不同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在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必须认真改正错误，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认真改正错误，就要：（一）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作检讨；（二）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实行真正平反，给他们恢复名誉；（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错误推给群众、推给下级，要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四）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五）

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广大群众，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实事求是的。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做到以上几点，就能够获得广大革命群众的谅解，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就能够做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那就非垮台不可。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开展以来，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每个革命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列宁说：“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为指南，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各种现象，分析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的动向，研究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和提高领导核心，进一步提高斗争的艺术。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和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商量，讨论问题，善于团结广大群众，要欢迎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刊登王力 贾一学 李鑫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这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各国范围内，在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主义世界，都以不同的形式炽烈地进行着。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国家政权问题。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还说过，谁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保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法宝。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从来都是识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试金石。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政权以前，要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政权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造旧经济，组织新经济，搞建设，搞教育，没有认识到，国家政权还可以被资产阶级夺过去，无产阶级还可以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早就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后，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又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国的事件，使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个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极大的注意，认真地加以思考。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研究和总结了中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着矛盾的，存在着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承认这两类矛盾，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才能不断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贯穿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不引起警惕，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就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故意抹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事实，矢口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赫鲁晓夫是这样，赫鲁晓夫的门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也是这样。

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谬论，是为了维护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们对苏联人民的反动统治。他们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正是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实际上，他们自己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用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说法，作为实行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根据，来欺骗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掩盖他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行为。他们完全背叛了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最害怕的是苏联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同他们展开阶级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同志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人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消灭他，他要消灭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否认阶级斗争，逃避阶级斗争，而应当领导无产阶级，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因势利导，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反动路线，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它在党内是有一定市场的，这就是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的人。而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则把这条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乘机兴风作浪。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在我党历史上最深刻的斗争。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搬到社会上来，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每前进一步，都经过激烈的斗争，都经过克服社会上和党内的各种阻力。几个月来，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使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更加自觉地拥护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断变换手法，采取新的花样，来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是，随着势不可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断遭到破产和失败。

在半年的时间里，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刷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垢，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真正的大革命，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大变动，触动了人们的灵魂。无数的新事物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使得一些人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掌握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的阶段。

我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紧接着，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行了一场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日益突出起来了。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利用他们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有相当的优势，利用旧的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来腐蚀群众，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扩大阵地，制造复辟的舆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

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改造人的灵魂，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这样的大革命，只有依靠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搞深，搞透，搞彻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把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穿着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对群众，反对革命，反对和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懈地进行斗争，群众运动的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

义的新事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和勇敢，就在于当这些新事物刚刚萌芽的时候，给予有力的支持。

红卫兵，就是这样的新事物。在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的支持下，一小批红卫兵迅速地在全国各学校、许多工厂和农村发展起来，成为浩浩荡荡的群众革命队伍。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斗争，敢革命。他们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广大的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人。坚定不移地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就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的、锐不可挡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正在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我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的重点，就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钻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式的坏蛋，是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炸，就会发动赫鲁晓夫式的政变。

在这场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他们被揭露出来，被斗得威风扫地。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

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支持革命群众广泛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这些大民主的形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

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他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群众都可以批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在群众之间，在各个群众组织之间，也要实行大民主，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们所实行的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没有这种大民主，没有亿万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就不能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就不能防止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同时，无产阶级专政是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有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正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所以敢于和能够实行这样的大民主。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我国形成。

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

我国已经有了一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一些学校，还没有打破或没有完全打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框框。一些文化领域里的阵地，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在资产阶级手里。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改变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这些阵地的现象，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域各界的领导权。

经过革命的大风大浪的考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发展和壮大。革命的青少年和红卫兵，正在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正在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

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少年，正在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可靠的接班人。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要把全国办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工、农、兵、学、商和机关干部，都要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逐步做到能文能武，亦工亦农，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旧框框，废除一切陈规陋习，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工农群众和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工农业和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可以预见，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科学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扬起来的冲天的革命干劲，一定会用到工农业生产、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引起我国国民经济的大飞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保证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

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必须在国内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和平演变”。

我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同国外阶级敌人互相呼应的。他们积极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效劳。他们要做的事情，正是赫鲁

晓夫在苏联已经做过的事情，也正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我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幻想，这是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沉重打击。

我国这场文化大革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做好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略战争的最根本的准备。广大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青少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的后备力量。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更有效地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更有力地支援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更好地完成我们光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国亿万群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必然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亿万劳动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观察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来批判旧世界，来斗争，来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布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

治。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起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新头目，现在都赤膊上阵，扯下了骗人的假面具。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同赫鲁晓夫是一路货，他们比赫鲁晓夫更坏。这就必然激起苏联人民进一步起来反对他们。这样，他们自己就加速地走向赫鲁晓夫那样的结局。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当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全世界的牛鬼蛇神就要联合起来，进行疯狂的反扑。

马克思主义刚在欧洲诞生，并开始被工人阶级所掌握的时候，敌人就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当时，欧洲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同盟”，妄图驱逐这个在欧洲出现的“幽灵”。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并取得十月革命划时代胜利的时候，正在互相厮杀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英雄”们，各国的工贼和叛徒们，又都联合起来，结成反列宁主义的“神圣同盟”，张牙舞爪地对列宁主义进行围攻。现在，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世界各国的反动派，一切新老工贼和叛徒们，又都联合起来，拼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圣同盟”，妄图抵制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妄图阻挠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历史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好汉”们，反对列宁主义的“英雄好汉”们，一个个的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英雄好汉”们，将失败得更惨。他们的叫嚣，只不过是垂死的疯狂挣扎罢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人民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正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国人民，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也具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并讲话：

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有个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现即发出。

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农村上下左右一起搞，两个席卷，一个震动。

一、农村

- ① 积极搞文化大革命。
- ② 农村实行大民主。
- ③ 不愿意搞的不勉强。
- ④ 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命。
- ⑤ 依靠贫下中农和红卫兵。
- ⑥ 达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

二、我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要受得了。

- ① 对干部的认识问题，我们过去把现状维持派当成好干部，好听现状维持派的话，没有弄清那些是革命的，那些是不革命的。
- ② 现在又发生了“痞子”问题。最闹革命的终归有缺点，现在看，要允许人家革命。怎样看待这些人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 ③ 如何认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是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运动，也是一个批判干部的运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性质不同，开始也很难分清楚。
- ④ 如何安排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如何对待，现在干部距离很大。有四种情绪：第一种抱怨情绪；第二种抱对立情绪；第三种抱抵触情绪；第四种抱无可奈何情绪。只有一条，紧跟主席思想，否则就抛开。

- ⑤ 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首先搞通自己思想，要检查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们落后思想容易接受？为什么精神不振？为什么运动以来“怕”字当头？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行，一定要垮台。现在左派反对我们好得很，因为我们犯了路线错

误。右派反对我们也好，还有黑帮反对我们，这就看你们顶得住顶不住。有人说自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很值得深思。总之两句话，大民主，人人可以出来讲话，看你怎么办？

⑥ 号召同志们学习十五期《红旗》社论。新的形势，两个利用，两个反对，五个标准。

⑦ 现在干部有五种情况：

(一) 能跟上主席思想，在游泳中已经游过去了。

(二) 在游泳中淹得够呛，但也算游过去了。

(三) 跟得很吃力，结果还是淹死了。

(四) 不下水不革命。口头上也说几句革命的话，但什么都是人家的不对。

(五) 也在那里游，但确实身体不好，游到半途了。这些水平不高，认识跟不上去，往前没有力气了，对这种人大家要帮助一下。

这次运动是全面的考查干部，看你是怎样对待革命的，怎样对待群众的，怎样对待自己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中发〔66〕612号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考虑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

三、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

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四、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

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产生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

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

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向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

七、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

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
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

八、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

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

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必须防止和坚决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和铺张浪费的现象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必须注意防止和坚决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和铺张浪费的现象》的文件并转发了河南省委批转的一份材料。河南省委认为，有的同志忘记了过去刮“共产风”的严重教训，又在那里平调生产队的粮、款、物资和劳力，铺张浪费，盲目大办各项事业。省委提出，要维护生产队的所有权，不准再搞平调，对平调生产队的粮款和物资，要坚决如数退回。对刮“共产风”的人，要严格批评教育。干部大吃大喝、多吃多占的，要检查退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参加文革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根据中央指示，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回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和串联问题，中央正在研究，不日有正式文件下达，应照文件规定执行。在未接到中央正式文件以前，应劝说这些已参加工作的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不要离开工作单位，免致工作受到损失。

中央办公厅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我国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负

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千百万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我们的工矿企业，究竟走什么道路？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呢？还是沿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极端重大的问题。

十七年来，我们的工矿企业，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工人群众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我们有很多工矿企业，无论在政治思想上，组织领导上，生产管理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严重影响。这些东西，不仅束缚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繁殖修正主义的种子，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在有些工矿企业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混进职工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分子、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勾结起来，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套，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企业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倒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那就必然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妨碍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使我国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由此可见，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就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发展生产的方法，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不靠强制，二不靠物质刺激，而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政治思想工作，靠人的思想革命化。人们的政治理想面貌改变了，精神的力量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谁最能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意义呢？首先是那些亲自参加革命和生产实践的工人群众。有些工人同志，看到工厂里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工人闹文化革命受到压制，感到非常愤慨，非常焦急；看到因为革命搞不起来，而使生产受到影响，又非常心痛。他们对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现在，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的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他们这样做，完全可以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生产，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生产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这些人不是害怕搞不好生产，而是害怕群众革他们的命。有的工人说：“他们怕群众，怕革命，怕罢官，就是不怕完不成生产计划。”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当革命群众向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疯狂的抵抗。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账”相威胁。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利益作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为自己保镖。他们甚至在幕后操纵，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制造事件，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文化革命。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

党中央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开除工人，也不准因此而解雇合同工和临时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必须一律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受到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规定，保证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正常地健康地进行。

工人阶级应当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些组织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

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一定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革命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应当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民主讨论，求得协商解决。在原则问题上应当求同，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存异。

我们一定要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政策，不断地巩固和壮大革命左派的队伍，团结大多数，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革命学生也应当欢迎本市的工人到学校去串连，以便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全国广大工人同志们，只要我们善于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尽管我们前进道路上会有困难，会有曲折，我们也一定能够乘风破浪，从胜利走向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中发〔66〕624号

黑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收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中央认为：（一）同意照你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中 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来电：

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我省城市街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九月间搞了一段，主要是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后停了下来。当前随着城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多数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即将席卷全省。街道广大的革命妇女和革命群众，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中来，斗争矛头首先指向公社（区）、分社（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干部。整个形势好得很。对基层干部将是一次大教育，大审查，大批判。对城市中的牛鬼蛇神，也将是一次大清理、大扫荡。街道有着不同于工厂、农村和机关的特点。随着运动的开展，街道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

一、街道运动重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分社（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二、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不脱产、不挣工资），是居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不是国家干部，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算做当权派。发现其中有五类分子，或有其它严重错误的，可以批判斗争；有一般缺点错误应进行批判，不适合担任现职的，进行改选。

三、在街道文化大革命中依靠谁？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

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干涉、领导。

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除五类分子外，还有劳教释放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流氓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工厂和机关开除人员、巫医神汉等。这些人员，在有的街道中竟达成年人的百分之十左右。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为防止他们进行阶级报复，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

六、我省各城市街道中，为加强对社会青年的教育，组织了劳动后备讲习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学员普遍要求和其它半工（农）半读学校一样，纳入国家统一管理，我们认为可以同意。

七、职工家属集中居住的地方，有家属委员会的，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随同工矿企业一块进行，以利于互相配合。

上述问题是否合适，请能尽早给以指示。

中共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通知

京发〔66〕063号通知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的规定，市委决定：

一、所有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都坚决执行中央的规定，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的结合。除中央有规定的特殊工厂，特殊车间外，都应无例外地热情支援革命学生的串联，不得以任何借口公开拒绝或消极抵制。

二、凡有革命学生进行革命串联的单位，都应为革命学生的活动提供应有的条件。如进行宣传活动的场地、时间、广播用具、文具纸张、食宿条件等。参加劳动的劳保用品、疾病治疗和粮食补助，按中央已有规定办理。劳动时间，可以八小时，也可以四小时，以保证有革命串联的时间。以上事项的具体安排，可由单位的党、政负责人或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同革命学生的代表协商，并尽可能尊重革命学生的意见。

三、凡持有学校文革或其它革命群众组织的正式介绍信到厂矿串联的均应视为有效，各企业、事业单位应予接受。如一个单位确因接受串联任务过重，也可以说明情况，经过协商，由上级部门适当调剂。

以上各点，望认真执行。不完全的地方，实践过程中再行补充。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

中发〔66〕629号

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涂成全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的做法。

特此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中发〔67〕2号

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重要的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

毛主席早在革命初期就指出，农民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是红军的现成后备军，以后又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一九五八年，又号召“实行全民皆兵”。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同志的信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并且说：“教育要革命”。林彪同志在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

大会上说：“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是实现毛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的一个好办法，是毛主席所说的“教育要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重大措施。这样做，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锻炼，对有些学生将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当解放军战士，对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都有极大的好处。中共中央、国务院殷切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大中学校的全体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完成军政训练的任务。

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着重学习以下几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习和时局》、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有关文件。有些学生还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同时，要学会《国际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等歌曲。提高阶级觉悟，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做群众工作，军民一致，团结对敌。军事训练，要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是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

训练办法，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派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能起模范作用的干部和战士，到革命师生中充当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团政委，负责军政训练。大专院校人民武装部和原来的民兵组织，应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各校革命师生应按照班、排、连、营、团的序列进行编组。训练地点在本校。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二十天。

总参、总政设立全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各省和大中城市，以军队为主，当地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参加，设立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负责指导此项工作。

这种短期军政训练的方法，要长期坚持下去，成为制度。今后每年暑假或寒假期间，各大中学校都要实行这种训练。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革命师生遵照执行。

2007 年 3 月 19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2 日修改

2007 年 3 月 26 日初稿